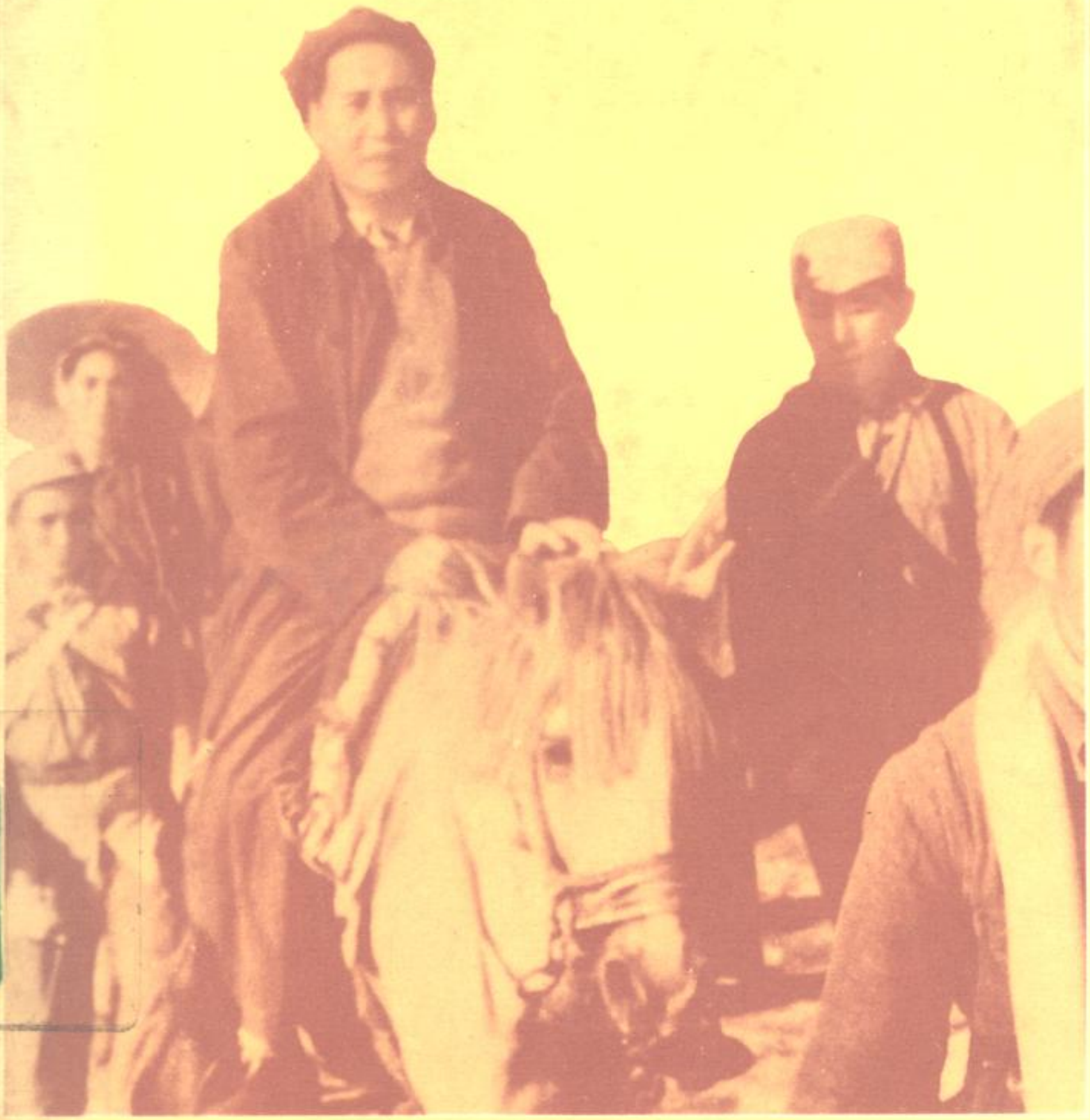
毛泽东

毛泽东在延安丛书

在延安纪事



陕西人民出版社

83349

K827
2.5

毛泽东在延安丛书

DE0266

毛泽东在延安纪事

刘益涛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陕)新登字 004 号

毛泽东在延安丛书

毛泽东在延安纪事

刘益涛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长安路南段 376 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陕西师大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大 32 开本　16.25 印张　6 插页　407 千字

1994 年 1 月第 1 版　199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

ISBN 7—5419—5339—3/G・4610

定价:17.20 元

毛泽东在延安丛书
编辑委员会

顾　问　彭　真　马文瑞

主　编　杨植霖　强晓初

副主编　李　鉴　吴　木　邵　华
王巨才　赵喜民

编　委　（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巨才　王海珠　孙钱章
刘益涛　刘孟泽　杨植霖
李　鉴　吴　木　邵　华
宋　柏　范　平　赵喜民
萧少秋　曾宪新　强晓初
廖广洲

DF-69/05

总　序

为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和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共同组织一套大型的“毛泽东在延安”丛书的编写工作。

这套丛书研究的主要内容，是中共中央率领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革命根据地前后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后（重点是从遵义会议到新中国建立）这一历史阶段，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党中央领导集体对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所进行的艰辛开拓和卓越奉献。

这一历史阶段，即延安时代，是中国共产党人继井冈山时期之后，政治上更加成熟，组织上更加团结统一，独立自主地领导中国革命和根据地建设事业的一个重要的历史阶段。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开辟，标志着党内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领导人政治上开始成熟和独立自主地领导中国革命的高超能力。后来，“左”倾错误不仅在中央，而且在许多革命根据地也居于统治地位，中国革命和根据地的事业遭到严重损失。党中央和中国工农红军被迫进行长征转移。长征，有遵义会议之前和之后的区别。长征这一历史事件的发生，有客观的原因，但主要是中央内部“左”倾错误的干扰，不能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路线独立自主地驾驭中国革命持续胜利发展。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是党的历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纠正了中央内部的“左”倾错误，进一步体现了以毛

泽东为代表的中央有能力独立自主地领导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中共中央和红军主力到达陕北革命根据地以后，正确地总结历史经验，制定了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正确的政治路线，运用整风学习的方法，教育全党的干部，掌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实现了全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团结统一，党在政治上更加成熟，领导中国革命和根据地建设事业的成就更加巨大，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这一历史阶段，在毛泽东从事革命活动的生涯中，是内容最丰富、成就最辉煌的一个时期。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的著作以这一历史阶段写得最多；他对中国革命的指导作用最为显著。正是在这一历史阶段，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正确地总结广大人民群众的创造，划清了旧民主主义和新民主主义的界线；制定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完整的理论、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和方法；明确了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条件，以及对建设新中国的初步规划；找到了加强党的建设的有效途径和方法；发扬和培育了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克服了党内不良的作风，集中地形成了具有深远意义的延安作风。正是在这一历史阶段，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作出独创性的贡献，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形成了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毛泽东思想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意识形态上层建筑的指导理论。

这一历史阶段，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领导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所取得的历史成就和积累的丰富经验，是取之不尽的宝贵财富，全国人民可以从中多方面地吸取营养，增长智慧，取得借鉴，开拓今日的事业，奔向光辉的未来。研究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应

该把这一历史阶段作为最主要的时期。

“毛泽东在延安”这套丛书的编写，许多同志付出了辛勤的劳动，我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当然，对于我们来说，这套丛书的编写出版，只是研究这一历史阶段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工作的开端，愿同各方面有志于此项事业的人士，共同把这项事业开展下去，逐步取得更多的研究成果，以推动今天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宏伟事业。

毛泽东在延安丛书编辑委员会

1993 年 7 月 1 日

目　　录

1937 年

进驻延安 …… (3)
讨论延安工作方针 …… (4)
兼任抗大教育委员会主席 …… (5)
你现在仍然是我的先生 …… (6)
《红军长征记》编竣 …… (7)
与美国女作家史沫特莱谈话 …… (8)
延安会议 …… (9)
苏区党代表会议 …… (11)
欢迎国民党中央考察团 …… (13)
支持刘少奇在白区党代表会议上的报告 …… (14)
读《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并写批注 …… (15)
收到芦沟桥事变的消息 …… (16)
呼吁社会各界迅速组成对付大事变的统一战线 …… (17)
出席党内外群众集会动员全面抗日 …… (18)
红军出动应作真实准备 …… (19)
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 …… (19)
在“八一”抗战动员运动大会上演讲 …… (20)
向南京国防会议提出对国防问题的意见 …… (21)
警惕国民党在谈判中的阴谋 …… (23)
撰写《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暂告段落 …… (25)
欢送“西北战地服务团”奔赴前线 …… (27)
洛川会议 …… (29)

适时变更八路军的战略部署 …… (31)
进一步阐述独立自主山地游击战方针的基本原则 …… (33)
写《艾著〈哲学与生活〉摘录》 …… (36)
《反对自由主义》 …… (37)
提出对待陈独秀等托派分子的原则问题 …… (38)
电贺平型关战役胜利 …… (39)
讨论《中央关于共产党参加政府问题的决定草案》 …… (40)
关于判处黄克功死刑致信雷经天 …… (41)
指出军分会10月8日指示有原则错误 …… (42)
恢复军队中政治委员及政治机关制度 …… (43)
会见叶挺商组新四军 …… (44)
反对军队中的片面观点和机械主义 …… (46)
中共中央政治局十二月会议 …… (46)

1938年

要梁漱溟读《反杜林论》 …… (51)
叫“荣誉军人教导院”好 …… (53)
写《读书日记》 …… (55)
中共中央政治局三月会议 …… (55)
与合众社记者谈话 …… (56)
会见白求恩 …… (57)
抗大的教育方针 …… (59)
出席鲁迅艺术学院成立大会 …… (60)
张国焘一贯是两面派 …… (62)
会见卫立煌 …… (64)
关于巩固与扩大晋察冀根据地的指示 …… (65)
工人要在抗日中做先锋 …… (66)
关于开展平原抗日游击战的指示 …… (67)
会见卡尔逊 …… (68)

同徐懋庸谈“两个口号”的争论问题 …… (70)
关于新四军进行游击战建立根据地的指示 …… (71)
《大公报》否认持久战是不对的…… (72)
会见国民党老党员施方白 …… (73)
《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 (74)
《论持久战》…… (75)
不能要求《西行漫记》的观点都是无产阶级的 …… (77)
抗战也需要国际援助 …… (78)
有名英雄与无名英雄 …… (79)
题《文艺突击》、《山脉文学》刊头 …… (81)
中共六届六中全会 …… (83)
永远以革命的面目相见 …… (86)
与国民党军邓宝珊部互通情报 …… (87)
致杨令德先生两封信 …… (88)

1939 年

在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上的三次讲话 …… (93)
为《陕甘宁边区实录》的出版 …… (94)
中国政府将对外来投资及外人在中国财产给以保障 …… (95)
动员开展生产运动 …… (95)
反对投降主义 …… (97)
会见印度援华医疗队 …… (98)
为《抗日模范根据地——晋察冀边区》写序 …… (99)
与马洪三问三题 …… (99)
国民精神总动员的政治方向…… (100)
《五四运动》和《青年运动的方向》 …… (101)
与萧三说《聊斋》谈《传记》…… (103)
要卡尔门在中国留八年…… (105)
警惕阎锡山投降反共…… (105)

三大政治口号的提出…… (107)
支持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发表…… (108)
我还给同志们三面旗帜…… (109)
寻问杨展和看望受伤的周恩来…… (110)
在追悼平江惨案死难烈士大会上发表演说…… (111)
和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三记者谈话 …… (113)
调王震旅返回陕北…… (115)
赶走何绍南…… (116)
取名延生如何…… (117)
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已进到新的阶段…… (118)
会见第二次访问延安的美国记者斯诺…… (120)
为《共产党人》撰写发刊词…… (121)
群众工作是克服投降危险的决定性条件…… (122)
为刘岘木刻作品题词…… (122)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 …… (123)
鱼不能没有水…… (124)
诗歌以押韵为宜…… (125)
关于晋西事变和我们的方针…… (125)
纪念白求恩…… (127)
欢迎马占山…… (128)
驳斥“毛泽东已由新疆返延安”的谣言…… (130)

1940年

加强晋西北作战的指挥…… (133)
关于陇东事件的谈判…… (133)
在理论上也要采取攻势…… (135)
还不是全国下雨之时…… (135)
《新民主主义论》 …… (136)
没有经济工作人员便没有饭吃…… (138)

新四军主要出路在江北…… (139)
声讨汪精卫…… (140)
自然科学是人们争取自由的一种武装…… (141)
设晚宴款待西北摄影队…… (142)
和平解决晋西事变…… (142)
促进和争取新民主主义宪政的实现…… (144)
抗日民主政权的“三三制”…… (145)
《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 …… (147)
决不能把中央军看成都是顽固派…… (147)
皖南新四军速移苏南为宜…… (149)
指示项英坚决执行中央关于发展华中的方针…… (150)
不能把顽固派当作汉奸打…… (151)
会见茅盾…… (152)
会见陈嘉庚…… (153)
出席延安新哲学会第一届年会…… (155)
法国投降后谈形势…… (156)
小诗无罪可以刊登…… (157)
对中间势力成分的新补充…… (158)
今后要重视国民党统治区域的工作…… (158)
中国处在大事变的前夜…… (159)
百团大战是一次更大规模的反扫荡的战役反攻…… (160)
党外资本主义是要发展的…… (161)
催促皖南新四军军部速速渡江…… (162)
黄桥战役的胜利和苏北根据地的建设…… (163)
对反共俘虏的政策…… (165)
起草关于防止和纠正“左”倾错误的指示…… (166)
准备对付最黑暗的局面…… (167)
要做“政治坚定、技术优良”的医生…… (169)
争取友军和黄埔生军人…… (170)

对《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作重要的修改…… (170)
关于华中地区的各项政策…… (172)
《论政策》 …… (173)
指示项英等克服动摇犹豫，坚决执行北移方针…… (175)

1941 年

在皖南事变发生的时候…… (179)
正确的反攻方针的形成…… (181)
为皖南事变发表的命令和谈话…… (182)
看到报纸题字为之神往…… (184)
从重庆订购书报的目录…… (185)
对边区资本主义发展不要害怕…… (185)
对《论出版专门妇女刊物问题》一文的批评…… (186)
对《苏日中立条约》签订发表意见…… (187)
关心续范亭在延安医疗…… (189)
对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的重要改写…… (190)
《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 …… (191)
配合国民党军与日军在中条山作战…… (194)
延安《解放日报》创刊…… (195)
《改造我们的学习》 …… (196)
对于青年工作的指示…… (197)
当听到逆耳之言以后…… (198)
中条山战役后对国民党的方针…… (199)
关于陕某宁边区财政经济预决算的问题…… (201)
准备配合苏联对日作战的方针…… (202)
苏德战争的预测彼方甚为重视…… (203)
会见回民抗日骑兵团团长马思义等…… (204)
对萧军的信任和帮助…… (205)
关于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政策的争论问题…… (206)

任中共中央调查研究局主任…… (209)
为《鲁忠才长征记》写按语…… (211)
任中共中央思想方法学习小组组长…… (211)
再次提出德波林主义是中共党内教条主义的主要思想根源之一…… (212)
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九月会议）…… (214)
任中央学习组组长…… (214)
对王明错误的批评和帮助…… (217)
肯定李鼎铭提出的关于精兵简政的提案…… (219)
从日本东条英机上台到太平洋战争爆发…… (220)

1942 年

接见绥德青年代表…… (227)
为《文化课本》作序…… (227)
号召全边区部队学习研究古田会议决议…… (228)
第一次公开承认资本主义生产并给予奖励…… (228)
修改审定《中共中央关于如何执行土地政策决定的指示》…… (230)
《整顿党的作风》 …… (231)
参观延安讽刺画展…… (233)
要造成一河革命的大水…… (234)
参加张浩的葬礼…… (235)
改进《解放日报》工作…… (237)
鼓励舒群当主编…… (239)
《如何研究中共党史》 …… (240)
“四三”决定 …… (241)
约见作家了解情况…… (242)
与几位党员作家谈文说艺…… (244)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 (245)

要使小鲁艺与大鲁艺结合起来…… (248)
你的诗做了座右铭…… (249)
成立中央总学习委员会…… (250)
提出战后建国方针…… (251)
不要把什么都说成是张国焘路线…… (253)
此次整风是全党的…… (253)
一次未实现的毛蒋西安谈判…… (254)
精兵简政要来一个大举方能切实见效…… (256)
精兵简政的辩证法…… (257)
务使我们的宣传增强党性…… (259)
为延安《解放日报》第四版拟定征稿办法…… (261)
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 (263)
指示晋西北把敌人挤出去…… (265)
连续撰写几篇关于国际形势的文章…… (266)
讲斯大林论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 (267)
撰写《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 (270)

1943 年

保持施政纲领的稳定性…… (275)
为受奖同志题词…… (276)
与政府党外人士座谈会可每两月召集一次…… (277)
称赞新秧歌剧《兄妹开荒》和为枣园老人祝寿…… (277)
妇女工作者应参加经济工作…… (278)
任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书记处主席…… (279)
同意新四军释放在反磨擦战斗中俘虏的韩德勤…… (280)
生日决定不做…… (281)
关于何时打败日本问题的宣传工作的指示…… (282)
为刘志丹陵园纪念碑题字…… (283)
同意关于解散共产国际的提议…… (283)

会见邓宝珊…… (286)
中共中央为抗战6周年纪念宣言…… (287)
不赞成“毛泽东主义”的提法…… (288)
运用舆论反击国民党进攻…… (289)
你的《游击队歌》写得很好啊…… (292)
评蒋介石《中国之命运》…… (293)
纠正“抢救运动”的错误…… (294)
发动反对中国的法西斯主义的运动…… (296)
送大批干部回后方保存甚为必要…… (297)
视察南泥湾…… (298)
总结抗日战争克敌制胜的十大政策…… (300)
评国民党十一中全会和三届二次国民参政会…… (301)
合作社方式和组织起来…… (304)
展开讨论抗日时期党的路线问题…… (305)
开罗会议和德黑兰会议…… (308)

1944年

正确处理季米特洛夫的来信…… (313)
旧剧革命的划时期的开端…… (314)
为个人生产节约计划事致信林伯渠…… (315)
边区的文化教育工作要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315)
称赞《延市完小面貌一新》是好新闻…… (316)
不但是指创作时“集中”起来…… (317)
贸易金融财政是组织全部经济生活的重要环节…… (318)
我欢迎你这个态度…… (319)
《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 …… (321)
《学习和时局》 …… (322)
关于《永昌演义》一书致信李鼎铭…… (326)
半百年华不知老…… (327)

宴请林迈可…… (328)
中共六届七中全会…… (329)
共产党员都应该学习经济工作…… (330)
向在审干和“抢救”运动中受委屈的同志摘帽道歉…… (331)
起草《中央关于城市工作的指示》…… (334)
会见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 (336)
每一个模范合作社都是一本活的教科书…… (339)
在抗日根据地内是有很多伯乐的…… (341)
请各地调查和答复10个问题 …… (342)
欢迎美军驻延安观察组…… (343)
建立新民主主义家庭…… (344)
提出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 (347)
与延安市委书记谈工作…… (349)
《为人民服务》 …… (351)
新闻工作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352)
在陕甘宁边区文教大会上讲话…… (353)
组织南下支队挺进华南…… (354)
与赫尔利谈判…… (356)
赞扬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 (360)
作题为《一九四五年的任务》的演说…… (361)
不要使英雄模范因骄傲而落选…… (363)

1945年

在陕甘宁边区英模大会上讲话…… (367)
关于召开国事会议预备会议的谈判…… (368)
向前来拜年的延安市西区军民代表讲话…… (371)
要使延安文艺工作者多参加群众性的集会…… (372)
我们这里是一个大秧歌…… (373)
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猪仔国民大会…… (373)

旧金山会议我们要参加…… (375)
对《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案的多次修改…… (376)
致七大开幕词…… (378)
作《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 (379)
作关于选举方针的报告…… (382)
拒绝参加四届一次国民参政会…… (385)
和黄炎培谈跳出这个“周期率” …… (387)
《评赫尔利政策的危险》 …… (388)
撰写新闻稿《爷台山战事扩大》 …… (390)
就苏联对日宣战发表声明…… (391)
不应夸大原子弹的作用…… (392)
得知日本宣布投降的消息…… (393)
坚决地彻底地反对蒋介石的命令…… (395)
赴重庆谈判…… (397)
作《关于重庆谈判》的报告…… (400)
邯郸战役…… (402)
接见作家草明…… (405)
播发以中共发言人名义发表的谈话…… (406)
在柳树店王家坪治疗休养…… (407)
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 (408)

1946 年

你应该上中国的“劳动大学” …… (413)
下达停战令…… (414)
拥护重庆政治协商会议…… (415)
警惕中国法西斯分子的阴谋…… (417)
欢迎马歇尔等最高军事三人小组…… (418)
中共中央准备搬迁到清江浦…… (419)
倾听梁漱溟陈述政见…… (421)

我只接受第十一个宪法…… (422)
我感觉对你及许多同志很负疚…… (423)
批准叶挺入党…… (424)
向“四八”被难烈士致哀…… (425)
为什么不叫“人民日报”…… (426)
化四平街为马德里…… (426)
中原突围胜利第一…… (429)
先在内线打几个胜仗…… (432)
为争取和平民主而牺牲的斗士精神不死…… (434)
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 (435)
听盲艺人说书…… (437)
苏中七战七捷…… (438)
接见延安解放前的大地主张永泰…… (442)
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 (443)
主要应澄清悲观思想指出必胜前途…… (445)
坚决反对召开伪国大…… (445)
在枣园后沟召开的三人重要会议…… (447)
采纳陈赓“围魏救赵”之计…… (449)
与西方记者的问与答…… (450)

1947 年

从新的观点出发研究法律甚为必要…… (455)
第二次接见起义军官…… (455)
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 (457)
指示华野必要时放弃临沂…… (458)
可以打两把菜刀…… (460)
拿一个延安换一个全中国…… (461)
我是要最后撤离延安的…… (463)

附录：毛泽东在延安活动简表…… (465)

后记…… (501)

1937 年

进驻延安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折的枢纽，消除了内战的危险，实现了中国由内战到抗战的转变，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发展。

“西安事变”后，东北军撤离延安向西安一带集中。按照与东北军达成的协议，由工农红军接管延安。但这时，延安还是由国民党地方民团和县府保安队等千余人据守着。周恩来在1936年12月15日赴西安商谈国事的前一天，指示有关同志与国民党县府官员谈判，争取尽可能和平解放延安，如果不行，再由部队解决。12月17日，江华率领红一团进驻延安，接管了县府，并很快组成以王观澜、江华为首的工作委员会，王观澜任书记，江华任延安城防司令兼政治委员。1937年1月初，中央警卫团团长黄霖带领警卫部队到延安，为党中央进驻延安做准备。

这时，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还在保安。12月底的一天晚上，毛泽东写好《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刚搁下笔，见警卫员进来送开水，就嘱咐他说：“你们几个都把东西收拾好，借老乡的东西要还清，损坏的要赔偿，我们再过几天就要搬家了。”警卫员问：“主席，往哪里搬呀？”毛泽东说：“往陕北最大的城市搬，那里有汽车、飞机场、商店，总比保安大多了，好多了。”警卫员猜出来了，问毛泽东：“我们是不是要搬到延安去？”毛泽东笑着说：“你猜对了，我们就是要搬到延安去。”

1937年1月10日，保安的乡亲们都来给毛泽东送行，大家含着热泪说：“我们实在不想让您和红军同志走啊！”毛泽东亲切地对乡亲们说：“革命形势的发展，使我们不得不离开这里，迁到延安去。到延安去，是为了迎接新的战斗。我们到了延安，永远不会忘记保安人民对中国革命作出的贡献！”这一天，毛泽东率中共中央机关恋恋不舍地告别了前来欢送的乡亲们，离开住了6个月

的保安，向延安出发了。

毛泽东等经过 4 天的长途行军，1 月 13 日到达延安。快要进城的时候，毛泽东对周围的同志们说："延安，在陕北来说，是个大地方，是陕北的大城市。过去延安一直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下，现在刚刚解放不久，群众还不了解我们，我们一定要很好地联系群众，要注意群众纪律，要对群众多做宣传工作。"

这一天，延安人民听说毛主席来了，都纷纷聚到大路两旁，有红军指战员、机关干部、学生、城乡群众，还有从四乡赶来的赤卫军和甘泉、富县的群众代表。欢迎的人群从北门一直排到数里外的大砭沟口。大家高举着五颜六色的三角形旗帜，上面写着"热烈欢迎党中央、毛主席进驻延安"、"中国共产党万岁"、"团结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

下午 2 时许，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经延安西北川，沿杨家湾、兰家坪、杨家岭小路而下。各界代表立即跑向前去迎接。毛泽东同代表们一一握手问好！这时，有一位代表牵来一匹头扎红布大花球、脖子上系着铮光发亮的铜铃铛的高头大马，请毛主席骑马过河。毛泽东感谢延安人民的盛情，谢绝了骑马，同代表们一起走下河岸，踏着坚冰，走过河去。他和蔼亲切地和代表们肩并着肩，边走边谈。他关切地询问了延安人民的生产、生活状况，又问到各革命团体开展工作的情况。当毛泽东等走到大砭沟口时，沿路两旁响起了锣鼓声、唢呐声和鞭炮声！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微笑着，频频向群众点头挥手。欢迎的群众见毛泽东走来，沸腾了，个个欢腾雀跃，欢呼声、口号声和歌唱声响成一片。

讨论延安工作方针

中共中央进驻延安后，于 1937 年 1 月 15 日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延安工作问题。毛泽东出席会议，在听取延安工作委员会书记王观澜汇报在延安 20 多天的工作情况后，毛泽东发言指

出：延安工作方针与方法基本上是好的，产生了好的影响，应该继续这一方针。现在不打土豪，土豪喜欢；保护商人，商人喜欢；取消苛捐杂税，使贫民喜欢。以后应进一步使群众更加喜欢，使土豪喜欢减少。毛泽东强调：应该使在延安工作的同志明了，延安工作对全国有影响，延安的各种具体工作都应把握这一原则。关于延安的政权形式问题，毛泽东说：抗日救国会只是暂时的，这里最好是不派县长，应成立抗日革命委员会，将来要成为苏维埃政权。因为这是我们首都所在地，不应与人共管。关于金融问题，毛泽东说：认为用白票（指国民党政府发行的纸币）就不能用苏票（指苏维埃政府发行的纸币），用苏票就不能用白票，这种估计是过分的。我同意朱总司令的意见，还是在城内苏票、白票混用。我认为中心问题是从外面办货来的问题，用合作社来调剂是可以的。

兼任抗大教育委员会主席

1937年1月中旬，根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中央军委为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决定把抗日红军大学正式改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除继续培养红军干部外，把培养革命知识青年作为抗大的一项重要任务。校部也由保安迁到党中央的所在地——延安。校长仍是林彪、副校长刘伯承，教育长罗瑞卿。由于学员数量的增加和学校的扩大，为加强领导，中央军委决定成立抗大教育委员会，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兼任抗大教育委员会主席，直接领导学校的教育和建设工作。

3月2日，抗大举行第二期开学典礼，毛泽东亲临大会并讲话，他指出：抗大象一块磨刀石，把那些小资产阶级意识——感情冲动、粗暴浮躁，没有耐心等等，磨它个精光，把自己变成一把雪亮的利刃，去创新社会，去打倒日本。毛泽东勉励全校教职学员特别是知识青年努力改造思想，献身于抗战和创造新社会的

伟大事业。

你现在仍然是我的先生

徐特立，当时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教育部部长，他是毛泽东早年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求学时的老师。

1937年2月1日，是徐特立的60寿辰。中共中央为了表示对这位老战士的敬重，特地在1月30日那天为他举行庆祝会。毛泽东除亲自出席庆祝会，为徐老祝寿外，同一天还给徐特立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祝贺信。贺信说：

“徐老同志：你是我二十年前的先生，你现在仍然是我的先生，你将来必定还是我的先生。当革命失败的时候，许多共产党员离开了共产党，有些甚至跑到敌人那边去了，你却在一九二七年秋天加入共产党，而且取的态度是十分积极的。从那时至今长期的艰苦斗争中，你比许多青年壮年党员还要积极，还要不怕困难，还要虚心学习新的东西。什么‘老’，什么‘身体精神不行’，什么‘困难障碍’，在你面前都降服了。而在有些人面前呢？却做了畏葸不前的借口。你是懂得很多而时刻以为不足，而在有些人本来只有‘半桶水’，却偏要‘淌得很’。你是心里想的就是口里说的与手里做的，而有些人他们心之某一角落，却不免藏着一些腌腌臢臢的东西。你是任何时候都是同群众在一块的，而在有些人却似乎以脱离群众为快乐。你是处处表现自己就是服从党的与革命的纪律之模范，而在有些人却似乎认为纪律只是束缚人家的，自己并不包括在内。你是革命第一，工作第一，他人第一，而在有些人却是出风头第一，休息第一，与自己第一。你总是拣难事做，从来也不躲避责任，而在有些人则只愿意拣轻松事做，遇到担当责任的关头就躲避了。所有这些方面我都是佩服你的，愿意继续地学习你的，也愿意全党同志学习你。当你六十岁生日的时候写这封信祝贺你，愿你健康，愿你长寿，愿你成为一切革命党人与

全体人民的模范。”

在毛泽东的发起下，徐特立共收到祝词、诗、文章等达千余篇。

《红军长征记》编竣

1937年2月22日，在毛泽东的关怀下《红军长征记》在延安编竣。内收110篇作品，计30余万字。因为国内政治形势变化，这部书推到1942年11月20日由八路军总政治部正式出版。毛泽东是这部书编写的发起人之一。1936年8月5日，他与红军前线总指挥部总政治部副主任杨尚昆联名给各部队和参加长征同志发出征稿的电报和信件。内称：“现有极好机会，在全国和外国举行扩大红军影响的宣传，募捐抗日经费，必须出版关于长征记载。为此，特发起编制一部集体作品。望各首长并动员与组织师团干部，就自己在长征中所经历的战斗、民情风俗、奇闻轶事，写成许多片断，于九月五日以前汇交总政治部。事关重要，切勿忽视。”另一件内称：“现因进行国际宣传，及在国内国外进行大规模的募捐运动，需要出版《长征记》，所以特发起集体创作，各人就自己所经历的战斗、行军、地方及部队工作，择其精彩有趣的写上若干片断。文字只求清通达意，不求钻研深奥，写上一段即是为红军作了募捐宣传，为红军扩大了国际影响。来稿请于九月五日以前寄到总政治部。备有薄酬，聊志谢意。”这部书的具体编辑是丁玲、成仿吾、徐梦秋等。一共收到几千篇稿子。在正式出版前，一些作品已在国内外报刊上发表，起到积极作用，达到预期的目的。《红军长征记》的编纂工作是我党直接领导和发动的一次成功的写作运动。

与美国女作家史沫特莱谈话

1937年3月1日，毛泽东出席延安文艺协会和新中华社联合欢迎女作家史沫特莱到延安访问的集会。毛泽东还以“围剿”二字作了简短演说。

同日，毛泽东在凤凰山住处会见史沫特莱，就中日问题与西安事变同她进行了问答。

史沫特莱问：共产党现在执行的反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有无改变？

毛泽东答：从基本上说来，是没有什么改变的。我们的民族统一战线是抗日的，不是反对一切帝国主义，而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但是我们要求英、美、法等国同情中国的抗日运动，至少善意中立；在这个基本上我们愿意同这些国家建立友谊的关系。我们的反日民族统一战线是民族的，包括全民族一切党派及一切阶级，只除开汉奸在外。有人说共产党倡导人民阵线，这是不对的。共产党倡导的是民族战线，这种民族战线比起法国或西班牙的人民阵线来范围广大许多。

问：新的反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是否即可认为中国共产党人为建立民族战线，放弃阶级斗争，而变成了民族主义者？

答：中国共产党决定实行的各种具体政策，其目的完全在为着真正抵抗日本，保卫中国。共产党人决不将自己观点束缚于一阶级与一时的利益上面，而是十分热情地关心全国全民族的利害，并且关心其永久的利害。在阶级斗争问题上，我们主张从两方面努力，适当地解决这一问题。中国共产党现在提出的这些政策，没有问题的是带着爱国主义性质的。有人说共产党是国际主义者，他们是不顾民族利益的，他们不要保卫祖国，这是极糊涂的话。中国共产党是国际主义者，他们主张世界大同运动；但同时又是保卫祖国的爱国主义者，为了保卫祖国，愿意抵抗日本到最后一滴

血。

问：对日作战是否已成为不可避免？

答：不可避免。在日本人民推翻日本军阀政府以前，日本的侵略政策是不会停止的，因此，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德日协定之后，战争的威胁更加紧一步。

……

毛泽东与史沫特莱的谈话在3月16日至4月3日的《新中华报》上全文发表了。毛泽东十分重视这篇谈话稿，曾想通过美国记者斯诺和《大公报》记者范长江，在国内外广为宣传。

3月10日，毛泽东致信斯诺："自你别去后，时时念到你的，你现在谅好？我同史沫特莱谈话，表示了我们政策的若干新的步骤，今托便人寄上一份，请收阅，并为宣播。我们都感谢你的。"

3月29日，毛泽东致信范长江，说"你的文章（指范长江访问西安和延安后，在《大公报》上发表的报道西安事变真相和中共抗日主张的新闻通讯——引者）我们都看过了，深致谢意！寄上谈话（即毛泽东与史沫特莱的谈话——引者）一份，祭黄陵文一纸，借供参考，可能时祈为发布。"

延安会议

1937年3月23日至31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即延安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张闻天、朱德、张国焘等56人。会议议程有两项：（一）国民党三中全会后中国共产党的任务。（二）关于张国焘的错误问题。

3月23日，毛泽东就第一项议程发言。他说：现在中日矛盾是主要的，国内矛盾降到次要的地位。我们的政策变化，国民党的政策变化，主要的根据就是这一主要矛盾。为了抗日要争取民主，是目前的主要任务，是这次政治局会议的主要议事日程。一切都要带国防性，政治的军事的文化的各方面的都是要为着抗日。

毛泽东还指出：资产阶级从来都是想无产阶级服从它，做它的尾巴，这是应当着重说明的，并加紧对群众的教育。

3月27日，会议开始第二项议程。首先张国焘作检查，他承认自己“是路线的错误，是退却逃跑的错误，是反党反中央的错误”。但在一些具体的错误事实上，却又进行狡辩，拒不认错。3月30日，毛泽东就第二项议程发言。他主要批评了张国焘的“机械论”和“狭隘经验论”及其“后梯队思想”。他说：张国焘只承认看得到的东西，因此他的思想是反理论反原则的。他老是将自己描绘成实际家，恰恰证明他是真正的经验论。那次我们接到捉了蒋介石的消息以后，他举出几十条理由要求杀蒋介石。张国焘要改正自己的错误，首先要放弃自己的经验论。毛泽东接着说：张国焘的机械论，只看见形式，不看见内容。他把日本和蒋介石看作有无穷力量的魔鬼，害着恐日病和恐蒋病，说什么10倍于现在的力量也不能战胜日本，在革命战争中只想起“后梯队”的作用。他看不见日本和蒋介石都存在着种种矛盾。他不承认事物内部的矛盾，不知道红军中、共产党内部都有矛盾，只有加强党内斗争、思想教育和党内民主来解决这些矛盾。毛泽东在最后指出：张国焘入党以来，还曾有若干阶段是在党的路线下工作的，但他的机会主义史问题是必须要指出来的。我们应该用诚恳的态度要求张国焘转变，抛弃他的错误，今后应从头干起。

会上，许多同志提出，要给张国焘做组织结论，并开除其党籍，撤销其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红军总政委、军委副主席等职务。但毛泽东等考虑，为了挽救张国焘，还应给他改正错误的机会和时间，暂不给张国焘做组织结论。经过说服工作，与会同志大多数同意了，最后由张闻天代表党中央提出这个提议。3月31日，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张国焘错误的决定》，指出了张国焘错误的性质和主要内容，暂不给张国焘做组织结论。

延安会议后，在党内军内广泛深入地展开了揭发批判张国焘路线的斗争。4月24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反对张国焘路线讨论

大纲》，进一步系统分析了张国焘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和军阀主义、分裂主义的罪恶。同时，中共中央对张国焘本人继续采取帮助教育的态度，并在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后，安排张国焘担任了边区政府的代主席。

苏区党代表会议

苏区党代表会议即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1937年5月2日至15日在延安召开。出席会议的有来自苏区、白区和红军中党的正式代表218人，列席者64人。

5月2日下午会议在延安中央大礼堂正式开幕。毛泽东被推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

5月3日、4日，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作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报告（建国后，编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时，题为《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毛泽东指出："由于中日矛盾成为主要的矛盾、国内矛盾降到次要和服从的地位而产生的国际关系和国内阶级关系的变化，形成了目前形势的新的发展阶段。"从1935年一二·九运动到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党提出的争取和平的任务已经基本实现，下一段的任务主要就是争取民主。没有民主自由，便不能巩固已经取得的国内和平，不能增强国内的团结；没有民主自由，便无从动员人民参加抗战，所以争取民主，成为目前发展阶段中革命任务的中心一环。毛泽东接着指出：为争取民主和自由，中国必须实行两方面的民主改革：第一方面，将政治制度上国民党一党一派一阶级的反动独裁政体，改变为多党派多阶级合作的民主政体。第二方面，是保障人民的言论、集会、结社自由。毛泽东还指出："使无产阶级跟随资产阶级呢，还是使资产阶级跟随无产阶级呢？这个中国革命领导责任的问题，乃是革命成败的关键。"而"无产阶级怎样经过它的政党实现对于全国各革命阶级的政治领导呢？首先，是根据历史发展行程提出基本的

政治口号，和为实现这种口号而提出关于每一发展阶段和每一重大事变中的动员口号。”“第二，是按照这种具体目标在全国行动起来时，无产阶级，特别是它的先锋队——共产党，应该提起自己无限的积极性和忠诚，成为实现这些具体目标的模范。”“第三，在不失掉确定政治目标的原则上，建立与同盟者的适当的关系，发展和巩固这个同盟。”“第四，共产党队伍的发展，思想的统一性，纪律的严格性。”毛泽东最后指出：为了保证党对全国人民的政治领导，必须同“左”，右两种错误倾向作斗争，即要反对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又要反对尾巴主义。

5月8日下午，毛泽东在会上又作了题为《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结论。毛泽东在结论中进一步阐述了和平、民主和革命前途等问题之后，着重阐述了党的干部问题、民主集中制问题和全党的团结问题。毛泽东说：“指导伟大的革命，要有伟大的党，要有许多最好的干部。”“我们党的组织要向全国发展，要自觉地造就成万数的干部，要有几百个最好的群众领袖。这些干部和领袖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有政治远见，有工作能力，富于牺牲精神，能独立解决问题，在困难中不动摇，忠心耿耿地为民族、为阶级、为党而工作。党依靠着这些人而联系党员和群众、依靠着这些人对于群众的坚强领导而达到打倒敌人之目的。这些人不要自私自利，不要个人英雄主义和风头主义，不要懒惰和消极性，不要自高自大的宗派主义，他们是大公无私的民族的阶级的英雄，这就是共产党员、党的干部、党的领袖应该有的性格和作风。”关于党的民主集中制和全党团结问题，毛泽东说：“要党有力量，依靠实行党的民主集中制去发动全党的积极性。”又说：“只有经过共产党的团结，才能达到全阶级和全民族的团结，只有经过全阶级全民族的团结，才能战胜敌人，完成民族和民主革命的任务。”

会议批准了毛泽东的报告和结论，批准了1935年遵义会议以来党中央的正确路线，确定了新形势下的方针和任务，为迎接全

国抗日战争的到来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军事上作了重要的准备。

欢迎国民党中央考察团

1937 年 5 月，国民党派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西安行营考察团（简称中央考察团）到陕甘宁特区和红军驻地考察，了解中国共产党和特区的各方面情况，以及中国共产党对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态度。

中央考察团一行 18 人，在涂思宗、萧致平率领下，于 5 月 29 日下午 5 时到达延安。当晚陕甘宁特区举行欢迎晚会，毛泽东出席晚会并致欢迎词。毛泽东说：这次欢迎大会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因为第一次大革命时代是由国共两党合作干起来的，现在与那时不同，民族危机比那时严重，因此，今天国共合作比以前合作的意义与作用是更大的。过去 10 年国共两党没有团结，现在民族危机严重，如果国共两党再不团结，国家就要灭亡。考察团此来，使国共两党团结进入新的阶段，其意义是很大的。毛泽东在致词中还批评了两种错误观点：一是怀疑国共两党合作是否有诚意；一是怀疑国共两党合作只是临时的策略。他说：考察团的到来，中国共产党召开欢迎会，就是国共合作的表现。我们希望两党长期合作下去，并且努力朝着这个目标做。毛泽东还说："在中国历史上，我们所写的文章，是为着民族解放，是为着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今后要写文章，一个人是写不成的。写民族独立固是一篇大文章，写由封建专制转入民权自由更是一篇长文章，民生幸福的一篇自然是更大更长的文章。我们希望的是使两党合作达到新的阶段，这不是短期的合作，是长期的问题，这篇文章怎样写，共产党的笔已经在手里了。"

5 月 30 日下午，延安各机关、群众团体和武装部队在城南门外大操场召开五卅纪念与欢迎中央考察团的群众大会。毛泽东出

席并讲话。他说：日本帝国主义要灭亡中国，现在中国最中心最主要的任务就是打日本救中国。要打日本救中国，就要国内团结。他还就某些人怀疑国共两党是否有诚意合作等问题，作了详尽的解释。

国民党中央考察团在延安考察了抗日军政大学、中共中央党校和各武装部队，受到中共中央和延安各界群众的热情接待。国民党中央考察团表示愿将苏区各界对国共两党合作的愿望和诚意转达南京政府，以迅速促进对日抗战的实现。

支持刘少奇在白区党代表会议上的报告

1937年5月17日至6月10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白区党代表会议。会议由刘少奇等主持。会议开始，刘少奇作了《关于白区的党与群众工作》的报告。刘少奇在报告中，着重说明白区的党和群众工作要实行“彻底转变”，批评了历史上党和群众工作中出现的严重关门主义、宗派主义、冒险主义的错误，提出适应建立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要求的党和群众工作的政策。与会代表在讨论刘少奇的报告时出现了一些分歧，有的代表没摆脱“左”的思想影响，认为刘少奇的报告有右的倾向，批评了刘少奇一些正确的观点。

为此，6月1日至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白区工作问题。6月3日，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对有意见分歧的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说：少奇的报告基本上是正确的，错的只是在个别问题上。他对这个问题有丰富的经验，他一生在实际工作中领导群众斗争和处理党内关系，都基本上是正确的，他懂得实际工作的辩证法。他系统地指出党过去在这个问题上所害过的病症，他是一针见血的医生。毛泽东还说：党在15年中造成与造成着革命的与布尔什维克的传统，这是我们党的正统。我们党内也存在着某种错误的传统，这就是群众工作、宣传教育与党内关

系问题上的“左”的关门主义、宗派主义、冒险主义、公式主义、命令主义、惩办主义的方式方法与不良习惯的存在。这在党内还没有克服干净，有些还正在开始系统地提出来解决。毛泽东还提出造成“左”的传统的几种原因，指出要克服“左”的传统，在于普及与深入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唯物辩证法）于多数干部中。总之，毛泽东在发言中肯定了刘少奇在党的白区工作会议上所作报告的正确性，并指出一些人的看法是欠妥的。

6月6日，张闻天根据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在党的白区代表会议上作了白区党目前的中心任务的总结报告，从总的方面肯定了刘少奇的报告，批判了“左”倾关门主义，并要求党在白区的实际工作中贯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

读《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并写批注

《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上册）一书由苏联学者米丁等著，中国学者沈志远翻译，中山文化教育馆编辑，1936年12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全书34万多字，共分六章三十四节。在1937年7月以前，毛泽东仔细研读了这本书，同时作了批注。

毛泽东的批划和批注主要集中在第三章第五节“社会的实践为认识底标度”、第四章第一节“对立体一致底法则”和第二节“量变质和质变量底法则”。批注明确提出了“实践是真理标准”；“实践高于认识”；“正确的理论积极地指导着实践”；“实践是发展的，理论也应是发展的”等等有关实践的基本观点，强调并复述了“实践之观点是认识论第一的观点”。对对立统一规律批注较多，如“外因通过内因并被曲折才能发展”；“不废除外因，但内因是主导的。不明内因，即无从了解发展”；“任何现象自身的矛盾性引起了事物发展，这是唯物辩证法的发展观的基本要素”；“运动就是矛盾，即是连续和中断的一致。托洛斯基只肯定不间断而否定间断，斯特鲁威等肯定间断而否定不间断，都是错的。动与静

的一致，续与断的一致，今与明的一致，上与下、生与死、民主与独裁的一致，矛盾就是运动”；“将一体分裂为二的见解，是辩证法的基本特质”；“统一是相对的，斗争是绝对的”；“新事物发生即原有矛盾的解决，原有对立及其统一同时消除，新矛盾开始发展”等等。对于量变质变规律也有较多批注，如“质是现象的定性，规定现象之特殊个性，因此使各现象能互相区别”；“一定的特殊的质必具有一定的特殊的量，单纯的质和量是没有的”；“量的变化是以质的定性为基础而受其限制的，但同时量的变化又反过来影响质。这即是说，受一定的质规定的事物，只在某一瞬间〔以前〕是这样，等到量的变化达到一定质的限度和一定的界限时，量就要求质的变化。同时这一变化，也是由质到量的变化，旧质一消灭，新量就向前发展了”；“只有经过量的变化才能发生质的变化”等等。从上述批注内容看，与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有直接联系。这说明毛泽东研读《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上册），是为他写作哲学著作做准备的。

收到芦沟桥事变的消息

7月7日晚，《新中华报》编辑左漠野等人抄收到中央社关于日本军队进攻芦沟桥，中国军队奋起抵抗的几条消息。中共中央党报委员会秘书长廖承志当即吩咐《新中华报》主编向仲华和左漠野两人把这几条消息立即送给毛主席看。大约是晚上11点钟左右，向仲华和左漠野提着马灯，带着这几条新闻电讯，到了毛泽东住处。毛泽东习惯夜间工作，此时住处灯火通明，身边的工作人员都已经上班了。向仲华向毛泽东简要地报告日军已向芦沟桥发动进攻，并将几份电讯稿呈上。毛泽东看了电讯稿后，就要秘书拿来一张地图，把地图铺在桌子上，用一个放大镜低头细看。毛泽东边看边自言自语地低声说道：芦沟晓月。看完地图后，毛泽东对向仲华说：你们今晚要继续抄收这方面的消息，不要遗漏，有

什么消息，随时送来给我看。你们回去以后，告诉博古（当时任中共中央党报委员会主席）和廖承志，请他们考虑一下，我们对这个事件如何表态。向仲华、左漠野回来以后，就把毛泽东的指示向廖承志汇报了。

7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芦沟桥通电》，呼吁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这一天，毛泽东与朱德、彭德怀、贺龙、林彪、刘伯承、徐向前又发表了《红军将领为日寇进攻华北致蒋委员长电》，要求实行全国总动员，保卫平津，保卫华北，收复失地。红军将士愿为国效命，以达保土卫国之目的。还是这一天，毛泽东与朱德等又致电国民党军北平第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天津第三十八师师长张自忠，张家口第一四三师师长刘汝明，保定第三十七师师长冯治安，请他们策励全军，为保卫平津而战，为保卫华北而战！红军战士，义愤填胸，准备随时调动，追随贵军，与日寇决一死战！

呼吁社会各界迅速组成对付大事变的统一战线

7月9日，毛泽东收到叶剑英来电。来电说，芦沟桥事件轰动全国。西安救国团体向中共提出四项建议：（一）向南京及全国请求派队援助二十九军。（二）红军立刻准备进行增援华北的动员。（三）电贺二十九军芦沟桥的英勇抗战。（四）派员前往华北组织抗日义勇军。

毛泽东接电后，同张闻天当即复电叶剑英：请答复救国会及各方，我们同意他们的各项要求，并且正在做。请他们努力与政府、国民党党部及各界领袖协商，迅速组成对付大事变的统一战线，唯有全国团结才能战胜日本。

同日，毛泽东同张闻天又致电上海、太原、广西、西安党的负责人，指示他们根据党的宣言及红军通电、与当地政府、党部

及各界领袖协商，迅速组成统一对外之阵容。毛泽东强调只能这样才能应付大事变，再次指出唯有全国团结才能战胜日本。

为团结抗日，毛泽东还特别注意搞好与苏区周边友军的关系。7月13日，毛泽东致电叶剑英，指示他积极同中央军十七路军及冯钦哉等接洽协商对日坚决抗战之总方针及办法。同日，为国民党军高桂滋师和李仙洲师开赴抗日前线，与朱德联名发出致敬电。14日，毛泽东致电中共神府特委，指出：高桂滋、李仙洲部准备继续开赴抗日前线，望立即严令神府党政机关及地方部队，对他们所遗防地，我们不得有丝毫侵占和骚乱行为，应各守原防不得异动。在这段时间里，毛泽东与朱德多次致电国民党军驻榆林的高双成师长，协商解决骑匪滋扰苏区事。7月14日、15日、17日、20日，毛泽东四次致电阎锡山，呼吁团结抗日，协商抗日办法。

出席党内外群众集会动员全面抗日

7月13日，延安召开共产党员和机关干部紧急会议。毛泽东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号召每一个共产党员与抗日的革命者，应该沉着地完成一切必需的准备，随时出动到抗日前线。第二天，毛泽东同朱德即发布红军在10天准备完毕，待命开赴抗日前线的命令。也是这一天，毛泽东在关于广东、广西、四川各地方当局对全国抗战应采取的方针问题致张云逸的电报中指出：各方此时的任务是，一方面促成蒋介石建立全国抗战的最后决心；一方面自己真正地准备一切抗日救亡步骤，并同南京一道去做。

7月18日，延安市民众举行援助平津抗战大会，毛泽东出席大会并报告芦沟桥事件的经过及最近情况，到会者数千人。大会通过了致二十九军将士电，为反对日本侵略中国进行了示威游行。

红军出动应作真实准备

毛泽东与朱德7月11日致电彭德怀、任弼时、邓小平，指出：已向蒋介石交涉，红军调赴河北应战。第一步拟将二十七军、二十八军、三十二军各改为团，加上骑兵团编成一个小师先行派去，主力编成后去。同时提出，红军大学增加抗日课程，也准备派出。

7月14日，毛泽东与朱德等致电叶剑英，要其转告蒋介石：红军主力准备随时出动抗日。同意担任平绥线国防，同时指出，红军特长于运动战，防守非其所长。可与防守之友军配合作战，并愿意一部深入敌后方，打其后方。同日，与朱德致电红军各将领，改变红军抗日待命的准备时间："原命令一个月准备完毕，现改为十天准备完毕，待命抗日。"

毛泽东于7月15日，连续两次致电彭德怀、任弼时、叶剑英，指示他们：红军出发前必需补充之物，如刺刀、工具、高射炮、手榴弹、子弹等，由叶剑英向国民党方面交涉办理。红军出动应作真实准备，须迅速，以便在蒋介石、阎锡山同意后，不失时机地向平绥线出动。如情况紧急，补充不及，亦应准备开往太原、大同再行补充。

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

为阐明中国共产党全面抗战的方针、办法和前途，反对国民党片面抗战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7月23日毛泽东写了《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一文，7月26日此文在《解放》周刊上发表。

文章指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于7月8日向全国发出的号召抗战的宣言和蒋介石于7月17日在庐山发表的准备抗战的谈话，是国共两党对芦沟桥事变的两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政治宣言。

这两个宣言的共同点是：主张坚决抗战，反对妥协退让。这是对付日本进攻的第一种方针，正确的方针。但是还有采取主张妥协退让的第二种方针的可能。文章提出实现坚决抗战的一整套办法：（一）全国军队总动员。（二）全国人民总动员。（三）改革政治机构。（四）实行抗日外交。（五）宣布改良人民生活的纲领，并立即开始实行。（六）国防教育。（七）抗日的财政经济政策。（八）全中国人民、政府和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文章还列举了与之相反的不抵抗方针的一套不抵抗办法。接着指出：办法是跟着方针来的。方针是不抵抗的时候，一切办法都反映不抵抗主义。方针如果是坚决抗战，那就非实行合乎这个方针的一套办法不可，非实行这八大纲领不可。实行第一种方针，采取第一套办法，就一定得一个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实现中国自由解放的前途。实行第二种方针，采取第二套办法，就一定得一个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中国，中国人民都做牛马的前途。文章最后号召全国的爱国同胞、爱国军队、爱国党派，一致团结起来，坚决地实行第一种方针，采取第一套办法，争取第一个前途；坚决地反对第二种方针，反对第二套办法，避免第二个前途。

在“八一”抗战动员运动大会上演讲

8月1日，延安召开第一届抗战动员体育运动大会。毛泽东出席开幕式并作演讲。他说，日本帝国主义打到华北来了！平津失守了！（按：7月30日，北平、天津相继失守）如果我们还不动员起来抗战，那日本帝国主义就要打到我们这里来了。苏区是全国抗日模范区。在这个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已到最后关头的时候，我们举行这个抗战动员运动大会，是有着极重大的意义的。我们要做一个榜样，表示我们抗战的决心。毛泽东怀着十分遗憾的心情提到：很久以前，我们就两次三番地对他们（按：指国民党当局）说过，希望他们坚决抗战，他们不听，始终动摇不定，始终

没有坚决抗战的决心。此次平津失陷，是由于动摇不定，没有抗战决心所致。华北当局始终是抱着委曲求全的态度，在军事上不作充分的准备，对于民众是怀着不必要的戒心，不发动民众，不扩大民众爱国运动；相反的，还要出告示，下戒严令，要民众“镇静”，使有着满腔热血的爱国民众们，动弹不得，这样干的结果，便把平津丢掉了！我希望全国守土抗战的将士们，对于这个悲痛的教训，有所警惕！我们现在只有一个方针，这个方针就是坚决打日本！立即动员全国民众，工农商学兵，各党各派各阶层，一致联合起来，与日本帝国主义作殊死的斗争！这是民族独立与自由的不二方针。毛泽东在演讲中最后指出：我们今天举行这个抗战动员运动大会，就是向着这个方针迈进。我们这个运动大会，不仅是运动竞赛，而且要为抗战而动员起来。为了保卫国家，保卫领土，我们要把全国民众动员起来。同志们，准备出发到河北去，准备到抗日的最前线去，把我们这里的方针与办法带到全国各地去，把我们的决心带到抗日最前线去！

抗战动员体育运动大会8月6日闭幕，毛泽东出席大会并致闭幕词。他说，运动大会精神很好，我们应该把这一运动大会精神发扬到全苏区去，发扬到每个人民中去。因为我们体育运动应该是大家的，现在日本帝国主义打进来了，我们要唤起民众坚决打日本，坚决抗战是要每个人民参加的，正好象体育运动也要大家参加一样。最后他号召大家：要努力学习军事体育来武装我们的手足，学习政治来武装我们的头脑，把这一大会的精神带到各个地方各部队中去。

向南京国防会议提出对国防问题的意见

毛泽东等于8月1日收到张冲关于蒋介石密邀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即飞南京共商国防问题的急电。同日，与张闻天致电周恩来等：拟复以朱德、周恩来、叶剑英三人赴京，如何盼复。同一

天．毛泽东与张闻天再电周恩来等，强调红军作战的两原则：（甲）在整个战略方针下执行独立自主的分散作战的游击战争，而不是阵地战，也不是集中作战，因此不能在战役战术上受束缚，只有如此才能发挥红军特长，给日寇以相当打击。（乙）依上述原则，在开始阶段，红军以出三分之一的兵力为适宜，兵力过大，不能发挥游击战，而易受敌人的集中打击，其余兵力依战争发展，逐渐使用之。电报嘱：以上原则请与各同志商定，并准备携告国民党。

8月3日，毛泽东与张闻天致电周恩来、秦邦宪并告叶剑英：此次赴宁须求得下列问题一同解决：（一）发表宣言。（二）确定政治纲领。（三）决定国防计划。（四）发表红军指挥系统及确定初步补充数量。（五）红军作战方针。同一天，周恩来将同朱德商讨过的准备提交国防会议的提案内容电告毛泽东。内容包括国防会议组织机构案，重新确定战时编制案，确立全国抗战的战略计划及作战原则案，确定华北抗战计划案及红军担任一方面独立作战的任务、实施全国人民总动员及武装民众参战计划案等。

收到周恩来的电报后，毛泽东于8月4日下午在住处同张闻天商讨对国防问题的意见。当天即电周恩来、朱德、叶剑英："国防问题我们意见如下：甲、第一防线张家口、涿州、静海、青岛等处，重点在张家口，应集中第一次决战兵力。乙、第二防线保定、大同、马厂、维县等处，应集中优势兵力，相机增援第一线并准备第二线决战。丙、至太原、石家庄、沧州等处仅能作为第三防线，决不能只顾此线而不集中兵力于第一二线。丁、目前关键是第一防线。"电报指出："总的战略方针暂时是攻势防御，应给进攻之敌以歼灭的反攻，决不能是单纯防御，将来准备转变到战略进攻，收复失地。""正规战与游击战相配合，游击战以红军与其他适宜部队及人民武装担任之，在整个战略部署下给与独立自主的指挥权。""担任游击战之部队，依地形条件及战况之发展，适当使用其兵力。为适应游击战性质，原则上应分开使用，而不

是集中使用。”关于红军参战的问题，电报指出：“依现时情况，红军应出三分之一兵力，依冀察晋绥四省交界地区为中心，向着沿平绥路西进及沿平汉路南进之敌，执行侧面的游击战，另以一部向热冀察边区活动威胁后方（兵力不超过一个团），红军应给与必要的补充。”电报强调：“发动人民的武装自卫战，是保证军队作战胜利的中心一环，对此方针游移，是必败之道。”同一天，毛泽东收到朱德、周恩来等向中共中央提出的《关于全国对日抗战及红军参战问题的意见》和《关于红军主力出击抗战的意见》的来电，其中提到：“不反对在推动全国抗战中，须要积极的准备”。为此，我们应“参战不迟疑，但要求独立自主担任一方面作战任务，发挥红军运动战、游击战、持久战”的优点。“不反对开赴察绥，但要求给便于作战察、绥、晋三角区（争取消灭伪军与发展察、热、冀的游击战争）与便于补充联络的后方”等。

第二天，毛泽东与张闻天复电朱德、周恩来等，关于红军担任一方面作战任务问题，指出：“红军担负以独立自主的游击运动战，箝制敌人大部分，消灭敌人一部的任务。具体要求，指定冀察晋绥四省交界地区（四角地区不是三角地区），向着沿平绥西进及沿平汉南进之敌，以出击侧面的扰乱箝制和打击，协助友军作战，并便于派一部远出热河”。电报说：“这不是‘独当一面’的意思，均是在一定地区内协助正面友军作战的意思。”“我们事实上只宜作侧面战，不宜作正面战，故不宜于以独当一面的语意提出”。

8月9日，周恩来、朱德、叶剑英等由西安飞赴南京参加国防会议。11日，周恩来、朱德分别发言，就中国共产党关于全国抗战的战略方针和作战原则作了阐述。

警惕国民党在谈判中的阴谋

在整编南方各地红军游击队的过程中，中共闽粤特委和红军

游击队负责人何鸣于1937年6月与国民党军第一五七师谈判，达成合作抗日协议，并接受国民党的要求，将部队开到漳浦县城驻防。7月16日，第一五七师以点编发饷为名，将近千名红军游击队骗入一个地方，全部缴械。中共中央得知这件事后，极为重视。8月4日，毛泽东专为此事致电叶剑英、彭德怀、任弼时，指出红军闽粤边部队被国民党阴谋缴械事件，是极为严重的教训，红军各部都应引为深戒。10月1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南方各游击队集中改编方针致电张云逸等，指出，国民党首先把何鸣部人枪交还，经证实具报无误后，方能谈到各游击区问题。由于毛泽东等坚持斗争，在这个问题上决不退让，后来终于使第一五七师退还300多枝枪，释放被扣人员。

周恩来、朱德等于8月12日在南京同国民党方面谈判代表张冲、邵力子、康泽商谈《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的内容，其间康泽捣乱，他提出：不提民主，取消对民族民权民生三条的解释，不提与国民党获得谅解、共赴国难等。当时，周恩来、朱德就给以严辞批驳，并把这一情况及时报告毛泽东。8月14日，毛泽东同张闻天复电朱德、周恩来、叶剑英，指出：宣言可以修改，但决不能照康泽提案，我们的修改案即告。最后宣言还是按照我们的方案修改，于9月22日经国民党中央通讯社播发。

8月9日，毛泽东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谈到红军问题时，毛泽东说：红军应当实行独立自主的指挥与分散的游击战争。必须保持独立自主的指挥，指出发挥红军的长处，集团作战是不行的。同时还要估计到特别的情形，防人之心不可无，应有戒心，保障红军之发展扩大。周恩来、朱德在南京同国民党谈判期间，白崇禧、黄绍竑提出红军以两个师由渭南上车，经风陵渡、同蒲路至代县附近下车，到蔚县一带集中。另一师沿陇海路转平汉路，在徐水下车，到冀东玉田、遵化一带，开展游击战争。毛泽东得知这一消息后，于8月18日同张闻天致电周恩来、叶剑英，指出：黄白案将红军分割出动，其中包含着极大阴谋，坚决不能同意。在

根本问题解决后，我军主力（不是全部）决定由韩城渡河，决不走陇海线和平汉线。同一天，毛泽东同张闻天又致电秦邦宪、林伯渠、彭德怀、任弼时，指出：国民党阴谋已表现很明显，他的企图是：（一）将红军全部送上前线。（二）分路出动，使不集中，强使听命。（三）红军受命出动后，即变为蒋之属下，彼以命令行之，彼时党的问题与边区问题，由彼解决，甚至将不许发表宣言并取消苏区。”电报指出我们的对策见8月18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与国民党谈判的十项条件给朱德、周恩来、叶剑英的训令》，并说此事关系重大，须在洛川会议中慎重讨论。最后，八路军没有按照国民党划定的路线出动，从而击破了国民党的这一阴谋。

撰写《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暂告段落

《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是毛泽东为在红军大学（后为抗日军事政治大学）讲哲学课而写的。毛泽东十分重视讲课，他把讲课看成是学习的一种重要的方法，认为讲课可以加深学习和记忆，讲一次课比看几回书都更能记忆清楚。在准备和酝酿写作讲授提纲期间，毛泽东精心阅读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其他一些中外哲学著作，并对有的著作写下了大量的批注。如1937年4月4日以前对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著《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的批注，同年7月以前对米丁等著《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上册）的批注等等。讲授提纲的许多论点。都是毛泽东在批读这些哲学著作中逐渐形成的。毛泽东为准备讲授提纲，讲好哲学课，付出了很大的精力。有一次毛泽东费了四个夜晚和三个白天的时间准备了一次的讲课，事后他风趣地说：“我折本了，准备了三天四夜，只讲半天就讲完了。”毛泽东讲课时联系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讲得深刻而通俗，生动而有趣，常使得听课的学生不断发出笑声，有时甚至哄堂大笑。毛泽东认为教学的方法很值得研究，很需要改善。

讲授提纲共三章十六节。第一章“唯心论与唯物论”，一开始就讲哲学中唯心论与唯物论的两军对战，分析唯心论与唯物论的区别和它们发生与发展的根源。第二章“辩证法唯物论”，指出辩证唯物论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武器，强调对于指导革命的干部人员尤属必修的科目。在这一章里毛泽东分别阐述了：物质论、运动论、时空论、意识论、反映论、真理论、实践论。第三章“唯物辩证法”，原计划写三节，分述辩证法的三个根本法则：矛盾统一法则；质量互变法则；否定之否定法则。但后来由于种种原因只写了第一节，后面两节没有写。在这一章开头，毛泽东指出，与上述唯物辩证法的三个根本法则联系着的还有：本质与现象、形式与内容、原因与结果、根据与条件、可能与现实、偶然与必然、必然与自由、炼与环等等范畴，拿这些范畴合在一起，就形成一个完整的深刻的唯物辩证法的系统。可以推想当时毛泽东是准备全写出来全讲的。

《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最先出现的是油印本，封面注明“一九三七年九月印”，没有著作者姓名。总共三章、六万一千字。油印本在全篇之末有一括号：（论矛盾统一律完，一九三七，八月七日），这说明毛泽东在1937年8月7日写完第三章第一节论矛盾统一法则，此后写作讲授提纲，便告一段落。

建国后在编辑《毛泽东选集》时，将讲授提纲的第二章第十一节“实践论”单独成篇，以原题《实践论》收入1951年10月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将第三章第一节“矛盾统一法则”以《矛盾论》为篇名，收入1952年3月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不久又改收入1952年7月第二次印刷的《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实践论》与讲授提纲基本上没有什么大的改动，只有一些数字上、举例上、解说上，作些文字的修改。《矛盾论》则与讲授提纲有较大的改动。删去的地方，主要是“形式论理的同一律与辩证法的矛盾律”，其中包括对“同一律”、“矛盾律”和“排中律”的解释和批判，还有一些不很重要的举例和解释也被删

去。增加的地方，主要是在“矛盾的特殊性”一节中，作了较多较深刻的阐述。对“主要矛盾与主要矛盾方面”、“对抗在矛盾中的地位”则有增加的，也有删节的。经过修改，不但保全了原来的精神面貌，而且在内容上、逻辑上，都大有发展和提高。

毛泽东的著述态度是十分严谨的，他从不满足于已取得的成果，总是根据新的实践经验和认识，不断修改和补充自己著述中的已被实践证明是不太完善、不太准确的观点。1951 年 3 月 27 日，毛泽东在致李达的信中说：“《实践论》中将太平天国放在排外主义一起说不妥，出选集时拟加修改，此处暂仍照原。”1952 年 9 月 17 日，毛泽东在致李达的又一封信中说：“《矛盾论》第四章第十段第三行‘无论什么矛盾，也无论在什么时候，矛盾的诸方面，其发展是不平衡的’，这里，‘也无论在什么时候’八字应删，在选集第一卷第二版时，已将这八字删去。”事实上，毛泽东每一次修改都使原来的著作更加精确、更加完善。

欢送“西北战地服务团”奔赴前线

作家丁玲、吴奚如等，为加强抗日战地服务工作，发起组织“西北战地服务团”。经中共中央宣传部批准：丁玲为主任，吴奚如为副主任。8 月 15 日，延安各界举行欢送“西北战地服务团”奔赴前线晚会，毛泽东等到会致词表示祝贺。毛泽东致词说，战地服务团是一件大工作，因为打日本，在国内在世界上都是一件大事，我们数年来要求举国团结一致抗日，在今天可说已经开始实现了。这次战争可以说带着有最后一次的意义，战地服务团随红军出发到前方工作，你们要用你们的笔，用你们的口与日本打仗。军队用枪与日本打，我们要从文的方面从武的方面夹攻日本帝国主义，使日寇在我们面前长此覆灭下去。

毛泽东非常关心“西北战地服务团”的工作，他曾先后几次对丁玲说：这个工作重要，对你也很好，前方去可以接近部队，接

近群众，宣传党的政策，扩大党的影响。组织上嘛，在延安属军委管，到了前方由总政管。出发以前，需要什么，找萧劲光同志。宣传工作，问中宣部。组织机构可以小一点，你们几个领导同志，称呼团长可以，称呼主任也可以。下边就不要设“部”、“科”，我看叫“股”就行了。宣传上要作到群众喜闻乐见，要大众化。现在很多人谈旧瓶新酒，我看新瓶新酒，旧瓶新酒都可以，只要对抗战有利。你是写文章的，不会演戏，但可以领导，没有搞过，可以学会。团里有几个人的历史、政治面貌没有搞清楚，这不要紧。在工作中可以慢慢了解，对他们不要有成见，不轻易作结论，要帮助他们；有这样几个人，你们就有事情做了。

“西北战地服务团”出发前先在延安举行汇报演出。一天，演出话剧《王老爷》。由于人手缺乏，丁玲在剧中也扮演了一个角色。因为她湖南腔很重，又没怎么化装，在台上刚一开口，台下一片笑声传遍礼堂。这时，毛泽东恰巧赶来看戏。他来得晚了，从前门进不来，观众挤得密密麻麻。那时，领导同志如果来晚了，都习惯从后台进来，从前台跳下去就座。没想到团里刚建立了新制度，为了搞好舞台演出秩序，规定在演出进行中，无论是谁都不能从台口上下，影响观众看戏。毛泽东不知道这个新规矩，在警卫战士的引导下来到后台。团里的同志见到毛主席来看戏了，又高兴又感到为难，他们只好把新规定告诉毛泽东，问是否可以等戏闭幕时再到前台去。毛泽东听了立刻回答说：“这个规定好！遵守你们的规定！”此时，礼堂里丁玲的台词和观众的笑声又响成一片，毛泽东忍不住问工作人员：我先不下去，站在台侧看看行不行？工作人员说：行！他们立刻引毛泽东从侧幕的缝隙中静静地望着台上。就这样，毛泽东站在侧幕间看戏，一直等到这一场戏演完。大幕拉上了，大家为丁玲和演员们的表演热烈鼓掌。在掌声中，毛泽东突然出现在幕前一侧，他高高兴兴地走下台去，这时，掌声更加热烈了。

洛川会议

为要研究讨论红军出动问题、作战问题，毛泽东与张闻天8月8日致电彭德怀、任弼时，提出“拟在红军开动时开一次政治局会议”，“地点在洛川”，“时间十五号左右”，同时问询“由云阳到洛川须几天并估计情况是否可能”。

地点选在洛川，主要是因为当时红军前方将领多在云阳集中，洛川在延安与云阳之间，在洛川开会可省去前方将领一半路程。此时林彪正率抗大学员在洛川，毛泽东嘱他在洛川待命，暂不要回来也不要上前方。15日左右没有开成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八·一三”上海事变后有了新情况，二是等待在南京同国民党谈判的周恩来等能返回参加会议。

大约在8月中下旬之交的一天，毛泽东把萧劲光叫到他的窑洞里对萧说，党中央的这个会议准备去洛川开，你去打个前站，安排个开会的地方。不在洛川县城，那里不安全，要选个安全的地方。你准备一下马上出发吧。

毛泽东等是8月20日从延安出发去洛川的。在出发前一天，毛泽东与张闻天致电朱德、秦邦宪、彭德怀、任弼时等，请他们也于明日动身并带电台及华北地图，到洛川交通站找林彪，并提出洛川会议日程：（一）政治任务问题。（二）军事问题。（三）两党关系问题。

8月22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洛川冯家村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代表中央政治局作关于军事问题和同国民党关系问题的报告。他深刻地分析了中国革命的形势，指出抗日战争将是艰苦的持久战，提出了党在抗日时期所采取的政治路线和基本方针。关于军事问题，报告指出红军的基本任务是：1. 创造根据地；2. 钳制和相机消灭敌人；3. 配合友军作战（战略支援任务）；4. 保存和扩大红军；5. 争取民族革命战争领导权。红军的作战方针

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包括在有利条件下集中兵力消灭敌人兵团，以及向平原发展游击战争。独立自主是在统一战线下的相对独立自主；游击战争的作战原则是分散以发动群众，集中以消灭敌人，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山地战要达到建立根据地，发展游击战争，小游击队可到平原地区发展。关于国共关系问题，报告强调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对国民党要保持高度的阶级警觉性。红军主力全部出动要依情况由我们自己决定，要留一部分保卫陕甘宁边区。

会议对毛泽东的报告进行了认真的讨论。许多同志都发了言，大多数人同意毛泽东的报告，拥护党中央的政治路线。但是，在一些具体问题上，有些不同意见。如关于出兵时间问题，有人认为应该早出兵；关于陕甘宁边区留守部队问题，有人主张把军队全部开到前线；关于作战方针问题，有人主张红军要配合国民党军队多打大仗等。

毛泽东代表中央政治局对会议作了总结，回答了讨论中提出的问题。他指出，必须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一定要实行党对抗战的领导，依靠人民群众，实行全面抗战，反对片面抗战，反对妥协退让，民族革命战争才能获得彻底胜利。与会同志一致同意毛泽东的总结。但由于时间紧迫，有些具体问题来不及充分讨论，所以还没有取得完全一致的认识。

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和毛泽东起草的《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以及他为中共中央宣传部门起草的宣传鼓动提纲《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十大纲领”全面概括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基本政治主张，其主要内容是：1.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2. 全国军事总动员；3. 全国人民总动员；4. 改革政治机构；5. 实行抗日的外交政策；6. 实行战时的财政经济政策；7. 改良人民生活；8. 实行抗日的教育政策；9. 肃清汉奸卖国贼亲日派；10. 加强抗日的民族团结。会议在组织上进一步健全了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会员，成

员增为11人，毛泽东为主席，朱德、周恩来为副主席。8月25日，中央军委发布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会议期间，中央政治局常委还决定设立中央军委前方军分委（后称华北军分会），朱德为书记，彭德怀为副书记。

8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在洛川召开座谈会。毛泽东在会上发言说：无产阶级的政治和组织程度比资产阶级高，所以统一战线由无产阶级提出。在联合抗日的情况下，要把民族革命与社会革命贯通起来。在统一战线的长期过程中，国民党有计划地从各方面影响和吸引共产党及红军，我们要提高政治警觉性，要使农民和小资产阶级跟随我党走。国民党内有些人动摇于国共两党之间，这对我们吸引国民党是有利的，共产党吸引国民党的条件是存在着的。两党之间互相吸引的问题，要在斗争中解决。统一战线成功后，主要危险是右倾机会主义，要注意在党内加强教育。

毛泽东等于8月30日由洛川返抵延安。

适时变更八路军的战略部署

在华北战局危急的形势下，八路军不待改编全部就绪，第一一五师主力即于8月22日由陕西省三原地区誓师出征。8月31日，经韩城县芝川镇东渡黄河，沿同蒲路北上。9月3日，第一二〇师主力由陕西省富平县庄里镇出发，随第一一五师之后北上。9月4日，八路军总指挥部由陕西省泾阳县云阳镇东进。根据毛泽东、张闻天于8月4日提出，后经洛川会议讨论同意的，决定八路军全部部署于以恒山山脉为中心的冀察晋绥四省交界地区的战略部署，第一一五师、第一二〇师向冀察晋绥四省交界的恒山地区挺进。

正当八路军日夜兼程向恒山地区挺进的时候，沿平绥路西犯的日军，突破国民党军的防线，于9月13日占领大同，并沿同蒲

路南下，向雁门关、茹越口进攻。与此同时，由平绥路向晋东北进犯的日军，向平型关进犯，企图实施右翼迂回，威胁平汉路沿线国民党军第一战区主力的侧背。沿平汉路及其两侧南犯的日军也于9月中旬沿滏阳河南下，迂回平汉路沿线国民党军的侧背，企图歼灭国民党军第一战区主力于河北省中部地区。在此情况下，9月16日，毛泽东在复朱德、任弼时的电中指出："我三个师已无集中晋东北一处之可能，更无此必要"。并提出：拟以一一五师位于晋东北，以五台为活动重心，暂时在灵丘、涞源，不利时逐渐南移，改以太行山脉为活动地区；一二〇师位于晋西北，以管涔山脉及吕梁山脉之北部为活动地区；一二九师位于晋南，以太岳山脉为活动地区。9月17日，毛泽东就八路军的战略部署再电朱德等，指出：根据华北日军大迂回进攻的形势，恒山山脉必为敌军夺取冀察晋三省的战略中枢，敌军向这里出动主力，阎锡山指挥的各军已失锐气，节节败退。因此，八路军如果仍按原计划全部进到晋东北恒山山脉，必将使自己处于敌军大迂回中，完全陷于被动地位。为战略上展开于主动地位，即展开于敌之侧翼，钳制敌之进攻太原与继续南下，援助晋绥军使之不过于损失力量，真正执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广泛发动群众，组织义勇军，创造根据地，支援华北游击战争，并为扩大本身起见，拟变更原定部署，采取如下之战略部署：第一二〇师转至以管涔山脉为依托的晋西北地区；第一二九师于适当时机进至以吕梁山脉为依托的晋西南地区；第一一五师即进入恒山山脉南段，并准备逐渐南移，展开于太行、太岳两山脉中。9月18日，毛泽东致电朱德、任弼时，指出：恒山山脉是第一战区与第二战区接合部，敌主力必从此进。林彪师现已当了正面，处于完全的被动地位，贺龙师决不能再用此方，应速向晋西北转进。9月19日，毛泽东在致彭德怀电中再次强调贺龙率领的第一二〇师主力应速赴晋西北：敌于太原，志在必得，此时部署应远看一步。五台、定襄、盂县地区狭小，敌进太原后，即在其包围中，因此，贺龙师应位于晋西北，处

于大同、太原之外翼，向绥远与大同展开游击，方能给进攻太原之敌以相当有效的钳制。所以，贺龙师应速赴晋西北占先着，如再去五台则失去战略意义。

毛泽东依据战局发展趋势，适时改变八路军的战略部署，将原定三个师集中部署于冀察晋绥四省交界地区的计划，改变为分别依托恒山、管涔山、太行山、吕梁山，向着敌占交通线和中心城市取四面包围的态势，这对八路军摆脱日军之迂回包围，保持战略上的主动地位，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具有重要的意义。

进一步阐述独立自主山地游击战方针的基本原则

毛泽东在8月初就明确提出红军对日作战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分散游击战原则。洛川会议正式确立了以独立自主山地游击战作为红军对日作战基本战略方针。但在洛川会议上，由于时间紧迫，有些分歧意见没有及时得到解决，所以，在此后贯彻执行这一方针中，党内、军内一些同志的认识并不一致。分歧意见主要集中在究竟是以游击战为主还是以运动战为主这一点上。一些同志主张以运动战为主，配合国民党军队抗击日寇进攻，或者干脆由红军单独开辟一条战线，独立自主地同日寇进行较正规的运动战。从战场实际情况来看，在太原失陷以前，八路军对日作战基本上是运动战和游击战并行，甚至有时运动战要占主要位置，出现这种情况虽然同当时华北战场的实际需要有很大关系，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有相当一部分同志对这一战略方针缺乏深刻理解。

为统一党内的认识，保证战略转变的顺利实现，洛川会议后，毛泽东就战略方针问题多次给党和军队的一些领导人发电，进一步阐述独立自主山地游击战方针的基本原则。

1937年9月，国民党西安行营主任蒋鼎文无理要求第一二九师速上前线，彼等用意，或者不明白使用大兵团于一个狭小地域实不便于进行游击战争；或者含有恶意，企图迫使八路军打硬仗。

本来，游击战争与按照情况使用兵力，是朱德、周恩来在南京与蒋介石、何应钦、白崇禧、黄绍竑决定的八路军的战略方针与指挥原则。八路军主力上前线，多兵堆于狭地不合游击战使用，因此第一二九师留驻待机是完全正当的。毛泽东认为，如果蒋鼎文等真不明白这个道理，至少是我们未对他们有过彻底坚持的说明，同时反映出我们本身对独立自主山地游击战战略方针的基本原则还缺乏深刻理解。9月12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嘱他“在晋在冀在京，均着重解释我军‘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这个基本原则”，并对基本原则的内涵作了较系统的说明。他指出：“这一方针的基本原则包含：（一）依照情况使用兵力的自由。（二）红军有发动群众创造根据地组织义勇军之自由，地方政权与邻近友军不得干涉。（三）南京只能作战略规定，红军有执行此战略之一切自由。（四）坚持依傍山地与不打硬仗的原则。”这个说明，将独立自主山地游击战的战略方针进一步具体化了。

9月13日，日军占领大同，并继续向山西境内大举进攻，阎锡山处在不打一仗无法向山西民众交待的情况下，拟集中兵力保卫太原，与日军来一次决战，希望八路军参加。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接连几次给八路军前线指挥员发电。9月21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指出：阎锡山的“部下全无决心，他的军队已失战斗力，也许在雁门关、平型关、沙河一带会被迫地举行决战，然而大势所趋，必难持久。不管决战胜败如何，太原与整个华北都是危如累卵。个别同志对于这种客观的必然的趋势，似乎还没有深刻认识，被暂时情况所诱惑。如果这种观点不变，势必红军也同阎锡山相似，陷入于被动的、应付的、挨打的、被敌各个击破的境遇中”。电报强调：“今日红军在决战问题上不起任何决定作用，而有一种自己的拿手好戏，在这种拿手戏中一定能起决定作用，这就是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不是运动战）。要实行这样的方针，就要战略上有有力部队处于敌之侧翼，就要以创造根据地发动群众为主，就要分散兵力，而不是以集中打仗为主。集中打仗

则不能做群众工作，做群众工作则不能集中打仗，二者不能并举。然而，只有分散做群众工作，才是决定地制胜敌人、援助友军的唯一无二的办法。集中打仗在目前是毫无结果可言的。”电报还说：“我完全同意你十八日电中‘使敌虽深入山西，还处在我们游击战争的四面包围中’这个观点。请你坚持这个观点，从远处大处着想，对于个别同志不妥当的观点给予深刻的解释，使战略方针归于一致。”

9月25日，毛泽东就华北工作问题致周恩来并转刘少奇、杨尚昆等电，明 确指出：“整个华北工作，应以游击战争为唯一方向。一切工作，例如兵运、统一战线等等，应环绕于游击战争。华北正规战如失败，我们不负责任；但游击战争如失败，我们须负严重的责任。”应“发动全华北党（包括山东在内）动员群众，收编散兵散枪，普遍地但是有计划的组织游击队”。“为此目的，应着重于高级干部之分配及独立领导的党政军集体机关之组织。要设想在敌整个占领华北后，我们能坚持广泛有力的游击战争。要告诉全党，今后没有别的工作，唯一的就是游击战争”。

10月16日，毛泽东为答复阎锡山拟集中十四个团并要一一五师参加与日军决战事，致电林彪，指出：“我军应坚持既定方针，用游击战来配合友军作战。此方针在京与蒋、何决定，周、彭又在晋与阎当面决定，基本不应动摇此方针。”

形势发展正如毛泽东所预料到的那样，11月8日太原失陷，华北正规战争随之结束，游击战争转入主要地位。就在太原失陷的同一天，毛泽东致电周恩来、朱德、彭德怀、任弼时等，指出：八路军将成为全山西游击战争之主体，应该在统一战线的原则下，放手发动群众，扩大自己，征集给养，收编散兵，应照每师扩大三个团之方针，不靠国民党发饷，而自己筹集供给之”。电报还指出：吕梁山是八路军的主要根据地，但其工作尚未展开。第一一五师主力应立即迅速转移至吕梁山地区；第一二九师全部在晋东南，第一二〇师在晋西北，坚持长期游击战争。

11 月 12 日，上海失陷。11 月 13 日，毛泽东致电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及周恩来、刘少奇、杨尚昆等，指出："全国片面抗战已无力支持，全面抗战还没有到来，目前正处青黄不接，危机严重的过渡中"。"正规战争结束，剩下的只是红军为主的游击战争了"。"红军的任务在于发挥进一步的独立自主原则，坚持华北游击战争，同日寇力争山西全省的大多数乡村，使之化为游击根据地"。

根据上述毛泽东的指示，八路军各部队在太原，上海失陷后，按照开展游击战争的需要，以山西为中心深入敌后，创建抗日根据地，将正规军变为游击军，广泛开展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这标志着毛泽东早先提出的战略转变思想正得以迅速实现。

写《艾著〈哲学与生活〉摘录》

艾思奇，当时是个还不到 30 岁的年轻哲学家，1937 年 10 月到延安，在抗日军政大学任主任教员。《哲学与生活》是艾思奇继《大众哲学》之后，在上海《申报》、《读书生活》为答读者问写的一些短文，后来汇集成册，于 1937 年 4 月由上海读书生活出版社出版。同年 9 月，毛泽东在延安窑洞里的煤油灯下仔细阅读了这本书，并用毛笔写了 19 页《艾著〈哲学与生活〉摘录》，总共 3000 字。不久后，毛泽东致信艾思奇："你的《哲学与生活》是你的著作中更深刻的书，我读了得益很多，抄录了一些，送读一看是否有抄错的。其中有一个问题略有疑点（不是基本的不同），请你再考虑一下，详情当面告诉。"

毛泽东对艾著《哲学与生活》略有疑点的问题是指这样一段话："差别的东西不是矛盾，例如笔墨，椅子不是矛盾。但如果懂得推移和变化的原理，就知差别的东西在一定条件下也可以转化为矛盾，倘若某两件差别的东西同时同地在一起且发生互相排斥的作用时，就成为矛盾了。例如店员与作家是本无矛盾的，但如

果某店员有了写作兴趣而想成为作家时，二者就在统一体里互相排斥，也就成为矛盾了。”毛泽东在摘录艾思奇的这个论点后，写下了一段话：“根本道理是对的，但‘差别不是矛盾’的说法不对。应说一切差别的东西在一定条件下都是矛盾。一个人坐椅摇笔濡墨以从事作文，是因人与作文这两个一定的条件把矛盾的东西暂时的统一了，不能说这些差别不是矛盾。大司父（师傅）煮饭，把柴米油盐酱醋茶在一定的条件下统一起来。店员与作家也可以在一定条件下统一起来。半工半读，可以把工读统一起来。差别是世上一切事物，在一定条件下都是矛盾，故差别就是矛盾；这就是所谓具体的矛盾。艾的说法是不妥的。”在这段话的末尾，毛泽东还特别注上“毛泽东意见”五个字。

《反对自由主义》

由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和许多知识青年纷纷来到延安，一方面壮大了革命队伍，另一方面也使党内和革命队伍内滋生了一些思想问题。自由主义就是一种不良倾向，对党和革命军队妨害极大。当时担任陕甘宁边区党委宣传部长的刘澜涛，将这一情况向中央写了一个报告。毛泽东接到报告后，于9月7日写了《反对自由主义》一文。不久，毛泽东的《反对自由主义》的手稿，经有关同志传到刘澜涛手中。当时这篇文章是不公开的，刘澜涛与有关同志商量，最好能够在党内发表。后来，边区党委经请示中央同意，这篇文章于1937年冬季在陕甘宁边区党委的刊物《工作通讯》上全文发表了。（据胡耀邦回忆：“1937年的秋天，毛泽东建议我担任党的抗大总支部书记。他教我要做好党的总支部的工作，首先要办一个好的校刊。他看了这个校刊的第一期，批评我们自己没有动手写东西，又自告奋勇写了那篇著名的战斗檄文——《反对自由主义》。”——编者）

毛泽东在文章中首先指出：“我们主张积极的思想斗争，因为

它是达到党内和革命团体内的团结使之利于战斗的武器。每个共产党员和革命分子，应该拿起这个武器。”接着毛泽东列举了自由主义的十一种主要表现，进而剖析了自由主义的危害、来源及其思想方法。文章最后强调提出反对和克服自由主义是思想战线的任务之一。

提出对待陈独秀等托派分子的原则问题

在以第二次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迅速形成时，在中国共产党释放一切政治犯的要求下和各界人士的营救下，陈独秀于8月23日获释出狱。陈独秀出狱后曾亲自到南京八路军办事处，向叶剑英、秦邦宪表示，赞成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接着，陈独秀的好朋友、已经脱离托派的罗汉到了南京，与叶剑英、李克农等人晤谈，说陈独秀愿回到党的领导下工作，并提出了联合抗日的要求。叶剑英等人表示欢迎，但因与陈独秀联合，事关重大，必须请示中央。于是，叶剑英一面电告中央，一面嘱罗汉亲自到延安走一趟，并给他开了介绍信和旅费。罗汉先到西安，由林伯渠、王若飞等接待。9月5日，林伯渠自西安致电张闻天，说罗汉、李侠公要见张闻天，要求恢复组织关系。9月8日，张闻天、毛泽东复电林伯渠，同意罗汉、李侠公去延安一谈。后因山洪毁路，罗汉被阻西安，延安没有去成。但罗汉于9月9日致电中共中央，提出五点建议和要求，其中提到请中央劝陈独秀、彭述之、郑超麟回党工作。

中共中央认真研究了南京和西安发来的讯息。毛泽东同情罗汉的活动，觉得中国的托派不能与苏联的托派相提并论，表示“可以与陈独秀先生等形成某种合作关系，以期一致抗战。……现在我们是团结一切力量抗日，陈独秀托派如果表示改悔，何尝不可一起抗日。”于是，毛泽东同张闻天，于9月10日致电林伯渠，提出对待陈独秀等托派分子的原则问题：“请告诉罗汉我们对待托

派分子的下列原则：（甲）我们不拒绝过去犯过错误而现在真心悔悟、愿意抗日的人，而且竭诚欢迎他们的转变。（乙）在陈独秀等托派分子能够实现下列三条件时，我们亦愿与之联合抗日。（一）公开放弃并坚决反对托派全部理论与行动，公开声明同托派组织脱离关系，承认自己过去加入托派的错误。（二）公开表示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政策。（三）在实际行动中表示这种拥护的诚意。（丙）至于其他关系，则在上述三条件实现之后，可以再行考虑。”

1937年11月20日出版的中共中央理论刊物《解放》，还发表《陈独秀先生到何处去》的时评，以尊敬和期待的口吻说：“当陈独秀先生恢复了自由以后，大家都在为陈先生庆幸，希望他在数年的牢狱生活里虚心地检讨自己的政治错误，重振起老战士的精神，再参加到革命的队伍中来。”表现出当时中共中央期待陈独秀归队的诚恳心情。

但此事终因陈独秀始终拒绝公开表示反对托派的理论和行动而告终。王明、康生出来打横炮，也是造成谈判破裂的重要原因。王明在12月政治局会议上说，我们和什么人都可以合作，只有托派例外。在中国我们可以与蒋介石及其下属的反共特务等人合作，但不能与陈独秀合作。康生于1938年初发表《铲除日寇侦探民族公敌的托洛茨基匪徒》的文章，诬蔑陈独秀是领取日本津贴的汉奸。由于王明、康生的作用，把陈独秀永远拒绝于党的大门之外。从这个意义上说，也是党内的左倾错误断送了挽救陈独秀的工作。

电贺平型关战役胜利

9月25日，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主力在晋北平型关东北一带公路两侧山地伏击由灵丘西犯的日军坂垣师团一部。经一天激战，歼灭日军一千余人，缴获大量武器和军用品，取得了全国抗战以来第一个大胜利。

在这以前，一一五师师长林彪把“只想以陈旅（即担任平型

关战斗的以陈光为旅长的第三四三旅）集中相机给敌以打击，暂时不分散”的想法电告毛泽东。毛泽东在9月21日致彭德怀的电中，提到此事，并说“这种一个旅的暂时集中，当然是可以的，但如许久还无机可乘时，仍以适时把中心转向群众工作为宜”。可见，事先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同意陈旅集中给敌以打击的部署。就在平型关战役后第二天，即9月26日，毛泽东致电朱德、彭德怀：“庆祝我军的第一个胜利”，并提出：向恒山山脉及其东西北三方向突击，展开敌人侧面游击战争的计划，暂时还无执行的条件，要待敌人更深入，后方更空虚时才能执行。同日，毛泽东还就平型关大捷的对外宣传问题向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发出了指示。第三天，即9月27日，毛泽东又就平型关战役战况电告正在南京同国民党谈判的博古、叶剑英。

讨论《中央关于共产党参加政府问题的决定草案》

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以后，有些共产党员对于参加国民党政权引为荣耀，对国民党所施行的升官发财、酒色逸乐的引诱，丧失应有的警惕。为要纠正政权问题上的右倾错误，中共中央政治局于9月25日召开会议，张闻天、毛泽东、张国焘、何凯丰、郭洪涛、李富春、吴亮平、王首道参加，讨论共产党参政问题。毛泽东在发言中指出：目前时局需要有一个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府，我们要明确提出参加这样的政府，不是提出参加国民党政府。在日本占领区域，我们可以建立许多小块政权，南方各地也有小块苏区政权，在这些地方，要以共产党为主体组织政权。在战区的地方政府，如果能够实行抗日纲领，同时国民党政府又不反对，在这种特殊情况下，共产党员可以去参加。会议通过以中央书记处名义发出的《中央关于共产党参加政府问题的决定草案》。草案主要是根据毛泽东的意见起草的。它明确指出：“在党中央没有决定参加中央政府以前，共产党员一般的亦不得参加地方政府，并

不得参加中央的及地方的一切附属于政府行政机关的各种行政会议及委员会。这种参加徒然模糊共产党在人民中的面目，延长国民党的独裁统治，推迟统一战线的民主政府之建立，是有害无利的。”但“共产党在没有公开参政以前，参加全国国民大会之类的商讨民主宣传与救国方针的代议机关，在原则上是许可的”。草案强调：“在原有红军中苏区中及一切游击区中，共产党绝对独立领导之保持，是完全必要的，共产党员不许可在这个问题上发生任何原则上的动摇。”

关于判处黄克功死刑致信雷经天

1937 年 10 月 5 日，抗日军政大学第六队队长黄克功，对陕北公学女学生刘茜逼婚不成，开枪把她打死。经抗大副校长罗瑞卿向中央领导报告批准，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将黄克功逮捕收监。在审理这个案件期间，延安各单位围绕这一案件组织了讨论。有的同志认为，黄克功是红军的重要干部，对党是有功的，主张给他戴罪立功的机会。有的同志认为，黄克功自恃有功，无视法纪，杀人者必须偿命。黄克功本人也写信给中央，他说，如果死刑必须执行的话，希望死在与敌人作战的战场上，不死在自己的法场上。他要求给他一挺机关枪，由执法队督阵，要死在向敌人的冲杀中。最后，经边区高等法院最后判决，仍判处黄克功死刑。

在公审大会上，当着黄克功及到会群众，除宣布法庭判决外，并宣布了毛泽东于 10 月 10 日致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院长雷经天的信。信中说：

“黄克功过去斗争历史是光荣的，今天处以极刑，我及党中央的同志都是为之惋惜的。但他犯了不容赦免的大罪，以一个共产党员红军干部而有如此卑鄙的，残忍的，失掉党的立场的，失掉革命立场的，失掉人的立场

的行为，如果赦免，便无以教育党，无以教育红军，无以教育革命者，并无以教育做一个普通的人。因此中央与军委便不得不根据他的罪恶行为，根据党与红军的纪律，处他以极刑。正因为黄克功不同于一个普通人，正因为他是一个多年的共产党员，是一个多年的红军，所以不能不这样办。共产党与红军，对于自己的党员与红军成员不能不执行比较一般平民更加严格的纪律。当此国家危急、革命紧张之时，黄克功卑鄙无耻、残忍自私至如此程度，他之处死，是他的自己行为决定的。一切共产党员，一切红军指战员，一切革命分子，都要以黄克功为前车之戒。”

指出军分会10月8日指示有原则错误

前方军分会（后称华北军分会）是1937年8月29日，由中共中央决定成立的，是中国共产党在华北敌后的军事领导机构。10月8日，前方军分会发出“对目前华北战争形势与我军任务的指示”。这个指示是在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取得平型关大捷的胜利影响下产生的。在指示中，把山西太原说成是华北抗日战争的堡垒，过高地估计了国民党军队的力量及其进步性，特别是没有把敌后游击战争提到战略上来认识，模糊“游击战”和“运动战”两个概念的主次关系，提出“我们必须依据独立自主的运动游击战机动果敢的作战原则，以高度的积极动作，争取新的胜利”，“必须反对一切民族失败主义的情绪与认为华北局势无法挽救的宿命论”等等。这个指示只是根据看到的一些表面现象和从主观愿望写的，所以它是一个脱离实际和经不起实践考验的指示，因而也是一个错误的指示。当毛泽东看到这个指示文件后，于10月17日同张闻天、致电朱德、彭德怀、任弼时，明确指出：“军分会十月八日指示文件，有原则错误，望停止传达。”

恢复军队中政治委员及政治机关制度

1937年8月25日，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宣布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改编命令虽然任命任弼时为八路军政治部主任、邓小平为副主任，但取消了政治委员，并将八路军下辖三个师的政治部改为政训处。为统一并加强前后方部队政治工作的领导，10月16日中央军委作出关于成立总政治部的决定，并任命任弼时为主任，总政治部副主任在邓小平未回军委以前由毛泽东亲自兼代其职。10月19日，八路军总部致电中央，说明改编后，政治工作的地位和职权降低，政治工作已开始受到若干损失；而在指挥人员方面，有个别同志因改单一领导不大接受他人意见，多数单一首长感到自己能力不够，致使部队建设也受到某些损失。因此，建议恢复党代表制度和政治部。10月22日，毛泽东同张闻天复电朱德、彭德怀、任弼时、邓小平并告周恩来："关于恢复政治委员及政治机关原有制度，我们完全同意，请即速令执行。惟党代表名义不妥，仍应名为政治委员。将来国民党采用党代表制时，我军方可改为党代表。"10月24日，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在五台县发布命令："为加强党在军队中的领导，保持党（和）红军光荣传统，……特决定军队中（恢复）政治委员及政治机关原有制度，团以上（及）独立营设立政治委员"。"各师政训处立即改为政治部，各团政训处改为政治处"。由于及时恢复军队中政治委员及政治机关制度，使一度削弱的八路军政治工作得到加强和提高。

红军改编后，开赴华北前线。当时华北七十多万国民党军正节节败退，平津失守，日军长驱直入，山西危急。而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平型关首战告捷，取得抗战史上第一次对敌歼灭战的重大胜利。国民党军节节溃败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未能建立以革命的政治纲领和革命思想为指导，以团结、巩固、提高部队战斗力

为目的革命政治工作。9月29日，毛泽东在《国共合作成立后的迫切任务》一文中尖锐指出："现在国民党军队的制度还是老制度，要用这种制度的军队去战胜日本帝国主义是不可能的"。"中心的任务是改变军队的政治精神和政治工作"。"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在今天，对于整个抗日战争，还只能起先锋队的作用，还不能在全国范围内起决定的作用，但是它的一些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的优点是足供全国友军采择的。这个军队也不是一开始就象现在的情形，它也曾经过许多的改造工作，主要地是肃清了军队内部的封建主义，实行了官兵一致和军民一致的原则。这个经验可以供全国友军借鉴"。10月25日，毛泽东在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中，进一步明确而完整地提出了政治工作三大原则。他说："八路军更有一种极其重要和极其显著的东西，这就是它的政治工作"。"八路军的政治工作的基本原则有三个，即：第一、官兵一致的原则，这就是在军队中肃清封建主义，废除打骂制度，建立自觉纪律，实行同甘共苦的生活，因此全军是团结一致的。第二，军民一致的原则，这就是秋毫无犯的民众纪律，宣传、组织和武装民众，减轻民众的经济负担，打击危害军民的汉奸卖国贼，因此军民团结一致，到处得到人民的欢迎。第三，瓦解敌军和宽待俘虏的原则。我们的胜利不但是依靠我军的作战，而且依靠敌军的瓦解"。

会见叶挺商组新四军

1937年10月下旬，叶挺离开南京，途经武汉、西安来到延安。叶挺这次到延安，是为了向中共中央请示关于组建新四军的工作问题。

在延安，毛泽东亲自迎接他，为他设宴接风，多次进行广泛交谈。叶挺对他在大革命失败后走过的一段曲折道路，作了自我解剖，再次表示，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军事战略，完全接受中

国共产党的领导。毛泽东对叶挺在北伐战争和南昌、广州起义中建立的历史功绩，给予高度的评价；对他充分理解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政策和愿意与中国共产党合作抗日的决心，表示热烈的欢迎。毛泽东和叶挺还对抗日战争的发展趋势，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创造敌后根据地等问题进行了详尽的探讨，互相间取得了充分的谅解和信任。关于组建新四军的问题，毛泽东向叶挺提出：经过中共中央的郑重考虑，认为可争取将新四军的编制定为两师四旅八团。领导人可选叶挺为军长，项英任副军长，陈毅任政治部主任，周子昆任参谋长。军部暂驻武汉，南昌、福州设办事处。叶挺同意这个方案，并提出，请党中央多派一些得力的干部，加强新四军的工作。毛泽东希望叶挺能据此方案向蒋介石本人和国民党军委会方面多做争取工作，同时还要向南京提出将陕北部队增编一个师。叶挺表示他一定照毛泽东的要求尽力去做。

在延安期间，毛泽东在抗大礼堂亲自主持了一次欢迎叶挺的大会。毛泽东在欢迎大会上说："我们今天为什么欢迎叶挺将军呢？因为他是大革命时代的北伐名将，因为他愿意担任我们新四军军长，因为他赞成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所以我们欢迎他。"叶挺受到党中央如此隆重的欢迎，心情十分激动。他在会上表示："同志们欢迎我，实在不敢当。革命好比爬山，许多同志不怕山高，不怕路难，一直向上走。我有一段爬到半山腰又折回去了，现在又跟了上来。今后，一定遵照党所指示的道路走，在党和毛主席正确领导下，坚持抗战到底。"

11月7日，已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新四军分会书记，新四军副军长的项英来到延安。毛泽东为欢迎项英，也组织了一个晚会。他特意请项英、叶挺一起坐在主席台上。叶挺和项英在延安相见，他们都想借着这个机会好好地谈一谈，但因叶挺急需赶回去处理有关组建新四军的重要事项，而项英又要留下与党中央讨论问题，两天之后他们便匆匆告别了。

叶挺在党中央逗留了10余天，于11月9日离开延安，返回武汉。

反对军队中的片面观点和机械主义

1937年10月，八路军第一二九师为配合国民党打击沿正太铁路西犯之日军，在山西平定县集结，待机开进。10月23日，该师第三八六旅第七七一团在平定县七亘村地区遭日军一个联队和200余骑兵的袭击，伤亡30余人。消息传到延安，10月25日毛泽东立即给八路军各级负责人发出电报，指出："屡胜之后，必生骄气，轻视敌人，以为自己了不得。七七一团七亘村受袭击，是这种胜利冲昏头脑的结果。你们宜发通令于全军，一直传达到连队战士，说明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是一个艰苦奋斗的长过程。凡那种自称天下第一，骄气洋溢，目无余子的干部，须以深切的话告诉他们，必须把勇敢精神与谨慎精神联系起来，反对军队中的片面观点与机械主义。"10月28日，第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亲自指挥第七七二团第二次在七亘村设伏，由于料敌如神，谨慎用兵，取得"重叠设伏"的重大胜利。第七七二团两次于七亘村设伏，共歼日军400余人，缴获缨马300余匹及其他大量的军用物资，挽回了七亘村受袭击的损失。

中共中央政治局十二月会议

11月29日，毛泽东去延安机场迎接从苏联回国的王明。王明在苏联时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之一，并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主席团委员和候补书记。王明回国，是为了在中共中央贯彻共产国际执委书记处在5月制定的关于中国抗日形势和中共任务的"新政策"。王明离开莫斯科后，由王稼祥接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的职务。

王明回国后，各地政治局委员大多已齐集延安。为了听取共产国际的指示和总结党的工作，中共中央于12月9日至14日召开政治局会议（即“十二月会议”）。出席这次会议的有张闻天、毛泽东、王明、康生、陈云、周恩来、博古、林伯渠、彭德怀、凯丰、刘少奇、项英、张国焘共13人。张闻天在会上作了《目前的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报告，王明作了《如何继续全国抗战和争取抗战胜利呢?》的报告，项英作了《三年来坚持的游击战争》的报告。王明的报告分析了抗战爆发以来的国内外形势，在坚持联合国民党抗战的问题上，发表了一些正确的意见。但是，他又以共产国际路线代表的名义，批评洛川会议过分强调“独立自主原则”，没有提出“抗战高于一切”；批评毛泽东《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对形势的分析有错误；批评刘少奇《抗日游击战争中各种基本政策问题》的一些正确观点，并在如何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面，提出了比较系统的右倾投降主张。主要是：一、过高地估计了国民党的政策转变，忽视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不同阶级和集团的原则区别。二、反对提出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主张“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和“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三、轻视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游击战争，幻想依靠“全中国统一的国防军”求得抗日战争的速胜。

在会上毛泽东没有作正式报告，但他在两次发言中正面阐述了洛川会议以来中共中央的正确主张。他说：团结御侮是我们的基本方针，统一战线问题要适合于这个总方针。在统一战线中，“和”与“争”是对立的统一。国民党内划为左、中、右派，而且左、中、右派会变动的。过去我们反对国民党派大官来也是必要的，因为西安事变后国民党要派大批人来侮辱和破坏红军，应该拒绝。如果没有共产党的独立性，便会使共产党降低到国民党方面去了。国民党与共产党谁吸引谁这个问题是存在的，不是说要将国民党吸引到共产党来，而是说要国民党接受共产党的政治影响。我们所谓独立自主是对日本作战的独立自主。战役战术是独

立自主的。抗日战争总的战略方针是持久战。红军的战略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在有利条件下打运动战，集中优势兵力消灭敌人一部。洛川会议决定的战略方针是对的。独立自主，对敌军来说我是主动而不是被动的，对友军来说我是相对的集中指挥，对自己来说是给下级以机动。总的一句话：相对集中指挥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

这次会议，由于毛泽东等的抵制，王明的错误意见没有形成会议决议；王明的错误意见虽然一度影响了一些同志，但没有为全体与会同志所接受。会议决定成立由25人组成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筹备委员会，毛泽东任主席、王明为书记，并由毛泽东、张闻天、康生、陈云、王明5人组成筹备委员会秘书处。会议决定，增补王明、陈云、康生为中央书记处书记；由周恩来、王明、博古、叶剑英组成中共代表团，负责与国民党谈判；由项英、周恩来、博古、董必武组成中共中央长江局，领导中国南方各省党的工作。会议之后，王明前往武汉，并担任了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使当时国民党统治区、华中敌后地区的党的工作和开创根据地工作受到了一些不良影响；但是，就全党范围来说，还是以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在洛川会议之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方针为主。

1938 年

要梁漱溟读《反杜林论》

抗战爆发后，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使梁漱溟对抗战前途感到悲观，同时又想对中国共产党作一考察。于是，梁漱溟产生了赴延安见毛泽东的念头。经蒋介石同意，中共方面表示欢迎，梁漱溟便很快成行。1938 年 1 月 5 日梁漱溟由西安往延安，1 月 25 日返回，往返共 3 个星期。在延安，毛泽东不仅设宴招待了梁漱溟，临走时又为梁送行，而且进行了 6 次长时间的交谈。有两次竟通宵达旦。他们谈的内容很多，主要的归纳如下：

梁问：造成 1927 年后国共两党分裂、斗争的客观因素是什么？毛答：大致分为国内的因素、国际的因素。如国际的因素，那时各帝国主义同惧中国的赤化，他们可以统一起来。于是他们就来分化中国内部，使国共分裂。但到今天则相反。今天国际上有侵略的日德意一边，有反侵略的英美法一边，因统一不起来，他们就不能共同来对付中国。日本的侵略逼成中国的团结，反侵略者则不愿中国再有内战，处处从正面助成我们的团结。1936 年西南“两广事件”和“双十二事变”时，英美友人的心理及其活动，就是最好的例证。毛泽东说：这就是今昔客观因素的不同。由于这些因素（国际的加国内的），他相信国共前途只会团结，不会分裂。

关于抗战前途问题，梁漱溟说出了自己的失望和悲观。中国的前途如何？中华民族会亡吗？他说，到延安就是专程讨教的。毛泽东十分耐心地听他把话说完后，面带笑容，斩钉截铁地回答：中国的前途大可不必悲观，应该非常乐观！最终中国必胜，日本必败，只能是这个结局，别的可能没有！接着毛泽东分析了国内，国外，敌、我、友三方力量的对比，强弱的转化，战争的性质，人民的力量等等，使梁漱溟十分信服。毛泽东这次谈的“中国必胜，日本必败”的观点，即是不久后他写成的《论持久战》一书的主要论点。

谈到如何建设一个新的中国问题，毛泽东和梁漱溟分歧很大。毛泽东事先用一天时间读了梁漱溟著的几十万字的《乡村建设理论》一书，这是梁在谈话前送给毛的。毛泽东作了许多摘录。毛泽东对梁漱溟说，你的著作对中国社会历史的分析有独到的见解，但你的主张总的说是走改良主义的路，不是革命的路。改良主义解决不了中国的问题，中国的社会需要彻底的革命。革命怎样才能彻底？中国共产党的基本理论，是在对中国社会进行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分析、估计后，从这一基本分析、估计得出的力量对比出发，来确定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毛泽东十分强调阶级和阶级斗争的作用，梁漱溟不同意的正是这一点。他争辩说，中国社会与外国社会不同。在历史上，外国的中古社会，贵族与农民阶级对立鲜明，但中国的中古社会贫富贵贱不鲜明、不激烈、不固定。有句老话叫："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男儿自当强。"因此中国社会阶级分化和对立也就不鲜明、不激烈、不固定。根据这种分析，梁漱溟提出"伦理本位"、"职业分途"8个大字。"伦理本位"是指中国家庭和社会的重要原则，像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妻相敬，亲朋善友，等等，即注重义务。"职业分途"，也就是社会分工，人人尽责，做好本行，则社会就能稳定、发展。这一次，梁漱溟讲了许多，毛泽东耐心听着，有时插话。毛泽东强调说，中国社会有着特殊性是对的，但中国社会却同样有着与西方社会共同性的一面。毛说梁的观点太看重了中国特殊性的一面，而忽略了共同性即一般性的一面。梁则说毛是太重了一般性的一面，而忽略了特殊性的一面。两人相持不下，谁也没有说服谁。

毛泽东和梁漱溟之间虽然存在着重要分歧，但毛泽东的政治家的风貌和气度，给梁漱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致使他终生难忘。梁漱溟结束对延安的访问要返回西安去了。临别时，毛泽东对梁漱溟说：我对你说一句要紧的话，要贡献你一句要紧的话。恩格斯写了一本书，叫《反杜林论》。你要读读《反杜林论》。

叫“荣誉军人教导院”好

1938年初，在延长、延川、宜川等县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有200多名伤病员集合起来要上延安“请愿”，并点名要找毛主席提意见。

两延河防司令员知道后，很着急，他赶紧请来伤病员代表谈话。原来，这些伤病员大部分是长征过来的老同志，当时留在陕北根据地的几个伤残医院里疗养。由于日寇和国民党军队对我抗日根据地的蚕食、“扫荡”、封锁，物质条件非常艰苦。同时有些医务人员医护作风差，对伤残人员照顾得不周到，因此，他们很有意见。司令员听了伤病员代表的意见，一面找房子安排这些同志先住下，一面打电话把这件事报告毛泽东。

毛泽东详细询问了伤病员提的意见，又问司令员怎么处理的。当了解清楚后，毛泽东说：“没有责备他们就好。这些同志大部分是长征过来的，流过血，对革命有贡献，现在伤残了，没有伸手要什么，就是要求我们改进工作。是些好同志呵。”稍停片刻，毛泽东又沉痛地说：“同志，这个事情我们没有搞好啊！”“我们确有官僚主义，要发动伤病员给我们提意见，‘动手术’医治这官僚主义。”他要司令员转告伤病员同志们：“就说毛泽东和中央领导的窑洞已经腾出来了，欢迎他们到延安来住，整整我们的官僚主义。”司令员内心很不平静，放下电话就跑到伤病员的住处转告毛泽东的话。大家听了深受感动，都说毛主席总是和群众血肉相连，心心相映，虚心听取群众的意见。有个伤病员哽咽着说：“请转告毛主席，我们不去延安了。”

司令员报告毛泽东后，毛泽东还是坚持邀请伤病员派代表到延安来开会。开会前，毛泽东为了把这个问题解决好，把司令员等人召到延安，制定切实改进的措施。连更改医院名称的细节都考虑到了。毛泽东说：“不能再叫残废医院了，这个名称对伤病员

的人格不尊重，任何人到那里去，都会对这个名词反感，很不好。要把残废医院改成荣誉军人教导院，积极地当作训练干部去办好。”

1938年2月底，会议在延安抗大旁边的房子里召开了。毛泽东亲自到会讲了话，他说：“欢迎大家提批评意见。过去工作没搞好，责任在我们上面没有组织好，缺乏主动精神来抓这一工作。当然，客观上也确实存在好多困难，需要谅解。最后，毛泽东说：今后大家都要照这里讲好的去办。伤病员代表和所有参加会议的同志，听了毛泽东的讲话都非常激动，每个人的心中都鼓起了一股劲：做好工作，团结抗日。

会议刚开过，毛泽东根据有的伤病员要求回家乡的意见，请周恩来副主席先同国民党交涉，待人身安全有保证后，再送伤病员回去。后来，通过周恩来同国民党交涉好了，荣誉军人教导院才把2000余名荣誉军人送回老家。当时有些同志提出：将来还叫不叫他们回来呢？毛泽东说：全国胜利后，当然要他们回来，因为他们是回各地做抗日宣传动员工作的人员。在做这项工作的过程中，毛泽东还指示，全残的同志不要让他们回去，因为他们到白区去，连日常生活都不能自理，会有很大困难的。

1938年底，毛泽东还召集卫生部门和中央有关负责同志，到杨家岭向他汇报对伤残工作的检查情况。在会上，毛泽东当即指示有关部门：今后发物资的次序为：（一）前方；（二）伤病员；（三）残废同志；（四）后方部队和机关等。残废同志的伙食标准与伤病员同（中灶标准，每人每天7分钱）。

在毛泽东的直接关怀下，伤病员和残废同志的生活立即得到提高。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也没有忽视对伤病员和残废同志在生活上的照顾和政治上的培养。这已成为我们党和军队工作的优良传统了。

写《读书日记》

毛泽东20年没有写过日记了，2月1日起再来开始，说是为了督促自己研究一点学问。在第一天的日记上写道："看李达的社会学大纲，一月十七日至昨天看完第一篇，唯物辩证法，从1—385页。今天开始看第二篇，当作科学看的历史唯物论，387—416。"

以后毛泽东几乎每天不漏地记录着读过的页码，有几页、十几页、几十页不等，要是工作紧张没有时间，就写上"没有看书"。

2月6日，读完李达《社会学大纲》第二篇，开始读第三篇"社会的经济构造"。

2月20日，读完李达《社会学大纲》第三篇。开始读第四篇"社会的政治建筑"。

3月5日，开始读李达《社会学大纲》第五篇"社会的意识形态"。

3月16日，读完李达《社会学大纲》全书。

3月18日，开始读克劳塞维茨《战争论》。本日看完第一章，一直到55页止。

3月25日，开始读《新华日报》社社长潘梓年寄来的他所著《逻辑与逻辑学》。本日看到93页。毛泽东在日记中写道："颇为新鲜"。26日继续阅读，27日读完全书。

3月28日，开始继续阅读中断的《战争论》。《战争论》何时读完的，没有记载。《读书日记》写到4月1日为止。

中共中央政治局三月会议

1938年2月27日至3月1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政治局会议（又称三月会议），主要讨论抗战形势、国共两党关系和抗日

军事问题。毛泽东、王明、张闻天、周恩来、康生、凯丰、任弼时、张国焘8名政治局委员出席会议。王明作政治报告，坚持他在去年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上提出的右倾主张，附和国民党“只要一个军队”和“统一军令”的说法，强调在军事上要服从国民党的统一领导。

毛泽东就抗日军事问题作了发言，提出：中国抗战最后是必然胜利的，但必须经过许多困难。国民党的腐败与共产党的力量不足，日本的兵力不足与野蛮政策，再加上复杂的国际条件，造成了中国抗战的长期性，即持久性。中国抗战应有战略退却，前一段没有大踏步的进退，只是硬拼，这是错误的。应该知道保存实力到最后便能取得最后的胜利。日军的继续进攻，将使中国被割断为许多块，因此在原则上应分割指挥，以便于发展。将来战争的具体形势，是内线外线作战互相交错，日本包围我们，我们在战役上也包围日本。中国抗战要争取外援，但主要是靠自己，强调自力更生。毛泽东在发言中还提出要大量发展共产党的组织，并以此来推动群众抗日运动的发展。毛泽东的这一建议立即为中共中央采纳，3月15日中共中央即作出了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

毛泽东等的发言，实际上抵制了王明的错误主张。这次政治局会议没有形成正式文件。但会议之后，王明以个人署名公开发表了《三月政治局会议的总结》，把他的右倾投降主义主张冒充为中央政治局的“一致意见”广泛宣传，造成了不良的影响。

与合众社记者谈话

美国合众社记者王公达于1938年2月间来延安访问，毛泽东与他作了一次谈话。王公达把这次谈话记录整理成文章，经毛泽东审阅，在3月5日《解放》第32期上发表。

毛泽东在回答王公达提出的各种问题时说：我对中国抗战的

前途完全是乐观的，因为中国抗战的前途必然是先败后胜、转弱为强，这已经成了确定的方向了。关于军事方面，毛泽东指出：有人说，我们只主张游击战，这是乱说；我们从来就主张运动战、阵地战、游击战三者的配合。在目前以运动战为主，以其他二者为辅；在将来要使阵地战能够有力地配合运动战，而游击战，作为战斗方式说来，则始终是辅助的，但游击战在半殖民地的民族战争中，特别在地域广大的国家，无疑在战略上占着重大的地位。关于国共两党合作建国，毛泽东指出：因为中国是处在半殖民地地位，目前则更处在亡国灭种关头，连半殖民地地位都在危险中。党派与阶级虽不同，这个共同的地位则一样，就此决定了两党不但能合作抗日，并且能合作建国。但合作是在一定纲领下的合作，是有原则的合作，是真正的合作，而不是苟合与貌合。如果离开纲领与原则，必变成苟合与貌合，这是任何有原则的政党所不许可的。有纲领有原则的合作，如同朋友之间的道义之交，只有这种道义之交，交情才能长久。

会见白求恩

1938年3月底，加拿大著名的胸外科专家白求恩大夫来到延安。第二天晚上，毛泽东就在凤凰山麓的窑洞里亲切地会见了他。

白求恩大夫是加拿大共产党员，他受加拿大共产党和美国共产党的派遣，率领一支医疗队，越洋渡海，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支援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当白求恩在翻译的陪同下来到毛泽东的窑洞门口时，毛泽东已迎出来了。他紧紧地握住白求恩的手，把他请进了窑洞。毛泽东对白求恩和医疗队来到中国表示热烈欢迎。他请白求恩坐下，高兴地说：你们来解放区，说明了加拿大人民、美国人民和中国人民的团结与战斗友谊，说明了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和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之间的深厚感情。白求恩向毛泽东转达了加拿大人民和美国人民的亲切问候，详细介绍了加拿大

人民和美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情况。

白求恩从贴胸的衣袋里，掏出党证，郑重地交给毛泽东。毛泽东双手接过党证，亲切地点点头。他意识到，这不仅是一位普通的共产党员的证明书，而且是一位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的一颗火热的心啊！

毛泽东询问了白求恩一路上的旅行情况，又问到他过去在西班牙战地医疗的事，白求恩一一作了回答。他兴奋地说：根据我在西班牙的经验，如果能在战场上立即给伤员们治疗，我敢说，百分之七十五的伤员，一定能得到抢救。这就是说，医疗队必须到前线去，到战壕附近去。毛泽东一面听，一面满意地点头。

在谈到解放区的发展时，毛泽东告诉白求恩：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战场的暂时优势正在消失，解放区人民的抗日情绪越来越高。除了有训练的军队之外，共产党在农村里组织了很多游击队。人民一起来，日本侵略者将要完全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白求恩聚精会神地听着，他深深地被毛泽东的精辟分析，被解放区军民英勇抗日的伟大气概所感动。他立即向毛泽东请求，到前线去，到晋察冀边区去。他说：一个军医的战斗岗位应该是离火线最近的地方。在那里，我将使百分之七十五的伤员迅速恢复健康。毛泽东听了点点头，高兴地对他说：你的想法很好，前线很需要你这样高明的大夫。并且关心地说：前线很危险，任务重，条件差，生活艰苦，要注意自己的身体……最后，毛泽东答应由八路军卫生部来安排白求恩的工作，并且向白求恩致谢。

谈话进行了 3 个小时。白求恩回到凤凰山下的住处，把这次会见的情况详细地记录下来。他写道："我在那间没有陈列的房间里和毛泽东面对面坐着，倾听他从容不迫的言谈的时候，我回想到长征，想到毛泽东和朱德在那伟大的行军中怎样领导红军经过两万五千里长途跋涉，从南方到了西北丛山里的黄土地带。由于他们当年的战斗经验，使得他们今天能够以游击战来困扰日军，使侵略者的优越武器失去效力，从而挽救中国。我现在明白为什么

毛泽东那样感动每一个和他见面的人。这是一个巨人！他是我们世界上最伟大的人物之一。”毛泽东说：“我和白求恩同志只见过一面。”就是指这次亲切的会见。

抗大的教育方针

1938年3月19日，毛泽东在抗大第四期五大队开学典礼上讲话。他指出：你们一定要在学习的短短时期中完成学习计划，主要的是要学得一个方向，一种作风。方向是革命的方针，也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三民主义的方针，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方针。其次说到作风，便是艰苦奋斗的作风。你们要练习爬山，因为“爬山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一部分”。为什么如此说呢？马克思主义在今天中国的具体任务是去掉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而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便非吃苦耐劳，努力爬山不可！否则便成为形式的马克思主义者了！再加上明确的、灵活的战略战术，学习军事知识，你们便是“文武双全”的干部了！会打军事的冲锋，又会打政治的冲锋。这两个冲锋有机地、统一地配合起来，便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所以，你们到抗大来可以学习三样：（1）正确的政治方向；（2）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3）灵活的战略战术。有了这些，你们便可出去当教员，当排长也是教员，当新闻记者也是教员，教一切和你们接近的人。

4月9日，毛泽东在抗大第四期三大队开学典礼上讲话。他指出：诸同学不避艰苦，从很远的地方，风尘跋涉，来此学习，这种精神，这种决心是很好的。你们在这里学习，就是要学一个宗旨，这个宗旨也即是全国的全中华民族的宗旨——抗日救国，这是我们学校的总的方针，也是全国人民的要求。因此你们在这里应当学到以下几样东西：首先，是学一个政治方向。政治方向可以有许多不同的方向，你们都要学一个正确的政治方向，要抗日救国、怎样打、为什么日本帝国主义一定能被打倒的正确的政治

方向。其次，要学一个达到及完成这种政治方向的工作作风——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必须有这种作风才能达到及完成以上的政治方向。再次，你们要学作一个军人，要学军事，要学战略战术——灵活的战略战术。即是无论敌人用什么方法来进攻，我们都有一种办法对付；敌人用这一种方法打过来，我们用另一种方法打过去，等到敌人技穷了，我们便可以打胜他。总之，你们在这里要学得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加上灵活的战略战术，这样我们便能够最后战胜敌人。

5月4日，毛泽东在抗大第四期一大队成立大会上讲话。他指出：你们在此学什么——我们的政治方向就是学习马克思主义，三民主义等等，那是第一条；再有坐地下，吃小米，爬山等等便是实行，这是第二条。现在你们是政治队，二月毕业，也可到军队中去，如果再加上战略战术，那是更好。我们抗大的学习有三：(1) 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2) 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3) 灵活的战略战术。有了这三条就够了。

毛泽东的这三次讲话，基本上概括了抗大的教育方针，即是：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这三者，是造成一个抗日的革命军人所不可缺少的，抗大的职员、教员、学生，都是根据这三者去进行教育、从事学习的。

出席鲁迅艺术学院成立大会

1938年1月28日，为纪念淞沪抗战6周年，延安文艺界从抗大、陕北公学等单位集中六七十位艺术人才，排练演出话剧《血祭上海》。毛泽东看了这次演出。看完后他说：戏演得好，这些人不要散了。最初打算办一个戏剧训练班，后来办了一个艺术学校，取名鲁迅艺术学院。

2月，毛泽东与周恩来领衔发出鲁迅艺术学院的《创立缘起》。文中说：艺术是宣传、发动与组织群众的最有力的武器，培养抗

战的艺术工作干部正是不容稍缓的工作，因此决定创立鲁迅艺术学院，要沿着鲁迅开辟的道路前进。

4月10日，毛泽东出席由他领衔创办的鲁迅艺术学院的成立大会，并与全体师生合影。工作人员请毛泽东坐首长席，毛泽东不肯，他说，我是工作人员，不是首长。就和鲁艺的同志们坐在一起来了。在成立大会上，几位中央领导同志讲了话。当请毛泽东讲话时，他说：我是工作人员，今天不讲话，过几天再来讲吧。他说是鲁艺的工作人员，因为鲁艺是由他作为第一个发起人创立的。

会后，出了一本小册子，毛泽东题写了书名：《鲁迅艺术学院成立纪念刊》，并签了名。书内收《鲁艺创立缘起》、《成立宣言》等。

5月12日，毛泽东到鲁艺讲话。他说：我们的两支文艺队伍，上海亭子间的文艺队伍和山上的队伍，汇合到一起来了。这就有一个团结的问题。要互相学习，取长补短。要好好团结起来，进行创作演出。要下去，要到人民生活中去，走马看花，下马看花，起码是走马看花，下马看花更好。我们要有大树，也要有豆芽菜。怎么能有大树呢？我不懂文艺，文艺是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日本帝国主义的武器。创作好象厨子作菜一样，有的佐料放得好，菜就好吃。你们要好好看书学习。书是好看的，它不会叫，不会跑，不象杀猪，杀不好，猪就跑了。除了看书，还要学习民间的东西。演戏要象陕北人。无产阶级文学艺术工作者要到革命斗争中去，同时学习人民的语言。要从革命斗争中学习的东西多得很。你们看法捷耶夫的小说《毁灭》，描写骑马，平时上马是怎么上的，紧急时候上马是怎么上的，都不一样。如果作者没有参加过战斗生活，怎么写得这样真实呢？绥拉菲摩维支写了《铁流》，我们的二万五千里也是“铁流”，可惜还没有人写。《红楼梦》里有个大观园。大观园里有个林黛玉、贾宝玉。你们鲁艺是个小观园。你们也就是林黛玉、贾宝玉。但是，我们的女同志不要学林

黛玉，只会哭。我们的女同志比林黛玉好多了，会唱歌，会演戏，将来还要到前方打仗。抗日民主根据地就是大观园。你们的大观园在太行山、吕梁山。

毛泽东讲话后，鲁艺师生进行了热烈讨论。不久，开始派一部分同学到前方去。

张国焘一贯是两面派

1938年4月4日，张国焘假借到陕西省中部（今黄陵）县祭黄帝陵之机，私自逃离延安，在国民党军政要人的庇护下经西安到达武汉。驻武汉的中共中央长江局负责人曾多次与张国焘谈话，劝其改正错误回党工作。4月16日，毛泽东同张闻天等发电报给长江局转张国焘，希望他翻然悔悟，早日归来。4月17日，王明、周恩来等根据张国焘的表现，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商讨处理办法。经中央同意，周恩来同张国焘谈话，向张提出：改正错误回党工作或向党请假，暂时休息一个时期或自动声明脱党。当晚，张国焘以书面形式声明脱离共产党，公开投靠国民党。中共中央乃于4月18日作出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决定。

5月4日，毛泽东在抗大第四期一大队成立大会上作报告，讲到为什么要开除张国焘的党籍问题。他说：张国焘是共产党员，为什么开除他？因为他不干了，对共产党路线发生动摇，私自跑到国民党那里去，并声明脱离共产党，因此开除他的党籍。毛泽东说：他在西安事变时主张杀蒋，实行内战。以前，在1936年西征的时候，他要到昆仑山上进行统一战线，与姜太公、太上老君进行统一战线。我们到了陕北他还要去，他自立伪中央，自封为总书记，天下少有的这位先生。1921年中共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他也到的，1923年在广州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他也到了，中央决定国共合作统一战线政策，他坚决反对与资产阶级合作，他说无产阶级是清高的阶级，与资产阶级合作，要沾上脏物，反对

合作。可是他终是少数，在革命时就脱队了。承认错误，尾巴又在，一翻一复，两面派的行为始终占据他。现在又走了，跑到国民党那儿特务机关里去。我们要他当代主席时，希望他割掉尾巴，要他在工作中纠正错误，他说："割掉了"！而实际上穿起袍子来，尾巴藏在里面。为什么今天才开除呢？因为讲讲仁义道德，而且他资格老，做过工人运动。同时，我们共产党对党员以说服教育为前提的。他这次走，是借口到中部祭黄帝陵，黄帝抓他到墓里去了。他到西安与林伯渠讲，说边区是鸡骨头，吃之无肉，舍之有味，这是曹操讲的。这边区是否鸡骨头，可以讨论，我看你们一定以为它不是。我看边区还有两块肉：（一）坚定的政治方向；（二）艰苦的工作作风。你看这里有民主，只要抗日我们都拍掌欢迎……全国青年潮水一般地涌进来。他说边区不好，是鸡骨头，我看不对。现在他到汉口，住特务机关，脱离了共产党，因此开除他的党籍。

5月7日，毛泽东在陕北公学对即将毕业的二期学员讲话，讲关于张国焘叛党以及被开除党籍的问题。讲话中又列举了张国焘所犯过的"左"、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和分裂党的错误，指出张国焘一贯是两面派，这次叛党是被资产阶级引诱。最后说，张国焘叛党在全党可引为教训，我们每个同志都应当坚定革命的旗帜，不怕困难，坚决奋斗。

10月12日至14日，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向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作了《抗日民族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新阶段》的报告。他在报告的第七部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提出："鉴于张国焘严重地破坏纪律的行为，必须重申：（一）个人服从组织；（二）少数服从多数；（三）下级服从上级；（四）全党服从中央。谁破坏了这些纪律，谁就破坏了党的统一。经验证明：有些破坏纪律的人，是由于他们不懂得什么是党的纪律；有些明知故犯的人，例如张国焘，则利用许多党员的无知以售其奸。因此，必须对党员进行有关党的纪律的教育，既使

一般党员能遵守纪律，又使一般党员能监督党的领袖人物也一起遵守纪律，避免再发生张国焘事件。”

会见卫立煌

1938年4月，卫立煌和他的总指挥部遭到日军的阻拦，被困于黄河之滨。为靠上他的军队，与所部会合，加之想去延安会见毛泽东，了解陕甘宁边区的情况，卫立煌决定西渡黄河，假道陕北。这样，卫立煌和总指挥部全体人员，于4月16日从山西省的永和关渡过黄河，来到陕北的延水关。第二天抵达延安。

4月17日，卫立煌一行在城里稍事休息之后，就去城西凤凰山麓毛泽东的住处会见毛泽东。毛泽东走出窑洞，快步向前，热情迎接卫立煌等。在毛泽东的窑洞里，两人促膝长谈，十分倾心。中午，毛泽东设宴招待卫立煌一行。晚上，毛泽东陪同卫立煌出席延安各界举行的盛大欢迎晚会，毛泽东亲致欢迎词。他指出，卫立煌将军是坚持华北抗战的领导者，此次过延，希卫将军对边区工作加以指示。在热烈的掌声中，卫立煌讲了话。他说：这次抗战中把我国的弱点、缺点完全暴露出来了。第一是不团结现象，因而受到了局部失利。第二没有组织，没有坚强的领导。今后要把全国人民组织起来，筑成一道万里长城，来打击日本强盗的进攻。最后卫立煌称赞边区各地的人民组织实为全国的模范，应该把边区好的例子更加发扬起来。晚会上，延安鲁艺师生表演了精彩的文艺节目。毛泽东与卫立煌并排坐着，一起观赏，十分融洽。

卫立煌原打算第二天一早就走，现在又改变主意了，打算多停留一天，参观抗大和其他地方。4月19日一早，卫立煌一行离延赴西安。

关于巩固与扩大晋察冀根据地的指示

1938年1月，晋察冀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在阜平城召开，标志晋察冀边区政府正式成立。当时负责中共中央长江局工作的王明，极力反对。1月28日，他曾以“长江局”的名义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和八路军总部，反对成立边区政府，声称晋察冀这样做会“刺激”国民党，对全国统一战线工作将发生不良影响。但党中央拒绝了王明的意见。

4月20日，毛泽东等致电中共晋察冀分局书记彭真和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聂荣臻，指出由于各种顺利条件与你们领导和同志们的努力，使晋察冀广大地区的抗日运动在各方面都有很大的发展，根据地的建立，已经大体成功；目前你们的任务中心是在多方面巩固已得的胜利，并在巩固的现有的基础上去继续发展。电报还对为巩固和发展根据地应当进行的工作和采取的政策，提出了具体意见。

同年秋季，当晋察冀边区军民开始反击日军“北围五台”的时候，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大会主席团于10月5日特意向聂荣臻和晋察冀军民发电慰勉。电报说：“全会完全同意边区党委所执行的坚定的统一战线的方针，并在这个方针下，依靠全党全军的努力，已经使晋察冀边区成为敌后模范的抗日根据地及统一战线的模范区。这些都在华北抗战中已经和将要起其极重大的战略作用，而且你们的经验将成为全党全国在抗战中最有价值的指南。”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上肯定了晋察冀根据地的经验，对晋察冀根据地进行了热情的宣传。毛泽东说：全国广大的敌后地区都可以照晋察冀的样子去做，只要把群众充分发动起来，都可以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

工人要在抗日中做先锋

1938年4月20日，毛泽东出席陕甘宁边区第一次工人代表大会举行的晚会，作题为《结团体打日本》的讲话。他说工人首先要团结起来，要把全国各省各业的几千几百万无产阶级都组织起来，结成工人的团体，还要结成农民的团体，商人的团体，文化人的团体，全国各种行业的人的团体。不仅要结成全国的大团体，而且要结成全世界的大团体。这样一来，就使各国的工人也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他们也要组织统一战线。三个统一战线，中国一个，全世界反法西斯一个，再加上日本无产阶级的一个，这就成了全世界的统一战线。这个统一战线还要把它好好组织，好好扩大起来，一齐向日本帝国主义进攻，日本帝国主义一定能够被打倒的。中国要打胜日本帝国主义，工人阶级在抗战中有重大作用，所以无产阶级要好好团结起来，只有团结，才可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5月8日，毛泽东会见来延安的平汉铁路工人破坏大队全体人员，先与工人领队作了10分钟的谈话，询问该队情况，然后向全体讲话。他说：此次你们由山西、河北到这里来，是为了抗日，抗日是中国的大事情，这事办不好，一切人都没有好的生活，工农的生活自然不用谈了！所以现在要全国团结起来一致抗日，而工农便是其中的大多数，艰苦的工作也由他担负，没有他们就根本不行，他们在抗日运动中的责任非常之大。现在的缺点是工农还没有普遍组织起来，对自己的使命认识不够。要提倡团体，言论出版结社有自由，可以组织各种抗日团体。我希望同志们回去通通到铁路上组织工会去，工人要在抗日中做先锋。毛泽东还说：这次你们真是“不远千里”越过黄河而来，我们能见面也是因为国共两党合作的缘故。过去我们在“山上”只看见手工业工人，大城市才有产业工人。我这次见到诸位，是十多年第一次看见铁路

工人哩！十多年来我没有坐火车，因为人家说“不能坐”，我只好上山打游击去。现在事情是弄好了，所以能大打胜仗。毛泽东指出，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他一心一意为无产阶级而奋斗，从不违背无产阶级的利益。今天因为抗日，所以对资本家和地主让一点步，否则，日本帝国主义打不倒。我们要对工人同志讲清楚为什么要停止苏维埃和土地革命。工人的生活问题，农民的土地问题，我们一定要解决，但不用以前的方法，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变旧中国为新中国。希望同志们了解这些，经过同志们出去宣传鼓动，一道儿把这个事情干好。

关于开展平原抗日游击战的指示

冀鲁平原，人口稠密，物产丰富，平汉、津浦铁路纵贯南北，是日本侵略者竭力争夺与控制的地区。八路军经过7个月的作战，粉碎了敌人对山区各根据地的多次围攻，完成了山西“四角”的展开，创建了山区抗日根据地，在山岳地带站稳了脚跟。而冀鲁平原虽群众性的抗日游击战争已经开展起来，但急待加强。同时敌华北方面主力军南下进攻徐州地区友军，而友军在冀鲁平原的兵力相对薄弱，所以，为进一步发展平原敌后游击战争，以钳制和打击敌人，配合正面战场友军作战，4月21日毛泽东、张闻天、刘少奇致电刘伯承、徐向前、邓小平等，向八路军发出关于开展平原抗日游击战的指示。

电报指出：“根据抗战以来经验，在目前全国坚持抗战与正面深入群众工作两个条件之下，在河北、山东平原广大地区的发展抗日游击战争，坚持平原地区的游击战，也是可能的”；“党与八路军部队在河北、山东平原地区应坚决采取尽量广泛发展游击战争的方针，尽量发动最广大的群众走上公开的武装斗争”；“应即在河北、山东平原划分若干游击军区，并在各区成立游击司令部，有计划有系统地去普遍发展游击战，并广泛地组织不脱离生产的

自卫军”；“在收复的地区应即建立政府”，“组织民众抗日战争，镇压汉奸，保护民众利益，帮助部队筹拨给养”，“使政府、部队、人民密切联系起来”，“吸收民间的枪枝加入游击队与军队，要采用宣传说服的方法来发展游击队”，“以人民自卫军为主要的群众组织形式”等等。

4月22日，八路军总部作了具体部署：令徐向前率两个团、一个支队挺进冀南；令陈再道、宋任穷部除仍发展冀南外，再组建一个支队挺进冀鲁边；令宋时轮支队与邓华支队组成一个纵队深入冀东；令第一二九师主力在正太路和晋冀边区积极活动，以策应平汉路东的我军迅猛发展游击战和第三四四旅与决死一纵队开辟太岳山脉南部地区。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和八路军总部的部署，各部队积极向平原挺进，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在冀鲁平原蓬勃地开展起来了。

会见卡尔逊

卡尔逊原是美国海军陆战队军官、美国驻华大使馆参赞。他于抗日战争初期在中国各战场进行考察，1938年5月到达延安。一天晚上，毛泽东会见了卡尔逊。他们攀谈至深夜，谈到战争，欧美政治形势，古往今来的政治思想发展，宗教对社会的影响以及成功的世界机构的要素等等。

毛泽东说：“只要人民有志气忍受困难，有愿望继续抵抗，中国就不会垮台。只有人民信任他们的领导人，只有他们有过好一点日子的希望，人民才会建立起并保持这种意识。我们努力争取具备这些条件，我们训练干部要生活简朴、秉公执政，诚心实意地帮助老百姓解决困难。我们相信好一点的生活来自发展民主，学会自己管理自己。我们认为，经济生活应以合作社为基础。共产主义并非眼前的目标，是要经过长期的发展才能达到的。在它之前必须有强大的民主，然后是社会主义过渡时期。”

毛泽东继续说："中国象一个能盛一加仑的细颈瓶，而日本灌进了半品脱（一品脱等于八分之一加仑）水。它的部队进占一地，我们转向另一个地方；他们追击，我们就后退。日本兵力不足，无法占领全部中国。只要人民决心继续抵抗，他就无法用政治手段控制。"

卡尔逊问："对于战后，中国共产党有什么计划？"

毛泽东答："我们希望目前同国民党的协定能持续下去，建立一个真正民主的两党政府。我们认为，银行、矿山、交通应该国有。应发展生产者和消费者合作社，我们赞成鼓励私有企业。最后，我们认为，中国应同一切愿意在平等基础上对待我们的国家建立和保持友好关系。"

当谈到欧洲局势时，卡尔逊说，如果法国侵略捷克斯洛伐克，英国就会参战。毛泽东说："不会。英国不会为捷克斯洛伐克作战。如果德国伸向西南，英国就会作战，但他不准备为捷克斯洛伐克而战的。"第二年 10 月，毛泽东的预见在慕尼黑得到证实。

毛泽东的谈论又回到抗日问题上来，他说："日本把我们包围在五台山，我们在这里受到包围。日本和中国都使用突出阵地战术，好象孙连仲在台儿庄所采用的一样。但我们有另外一种类型。以日本在太原府的驻军来说吧！"他推出一只茶杯代表日本驻军的位置，其他 4 件东西代表中国军队的位置。"太原府东北五台山有聂荣臻指挥下的我军部队，西北有贺龙，西南有林彪，东南有朱德。日本人如果侵入山西，就会受到我们其中一支部队的打击。"接着毛泽东又补充说："山西是华北的战略枢纽，五台山是山西的战略枢纽，只要我们占有五台山，日本就没法控制这个省份。"

"另外一种包围方式就是美国、苏联与中国联合起来包围日本，那是一种国际的包围。"毛泽东用这句话结束了谈话。

谈话后第二天，卡尔逊又见到了毛泽东。

5 月 15 日，卡尔逊一行离开了延安。

同徐懋庸谈“两个口号”的争论问题

徐懋庸在左翼作家联盟时，于1936年8月就“国防文学”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两个口号的争论等问题，写信给鲁迅。鲁迅接信后发表了《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文，驳斥了徐懋庸。为要弄清是非，徐懋庸于1938年3月到达延安。5月中旬之末，徐懋庸写了一封信给毛泽东，请求接见。毛泽东第二天就复信徐懋庸，说愿意同他一谈，但目前较忙，待过几天相约，末尾说，不要急，问题总可以弄清楚，前途是光明的。又过了一天，毛泽东派秘书和培元、和华民来找徐懋庸，一般地了解了“左联”的情况。

大约是5月23日左右，下午3点钟，毛泽东的秘书华民来把徐懋庸带到北门内凤凰山麓毛泽东住的窑洞里谈话。毛泽东刚刚午睡起床，披了一件旧棉袄，让徐懋庸隔着办公桌，和他对面而坐。毛泽东让徐懋庸吸烟，徐说不会吸，毛泽东笑笑说：“搞文艺的人不吸烟的可不多嘛。”然后说：“现在就谈谈吧。”徐懋庸先简单地讲了自己的履历，然后把他所知道的“左联”的情况，“左联”解散的过程，两个口号的争论，他给鲁迅的那封信，鲁迅的那篇驳斥他的文章，以及事后上海的舆论对他的态度，他来延安要求弄清是非的决心，详细谈了一下。大概讲了一个半钟头。毛泽东十分认真地听着徐懋庸讲话。当徐说到他后来基本上认为鲁迅是正确的时候，毛泽东把“鲁迅”两字错听为“路线”，马上就问：“路线？谁的路线是正确的？”非常注意这一点。徐说：“我说的是鲁迅，不是路线。”毛泽东笑了一下说：“哦！”毛泽东把徐懋庸的话全部听完以后就两个口号的争论问题，谈了以下内容：

“关于两个口号的争论的问题，周扬同志他们来延安以后，我们已基本上有所了解。今天听了你们所谈的，有些情况使我们更清楚一些，具体一些。”

“我认为，首先应当肯定，这次争论的性质，是革命阵营内部的争论，不是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争论。你们这边不是反革命，鲁迅那边也不是的。”

“这个争论，是在路线政策转变关头发生的。从内战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个重大的转变。在这样的转变过程中，由于革命阵营内部理论水平、政策水平的不平衡，认识有分歧，就要发生争论，这是不可避免的。其实，何尝只有你们在争论呢？我们在延安，也争论得激烈。不过你们是动笔的，一争争到报纸上去，就弄得通国皆知。我们是躲在山沟里争论，所以外面不知道罢了。”

“这个争论不但是不可避免的，也是有益的。争来争去，真理越争越明，大家认识一致了，事情就好办了。”

“但是你们是有错误的，就是对鲁迅不尊重。鲁迅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艺运动的旗手，你们应该尊重他。但是你们不尊重他，你的那封信写得很不好。当然，如你所说，在某些具体问题上，鲁迅可能有误会，有些话也说得不一定恰当。但是，你今天也说，那是因为他当时处境不自由，不能广泛联系群众的缘故。既然如此，你们为什么不对他谅解呢。”

“但错了不要紧，只要知道错了，以后努力学习改正，照正确的道路办事，前途是光明的。”

关于新四军进行游击战建立根据地的指示

根据华中战略地位、形势及开展华中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条件，1938 年 2 月 15 日毛泽东致电中共东南分局书记项英等，指出：力争集中苏浙皖边发展游击战争，“在目前最有利于发展的地区，还在江苏境内的茅山山脉，即以溧阳、溧水地区为中心向着南京、镇江、丹阳、金坛、宜兴、长兴、广德线上之敌作战，必能建立根据地，扩大新四军基地。”

5 月 4 日，关于新四军如何开展游击战争问题，毛泽东致电项

英，指出：在敌后进行游击战争虽有困难，但是只要有广大群众，活动地区充分，注意指挥的机动灵活，就能够克服这种困难。这是河北及山东方面的游击战争已经证明了的。新四军主力部队在广德、苏州、镇江、南京、芜湖之间广大地区组织民众武装，发展新的游击队，创造根据地是完全有希望的。在茅山根据地大体建立起来之后，还应准备分兵一部进入苏州、镇江、吴淞三角地区去，再分一部渡江进入江北地区。在一定条件下，平原也是能发展游击战争的，现在条件与内战时候有很大不同。当然无论何时也应在谨慎的态度，具体的作战行动应在具体情况许可之下进行。

根据毛泽东关于开展华中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方针部署，新四军军部于5月间向所属各部发出指示，明确提出新四军的任务是："深入敌人后方，开展广泛的游击战，达到牵制和分散敌人的兵力，配合国军主力正面作战，在持久战中，争取最后的胜利。"新四军的作战原则是："积小胜为大胜，团结群众以游击动作进行胜利的战斗，并力求达到自身的壮大和战斗力量的坚强而能进一步进行大的运动战歼灭大的敌人。"遵照中共中央确定的方针和军部的指示，新四军各支队开始向华中敌后挺进，实行战略展开。

《大公报》否认持久战是不对的

台儿庄大捷后，蒋介石为了扩大战果，从各战区调集大批军队，企图进行徐州会战。1938年4、5月间进行的鲁南战役是徐州会战的第三阶段。4月25日《大公报》发表社论说："现时的时局，就是抗战前途的重要关头，我们在这一战胜利了，其有形无形的影响，就可以得到准决胜的功效。""全军将士注意！现在就是准决战"。4月26日《大公报》又发表社论说："这一战当然不是最后决战，但不失为准决战。因为在日本军阀，这一战，就是他们最后的挣扎。"

毛泽东反对这种意见，他在5月10日中共中央常委会议上说：现在蒋介石与我们的估计都认为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近《大公报》两篇社论态度变化，认为鲁南战争是准决战，否认中日战争是持久战。我们对于中日战争的估计，过去也有两种意见。我一贯估计中日战争是持久战，因为中国是大国，日本不能完全吞并中国，同时中国又是弱国，须要持久战争才能取得胜利。

5月13日，毛泽东就《大公报》宣传“准决战”问题，致电王明、周恩来等，指出：“《大公报》否认持久战，提倡准决战的论调，我们认为是不对的，徐州决战只应该是某种程度的战役决战，而决不应该看作战略决战。必须准备在徐州决战失败后，仍有充足力量为保卫武汉而战。”

会见国民党老党员施方白

1938年5月11日，毛泽东会见国民党老党员施方白，对他提出的9个问题逐一作了回答。事后，施方白整理了谈话记录，他写道：“我于一九三八年五月十一日十八时见毛主席于延安城内，谈话一小时又十余分钟。上项九答记录，有关学术思想，为慎重起见，曾于翌日将原稿送请毛主席修正，此乃修正本也。”

施方白问：抗日胜利的把握如何？假使胜利的话，政治路线有无突变的可能？毛泽东回答：抗战的必胜，那是确有把握的。你所说的突变，如果指政治进步而言，那我可说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以后，中国的政治，当然会有很大的进步，但不是立即实行社会主义，而是彻底完成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

施方白问：中国是不是需要社会革命？假使需要的话，是不是要在资本主义发展以后？毛泽东回答：中国将来是要实现社会主义的，但不一定要经过如同西方各国那样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也不一定需要如同十月革命那样的流血革命，中国可能和平地走到社会主义。

施方白问：是不是在抗战胜利后就可进行社会革命？毛泽东回答：不是，条件还不具备，需要经过一个相当长的时期，抗战胜利后，中国的政治当然会有很大的进步，但不是立即实行社会主义，而是彻底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5月12日，毛泽东还为施方白题写了赠言："中国目前阶段一定要完成民族民主革命，即彻底战胜日寇与建立新的民主共和国。中国将来阶段一定要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即实现更进步的更完满的社会主义共和国。完成这两个革命都要坚持统一战线政策，只有好好团结一切革命势力于统一战线里面，才能达到目的。"

5月13日，毛泽东还把自己签名的一张照片赠送施方白。

《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

1938年5月30日出版的《解放》第四十期上发表了毛泽东所著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

抗日战争爆发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顽固派千方百计限制八路军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游击战争进行恶毒的诬蔑和攻击。同时，中国共产党内也有少数人轻视游击战争的战略作用，把希望寄托在正规战争特别是国民党军队的作战上面。为了回答和解决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军队要不要坚持和怎样坚持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的问题，毛泽东写了这篇文章。

毛泽东指出：中国是一个处于进步时代的大而弱的国家，而日本是一个小而强的野蛮的帝国主义国家。在这样的情况下，敌人占地甚广和战争的长期性发生了。但日本是小国，兵力不足，必然在其占领区中有许多空虚的地方，因此，游击战争就主要地不是在内线、在战役战斗上配合正规军作战，而是在外线即在敌后单独作战，在战略上配合正面友军的正规战。并且由于有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和广大群众的广泛参加，因而游击战争就不是小规模的，而是大规模的，于是战略防御和进攻一整套东西发生

了。这样，就要求把游击战争的问题放在战略的观点上加以考察。在此基础上，毛泽东分别论述了抗日游击战争的6个具体战略问题：（1）主动地、灵活地、有计划地执行防御战中的进攻战，持久战中的速决战和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2）和正规战争相配合；（3）建立根据地；（4）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5）向运动战发展；（6）正确的指挥关系。并指出“这六项，是全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纲领，是达到保存和发展自己，消灭和驱逐敌人，配合正规战争，争取最后胜利的必要途径。”

毛泽东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对统一和提高全党全军对抗日游击战略地位的认识，促进抗日游击战争的迅猛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1939年延安解放社出版由毛泽东题签的《抗日游击战争的一般问题》一书，作为该书第七章收入这篇文章。建国后，以原题编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

《论持久战》

早在1935年12月，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中，就指出“帝国主义还是一个严重的力量，革命力量的不平衡状态是一个严重的缺点，要打倒敌人必须准备作持久战”。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内还有一些人存在着“亡国论”和“速胜论”的错误观点。在国民党内有人叫嚷“再战必亡”，有人则幻想依赖外援迅速结束战争。台儿庄胜利后，有人认为徐州会战是“准决战”，“是敌人的最后挣扎”。此外，共产党内也有人过高地估计中国的力量，过低地估计日本的力量，存在着轻敌思想。

为进一步从马克思主义理论高度揭示抗日战争的客观规律，为全国人民指明胜利的方向，毛泽东于5月26日至6月3日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发表《论持久战》的讲演。首先，毛泽东考察和论证了持久抗战的根据和发展过程，指出中日战争是“半殖

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进行的一个决死的战争”。这场战争双方存在着相互矛盾的基本特点：即敌强我弱、敌退步我进步、敌小我大、敌寡助我多助。这些特点，规定了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胜利是中国的。

根据敌我双方存在的相互矛盾着的各种因素，毛泽东科学地预见持久抗战将经历三个阶段：第一是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阶段；第二是敌之战略保守，我之准备反攻，即战略相持阶段；第三是我之战略反攻，敌之战略退却阶段。并为这三个阶段描绘了一个轮廓。同时毛泽东还断言：“长期而又广大的抗日战争，是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多方面犬牙交错的战争，这是战争史上的奇观”。抗日战争的实际发展完全证实了这一科学预见。

关于如何进行持久战和如何发扬自觉的能动性以争取战争最后胜利等问题，毛泽东首先指出抗日战争的胜利离不开“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立自由平等的新中国”的政治目的，离不开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方针，离不开普遍深入的全国人民的总动员。其次，毛泽东进一步探讨了实行持久战总方针所应采取的具体作战方针与原则。就全国抗战的三个阶段来说，战略防御和反攻两个阶段是以运动战为主，以游击战与阵地战为辅，而战略相持阶段则以游击战为主，运动战与阵地战为辅。在整个战争中，正规战是主要的，游击战是辅助的，说的是解决战争的命运，主要依靠正规战，尤其是运动战，但这不是说游击战在抗日战争中的战略地位不重要。游击战的战略作用一是辅助正规战，一是把自己也变成正规战，即向运动战发展。我军的方针“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最后，毛泽东进一步突出阐明人民战争的思想，他指出：“兵民是胜利之本”。“武器是战争的重要的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力量对比不但是军力和经济力的对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对比。军力和经济力量是要人去掌握的”；“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有力地驳斥了“亡国论”

和“速胜论”，深刻地揭示了抗日战争发展的客观规律，科学地预见了抗日战争发展的历史进程，进一步坚定了全国人民持久抗战的胜利信心，为夺取抗战胜利指明了正确方向和具体道路。

《论持久战》首先在1938年7月1日出版的《解放》第四十三、四十四期合刊上全文刊出，同月延安解放社出版单行本。1939年1月重庆新华日报馆出版订正本。1938年7月9日，毛泽东为订正本写小注：“此书是最后校正本，与《解放》报发表的，有某些小的字句上的不同。”建国后，《论持久战》以原题编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

不能要求《西行漫记》的观点都是无产阶级的

1938年春夏之交，一天毛泽东会见了德共党员、作家兼记者汉斯·希伯。希伯同毛泽东谈话，刚开始非常紧张，因为他已经给《太平洋事务》杂志写了文章批评《西行漫记》。他认为那书中有许多观点不正确，是要批的。但毛泽东看了斯诺的《西行漫记》却很夸奖，说这本书是外国人报道中国人民的最成功的著作之一。斯诺虽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他是一个有正义感的新闻记者。当时，在美国，已有不少中国人民的朋友，斯诺就是其中的一位优秀代表。所以毛泽东知道希伯对这本书进行批评很生气，会见一开始就责问希伯，为什么要批判斯诺写的这本书。毛泽东说：斯诺不是一个共产党人，当然不能要求他的观点都是无产阶级的，但他将中国共产党的斗争史，特别是十年的斗争史，及时介绍给了世界。国民党和外国反动派一致辱骂中国共产党和革命人民是“匪”，只有斯诺到了延安，比较真实地报道了我们的斗争情况。这不是中国人报道的，是通过外国人报道出去的，在国际上发生了极大影响，你为什么还要批评他呢？你是共产党人，你个人写的东西，决不可能起到斯诺那样大的作用。希伯没有辩解，事后他说：毛主席站得高，看得远，从国际统一战线的高度来看待和处

理问题。从这件事上，也体现出了辩证唯物主义者的广阔胸怀，这对他教育极大。后来，希伯受到这件事的启发，冒险到达山东敌后，意图报道山东敌后八路军及共产党领导下的民主政权及抗日斗争的第一手材料。可惜他的愿望没能实现。1941 年 11 月 30 日，希伯英勇战死在山东沂蒙山区的沂南县大青山的五道沟下。谈话继续进行，后来毛泽东也冷静下来了，一一回答了希伯准备好的问题。最后，两人都很高兴，谈得很好。

抗战也需要国际援助

1938 年 6 月 29 日，国际青联访华代表团（又名世界学生联合会代表团）到达延安。该团团长柯乐满是英国人，团员有加拿大人雷克南、英国人傅路德、美国人雅德，一共 4 人，都是世界学联的著名领袖，进步分子，支持中国革命和抗战。当天，延安南门外广场聚集了万余群众，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会。柯乐满在欢迎会上讲话。他说：我们看到中国许多青年都团结起来了，并英勇地参加了为民族解放事业的斗争。全世界青年也团结起来了，募集了几十万几百万现金捐给中国，美、英、印学生领导抵制日货，三十多个国家学生要求国际来制裁日本，援助中国。我们相信中国一定能胜利。

7 月 1 日，中共中央按照西方的习惯，举行鸡尾酒会招待世界学联代表。毛泽东出席酒会，并致欢迎词：世界学联对我国的衷心援助，我们表示十二万分的谢意！抗战虽然要自力更生，但也需要国际援助。因为日本有侵略朋友，侵略者结成了统一战线，在世界上造成了灾难。我们也要与世界人民团结，战胜法西斯。希望代表团把中国人民的这一愿望带给将要开幕的世界青年大会和全世界人民。

7 月 2 日，毛泽东接见了代表团全体人员，和他们进行了重要的谈话。毛泽东在谈到边区在中国的意义和作用时说：边区的性

质就是抗日民主的堡垒，它把抗日战争与民主制度结合起来，以民主制度的普遍实行去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边区的意义和作用，在于做出一个榜样给全国人民看，使他们懂得这种制度是最有利于抗日救国的，是抗日救国唯一正确的道路。在谈到目前中共在全中国的作用时说：坚持统一战线，坚持持久战，是目前中共的基本主张，它在全国的作用和意义也在这里。我们要作好持久战的准备。只有加强和扩大统一战线，争取日本国内人民的帮助，争取世界各国的支援，我们的抗战才有缩短的可能。在谈到抗战胜利后中共的主要任务时说：一句话，是建立一个自由平等的民主国家。这是中国的历史任务。建立这样的一个国家，不是把日本赶到鸭绿江之后的第二天才开始的，抗战过程中的各种工作，都与建立这样的国家有关联。不过许多重要工作要在抗战胜利之后才能完成，例如基本的经济建设等。在谈到青年运动的任务时说：中国青年、学生在抗战中的特殊责任，是为争取本身的权利、受教育的机会和教育改革而斗争。而世界青年和学生在支持中国方面的使命，就是要向各国介绍中国的情况，敦促各国政府向中国提供大量援助。

代表团在延安期间还参观了党校、陕北公学、抗大、鲁艺、印刷厂、报社等，7 月 4 日离开延安。

有名英雄与无名英雄

1938 年 6 月，抗大在全校掀起迎接“七七”抗战一周年，创造抗战突击队员的革命竞赛运动，提出“向学习突击，向工作突击，向生活突击”等口号，运动历时一个月，涌现出 520 名突击队员和一批模范单位。7 月 9 日，毛泽东出席抗大纪念“七一”、“七七”及突击运动总结大会并讲话。他用大树与小树作比喻，精辟地论述了有名英雄与无名英雄，领导与群众的辩证关系。他说：今天的突击总结大会，从总的方面说来是胜利了。这个胜利是在

正确的领导之下，领导者和群众共同努力所得到的结果，当然突击队员们的优秀和聪明也是一个条件，不然你去训练一个木头，那无论怎样也不成功的。可是单单是这一条件也不成功。例如在森林中有很多树木，那中间一定有很多又大又高的树，假如是一棵树独长，它就不高兴长，懒得长，索性不长了。所以说森林中那矮小的树不能说它没有用，要没有它们，高大的树也长不出来的。500多个突击队员也正如大树，而其余的无名英雄则如小树。没有其余的无名英雄，500多个突击队员也是不会有的。有名英雄是从无名英雄中产生出来的，而且他们是不能分离的，这是此次突击运动中所得出的一个主要经验。

以此来看一周年的抗战中，军队与人民的关系也是如此，军队中官长与士兵的关系也是如此，团体中领袖与群众的关系也是如此。现在有一个公式说："自芦沟桥事变以来，四万万人一齐努力，最后胜利一定是我们的。"这个公式很对，但还需要加以解释。四万万人要能打胜日本侵略者，非有群众的领导者不可。没有领袖，是做不出事情来的，那不过是空中楼阁而已。而今的老百姓要求共产党、国民党、八路军、新四军，抗大的诸位突击队员们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去。你们将来出去要为着这个要求而定自己的志向，去当连长、营长、旅长，去作宣传和教育民众的工作，不辞一切辛苦，甚至说得舌敝唇焦。我们去宣传抗日，使一传十，十传百，传至四万万五千万同胞都团结起来，筑成一座火焰山，而日本帝国主义如一条牛两只角钻入这个火焰山里来，大家预备着食盐，让火烧死后就好大吃。但是要烧死这一条牛，一定要所有老百姓齐心来干才能成功。

再讲到共产党的十七周年纪念——共产党它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它是和老百姓联结在一起的，它从没有脱离过老百姓；它不但不扰乱老百姓，而且帮助老百姓，保护老百姓的利益。这不单是共产党应该这样做，也是其他所有革命分子所应该做的。为什么一定要帮助和爱护老百姓呢？不吃老

百姓的鸡蛋而给老百姓以鸡蛋，这是所谓改善人民生活。鲁迅不是一个共产党员，但他却一生都为着老百姓的利益而奋斗，甚至舌敝唇焦，生肺病而死。所以我们非常尊崇鲁迅。

我们目前需要造就千万个突击队员、民族英雄，打走日本帝国主义，为老百姓谋幸福，这样“四万万人一齐努力，最后胜利一定是我们的”。

题《文艺突击》、《山脉文学》刊头

《文艺突击》创刊于1938年9月中旬，初以油印本出过两期，后改为铅印本出了6期，至1939年6月止。这是在毛泽东的支持与鼓舞下在延安最早诞生的一个文学刊物。

1938年9月当第一期稿件编齐以后，发起创办人之一奚定怀（现名奚原）按照大家的意愿，于9月17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并附一小张宣纸，请他给题一个报楣。原信是这样写的：“毛主席：因为觉得延安文艺活动表现得很沉寂，而事实上又很有这种需要，所以我们发起由文化界救亡协会联合延安各学校团体爱好文艺的同志们，成立一个“文艺突击社”，并且初步工作是出版一个油印的纯文艺的旬刊，名字也就叫作《文艺突击》。这个旬刊第一号已经编好，决于二十日以前出版。大家的意思要请你题一个报楣，大小是文艺突击。希望能马上替我们挥成。你近来很忙，如果有从前的文艺作品愿意给《文艺突击》，这将使我们如何兴奋！而且也将使不久以后的每一个读者如何兴奋！此致挚爱的敬礼！一个抗大工作者奚定怀9月17日”。

毛泽东在当天就接到这封信，并立即在附去的宣纸上挥就了三幅“文艺突击”，还在原信右上端批复：“写了几个字，不知可用否？”大家接到批复和报楣后，倍受鼓舞，很快就出版了《文艺突击》创刊号。

在《文艺突击》出版之后，为了进一步发展群众性的大众文

艺活动，抗大、马列学院等一些青年文学爱好者又自发组织了山脉文学社。这个组织的名称，是根据毛泽东开展敌后游击战的思想而来的。1938 年 5 月，毛泽东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指出："山地建立根据地之有利是人人明白的，已经建立或正在建立或准备建立的长白山、五台山、太行山、泰山、燕山、茅山等根据地都是。这些根据地将是抗日游击战争最能长期支持的场所，是抗日战争的重要堡垒。"由此可见，山脉文学社，正是受此启发而产生的。山脉文学社成立之后，即着手编辑《山脉文学》。创刊号稿子编得差不多的时候，大家又想请毛泽东题写刊头。这样由奚定怀以山脉文学社的名义，于 1938 年 10 月 20 日又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日前，我们给你一信，请你题'山脉文学'四字。大概因为你近来事情非常之忙，所以没有动手来办这件事吧？近期之内，我们就准备把'山脉文学'编出来，望你能替我们题下四个字'山脉文学'。你一定支持我们吧！"

当时正值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召开期间，毛泽东的确十分忙碌，但仍于数日之后的 1938 年 10 月 27 日，题写了三个"山脉文学"的刊名，这三款竖行题字是写在来信的信尾空白处的。毛泽东又在来信的上面横行批了几句重要的话："写下几个字，不知可用否？名称似以'山头文学'为好。"这个批语完全是用商讨的口气，可惜当时这些革命青年文学爱好者还不理解它的重要含义，只是觉得毛主席很忙，既然已经题为"山脉文学"，不宜再去要求重题，所以就没有改动。后来当他们读到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其中有一段话说："大众文化，实质上就是提高农民文化。抗日战争、实质上就是农民战争。现在是'上山主义'的时候。大家开会、办事、上课、出报、著书、演剧，都在山头上，实质上都是为的农民。"这时候大家才领悟，毛主席是号召大家到山头上去，山头文学的方向，也就是革命的、战斗的大众文学的方向。这样理解，当然"山头文学"要比"山脉文学"更好些，因为它更通俗、更彻底、更为广大群众所接受。

后来，由于印刷条件未获解决，《山脉文学》未能出版，而是改出了油印的《山脉诗歌》。这样，便出现了“山脉诗歌社”。而山脉文学社的活动则持续到 1940 年 9 月。

中共六届六中全会

1938 年 9 月 14 日至 27 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实际上是六届六中全会的预备会议。在 14 日的会议上王稼祥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的意见：认为中共一年来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中共在复杂的环境和困难的条件下真正运用了马列主义；明确指出中共中央领导机关要以毛泽东为首解决统一领导问题，领导机关要有亲密团结的空气。

在 24 日会议上毛泽东作了长篇发言。他指出，共产国际的指示是这次政治局会议成功的保证，同时又是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和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指导原则，指示的最主要点是强调党内团结。毛泽东分析了武汉即将失陷后的形势，指出抗日战争将开始进入一个新的阶段——相持阶段，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也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他论证了统一战线中统一同斗争的辩证关系。由于国共合作是对立阶级的政党的合作，所以斗争是严重的不可避免的，具体表现是国民党顽固分子的磨擦和共产党的反磨擦。统一战线中统一是基本的原则，要贯彻到一切地方、一切工作中，任何时候任何地方不能忘记统一；同时不能不辅助之以斗争的原则，因为斗争正是为了统一，没有斗争不能巩固与发展统一战线。在 27 日，也即最后一天会议上，毛泽东再次发言，指出这次政治局会议取得了伟大的成功，从而可以保证六届六中全会的成功，并建议在六中全会通过一个中央工作规则。这次政治局会议通过了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的议程，决定由毛泽东代表中央向全会作政治报告。

9月29日至11日6月，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桥儿沟召开。参加会议的中央委员和党中央各部门、全国各地区的领导干部共53人，是党的六大以来到会人数最多的一次中央全会。

9月29日，六届六中全会开幕，毛泽东被推选为全会主席团成员，并在会上宣布全会议事日程。会上，六中全会主席团决定，以毛泽东名义写信给蒋介石。信中说："敝党中央六次全会，一致认为抗战形势有渐渐进入一新阶段之趋势。此阶段之特点，将是一方面更加困难，然又一方面必更加进步，而其任务在于团结全民，巩固与扩大抗日阵线，坚持持久战争，动员新生力量，克服困难，准备反攻。"毛泽东的这封信，由周恩来在10月4日当面交给蒋介石。

10月12日下午，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六中全会作政治报告，题目是《抗日民族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新阶段》。13日下午，14日下午和晚上，继续报告。报告分8个部分：一、五中全会到六中全会；二、抗战15个月的总结；三、抗日民族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新阶段；四、全民族的当前紧急任务；五、长期抗战与长期合作；六、中国反侵略战争与世界反法西斯运动；七、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八、党的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指出，在敌占武汉、广州后，必达一个战略进攻的终点，抗日战争将过渡到一个新阶段——战略相持阶段。在抗日战争的新阶段中，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必须以一种新的姿态出现，这种新姿态就是战线的广大的发展与高度的巩固。国共两党要以长期合作支持长期战争，以至合作建国。报告还提出要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强调全党要普遍地深入地学习和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反对教条主义。毛泽东的这个报告，以《论新阶段》为题，发表在1938年11月25日出版的《解放》第五十七期上。其中第七部分编入建国后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二卷，题仍为《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

11月5日下午，毛泽东在会上作结论报告。6日下午，继续作结论报告。讲了5个问题：第一，六中全会的成功。这次会议总结了抗日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全部经验，科学地分析和估计了抗日战争的形势，规定了党的方针和任务。这次会议是一个好的会议，是党的历史上少有的，讨论的问题多，态度认真。我们党奋斗了17年，空前地进步了，党已能够更灵活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第二，广州、武汉失守后的形势。在敌强我弱形势没有发生决定性变化的条件下，广州、武汉的放弃是正确的。这种战略退却虽一时表现了有利于敌而不利于我，但从整个形势看表现了有利于我而不利于敌，我们保存了实力，敌人的兵力更分散了。日军占领上海等地时是一鼓作气，占领武汉后它的力量就再而衰了，其战略进攻接近顶点，这是相持局面快要到来的象征。在相持阶段中，我方作战形式以游击战为主，运动战为辅。敌后游击战争应分为两大区域，在已经大大发展了游击战争的区域，应大力加以巩固；在没有充分发展或正在发展游击战争的区域，应迅速地广大地发展游击战争。所以，应当巩固华北，发展华中和华南。第三，民族统一线的长期性。为了长期合作，统一战线中的各党派实行互助互让是必需的，但应该是积极的，不是消极的。用长期合作支持长期战争，就是说使阶级斗争服从于今天抗日的民族斗争，这是统一战线的根本原则。在此原则下，保存党派和阶级的独立性，保存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否则就是将合作变成了混一，必然牺牲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是不对的，我们的方针是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既统一，又独立。第四，战争和战略问题。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革命的特点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主要的斗争形式是战争，主要的组织形式是军队；游击战争在全战争中占着一个重要的战略地位，没有游击战争，忽视游击队和游击军的建设，忽视游击战的研究和指导，也将不能战胜日本。第五，其它问题。结论报告的第三、第四部分，建国后分别以《统一战线中的独立

自主问题》与《战争和战略问题》为题编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

11月6日，全会根据毛泽东的报告通过了《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关于各级党委暂行组织机构的决定》、《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关于各级党部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等重要文件。本日，全会闭幕。

六届六中全会批准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政治局的路线，基本上克服了抗战初期王明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统一了全党的思想、推动了党的各项工作迅速发展。

永远以革命的面目相见

1938年12月1日，毛泽东应邀在抗大第四期一、三、四大队十五个队毕业典礼上讲话。他说：早几天有即个同学哭脸，武汉、广州失掉了，因为不愿意地方失掉，爱国，这个哭脸是好的，那些汉奸才不会掉泪哩。但我们要知道今天失掉个把城市是不要紧的，因为我们是长期战争，那些城市总归要掉的。今天还有长沙、南昌，西安也差不多了，它要来，有什么办法呢？我们就是打下去！要打多少年？五年还是六年我们不算数目，问问日本帝国主义要多少年？我们总归打下去，一直到胡子白了，于是把枪交给儿子，儿子的胡子又白了，再把枪交给孙子，孙子再交给孙子的儿子，再交给孙子的孙子……，总 要打下去。日本帝国主义倒不倒？不倒也差不多了。中国古时候有个故事，有一个老头子他要搬山，因为一座山挡在他家的门口，讨厌得很，所以要搬掉它；他的儿子也跟着他挖。他的隔壁也有一个老头子，说："你要搬掉这个山，真是太笨了。"他回答说："你才是太笨哩。你想想，我现在来搬这个山，我搬不完还有儿子，儿子搬不完，还有儿子的儿子，还有儿子的孙子……，我的儿子是不断的，是生的，是长的，然而山却是不长的"。……我们要走下去，不半路上开小差，不象

张国焘半路上忽然不见了。……我们将来要永远以革命的面目相见。现在我们就订一个条约：不开小差，坚持长期斗争，长期学习，不怕艰苦，与我们的朋友长期合作下去，我们一定要建立一个自由幸福的新中国！

与国民党军邓宝珊部互通情报

1938年12月5日，毛泽东写给国民党军晋陕绥边区总司令邓宝珊一封信。信中说："近日敌侵西北之消息又有传闻，谅尊处早已得悉。不论迟早，敌攻西北之计划是要来的，因之准备不可或疏。高明如兄，谅有同情。"特嘱八路军留守兵团绥德警备区司令员陈奇涵向邓报告防务，并送去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报告、决议、宣言等。当时邓宝珊部驻在榆林。我方获得的关于日军以及蒋介石顽固派在政治、军事方面的新动向情报，特别是关系到榆林的，我们都及时与邓宝珊通气。我党中央和边区政府的施政纲领，重大决策，也尽快地将主要精神告诉他们，以增强了解。这种关系是5月邓宝珊与毛泽东第一次见面后，逐渐建立起来的。

5月的一天，邓宝珊一行事先没有通知，突然途经延安，准备停留一下悄悄通过。毛泽东得知消息后，立即指示一定要予邓宝珊一行以热情的欢迎与优待，要想办法把他们留下来多住几天。盛情之下，邓宝珊不再推辞了，答应当天不走，和中共党政军领导人见面。第二天一早，毛泽东同萧劲光等来到邓宝珊的住处，他们一见如故，谈得很融洽。接着毛泽东请邓宝珊等吃午饭。席间毛泽东与邓宝珊更是谈笑风生。毛泽东说：西北军的将领许多是爱国的，有与我党合作的民主革命的传统。现在国共重新合作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经建立起来，只要我们共同坚持下去，并巩固发展下去，一定能够打败日本侵略者。邓先生在榆林，我们一定能合作得更好。邓宝珊也表示很有信心，他说：这是孙中山先生的遗愿，也是全国民众的共同要求。毛主席和周恩来先生在双

十二事变中坚持和平解决的方针，促成了两党重新和好，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是深得人心的。从此总理生前的愿望，有实现的希望了。谈话中，毛泽东亲自挽留邓宝珊多住几天，到延安各处去参观、指导。邓宝珊被毛泽东的真挚情谊所感动，欣然决定改变计划，多住几天再走。结果邓宝珊在延安整整呆了一个星期，到毛泽东的住处拜访了毛泽东，参观了抗大、陕北公学等学校，出席文艺晚会和群众大会，与其他党政军领导人也进行了交往。

邓宝珊自从与毛泽东这一次初交后，每次到西安、重庆去开会，途经延安时，都要逗留几天乃至旬日。每次来，都受到毛泽东等的优厚款待。从此，毛泽东与邓宝珊的信使往来和礼品互赠也频繁起来。

致杨令德先生两封信

杨令德是《大公报》记者，“七七”事变后，驻榆林从事采访工作。1938 年初杨令德将其外甥袁尘影送到延安入陕北公学学习。没想到结业后因误会被拘押。杨令德当即给西北局的高岗和陕北公学校长成仿吾写了信，同时也给毛泽东写了信，请求释放袁尘影。

1938 年 12 月 14 日，毛泽东复信杨令德：“先生两信均收到了，因开六中全会，久稽奉复，至以为歉！但袁尘影兄早嘱高岗同志令经手机关释放，谅已获悉。此事不但我不知，高岗、仿吾亦均不知。经手机关根据晋西北材料，遽尔如此处置，甚为抱歉！尔后此间有何缺陷，倘有所闻，尚祈见告，俾资改进，不胜盼祷！”

当时杨令德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情给毛泽东写信的，觉得能得到毛泽东吩咐秘书给回个字，就是喜出望外的了。毛泽东对于一个普普通通的新闻记者给他的信，竟是这样重视，亲笔作复，令杨令德非常感动。他马上提笔又写一信向毛泽东致谢。

1939 年 1 月 22 日，毛泽东再次复信杨令德：“十二月二十四

日，大示敬悉。令甥被屈事，能邀先生谅解，为之欣慰。如先生高兴来延安一游，甚表欢迎。此致　抗战敬礼！”

杨令德一连得到毛泽东两封亲笔信，而且这两封亲笔信写得那样谦虚、诚挚，真使他万分钦佩和感激。杨令德先生认为，这是他终身感念的殊荣。

1943 年 6 月，杨令德作为秘书随邓宝珊将军由榆林南下重庆，途经延安，停留一周。毛泽东在杨家岭大礼堂设宴招待邓宝珊一行。入席前当邓宝珊介绍杨令德同志给毛泽东握手时，毛泽东以惊人的记忆马上想起四五年前的事，亲切地说：“噢，杨先生，我们还通过信呢。”

1939 年

在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上的三次讲活

1939年1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建立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问题。毛泽东在发言中指出：六中全会后边区工作要有一个推动，要从边区议会做起，使边区能应付困难环境，造成对外有好的影响，因此边区议会要开。国民党攻击我们立异，我们为实行民主制度必须立异，否则不能表示我们的进步。议会名称仍用参议会好。边区问题解决必须坚持下列原则：（一）边区事情由我们办；（二）保证民主制度。

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于1月17日至2月4日在延安召开，毛泽东有3次重要讲话。第一次，是在1月17日的开幕会上。毛泽东指出：边区是全中国的一个部分，但这里有些新的东西，如民权主义，别的地方很少，民生主义别的地方根本没有，这就是边区和其他地方的不同之处。现在全国坚持着抗战，开参政会等等，在实行着三民主义，我们边区的参议会也是其一。抗战一定要有民权主义与民生主义。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民族民权民生是相互配合的，没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就不能实行民族主义，抗战就不会胜利。边区的进步，主要的表现在民主，而这民主又是苏维埃在现阶段的发展物，现在各阶级，工农商学兵各界都可参加参议会。大事一定有人反对的，坏事有人反对，好事也有人反对的，那末怎样断定事之好坏呢？看问题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标准，这标准就是：凡是日本帝国主义、汉奸所反对的，那一定是好事。因之，我们要努力的干。

第二次是在1月18日的下午，毛泽东作关于目前政治形势的报告。他说：武汉失守了，但还没有进到敌我相持的新阶段，而是敌攻我守与敌我相持两个阶段中间的过渡时期。完成这个过渡需要三个条件：中国坚持持久抗战并增强抗日力量；敌人困难的增长；国际上更多的援助。共产党的任务，是要坚持抗战，巩固

与扩大统一战线。八路军、新四军的任务，主要是在敌后拖牛尾巴，配合国民党军队的正面作战。陕甘宁边区要成为抗战的堡垒，民主的模范。

第三次是在2月4日的闭幕会上。他在讲话中驳斥国民党鼓吹的“一个主义”、“一个党”的谬论，批评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所确定的反共、溶共方针，指出：“一个主义”论者，现在不对，过去也是不对。过去皇帝时代尚有几种信仰，现在“民国”时代反而没有，那简直是放屁。至于“一个党”，也是不对。有不同阶级，不同主义，当然有各党各派。过去有人唱一个歌，说“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这话说得相当对。所以“一个主义”、“一个党”这种话就应该取消，如果他再要讲，我们就要驳他。讲到溶化，应当熔化的是那些顽固分子，那些“发国难财”、“吃磨擦饭”的人，为国为民的共产党是绝对不能熔化的！

为《陕甘宁边区实录》的出版

《陕甘宁边区实录》一书初稿是由毛泽东办公室秘书长李六如和秘书和培元共同撰写的。陕甘宁边区准备出版这本书，向全国特别是国统区人民介绍陕甘宁边区的情况。

1939年1月22日，毛泽东给陕甘宁边区政府教育厅厅长周扬写信。信中说：这本书“我全未看。因关系边区对外宣传甚大，不应轻率出版，必须内容形式都弄妥当方能出版。现请你全权负责修正此书，如你觉须全般改造，则全般改造之。虽甚劳你，意义是大的，最好于二月十五日前完稿，二月底能出书。”

后来，这本书因修改于12月由延安解放社出版，毛泽东亲自为此书题写了书名并题词：“边区是民主的抗日根据地，是实施三民主义最彻底的地方。”

中国政府将对外来投资及外人在中国财产给以保障

1939 年 2 月的一天晚上，毛泽东会见美国合众社记者罗伯特·马丁，大约谈了两个多小时，当时请抗大校部交际科的吴青作翻译，马丁作了英文记录。事后马丁根据记录用英文写了毛主席的谈话要点 43 条，再由吴青译成中文，经毛泽东的秘书和培元交毛泽东审阅。

毛泽东说：中国需要民主才能坚持抗战，不单需要一个民选的议会，并且需要一个民选的政府。实行民主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并且必需减轻人民负担，减税减租，减利率，使人民乐业，努力生产。

毛泽东说：日本现在有骑虎难下之势，准备继续进攻西安等地。估计抗战第一阶段将结束在西安的失守，第二阶段是日军困驻于城镇的时期，第三阶段是驱逐日军出中国的时期。游击战争将继续发展，为驱逐日寇到城市里去，汉口、上海、南京、北平等地，让他在那里住上三年到七年。他们不得食，不能通商，那时，把他们赶回东京去。

在谈到中国共产党纲领时，毛泽东说：共产党今日的纲领与三民主义没有基本上的冲突，但有不同点，废除私有财产制，是国共两党纲领的基本异点。到中国走上社会主义，如果那时英、美、法等国仍然是资本主义国家，如果这些国家不来打中国的话，那末，中国政府将对外来投资及外人在中国财产给 以保障（付以代价）。中共在中国实行的纲领，是根据中国的需要，而不是共产国际对中共的统治。

动员开展生产运动

1939 年 1 月 25 日，毛泽东出席在延安举办的陕甘宁边区农

产品展览会并讲话。他说：今天开边区农产品展览大会意义是很大的。现在跟日本帝国主义打仗，是需要多方面的努力，前方要有将士的英勇抗战，而这些将士们要饭吃，要衣穿，这就要依赖后方努力生产来解决。边区在过去生产运动已有了一些成绩，这次农展会就是成绩的代表。前方努力打仗，后方努力生产，打下去，一定可以打垮日本的。在我们边区，不仅老百姓要如此做，其他如学校、党政机关，及部队都要参加生产运动。1939 年开始的时候，就开这次大会，全边区的各机关学校部队和 200 万老百姓大家联合起来，全体动员，为完成生产任务而斗争。

第二天，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讨论了生产运动。毛泽东在发言中指出三点：一、准备工作。现在到春耕还有两个月，要雷厉风行地不失时机地进行准备工作。二、进行生产动员。在 2 月 1、2、3 日进行生产动员，分配生产任务，各机关学校等单位组织生产委员会。三、总的生产委员会，以林伯渠为主任。

2 月 2 日，中共中央召开延安党政军生产动员大会。李富春在会上作题为《加紧生产，坚持抗战》的报告。毛泽东、张闻天、王明等出席大会并演讲。毛泽东指出：今天开生产动员大会，意义是很大的。要继续抗战，就需要动员全中国的人力物力。陕甘宁边区有 200 万居民，还有 4 万脱离生产的工作人员，要解决这 204 万人的穿衣吃饭问题，就要进行生产运动。这 4 万人在过去，不知道怎样生产，也没有功夫生产，而事实上也不必要生产。在中央苏区，各机关粮食多得很，因而也不必要工作人员去生产；同时，那时候的环境是非常紧张的，处在包围战争的环境中，各机关工作都很忙，部队在战斗中；再则，那时也没有经验，不知道怎样来生产。现在不同了。现在是处在新的抗日战争的环境中，又在历史所造成的落后经济的陕北，显然的，经济是较困难了，因此，就要自己来解决生活问题。现在虽同样是战争的环境，但这与过去是不同的；各机关的工作虽然一样很忙，但在新的环境，即在国内和平、对外战争的环境中，工作忙的程度也有些不同。讲

到经验，现在也有了，去年留守兵团部分地进行了生产运动，他们日常生活改善了，冬天解决了鞋袜问题。过去有部队的战士们冻足冻手，现在这种现象消灭了，这也是进行生产之功。所以无论部队机关，这种生产运动必须开展起来，大家种菜喂猪，办合作社，进行一场伟大的经济战线上的斗争。

反对投降主义

在日本帝国主义的诱降政策下，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于1938年12月18日潜逃越南河内。29日，汪精卫发表公开叛国投敌的“艳电”。1939年1月21日至30日，国民党在重庆召开五届五中全会，会议虽然声言仍要“坚持抗战到底”，但确定了“溶共”、“防共”、“反共”的方针，原则通过《防制异党活动办法》，决定设置防共委员会，严密限制共产党和一切进步力量的言论与行动。国民党方面还大登张国焘的文章，广播张君劢的文章，鼓吹“一个党”，“一个主义”的谬论，利用二张攻击共产党。与此同时，各地磨擦事件增加。毛泽东在1月12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就提出，对于磨擦问题，我们的原则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1939年2月5日，毛泽东在中央党校作题为《反对投降主义》的讲话，指出：讲要不要共产党的问题，国民党方面说要把共产党溶化，共产党方面也有人说国民党与共产党没有区别，所以不要共产党，因这两方面的意思有些相近，都不要共产党，所以拿到一块儿讲。要达到抗战必胜，建国必成的目的，中心任务就是要巩固和扩大民族统一战线。要巩固统一战线就要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反对关门主义与投降主义。国民党要溶化我们，我们就被溶化了吗？不能，绝对不能，那是投降主义。二中全会提出反对关门主义的同时又提出反对投降主义。统一与斗争是统一战线的原则问题；统一是统一战线的第一个基本原则；斗争是统

一战线的不可缺少的原则，这点不能忘记的。现在国民党采取防共政策，要从政治上组织上瓦解共产党。我们的原则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要记取陈独秀投降主义使大革命遭受失败的教训，反对政治上的软弱症，使自己的力量增强起来，才能巩固与扩大民族统一战线，战胜日本帝国主义。

会见印度援华医疗队

印度援华医疗队由5位大夫组成，即爱德、卓克、柯棣尼斯(柯棣华)、巴苏和木克吉。他们受印度国大党的派遣，来华帮助抗日战争。

1939年2月12日，医疗队到达延安。2月14日，毛泽东出席为印度援华医疗队到达延安举行的欢迎晚会。

2月15日，毛泽东在杨家岭住处会见印度援华医疗队全体成员。毛泽东首先代表中国人民感谢印度国民大会和印度人民对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所给予的同情和支持；并回顾了具有悠久历史的中印传统友谊，指出这种友谊在目前团结反帝的斗争中达到了新的高峰，医疗队来到中国，就传布了人民团结反帝的精神。在谈到甘地时，毛泽东表示他不赞成甘地的“非暴力抵抗”思想，并以中国历史为例，强调以革命暴力反对反革命暴力的必要性。谈话后，宾主共进午餐。进餐时，毛泽东说：我们吃的是小米，拿的是步枪，却满怀信心要战胜日本强大的武装。

3月18日，爱德、柯棣尼斯、巴苏被派往离延安35华里的拐窑医院工作，卓克、木克吉去张村驿卫校。后卓克回印度，木克吉患病，爱德等3人要求去前线。9月26日，毛泽东邀请医疗队的3位大夫去延安赴宴，并告诉他们：印度国大党已通过决反对德、意、日法西斯侵略战争。10月29日，爱德等3位大夫又到杨家岭看望毛泽东，再次要求去前线。在他们强烈要求下，决定派他们去晋东南八路军总部工作。医疗队于12月到达王家峪八路军

总部，受到朱德总司令的热情欢迎。

为《抗日模范根据地——晋察冀边区》写序

1939年1月，聂荣臻写了一份关于晋察冀初创时期的情况报告，涉及的内容比较多，约有10万字。其中着重叙述了晋察冀边区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开展游击战争的情况。

毛泽东接到这个报告后，读后觉得很好，决定把这个报告单独成书出版，亲自为它题写了书名：《抗日模范根据地——晋察冀边区》。3月2日，毛泽东还为这本书写序言。序言说："晋察冀边区是华北抗战的堡垒"，"那里实行了互相联结不可分离的三民主义"。"唤起民众就是要实行民权民生主义，否则无从唤起，尤其是民权主义，真如大旱望云，一刻不可或缓"。"聂荣臻同志的这个小册子，有凭有据地述说了该区一年半如何实行三民主义与如何坚持游击战争的经验，不但足以击破汉奸及应声虫们的胡说，而且足以成为各地如何实行三民主义，如何唤起民众以密切配合抗战的模范。"

3月18日，毛泽东致信聂荣臻："你著的书及送我的一本照片，还有你的信，均收到。这些都是十分宝贵的东西。书准备在延安重庆两处出版（我与王主任各作一序），照片正传观各同志。望努力奋斗、加深研究，写出更多的新作品。"

与马洪三问三题

1939年春，一天毛泽东到马列学院作《中国革命战争与战略问题》的报告。他因为早到了一会儿，就先到二班支部办公室休息。毛泽东一坐下来就问当时任二班党支部书记的马洪，学员们的思想、学习、生活等情况怎样。马洪一一回答后，毛泽东便很关切地问到马洪的年龄和经历，特别问到他的兴趣和爱好。马洪

在回答了毛泽东的提问后便提出请毛泽东给二班支部题辞。毛泽东很高兴地答应了，因为他在谈话中听马洪说很爱看报，于是就挥笔写下四个有力的大字："看报有益"，并签上了毛泽东的名字。

毛泽东放下笔又与马洪谈学习。马洪说他从小读书少，文化不高，现在特别喜欢看书。毛泽东听了非常高兴，马上又挥笔写下"读书是好的。毛泽东"。

谈话继续进行。毛泽东接着问马洪留校工作的感想和学院工作的情况，马洪一一作了回答，毛泽东听了比较满意，他第三次提笔写下一幅"工作着是美好的"题辞。

作报告的时间到了。马洪恋恋不舍地把毛泽东送出二班支部办公室来到讲台前。心情久久难以平静。

之后，马洪把三帧墨宝张贴在支部办公室，以勉励支部全体同志，因为他知道这是毛泽东对全体学员的关怀和希望。

国民精神总动员的政治方向

1939年3月11日国民党在国防最高委员会下设立精神总动员会，由蒋介石任会长，并公布《国民精神总动员纲领》。3月22日，毛泽东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听取林伯渠关于一届三次国民参政会的报告。林伯渠在报告中说：蒋介石提出的精神总动员，不少内容是对付共产党的，企图在理论上与我党斗争。毛泽东的《论新阶段》在上海印了12万份，共产党的各种书籍在外面销售很快，国民党表示害怕。

4月5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听取罗瑞卿关于抗大工作检查的报告。毛泽东在发言中提出，抗大今后教育要注意人格的教育和人格的陶冶，人格的教育即思想意识的锻炼。

4月26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讨论国民党提出的国民精神总动员问题。毛泽东发言指出：要用国民党提出的国民精神总动员在陕甘宁边区发动一个大的运动，反对纷歧错杂思想与

贪生怕死等，说明只要国民党抗日，我们就能服从。中央书记处作出一个提纲，从5月1日到30日进行边区的大动员，动员反对反共，反对不民主，反对妥协，最重要的一点是强调反对反共。

中共中央在4月5日和4月27日先后发出两次指示，指出国民精神总动员具有两面性，一方面是抗日的，这是基本的；另一方面是防共的，我们要经过这一精神总动员的形式，支持、运用和发展其中积极的东西，对其抗日方面予以支持，批评其中包含的缺点，对其反共反人民方面予以抵制，揭露其压制人民抗日力量的企图，使这一动员成为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抗战，开展群众运动，要求民主的武器。

5月1日，延安各界3万人于南门外广场举行国民精神总动员及纪念五一劳动节大会，毛泽东在大会上发表题为《国民精神总动员的政治方向》的讲演。他指出，反对汉奸，拥护抗战，集中力量，集中意志，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把我们中国在危难中挽救过来，改造过来，变成一个新中国，就是今天开会的意义。凡利于抗战的，我们就要做，就要拥护；凡属妨碍打胜仗的，妨碍抗战的，就不要做，就要反对。汪派、托派、捣乱分子的活动，顽固分子和阴谋家的活动，我们统统要反对。我们民族历来有一种艰苦奋斗的作风，我们要把它发扬起来。共产党历来更提倡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在抗战中间就要纠正一切不利于抗战的错误思想。这种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是与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不能脱离的，没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就不能激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没有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也就不能执行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

《五四运动》和《青年运动的方向》

为纪念五四运动20周年，毛泽东于1939年4月下旬撰写《五四运动》一文。这篇文章首先发表在5月1日出版的《解放》

第七十期上，建国后，以原题编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文章指出："二十年前的五四运动，表现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发展到一个新阶段。""今天的抗日战争是其发展的又一个新的阶段，也是最伟大、最生动、最活跃的一个阶段。""在中国的民主革命运动中，知识分子是首先觉悟的成分"，"然而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革命的或不革命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五四运动到现在已有了二十周年，抗日战争也快两周年了。全国的青年和文化界对于民主革命和抗日战争负有大的责任。我希望他们认识中国革命的性质和动力，把自己的工作和工农民众结合起来，到工农民众中去，变为工农民众的宣传者和组织者。全国民众奋起之日，就是抗日战争胜利之时。全国青年们，努力啊！"

5月4日，毛泽东出席在抗大第五大队坪场举行的延安青年纪念五四运动20周年大会，作关于青年运动的政治方向的演讲。这篇演讲稿在建国后，以《青年运动的方向》为题编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毛泽东指出：现在定了五月四日为中国青年节，这是很对的。中国革命现在的目的就是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建立一个人民民主主义的共和国。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正确说是从孙中山开始的。孙中山开始的革命，几十年来没有取得胜利的主要原因，是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农群众还没有动员起来。中国革命中，知识分子起了先锋作用、带头作用，但主力军是工农大众，没有工农大众的动员起来和组织起来，中国革命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毛泽东重申了在《五四运动》一文中提出的检验一个青年是革命的、不革命或反革命的标准，指出："看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的，拿什么做标准呢？拿什么去辨别他呢？只有一个标准，这就是看他愿意不愿意，并且实行不实行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结合的，是革命的，否则就是不革命的，或者是反革命的。他今天把自己结

合于工农群众，他今天是革命的；但是如果他明天不结合了，或者反过来压迫老百姓，那就是不革命的，或者是反革命的了。”我希望全国的青年“要认清工农是自己的朋友，向光明的前途进军”。

毛泽东演讲完毕，接受延安青年的献旗，旗上书写着“新中国的火炬”几个字。

与萧三说《聊斋》谈《传记》

1939 年 4 月 29 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组织部所在地同本日到达延安的邓发、邓小平、萧三相遇，邀他们到自己住处杨家岭共进晚餐。吃饭时，萧三问有没有辣椒。毛泽东说有；还说，现在可以开个辣椒同乡会。又说，凡是革命的都吃辣椒。季米特洛夫是保加利亚人，吃辣椒。斯大林是格鲁吉亚人，当然也吃辣椒。可见吃辣椒的都革命。大家听得都笑了。过了一会，毛泽东回忆起 20 年前他和萧三从北京去大沽口看海之行，他说，“那个时候，我还相信旧小说里所写的蓬莱仙岛是可能的……我 8 岁的时候最信神，我父亲不信神，我还认为他不对哩……”。毛泽东与萧三有 10 多年没见面了，晚饭后，毛泽东特邀萧三一人单独到他住的窑洞里去谈天。

5 月 5 日晚，毛泽东专程到鲁艺来看望萧三，边走边笑说：“特来拜谒。”萧三忙说：“ 真不敢当！”萧三的窑洞里没有多余的凳子，毛泽东便坐在木床上，背靠着墙谈了起来。他们谈起文学问题。谈到《聊斋》时，毛泽东说：“《聊斋》是封建主义的一种温情主义。作者蒲松龄反对强迫婚姻、反对贪官污 吏，但是不反对一夫多妻（妾），赞美女人小脚。主张自由恋爱，在封建社会不能明讲，乃借鬼狐说教。作者写恋爱又都是很艺术的，鬼狐都会作诗……蒲松龄很注意调查研究。他泡一大壶茶，坐在集市上人群中间，请人们给他讲自己知 道的流行的鬼、狐故事，然后去加

工……不然，他哪能写出四百几十个鬼狐精来呢？《聊斋》其实是一部社会小说。鲁迅把它归入了“怪异小说”，是他在没有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前的说法，是搞错了。

萧三告诉毛泽东，他在苏联写过毛泽东的传记，想再增补修改。假如主席不反对“翻古”，请能再详细谈谈。毛泽东说：无事时“翻翻古”也有趣味。我可以在政治上帮助你。不过你要研究调查一些历史事实才能写东西……把一些历史事实写出一部小说来，拿一个人作引线，那是有味的。不过斯诺花了我 4 个夜晚，以后我再也不愿谈自己的什么了……最后毛泽东又说道：“等我休息的时候同你谈。”

谈话后，毛泽东邀请萧三一起去中共中央组织部大礼堂参加纪念马克思诞辰和马列学院成立一周年的晚会。

5 月 12 日傍晚，萧三如约去看望毛泽东。毛泽东正在读《宋史演义》。他告诉萧三，他这次用了 40 元在西安买了 200 种旧历史小说。毛泽东告诉萧三，昨天中央开了会，决定萧三在鲁艺作编辑部的工作。谈到诗，萧三将自己写的一个手抄诗本留下请毛泽东看。谈到萧三与其兄萧子升决裂的问题，毛泽东说：你们兄弟关系，有点象鲁迅与周作人的关系。萧三说：“那我可不敢媲美。”毛泽东说：“是说在兄弟关系这一点上”。大约谈了 3 个小时，萧三起身告辞。

1 个月后，萧三收到毛泽东寄还的手抄诗本，还附有一封信，是 6 月 17 日写的：“（一）大作看了，感觉在战斗，现在需要战斗的作品，现在的生活也全部是战斗，盼望你更多作些。（二）高尔基晚会如无故障当来参加，惟这几天较忙一些。（三）马，待查问一下看，这事倒不很容易。如你在边区范围行动，那我可以拿我的马给你用一下；如往外边，就得另想办法了。”

要卡尔门在中国留八年

1939年5月中旬，苏联著名的青年电影摄影师、制片人罗曼·卡尔门来到延安。卡尔门是1938年10月到中国的，他满怀热情地要拍摄中国抗战的影片，但从武汉到长沙、衡阳和桂林，备受国民党阻挠。这次他是从重庆专程到延安的。

毛泽东几次接见卡尔门，都由萧三当翻译。

5月25日晚9时，毛泽东在杨家岭接见卡尔门，畅谈到深夜12点。毛泽东问他：到中国几个月？卡尔门回答：八个月。毛泽东说：要留八年。又说：苏联应该派二十个青年作家到中国来，参加八路军，学中国话，住中国房子，吃中国饭，穿中国衣，留住四十年……

卡尔门在延安拍了毛泽东工作日的电影。途中，还拍下了毛泽东与农民，毛泽东和几个小八路谈话的镜头。也拍下了毛泽东、萧三和红小鬼亲切谈话的合影。

警惕阎锡山投降反共

1939年5月11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听取和讨论八路军驻山西办事处处长王世英关于阎锡山部情况的报告。王世英说阎锡山最近召开的晋绥军政民高级干部会议（即秋林会议）基本上是右倾的。毛泽东在发言中指出：阎锡山态度的变化，除整个磨擦趋势增大外，还有日本的挑拔离间，山西旧派的不满，国民党中央的压力等。我们对阎锡山仍应有条件地拥护，可以对他进行必要的批评。

秋林会议是阎锡山布置投降反共的重要会议，3月25日在陕西宜川秋林镇召开，4月22日结束。阎锡山在会上分析抗战的前途是“中日不议而和，国共不宣而战”。他说：“蒋先生（指蒋介

石）脑筋中决无抗战之意，今天是如何妥协的问题了。”又说：“一切关键只在日本条件能否接受。这种情势，我们要看得清楚，天快下大雨了，要赶快准备雨伞。”阎锡山在秋林会议上的一系列反动言论，自然引起与会的新军干部和进步组织领导人如薄一波、续范亭等的强烈反对和抵制。当时作为国民党第二战区保安司令部司令的续范亭，借口前方吃紧，脱身离开秋林，专程绕道延安，于5月的一天，亲向毛泽东报告了这件事。

就在续范亭离开延安后不久，6月10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反投降的报告，他指出：“国民党投降可能是从抗战开始就存在的，不是今天突然发生的；但成为时局的最大危险，则是目前政局中的现象。国民党反共也是从统一战线建立时就存在的，不是今天突然发生的；但把反共作为直接准备投降的步骤，则是目前的实际。”关于当前的任务，要从坏的可能性作准备，“全党努力从思想上组织上准备自己，并准备舆论，准备群众，随时可以对付事变——各种意料之外的袭击，多种大小事变”。要吸取1927年大革命失败的教训，“那时，精神上没有准备，是失败的主要原因”。国民党五中全会后，在河北、山东，特别是在陕甘宁边区所进行的磨擦，是必须给以坚决抵抗的，但必须严格站在自卫立场上。“统一不忘斗争，斗争不忘统一，二者不可偏废，但以统一为主，‘磨而不裂’。”

6月13日，毛泽东在延安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作结论，指出：“目前要极力争取的，用党的全力去争取的，是克服投降可能，争取多数抗日，拥护并帮助、监督并批评国民党与蒋，使之能够从反汪斗争中从今后发展中克服投降倾向。这是目前的中心任务。”“因此应强调团结，强调统一，强调国共长期合作，而不是强调其他东西。也只有强调这些才能克服投降危险，也只有强调这些才能更好地准备自己，应付可能的事变。”

三大政治口号的提出

1939年7月7日，中共中央发表了《为抗战两周年纪念对时局宣言》。在这个宣言里提出三句很重要的政治口号。9月16日毛泽东在和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三记者的谈话中，指出：“‘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这是我们党在今年‘七七’宣言里提出来的三大政治口号。我们认为只有这样做，中国才能避免亡国，并把敌人打出去；除此没有第二条路好走。”

三大政治口号的提出有一个过程。1939年6月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反对投降危险的指示》。6月10日、13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了《反投降提纲》的重要报告。6月30日，毛泽东为抗战两周年纪念撰写《当前时局的最大危机》一文，这篇文章建国后编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时，题目改为《反对投降活动》。文章指出：半年以来，“所谓和战问题竟闹得甚嚣尘上，投降的可能就成了当前政治形势中的主要危险；而反共，即分裂国共合作，分裂抗日团结，就成了那班投降派准备投降的首要步骤”。“中华民族的历史任务是团结抗战以求解放”。“反对投降和分裂—— 这就是全国一切爱国党派、一切爱国同胞的当前紧急任务”。

7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对“七七宣言”的内容和写法进行了讨论。毛泽东提出，文件要反对反共、防共、限共的方针，我认为防共、限共是国民党的防御口号，要强调反对内战危险，指出反共危险便是内战。毛泽东还具体建议宣言中的文字要简洁些，纲领每条只要一两句话。

7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继续讨论“七七宣言”，决定由毛泽东、秦邦宪负责修改，7月7日发出。

在7月3日和6日两次政治局会上除毛泽东外，其他如刘少

奇、张闻天、陈云、王稼祥等都提出了重要的意见。特别是周恩来提出了系统的意见，他建议《宣言》应提出下列纲领：（一）坚持抗战到底，反对投降妥协；（二）坚持统一战线，反对挑动内战；（三）发动全面抗战，并据此内容提出更加生动的口号。

根据周恩来的发言和其他同志的补充，“七七宣言”发表时将纲领口号归结为“坚持抗战到底”——反对中途妥协！巩固国内团结——反对内部分裂！力求全国进步——反对向后倒退！”随后，毛泽东又把这三句口号改为：“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后退”，坚定而策略地表述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政治主张和要求，有力地制止了国民党的投降活动。

支持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发表

1939 年 7 月 8 日、12 日，刘少奇在马列学院为学员们作了有关思想修养的讲演。他首先指出在建设与巩固党的基本任务前面讲共产党员的修养这个问题的重要意义。然后，他详细阐述了共产党员修养的各个方面和修养的方法，列举了党内各种错误思想意识的来源，提出了对待它们所应采取的态度。刘少奇的演讲，受到了马列学院学员们的热烈欢迎。

当时兼任中央机关刊物《解放》周刊主编的张闻天，认为刘少奇讲的内容对于广大党员都是迫切需要的，所以请刘少奇将讲演稿修改整理成文章。刘少奇把文章写好后交张闻天。按照当时《解放》周刊的工作惯例，凡是重要文章都先送毛泽东那里。毛泽东打破常规，用最短的时间很快就看完了，立即退给编辑部；并给吴黎平写了一封短信，说少奇同志这篇文章他看了，写得很好，这篇文章“提倡正气，反对邪气”，是一篇很有用的文章，应当快些。编辑部接到毛泽东的指示后，立即发排付印，在《解放》周刊第 81—84 期上刊出，题为《论共产党员的修养》。

整风运动开始的时候，党中央规定了22篇学习文件，毛泽东曾亲自在干部会议上宣布了这些干部必读文件，《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就是其中的一篇。1943年被正式编入解放出版社的《整风文献》。

我还给同志们三面旗帜

1939年春、夏，中共中央决定陕甘宁边区几所主要大学的大部分师生向前方挺进。抗日军政大学、由罗瑞卿任校长，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安吴堡战时青年训练班、延安工人学校，四校联合，成立“华北联合大学”，由成仿吾任校长，一起开赴敌人后方，为坚持华北抗战，去开展国防教育。

7月9日，毛泽东应邀在桥儿沟天主堂西侧广场上为几千名准备奔赴前线的师生们演讲。演讲前，全体同学献给毛泽东一面旗，所以演讲从献旗开始。毛泽东说，同志们送我一面旗帜，我受了。但我要还给同志们三面旗帜，作为送你们上前线的礼物。这三面旗，又叫三个法宝。当年姜子牙（姜太公）下昆仑山，元始天尊赠予他“打神鞭”、“方天印”、“杏黄旗”等三样法宝。现在你们出发上前线，我也赠你们三样法宝，这就是统一战线、游击战争、革命团结。接着，毛泽东对这三样法 宝，一一作了讲解。最后，他说，我讲的这些都是我们18年的经验总结，又加上2年的抗战，这三样法宝是从血肉中得出的，死了许多人，艰苦奋斗，才有这样的总结。我们中国从前有一个文学家叫江淹，他做了很多的好文章，有一篇叫别赋，送他的朋友离别的赋，里边有很好的话，但是都是流泪的话，最为人所熟记的有“青草碧色，春水渌波，送君南浦，伤如之何”，多么伤心流泪，文笔写得很好；但我今天送同志们上前线，不需要他这样写，把它改一下，成为“青草碧色，春水渌波，送君延安，快如之何”。我今天算马马虎虎做了这一篇别赋。我的文墨不大行，可是有三样法宝，三面旗子，就

是统一战线、游击战争、革命团结送给你们。因为同志们送我一面旗子，所以我也送你们三面。

据当时主持演讲会的成仿吾回忆，毛泽东这次给他们讲话的主要思想，几个月后，1939年10月4日，发表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一文中（在这篇已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的文章中，毛泽东把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归结为：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

毛泽东讲完话后，由一女同学代表华北联合大学向党中央和毛主席宣读了告别中央奔赴前线的决心书。毛泽东接过了决心书。这时，同学们振臂高呼：“到敌人后方去！”“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万岁！”许多同学涌过来，拿着笔记本要毛主席题词。毛泽东笑着接过钢笔和笔记本，写上“打日本，救中国”或“抗战到底”等题词，并署了名。后来涌上来的人太多，毛泽东只好在笔记本上签上“毛泽东”三个字。

寻问杨展和看望受伤的周恩来

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在华北联合大学出发上前线前一天晚上，在陕北公学礼堂举行一个欢送晚会，在延安的中央政治局同志们出席，同上前线的师生员工代表见面送别。7月11日晚上，毛泽东出席了欢送晚会。可容800人的陕北公学礼堂，人们挤坐得满满的。当毛泽东等到达时，全场都热烈地鼓掌。毛泽东等也频频向大家招手致意。毛泽东坐下后，问坐在他旁边的联大校长成仿吾：“杨展来了没有？”杨展是杨开慧的侄女，幼年时同毛泽东、杨开慧一起生活过。1930年杨开慧在长沙被杀害牺牲后，暴尸刑场。当时年仅10岁的杨展曾多次要去背“霞姑”的遗体。她在1938年是长沙周南女子师范学校的地下党支部书记。抗战爆发后，她常常同毛泽东通信。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一书中写到：“有个学生从湖南写信来说……”（《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441页），这

个学生就是杨展。她1938年秋到达旬邑陕北公学分校学习。1939年6月下旬，随校出发上前线途经延安，才得有机会同毛泽东见面。当听到招呼找杨展，联大社会科学部副部长何干之很快地把杨展引到毛泽东身边。当时杨展刚满20岁。毛泽东握着杨展的手，凝视着她，问她家里还有什么人？现况怎样？……后来，杨展在1941年反扫荡中英勇牺牲。

晚会开始，由党中央组织部李富春代表党中央致欢送词，由成仿吾代表上前线的师生致答词。然后由陕北公学剧团演出一些精彩的小节目。节目开始了，但周恩来还没有到。这时，忽然有一个警卫员匆匆忙忙地跑进会场来，向毛泽东报告，说："糟糕！周副主席的马滑下沟里，周副主席摔伤了右臂，正在包扎中。"毛泽东和中央同志们都很震惊，晚会只草草演了一两个小节目就立即结束了。毛泽东和中央的同志们都去看周恩来去了。原来，周恩来从杨家岭骑马出发，到陕公礼堂来参加送别晚会，骑马过了延河，他的马突然受惊，跳了起来；周恩来没有防备，马滑摔下去。岸边是一个树根坑，还有嶙峋的大块乱石，周恩来的右臂摔撞在一块尖锐的岩石上，当时折断，骨头都露了出来，流血很多。后来，经印度援华医疗队的柯棣华大夫和巴素华大夫临时包扎，上了夹板。当时延安的医疗条件很差，不能接骨。周恩来后来飞到莫斯科治疗，虽然接上了骨头，但已伤了筋。从此，他的这只右臂就不能伸直。几十年来，他就以这只伤残的右臂，做着极其繁重的工作，从写文章，批改文件，直到纺线、种地。周恩来是为送别联大师生而受伤的。许多年过去了，这件事却深深地刻在联大师生们的心里。

在追悼平江惨案死难烈士大会上发表演说

自国民党五届五中会会以后，国民党顽固派就不断在全国各地制造磨擦。1939年6月12日，根据蒋介石的秘密命令，国民党

第二十七集团军派兵包围新四军驻湖南平江嘉义镇的通讯处，惨杀新四军参议涂正坤，八路军少校副官罗梓铭等6人，这件惨案称为平江惨案。

8月1日，毛泽东出席在延安南门外体育场举行的延安各界人士追悼平江惨案死难烈士大会，发表题为《用国法制裁反动分子》的演说。毛泽东首先对国民党反动派屠杀革命同志、抗日战士提出抗议，他指出，现在应该杀死什么人？应该杀死汉奸，杀死日本帝国主义者。但是，中国和日本帝国主义者打了两年仗，还没有分胜负。汉奸还是很活跃，杀死的也很少。革命的同志，抗日的战士、却被杀死了。什么人杀死的？军队杀死的。军队为什么杀死了抗日战士？军队是执行命令，有人指使军队去杀的。什么人指使军队去杀？反动派在那里指使。这些反动派，他们是准备投降的，所以恭恭敬敬地执行了日本人和汪精卫的命令，先把最坚决的抗日分子杀死。这件事非同小可，我们一定要反对，我们一定要抗议！接着毛泽东驳斥了国民党顽固派的统一观，提出自己的统一观。他说：中国应该统一，不统一就不能胜利。但是什么叫统一呢？统一就是要大家抗日，要大家团结，要大家进步，要有赏有罚。现在统一了没有呢？没有。平江惨案就是证据。我们早就要求全国统一。第一个，统一于抗战。第二个统一于团结。第三个，统一于进步。然而近来日本帝国主义的捣乱更加厉害了，国际帝国主义帮助日本也更加积极了，中国内部的汉奸，公开的汪精卫和暗藏的汪精卫，他们破坏抗战，破坏团结，向后倒退，也更加积极了。他们想使中国大部投降，内部分裂，国内打仗。现在国内流行一种秘密办法，叫做什么《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其内容全部是反动的，是帮助日本帝国主义的，是不利于抗战、不利于团结、不利于进步的。这种办法就是破坏团结的种种罪恶行为的根源。毛泽东最后指出，我们今天开这个大会，就是为了继续抗战，继续团结，继续进步。为了这个，就要取消《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就要制裁那些投降派、反动派，就要保护一切革命的同

志、抗日的同志、抗日的人民。

和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三记者谈话

中央社记者刘尊棋、《扫荡报》记者耿坚白、《新民报》记者张西洛随全国慰劳总会北路慰劳团于9月9日到达延安。第二天毛泽东到招待处拜访慰劳团，并设宴招待他们。当天晚上，毛泽东陪同慰劳团出席陕甘宁边区政府在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召开的有一千多人参加的欢迎大会，并致欢迎词。他针对当时的形势，义正词严地提出，全国人民拥护抗战，拥护国共合作，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告诫国民党，要做亲者快仇者痛的事，而为亲者所痛仇者所快的事一件也不要做。毛泽东讲话之后，慰劳团总团长张继、北路团长贺衷寒接着讲话。张继非常激动，他在谈到“民国十三年反对国共合作的人中间有我，并且我是第一个“的时候，捶胸顿足，老泪纵横，连说“我是罪人，我有罪！”接着，他提高语调说：“今天情形变了，国共两党正常亲密团结着，我认为今日国共两党虽然有小磨擦，但是这些磨擦是通过和平方法可以解决的。现在大家没有不同意打日本的事情，我中华民族黄帝子孙绝不会再用兵打自己了。”毛泽东为张继的“自我检讨”热烈鼓掌。讲话完毕，慰劳团文艺界代表老舍，被请上台去讲话，他还唱了一段京剧《打渔杀家》。接着，是鲁迅艺术学院演出的《黄河大合唱》、民众剧团演出的秧歌剧《查路条》等。

慰劳团在延安停留了4天后去榆林，从榆林回到延安时，又继续进行参观访问和座谈。刘尊棋等三记者提出要访问毛主席，毛泽东同意同记者们谈一次话，并定于16日下午6点钟，在边区政府交际处会见他们。会见时除中共中央统战部和八路军政治部宣传部的负责同志外，还有新华社的向中华和《新中华报》的李初梨等在座，两位青年同志担任记录，大约有十几个人，不大的窑洞，坐得满满的。

毛泽东先问三位记者到延安以后的观感。张西洛说，在鄜县县城他们受到国共双方的县长的欢迎。给他们印象最深刻的是两个县长的形象：那个身穿毛料中山服、脚上皮鞋闪闪发亮的国民党县长，见了慰劳团只是点头哈腰，毕恭毕敬，一副奴才相；另一位年纪大约只有二十来岁，身着灰色粗布服，脚穿陕北式布鞋，一看就知道这是边区政府的县长了。毛泽东笑着说："县长，有些也是民选的了，许多先进的人物和有为的青年，被选出来当县长了。"谈话就这样开始了。

毛泽东按照记者们事先写好的一张问题表，与他们一问一答。在谈到关于所谓"限制异党"问题的时候，毛泽东说："先生们关心这件事是很对的。关于这件事，近来情况虽然比较好一点，但是根本上没有什么变化。"

问："共产党对这个问题的态度，曾向中央政府表示过没有？"

答："我们已经提出抗议。"

问："用什么方式提出的？"

答："还是在七月间，我们党的代表周恩来同志，已经写信给蒋委员长。八月一日，延安各界又打电报给蒋委员长和国民政府，要求取消那个秘密流行成为各个磨擦根源的所谓《限制异党活动办法》。"

问："中央政府有无答复？"

答："没有答复。听说这个东西，国民党里面也有一些人不赞成。"

谈到这个问题时，毛泽东十分气愤，他站起来有力地挥动着手臂，望着大家说："你们知道，共同抗日的军队叫做友军，不叫做'异军'，那么，共同抗日的党派就是友党，不是'异党'。抗战中间有许多党派，党派的力量有大小，但是大家同在抗战，完全应该互相团结，而决不应该互相'限制'。什么是异党？日本走狗汪精卫的汉奸党是异党，因为它和抗日党派在政治上没有丝毫共同之点，这样的党，就应该限制。"毛泽东接着指出：我们的口

号“一定要和汪精卫的口号对立起来，而决不能和他相混同”。毛泽东就这个特定问题，第一次提出了“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和“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著名的政治原则。

毛泽东同三记者这篇一问一答式的重要谈话，已经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10月6日，延安《新中华报》以《毛泽东同志与中央社记者刘先生、扫荡报记者耿先生、新民报记者张先生的谈话》为题，把这篇重要讲话刊登在第一版。10月19日，重庆《新华日报》也刊登了。

慰劳团是9月23日离开延安的。22日下午，毛泽东又一次亲临招待处，同三记者一起照了相，送给每人一本《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并分别在书的扉页上签了名，写上他们每个人的名字。

调王震旅返回陕北

1939年8、9月间，由于河防紧张，党中央决定调王震的三五九旅返回陕北，加强河防守备力量。当时边区内外的顽固派正在到处寻衅闹事，制造磨擦事件。为了不给顽固派造谣生事以任何口实，在下令调动三五九旅的同时，毛泽东指示十八集团军留守处主任萧劲光把这件事向国民党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和驻柳林地区的邓宝珊报告一下。

毛泽东审阅了萧劲光起草的电文，认为电文表达的意思不够充分，措词也不够策略，随即将电文全部改写了一篇。改写后的电文是这样的：“日寇猖狂，河防屡急，迭奉钧座电令，加强防御。近以敌占柳林，盘据不去，窥其用意，似有西犯模样。迭以此情呈报朱彭总副司令。嗣奉电示：指派一二0师王旅布置绥吴警备区，巩固河防，并资休整。现该旅已到东岸，即日渡河布防。兵力既增，河防当可巩固。惟仍当恪遵钧谕，激励士气，不使稍有

疏忽……”在电文后面，毛泽东还写道：“萧：此电待王旅确到河边并先头部队开始渡河时才发，不要发早，也不要发迟了。”

正是由于电文无懈可击，时机又掌握得恰到火候，果然得到阎锡山、邓宝珊认可。阎锡山在给萧劲光的回电说：“希饬该旅速至巩固河防为要。”邓宝珊回电更是表示赞同：“五旅开驻绥吴，增厚兵力，极佩苾筹”。

但是，边区内外的顽固分子抓住这件事，大作文章。一时间，谣言四起，什么“三五九旅不服从中央，自由引动”呀，“三五九旅是来警备区消灭保安队的，中央不知道”呀等等。有的甚至谩骂“三五九旅是叛军，是土匪”。为了驳斥顽固分子，毛泽东指示萧劲光立即写了一篇文章给以驳斥。这样，在1939年12月9日的《新中华报》上，发表了萧劲光的《加强河防，反对造谣破坏的阴谋家》的文章。文章痛斥了顽固分子的无耻谰言，转述了上述阎锡山、邓宝珊回电的原文，说明调五旅是为了巩固河防，并且是按照国民党高级将领的电令做的。事理俱在，那些谣言便不攻自破了。

赶走何绍南

何绍南是国民党派任的绥德专员兼保安司令，是顽固的反共分子。在他任职的两年中，制造了大量的磨擦事件。1939年5月，他授意安定县县长田杰生指挥保安队袭击我杨家园子，打死打伤我官兵数十人。9月，他面喻吴堡县县长黄若霖，组织暗杀队，杀害我718团三营副营长尹才生。10月，他指令清涧县县长艾善甫组织哥老会码头和黑军“政府”，串通土匪，到处抢劫等，无恶不作。

9月间，何绍南途经延安去西安。为了争取国民党多数人团结抗日，毛泽东还是决定接见了他。毛泽东首先讲了挽救民族危亡，必须维护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道理，说明中国共产党强调

团结，强调统一，强调国共合作的 方针，明确向他指出了国民党正在把反共作为直接准备投降的步骤。毛泽东要何绍南看清形势，不要再根据所谓《限制异党活动办法》搞磨擦，重申了不久前在接见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三记者谈话中“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精神，指出“我们根本反对抗日党派之间那种互相抵消力量的磨擦，但是任何方面的横逆一定要来，如果欺人太甚，如果实行压迫，那么，共产党就必须用严正的态度对待之”。当时何绍南只得嗫嚅应允，但回去后仍旧不断制造磨擦。一直到王震率三五九旅驻防绥德，并担任绥米葭吴清警备司令以后，针锋相对地同他进行坚决斗争，打掉了他的嚣张气焰，他才有所收敛。不久，何绍南逃出陕北，到西安去了。

为了把何绍南彻底赶走，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和八路军后方留守处主任萧劲光联名致电蒋介石、孔祥熙、程潜、蒋鼎文等人，要求惩办何绍南，并委任王震兼任绥德地区专员。电文中说：“现在组织暗杀之黄若霖，虽经撤职；纵兵为匪之艾善甫，虽被管押；贩卖烟土之高步元等，虽已法办……但发号施令之主谋罪魁何绍南至今消遥法外，未闻议处。”毛泽东修改了电文，对于如何处置何绍南，这样写道：请“将该犯官何绍南加以逮捕，并解至陕北，组织巡回法庭，令民众代表参加审判，置之重典，以肃法纪，而快人心。”对于委任王震为专员一事，经毛泽东修改后的电文是这样写的：“查有绥米葭吴清警备区王司令震，前以转战华北，屡建奇勋，近则守备河防，复树劳绩，以之兼理专员一职，实属人地相宜。”

取名延生如何

1939 年 7 月 1 日，音乐家向隅、唐荣枚的第二个儿子降生在延安的窑洞里，他们想请毛泽东给孩子取个名字，但考虑到毛泽那么忙，难以启齿。8 月 18 日，孩子的舅舅柯蓝，当时是鲁迅文

学系的学生，当他知道这件事后，自告奋勇，从练习本上撕下一页纸，代为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信是这样写的："我们的小孩——一个男孩——是七月一日生下来的，因为他刚巧在伟大的日子里进入了这伟大的时代，我们都希望得到你的光荣给他取一个名字……"18天后，他们收到毛泽东的一封信，中国式的信封上竖写着"鲁艺文学艺术研究院 向隅同志收"。打开一看，毛泽东在他们的去信上作了批示："取名延生如何？如以为不妥，请你们自己拟出两三个，我替你们选择一个。因忙迟复，是以为歉！此复向、唐二同志并庆祝你们的小孩。毛泽东　九月五日。"

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已进到新的阶段

1939年9月1日，毛泽东就目前国际形势和中国抗战问题，对《新华日报》驻延安记者发表谈话。这一谈话建国后以《关于国际新形势对新华日报记者谈话》为题编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谈话指出目前的国际时局已处在新的形势中。早已开始了的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的片面性状态，即是说，由于"不干涉"政策而发生的一方进攻、一方坐视的局面，就欧洲方面说来，今后势必由全面性战争起而代之。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已进到新的阶段。日本帝国主义受到苏德协定的打击，它的前途将更加困难。目前和英国妥协的趋势甚大。英国反动派将以共同瓜分中国和在财政上经济上帮助日本为条件，换得日本充当英国利益的东方警犬，镇压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牵制苏联。因此，不管怎样，日本灭亡中国的根本目的是决不会变更的。在这种形势下，中国的前途有两个：一个是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的前途，这就是复兴的前途。一个是实行妥协、实行分裂、实行倒退的前途、这就是亡国的前途。在新的国际环境中，在日本更加困难和我国绝不妥协的条件下，我国的战略退却阶段便已完结，而战略相持阶段便已到来。所谓战略相持阶段，即是准备反攻的阶段。从现时

起，全国应以“准备反攻”为抗战的总任务。

就在毛泽东发表谈话的同一天，法西斯德国向波兰发动进攻。9月3日，英、法对德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

9月7日，毛泽东在《新华日报》上发表他为该报写的社论《国际新形势与我国抗战》，指出：早已开始的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的范围，现在是更加扩大了。帝国主义战争扩大这一新的国际形势，可能对中国抗战产生有利的和不利的影响。然而，最主要的，是中国本身的问题，只要我们能始终坚持抗战到底国策，坚持内部团结，尤其是国共合作的方针，坚持力争全国进步的方针，那么，在有利的国际形势下，我们可以缩短时间，减少牺牲，而取得抗战的胜利，就是在更困难的形势下，我们同样可以而且一定能够克服一时困难，进而取得抗战的胜利。

9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会议讨论德波战争爆发后的国际形势。会议决定由毛泽东在干部大会上对这个问题作一次报告。

9月14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大会上作关于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的讲演。讲演论述了战争的新阶段；战争的原因；战争的目的；战争的性质；战争第一阶段的特点；我们在战争第一阶段中的革命政策；英法苏谈判的破裂与战争第二阶段的开始；战争第二阶段的特点；我们在战争第二阶段的革命政策；战争的前途等10个问题，毛泽东指出：从英法等帝国主义国家参加战争的现在开始，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进入第二阶段，即已是帝国主义的世界大战。一切直接间接参加战争的帝国主义国家，不论是德意日，不论是英美法，都是为了重新瓜分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势力范围，为了掠夺世界人民。所以，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是非正义的掠夺的战争。第二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是持久的战争，其规模将比第一次世界大战要大得多。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将在这个战争中起维护人类利益、干涉帝国主义的伟大作用。中国、苏联、各国人民解放运动、各国民族解放运动，应该组成坚固的革命的统一战线，用

以 对抗反革命的统一战线。世界的前途是光明的，中国的前途也是光明的，一个自由独立的新中国将会出现。

会见第二次访问延安的美国记者斯诺

斯诺第一次访问延安是在1936年7月至10月。1939年9月斯诺又来到陕北，在陕北第二次见到了毛泽东。9月24日，毛泽东邀请斯诺到家里作客，进行长谈，回答斯诺提出的问题。谈到陕甘宁边区，毛泽东说：从西安事变起，特别是从1937年行政院正式批准给予陕甘宁边区政府合法地位的法案时起，蒋介石先生就承认了边区政府。至于到现在还没有发表，还没有委任边区的官吏，这只是证明行政院办事未免太迟缓，中国政府的官僚主义作风实在太严重，要改变一下才好。谈到国民政府的阶级基础，毛泽东说：现在的国民政府，主要的还是地主与资本家的代表。作为抗战的政府，它的基础主要地应该放在、也将不得不放在中等阶级与广大的农民之上。谈到中国革命，毛泽东说：中国革命，有两篇文章，上篇和下篇：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一道，进行民族民主革命，这是文章的上篇，我们现在正在做这一篇文章，并且一定要做好这一篇文章。但是，文章还有一篇，就是它的下篇，就是无产阶级领导农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这一篇文章，我们也是一定要做的，并且也一定要做好的。不过，文章的上篇如果不做好，下篇是没有法子着手做的。谈到共产党对工农的领导，毛泽东说：可以分为政治上的领导和组织上的领导两方面。象在陕甘宁边区和在华北八路军游击区，这些地方的工人农民，共产党不但在政治上领导着，而且组织上也领导了。其它区域，凡是赞成共产党的主张，他们就是接受了共产党的政治上的领导，如果组织起来了，那么，也已有了组织上的领导。谈到抗日与民主，毛泽东说：现在的中国，是一个不民主的国家，自抗战开始以来，国民政府在民主民生政策方面，至今还没有什么变化。抗日而没有

民主，是不能胜利的，抗日与民主是一件事的两方面。有一些人，赞成抗日，而反对民主，这种人，实际上是不愿意抗日胜利的，是要引导抗日到失败的人。毛泽东还和斯诺谈了欧战爆发后的国际形势及政治格局。

9 月 29 日，毛泽东设宴欢迎国民党军骑兵第二军军长何柱国、斯诺和苏联朋友等。宴会后，毛泽东又陪同他们出席延安各界在中央大礼堂举行的欢迎晚会。他在欢迎会上说：今天开这样盛大的晚会，热烈欢迎中国的外国的许多朋友和来宾。国内的团结，再加上国际的团结，日本帝国主义一定会打倒的。毛泽东在介绍斯诺时说，1936 年斯诺先生第一个首先到陕北苏区来。这次重来边区，我们热烈欢迎他。美国是一个大民族，人民大众是反对帝国主义，同情被压迫民族解放的。“斯诺先生是站在人民大众方面的，他是共产党的好朋友。希望经过斯诺先生，使中美两大民族亲密携手，帮助中国人民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为《共产党人》撰写发刊词

1939 年 10 月 4 日，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共产党人》创刊。这个刊物共出了 19 期，于 1941 年 8 月停刊。毛泽东为创刊号写了发刊词。建国后，以《〈共产党人〉发刊词》为题编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

毛泽东在发刊词中首先指出，中共中央创办《共产党人》的目的是，为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而起推动作用。毛泽东总结了 18 年来党的建设的丰富经验，指出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是中国民主革命过程中的两个基本特点。党的建设的过程，就是在这个特殊的情况下进行的。党的失败和胜利，党的后退和前进，党的缩小和扩大，党的发展和巩固，都不能不联系于党同资产阶级的关系和党同武装斗争的关系。毛泽东由此得出结论，统

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大法宝，是中国革命的三个基本问题。并阐明了三大法宝之间的关系，指出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是战胜敌人的两个基本武器，而党的组织则是掌握这两个武器以实行对敌冲锋陷阵的英勇战士。正确地理解了这三个基本问题及相互关系，就等于正确地领导了全部中国革命。

群众工作是克服投降危险的决定性条件

1939 年 11 月 1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通过《中央关于深入群众工作的决定》。在讨论这个问题时，毛泽东发言指出：党有很大的发展，党与群众有好的联系，但党内也有脱离群众的现象。许多共产党员不知道脱离群众是一种罪恶。毛泽东指示这个决定必须阐明：一、党要进一步地依靠群众。当前克服投降危险更需要发动群众。二、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群众工作，要与国民党左派人士联合，要有步骤并要有长期深远的计划。要以群众工作的好坏作为判断党的工作好坏的主要条件。三、在八路军新四军活动区域的 群众工作，要实行减租减息、减税，废除高利贷；群众团体要坚持照顾最大多数及发扬民主的原则；军队的政委和政治机关要帮助地方群众工作。四、群众工作是克服投降危险的决定性条件。

本日，政治局会议通过了这个决定。决定包括了毛泽东指示的四点，强调共产党必须进一步依靠群众，必须深入群众工作，才能克服投降与反共危险；才能在投降与反共危险没有克服以致发生突然事变时，使党与抗战避免意外的损失。

为刘岘木刻作品题词

刘岘原名王之兑，1915 年生于河南省兰封（今兰考）县。1933

年夏考入上海美专学习，同年10月发起成立无名木刻社，并开始了和鲁迅的交往。他常将自己的作品寄给鲁迅请他指教，鲁迅曾给他写过17封信，对其木刻作品予以认真的评述。1938年，刘岘投身新四军彭雪枫部。1939年调往延安鲁艺任木刻教授。这一时期，刘岘除教学外，创作热情极为高涨，在短短的几个月中，就创作了数十幅新作。他把这些作品手拓，贴在马兰草纸上，装订数册，分别呈送中共中央领导同志阅赏。

11月末，毛泽东阅后挥笔为刘岘木刻题词："我不懂木刻的道理，但我喜欢看木刻。刘岘同志来边区时间不久，已有许多作品，希望继续努力，为创造中华民族的新艺术而奋斗。"这幅题词由鲁艺副院长赵毅敏转交刘岘。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

1939年12月，毛泽东主持撰写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第一章、第二章定稿。这两章于1940年春先后在《共产党人》第四期和第五期上发表。建国后，编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这本书原是由毛泽东主持和其他同志参加合作写的一个课本，原计划共写三章。第一章《中国社会》，是由其他同志起草，经过毛泽东修改的。第二章《中国革命》是毛泽东自己写的。第三章准备写《党的建设》，因担任写作的同志没有完稿而停止。

第一章着重分析了中国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点和主要矛盾。毛泽东指出，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根据。第二章，毛泽东首先回顾了近百年来的革命运动，接着分析了中国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性质和前途，指出：中国革命的对象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在日本武力侵入中国以后，中国革命的主要敌人则是日本帝国主义和勾结日本公开投降或准备投降的一切汉奸和反动派。中国革命的任务在现阶段是对外推翻帝国主义的民族压迫的民族革命和对内

推翻封建地主压迫的民主革命，而最主要的任务是推翻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无产阶级是中国革命的最基本的动力，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是无产阶级可靠的同盟军，民族资产阶级则是在一定时期中和一定程度上的同盟军。现阶段中国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但它不同于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即一方面替资本主义扫清道路，另一方面又替社会主义创造前提的革命。中国革命的全部结果是：一方面有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另一方面有社会主义因素的发展。而在当时环境的有利条件下，使其实现社会主义的前途更具有极大的可能性。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并在适当时候将其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阶段上去，这是中国共产党的全部革命任务。只有认清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联系和区别，才能正确领导中国革命。

1940 年下半年，毛泽东根据反对第一次反共高潮的经验和当时的形势，对《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第二章作了重要修改，这些修改又对《新民主主义论》的一些观点作了重要的发展。

鱼不能没有水

当时干部教育教材来源：一是翻译苏联的书；二是自己编写，最早编了一本教材题为《共产主义与中国共产党》。后来由毛泽东主持，几个同志合作撰写《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这本书一共计划写三章，第一章《中国社会》，是由其他同志起草，经过毛泽东修改审定的。第二章是毛泽东亲自写的。第三章《党的建设》由李维汉等一些同志分头起草。

李维汉起草第三章中的两节，他把这两节的草稿送毛主席审读。第一节里说到共产党和群众的关系，李维汉说好比鱼和水的关系。毛泽东看到此处，作了一句顶批："水可以没有鱼，鱼不能没有水"，进一步阐明党绝对不能脱离群众的深刻道理。李维汉知道后，很受教育和启发，以后他在讲课时多次讲到毛泽东的这条

批语。第三章的第二节是写民主集中制。后来，因情况变化写作中止了，第三章未完全写完，所以《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只有两章。

诗歌以押韵为宜

1939 年 12 月，诗人刘御给毛泽东写信，说“您在六届六次会上所倡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虽然是针对马列主义的学习与宣传而提出的，但我觉得，在文艺创作上也完全适用。我正是基于这样的理解而在诗歌创作中进行尝试的，不知道我这样的看法和做法是否得当。”为了便于毛泽东了解情况，刘御还把他当时写的诗寄给毛泽东看。

12 月，毛泽东很快写来回信，说：信和习作均收到，迟复为歉。你的努力，很好很对。优秀的民族，大抵是千百年来群众的集体创作。多中要有些好的。诗歌以押韵为宜，无韵的诗歌，难于行运。抗战是大同，形式上风格上的差别是小异，凡小异而大同者均应兼容并包。

关于晋西事变和我们的方针

1939 年 12 月 3 日，阎锡山部在永和附近袭击决死队第二纵队，破坏永和、石楼等地抗日民主政权及“牺盟会”等抗日群众团体，杀害洪洞县、蒲县县长及位于隰县的八路军晋西独立支队后方医院的伤病员，制造了晋西事变。

12 月 6 日，毛泽东同王稼祥就晋西事变和我们的方针，急电朱德、左权、鼓德怀、八路军晋西独立支队等，指出：“晋西南阎部新旧两军已发生严重武装冲突，表现着山西旧派投降日寇的表面化，其性质是对抗日的叛变。”“反新军反抗日的武装叛变可能在晋西南、晋西北再扩大化。”我们的方针是：“速即通知进步分

子，立刻警惕，准备坚决应付事变。对叛军进攻绝不让步，坚决有力地给予还击，并立即由新派提出反对叛军口号，但不要反对阎。”“在新军内迅速巩固党的领导，不可靠者断然撤换”。“八路本身严加警戒，以防意外，并应给新军以鼓励、掩护和支持”。“晋西北晋西南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我们绝不能放弃。”

12月9日，为防止和对付晋西北武装冲突，毛泽东在给贺龙、关向应、李井泉的电报中提出要加强晋西北的政治领导，调李井泉任晋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统一地方党和军队的领导。

同一天，毛泽东同王稼祥再致电八路军总部、第一二0师、一二九师、晋西独立支队等，补充说明对晋西事变的估计和我们的方针。电报指出：阎锡山发动晋西事变，其目的在向我们示威，取得 我们让步，以便他能确实掌握晋西南、晋西北两区，压倒新派和我们的力量，以准备实行投降时的比较有利阵地。但目前阎本人对实行投降与公开反共，似尚未下最后决心。整个说来，现时局是布置投降的时期，未至实行投降的时期。电报强调晋西南、晋西北两区为华北与西北间之枢纽，必须掌握在抗战派手里。我们的方针是坚决反击阎之进攻，力争抗战派的胜利。应利用阎尚未至下最后投降决心时机和旧派之间的矛盾。要估计新军可能打些败仗，发生叛变，并要准备打些败仗与一部分叛变。新军中、政权中、牺盟中的统一与决心第一要紧，一切真正不稳分子，必须开除出去。

在晋西事变发生的同时，阎部第七集团军总司令赵承绶采取威胁利诱，分化瓦解等手段，阴谋策动决死队第四纵队中部分反动军官发动叛乱。为此，决死队第四纵队在组织上采取果断措施，于12月13日，逮捕了阴谋暴乱的军官，从而粉碎了赵承绶破坏新军的阴谋。12月12日，毛泽东同王稼祥致电中共晋西北区委书记赵林，八路军一二0师三五八旅旅长彭绍辉、政委罗贵波等，指出：“你们对巩固四纵队的方针是根本妥当的，望坚决执行之”。“如果你们能够不失时机而方法又很恰当又很适宜地去巩固四纵

队，则晋西北阵地就基本上巩固了，最好是能避免武装冲突，又能巩固四纵队”。电报还指示要经常与决死队第四纵队政委雷任民、新军暂编第一师师长续范亭联系。他们办法较多，要同他们多商量、讨论。要使雷任民能够直接指挥四纵队，号召四纵队的党员及新派团结在雷任民的周围，没有领导中心是不能胜利的。

12 月 23 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这次的冲突，是新旧两派斗争的生死决斗能问题，须严重注意，但不是短期解决的。国民党自六中全会以后以军事反共为主了，与过去以政治溶共为主不同。我们对付的方针是反磨擦，但方法要灵活。现在新军虽然打了两次胜仗，但局面还很严重，要准备长期斗争。我们要提倡坚决顽强性。我们对陕甘宁边区须采取坚决争取的方针，一尺一寸也不放松。有磨擦也可以教育我们，实际上使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联系起来。

纪念白求恩

1938 年 3 月底，毛泽东在延安凤凰山的窑洞里会见了加拿大胸外科专家白求恩大夫。4 月，白求恩东渡黄河，前往晋察冀边区。他带着战地医疗队转战多个战场，冒着枪林弹雨，在极端艰难的环境中抢救了成千上万的伤病员，培养了大批的革命医疗战士，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白求恩在前线，曾多次给毛泽东写信，汇报他的工作情况，对医疗工作提出不少建议。毛泽东也非常关心白求恩的工作和生活。毛泽东在给晋察冀边区聂荣臻司令员的电报中指示：“请每月付白求恩一百元。白求恩报告称松岩口医院建设需款。请令该院照其计划执行。同意任白求恩为军区卫生顾问。对其意见、能力完全信任。一切请视伤员需要斟酌办理。”白求恩很感谢毛泽东对他的关心，他在复电中说：“我自己不需要钱。因为衣食等一切均已供给。该款若系由加拿大或美国汇给我私人的，请留作菸草费，专

供伤员购买菸叶及纸烟之用。……”

1939年11月12日，白求恩在医治伤员时中毒，在河北定县不幸逝世。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仍怀着崇敬的心情，想念着毛泽东。他握着周围同志们的手说：“请转告毛主席，感谢他和中国共产党给我的帮助。我相信，在毛主席的领导下，中国人民一定会获得解放。”

毛泽东得知白求恩牺牲的消息后，非常悲痛。12月1日为延安各界追悼白求恩的大会，亲笔写了挽词：“学习白求恩同志的国际精神，学习他的牺牲精神，责任心与工作热忱。”12月21日，毛泽东为八路军政治部、卫生部于1940年出版的《诺尔曼·白求恩纪念册》撰写《学习白求恩》一文（建国后编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时，题目改为《纪念白求恩》），高度赞扬了白求恩的共产主义、国际主义精神，号召每一个共产党员向他学习。毛泽东指出：“一个外国人，毫无利己的动机，把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当作他自己的事业，这是什么精神？这是国际主义的精神，这是共产主义的精神，每一个中国共产党员都要学习这种精神。”“白求恩同志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表现在他对工作的极端的负责任，对同志对人民的极端的热忱。”“我们大家要学习他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从这点出发，就可以变为大有利于人民的人。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欢迎马占山

抗日将领、东北挺进军总司令马占山，于1939年冬离重庆返回防地。途经甘泉时，马占山下车打猎，不料猎枪炸裂，伤了左手指，拇指炸飞，中指折断，血流如注。随从急忙把不省人事的马占山送往延安医院急救。延安立即组织抢救，使马占山安全脱

险。毛泽东知道了立即前去看望，他对马占山说：我看你伤势很重，大夫医药，延安完全给你想办法，不会误了你的伤。接着又风趣地说：过几天你就回榆林吧，你是世界知名人士，万一死在延安，蒋介石会大作文章，给我带来洗不掉的污点。马占山也笑着说：不要紧，我死不了。毛泽东说：日本侵略军必定以失败告终。不过伪满地区还有其精锐部队，免不了要负隅顽抗，未来收复东北，要你搭个过渡桥。说到目前的投降危机，马占山说，投降很困难，但中国没有武装民众不能决定问题。

12 月 22 日，毛泽东设宴欢迎马占山到延安。宴会后，毛泽东陪同马占山出席延安各界在中央大礼堂举行的欢迎晚会。在晚会上毛泽东说：今天开会欢迎始终如一抗战到底的马占山将军。中国古代社会即是欢迎有始有终的人，一直到今天都是这样，半途而废的人不被人所欢迎。抗日是一件大事，要始终如一，抗战到底。现在有些投降派，半途而废，他们是虎头蛇尾。我们要和马将军一道，和全国抗战的人一道，抗战到底。

马占山在延安住了两周多，伤势见好，已能活动，就在延安几位医生护士的护送下返回榆林。事后，马占山向毛泽东等写了表示感谢的信。

1941 年 9 月，马占山的新兵队开入八路军防地，八路军误以为胡宗南部队进攻了，就包围缴了新兵先头部队约 700 人的枪。不久，毛泽东致电马占山表示歉意，大意是纯系误会，希即派员来接。结果马占山派人将新兵全部接回，枪支弹药完整无损。毛泽东还特地送了 7、8 斤延安土产糖带给马占山。马占山复电毛泽东说：接兵部队已如期安全到达陕北防地哈拉寨，承你赐赠糖果和新兵过延安时期有劳关怀之处，在这里一并表示感谢，顺祝你健康愉快。

驳斥“毛泽东已由新疆返延安”的谣言

1939年12月27日，毛泽东在《新中华报》上发表向该报记者驳斥国民党军某战区司令长官部通报所散布的谣言。该通报称：“据报，毛泽东已由新疆返延安，在本月五日向其所属各负责人报告，李立三率领七百三十人，内有俄人及苏联飞机多架，将乘反攻敌人之际夺取中央政权，以兰州为中国之莫斯科”等语。毛泽东驳斥说：这种消息是日本人造的，怎样由中国的战区司令部发出来，未免奇怪。我又“由新疆返延安”了，可是我还没有准备去新疆。一切想挑动国共分裂准备投降日寇的人，造作了千百件情报，但这一件是最拙劣的。“夺取中央政权”，好大题目！明明是夺取边区，还在今年7月就把边区的旬邑夺取了，近日又夺取了边区的镇原、宁县两城，飞机大炮全使用上来了。据闻还要夺取边区的庆阳、合水、淳化、富县，打下夺取延安的基础。前面是日本人大块地夺取中国国土，后面是中国人小块地夺取陕甘宁边区。边区总共只有23县，现在剩下了20县，通通夺取干净也抵不上被日本人夺去的几分之一，然而总可谓勇敢矣。你们报馆里应作点文章，劝劝那些勇敢的先生们，叫他们稍为收敛一点，不要太横行霸道了，有勇敢到日本人面前献去，在内窝子里显劲，过去已有经验，到底显不出什么结果来的。

1940 年

加强晋西北作战的指挥

自晋西事变发生以后，毛泽东一直担心晋西北的领导问题。1939年12月9日，曾指派李井泉立即离开大青山支队，到晋西北加强政治领导。

1940年1月5日，中共中央军委决定，令贺龙、关向应直接负责晋西北对阎锡山旧军作战的指挥。同日，毛泽东同王稼祥致电告知聂荣臻、彭真、贺龙、关向应即赴晋西北指挥，晋西北关系全局，“吕梁山已失，靠夺取晋西北北作战略枢纽”。

贺龙、关向应接到命令后，即率第一二〇师师部及主力5个团于2月2日至8日分批返回晋西北。一二〇师主力返回晋西北，保证了晋西北斗争的胜利和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的巩固与发展。

关于陇东事件的谈判

自1939年4月至12月，国民党顽固派在陕甘宁边区制造了两次陇东事件。第二次陇东事件，国民党军胡宗南部出动3000余人，袭击八路军驻宁县、镇原城的第七七〇团，杀伤干部战士300余人，夺占宁县、镇原两城。为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破坏团结抗战的罪行，12月下旬，八路军后方留守处主任萧劲光致电蒋介石等，呼吁停止进攻边区，恢复团结，勿使事态扩大。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通电全国，反对枪口对内，进攻边区。同时陇东地区军民对国民党的进攻展开反击，打击了顽固势力，恢复了陇东大部地区。

毛泽东在这场斗争中非常重视以萧劲光名义发出的每封电报，这些电文多是通过毛泽东修改或是重新起草的。毛泽东在修改电文时，多次加了这样一些话：“边区二十三县范围为蒋委员长所指定”，我军“对于原定二十三县并未越出雷池一步”。

在修改萧劲光给蒋介石等人的一份通电中，毛泽东反复推敲，最后改写成这样一段话："目前日寇以一师团之众大举西犯，柳林、军渡相继失守，我河防部队正尽一切力量，予以痛击，连日战斗甚为激烈。大敌当前，覆舟堪惧，后方纷争，实属不宜再有。苟一方拼死杀敌于前，他方复乘机争夺于后，则不啻以刃资敌，前途危险，何堪设想!?"

在修改萧劲光致程潜、朱绍良的一份电文时，毛泽东加了"据闻一切行动均系根据新颁处理共党问题方案，下级不过照此方案执行而已"。

在萧劲光致程潜的一份电文中，毛泽东写道："镇宁两城虽被袭占，无辜官兵虽被牺牲，下级人员虽极愤慨，然劲光至今未增一兵，无非体钧座之意旨，本团结之大义，力求和平解决之道"。"职意公平处理，撤兵为先，进占镇宁两城之兵不撤，即无以示诚意而服人心。专员钟竞成实为肇祸之主谋，庆父不死，鲁难未已，施以撤惩，出自钧裁。"

经过一番交涉、斗争，双方均派出代表进行谈判。党中央和毛泽东决定选派陕甘宁边区副议长谢觉哉为代表同国民党进行谈判。1940年1月8日，毛泽东同王稼祥、萧劲光写信给谢觉哉，关于谈判条件："(甲)陇东六县(环县、庆阳、合水、宁县、正宁、镇原)属边区二十三县范围，地方行政应即全部移交边区管辖，杜绝一切纠纷之源；(乙)边区及八路军保证不向六县境外越出一步；(丙)在上列两条基本原则下具体解决彼方从六县撤退军队保安队行政机关及此次纠纷中双方交换俘虏等事；(丁)如彼方不愿照此解决，则我只能承认双方停止冲突，暂维现状，交换俘虏，其他问题，由双方中央解决。"

谈判是在陇东西峰镇进行的，从1月中旬开始，持续到2月间，最后没有到得积极成果，只达成了象毛泽东在信中最后一条所说的"暂维现状，听候双方中央解决"的协议。

在理论上也要采取攻势

1940年1月1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山西新旧军的磨擦问题。毛泽东在发言中指出，我们对山西新旧军的磨擦问题，采取强硬的方针是对的。我们反磨擦的方针，一方面在军事上我军占优势的区域要取攻势；另一方面在理论上也要采取攻势，批判资产阶级专政，说明它的不好，使顽固派孤立。毛泽东为此提议边区文协代表大会发表一个宣言，驳斥叶青等的错误言论。

叶青，原名任卓宣，中国共产党的叛徒。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先后主办《抗战向导》、《时代思潮》等刊物，写了一些小册子，搞所谓“三民主义研究及三民主义文化运动”，反对中国共产党，反对共产主义。毛泽东在1939年8月的一次政治局会议就批评叶青的三民主义和平转变论是错误的，指出三民主义本身不能发展到社会主义，有必要公开宣传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的相同点和不同点。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就是在此背景下产生的。

毛泽东除指示要开展理论攻势外，也注意了采用宣传攻势。1月5日，他同王稼祥致电朱德、彭德怀、杨尚昆等，指示他们即日着手以牺盟会负责人的名义，写一本晋东南7县惨杀记，内容记载1939年12月8日至26日，国民党军第八集团军总司令孙楚奉阎锡山之命率独立第八旅进攻决死队第一、第三纵队，并破坏晋东南地区沁水、阳城、晋城、高平、陵川、壶关、长治等7县抗日民主政权，杀害共产党员及其他进步分子500余人的经过。书成后广发本地及西安、重庆，并送一本来延安。

还不是全国下雨之时

阎锡山在1939年的秋林会议上曾暗示部下：“天要下雨，要赶快备雨伞，一落人后，就要吃大亏”。意思是国民党政府快要对日妥

协了，山西要赶快做投降的准备。

1940年1月11日，毛泽东在致彭德怀的电报中说：目前国内的政治形势“还不是全国下雨之时，在全国任务还是组织进步力量，力争中间阶层，击破大资产阶级的动摇与反动，这种可能性现在还未丧失。目前最严重的问题，是阎锡山的反动，他就是目前大资产阶级中最反动的部分，他的阴谋十分恶毒，他已封锁了吕梁山与中条山。我们的对策，以贺关力量首先夺取晋西北的全部，至少是大部，以晋东南力量巩固晋东南未失阵地，争回已失阵地之一部，打开一条通洛阳的路十分要紧。然后由贺关与晋东南各出一部，向吕梁山攻击，至少恢复原有陈支队阵地及一条交通线，打通延水关。如果此时阎锡山愿意讲和（还未丧失此种可能），则让他占领吕梁山的大部，我只占一小部及一条交通线就此罢手，否则战事难免扩大。”

前一天，即1月10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上指出：目前国内时局，由于八路军的反磨擦斗争，汪精卫准备上台和日苏接近，有好转的可能。南方工作要加紧争取中产阶级，争取时局好转。毛泽东强调：争取中产阶级的工作大有文章可做。

同一天，毛泽东致电八路军驻山西办事处处长王世英，指出：“（甲）国共分裂之谣不可信，这是汉奸放的空气。（乙）你应对外表示八路拥护阎长官抗日建国一如往昔，但希望旧军停止进攻新军，双方和解，以利抗日。”

《新民主主义论》

1940年1月9日，毛泽东出席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作题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的长篇演讲。这篇演讲，经过修改、补充而成文，于1月15日完稿，2月15日在延安出版的《中国文化》创刊号上发表，题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2月20日出版的《解放》第九十八、九十

九期合刊也刊载了这篇文章，题目改为《新民主主义论》，文内各部分加上了小标题。建国后，《新民主主义论》编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

毛泽东在文章中分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特点及其基本矛盾后指出：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第一步是民主主义的革命，第二步是社会主义的革命，这是性质不同的两个革命过程。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划分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任何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就不再属于旧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范畴，而是属于新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即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也即新民主主义革命。它按其社会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但又是为社会主义的发展扫清更广阔的道路。因此，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历史进程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本质特点的论述，揭穿了国民党顽固派宣扬“基马尔主义”的阴谋，也打破了民族资产阶级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幻想。毛泽东还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纲领，勾画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蓝图，指出：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们联合专政的民主共和国”，国体是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政体是民主集中制。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实行“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归这个共和国的国家所有”，国营经济“是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力量，但这个共和国并不没收其他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一定要走‘节制资本’和‘平均地权’的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其具体内涵就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

1939 年年底，毛泽东曾致信吴玉章，请吴阅读待发表的《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一文，并提出修改意见。

1940 年 1 月 21 日，毛泽东写信给周扬：“文章虽算写好了，但还待汇集意见加以最后修改，还得两三天才能将最后修正稿交你付印，累你等得太久了！现送上初稿一份，请加审阅、指正、批示，并

退我为盼!”

1月23日,毛泽东又写信给周扬:“我的感冒还未好,字还要等两天才能写好送来。兹先将文章送上,请付印,清样打好后,请给我自己校对一次。你对此有何意见,仍请阅示,以便校对时修改。前送上的那一份,仍请退还。”

1956年3月14日,毛泽东在会见外宾的一次谈话中,针对《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从1919年五四运动开始的观点说:“《新民主主义论》初稿写到一半时,中国近百年历史前八十年是一阶段,后二十年是一阶段的看法,才逐渐明确起来,因此重新写起,经过反复修改才定了稿。”

1958年9月2日,毛泽东在同巴西记者马罗金和杜特列夫人谈话时,对《新民主主义论》中的一个观点作了修正。这个观点是:处在今天的国际环境中,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任何英雄好汉,要就是站在帝国主义战线方面,变为世界反革命力量的一部分;要就是站在反帝国主义战线方面,变为世界革命力量的一部分。二者必居其一,其他的道路是没有的。毛泽东指出:事实上,这种观点只适合于一部分国家。对于印度、印度尼西亚等国家却不通用,它们是民族主义国家。拉丁美洲也有许多这样的国家。这些国家既不站在帝国主义的一边,也不站在社会主义的一边,而站在中立的立场,不参加双方的集团,这是适合于它们现时情况的。

没有经济工作人员便没有饭吃

1940年1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在讨论1940年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问题时,毛泽东发言指出:我党过去的财经工作是有成绩的,特别是中央苏区。没有财政经济工作所造成的物质基础,要战胜敌人是不可能的。毛泽东发言阐述了财经工作中必要与可能、统一与独立、自力更生与争取外援、经济生产运动的政治与经济的意义等问题。毛泽东说:在一定意义上,没有经济工作

人员便没有饭吃，所以总务处长是第一个英雄。他还说：对边区的公粮征收，要注意积蓄力量，不要一次征光，羊毛不能一次抽光了。动员人力也要如此。

3月22日下午，毛泽东出席中共中央秘书处召集的中央直属机关学校在职财政经济及各种技术工作干部会议，并在当天的晚会上作演讲，说召开这次会议，是向埋头苦干与艰苦奋斗的财经工作干部、技术工作干部表示慰问和敬意。

毛泽东非常担心各根据地财政经济工作还没有做好。4月11日，他在给彭德怀的电报中说：全国18个根据地工作，最差最无秩序最未上轨道的是财政经济工作，许多重要工作都接受了苏维埃时期的教训，独财经工作至今没有接受过去的教训，如不速加注意，必遭破产之祸。

新四军主要出路在江北

1940年1月，项英主持召开东南局和新四军军分会联席会议，决定新四军在遇急变时向浙闽方向发展，并把这个情况报告中央。1月5日，毛泽东起草中共中央书记处致项英电，指出："(甲)如遇急变不能向北，当然只有向南，你的决心是对的。(乙)陈毅仍应力争江北。(丙)蒋介石投降还不是马上的事，你们还来得及准备，但是内部秘密准备，不要露形迹。(丁)努力争取一切军队的同情者。(戊)一切自力更生，不要靠任何外援。"

毛泽东只同意在遇急变不能向北，只能向南的情况下，皖南的新四军向南，但陈毅部队必须力争江北。1月29日，毛泽东同王稼祥在致项英、叶挺的电中，即明确提出："你们主要出路在江北，虽已失去良机，但仍非力争江北不可。""须秘密准备多数渡口，为紧急时用。"

为保证中央路线在新四军的贯彻实行，3月19日，毛泽东起草了同王稼祥、谭政致新四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的电报，指示他：

望以后多打电报，汇报新四军在政治工作的各方面如何保证中央路线的实行情况。

4月3日，毛泽东对新四军的出路问题还是不放心，他在致项英的电报中，再次询问新四军军部及皖南部队在被国民党军袭击时是否有冲出包围、避免重大损失的办法，其办法是以向南打游击为有利，还是以向东会合陈毅为有利。毛泽东特别询问渡江向北是否已绝对不可能，党内干部是否已有应付可能遭到袭击的精神上的充分准备。

声讨汪精卫

1940年2月1日，毛泽东出席延安民众声讨汪精卫大会，并发表题为《相持阶段中的形势与任务》的演说。这篇演说在建国后编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时，改题为《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反对反共顽固派》。

汪精卫集团于1939年12月30日于日本秘密签订了旨在出卖民族利益的《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1940年1月，这件事被揭露后，中共中央于1月28日发出由毛泽东起草的《克服投降危险，力争时局好转》的党内指示，指示各地应普遍举行民众大会，掀起全国反投降、反汉奸、反磨擦的热潮。于是，延安民众声讨汪精卫大会于2月1日召开。

毛泽东在演说中首先指出，我们延安的各界人民今天在这里开会，为了什么呢？为了声讨卖国贼汪精卫，又是为了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反对反共顽固派。接着，毛泽东列举了日汪反共，利用国民党内部的顽固派，到处放火的行径："在湖南就闹平江惨案，在河南就闹确山惨案，在山西就闹旧军打新军，在河北就闹张荫梧打八路军，在山东就闹秦启荣打游击队，在鄂东就闹程汝怀杀死五六百个共产党员，在陕甘宁边区就闹内部的'点线工作'、外部的'封锁工作'，并且还准备着军事进攻。此外，又逮捕了一大批进步青年送进

集中营；又雇请玄学鬼张君劢提出取消共产党、取消陕甘宁边区、取消八路军新四军的反动主张，雇请托洛茨基分子叶青等人做文章骂共产党”。毛泽东在驳斥要取消陕甘宁边区的谬论中，提出了陕甘宁边区有十大好处的著名论断：“陕甘宁边区是全国最进步的地方，这里是民主的抗日根据地。这里一没有贪官污吏，二没有土豪劣绅，三没有赌博，四没有娼妓，五没有小老婆，六没有叫化子，七没有结党私营之徒，八没有萎靡不振之气，九没有人吃磨擦饭，十没有人发国难财”。毛泽东接着说：“为什么要取消它呢？只有不要脸的人才说得出不要脸的话”。毛泽东驳斥了国民党顽固派借统一之名，行取消共产党之实的假统一，提出共产党以抗战、团结、进步为基础的统一论；强调指出在目前形势下共产党的根本方针是，决不悲观失望，力争时局的好转，挽救时局的逆转。

大会还一致通过了毛泽东为大会起草的声讨汪精卫的通电，通电提出全国讨汪、加紧团结、厉行宪政、制止磨擦、保护青年、援助前线、取缔特务机关、取缔贪官污吏、实行《总理遗嘱》、实行三民主义等10项要求。建国后，这篇通电以《向国民党的十点要求》为题，编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

自然科学是人们争取自由的一种武装

1940年2月5日，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召开成立大会，毛泽东出席并讲话。他说：自然科学是很好的东西，能解决衣、食、住、行等生活问题。“自然科学是人们争取自由和一种武装。人们为着要在社会上得到自由，就要用社会科学了解社会，改造社会，进行社会革命；人们为着要在自然界里得到自由，就要用自然科学来了解自然、克服自然和改造自然，从自然里得到自由”。“马克思主义包含有自然科学，大家要来研究自然科学，否则世界上就有许多不懂的东西，那就不算一个最好的革命者。”

3月10日，毛泽东出席八路军后方技术干部及技术部门政治

干部座谈会并讲话，再次提出技术工作对革命的重要意义，发扬技术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和提高他们地位的必要性，并谈到党对技术干部的关心等。

设晚宴款待西北摄影队

国民政府军委政治部三厅领导的中国电影制片厂西北摄影队，为拍摄阳翰笙的名作《塞北风云》路经延安。1940 年 2 月 15 日，毛泽东同朱德设晚宴款待西北摄影队。席间，毛泽东询问大家在国统区的生活、工作、学习情况，并说："大家一路辛苦了，到延安来很不容易呀，多住几天，去延安各方面看看"。最后很感兴趣地听了摄影队摄制组导演兼领队应云卫介绍《塞上风云》的内容和拍摄计划。毛泽东听后非常满意地说：我们目前正是要动员一切力量起来争取抗战的胜利，应当动员蒙族、回族及其它少数民族人民。在民族自决和自治原则下，共同抗日。《塞上风云》这部电影较好地体现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精神，是一个很有意义的题材，我祝你们大家工作顺利，在塞外的风云中锻炼得更坚强；不要忘了和蒙族兄弟交朋友，向他们学习；你们要为中华民族的文化事业做出贡献。毛泽东还为摄影队题了词："抗战、团结、进步"。

上海青年画家沈逸千也应邀出席了晚宴。在晚宴上沈逸千为毛泽东画了一幅速写像，毛泽东很高兴地在速写像上签名留念。

和平解决晋西事变

1940 年 2 月的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就山西问题发言指出：现在山西的形势是八路军、阎锡山、中央军三大力量的斗争。我们的方针以保持原有力量为好，维持三角鼎立的形势为好。新旧军已经不能再打了，今后是僵局或是和平，我看僵局是过渡的阶段，和是确定了的。关于谈判问题，毛泽东建议派八路军后方留

守处主任萧劲光和中共华北、华中工作委员会秘书长、八路军副参谋长王若飞二人为代表，谈判的方针是新旧军互不处罚为好。

为和平解决晋西事变，2月23日毛泽东指示贺龙、关向应："以后对外立词，请注意和缓些"。"你们准备派两个团向南行动，现不适宜，谅已停止，如未停止请即设法停止，退回来，但晋西游击战争仍应积极发展"。同一天，毛泽东起草了给阎锡山的信，表示愿意和平解决山西的磨擦事件，并告知派萧劲光、王若飞前往谈判。在萧劲光、王若飞离开延安时，毛泽东对他们说：你俩去给阎锡山讲清楚，我们共产党是诚心实意要同国民党合作抗日嘛，你们为什么要同室操戈，制造磨擦，杀人掠地，让日本强盗高兴呢？抗战初期，你阎锡山同我们合作得还可以嘛，为什么现在又跟着蒋介石的指挥棒转，同我们过不去呢？萧、王两人持毛泽东给阎锡山的这封信于2月25日到达秋林镇，开始同阎锡山谈判。

为使谈判能顺利进行，2月24日毛泽东同王稼祥致电贺龙、关向应、林枫、赵林等，指示新军部队绝对不应该编入八路军，应注意巩固新军干部的团结。毛泽东还指出，晋西北施政大纲六项，没有提到坚决实行阎锡山的十大纲领，是一个大缺点。

3月4日，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党政联席会议上讲到磨擦问题时指出：共产党对任何国民党军队不放第一枪，但你放第一枪，我就放第二枪。现在国共之间是大和小打，大团结小磨擦，还不是放着日本不打到处反共的那个时候。

3月5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起草致朱德、彭德怀、杨尚昆等并告新军各领导人电，通报萧劲光、王若飞同阎锡山谈判的经过和今后对阎的革命政策。电报说：萧劲光、王若飞在秋林镇住4天，受到极大欢迎，谈判是成功的。电报继而指出今后我们的基本政策是，继续团结阎锡山，巩固山西旧军力量在阎的指挥下，保存阎在吕梁山的地盘，恢复新军和阎的指挥隶属关系，以利华北和西北的抗战。电报还说，为保证此种政策的实现，双 方商定划区作战的条件是：在晋西以汾（阳）离（石）公路为界，在公路以

南，准备停止游击战争；在晋东南以临（汾）屯（留）公路为界，八路军及新军不向路南发展。

同一天，毛泽东在另一封指示电中指出目前要尊重阎锡山的一定地盘，是因为要彻底打击蒋介石消灭阎系取而代之以便直接反共的恶毒政策。所以极力争取阎系一切人员，使他们团结成为一个中间单位；保存这个国共之间的中间力量，对于抗战与国共合作是大有利益的。同日，毛泽东还指示王震：靠近榆林的米脂及佳县地区暂时不要边区化。在何绍南走后，你的态度要放和缓些，十分注意不要失去中间派绅士的同情。

毛泽东在考虑和平解决晋西事变的同时，还考虑到反磨擦的武装斗争在西北、华北的主要的地区，有暂时告一段落之必要与可能。3月5日他在给彭德怀的电报中指出："我们方面，目前任务是在主要地区求得对内和平，以便在半年之内集中力量巩固已得阵地。"他说，实现对内和平的步骤，重心是争取使蒋介石、阎锡山、卫立煌承认军渡、汾阳、临汾、屯留、壶关、林县、漳河、大名一线为双方作战地界，在此线以北的国民党军向南调，在此线以南的我军向北调；而重心的重心又在朱怀冰退出磁县、武安、涉县及承认壶关、林县为我驻军地区。

3月20日，毛泽东在同王稼祥致朱德、彭德怀、杨尚昆等的电报中指出："山西河北两省反磨擦行动，全部告一段落，在此期间内，偃旗息鼓，一枪不打，向一切国民党军队表示友谊，求得恢复感情，推动时局好转"。

促进和争取新民主主义宪政的实现

国民参政会于1939年9月举行的第四次会议，通过要求国民政府明令定期召开国民大会实行宪政的决议。同年，国民党五届六中全会作出了于1940年11月12日召集国民大会的许诺。为揭露蒋介石玩弄宪政的骗局，给人民指明争取民主自由的方向，毛泽东

在这一时期参加了延安一系列的宪政活动。

1940年2月19日，毛泽东出席延安青年宪政促进会成立大会并讲话。他指出：新民主主义的宪政就是中国人民大众的宪政。打日本需要青年，参政也需要青年，青年应是宪政运动的先锋队，延安青年要推动全国青年起来为促进宪政运动而奋斗。

2月20日，毛泽东出席延安各界宪政促进会成立大会，以《新民主主义的宪政》为题发表了演说。他指出：抗日和民主这两件事，是目前中国的头等大事。中国缺少了两件东西，多了两件东西：少了独立和民主，多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现在我们全国人所要的东西，主要的是独立和民主，同时，我们要破坏帝国主义，要破坏封建主义。把独立和民主合起来，就是民主的抗日，或叫抗日的民主。没有民主，抗日是要失败的。我们现在要的是民主政治，是新民主主义的宪政，即几个革命阶级联合对汉奸反动派的专政。而蒋介石所说的宪政，是挂宪政的羊头，卖一党专政的狗肉。应当动员人民大众起来，促进和争取新民主主义宪政的实现。会议还通过了由延安各界宪政促进会理事长吴玉章、理事毛泽东等联合署名的宣言，向全国提出关于宪政的四项意见。

3月4日，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党政联席会议上讲话。当提到宪政问题时，毛泽东指出：要揭破国民党顽固分子搞假宪政的阴谋，我们要搞真宪政，真民主。

3月24日，毛泽东出席陕甘宁边区工人宪政促进会成立大会，他在讲话中号召边区工人为争取宪政而奋斗。

抗日民主政权的“三三制”

1940年1月28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目前时局的指示，指示要求全党不要把各地发生的投降、反共、倒退等严重现象孤立起来看，应认识其严重性，并坚决反抗，不要被这些现象的威力所压倒。同时还强调全党应看到目前国内国际尚存在许多有

利于我们争取继续抗战、团结、进步的客观条件。指出:“力争时局好转,同时提起可能发生突然事变(在目前是局部、地区性的突然事变)的警觉性,这就是党的目前政策的总方针。”

在这个总方针下,同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的给北方局、山东分局等电报中指出:“只有扩大发展革命武装力量以与全国工作相配合,才能制止投降与反共,才能巩固统一战线,才能争取时局好转”。而“要建立这样大的武装力量,没有政权是不行的”,“要使干部明白,没有伟大革命武装与伟大革命根据地,抗日胜利是不可能的。”

毛泽东为此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时局与党的任务的决定》,该决定在1月31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被讨论通过,决定提出了力争时局好转的十大任务,其中第七条便是巩固与扩大各个抗日根据地,建设几个革命阶级联合的民主专政的抗日政权。关于抗日民主政权的性质问题,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指出,目前华北的抗日政权还不是工农小资产阶级政权,而是抗日民主政权,是几个阶级联合的政权。中共中央的这个决定于2月1日发出。同时还发出《中央关于抗日民主政权的阶级实质问题的指示》。

3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由毛泽东起草关于政权问题的指示。同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抗日根据地的政权性质》的党内指示,正式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权在人员构成上实行“三三制”。指示说:“在抗日时期,我们所建立的政权的性质,是民族统一战线的这种政权,是一切赞成抗日又赞成民主的人们的政权,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汉奸和反动派的民主专政。”“根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的原则,在人员分配上,应规定为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三分之一。”指示还强调,在政权建设上,应力避过右和过左的倾向,必须保证共产党员在政权中占领导地位,但目前更严重的是忽视争取中等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的“左”的倾向。

《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

1940年3月11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提议目前拟采取和平攻势策略问题，他说：山西新旧军的斗争，我们失去11个县，但得到晋西北及新军全部，并使阎锡山中立。现在各处磨擦已处在一种新的形势，我们要采用和缓些的政策，军事上实行休战，政治上实行和平攻势。

同一天，毛泽东在延安党的高级干部会上作《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报告。他根据反磨擦斗争特别是打退第一次反共高潮的经验，指出："抗日战争胜利的基本条件，是抗日统一战线的扩大和巩固。而要达此目的，必须采取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的策略，这是不可分离的三个环节，而以斗争为达到团结一切抗日势力的手段"。"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关于争取中间势力，毛泽东指出："就是争取中等资产阶级，争取开明绅士，争取地方实力派。这是不同的三部分人，但都是目前时局中的中间派。""争取中间势力是我们抗日统一战线时期的极严重的任务，但是必须在一定条件下才可能完成这个任务。这些条件是：(1)我们有充足的力量；(2)尊重他们的利益；(3)我们对顽固 派作坚决的斗争，并能一步一步地取得胜利"。"在中国，这种中间势力有很大的力量，往往可以成为我们同顽固派斗争时决定胜负的因素，因此，必须对他们采取十分慎重的态度"。毛泽东在报告中还阐述了同顽固派斗争的自卫原则、胜利原则和休战原则，即有理、有利、有节的策略原则。

决不能把中央军看成都是顽固派

毛泽东在《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的报告中指出："顽固派，目前就是大地主大 资产阶级的势力。这些阶级，现在分

为降日派和抗日派，以后还要逐渐分化”。不久，毛泽东就把中央军又从顽固 派中分化出来。

1940 年 3 月 14 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书记处和中央军委起草的致朱德、彭德怀等的电报中指出：反磨擦斗争必须注意自卫原则，不应超出自卫的范围。如果超出这个范围，则对全国的影响和统一战线是很不利的。毛泽东在此处特别提出“尤其对中央军应注意此点，因国共合作主要就是同中央军的合作”。

3 月 25 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书记处及中央军委起草的指示中明确提出：“应使干部明白，所谓国共合作，主要就是同中央军合作，我全体干部在加强对一切军队的团结说服工作中，要特别着重对中央军的团结说服工作”。

4 月 11 日，毛泽东在致彭德怀的电报中提出，今后统一战线应有更广泛的开展，而中心点是争取国民党政府的 200 万军队。

4 月 12 日，毛泽东同王稼祥电示朱德、彭德怀：同意武安、涉县由卫立煌派县长，向卫再让一步。目前应力争八路军和中央军的和好团结。并嘱朱总能否与卫立煌一晤。同一天，毛泽东起草致朱德电报，告以见卫立煌谈话中心，在于强调团结抗战，缓和中央军中一部分顽固派的反共空气，向他们声明，只要中央军不打八路军，八路军决不打中央军。同一天，毛泽东还起草了致陈光、罗荣桓、彭雪枫、刘少奇等的电报，指出：当地方实力派进攻时，八路军、新四军应在不防害自己根本利益条件下，先让一步，求得妥协；当他们不顾一切向我进攻，防害我之根本利益时，应对其一部进行坚决打击，作为警告，然后求得妥协。只有中间派转变成了坚决的不可变化的顽固派，才采取完全决裂、彻底消灭的政策。毛泽东强调：国民党中央军来进攻时，八路军、新四军也应同样采取上述方针，决不能把中央军看成都是顽固派。

皖南新四军速移苏南为宜

1940年4月9日，项英在致毛泽东的电报中，答复毛泽东4月3日来电询问皖南部队是否已作好应付突然事变的准备的问题。项英说，对袭击已有相当准备，但损失不可免。关于突围方向，项英说："向南，为黄山、天[目]山，纯石山，人少粮缺；靠江，则须经过敌友之间，极不利；渡江，绝对不可能，敌在长江封锁更严，江北桂军已密布江边。""向东，某方已有布置，须冲过两道封锁，经过几次战斗，才能与陈支会合。到苏南，地区不利，处在敌友夹击，地区狭小。只有在广德、宁国一带坚持，继续战斗。"

4月21日，陈毅、粟裕等致电中共中央，建议皖南部队东移 苏南，电报说："苏南为解决人、枪、款良好地区。皖南则地形好，为向苏浙赣发展战略要点。但目前坚持力量不够，应先放弃皖南，集中全力发展苏南，直到海边。"

4月26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致电项英、陈毅并告刘少奇、张云逸，指出："皖南军部以移苏南为宜"。毛泽东在4月29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就目前应 采取上山还是下山的问题说，现在一切偏僻地方都成为国民党的地区，我们不要上山，而要下水，深入敌后活动。

4月28日，陈毅致电毛泽东、王稼祥，建议皖南、苏南新四军合并，认为"合则两利，否则两面孤军，而且目前主要发展方向是向苏南"，"军部东移领导力量增强，干部加多，且可控制主力在手中以应付事变，并提高质量，故为比较稳当政策。"

5月4日，毛泽东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起草中央关于在抗日战争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对东南局及新四军的指示，强调应坚决执行中央多次提出的方针，向一切敌人占领区域发展，不受国民党的限制，独立自主地放手扩大军队，坚决地建立根据地。

5月5日，毛泽东起草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新四军兵力部署问题致项英、陈毅电，指出：一、同意新四军军部、后方机关及皖南主力移至苏南，但皖南阵地仍须坚持并发展。二、新四军一、二、三支队主力的主要发展方向不是在溧阳、溧水、郎溪、广德等靠近中央军的地区，而是在苏南、苏北广大敌人后方直至海边的数 十县，尤其是长江以北的地区。三、应在吴淞口至南京之间及芜湖以西长江两岸控制多数渡口，务不使被切断渡江交通。四、速令叶飞在长江北岸扩大部队，建立政权。

但是项英对速移苏南的部暑犹豫不决，6月12日项英在致中共中央的电中说："军部移动已停滞。如自加移动，因由皖[南]至苏南中间地区在两河之间，彼方军队已布置，须两日半行程才能通过，加以这段地区地方工作最差，很可能为彼方借词进攻。这一带作战极不利，故目前只有作待机移动。"这样，中央关于皖南新四军速移苏南的部署被拖下来了，一直没有落实。

指示项英坚决执行中央关于发展华中的方针

国民党军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于1940年4月间多次提出要江北新四军全部南调，并要新四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到上饶谈判，4月中旬，袁、顾谈判开始。4月14日，项英向中共中央提出将江北新四军全部南调的意见。16日，中央军委复电项英，指出江北部队不应南调，应配合八路军向苏北发展。同日，项英又致电中共中央："袁到上饶正求缓和，以我估计，江北部队不南调，冲突仍不免，全国局势日益恶化，我主张将近调之叶张两团（指叶飞领导的新四军第一支队原第六团和张道庸领导的新四军第二支队原第四团）全部急返江南，以应大事变。"20日，中共中央又致电项英，指出：蒋介石、顾祝同的阴谋是想把新四军江北、江南部队全部集中到苏南敌后狭小区域，隔断八路军与新四军之联系，尔后在适当时机消灭新四军。同时还强调指出：皖北、皖东、淮南、苏北是我军

在全国最重要的战略地区之一，是击败蒋介石把八路军、新四军全部困在敌后，消灭新四军之阴谋的重要斗争地区。因此，在与顾祝同的谈判中，绝对不能答允四、五支队和叶、张两团南调。叶、张两团及苏北部队均暂归中原局指挥，调动应依照中央的电令。至于江南部队如何部暑，可视情况自行决定。

为使项英坚决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毛泽东于5月4日，为中共中央起草了给南东局的关于在抗日战争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的指示（简称“五四”指示，建国后编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时题目改为《放手发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顽固 派的进攻》）。指示强调指出：在一切敌后地区和战争区域，应强调同一性，不应强调特殊性，否则就会是绝大的错误。不论在华北、华中或华南，不论在江北或江南，不论在平原地区、山岳地区或湖沼地区，也不论是八路军、新四军或华南游击队，虽然各有特殊性，但均有同一性，即均有敌人，均在抗战。因此，我们均能够发展，均应该发展。所谓发展，就是不受国民党的限制，独立自主地放手扩大军队，坚决建立根据地，在这种根据地上独立自主地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政权，向一切敌人占领区域发展。同时明确指出，由于国民党顽固派坚持执行防共反共限共政策，“我们应强调斗争，不应强调统一，否则就会是绝大的错误”。斗争是克服投降危险、争取时局好转、巩固国共合作的最主要的方法，是应付可能的全国性的突然事变的正确方针，当然这种斗争应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指示要求东南局和新四军军分会诸同志讨论中央的这一策略指示，并传达到党和军队的全体干部，坚决执行。

不能把顽固派当作汉奸打

朱德于1940年5月26日从前线回到延安。5月27日，毛泽东出席延安各界在中央大礼堂举行的欢迎朱德从抗日前线回到延安的晚会。

5月29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听取朱德关于国共磨擦的报告。朱德在报告中说，从打退国民党这一次反共磨擦中，我们得到一个大的教训，这就是争取中间力量是非常重要的。他在报告中还提出，对顽固 势力我们也要争取。毛泽东非常同意朱德的意见，他在会上发言说，朱总报告说得很对，我们还要争取中间势力，对顽固势力也要争取与分化，即使打了他们，也还要争取他们。不能把顽固派当作汉奸打，把中间派当作顽固派打。目前顽固派势力削弱，中间派的势力增大，要争取中间势力，就必须有统一战线的办法，如实行“三三制”的政权等，同时在理论上也要多作说明。

6月10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讨论怎样纪念“七七”抗战三周年，会议提出中央准备发表纪念宣言，并发一个指示，政治局的同志都要写纪念文章等。毛泽东在谈到写纪念文章时指出，要解答一些实际问题，例如政权问题，应当公开说明“三三制”问题，说明只有统一战线政权才能争取中间力量。目前党内错误倾向主要是“左”倾，表现在政权问题、土地问题、群众工作等方面，要发一个中央关于纠正“左”倾错误的指示。

7月7日，根据中央政治局会议的精神，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政策的决定。决定指出，必须纠正在执行统一战线政策中的“左”倾错误，一年以来在反磨擦斗争中发生了许多“左”的错误，主要是：在军事斗争中有些地方没有坚持自卫原则；乱打汉奸；财经工作中侵犯商人财产，滥罚款滥征税；在政权问题上不执行“三三制”政策；对顽固分子上有斗争没有团结，甚至把顽固分子看作汉奸，把中间分子看作顽固分子等。

会见茅盾

作家茅盾携全家由新疆到西安，1940年5月24日随朱德总司令的军队从西安出发，26日抵达延安。27日，延安各界在中央礼堂举行晚会，欢迎朱总司令、茅盾等。毛泽东出席欢迎晚会，他和茅

盾等一一握手问好，并一起坐在第一排的长凳上，观看了鲁艺演出的《黄河大合唱》。

28日，毛泽东在杨家岭的窑洞里接待前来探望的茅盾。茅盾谈了在新疆一年的经历，并把赵丹托付他帮助他们离开新疆的事，向毛泽东讲了。毛泽东让茅盾找李维汉想想办法。

6月初的一天，毛泽东到陕甘宁边区政府交际处看望茅盾，交谈甚久，一起用了便饭。毛泽东把一本刚出版的《新民主主义论》送给茅盾，并与茅盾畅谈中国古典文学，对《红楼梦》一书发表了许多精辟的见解。毛泽东问到茅盾今后的创作活动，建议他搬到鲁艺去。毛泽东说：鲁艺需要一面旗帜，你去当这面旗帜罢。茅盾忙说，旗帜我不够合格，搬去住我乐意，因为我是搞文学的。当看到毛泽东烟抽得很厉害，劝毛泽东戒烟时，毛泽东幽默地说：戒不了啰，前几年医生命令我戒烟，我服从了，可是后来又抽上了。看来，在这个问题上，我是个顽固分子。

后来，大约是7月间，茅盾已经搬到鲁艺，毛泽东又把茅盾接到杨家岭长谈了一次。这一次毛泽东和茅盾谈的是30年代上海文坛的斗争以及抗战以来文艺运动的发展。

9月下旬，茅盾按照党的安排要去重庆工作，家眷包括两个孩子暂时留在延安。临行时他去杨家岭向毛泽东辞行，毛泽东风趣地对茅盾说：你现在把两个包袱扔在这里，可以轻装上阵了。

会见陈嘉庚

南洋华侨领袖、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主席、国民参政员陈嘉庚发起组织的“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视察团”于1940年2月在新加坡正式成立。陈嘉庚作为南侨总会主席，亲率慰劳团回国。

慰劳团在重庆逗留期间，受到中共驻渝办事处的热烈欢迎。在欢迎茶会上陈嘉庚询问：“若往延安，交通是否方便，行程如何？”叶剑英一一奉告，并说到西安后可到八路军十八集团军办事处联系，

一切方便。事隔两天，陈嘉庚便接到毛泽东来电，邀他前往延安会晤。

5月31日下午5点多钟，陈嘉庚一行到达延安，受到5千多群众的热烈欢迎。第二天下午，毛泽东在杨家岭会见陈嘉庚，并与他亲切交谈。陈嘉庚首先表明海外华侨希望国共两党加强团结、一致对外的意愿。他对共产党进行反磨擦斗争不理解，他认为在国共两党关系的问题上，共产党应多做让步，要以团结求团结。毛泽东耐心向他解释：因为国民党中的顽固派企图消灭我们，他们日思夜想的是扫除共产党这个障碍，以便毫无顾忌地投降日寇。所以，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我们只有对他们的进攻给以适当的还击，才能使他们承认进步势力及各抗日党派、团体的地位，不敢轻易地同敌人妥协，不敢轻易发动全面内战。我们的政策是以斗争求团结。若以团结求团结，不但团结搞不成，进步势力会横遭摧残，统一战线也必将破裂，全国将重新陷入内战之中，还会亡党亡国。毛泽东还说：我们承认国民党是第一大党，拥护蒋委员长是全国抗战的领袖，拥护中央政府的领导。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是三民主义，组织基础就是国共两党，二者失去了任何一方，统一战线都不能设想。因此，我们的总方针是团结，但是只有在进步的基础上才能达到真正的团结。最后，毛泽东请陈嘉庚把共产党团结抗日的诚意转达蒋介石，并表示共产党将不负海外侨胞的愿望；希望陈嘉庚回南洋后，向海外侨胞据实报告在延安的见闻。陈嘉庚一一答应。谈话后，毛泽东设晚宴款待陈嘉庚等。宴会后，毛泽东还陪同陈嘉庚等出席延安各界举行的欢迎晚会。

6月4日下午，毛泽东到陕甘宁边区政府交际处看望陈嘉庚，这一次交谈到夜里10时左右。毛泽东告辞陈嘉庚后，又来到住在隔壁房间陪同陈嘉庚来延安的国民党某科长的住处，同他交谈到深夜。对此，陈嘉庚感触尤深，认为共产党的主席竟与国民党的一个科长“长谈若是”，“足见其虚怀若谷”。

陈嘉庚一行在延安进行了实地参观、访问，并与从集美、厦大

和南洋来到陕北参加革命的青年交谈，了解了延安的政治、军事、经济和民生。6月8日，陈嘉庚一行离开了延安。以后陈嘉庚每谈起延安之行，总是很兴奋。他说："我未往延安时，对中国的前途甚为悲观，以为中国的救星尚未出世，或还在学校读书。其实此人已经四、五十岁了，而且做了很多大事了，此人现在延安，他就是毛主席。"

出席延安新哲学会第一届年会

延安新哲学会，是在毛泽东倡导下于1938年夏秋之际成立的。1940年6月21日下午，延安新哲学会在文化俱乐部举行第一届年会首次会议。毛泽东、张闻天、朱德、茅盾、艾思奇、张仲实等50余人参加。这次会，是为了总结研究新哲学的经验，交流研究成果，明确研究任务，提高研究水平，进一步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会期原计划开3个月，但并不是每天都开，规定每星期开会一次，由会员报告研究成果。

毛泽东在年会首次会议上讲话。他说：今天开这个会，我心里很高兴。回想前年开新哲学会成立会的那一天到现在，已两年了，工作有了成绩，今年开过了这个年会以后，一定会更好。理论这件事是很重要的。中国革命有了许多年，但理论活动仍很落后，这是大缺撼。要知道革命如不提高革命理论，革命胜利是不可能的。过去我们注意的太不够，今后应加紧理论研究。现在人们的条件比过去好了，许多文化工作者与哲学家都会聚在这里。必须承认现在我们的理论水平还是很低，全国的理论水平还是很低，大家才能负起克服这种现象的责任。我们要求全国在这方面加以努力，首先要求延安的人多多努力。年会开了以后，新哲学的前途是光明的。

会议由何思敬致开幕词，艾思奇报告会务工作。张闻天、朱德、还有郭化若、张仲实等都相继在会上发了言。首次会议开得严肃活泼，从下午4点半开到了7点半。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在延安西北

饭店，用他的稿费，摆了几桌简单的酒菜，请代表们吃晚餐。毛泽东首先举杯庆祝新哲学会年会的召开和成功，号召大家积极学习马列主义新哲学，把传播新哲学的活动进一步推广扩大。他走到每一桌去敬酒，和每个代表碰杯，大家受到了很大的鼓舞。

法国投降后谈形势

1940年5月14日，德军进攻法国色当、马奇诺防线。英军赴法抵抗。26日英法联军开始了敦刻尔克大撤退。6月22日，法国贝当政府的代表在希特勒强加的停战书上签字，法国正式投降。

6月26日、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连续两天召开会议。毛泽东在26日的会议上作“关于目前形势的估计”的报告，他指出：法国投降与英国失败，造成了两个对立的帝国主义阵线之间的极大的不平衡状态。这一形势，一方面将促进德意帝国主义扩大战争胜利的贪欲，促进日本帝国主义加紧进攻中国与侵略南洋的野心，另一方面，又将促进英国帝国主义加紧武装起来走上战争的轨道。目前帝国主义营垒中的形势是：一方面——德、意、日扩大战争，一方面——美国、英国及法国不得不对抗德、意、日。毛泽东指出：中国目前处在新的环境中，主要是：“从英、美、法方面发动的东方慕尼黑危险，已经不存在了，或至少可以说很大地减少了”，“中国投降危险的主要来源，已由英、美、法移至德、日、意，而日本是策动中国投降的最主要的外来力量”。共产党力量的发展，是迫使国民党主体“既不能投降又不能剿共”的最主要的国内因素。同时国民党党内与党外存在着的广大中间势力，还保存着更多的抗日积极性。总之，中国目前的抗战形势：一方面投降危险空前地增长了，一方面好转的因素亦增长了，总的形势是于抗战有利的。虽然即使能好转，目前大体上也必然还是一个拖的局面。

27日政治局会议讨论毛泽东的报告。讨论结束后，毛泽东作结论，讲了战争问题、革命问题、中国问题、党与非党问题等。会议

决定由毛泽东起草中共中央为抗战3周年纪念对时局的宣言。7月5日，毛泽东起草的对时局宣言在《新中华报》发表。宣言的中心思想是号召抗战到底，团结到底。同日，毛泽为纪念抗战3周年而作的《团结到底》一文在《新中华报》发表。文章指出："抗战的第四周年将是最困难的一年。我们的任务是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反对投降分子，战胜一切困难，坚持全国抗战。"

小诗无罪可以刊登

1940年，作家杨述在绥德编《陕北青年》时，写了一首《颂毛主席》的小诗。这首诗是：

一

陕北近年老鼠少，农民争说有大毛。
陕北年年闹旱荒，他老一到年成好。

二

演讲语并不惊人，大家听得味津津。
中国土生中国长，道地中国一平民。

三

从古无人比得上，他是中国的列宁。
千万人民齐爱戴，他和群众一条心。

四

平平常常书生貌，一颗勤劳大众心。
抗战恁都有法办，不论下雨与天晴。

五

主意出得不寻常，大事来临不发慌。
潇洒只缺鹅毛扇，慢条斯理写文章。

六

斯人运筹帷幄时，不知抽有几只烟？
斯人运筹帷幄后，不知是否已成眠。

绥德地区宣传部的领导同志认为这首诗贬低毛主席，不许刊登。杨述不服，将诗寄给毛泽东，请他看一下，予以批评。毛泽东看后认为，小诗无罪，可以刊登。

对中间势力成分的新补充

毛泽东在1940年3月11日延安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所作的《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报告中，把中间势力划为中等资产阶级、开明绅士、地方实力派三部分人。

7月7日，根据毛泽东在6月26日和27日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精神，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政策的决定》，决定扩大了中间势力的成分，指出这些还保存着抗战积极性的中间势力是：国民党的多数党员，中央军中的多数军官，多数的杂牌军，中等资产阶级，中小地主及开明绅士，上层小资产阶级，各抗日小党派。

7月6日，毛泽东在杨家岭大礼堂召开的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讲述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政策的决定》。毛泽东在讲述这个决定，分析中间势力还保存抗战积极性时指出："中间势力的成分现在比前次更有了新的补充，把国民党中央军的大部分也放在里面了。中间势力观念在党内尚未普遍，这是要注意纠正的。"

毛泽东在8月8日的政治局会议上，也谈到中间势力的问题。他说：中间势力的问题是一个中心问题，现在注意了中间势力，过去许多干部没有这种观念，不了解中国的阶级关系。

今后要重视国民党统治区域的工作

1940年7月16日，国民党提出一个"中央提示案"，主要内容是规定八路军、新四军的作战地境为冀察两省、鲁北及晋北一部。八路军、新四军应于奉命后一个月内全部开赴上述规定地区。27

日，周恩来携带国民党的“中央提示案”飞回延安。

7月30日、8月1日、4日、7日、8日一共5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听取周恩来关于统一战线工作的报告和南方党的工作报告。在8月8日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作长篇发言，讲政治形势和党的各项工作。

关于政治形势，毛泽东指出：国民党今后可能发展的方向是亲苏、和共、改良，但需要一个斗争过程。亲苏可能首先实现；和共问题，今后可能出现“大和小战”的局面，同时又可能是“外和内反”；要国民党改变政策，必须阶级关系发生变化，现在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不能照旧统治下去，是接近变化的时期。

关于党的各项工作，毛泽东指出：今后要重视国民党统治区党的工作，南方党的工作是带全国性的工作。南方党以巩固为主，但在没有党组织或党组织很少的地方发展还是必要的。其工作路线是普遍化，打入社会，肃清内奸，在国民党统治区党内要提出“打入社会”的口号。其经常工作有4项，即政治估计、组织问题、统一战线、文化工作。毛泽东最后指出：过去中央工作方向偏重军事和战区，对南方和日本占领区注意很少，今后政治局须用大力加强这方面工作。他提议中央今后注意力，第一是国民党统治区域，第二是敌后城市，第三是我们的战区。

中国处在大事变的前夜

1940年7月7日，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政策的决定》指出：“目前国际国内形势，都表示出我们是处在新的巨大变化的时期中。”“由于日本切断我西南国际通路并积极向正面进攻，企图用增大压力分裂中国内部，压迫中国投降，这样就使中国抗战局面亦处在新的环境中，空前的困难时期与空前的投降危险快要到来了。”

7月18日，英、日在东京正式签定关于封锁滇缅路的协定，协

定规定：自本日起对滇缅路实行封锁3个月，在10月18日以前的3个月，日本设法与中国成立“全面之和平”。

毛泽东在8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国际国内政治形势时指出：日本企图以截断中国西南交通迫使中国言和，而蒋介石没有外援将不能继续抗战，所以中国抗战有和平解决的可能。要准备这一年多是国际国内的大转变关头，中国处在大事变的前夜。我们在思想上要有各种准备。

中共中央于9月10日发出毛泽东起草的关于时局趋向的指示，指示说：“目前国际国内的政治情况，正处在剧烈变化的前夜，我党对这种变化，必须在精神上有所准备。”但是，党内对于时局的悲观估计与不耐烦情绪，显然是不正确的，我们必须在思想上组织上政治上军事上加速准备一切条件，一方面准备迎接时局好转，一方面又准备对付投降派的突然事变。

9月11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对他起草的关于时局趋向的指示作了说明，指出：应补充现在中国处在大事变的前夜。目前时局趋势有3个方向，一是维持现状，使抗战有利于大资产阶级；二是进步，在不损害大资产阶级利益前提下，对中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作部分的让步；三是投降，在重庆失守后中国将变为南北朝，会产生中国的贝当式的投降政府与汪精卫合流。我们的方针，是团结与争取进步派、中间派，分化顽固派，争取可能变化的顽固派，反对投降派，以争取时局的逐步好转，即亲苏、和共、政治改良的实现，再争取时局的彻底好转，即抗日统一战线政权的建立。毛泽东尤其强调：我们必须在政治上、军事上、思想上、组织上准备可能到来的突然事变，使我们在任何可能变化条件下都能应付。

百团大战是一次更大规模的反扫荡的战役反攻

1940年8月8日，八路军总部下达交通破袭战的《战役行动

命令》。8 月 20 日，交通破袭战开始。由于此役八路军参战兵力达 105 个团，20 余万人，所以史称“百团大战”。百团大战一共经历了三个阶段，至 12 月上旬基本结束。

9 月 11 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到百团大战，他说：关于百团大战，不要说是大规模的战役进攻，现在还只是游击性的反攻。

9 月 20 日，延安各界万余人隆重集会庆祝百团大战第一阶段（1940 年 8 月 20 日至 9 月 10 日）的胜利，毛泽东、朱德、张闻天等被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朱德等在大会上讲了话。

9 月 23 日，毛泽东在杨家岭作《时局与边区问题》的报告，提到对百团大战的估计问题。他说：百团大战是敌我相持阶段中一次更大规模的反扫荡的战役反攻。这是“一次”，因为以后还要有；“更大规模”，表示以前有过大规模的反扫荡，但这次更大；“反扫荡的战役反攻”，表示不是战略反攻。毛泽东还说：百团大战各地方都要干，要继续下去，同时要有防备顽固分子背后进攻的部署。

党外资本主义是要发展的

1940 年 9 月 25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毛泽东提出的关于陕甘宁边区工作问题。会议决定边区中央局组成人员的名单和由任弼时领导边区工作。

在讨论边区财政经济问题时，任弼时发言说：绥米专区由于实行合理负担，已收到两万石粮食，办法可行。他还提议：陕甘宁边区的军事工厂还是给工人发工资为好；边区发 300 万至 500 万纸币，作为扩大生产的资本，明年增加养羊 300 万头，以提高羊毛产量，发展羊毛纺织。毛泽东发言说：各个根据地的中心问题，都是经济问题。整个经济工作要实行自给的原则，边区要实行 65000 人的自给，要把经济建设当作党与民众团体整个工作的中心，边区党委和政府工作的中心。在我们自己的区域，在革命战争时期不能机械地

执行工人8小时工作制，不能无条件地增加工资。毛泽东提倡共同富裕，在党员中反对发财思想。他说：官富民富是对的，但在党员中不要提发展私人经济的口号。在党内反对贪污腐化、反对发财思想是对的。

毛泽东于9月23日在杨家岭作《时局与边区问题》的报告中，关于边区财 政经济问题指出：党外资本主义是要发展的。边区有4种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私人资本主义、合作社经济、半自足经济。毛泽东说：新的国营经济似乎像国家资本主义，因为我们的政权不但有无产阶级，还有农民，最近又有了商人和绅士。这是一种特殊的国家资本主义，与俾斯麦的、与列宁的都不同。毛泽东还说：私人资本主义要节制，但不是打击，更不是消灭，消灭限于党内。

催促皖南新四军军部速速渡江

自《中央提示案》发出后，国民党对长江南北新四军决定采取行动。1940年9月6日，在重庆的周恩来、叶剑英急电延安：确悉国民党军令部已向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发出“扫荡”长江南北新四军的命令。中共中央军委当日即将此情报转发中原局、新四军，并指出：请叶挺、项英、刘少奇准备自卫行动。“皖南尤须防备”。

此后，国民党军第九十二军军长李仙洲3个师准备东进援助韩德勤，桂军增加了进攻皖东的兵力，国民党军第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汤恩伯部准备进入豫东皖西，据西安消息，蒋桂军对华中的进攻是有决心的。9月19日，毛泽东同朱德、王稼祥致电彭德怀等，提出我们的对策是：以打击李仙洲为目的，望彭德怀、左权令八路军第二纵队司令杨得志率部南下，须于一个半月内到达彭雪枫地区，望陈光、罗荣桓令五旅迅即南下，不可再推迟，应于半个月内到达张爱萍地区。电报还指出：望叶挺、项英率部迅即渡江，应于两星期内渡毕，增援皖东。

9月22日，毛泽东关于对付蒋桂军攻击的部署致电叶挺、项

英，告以蒋桂军向我彭雪枫，张云逸地区攻击的时间约在下月中旬左右。那时我除令彭雪枫，张云逸以游击战争暂时支持皖东与淮北两地外，我苏北主力即须动手解决韩德勤。电报还提出，皖南部队及军部以在动手解决韩德勤之前移至苏南为有利，并询问准备情形如何，几天可以开完。

黄桥战役打响了，但皖南新四军仍没有移动。为此，毛泽东等于10月8日再电叶挺、项英，指出目前的形势是："蒋令顾、韩扫荡大江南北新四军，大江南北比较大的武装磨擦是可能的"。中央最担心，"最困难的是在皖南的战争与军部，我们意见军部应移动到三支地区，如顽军来攻不易长期抵抗时则北渡长江，如移苏南尚有可能，也可移苏南。"如"决心移皖北，则四支应派一部到无为接应"。电报指出："向南深入黄山山脉游击，无论在政治上、军事上都是最不利的。"

10月11日，项英关于新四军军部不能北移给毛泽东等答复电："依据各方形势与条件，军部北移困难，也不便移三支区域（地区太小，敌友进攻无法抗住），仍以军部所在地作基点较有利"。

10月12日，毛泽东同朱德、王稼祥就新四军行动方针再电叶挺、项英等，再次指出因蒋介石站在反日立场上，我们不能在南方国民党地区进行任何游击战争，曾生部队在东江失败就是明证。电报再次强调："军部应乘此时速速渡江，以皖东为根据地，绝对不要再迟延。皖南战斗部队，亦应以一部北移，留一部坚持游击战争"。

黄桥战役的胜利和苏北根据地的建设

黄克诚率领的八路军第五纵队南下阜宁、盐城地区准备增援新四军陈毅部反击韩德勤进攻。为此，毛泽东于1940年10月3日致电周恩来，指出我们的方针是："韩不攻陈，黄不攻韩；韩若攻陈，黄必攻韩"。并要周恩来先告何应钦停止韩德勤的进攻行动，否则八路军不能坐视。

10 月 4 日，反击韩德勤进攻的黄桥战役打响，6 日战斗结束。这一战役新四军取得歼灭韩德勤部 11000 余人的胜利。

胜利后，毛泽东等于 10 月 9 日致电刘少奇、陈毅等，指出：陈毅部大胜，振我士气，黄克诚南下增援是完全正当的。10 月 12 日，为留用黄桥战役俘虏的国民党官兵和大批收容知识分子，毛泽东等致电陈毅，指示他把俘虏兵只释放少数坏分子，其余一概补充自己，加以训练，增强部队战斗力。下级军官也应留一部分稍带革命精神的，其余不论如何反动，一概不杀，加以优待和释放。对知识分子，只要是稍有革命积极性，不问其社会出身如何，一概收留，为建设广大抗日根据地之用。

为对付日寇进攻，巩固国内团结，毛泽东考虑华中磨擦在韩进攻失败后，应设法暂时缓和一下，采取完全自卫的方针。并提出在苏北应加紧开展地方工作，建立抗日民主政权，扩大与整训自己的部队。

10 月 14 日，毛泽东等在致陈毅并告刘少奇等的电报中，指出同韩德勤等谈判的主要条件：(一)停止安徽向皖东进攻。(二)撤退皖南对新四军的包围。(三)撤退苏南对新四军的包围。同一天，毛泽东等就建设苏北根据地问题又发出了 3 封电报。

在致陈毅、刘少奇等的电报中指出：建设苏北根据地是很大的工作。“注意苏北与皖东打成一片，不要使中间有间断。要尊重李明杨、韩国钧等的中立态度及其利益，注意收集蒋、顾、韩的反共证据(人证物证)，注意收集知识分子，注意调节各阶层利益，实行政权中的‘三三制’，预防‘左’的危险，注意组织财政经济工作，从长期战争出发，勿使人力物力浪费”。

在致刘少奇、陈毅、黄克诚等的电报中指出：你们注意吸收陶行知等生活教育社人员参加苏北文化教育工作是对的。但同时也应注意黄炎培、江问渔等所领导的职业教育社在江浙两省知识分子中的颇大影响。黄、江不仅在文化教育界有地位，而且是经营工商业的民族资本家的著名代表，因此，也应吸收职业教育社社员及

其各方有关人员参加苏北的文化教育和财政经济事业。应设法同江浙民族资本家代表张一麐、黄炎培、江问渔、褚辅成、穆藕初等联络，欢迎他们派人或介绍人参加苏北根据地的各项工作。

在致周恩来、叶剑英的电报中指出："苏北根据地的工作对全国有重大政治影响，而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正确政策，成为我们建立苏北模范抗日根据地的中心问题之一"。电报请他们除对生活教育社人员加以联络外，同时亦对江浙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加以联络，约请他们派人和介绍人到苏北去办教育文化事业，去投资兴办实业，并说明我们欢迎他们派人和介绍人参加苏北的政权工作和民意机关工作，以便经过他们，扩大我们争取江浙民族资本家的范围，并帮助我们巩固苏北根据地。

为建设苏北根据地，毛泽东于 10 月 17 日起草指示电，要从晋东南、冀南及晋察冀下决心抽调 300 至 400 个有经验的党政军民工作干部，随杨得志部队南下，交刘少奇分配使用。

对反共俘虏的政策

黄桥战役新四军取得歼灭韩德勤部 11000 人的胜利，俘虏了大批国民党官兵。对俘虏的国民党官兵怎么办，毛泽东等于 10 月 12 日致陈毅的电报中指出：俘虏兵只释放少数坏分子，其余一概补充自己，加以训练，增强部队战斗力。下级军官也应留一部分稍带革命精神的，其余不论如何反动，一概不杀，加以优待和释放。

由黄桥战役处理俘虏一事引起毛泽东的注意，他认为在对待俘虏的问题上中央应该有一个明文规定。10 月 16 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关于对待反共俘虏的问题。会议经过讨论决定：对反共俘虏今后原则上一律不杀害，也不要他们自首，而应加以优待。会议还决定由毛泽东起草关于对待反共俘虏的指示。

10 月 18 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关于对待反共俘虏问题的指示。指示说："任何国内反共派向我进攻被我捕获之俘

虏官兵、侦探人员、特务人员及叛徒分子，不论如何反动与罪大恶极，原则上一概不准杀害。这一政策是孤立与瓦解反共派的最好办法。应使全党全军从上至下有普遍深入的了解。其处置办法，凡反动分子无用人员，则优待释放之；凡可参加我军士兵及有用人员，则收留之，一律不准加以侮辱（如打骂及写悔过书等）或报复。如有关系紧要必须处决之个别分子，则须经过军中师以上及相当于师之机关党内分局及区党委以上或各根据地最高政权机关之批准，旅以下、地委以下、专员以下没有批准杀人之权。”

起草关于防止和纠正“左”倾错误的指示

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书记彭真于1940年9月15日致电中央，报告冀南土地政策的执行情况。10月18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北方局、冀南区党委、晋冀察分局、一二九师并告山东分局、一一五师、中原局电，认为根据彭真所述冀南的土地政策是过左的，是违反抗日统一战线原则的，并已造成了严重后果。电报询问晋东南及山东两地土地政策是否有过左错误，并请北方局、山东分局及一一五师加以检查报告中央。

同一天，毛泽东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了关于防止和纠正“左”倾错误的指示电，电文如下：“由于没有使中下级干部彻底了解，由于上面没有事先预防与及时检查，致使许多地方犯有极左错误，主要是在土地政策、劳动政策、财政政策、锄奸政策、对待知识分子政策、对待俘虏政策、对待国民党人员政策以及我之政权组织上表现过左，其结果是缩小了我之社会基础，引起中间势力害怕，给日寇、汪逆与顽固派以争夺群众团聚反动力量的机会。待错误形成再去纠正，已使我们受到极大损失。现在华中工作正在发展（山东亦然），你们必须预防下级执行政策时冒犯过左错误，你们必须懂得左倾错误是当前主要危险，必须及时检查下级工作，纠正过左行动，否则在敌人与顽固派的夹攻中要取得我党我军发展与巩固

的伟大胜利，要长期坚持根据地是不可能的。此事望你们尖锐地提起全党全军注意，切勿等闲视之。”

准备对付最黑暗的局面

1940年10月19日，何应钦、白崇禧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副参谋长的名义，向朱德、彭德怀、叶挺发出皓电，诬蔑八路军、新四军“不守战区范围自由行动”，“不遵编制数量自由扩充”，：“不服从中央命令破坏行政系统”，“不打敌人专事并吞友军”等，强令八路军、新四军限于电到一个月内全部开到“中央提示案”第三项所规定的作战地境内，即全部撤至黄河以北。

10月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临时会议，讨论目前形势问题。会议认为，时局有由小风波转到大风波的可能，如果美国进占新加坡，日军退出武汉，造成国共分裂，而苏联对中国又没有援助，这将是中国最黑暗的局面。党的工作布置应放在准备整个东方大黑暗的基点上。

毛泽东收到周恩来10月24日来电，25日即转发彭德怀、刘少奇、项英。周恩来来电说：目前国民党方面的种种情况，“均证明反共高潮是在着着上升，何、白十九日电是表示了国方决心”。“如果国际形势更利于英美派，局部‘剿共’会进入全面反共”。

毛泽东同意周恩来对形势的分析，他一方面转发周恩来的电报，一方面提出自己的意见。25日，毛泽东在复周恩来的电报中指出：国民党英美派“ 现在仍是动摇于英美路线与贝当路线之间，他们仍不敢过于得罪苏联，全面反共的决心也不容易下”。“但我们应估计到最困难、最危险、最黑暗的可能性，并把这种情况当作一切布置的出发点”。目前，我们的对策是稳键地对付国民党的进攻，军事上采取防卫立场，政治上强调团结抗日，在国民党区域的党实行全部地完全地退却下来，各根据地实行完全的自给自足，再支持一年，世界形势就大变了，目前是准备待机时期。同一天，毛泽东言犹

未尽，为准备对付最黑暗的局面，再电周恩来，指出：国民党现在发动的反苏反共新高潮，一方面是放弃独立战争参加英美同盟的准备步骤；一方面向日本示意，愿意担负替日本镇压中国民族革命的责任，以求交换日本对国民党的让步，同时又以加入英美同盟吓日本，以求日本的让步。故何应钦等反共活动特别起劲，日本正在拉蒋介石、何应钦。我们要准备蒋介石做贝当，准备他宣布我为反革命而发动全面反共，准备对付最黑暗局面。

10 月 29 日，毛泽东收到周恩来当日发来的关于对付国民党新高压政策的意见的电报，立即转发彭德怀、刘少奇、项英、陈毅。周恩来来电说："国民党目前是从局部讨伐入手。一月满期后，拟宣布取消新四军番号及八路军、新四军的各地办事处，然后实行局部讨伐，亦即东讨北锁的高压政策。"

同一天，关于目前时局问题，毛泽东致电周恩来、彭德怀、刘少奇、项英，指出：一个月来英美与德日意在中国的斗争是异常激烈的。"英国的开放滇缅路；美国的借款，尤其是撤侨，都向中国表示英美的反日决心，要求中国不跑德、意、日路线，而英、美两使坐镇重庆，紧紧拉住蒋介石不让跑掉"。"运城鄂北两飞机场的停开，阿部的回国，南宁的撤兵，海通社在重庆正式开设，则是表示日本让步和德国劝和的开端"。"蒋介石现在是待价而沽，一方面准备加入英美同盟，一方面也准备加入德意日同盟。""目前是蒋介石最得志的时候"。"在七八月间蒋介石确曾准备于重庆失守时迁都天水，准备亲苏、和共与某些政治改良，至九月已动摇，至十月乃大变，这是德意日同盟与英美对日积极化的结果"。但无论那一种局面，国共间的严重斗争是不可免的，蒋介石驱逐新四军八路军于老黄河以北而封锁之，这一计划是下了决心的。

11 月 1 日，毛泽东对这份电报作了一些修改，发给八路军新四军的有关负责人。毛泽东的修改指出："我们一方面要坚持华北华中各根据地，一方面要打破蒋介石的进攻，这就是我们所处的严重局面。如何有步骤有计划有秩序的冲破这一严重局面，这就是今

天我们要解决的问题。”

要做“政治坚定，技术优良”的医生

1940 年 11 月 12 日，毛泽东前往距延安城 15 里的柳树店，看望正在中国医科大学治疗肺结核病的续范亭。当时，学校全体师生员工正在礼堂开会纪念白求恩大夫逝世一周年，他们立即请毛泽东进礼堂讲话。

毛泽东先问了问这个学校有多少学生，多少教员，然后就开始向大家讲话。他说，革命需要枪杆子，可是光有枪杆子还不行，还要有各种各样为拿枪杆子的人服务的人，部队需要医生，需要大量的医生。他抚摸着讲桌上的白求恩石豪像，鼓励大家说：“你们要向他学习”。

接着毛泽东讲到了医学的发展。当他谈到细胞学和细菌学的时候，他伸出两个指头说：自从有了这“二细”，医学的面貌就为之一新。

毛泽东要大家做“政治坚定，技术优良”的医生，看病要细心负责，要有好本领。毛泽东正讲着的时候，续范亭走进来了。他听说毛主席在讲话，立刻打起精神，抱病下山来听。毛泽东一看见续范亭，急急忙忙过去和他握手，然后一面扶着他，一面对大家说：“如果你们把他的病治好，算你们立了一大功。”

毛泽东最后勉励大家，要向白求恩大夫学习，为革命多做工作，多做贡献。他说：白求恩大夫死了，人们都想念他。如果希特勒死了呢，人们都会拍着巴掌说：“好啊，死得好啊！”我看，现在的阎王老子应该是马克思。如果你是为革命做工作累死的，马克思会给你摆酒席，让你上座。

争取友军和黄埔生军人

1940年11月4日，毛泽东就争取友军的工作，同朱德、王稼祥致电叶挺、项英、刘少奇、张云逸、陈毅、黄克诚、彭雪枫、李先念，指出："根据华北（朱怀冰三个师打八路军时，由于我们火线上的统战工作，其中一个师中立）、陕甘宁边区（保安队和我们交战时，由于我们的联络工作，预三师在旁边观望不动）和苏北黄桥等反磨擦战斗（由于陈毅统战工作的结果，两李及陈泰运严守中立）的经验，在反磨擦的武装斗争中，加紧争取友军对我同情或严守中立的工作，不但有很大的意义，而且有很大的可能。"在今天华中的条件下，一方面国民党军队在数量上较我军占优势，另方面在那里聚集着各种不同系统的地方军和杂牌军。因此，立即动员一切可能的党政军民力量去进行争取友军工作，成为你们今天最中心任务之一。"陈毅对两李及陈泰运等之统战工作，有丰富宝贵之经验，望大家加以详细研究，加以发扬、广泛运用。"

11月16日，毛泽东同王稼祥、朱德就与黄埔生军人进行统战工作问题发出指示，指示说："我党我军中过去把黄埔生看作一个笼统的反共集团的传统观念是错误的、有害的，在目前严重时局，极须改正此观念，利用一切机会与黄 埔生军人进行统一战线的工作，不要刺激他们，而应以民族至上的观念来打动他们，使他们不肯投降日寇，使他们对反共战争取中立或消极态度。这对挽回危局有重大意义。"

对《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作重要的修改

1940年下半年，毛泽东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第二章作了重要修改。这些修改对《新民主主义论》的一些观点作了重要的发展。《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修订本最早在《党建论文集》上

发表。

1940年毛泽东在为修改《抗日战士政治课本》致萧向荣的信中谈到对《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修改情况，他说："战士课本写得很好。第一第二第四课看了，可即付印。第三课须加修改，望送来看，要将大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亲日派大资产阶级与非亲日派（即英美派）大资产阶级，大地主与中小地主及开明绅士，加以区别。宣传部正在付印的一本书中，我已将《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第二章关于这一部分加了修改，请你向罗迈同志索取一阅。在第三课中，主要应说各阶级对抗日的态度，才有现实意义，亦请加以注意。""在去年十二月写《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第二章时，正在第一次反共高潮的头几个月，民族资产阶级与开明绅士的态度是否与大资产阶级大地主有区别，还不能明显地看出来，到今年三月就可以看出来了，请参看三月十一日我的那个《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

在这一段时间里，毛泽东还有两次谈到这件事。在12月4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谈到蒋介石统治集团内部也有欧美派与亲日派的矛盾时，毛泽东说：过去我党没有把大资产阶级（即买办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区别开来，直到写《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第二章及"七七决议"时才认识清楚。

12月13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准备写一篇文章，主要解释以下几点：1、说明大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区别，过去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第二章中没有说清楚。2、《新民主主义论》虽说明了各党各派各阶级的联合专政，但没有把各党派联合专政的方针与具体政策联系起来。如地主资本家要人权、财权等便是具体的政策。现在各根据地土地政策、劳动政策都是过左的。如实行八小时工作制、过高增加工资等，必须解释清楚，把理论与实际政策说清楚。3、实行自我批评，对过去我党的包办作风要有慎重的必要的自我批评。此外要把亲日派资产阶级与英美派资产阶级加以区别。

关于华中地区的各项政策

1940年12月13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了关于华中地区的各项政策，致电中原局并告北方局、山东分局、东南局、南方局和南委。全文如下："(一)苏北组织政权机关及民意机关时，应坚决实行三三制，共产党只占三分之一，在开始时还可少于三分之一，网罗各党各派无党无派一切不积极反共之领袖人物参加，其中应有国民党中派及左派，韩国钧等民族产阶级及开明地主均应该参加，也可容许少数右派代表，真正组织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联合政权，力避我们包办。这对于全国是有大影响的。(二)劳动政策力避过左，目前只作轻微改良，例如十四小时工作日者减至十三小时或十二小时，不要实行八小时制，保证资本家能赚钱。(三)土地政策应实行部分的减租减息，以争取基本农民群众，但不要减得太多，不要因减息而使农民借不到债，不要因清算旧债而没收地主土地。同时应规定农民有交租交息之义务，保证地主有土地所有权。富农的经营原则上不变动。要向党内及农民说明，目前不是实行土地革命的时期，避免华北方面曾经发生过的过左错误。(四)同意胡服对税收办法的意见，在无更好办法之时暂时照旧法征税，唯苛杂应酌量减轻。(五)锄奸政策，以镇压众人皆恶之少数最反动分子为原则，极力避免多杀人。除政府外各机关团体不得自由捕人罚人。(六)经济政策是尽量发展工业农业生产与商业流通，力避破坏生产与商业，号召上海资本家到苏北办实业。(七)文化教育政策只去掉买办大资产阶级的文化专制主义，容许民族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思想存在，容许自由主义的文化人及教育家办报办学。(八)总之目前你们的政策只去掉 买办大资产阶级及封建大地主的专制主义及作初步的民生改良。一方面保证工农小资产阶级人权、政权、财权及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另一方面也应保证除汉奸以外一切资本家地主的人权、政权、财权及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只要

不武装暴动，任何党派阶层有活动之自由。应容许国民党之存在，应组织进步的国民党。(九)整个华中都应执行上述方针(当然华北亦如此)。(十)你们如何具体执行各项政策，望随时电告。”

《论政策》

1940 年 12 月 4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目前形势，毛泽东作长篇发言。他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回顾了抗战以来党的方针、政策，提出对于统一战线政策(总的政策)、劳动政策、土地政策、锄奸政策、文化政策、干部政策、政权中的组织政策，都要准备总结，提议组织委员会负责。“七七决议”批评了“左”的错误，但对各个具体问题没有明确的指示。

毛泽东在发言中还指出党的历史上特别是第三次“左”倾路线统治时期的错误。他说：我党历史上有三个时期。在大革命末期，陈独秀主张联合一切，下令制止工农运动；到苏维埃时期，在秋收暴动中实行打倒一切，到六大时纠正了。但到苏维埃末期又是打倒一切，实行消灭富农及小地主的政策，造成赤白对立。这种“左”的政策使军队损失十分之九，苏区损失不止十分之九，所剩下的只有陕北苏区。实际上比立三路线时的损失还大。遵义会议决议只说是军事上的错误，没有说是路线上的错误，实际上是路线上的错误，所以遵义会议决 议须有些修改。在苏维埃后期，土地革命潮流低落了，但民族革命潮流高涨起来。现在我们的统一战线的路线是又联合又斗争，不是绝对的联合或斗争。在抗日问题上对国民党又拥护又斗争，在反共问题上也有现在与将来之分，即反共也有高潮低潮之分。在武汉失守前，国民党军队溃退，我们在日军进攻时和靠近日军的地区可以大发展，因此对蒋的办法应是先斩后奏(如王震旅到绥米)，先斩不奏。这个观点现在只有项英处没有了解，因此军队少发展。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发得太迟了。在建立政权和吸收知识分子问题上，我们曾经失去了一些时机。我们总的政

策是在团结中要斗争，在斗争中又要团结，是统一中的独立，统一是主，独立是辅。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在战略上是统一的，游击战是独立的，即统一中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

在王明、博古、朱德、康生、张闻天、陈云等发言后，毛泽东再次发言。他说：抗战以来的倾向，在统一战线初期是“左”倾（主张苏维埃与国民党对立），国共合作后有一时期是右倾，反磨擦后又是“左”倾。1937年十二月会议否认独立自主的方针，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是错误的，这一口号到六中全会才取消。在战略问题上，洛川会议确定了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但前方同志不服从，到十二月会议及六中全会才得到正确的解决。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大体上要分大革命、苏维埃与抗战三个时期，总的错误是不了解中国革命的长期性、不平衡性。苏维埃末期犯了许多“左”的错误，是由于马列主义没有与实际联系起来。总结各项政策都要搞出条例来。

12月25日中共中央向党内发布毛泽东起草的《中央关于时局与政策的指示》。这个指示关于政策的部分编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题为《论政策》。指示指出：在目前反共高潮的形势下，我们的政策有决定的意义。但是我们的干部，还有许多人不明白党在目前时期的政策应当和土地革命时期的政策有重大区别。过去十年土地革命时期的许多政策，现在不应当再简单地引用。尤其是土地革命后期的许多过左的政策，不但在今天抗日时期不能采用，就是在过去也是错误的。要克服在策略问题上过左过右的摇摆，但目前党内的主要危险倾向，仍然是过左的观点在作怪。指示从策略原则分析了党在抗日时期的总政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指出：它“既不是一切联合否认斗争，又不是一切斗争否认联合，而是综合联合和斗争两方面的政策”。这种又联合又斗争的原则体现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政策，战略统一下的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对顽固派斗争的有理有利有节政策，国内阶级关系上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政策等。指示综述和重申党的各项具体政策：政权组织政策、劳动政策、土地政策、税收政策、锄奸政策、

保护人民权利的政策、经济政策、文化教育政策和军事政策。指示最后指出："在日寇加紧侵略中国和国内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实行反共反人民的高压政策和军事进攻的时候，惟有实行上述各项策略原则和具体政策，才能坚持抗日，发展统一战线，获得全国人民的同情，争取时局好转。"

指示项英等克服动摇犹豫，坚决执行北移方针

毛泽东在11月15日给周恩来、项英、刘少奇、彭德怀等电报中，提出击退蒋介石这次反共进攻的方针和措施："对于蒋介石此次反共进攻，决定对皖南取让步政策（即北移），对华中取自卫政策，而在全国则发动大规模反投降反内战运动，用以争取中间势力，打击何应钦亲日派的阴谋挑衅，缓和蒋介石之反共进军，拖延抗日与国共合作时间，争取我在全国之有理有利地位"。电报还指出：皖南部队要认真作北移之准备。

毛泽东一直坚持皖南新四军北移的方针。11月24日，他同朱德、王稼祥致电叶挺、项英："（一）你们必须准备于十二月底全部开动完毕。（二）希夷率一部分须立即出发。（三）一切问题须于二十天内处理完毕。"同日，再电叶挺、项英："立即开始分批移动，否则一有战斗发生，非战斗人员及资材势必被打散。"

项英于11月27日复电毛泽东等，强调无论如何要在12月底才能开动完毕。并说："中央大计如何？究竟有何举动？假若是队伍既未到苏南，又已离皖南，在半路上要战斗，则颇不利。但如有何变动，来的快时，则请毛[无]须顾虑，我们就在皖南打，资材与人员的损失是顾不了的，如何？盼立即复。"同日，项英等在致毛泽东的另一封电报中，说经他们多方研究与考虑，由苏南北移路线途中困难多，危险性较大，反不如由三支地区兼程北移皖北较有利，既时间经济又直接增援皖东。因此决心将大批工作人员化装过封锁线与部分资材先经苏南至苏北，同时以迷惑各方，再以突击方式，将

部队由现地区突过长江至皖北。请中央电示是否同意这一行动计划。

11月29日，毛泽东即复叶挺、项英电："同意直接移皖东分批渡江，一部分资材经苏南。"但这一北移计划迟迟不实现。12月23日，项英致电中共中央，说：对于北移，原定主力到江北，其他经苏南，同时布置除资材人员从五日起至十五〈日〉止分批到达苏南，目前因敌增兵堵截，正设法北进。"

12月26日，毛泽东起草中共中央书记处给项英等的电报，指示他们克服动摇犹豫，坚决执行北移方针。全文如下："各电均悉。你们在困难面前屡次来电请示方针，但中央还在一年以前即将方针给了你们，即向北发展，向敌后发展，你们却始终借故不执行。最近决定全部北移，至于如何北移，如何克服移动中的困难，要你们自己想办法，有决心。现虽一面向国民党抗议，并要求宽展期限，发给饷弹，但你们不要对国民党存任何幻想，不要靠国民党帮你们任何东西，把可能帮助的东西当作意外之事。你们要有决心有办法冲破最黑暗最不利的环境，达到北移之目的。如有这种决心办法，则虽受损失，基本骨干仍可保存，发展前途仍是光明的；如果动摇犹豫，自己无办法无决心，则在敌顽夹击下你们是很危险的。全国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有你们这样迟疑犹豫无办法无决心的。在移动中如遇国民党向你们攻击，你们要有自卫的准备与决心，这个方针也早已指示你们了。我们不明了你们要我们指示何项方针，究竟你们自己有没有方针，现在又提出拖或走的问题，究竟你们自己主张的是什么？主张拖还是主张走，似此毫无定见，毫无方向，将来你们要吃大亏的。"

1941 年

在皖南事变发生的时候

1941 年 1 月 1 日，新四军军部致电毛泽东等，告以“我们决定全部移苏南”，但对向苏南转移的具体路线未加说明。在此情况下，1 月 3 日，毛泽东同朱德复电叶挺、项英：“你们全部坚决开苏南，并立即开动，是完全正确的。”

1 月 4 日，新四军皖南部队 9000 余人由云岭分三路向南出发。按照 1940 年 12 月 28 日新四军军分会的决定，具体的转移路线是：由云岭驻地先向东南行进，绕道茂林，经三溪、旌德、宁国、郎溪，沿天目山麓进至溧阳苏南根据地，然后待机北渡。1 月 5 日，叶挺、项英报告中央：新四军皖南部队于 1 月 4 日夜开动，5 日晨到太平、泾县间茂林地区。

1 月 7 日，毛泽东同朱德发急电复叶挺、项英，提出：“你们在茂林不宜久留，只要宣城、宁国一带情况明了后即宜东进，乘顽军布置未就突过其包围线为有利。”但是，情况已发生变化。6 日，新四军行至泾县境内的丫岭一带后，遭到国民党军第三十二集团军总司令上官云相指挥的 7 个师 8 万余人的包围袭击，新四军被迫抗击，殊死奋战。至 14 日，除 2000 余人突围外，其余 6000 余人大部壮烈牺牲，一部被俘。

1 月 9 日，刘少奇致电毛泽东等：“我江南遵令北移被阻，战况激烈，请向国民党严重交涉”。同日，刘少奇再电中共中央：项英、袁国平、周子昆等在紧急关头已离开部队，提议中央明令撤项职，并令饶漱石在政治上负责，叶挺在军事上负责，以挽危局。

当天，毛泽东收到刘少奇的电报，才得悉皖南事变发生，但具体情况不详，于是立即同朱德复电刘少奇，说：“九日电悉。你说项、袁、周已离开部队，我们尚未接到此项消息，他们何时离开的，现到何处，希夷、小姚情形如何，军队情形如何，望即告我们。”电报还说明，中央得叶、项 5 日电，说他们 4 日夜开动，

5日晨到太平、泾县间，此后即不明了。

1月10日，刘少奇致电毛泽东等，转告叶挺、饶漱石9日电报内容，说明部队受敌包围激战的情况。刘少奇说："他们在何处及情形如何，我亦不知"。但"他们应从泾县以北青弋江、宣城向郎溪东进才安全，而先向南行动，到茂林拖了许多天，致受敌包围"。同日，项英等人离队突围不成，回到军部。项英致电中共中央，报告与袁国平等离队经过，表示"此次行动甚坏，以候中央处罚"。

1月11日，毛泽东同朱德、王稼祥复电刘少奇、陈毅："你们转来叶、姚电悉，叶、姚是完全正确的，望你们就近随时去电帮助他们并加鼓励，惟项英撤职一点暂不必提"。同日，毛泽东等致刘少奇即转叶挺、饶漱石并全体同志电："希夷、小姚的领导是完全正确的，望全党全军服从叶、姚指挥，执行北移任务，你们的环境虽困难，但用游击方式保存骨干，达到苏南是可能的。"

1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通过由毛泽东起草的中央关于新四军由叶挺、饶漱石负责领导的指示电。指示电说："中央决定一切军事、政治行动均由叶军长、饶漱石二人总负责，一切行动决心由叶军长下，项英同志随军行动北上。"同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致电周恩来、叶剑英："望向国民党提出严重交涉，即日撤围，放我东进北上，并向各方面呼吁，证明国民党有意破裂，促国民党改变方针，否则有全军覆灭危险"。

同一天，毛泽东等通过刘少奇、陈毅致电叶挺、饶漱石："你们当前情况是否许可突围，如有可能，似以突围出去分批东进或北进（指定目标，分作几个支队分道前进，不限时间，以保存实力，达到任务为原则）为有利"。电报还提到"应注意与包围部队首长谈判"。

还是1月12日这一天，刘少奇、陈毅向中央建议：为答复蒋介石对我皖南一万人之聚歼计划，"请朱、陈、罗准备包围沈鸿烈，我们准备包围韩德勤，以与国民党交换"。

1月13日，毛泽东等复电刘少奇、陈毅，同意他们的建议，并指示："限十天内准备完毕，待命攻击"。"如皖南部队被蒋介石消灭，我应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韩德勤、沈鸿烈，彻底解决华中问题"。在这个电报中，毛泽东第一次提出"我全国政治上、军事上立即准备大举反攻"。同日，中共中央以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的名义，发表包围皖南新四军通电。同一天，毛泽东等致电周恩来、叶剑英："请向当局提出最严重交涉，如不立即解围，我们即刻出兵增助，破裂之责由彼方担负"，并嘱立即散发抗议皖南包围通电。

1月14日，叶挺在谈判中被扣，皖南事变大规模的战斗结束了。同日，毛泽东起草致彭德怀、左权、刘少奇、陈毅等八路军、新四军各部将领及周恩来、叶剑英电，正式宣布："中央决定在政治上军事上迅即准备作全面大反攻，救援新四军，粉碎反共高潮"。该电还指出军事上全面大反攻的部署："除已令苏北、山东迅即准备一切，待命消灭韩德勤、沈鸿烈，同时发出最严重抗议通电，并向蒋介石直接谈判外，我华北各部须遵前令，提前准备机动部队，准备对付最严重事变。"

正确的反攻方针的形成

1941年1月15日，刘少奇向中央发出了一份非常重要的电报，建议中央对皖南事变主要应从政治上进行反攻。电报首先否定了刘少奇自己于1月12日向中央建议过的军事反击计划，指出：这几着均无胜利把握，亦无大利可图，且系进攻性质，对人民、对部队，对统战朋友均无充分理由。在目前向国民党实行这种反攻和破裂，不独将引起中间分子的非议，即自己部队亦难长期在精神上维系不发生动摇。那时，国民党更可借此向我大举进攻，故实行全面军事反攻，对我不利，且有极大危险。接着，刘少奇提出了关于从政治上进行反攻的可行办法，他指出：这样做，对我在政治上有利，在军事上稳健，使我能巩固华中阵地，以待

变化。将来如须在军事上反攻，是可再找到其他理由的。

刘少奇是当时处在斗争前沿的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所以熟悉情况，最有发言权，他的意见和建议受到毛泽东的高度重视。

1月15日，就在刘少奇发出建议电报的当天，毛泽东在致周恩来、叶剑英的电报中指出："中央决定发动政治上的全面反攻，军事上准备一切必要力量粉碎其进攻"，在表述上与1月13日提出的"我全国政治上、军事上立即准备大举反攻"不同，已经把政治同军事分开，并说明军事上是准备力量以粉碎敌之进攻。

同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毛泽东在发言中强调：对于皖南事件，我们要实行全国的政治反攻，象前年我们反对第一次反共高潮时那样的非常强硬的态度。只有不怕决裂，才能打退国民党的进攻。但左派主张我们马上与国民党大打起来，我们也不能实行这种政策。

1月18日，毛泽东同朱德、王稼祥致电刘少奇、陈毅等，同意刘少奇的建议，撤消包围韩、沈的计划，进一步说明党中央已经改变了原先在军事上立即大反攻的看法。

1月19日，毛泽东同朱德、王稼祥致电彭德怀并告刘少奇，明确提出了"在政治上全面揭破蒋介石之阴谋"；"在军事上先取防御战"；"在组织上拟准备撤消各办事处"。至此，一个完整的正确的"政治攻势，军事守势"的反攻方针形成了。

为皖南事变发表的命令和谈话

皖南事变发生后，蒋介石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名义于1月17日发布通令，诬蔑新四军为"叛军"，宣布撤销新四军番号，将军长叶挺革职交军法审判。

1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紧急会议，会议讨论为驳斥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发言人1月17日谈话的文件，决定照原稿修改发表。

1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指出：目前时局的发展，我们要从根本上考虑了。自蒋介石17日宣布新四军为叛军后，实际上，蒋已准备得罪我们，得罪苏联，已是准备全部破裂的开始。蒋首先破裂，一切同情与理由都在我们方面。要挽救时局，实现好转，必须取消17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言人谈话。会议决定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确定了任命名单，并决定用中共中央军委名义发表谈话。会议还决定：成立中央军委主席团，由毛泽东、朱德、彭德怀、周恩来、王稼祥组成，军委实际工作由主席团办理。

同一天，毛泽东为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起草的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在延安发布，任命陈毅为新四军代理军长，张云逸为副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

同一天，毛泽东以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言人的名义，对新华社记者发表关于皖南事变的谈话。谈话揭露了日本和亲日派的整个阴谋计划，指出：此次皖南事变，酝酿已久。自日德意三国同盟订立以后，日本和亲日派就蓄谋镇压中国的抗日运动，消灭八路军新四军，实现中日妥协。至去年年底，全部计划准备完成。袭击皖南新四军部队和发布一月十七日的反动命令，不过是这一计划表面化的开端。谈话严正提出解决皖南事变的十二条办法：第一，悬崖勒马，停止挑衅；第二，取消一月十七日的反动命令，并宣布自己是完全错了；第三，惩办皖南事变的祸首何应钦、顾祝同、上官云相三人；第四，恢复叶挺自由，继续充当新四军军长；第五，交还皖南新四军全部人枪；第六，抚恤皖南新四军全部伤亡将士；第七，撤退华中的“剿共”军；第八，平毁西北的封锁线；第九，释放全国一切被捕的爱国政治犯；第十，废止一党专政，实行民主政治；第十一，实行三民主义，服从《总理遗嘱》；第十二，逮捕各亲日派首领，交付国法审判。谈话对国民党顽固派提出最后忠告：“亡羊补牢，犹未为晚。”如能实行以

上十二条，则事态自然平复，我们共产党和全国人民，必不过为已甚。如果继续胡闹，必然是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那就悔之莫及了。

看到报纸题字为之神往

1941年2月2日，毛泽东在杨家岭住地同本月1日离开重庆本日到达延安的叶剑英，进行长时间的谈话。叶剑英带来周恩来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信以及邓颖超送给毛泽东的相片，并向毛泽东汇报了皖南事变前后同国民党谈判斗争的情况。叶剑英还介绍了1月18日重庆《新华日报》刊载周恩来题词的经过。

1月17日，就是在蒋介石发表“一一七”命令的当天晚上，周恩来再次向张冲提出严重抗议，并在电话中怒斥何应钦：“你们的行动，使亲者痛，仇者快。你们做了日寇想做而做不到的事，你何应钦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深夜，周恩来怀着极其愤慨和沉痛的心情为皖南事变死难烈士题写了“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的挽词和“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挽诗，并去《新华日报》报馆将他的题词手迹制版登在被国民党抽去的稿件的位置上，加快印刷，组织好发行力量，抢在次日各大报发出之前，送到广大读者手中。第二天清晨，周恩来的题词手迹出现在山城的大街小巷的阅报墙上，报纸的销量从平时的1000份猛增到5000份。周恩来题词的发表，震撼了山城，在政治上给蒋介石一个沉重的打击。

毛泽东听完叶剑英的汇报，见到周恩来的题词后感慨万分。当晚，毛泽东即电周恩来：“（一）剑英本日上午十时抵延，畅谈五小时，收到来示，欣慰之至。报纸题字亦看到，为之神往。（二）小超同志照片收到，敬谢。”

从重庆订购书报的目录

1941年3月，毛泽东3次致电周恩来、董必武，要他们在重庆订购所需书报。毛泽东要订购的报纸有：中央日报、扫荡报、新蜀报、新民报、时事新报、新中国日报、华光日报、国家社会报；重庆各党派集团及昆明、桂林等地的报纸、杂志；向中国文化服务社订购各种政府公报、杂志、报纸；向中国经济研究所订购四川经济参考资料、贵州经济、日本对支经济工作、列强军事实力，中外经济年报（三九、四〇年版）、中外经济拔萃（创刊起全要）等书刊。信中要求将商务、中华及其他书局出版的有关中国经济书籍尽先寄来："重庆所有的经济书籍望尽力搜集寄来"。

5月5日，毛泽东同陈伯达再电周恩来，急切需要购买以下各种书报：中国国民经济研究所出版的《四川经济参考资料》、《贵州经济》、《列强军事实力》、《日本对亚经济工作》以及该所出版的各期《中外经济年报》、《中外经济拔萃》、西南实业协会编辑的《四川工厂名录》；国民政府主计处统计局编辑的《中华民国统计提要》、《西南实　业通讯》；桂林出版的《实用国民年鉴》；并询问前托购的商务出版的方显庭的《中国工业资本问题》一书，是否已购得。还指出："关于各种统计公报及经济书籍，这里很需要，此后请指定专人多为购买，重庆运来书籍以此类较多为好，请嘱办事处同志注意。"

对边区资本主义发展不要害怕

1941年3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在讨论陕甘宁边区财政问题时，毛泽东发言指出：财政方针主要是发展的方针，手段是票子。应当转变过去的紧缩政策，根据新的方针，立即实行新的政策。要决心立即投资生产事业，主要是投资盐的生产。纸

票新增发 600 万元，因为现在特别需要，不得不发。以 200 万投资盐的生产，200 万买粮食，100 万支付中央与边区的经费，100 万由银行周转。各种垄断的办法必须立即改变，私利不要妨碍人家，政府要实行纠正。要实行贸易自由政策，过去实行以公营事业吞并私人事业的政策是不对的。对边区资本主义发展不要害怕，过去提党内反对资本主义发展的口号，后来改用反对贪污腐化的口号。

4 月 19 日，毛泽东为《农村调查》一书写跋，指出："国营经济和合作社经济是应该发展的，但在目前的农村根据地内，主要的经济成分，还不是国营的，而是私营的，而是让自由资本主义经济得到发展的机会，用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半封建制度。这是目前中国的最革命的政策，反对和阻碍这个政策的施行，无疑义地是错误的。严肃地坚决地保持共产党员的共产主义的纯洁性，和保护社会经济中的有益的资本主义经济成份，并使其有一个适当的发展，是我们在抗日和建设民主共和国时期不可缺一的任务。在这个时期内一部分共产党员被资产阶级所腐化，在党员中发生资本主义的思想，是可能的，我们必须和这种党内的腐化思想作斗争；但是不要把反对党内资本主义思想的斗争，错误地移到社会经济方面，去反对资本主义的经济成份。"

对《论出版专门妇女刊物问题》一文的批评

1941 年 3 月 19 日，毛泽东对《中国妇女》第二卷第十期刊载的署名周俊的《论出版专门妇女刊物问题》一文，写了几段批评的话。毛泽东指出：此文与宣传部出版发行部正在考虑的调整延安刊物这一计划相对立，不待中央讨论就向人民宣传这种对立意见，这一行动的实质，只能对党与对妇女工作发生不良影响，是党内关系上极不正常的表现。毛泽东说，相反，须要向妇女群众解释，目前延安的物质条件，不能不暂时停刊一部分刊物（实质

上是暂时“取消”这些专门刊物的印行），将其内容送登保存着的一部分刊物上，以免同归于尽，这是将局部利益服从于全体利益，而又并不完全牺牲局部利益〈牺牲其一部分〉的好办法。妇刊不作这种解释，却做了相反的解释，故是不正确的。因为已经公开发表，又引起了争论，故须有纠正的办法。

同一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在讨论中央出版发行工作时，毛泽东说：要使发行与消耗量相适合，要出版教科书及通俗书籍。合并刊物问题，现在继续停刊，把文章放在解放报上。今后关于下级提问题必须经过组织。《中国妇女》上周俊写的文章反对中央，这是原则上的错误，须要查实。

原来这事与当时在中共中央分管妇女工作和任延安中国女子大学校长的王明有关。王明在2月初的一个晚上，派人将已经睡觉的一位同志叫起，说王明要她写篇文章，内容是反对取消妇女刊物，理由有3个：第一是根据共产国际的决议，第二是国民党也出版妇女刊物，第三是由于妇女工作需要。第二天早晨这位同志去王明那儿，王明给她一本共产国际决议，叫她当天交卷，以便早日发表。所以王明在政治局会议上听毛泽东说须要查实，王明不得不承认：周俊的文章是我看过的，主要由我负责。这次会议决定由《中国妇女》登启事说明刊出周俊的文章是错误的，并在妇委及支部中进行批评。为此，毛泽东提议由任弼时写一篇关于党性问题的文章。在3月26日的政治局会议上又决定由王稼祥起草关于党性问题的决议。7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

对《苏日中立条约》签订发表意见

1941年4月13日，《苏日中立条约》在莫斯科签订。苏外长莫洛托夫约见中国驻苏大使邵力子，表示“苏联将毫无变更地继续援助中国。”

同日，毛泽东在一封电报中指出：苏日条约订立后蒋之态度如何尚须数日才能看清。

4月14日，毛泽东就苏日条约等问题，致电周恩来，指出："苏日条约使苏联彻底解除被攻威胁，对国际对中国发言权增高，使英、美利用三国同盟为反苏工具之幻想最后破产，对制止中国投降与反共危险有积极作用"。

由毛泽东起草的《中国共产党对苏日中立条约发表意见》于4月16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被通过。毛泽东在《意见》中指出："苏联根据其一贯和平中立政策，于四月十三日与日本签订了中立条约，这是苏联外交政策的又一次伟大胜利"。他针对对这个条约签订的各种错误议论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表了意见，他认为：这个条约的意义，"首先在于巩固了苏联东面的和平，保证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安全发展"。二是"使苏联的国际地位极大地提高了，苏联无论在东方在西方都增大了他的发言权"。三是"苏日条约没有限制苏联援助中国进行独立的正义的对日抗战"。四是"至于苏日声明互不侵犯满洲与外蒙，这也是题中应有之义"。"我们必须收复全国一切失地，必须打到鸭绿江边，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这是中国全民族的神圣事业，社会主义的苏联也必是赞助我们这种事业的"。毛泽东最后指出："在苏日条约之后，中国必须坚持抗战、团结、进步三大方针。第一，任何对抗战的动摇是不许可的。第二，国共合作必须继续，解散新四军一类的分裂行动必须取消，以后再不可发生此类行动。第三，各种反动的对内政策必须停止。循此以行，外援方有所附丽，抗战才可期胜利。如果反其道而行之，则必至众叛亲离，危亡可立而待。我们共产党深望国民党当局实行深切的反省，善处当前的时局，则非仅国民党之利，民族解放事业实利赖之。

关心续范亭在延安医疗

山西新军总指挥、晋西北边区行署主任、晋西北军区副司令员续范亭，在1941年4月间来到延安医疗休养，续范亭本来就患有肺病，经中山陵剖腹后，身体更加羸弱。晋西北的紧张战斗生活和艰苦的物质条件，使他痼疾复发，病情加重。所以，党中央指示晋绥分局，尽快地将续范亭护送到延安医疗。

党中央和毛泽东给予续范亭细致入微的关怀和照顾。续范亭先后在延安柳树店国际和平医院和枣园就医和休养，得到医术高明的苏联医生阿洛夫、米洛夫和美籍医生马海德、中国肺病专家何穆、内科专家鲁之俊的精心治疗。由于国民党对延安的封锁，当时医药极端困难，毛泽东等设法为续范亭从外地购买药品。1941年4月20日，毛泽东致电当时在重庆的周恩来，告以“续范亭胃病甚重，似胃溃疡，来延医治，略有好转，请购药努食丁(Larostidin) 20盒航快寄来为盼”。不到1个月，5月15日，毛泽东又致电当时在香港的廖承志和在重庆的周恩来，为续范亭购买治肠溃疡的注射剂德国药50盒，并嘱“从速寄来为盼”。7月2日，毛泽东致信续范亭：“重庆买的药已到两盒，送上应用，不知与你讲的那种无误否？闻尊体有进步，大家都欢喜。我有些不适，近日已略好，勿以为念。”

毛泽东一直十分挂念续范亭的病情。这一时期，毛泽东自己因劳累和住窑洞患风湿病，右胳膊抬起来比较吃力，但逐渐“采用洗澡，晒太阳，按摩，吃水果诸法，颇有起色”。9月22日，毛泽东致信续范亭，即将这些办法告诉续范亭。

12月23日，毛泽东致信续范亭，告以“我臂部十愈五六，是洗澡晒太阳之功，再过一时，或可全愈。尊恙有起色，大家欢喜。惟不宜急于求愈，不宜即准备行动，我看你的身体至少再休养一年，以为如何?”

对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的重要改写

1941年4月27日，毛泽东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审查陕甘宁边区中央局拟在第二届参议会竞选时提出的施政纲领，决定照毛泽东的修改通过，于五一劳动节发布。

4月28日，毛泽东就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的修改和发表问题，写信给任弼时并转边区中央局。信中说："施政纲领的最后修正稿付上二份，请在边区刊物上发表，并印多张广为散布于边区境内及境外。"干部人手一张。"群众报上，须为之逐条加以通俗解释，并张贴于通衢。""与此纲领发布同时，须由边局发一通知，亦同样在报上发表，在通衢张贴，并使干部人手一张。"

毛泽东对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作过多次修改，纲领共二十一条，第七、第八、第十、第十二、第十三、第十四、第十九、第二十条是他起草的，对其他一些条他也作了重要修改。第七条是："改进司法制度，坚决废止肉刑，重证据不重口供。对于汉奸分子，除绝对坚决不愿改悔者外，不问其过去行为如何，一律施行宽大政策，争取感化转变，给以政治上与生活上之出路，不得加以杀害、侮辱、强迫自首或强迫其写悔过书。对于一切阴谋破坏边区的分子，例如叛徒分子反共分子等，其处置办法仿此。"第八条是："厉行廉洁政治，严惩公务人员之贪污行为，禁止任何公务人员假公济私之行为，共产党员有犯法者从重治罪。同时实行俸以养廉原则，保障一切公务人员及其家属必须的物质生活及充分的文化娱乐生活。"第十条是："在土地已经分配区域，保证一切取得土地的农民之私有土地制。在土地未经分配区域（例如绥德、鄜县、庆阳），保证地主的土地所有权及债主的债权，惟须减低佃农租额及债务利息，佃农则向地主缴纳一定的租额，债务人须向债主缴纳一定的利息，政府对东佃关系与债务关系加以合理的调整。"第十四条是："继续推行消灭文盲政策，推广新文字教育，健全正规

学制，普及国民教育，改善小学教员生活，实施成年补习教育，加强干部教育，推广通俗书报，奖励自由研究，尊重知识分子，提倡科学知识与文艺运动，欢迎科学艺术人材，保护流亡学生与失学青年，允许在学学生以民主自治权利，实施公务人员的两小时学习制。”第十二条是：“对于在战斗中被俘之敌军及伪军官兵，不问其情况如何，一律实行宽大政策，其愿参加抗战者，收容并优待之，不愿者释放之，一律不得加以杀害、侮辱、强迫自首或强迫其写悔过书。其有在释放之后又连续被俘者，不问被俘之次数多少，一律照此办理。国内如有八路军、新四军及任何抗日部队举行攻击者，其处置办法仿此。”

5月1日，《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中共陕甘宁中央局提出，中共中央政治局批准）在《新中华报》正式发表。同日，《新中华报》刊登的《边区中央局发布施政纲领》报道中说：“此纲领内容极为重要，不但表示团结抗战之总方针，并包举各方面的正确政策，例如军事政策，优抗政策，廉洁政策，农业政策，土地政策，工商政策，劳动政策，税收政策，文化政策，妇女政策，民族政策，华侨政策，游民政策，俘虏政策及外国人政策等。”“据中共中央书记处人员称，边区中央局此项施政纲领之发布，适当国内外政治形势发生激烈变化之时，实具备着伟大的政治意义，不仅陕甘宁边区可以施行，而且在华北华中各抗日根据地均可以施行，即在全国范围内说来，亦必有甚大之影响云”。

《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

关于最近几个月来同国民党反共高潮作斗争的经验总结，毛泽东在3月底就开始进行了。

在3月26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提出关于增强党性问题。他说：“党性问题是一个重要问题。要使中级以上的干部实行检查，使干部巩固了党便巩固了。实行自我批评就是批评

自我，这是一个很难办到的事情，鲁迅也说解剖自己是困难的。自遵义会议后党内思想斗争少了，对干部政策向宽之宽的方面去了。对干部错误要正面批评，不要姑息。我们党的组织原则是团结全党，但同时必须进行斗争，斗争是为了团结。我党干部要做到虽受到打击也要服从组织，就是在一个时期为上级所不了解，并且孤立，都要能够忍耐下去。要能上能下。项英、袁国平的错误，中央也要负责，因1937年十二月政治局会议是有些错误的。当时对形势估计不足，没有迅速地布置工作；其次对国共关系忽视了斗争性，因此边区也失掉些地方，直到张国焘逃跑后才解决，对全国的影响很大。会议决定由王稼祥起草关于党性问题的决议。

4月2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介绍了准备在延安会议上作报告的提纲，内容是关于最近6个月来同国民党反共高潮作斗争的经验总结。会议通过了这个提纲。这个提纲的8点内容，全部包括在5月8日政治局会议通过的毛泽东起草的《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中。

3月18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通知。建国后，这个通知编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时，题目改为《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后的时局》。通知说："从何白'皓电'（去年十月十九日）开始的第二次反共高潮，至皖南事变和蒋介石一月十七日命令达到了最高峰，而三月六日蒋介石的反共演说和参政会的反共决议，则是此次反共高潮退兵时的一战，时局可能从此暂时走向某一程度的缓和"。"这次斗争表现了国民党地位的降低和共产党地位的提高，形成了国共力量对比发生某种变化的关键"。指出："国民党在其统治区域内对我党和进步派的压迫政策和反共宣传，决不会放松，我党必须提高警惕性"。同时，"在全国和各根据地，要反对对时局认为国共已最后破裂或很快就要破裂的错误估计以及由此发生的许多不正确的意见"。

5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时局问题。毛泽东在会上说，重庆国民党方面要刘为章同周恩来谈话，说明日军发

动新的军事进攻，要求我们在军事上配合。会议决定由毛泽东复电周恩来，表示“对于国民党要求我们配合作战，须告以当然如此，不成问题。”

会议还通过毛泽东起草的《关于我党在反对第二次反共高潮斗争中的教训》。建国以后，编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时，题目改为《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并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决定用电报发各战略单位。这个总结指出：“在中国两大矛盾中间，中日民族间的矛盾依然是基本的，国内阶级间的矛盾依然处在从属的地位。一个民族敌人深入国土这一事实，起着决定一切的作用。只要中日矛盾继续尖锐地存在，即使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全部地叛变投降，也决不能造成一九二七年的形势，重演四一二事变和马日事变。”“地方实力派的领导成分虽然也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但是因为他们和统制中央政权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分子有矛盾，故一般地亦须以中间派看待之。”“在这种情况之下，指导着国民党政府全部政策的英美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依然是两面性的阶级，它一面和日本对立，一面又和共产党及其所代表的广大人民对立。而它的抗日和反共，又各有其两面性。”我们的方针是“以打对打，以拉对拉，这就是革命的两面政策。”十年土地革命战争和抗日时期的两次反共高潮都证明：“任何的人民革命力量如果要避免为蒋介石所消灭，并迫使他承认这种力量的存在，除了对于他的反革命政策作针锋相对的斗争，便无他路可循。”“但是斗争必须是有理、有利、有节的。”“我们在皖南事变前所取佳电的立场，对于事变后我们转入政治的反攻是完全必要的，非此即不能争取中间派。”“须知中国社会是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共产党如果不能争取中间阶级的群众，并按其情况使之各得其所，是不能解决中国问题的。”现在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政权，便是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主要标志，“各根据地的模型推广到全国，那时全国就成了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

配合国民党军与日军在中条山作战

1941年5月7日，日军为解除晋南、豫北地区中国第一、二战区对其潜在威胁，向中条山地区发动大规模进攻。

5月8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重庆国民党方面要刘为章同周恩来谈话，说明日军发动新的军事进攻，要求我们在军事上配合。会议决定由毛泽东起草复周恩来电。同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的复周恩来电中指出“（一）对于敌军进攻，须强调‘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进攻’的号召。（二）对于国民党要求我们配合作战，须告以当然如此，不成问题。（三）我们要求事项：（甲）速解决新四（军）问题；（乙）速发饷弹；（丙）停止反共；（丁）派机送周回延开会。”

5月9日，毛泽东等致电八路军、新四军各部领导人，提出我军在配合国民党作战中的方针：仍按我军现在姿态，巩固各根据地，耐心发展敌伪奸三种工作（这是极重要的），按当地情况许可，拔取敌伪某些深入我区的据点；在接近豫陕地区，应有相应部队配合友军作战，并极力发展统战工作，但不要乘机向国民党地区扩展，使蒋桂各军放心对敌。次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已电总部拟具配合中央军作战计划，惟新四、饷弹、反共三大问题，请蒋速予解决。”

为在战役中减轻蒋介石对我恐惧起见，毛泽东于5月12日致电陈毅、刘少奇：在蒋介石令何柱国袭击陇海线，扰敌后路时，令彭雪枫、邓子恢所部，不要越过津浦线以西，仍在原地不动；令张云逸、罗炳辉所部不要扰击李品仙。

5月14日，毛泽东在致彭德怀的电报中，再次强调我们的基本方针是团结对敌，是配合作战。并提出在周密考虑情况下，给以有计划的配合，主要配合区域是晋东南和冀南，其他作为次要配合区域（即按寻常状态作战）。

当时有消息说日军沿黄河增兵甚多，扬言渡河。又传敌于日前由平民抢渡，沿河民众甚为恐慌，西安粮价亦猛涨，正在疏散，人心惶惶。毛泽东在5月14日致彭德怀的另一封电报中，认为“我军于此时有在敌侧背给以打击以振奋国民党之必要”。

5月26日，毛泽东在致周恩来的电报中指出：“卫立煌对我积极配合作战甚为兴奋”。

5月30日，毛泽东电告彭德怀：“九个月来中央社第一次广播我军战绩，谓据洛阳讯，我军又截断正太路，车不通等语”。

但是，日本在发动中条山战役的同时发动了谣言攻势，诬蔑共产党和八路军。5月25日，毛泽东在他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揭破远东慕尼黑新阴谋的通知中，揭破谣言，指出事实上“新四军虽被宣布为‘叛军’，八路军虽没有领到一颗弹一文饷，然无一刻不与敌军搏斗。此次晋南战役，八路军复自动配合国民党军队作战”。“共产党领导的武力和民众已成了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一切对于共产党的污蔑，其目的都在使抗战失败，以利投降。我们应发扬八路军新四军的战绩，反对一切失败主义者和投降主义者。”

延安《解放日报》创刊

1941年3月1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讨论中央出版发行工作时，毛泽东指出：要使发行与消耗量相适合，要出版教科书及通俗书籍。合并刊物问题，现在继续停刊，把文章放在解放报上。

3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调整刊物问题的规定，指出：“由于目前技术条件的限制，与某些书籍小册子的急于出刊，决定《中国青年》、《中国妇女》、《中国工人》，自四月起暂时停刊，以四个月为期。”在停刊期内，关于这些方面的指导性的文章，分别登载于其他有关刊物上。

4月16日，毛泽东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决定秦邦宪为即将在延安出版的日报的社长兼主笔。

5月14日，秦邦宪主持《解放日报》报社编辑部第一次会议，总编辑杨松在会上宣布：明天试报，后天正式出版。明天试报有毛主席的发刊词和秦邦宪的通讯。

5月15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关于出版《解放日报》等问题的通知，全文如下："五月十六日起，将延安《新中华报》、《今日新闻》合并，出版《解放日报》，新华通讯社事业亦加改进，统归一个委员会管理。一切党的政策，将经过《解放日报》与新华社向全国宣达。《解放日报》的社论，将由中央同志及重要干部执笔。各地应注意接收延安的广播。重要文章除报纸、刊物上登载外，应作为党内、学校内、机关部队内的讨论与教育材料，并推广收报机，使各地都能接收，以广宣传，是为至要。"

5月16日，中共中央机关报延安《解放日报》创刊，毛泽东题写报名和撰写发刊词。他在发刊词中指出："一切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加以轻视的意见是不对的。在这种意见之下，就是国共磨擦，就是反共高潮，就是两个战争。我们主张是国共团结，是消灭磨擦，是一个战争，才能打退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与驱逐日本帝国主义"。毛泽东最后提出："中国共产党的使命就是本报的使命，本报同人完全相信，由于世界人民与中国人民协力斗争的结果，世界必然要变成一个世界人民的光明世界，中国必然要变成一个中国人民独立自主的中国，日本帝国主义的一切企图，我们是能够粉碎的。团结，团结，团结，这就是我们的武器，也就是我们的口号。今当本报发刊之始，愿掬之诚，以告国人"。

《改造我们的学习》

1941年5月19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报告，提出改造全党学习方法和学习制度的任务，批

判了理论和实际脱离的主观主义。报告明确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联系实际的基本原则是党的指导思想，是党的一切工作的指针；把理论和实际统一的问题同党性问题联系起来；并规定了在全党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克服主观主义的基本措施。报告对“实事求是”的学习态度作了著名的论述：“‘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这个报告对党的高级干部的整风学习和路线学习起了推动作用，给全党的整风学习指出了明确的方向。

这个报告后来发表在1942年3月27日《解放日报》，是整风学习必读文件之一。1941年7月，根据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报告精神，延安马列学院改组为马列研究院（9月8日又改名中央研究院），毛泽东出席成立大会，并作题为《实事求是》的报告，要求大家一定要以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调查研究敌、友、我三方面的历史和现状。

对于青年工作的指示

1941年5月20日，毛泽东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书记何凯丰关于青年工作的报告。在讨论中毛泽东发言：大革命时期青年团是搞广大的群众运动。苏维埃时期形成狭小的组织是错误的第二党方针。抗战时期青年工作是有成绩的，但在组织问题上有缺点。现在群众运动发展了，我们的观点还落在后面。群众生活是广大的，我们了解的很少，主要错误是反映群众生活不够。我们对青年工作是重视的。中央青委的主要任务是政治领导，过去对掌握政策注意不够，而且要注意问群众要什么政策。青年工作要提高一步，不要搞基干组织，这次讨

论否决了基干组织，而是要加强同群众的联系，把落后群众提高起来。

6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了关于青年工作的决议草案。6月6日，毛泽东修改了决议草案，并给何凯丰、胡乔木写了如下批语："关于过去青年团，将白区苏区加以区别，似更好些，如同意，请给洛（甫）、弼（时）一阅。此决议抄正后付解放日报发表，并广播，个别地方（包括重庆、香港），还发战报台。"

《中央关于青年工作的决议》指出："共产主义青年团在大革命以前及大革命初期，的确发挥了很大作用，这是因为团比党成立为早，和当时党尚属薄弱的原故。但在以后，特别是在内战时期，青年团变成第二党，在国民党区域的团，完全失去了群众性，这一经验乃是失败的经验，而决非成功的经验。虽然还应该估计到青年团在这时期内在苏区中按其组织上工作上说来，基本上是成功的，曾经起过许多积极作用；但是即使在当时苏区的青年团依然存在着第二党的作风，组织的不广泛，也应当引为严重的鉴戒。在今天抗日时期，如又建立新的青年基干组织，又将发生脱离广大群众、变成狭隘组织的危险，故关于这类提议是决然不能采用的。因此今天青年工作的中心任务应该是根据统一战线方针，继续发展与充实青救会的组织与工作，青救会是还有很大发展前途的。"

当听到逆耳之言以后

1941年6月3日下午，陕甘宁边区政府小礼堂召开县长联席会议。突然，天降暴雨，雷电交加，小礼堂的一根柱子被雷击断，坐在柱旁的延川县代县长当即殒命。与此同时，雷电还打死农民的一头驴，这个农民便借故发泄对负担过重的不满，说起怪话来了：老天爷不长眼，为什么不打死毛泽东?!这事传到保卫部门，保卫部门认定说这话的人是反革命，要追查这个人。

毛泽东知道以后，没有让保卫部门去追查，而是对有关同志说：群众的意见反映了我们工作上有毛病，有些问题需要我们去解决。要允许人家讲话，讲错了也不要紧。后来检查发现是公粮征多了。1938 年公粮仅为 1.5 万石；1939 年增至 6 万石；1940 年上升为 10 万石；1941 年则剧增到 20 万石，比上一年增加了一倍，平均每人负担 1 斗 4 升（合 42 斤）。所以部分群众产生了不满情绪。有的人还说："救国公粮任务太重，群众要饿肚子了。""共产党的经是好经，让歪嘴和尚给念歪了。"毛泽东觉得群众还是拥护共产党的，但对我们的工作和作风有意见。负担过重了，伤害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也损害了党和群众的关系。通过这件事，一定要设法解决群众负担过重的问题。于是，毛泽东和边区政府的领导同志商量，决定把公粮减到 16 万石，并对群众能不能负担起缩减后的任务，要做大量的调查研究。当时延安县的征粮任务比较重，征收公粮任务完成后，延安县的县委书记到几个乡去作了调查，写了一篇《救国公粮完成以后，对群众生活影响怎样》的调查材料，说明群众还负担得起。毛泽东看了这份材料，很高兴地说：这样我就放心了。以后每年征收公粮的指标逐年递减。政府和部队的粮食不够，就用紧缩开支和生产自救的办法解决。

中条山战役后对国民党的方针

从 5 月 7 日开始的中条山战役，集结在这个地区的国民党军约有十五六万人，虽有八路军积极配合作战，国民党军仍然溃败，在 3 个星期内损失兵力约 7 万人，最后不得不退出中条山地区。6 月 6 日，毛泽东电告周恩来："中条山战事已告段落，敌人似在收兵休整，下一次进攻方向可能是河南。"

当时国民党军在中条山溃败，刘伯承、邓小平向中央建议，提出建立太岳军区的问题。毛泽东于 6 月 7 日即复电："关于太岳军区问题，事关重大，中央正在慎重考虑中，日内即有答复，部队

暂勿行动。”8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及中央军委即电彭德怀、左权并告刘伯承、邓小平，指出：从大局着眼，目前争取以蒋为统帅仍继续抗战局面十分必要。当此中央军在中条山溃败，日军仍将继续进攻，而在东方慕尼黑危险尚未过去的时候，我们对蒋方针着重在拉，而卫立煌在拉蒋抗日问题上有更大作用。目前卫立煌处境甚为困难，我们须极力同他拉好关系，予以种种援助，万万不可把关系弄坏。因此，你们所提建立太岳军区及派兵南下的计划，在目前时机是不适当的。因为这将给国民党亲日派以投降反共的借口，给蒋以刺激，给卫以反感，结果将使我们处于不利地位，所以这一计划暂不应执行。

6月9日，关于中条山战役后对国民党的方针问题，复电周恩来，告以彭德怀、刘伯承等部署进占中条山，中央已去电制止。“此事只能取合法步骤，朱彭给卫建议一电即转给你，望你在渝有所活动，蒋如真欲保卫河防，只有让我进入中条山，如他不许，则我可解脱责任。”“此次中条山损失恐在十万至十五万之间，为上海战役以来最大损失。”“目前我对国民党方针是着重于拉，中条失败后拉好的可能性甚大。”

同日，毛泽东起草朱德、彭德怀致卫立煌的电报，指出：“目前大局，非国共两党贵我两军密切合作不足以图存，敌于晋南得手后，有进图郑、洛、西安可能。八路决在委座及吾兄领导下与友军配合作战，坚决破坏敌之进攻，为保卫郑、洛、西安而战。唯配合有直接间接两种，直接配合则效速，间接配合则效迟。敝军担任平汉、平津、津浦、北宁、平绥、正太、白晋北段及同蒲北段、中段之破袭，从远后方、近后方牵制敌人，此间接配合也。八路以有力一部进入中条山及汾南三角地区，担任同蒲南段、白晋南段及道清路之破袭及黄河北岸之控制，从侧面打击与牵制敌人，以利贵军主力在黄河南岸西岸之力堵，此直接配合也。”“非有此一方面之部署，则牵制敌人难期速效。盖敌之重兵已集济原、运城地域，仅作远道配合，究属远水难救近火，此次中条战役证明

其也。”“今之建议，亦纯属进言性质，如以为可，则令行之，如以为不可，则弃置之。”如批准上述建议，“敝军到达中条及三角地区时，须请求允准发动民众组织抗日游击队，盖德等认为唯有此策为最有效。此次中条失利之原因固多，而无民众组织的障蔽敌之耳目，明快我之耳目，实为主因，并非兵不精将不勇或指挥不善之咎也。”

关于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预决算的问题

1941 年 6 月 12 日，毛泽东同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秘书长谢觉哉谈话至傍晚。林、谢走后，毛泽东仍感有些话要说。当夜，毛泽东写信给林伯渠，信中说：关于预决算，有两点请注意：（一）“凡必不可免之钱，予以慨允，使受者得所。”“其原则就是‘必不可免’四字。弱小部分，予以扶助，亦包括在此原则内。”（二）“不管是中央的，军队的，地方的，一概包揽，为之统筹。军队不分国军，地方军（不立此名目），一概统筹。”“总之发展路线是完全正确的”。这封信写好后当时没有发出。15 日，毛泽东又在信上加写了以下内容：（一）“追加预计，不可免的”，“故只能由你在预算中加重总预备费，尔后按需要（必不可免者）支用”。（二）“不必肯定边币只维持一千万，宜作千五百万之打算，较不束缚手足。”（三）预计算中应把自力更生的部分打进去，“须与党、政、军各部分的实际状况密切联系，了解其情形，方能算计。尤其是军。”（四）“商品货币流通量成正例说，亦不宜坚持，宜估计到许多新条件，还等今后研究。如持之过坚，将来不准，有损信誉。”

6 月 18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为着更能统一与集权地解决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问题与批准党、政、军三方面的各种预算、决算，决定成立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由林伯渠、朱德、任弼时、李富春、高岗组成，林伯渠为主席。同时决定改变过去经

济自给的办法，准备实行统一的实物供给制度，决定组织一个委员会，由任弼时负责。

准备配合苏联对日作战的方针

1941 年 6 月 22 日，德军突然发动对苏联的进攻，苏德战争爆发。

6 月 23 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反法西斯的国际统一战线的决定》，指出："德国法西斯统治者已于六月二十二日进攻苏联。""目前共产党人在全世界的任务是动员全国人民组织国际统一战线，为着反对法西斯而斗争，为着保卫苏联、保卫中国、保卫一切民族的自由和独立而斗争。在目前时期，一切力量须集中于反对法西斯奴役。"

7 月，日本在中国东北地区举行了代号为"关特演"的大规模演习，并将关东军由 11 个师增加到 20 个师，总人数由 40 万增至 70 万。这都是针对苏联的。苏德战争爆发后，德国不断催促日本早日出兵与其东西两线合力夹击苏联。苏联面临着德日夹击的严重威胁。

7 月 2 日，毛泽东等致电彭德怀，指出：日苏战争有极大可能爆发，如日本攻苏，将在华北加强镇压。我军须准备配合苏军作战，"但此种配合是战略的配合，是长期的配合，不是战役的配合与一时的配合，请在此基点上考虑一切问题"。

7 月 6 日，毛泽东致周恩来的电中指出："苏联战局有渐趋稳定形势，日本似不是攻苏而是牵制英美，英美均同情苏联，国共关系有好转可能。""不管是否帝国主义国家，凡反法西者就是好的，凡助法西者就是坏的，以此来分界限，不会错的。""目前反法西斯领导权，已握到苏联手中，只要苏联战局稳定，全世界反法西斯力量都环绕于苏，这是很好的形势。""对英、美主要是拉，批评可减少。"

7 月 7 日，中共中央发表抗战 4 周年纪念宣言。宣言指出："目前是全世界法西斯阵线与反法西斯阵线的伟大斗争时代，双方的决斗已经开始了。""大家应该警觉起来，特别团结，特别努力，坚持我们民族解放的旗帜，脚踏实地，向前奋斗，配合各国人民的反抗法西斯的斗争，争取我们的完全胜利"。

7 月 13 日，毛泽东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 7 月 9 日共产国际关于苏德战争与各国共产党任务的指示，表示完全同意这一指示。

7 月 15 日，毛泽东复电周恩来，指出关于配合苏联对日作战问题，我们决心在现有条件下，以最大可能帮助苏联红军的胜利。"我们采取巩固敌后根据地，实行广泛的游击战争，与日寇熬时间的长期斗争的方针，而不采取孤注一掷的方针。"

陈毅、刘少奇曾于 7 月 2 日致电毛泽东，说："如日本向苏联进攻，我们号召全国向日寇反攻，即使国民党不积极反攻，我八路、新四军亦须独力反攻，以牵制日本，敌后某些据点可能放弃。"7 月 18 日，毛泽东即复电刘少奇指出：反攻口号是对的，"但八路新四大规模动作仍不适宜，还是熬时间的长期斗争的方针，原因是我军各种条件均弱，大动必伤元气，于我于苏均不利。"

苏德战争的预测彼方甚为重视

1941 年 7 月 24 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说："二十一日开战的预测彼方甚为重视。现急欲查明者为德国之主攻方向，请极力设法探查密告至盼。"次日，再电周恩来，告以"友方要求我们利用一切线索和可能，将关于德国从德军西部及其占领国家向苏联西部国境之调动消息加以探索，若有可能，则将其编制、人数、运动路线及调动目的地亦加以调查，请尽可能为之。"

这里所说的"二十一日开战的预测"是指 6 月 22 日德军进攻苏联，苏德战争爆发。"彼方"和"友方"是指苏联。在抗日战争

期间，中共给苏军情报组提供了一些有价值的情报，如毛泽东说的“二十一日开战的预测”。这件事发生在6月上旬，在周恩来领导下做国际情报工作的阎宝航从国民党某高级官员那里得知：“希特勒德国将于6月21日进攻苏联。阎立即报告了重庆的周恩来，周于6月16日报告中共中央。中央从香港方面也得到了类似的情报，迅即把这一重要情报通过在延安的苏军情报组电告斯大林。苏联政府得到这个消息后，迟疑了一下，没有立即采取对策。他们的根据是，德国不会撕毁1939年签订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怀疑这是英美方面的挑拨。事实证明，这个情报是准确的。6月22日凌晨，德国果真背信弃义地发动了侵苏战争。苏德战争爆发后不久，苏联曾以伏罗希洛夫元帅的名义致电朱德总司令表示感谢。

毛泽东一方面指出苏联非常重视我们的情报，一方面指示周恩来继续探索消息，加以调查，尽可能为之。

会见回民抗日骑兵团团长马思义等

1941年6月，在甘肃省海原、固原和西吉一带，爆发了回族人民反抗国民党大汉族主义的统治和压迫的第三次武装起义。起义遭到国民党军的残酷镇压。起义失败以后，起义军领导人之一马思义，率领暴动群众200余骑，投奔陕甘宁边区，后成立回民抗日骑兵团，直属八路军留守兵团。

7月底，毛泽东在住处会见回民抗日骑兵团团长马思义等。会谈中毛泽东说，回族人民在中国历次革命运动中，都起过一定的作用，尤其是太平天国时期。不过，回族人民革命了200多年都失败了。今后共产党一定要帮助回族人民得到解放。接着，毛泽东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并对回民抗日骑兵团的工作方针作了指示。他说，我们党实行全国各民族一律平等的政策，坚决反对民族间的歧视和压迫，主张各民族间的友好团结，共同抗日。我们欢迎你们率领暴动群众来边区。我们边区是有饭大家吃，

有衣大家穿，有窑洞大家住，有日（本侵略军）大家抗。

对萧军的信任和帮助

7月下旬，作家萧军想离开延安回重庆去，到毛泽东处辞行。向毛泽东谈了他在延安见到的一些不良现象以及某些同志的宗派主义、行邦作风，并向毛泽东建议党应当制定一个文艺政策。毛泽东挽留萧军在延安，并托他帮助收集文艺界各方面的意见和情况。

经毛泽东恳切挽留，萧军决定不走了，回去以后，立刻把手里有的一些材料陆续寄给毛泽东，并写信向毛泽东借阅《毛泽东抗战言论集》。

8月2日，毛泽东复信萧军："两次来示都阅悉，要的书已付上。我因过去同你少接触，缺乏了解，有些意见想同你说，又怕交浅言深，无益于你，反引起隔阂，故没有即说。延安有无数的坏现象，你对我说的，都值得注意，都应改正。但我劝你同时注意自己方面的某些毛病，不要绝对的看问题，要有耐心，要注意调理人我关系，要故意的强制的省察自己的弱点，方有出路，方能'安心立命'。否则天天不安心，痛苦甚大。你是极坦白豪爽的人，我觉得我同你谈得来，故提议如上。如得你同意，愿同你再谈一回。"

萧军看了深受感动，他立即复信问会面时间。8月6日，毛泽东致信萧军："来示、文章及报纸均收到，文章已读过，兹璧还。近日颇忙碌，过几天后再奉约晤叙。"

信中提到的"报纸"是指延安《解放日报》6月17日、18日、19日三张报纸，上面有周扬写的《文学与生活漫谈》的文章，引起艾青、舒群、罗烽、白朗、萧军的不满。5个人开了一个座谈会，最后由萧军执笔，把大家的意见集中起来，写了一篇《〈文学与生活漫读〉读后》寄给《解放日报》，不给登，退了回来。萧军在

和毛泽东谈话中认为这太不公平了，太不民主了，所以毛泽东请萧军把报纸和文章都寄来看看。

过了三天，8 月 10 日，毛泽东致信萧军："我现在有时间，假如你也有暇，请惠临一叙。"当天晚上，毛泽东即与萧军晤谈。当萧军谈到《解放日报》拒绝发表他们与周扬争论的文章时，毛泽东说：《解放日报》不给登，你不是自己办了一份《文艺月报》吗？你可以登在《文艺月报》上啊！萧军经毛泽东提醒，把文章登在《文艺月报》第八期上了。

当毛泽东从萧军那得知有许多作家到延安来了，便于第二天，8 月 11 日傍晚，到杨家沟半山腰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住地，看望萧军、艾青、罗烽、白朗、舒群等作家，不巧罗烽、舒群不在。

第二天，8 月 12 日清晨，毛泽东致信萧军："昨晚未晤罗舒二同志，此刻不知他们二位及兄都有暇否？又艾青同志有暇否？又各位女同志有暇否？如有的话，敬请于早饭后惠临一叙。我们谈通一些问题，是很好的，很必要的。"当天早餐后，萧军、王德芬夫妇、艾青、韦篓夫妇，罗烽、白朗夫妇，还有舒群，一同应约来到杨家岭毛泽东住处，畅谈了有关文艺和文艺界方面的许多问题，并在毛泽东处共进午餐。中共中央组织部长陈云、宣传部长凯丰也在座。

关于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政策的争论问题

1941 年 7 月 24 日，毛泽东与谢觉哉谈话至夜晚，谈话后毛泽东派汽车送谢回住处。

7 月 25 日，谢觉哉致信毛泽东，并附保安处情报。

7 月 26 日上午，谢觉哉写信并附《池盐运销研究》一文送毛泽东。当晚，毛泽东到陕甘宁边区政府访谢，谈话至深夜一点方回。

7 月 31 日，毛泽东就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政策的争论问题，致信林伯渠、谢觉哉。信中说：“最近两次谈话，又读谢老两信，又得高岗同志转达二老意见，使我对现行边区财政经济政策的争论问题有更多的了解。我的了解仍不足，现行政策的几个根本点（预算分散，纸币，运盐）又在执行之中，最后的谁是谁非，还无法做结论”。“我现在不能断定纸币与运盐不失败，我同二兄谈过，如弄得不好，也许要失败的。但我现在还不能同意停止现行政策，采用另一政策，因为另一政策也许要失败的，或失败得更大”。信中还建议他们：“多从反面（即现行政策的正面）设想，现行政策固然已出了很多毛病，但另一政策是否毛病较少？从相对性设想，勿只从绝对性设想（即只设想现行政策完全是错的，另一政策完全是对的）”。“注意检查自己工作中的缺点，例如在税收工作上，在纸币发行工作上，在领导方式上，我觉得都是有严重缺点的”。

8 月 5 日，毛泽东致信谢觉哉，信中说：“你的各信我都转给弼时、王明、高岗、陈正人四同志看，使他们多了解你。他们都愿意多和你及林老谈，都愿意把事情把关系弄得好些。事情确需要多交换意见，多谈多吹，才能周通，否则极易偏于一面。对下情搜集亦然，须故意（强所不愿）收集反面材料。我的经验，用此方法，很多时候，前所认为对的，后觉不对了，改取了新的观点。客观地看问题，即是孔老先生说的‘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你三日信的精神，与此一致，盼加发挥。此次争论，对边区，对个人，皆有助益。各去所偏，就会归于一是”。“事情只求其‘是’，闲气都是浮云。过去的一些‘气’，许多也是激起来的，实在不相宜。我因听得多了，故愿与闻一番，求达‘和为贵’之目的。现在问题的了解日益接近，事情好办”。“在短时间内，总结一下边区工作很好，请准备材料及意见。你身体有病，切勿过劳，暂时以休养为主很好”。

8 月 6 日，毛泽东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工作的几个争论问题。关于增发边币问题，原决定

发350万元，有一种意见认为，边币贬值都是由于发行多了。关于盐的产、运、销问题，一种意见，主张由边区政府管理，盐的运销实行自由贸易政策，认为官督民运会引起民变；一种意见，主张由留守兵团管理，由政府组织民众运输。会议决定委托毛泽东召集争论双方的林伯渠、谢觉哉、高岗、陈正人、王明、任弼时、朱德谈话，统一思想，解决问题。

同日，毛泽东致信谢觉哉，对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的基本方针谈了自己的看法。信中说："近日我对边区财经问题的研究颇感兴趣，虽仍不深刻，却觉其规律性或决定性似在简单的两点，即（一）发展经济，（二）平衡出入口。首先是发展农、盐、工、畜、商各业之主要的私人经济与部分的公营经济，然后是输出三千万元以上的物产于境外，交换三千万必需品入境，以达出入口平衡或争取相当量的出超，只要此两点解决，一切问题都解决了。为此两点的关键，即粮盐二业的经营，如能增产二十万至三十万担粮与运三十万至四十万驮盐出境，即算基本地解决了两问题。"按此两点来检查我们的工作，则：一、今后必须停止公业投资，发动私业投资，即大放农贷与合作社贷款，兼放畜牧贷款与私商贷款，以达增加粮食产量，牛羊产量，与相当繁荣商业之目的。二、盐为达到出入口平衡之唯一的或最主要的办法，只要能年输三十万驮出境，换取三千万元（以每驮法币百元计）棉、布进来，即算平衡了出入口。出入口问题一解决，则物价币价两大问题即解决了。据此以观今年盐的官督民运政策，不但是未可厚非的，而且是完全正当的。信中最后说："昨日政治局会议决定委托我召集一次有关同志的会议，解决本问题。我想先作个别商讨，然后再开会议，较为有益"。

8月12日，毛泽东致信谢觉哉，在谈到劳役问题时说："劳役须经政治动员是完全对的，这就是我们的劳役与国民党的劳役之原则的区别，我们的特点是革命加战争。"

8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就陕甘宁边区财政经

济问题，毛泽东发言说：现在边区财经问题主要有两个，即生产的人民与消费的人员的矛盾，人民140万要供给8万人的生活，军队、机关等自己生产只能供给五分之一，尚有五分之四须人民负担。其次是出入口不平衡，相差甚大（800万元）。解决矛盾的方针是（一）发展经济，（二）使出入口平衡。发展经济，今年投资多在公营事业，今后要投资数百万元于民营的工农商业。发展经济的原则，主要民营，部分公营。扩大国营企业不是新民主主义前期的事，而是新民主主义后期的事，只有在有了大工业时才能办到。平衡出入口，要使盐大量出口，现在采用组织人民运盐的官督民运办法，是平衡出入口的好办法。能够解决发展经济与平衡出入口这两个问题，就能使边币稳定。劳役问题，由于陕甘宁边区有革命的民众，劳役是可能的；由于战争，劳役是必需的。会议同意毛泽东的上述意见，通过了相应的决议。

8月22日，毛泽东复谢觉哉21日来信，说：在陕甘宁边区，“今年所以采取这些政策，首先是根据于革命与战争两个基本的特点，其次才是根据边区的其他特点（地广、人稀，贫乏，经济落后，文化落后等）”。“凡人（包括共产党员）都只能根据自己的见闻即经验作为说话、做事、打主意、定计划的出发点或方法论，故注意吸收新的经验甚为重要，未见未闻的，连梦也不会作”。“善于总结经验，就是领导者的任务。边区有政治、军事、经济、财政、锄奸、文化各项重大工作，就现时状态即不发生大的突变来说，经济建设一项乃是其他各项的中心，有了穿吃住用，什么都活跃了，都好办了”。

任中共中央调查研究局主任

1941年7月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设立调查研究局的通知：毛泽东为主任，任弼时为副主任。下设情报部、政治研究室、党务研究室。毛泽东兼政治研究室主任。

毛泽东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草案，在7月21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被通过。

8月1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出《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决定指出："二十年来，我党对于中国历史中国社会与国际情况的研究，虽然是逐渐进步的，逐渐增加其知识的，但仍然非常不足；粗枝大叶，不求甚解，自以为是，主观主义，形式主义的作风，仍然在党内严重地存在着"。"党内许多同志，还不了解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一真理，还不了解系统的周密的社会调查是决定政策的基础。还不知道领导机关的基本任务，就在于了解情况与掌握政策，而情况如不了解，则政策势必错误"。"我党现在已是一个担负着伟大革命任务的大政党，必须力戒空疏，力戒肤浅，扫除主观主义作风，采取具体办法，加重对于历史，对于环境，对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具体情况的调查与研究，方能有效地组织革命力量，推翻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统治"。决定"责成各级党部将本决定与中央七月一日所发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联系起来，向党的委员会及干部会议作报告，并讨论实施办法"。

9月13日，毛泽东向中央妇委、西北局联合组成的妇女生活调查团作关于农村调查的讲话，着重讲了两个问题。一、情况是逐渐了解的，认识世界需要不断的努力。他说："我们是信奉科学的，不相信神学。所以，我们的调查工作要面向下层，而不是幻想。同时，我们又相信事物是运动的，变化着的，进步着的。因此，我们的调查，也是长期的。今天需要我们调查，将来我们的儿子、孙子，也要作调查，然后，才能不断地认识新的事物，获得新的知识"。他还回顾了自己调查农村、认识农村的过程，是经过六七年时间才基本完成的。二、方法。他说：1、分析和综合，先分析后综合，在分析中也有小的综合。应当学习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方法和苏东坡研究历史的"八面受敌"法。2、详细地占有材料，抓住要点。十样事物中，"如果你调查的九样都是一些次要的东西，把主要的东西都丢掉了，那末，仍旧是没有发言

权的”。

为《鲁忠才长征记》写按语

《鲁忠才长征记》是高克林于1941年8月13日晚向县城关区副区长鲁忠才以及王毓贤、孔照庆进行调查后根据记录整理而成的。这个调查报告具体地记述了县城关区第一次运盐的经验，包括牲口数，往返日期，沿途的各站概况，生活情况及问题，经验教训，等等。

毛泽东看到这个调查报告，认为写得很好，而且开调查会的方法也很好，于是他在8月26日，为《鲁忠才长征记》写了个按语。按语说：“这是一个用简洁文字反映实际情况的报告，高克林同志写的，值得大家学习。现在必须把那‘下笔千言、离题万里’的作风扫掉。把那些主观主义，形式主义扫掉。高克林同志的这篇报告是在一个晚上开了一个三个人的调查会之后写出的，他的调查会开得很好，他的报告也写得很好。我们需要的是这类东西，而不是那些千篇一律的‘夸夸其谈’，而不是那些党八股。”

这个调查报告和毛泽东写的按语发表在9月14日的《解放日报》上。

任中共中央思想方法学习小组组长

1941年8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讨论党内教育方针问题时，毛泽东发言说：我党干部理论水平比内战时是提高了，但共产国际认为我党的理论水平还不高。现在干部中多看了些理论书籍，但对于理论运用到中国革命实际上还不够。我们还没有各种问题的专家，对于许多实际问题不能下笔。延安学校是一种概论学校，缺乏实际政策的教育。过去我们只教理论，没有教会如何运用理论，如只教斧头本身，而没有教会如何使用斧头去做

桌子。延安研究哲学是空洞的研究，不研究中国革命的内容与形式，不研究中国革命的本质与现象。我们要培养行动的理论家。改造学习要采用革命的精神，对干部教育、学校教育、国民教育都要有一个大的改造。会议同意毛泽东的提议，彻底打破目前党内教学方法与思想方法上的主观主义与形式主义，决定由张闻天等组成委员会，研究改造学习的办法，并起草一个决定。

8月29日，毛泽东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会议决定：编辑马、恩、列、斯反对主观主义、形式主义的言论，由毛泽东等11人组成编辑委员会。为加强中央对全党思想上的领导，由中央同志组成思想方法学习小组，毛泽东任组长。

10月30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作《思想方法问题》报告，以通俗的语言和生动的事例讲解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批判教条主义、主观主义。指出：理论、观念、概念、原理、原则，都是从实际中得来的，这叫做唯物论，这是马克思主义起码的一条。理论正确不正确，要拿到实践中去，“实践是真理标准”。只从书本出发，从主观幻想出发，不从实际出发，不顾现实，这就是教条主义、主观主义。一件事情没有一定的条件是做不到的，一切都要从客观实际情况出发。“矛盾和统一，分析和综合，这叫做方法论，也叫做辩证论”。“理论还是要学习的，而且要把理论与实践统一起来，不要做书面上的马克思主义者，而是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与方法分析新的事件，解决新的问题”。

再次提出德波林主义是中共党内教条主义的主要思想根源之一

毛泽东的秘书张如心于1941年9月18日写的《清算德波林主义，开展反主观主义的斗争》一文（发表于1942年3月17日延安《解放日报》）披露：“毛泽东同志在最近一次会议上明确地指出：德波林主义是我党近十年来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主要思想根源之一”。德波林是苏联哲学家。十月革命前曾参加孟什维克

派，1929 年后任苏联科学院院士。他否认矛盾的普遍性，否认差异就是矛盾，认为矛盾不是一开始就在过程中出现，鼓吹用对立面的“互相调和”来解决矛盾，反对对立面的斗争。德波林学派在苏联有一定的影响，但在三十年代初就受到批判，认为他们犯了理论脱离实践、哲学脱离政治等唯心主义性质的错误。德波林主义无疑地给中国思想界和中共党内过去的政治领导以重大的影响。毛泽东在 1937 年 8 月写的《矛盾论》中已经提出：“苏联哲学界在最近数年中批判了德波林学派的唯心论，这件事引起了我们的极大的兴趣。德波林的唯心论在中国共产党内发生了极坏的影响，我们党内的教条主义思想不能说和这个学派的作风没有关系。”张如心在文章中以自己为例：“我在苏联的学习就受了德波林派的强烈影响，回国之后，也曾经在出版界宣扬过德波林派哲学思想。不仅如此，德波林主义的思想及工作方法，支配着我长时期的活动，使我犯了不容许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错误”。张如心同时指出：苏维埃运动后期“左”倾机会主义的领导者，不管他们口头上文字上如何宣扬，实质上他们的思想和领导方法正是德波林主义的再版。他们把我党真正的创造性马克思主义代表毛泽东同志称之为“狭隘经验主义者”，称之为“实行家而不是理论家”，然而实际上把 1929 年底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及《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书的全部理论与实践，与五中全会以前及五中全会本身的决议文件比较研究一下，则代表真正彻底的马列主义的正是前者而不是后者。现在我党中央虽然已经对这种德波林式的主观主义政治领导有了根本上的纠正，然而德波林主义的余毒，在我党思想上远还没有肃清，老的传统影响顽固地阻止着党的前进。张如心的文章点明了毛泽东在九月的一次会议上再次提出这个问题，实际上是提出了准备在党内要彻底开展反对主观主义的思想斗争的艰巨任务。

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九月会议）

1941年9月10日至10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延安召开，先后参加会议的有23人。毛泽东出席会议，并在9月10日作《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报告。

毛泽东在报告中指出：六届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前党中央领导所犯的错误是“路线错误”，它比立三路线的“左”倾，形态更完备，时间更长，后果更惨，其思想根源是主观主义和形式主义。会议讨论并通过了毛泽东的报告。会议检讨了党在历史上特别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政治路线问题，肯定党中央从六届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这一段历史上，犯了“左”倾政治路线性质的错误。一些受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影响而犯过错误的同志作了自我批评。会议集中讨论了如何使全党干部掌握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这一根本方向问题，讨论了如何使党的组织达到真正的团结和统一的问题。会议决定在全党发动思想革命，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会议还决定自9月16日起《解放日报》扩大为四版，增加反对主观主义与宗派主义的宣传教育内容；今后《解放日报》的文字，应力求生动活泼，尖锐有力，反对党八股；中央各部委工作同志要多给《解放日报》写文章，解释党的政策，介绍工作经验，使之真正成为全党反映实际领导工作的机关报。

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经一了党的高级干部对王明“左”倾政治路线的认识，提出了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的任务，为发动全党普遍整风奠定了基础。

任中央学习组组长

1941年9月26日，毛泽东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会

议通过中央关于高级学习组（又称高级研究组）的决定等。同一天，中共中央发出经由毛泽东修改审定的《关于高级学习组的决定》。决定指出，成立高级学习组的目的是“为提高党内高级干部的理论水平和政治水平”，“以理论与实践统一为方法，第一期半年，研究马恩列斯的思想方法论与我党二十年历史两个题目，然后再研究马恩列斯与中国革命的其他问题，以达克服错误思想（主观主义及形式主义），发展革命理论的目的”。决定还指出，延安及各地高级学习组统归中央学习组管理指导。中央学习组以中央委员为范围，毛泽东任组长，王稼祥任副组长。

9月29日，毛泽东起草以中央研究组组长毛泽东、副组长王稼祥的名义给中央研究组及高级研究组各同志的通知，全文如下：“本组研究方针，以理论与实际联系为目的。关于实际方面的材料，请各同志看六大以来的文件（要目另单）。关于理论方面，暂时以研究思想方法论为主，请各同志首先看下列材料：（一）《左派幼稚病》（用一九三九年解放社版）；（二）艾译《新哲学大纲》第八章‘认识的过程’（即哲学选辑第四章）；（三）李译《辩证唯物论教程》第六章‘唯物辩证法与形式论理学’；（四）河上肇《经济学大纲》的‘序说’（已油印发出）。”

10月4日，中共中央学习组发出通知：各地高级学习组暂不进行马恩列斯方法论的研究，本年内均先通读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的报告，列宁的《论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与六大以来的文件选集，明年可进入研究阶段。

10月18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关于各地应即组织高级学习组的指示，指出：“请即根据中央关于高级学习组的决定，加以考虑，规定各该地参加高级学习组的名单（注明现任职务及党龄）及其组长、副组长、秘书，电告中央，以便指定材料，开始学习（重庆高级学习组已经建立，共二十五人，周恩来为组长，董必武为副组长）。”

10月24日，毛泽东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讨论关于

在职干部学习问题。会议决定：延安党与政治工作的高级干部，由中央学习组领导，先学习理论部分；各种专门干部，应将理论学习与自己的实际工作相联系。

11月1日，毛泽东同王稼祥给各地高级学习组发出通知，规定各地高级学习组理论部分的研究材料共10件，计有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报告结论及闭幕词、《联共党史》结束语、《论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艾思奇译的哲学大纲第八章、李达译的辩证唯物论教程的第六章等。

11月3日，毛泽东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关于延安高级学习组问题，会议确定134人为政治学习组组员；委托任弼时等审定提出参加思想方法学习组的名单；通知各学习组组员，今年12月底以前读完《论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季米特洛夫报告及六大以来文件选集，明年1月进至深入学习阶段。

11月4日，毛泽东同王稼祥向各地高级学习组发出关于学习内容的通知。通知说：“第一步均以列宁主义的理论与我党六大以来的政治实践为中央学习组及各地高级研究组学习研究范围”。“现定在本年内，先将季米特洛夫在国际七次大会报告及列宁‘左派’幼稚病二书，与六大以来八十三个文件，通读一篇。这种通读的目的，在于获得初步概念，以便在明春可进到深入研究阶段”。“暂不进行关于思想方法论的研究”。

11月25日，毛泽东审批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高级学习组组织条例的规定。次日，为中央书记处起草关于实施高级学习组组织条例的通知，指出：“近因各地高级学习组组织或宽或严，未能一致；由中央逐一审查批准，势不可能，特制定高级学习组组织条例，各地收到后，即根据此条例加以审查，决定去取，除组长副组长秘书三人须向中央报告其姓名、业务外，其余可只报人数。”

对王明错误的批评和帮助

1941 年 10 月 4 日，毛泽东将季米特洛夫给中共中央的一封电报交给王明看，电报问在法西斯德国继续进攻苏联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准备采取什么措施能在中国战场上积极从军事上打击日本，使日本不可能开辟第二战场并进攻苏联。毛泽东让王明研究一下这份电报，第二天一起讨论如何复电。王明认为这封电报对自己有利，于是他以这封电报为契机，在此后提出了许多原则性的问题，对毛泽东等人在九月会议上的批评进行反扑。

10 月 8 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工作会议，毛泽东在发言中对此作了说明。他说，昨晚王明与我、稼祥、弼时等同志谈话，提出许多原则性问题，说我们现在只与中产阶级关系弄好，当现在苏联与中国异常困难的时期，还须要与大资产阶级弄好；说边区施政纲领与新民主主义只要民族资产阶级便不好，而要与大资产阶级关系弄好。王明认为我们过去的方针是错误的，认为我们太左了。恰好相反，我们认为王明的观点太右了，对大资产阶级让步太多了，只是让步是弄不好的。

在这次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上，王明不仅不检查自己的错误，反而进一步阐述了他的政治主张。王明发言后，与会同志立即对他进行批评帮助。毛泽东说，今晚他说的有些问题与昨晚谈的不同，经过了一些修改。王明同志在武汉时期许多错误，我们是等待了他许久，等待他慢慢地了解，直到现在还没有向国际报告过。最近我和王明谈过几次，但还没有谈通，现在又提出对目前时局的原则问题，我们大家来讨论是好的。王明在武汉时期的工作，我和他谈过下面几个问题上有错误：（1）对形势估计问题——主要表现乐观；（2）国共关系问题——忽视在统战下的独立性与斗争性；（3）军事策略问题——王明助长了反对洛川会议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方针；（4）组织问题——长江局与中央的关系极

不正常的，常用个人名义打通电给中央与前总，有些是带有指示性的电报。不得到中央同意，用中央名义发了许多文件。这些都是极不对的。王稼祥发言说：关于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我的印象是共产国际没有说过不正确的话；季米特洛夫对王明说过，你回国要与国内同志弄好，就是他们推你当总书记，你也不要担任。任弼时发言说：我与恩来在莫斯科时，季米特洛夫找我们谈话，说到王明同志一些缺点，要我们告诉毛主席帮助王明改正。我们回来后对毛主席说过。前几次毛主席与王明同志谈他在武汉时期的错误，他还不愿意接受。昨晚他又提出新的原则问题。在今天书记处会议上，我不得不把季米特洛夫对我说的问题谈出来，帮助王明同志来了解问题。曼努意尔斯基问我：王明是否有企图把自己的意思当做中央的意见?是否想团结一部分人在自己的周围?季米特洛夫说：王明有些滑头的样子。有一次王明与米夫到一个地方参观，米夫向人介绍王明为中国党的总书记。张闻天插话：《救国时报》宣传王明为英明领袖。任弼时继续说：王明的主要问题是个人突出，自以为是，对国共关系问题有原则上的错误，特别是忽视反对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复活。其他同志还提出了十二月政治局会议的路线，新华日报拒绝刊登《论持久战》等问题。

针对毛泽东等人的批评，王明几乎逐条进行了反驳和解释。会议结束时，毛泽东说：准备在政治局会议上讨论王明提出的政治问题。王明提议检查中央政治路线，我们要提前讨论一次。关于苏维埃后期错误问题，停止讨论。希望王明对六中全会以前即武汉时期的错误及对目前政治问题的意见，在政治局会议上说明。并提议在政治局会议上不必说共产国际对王明的批评。

但是，王明一听说要他在政治局会议上说明他在武汉时期的错误及对目前政治问题的意见，并在政治局会议上进行讨论，便突然于 10 月 12 日宣布有病，不能参加政治局会议。

10 月 13 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任弼时向会议介绍，王明因病，医生要他休息 3 个月，他提出不能参加书记处工作会

议，只参加政治局会议；关于在武汉时期的错误，他同意毛主席10月8日的结论；关于他对目前时局的意见，请政治局同志到他住室去谈，以后由政治局讨论，他好了再看记录。任弼时还说，王明病中还问我季米特洛夫批评他什么，我记起一点告诉他：季说王明留在中央工作，不应该在外工作。

鉴于王明不能到会，毛泽东在会上发言说，关于武汉时期工作只好停止讨论。关于政治局会议讨论苏维埃后期“左”倾机会主义错误结论问题，我准备在此次政治局会议上只作一个结论草案，提交七中全会，七中全会也只作结论草案再提交七次大会作为党内的结论。毛泽东并说明了结论草案的要点。

会议决定：组织清算过去历史委员会，毛泽东、王稼祥、任弼时、康生、彭真参加，以毛泽东为首，由王稼祥起草文件。组织过去被打击干部审查委员会，陈云、高岗、谭政、陈正人、彭真参加，以陈云为首。

从此，王明就借口有病长期不参加中央的会议和整风运动。

肯定李鼎铭提出的关于精兵简政的提案

1941年11月6日至21日陕甘宁边区召开了第二届参议会。在开幕那天，毛泽东发表了重要讲话，号召共产党人要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希望党外各参议员本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精神，对抗日救国大计提出意见和建议。当时还是米脂县参议会会长的李鼎铭听了毛泽东的讲话，深受感动，他带头响应毛泽东的号召，根据边区群众这些年来经济负担过重的实际情况，与其他10名参议员一道向会议提出一个有关财政问题的提案，要求“政府应彻底计划经济，实行精兵简政主义，避免入不敷出、经济紊乱之现象”。

这个当时被编为八十一号的提案一经提出，在参议会上立即引起反响，有的赞成，有的反对。反对意见认为：“提倡精兵主义，

部队就不能发展”，“要裁减政府工作人员，民主政权如何巩固发展”，甚至还有人以李鼎铭是党外人士，怀疑他提出精兵简政的动机纯不纯。毛泽东看到这个提案，非常重视。他用红笔把其中的重要段落圈起来，又把它抄在自己的笔记本上，旁边还加了一段批语：“这个办法很好，恰恰是改造我们的机关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对症药”。毛泽东肯定了这一提案，并对一些不正确的意见，进行了批评和说服工作。

11 月 17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毛泽东明确表示肯定精兵简政政策，他说：1942 年度边区财政经济方针须实行两大原则：第一精兵简政，调整人员；第二扩大收入，发展生产。在毛泽东的肯定和支持下，11 月 18 日，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以 165 票多数通过关于精兵简政的提案。

11 月 21 日，毛泽东在二届参议会闭幕会上说：“开了十五天会，闭幕了，大家热心，我觉得开的很好。总结起来有两大成功：第一，暴露了我们许多东西，好的东西和坏的东西，……第二，这是个很大的学习，使共产党员向党外人士学习，……”他号召要反对两种主义，主观主义和关门主义，要实事求是，与党外人士民主合作，主观主义和关门主义不打破，革命将不能成功。

二届参政会闭幕后，12 月 3 日，陕甘宁边区发出关于实行精兵简政的训令，12 月 4 日又发出了实行精兵简政给各县的指示信。12 月 17 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敌后抗日根据地工作的指示》，明确指出：“为进行长期斗争，准备将来反攻，必须普遍实行‘精兵简政’；“‘精兵简政’，节省民力，是目前迫切的重要任务”。这样，实行精兵简政的工作不仅在陕甘宁边区，而且在全国各抗日根据地都开展起来了。

从日本东条英机上台到太平洋战争爆发

1941 年 10 月 16 日，日本近卫内阁总辞职。18 日，东条英机

任首相的内阁正式成立。

原定于10月18日讨论时局问题，因材料不足（苏德战况，日寇动向，英美动向，重庆动向），须再看几天才有眉目，于是改日讨论。毛泽东在这一天致周恩来的电中，请周将自己的观察见告，并指出："依大局看，似乎还不能说对苏对我已经是怎样不利的。但我们应准备不利情况的到来。"

10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时局问题。毛泽东在发言中说：最近时局有到转变关头的味道。国民党说不要悲观，实际上有悲观情绪；蒋介石又提出三北政策（即日军北进，国民党军北进，八路军新四军北进）。现在我党员中也有悲观情绪，这种悲观失望是没有根据的。过去我们党的困难莫过于大革命失败后反动时期的游击战争和长征时期，但我们都渡过了。现在我们党有长期斗争历史和新的力量，是能够应付困难局面的。我们的路线仍须继续过去的方针，坚持团结，要团结就要进行斗争，我们要使国民党既不能投降又不能"剿共"。要保证党的独立性。现在莫斯科危急，但德国的进攻可能已到最高点，决定的关键在今后一二个星期内，一个星期后看形势发展更会明显。日本新内阁（东条英机内阁）应估计为直接准备战争的军人内阁，日本有北进的危险，但尚未与英、美妥协还不敢北进；南下可能性较大，但日本要准备战争，也不会立即南下，目前不会对我国有大的军事行动，但今后仍有大的进攻形势。

同日，毛泽东关于目前时局问题，致电周恩来并告廖承志，指出："东条内阁是一个直接准备战争的军人内阁，他是直接准备战争的，但还不见得马上动兵。其战争趋向有北进危险，但南进的可能性并未丧失。国民党正肯定北进，我们不必与之一致。无论日本北进南进，其对华侵略决不放松，此点我们应加强调。关于德苏战争，莫斯科一线虽尚未脱离被侵略危险，但苏联还是能坚持的，德国的情况并不怎样好，美、英、苏、中的合作必能战胜法西斯。当此党内外都生长着悲观情绪之时，我们应坚持正确立

场，反对这种悲观情绪。”

11 月 7 日，毛泽东在延安发表关于时局的广播讲演，指出：“目前全人类的任务是团结起来反对法西斯，而全中国人民的任务则是团结起来反对日本的进攻。现在这两种团结都有大大加强的必要。”毛泽东十分强调“美国应该毫不踌躇地向德国宣战，这是一个绝对不可回避不应回避的步骤，实现得愈迟就只有让德国炸沉更多的美国船。”同时，毛泽东又十分预见地提出警告：“美国绝不应听信日本的阴谋，与日本订立任何的妥协，美国应和中国及英国一道，以实力制裁日本法西斯。”

12 月 8 日（夏威夷当地时间为 12 月 7 日），日本海空军突然袭击美国在太平洋的海军基地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

中共中央得到这一消息，当天即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时局。毛泽东在发言中说：过去情况尚未弄清楚，因莫斯科危险未过去，日苏战争、国共关系也未明朗化。现在已明朗化了。自罗斯托夫胜利开始，德苏战争好转已确定。日美战争爆发后已解除日苏战争的危险。过去蒋介石估计是三北政策，现在是三南政策，对蒋不利。日军可能截断滇缅路，使蒋向南。日美战争爆发，对中苏两国有利之处有六点：第一，华北华中的敌军势将逐渐减弱，即是说无大举增兵之可能的；第二，国民党进攻边区的可能性会减少；第三，给亲日亲德两派以致命打击，我们使国民党既不投降又不能“剿共”的可能性更大；第四，中国民主政治的前途也更大了；第五，苏联可从东方抽调一部兵力向西；第六，欧洲有迅速造成第二条战线之可能。将来战争欧洲会短些，东方会长些。日美战争前途，最初对日会有利，战争会延长，将要二三年后英、美准备好才能决战。英、美可能集中力量先打败德国，然后英、美力量均向东打败日本。今后将使国民党既不能投降又不能“剿共”，我们的政策要一打一拉，有软有硬。过去有人认为对国民党硬会坏事，这是不对的。当硬时应该硬，使它既不能投降又不能“剿共”，例如打败了阎锡山的旧军，因此阎

对我们代表客气。关于工作布置，提议由中央发一指示，要加强南洋华侨工作，廖承志应大胆地在香港与英国建立关系。

12 月 9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继续讨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时局。毛泽东主持修改通过《中国共产党为太平洋战争的宣言》、《中央关于开展太平洋反日民族统一战线及华侨工作的指示》。

12 月 9 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国共产党为太平洋战争的宣言》。宣言说："这一太平洋战争，是日本法西斯为了侵略美国英国及其他各国而发动的非正义的掠夺的战争。而在美国英国及其他各国起而抵抗的一方面，则是为了保卫独立自由与民主的正义的解放的战争"。"自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全世界的一切民主国家也将无处不受法西斯国家的侵略，同时全世界的一切民主国家也将无处不起而抵抗。全世界一切国家一切民族划分为举行侵略战争的法西斯阵线与举行解放战争的反法西斯阵线，已经最后地明朗化了"。宣言分析了世界法西斯阵线与反法西斯阵线当前的形势及今后的发展，指出"法西斯阵线的最后失败局面与反法西斯阵线的最后胜利局面是已经确定了"。"中国政府与中国人民应该继续过去五年的光荣战争，坚决站在反法西斯国家方面，动员自己一切力量，为最后打倒日本法西斯而斗争"。

毛泽东对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国际时局又有精辟的论述，他在 12 月 12 日致周恩来的电报中说："在半年内英美均非日本之敌，但只要留得新加坡、马尼拉、达尔文等二三据点，即可在半年后造成对日相持局面，以待日军之敝，然后举行反攻"。"英、美的总方针可能是对日取守，而对德取攻，先集合英、美、苏力量解决德国，然后集合英、美、苏、中力量解决日本，而两方面苏联都将是决定力量"。"德国目前进入了进退维谷的歧途，但东线既无路可走，便有迫使希特勒在东线取守势在南线或西线取攻势的可能，如此则是希特勒自己造成第二条战线，也就有了迫使英、美采取集中主力（英是海陆空主力，美是空军与资源主力）打德之可能性"。

1942 年

接见绥德青年代表

中国青年反法西斯代表大会于1月4日在延安中央大礼堂召开，前后方各地代表200余人到会，凯丰致开幕词，朱德等出席会议并讲了话。会议通过8项提案，选出凯丰、冯文彬、胡耀邦等19人为“中国青年反法西斯临委会”委员。大会还发出致全国青年书和告世界各国青年书。

1月9日，毛泽东接见绥德分区代表团。该团一行20人，有绥德师范、米脂中学学生代表及三青团团友等。毛泽东与代表们一一握手，询问他们学习和生活的近况。在两个小时的座谈中，回答了代表们提出的20多个问题，包括太平洋战争没有苏联参加能不能胜利，毛泽东幼时爱看什么书，什么时候知道革命，还有张国焘、李立三、陈独秀的近况等等。毛泽东逐一予以简明的答复。有人问：青年应信仰何种主义？毛泽东回答：三民主义。三青团团友会的代表问：你们对三青团的态度如何？毛泽东回答：尊重他们，帮助他们。座谈完毕后代表们纷纷要求与毛泽东能经常通信。辞别时，毛泽东手擎灯烛，送代表们出会客室。

为《文化课本》作序

《文化课本》是凯丰、徐特立、范文澜等编辑的。1942年1月17日，毛泽东为之作序。序言指出：“一个革命干部，必须能看能写，又有丰富的社会常识，以为从事工作的基础和学习理论的基础，工作才有作好的希望，理论也才有学好的希望。没有这个基础，就是说不识字，不能看，不能写，其社会常识与自然常识限于直接见闻的范围，这样的人，虽然也能学到某些革命道理，但要学得好也是不可能的。”这本书当时在延安出版。毛泽东为《文化课本》写的序，在建国后 正式出版的《毛泽东同志论教育工

作》等书中也已公开发表。

号召全边区部队学习研究古田会议决议

为印发和学习研究古田会议决议（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毛泽东于1月23日致信中央军委政治部副主任谭政、留守兵团政治部主任莫文骅，说："将四军九次大会决议多印数千份，发至留守部队及晋西北部队，发至连长为止，每人一本，并发一通知，叫他们当作课材加以熟读。（各级干部均须熟读）。"留守兵团接到这一指示后，即大批地印发《古田会议决议（1929年12月）》给各部队，并于4月6日向各部队发出训令。训令指出："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不仅对当时中国红军的建军有着很大的意义与决定作用，就是在今天八路军新四军的建设上，仍然有着伟大的实际意义"。"今后的留守兵团及保安部队，要把这个决议当作改进我们工作的指南，不论上自高级指挥员和政治人员，下至科员干事排长，都要熟读也灵活地应用这个决议到我们的工作中去。读这个决议的时候，应该把它的条文做为检查我们过去与现在工作中优缺点的提纲和指南，而不是死板地把它当做教条"。训令还具体规定，如斗争经验比较缺乏而没有阅读这个决议文化程度的同志，主要的教育方法：（一）上课；（二）讨论；（三）熟读。（文化程度很低者，当文化课上）。教授方法，多采取启发式，多打比方，说故事，多举例，切忌教条式地宣读。教育期定为4月15日至7月1日。

第一次公开承认资本主义生产并给予奖励

1942年1月28日，毛泽东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这次会议集中讨论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及其三个附件（关于地租及佃权问题；关于债务问题；关于若干特

殊土地的处理问题)。这个决定是“中央在详细研究各地经验之后，特将我党土地政策作一总结的决定”，所以决定在承认农民（雇农包括在内）是抗日与生产的基本力量和承认地主的大多数是有抗日要求的，一部分开明绅士并是赞成民主改革的两条基本原则的基础上，特别指出第三条基本原则，即“承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中国现时比较进步的生产方式，而资本主义、特别是小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是中国现时比较进步的社会成份与政治力量。”

在阐述第三条基本原则时，决定指出：“富农的生产方式是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富农是农村中的资产阶级，是抗日与生产的一个不可缺少的力量。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与富农，不但有抗日的要求，而且有民主要求。故党的政策，不是消弱资本主义与资产阶级，不是消弱富农阶级与富农生产，而是在适当地改善工人生活条件之下，同时奖励资本主义生产与联合资产阶级，奖励富农生产与联合富农。但富农有其一部分封建性质剥削，为中农贫农所不满，故在农村中实行减租减息时，对富农的租息也须照减。在对富农减租减息后，同时须实行交租交息，并保障富农的人权、政权、地权、财权。一部分用资本主义方式经营土地的地主（所谓经营地主），其待遇与富农同。”

毛泽东在讨论发言中，指出这一决定的重大理论意义，是我党第一次公开承认资本主义生产并给予奖励。他还指出：现在解决土地问题必须保存一部分封建性，不使地主跑到敌人方面去。对如何理解保障地主的人权、政权、地权、财权（决定上的内容），特别是政权的问题，毛泽东说，在文件法律上地主有人权、地权，但实行上是农民的政权。实行这个政策，是破坏敌人统一战线的最好办法。毛泽东最后指出：土地政策，研究了好几个月了，是我党以前未曾有过的决定。凡事不要轻易决定，决定的只是已经成熟了的事情。

修改审定《中共中央关于如何执行土地政策决定的指示》

2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通过经毛泽东最后修改审定的《中央关于如何执行土地政策决定的指示》。毛泽东出席了会议。

该指示指出：1月28日中央政治局所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及其三个附件（关于地租及佃权问题；关于债务问题；关于若干特殊土地的处理问题），是综合五年来各地经验而得的结论。“它的基本精神是先要能够把广大农民群众发动起来，如果群众不能起来，则一切无从说起。在群众真正发动起来后，又要让地主能够生存下去。所以在经济上只是削弱（但一定要削弱）封建势力，而不是消灭封建势力，对富农则是削弱其封建部分而奖励其资本主义部分。在经济上，目前我党的政策，以奖励资本主义生产为主，但同时保存地主的若干权利，可以说是一个七分资本、三分封建的政策”。指示还具体讲述了在实行联合地主抗日的战略方针时，必须采取先打后拉，一打一拉，打中有拉，拉中有打的策略方针，要防止发生右的和过左的错误。指示对减租减息政策作了进一步的阐述：“减租是减今后的，不是减过去的；减息则是减过去的，不是减今后的，大体上以抗日前后为界限”。在减租问题上，应当允许农民清算旧账，以此作为发动群众的手段。到了群众已经充分发动，要把双方争论加以调停，使归平允。在减息问题上，抗战以后是借不到钱的问题，不是限制息额的问题。各根据地都未认清这个道理，强制规定今天息额不得超过一分或一分半，这是害自己的政策。今后应该听任农村自由处理，不应规定息额。目前农村只要有借贷，即使利息是三分、四分，明知其属于高利贷性质，亦于农民有济急之益。

《整顿党的作风》

1942年1月26日，毛泽东起草《中宣部宣传要点》，内容是反对党内的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

2月1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作《整顿学风党风文风》的报告（建国后编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时，题目改为《整顿党的作风》）。毛泽东在报告中指出："我们的学风还有些不正的地方，我们的党风还有些不正的地方，我们的文风还有些不正的地方。所谓学风有些不正，就是说有主观主义的毛病。所谓党风有些不正，就是说有宗派主义的毛病。所谓文风有些不正，就是说有党八股的毛病"。"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这就是我们的任务"。关于主观主义，毛泽东指出："我们党内的主观主义有两种：一种是教条主义，一种是经验主义"。"但是在这两种主观主义中，现在我们党内还是教条主义更为危险"。"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能够精通它、应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真正的理论在世界上只有一种，就是从客观实际抽出来又在客观实际中得到了证明的理论，没有任何别的东西可以称得起我们所讲的理论"。"我们所要的理论家是什么样的人呢？是要这样的理论家，他们能够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正确地解释历史中和革命中所发生的实际问题，能够在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种种问题上给予科学的解释，给予理论的说明"。"有书本知识的人向实际方面发展，然后才可以不停止在书本上，才可以不犯教条主义的错误。有工作经验的人，要向理论方面学习，要认真读书，然后才可以使经验带上条理性、综合性，上升成理论，然后才可以不把局部经验误认为即是普遍真理，才可以不犯经验主义的错误"。关于宗派主义，毛泽东指出："由于二十年的锻炼，现在我们党内并没有占统治地位的宗派主义了。但是宗派主义的残

余还是存在的，有对党内的宗派主义残余，也有对党外的宗派主义残余。对内的宗派主义倾向产生排内性，妨碍党内的统一和团结；对外的宗派主义倾向产生排外性，妨碍党团结全国人民的事业”。防止克服党内关系上的宗派主义，就应该提高共产主义精神，“以党的利益高于个人和局部的利益为出发点”，“使党达到队伍整齐、步调一致的目的，以利战斗”。防止克服党外关系上的宗派主义，就要求共产党员“密切联系群众，而不要脱离群众，学会尊重党外人士，看人家的长处，而切忌妄自尊大”。关于党八股，毛泽东指出，“党八股是藏垢纳污的东西，是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它是害人的，不利于革命的，我们必须肃清它”。毛泽东最后指出：“我们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有两条宗旨是必须注意的：第一是‘惩前毖后’，第二是‘治病救人’”。“对待思想上的毛病和政治上的毛病，决不能采用鲁莽的态度，必须采用‘治病救人’的态度，才是正确有效的方法”。这一报告，标志着延安整风转入全党范围的普遍整风时期。

2月11日，毛泽东在《中央宣传部关于进行反主观主义、反教条主义、反宗派主义、反党八股给各级宣传部的指示》上批示：“很好。发广播。登党的资料。抄给西北局宣传部、总政宣传部。”同一天，这个《指示》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被通过，同意发出。该指示列举了中央在这一时期内接连发表的重要文件，计有：关于党性的决定、调查研究的决定、改造延安干部学校教育的决定、高级学习组决定、毛泽东1941年5月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的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11月6日在边区参议会上发表的反宗派主义的演说、1942年2月1日在中央党校开幕典礼上发表的整顿学风（反对主观主义教条主义）整顿党风（反宗派主义）整顿文风（反党八股）的演说、2月8日又在延安干部会议上发表的反党八股的演说、1月26日中央宣传部发表的反主观主义反宗派主义的宣传要点。指示指出这些决定演说指示的主要内容，都是为着一个目的，就是要贯彻遵义会议以来党的正确路线，纠正主

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的错误。指示提醒各级宣传部，务必以极大的力量集中来宣传解释中央的这一思想，务必达到在党的全部工作中贯彻中央的这一思想。

参观延安讽刺画展

延安讽刺画展于1942年正月初一到初三在军人俱乐部展出。画展展示了华君武、蔡若虹、张谔3位画家的60余幅讽刺画。画的内容主要是批评当时出现的某些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党八股，恋爱、开会不遵守时间，乱讲自由，自高自大等不良现象。连日来参观者络绎不绝。

画展到第三天，即2月17日，参观群众仍没减少。这天，毛泽东和王稼祥也来参观画展了，毛泽东仔细地看了每幅画，揣摩着每幅画的意境。他不住地点头称赞，偶然也在一幅画面前停住脚步，思考着什么，有时还向陪同参观的画家们提出一些问题。总的来说，对这次画展毛泽东是满意的，表扬了三位画家，鼓励他们继续努力，创作出更多更好的革命讽刺画。他还通知中央领导同志也都来参观一下这个画展。

毛泽东参观讽刺画展后，有一天邀请华君武、蔡若虹、张谔三人谈话。毛泽东说，有一幅画，叫《一九三九年所植的树林》(华君武作，载8月19日《解放日报》)。那是延安的植树吗？我看是清凉山的植树。延安植的树许多地方是长得好的，也有长得不好的。你这幅画，把延安的植树都说成是不好的，这就把局部的东西画成全局的东西，个别的东西画成全体的东西了。漫画是不是也可以画对比画呢？比方植树，一幅画画长得好的，欣欣向荣的，叫人学的；另一幅画画长得不好的，树叶都被啃光的，或者甚至枯死了，叫人不要做的。把两幅画画在一起，或者是左右，或者是上下。这样画，是不是使你们为难呢？华君武说，两幅画对比是可以画的。但是，不是每幅漫画都那样画，都那样画，讽

刺就不突出了。为了更好地把握住如何正确运用讽刺，华君武向毛泽东说了一件事。有一次桥儿沟发大水，山洪把西瓜地里的西瓜冲到河里，鲁艺有些人下河捞西瓜。但是，他们捞上来不是交还给种西瓜的农民，而是自己带回去吃了。华君武问，这样的漫画可不可以画呢？毛泽东说，这样的漫画，在鲁艺内部是可以画的，也可以展出，而且可以画得尖锐一些。如果发表在全国性的报上，那就要更慎重，因为影响更大。毛泽东接着给画家们讲了一个故事：从前有一个小孩，老擤鼻涕，父母老骂他，也改不了。后来小学的老师看见他一天没有擤鼻涕，对他进行了鼓励和表扬，从此小孩就改了。毛泽东认为对人民的缺点也是这样，不要冷嘲，不要冷眼旁观，要热讽，要鼓励。鲁迅的杂文集叫《热风》，态度就很好。

要造成一河革命的大水

1942年2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讨论在职干部教育问题时，毛泽东发言指出：政治局五大业务（思想、政治、政策、军事、党务）中以思想为第一位，要抓住思想首先要以干部教育为主。现在有些干部“习非胜是”，把不正确的东西习以为是。纠正干部的毛病，要精细，不能粗暴。但必须造成一个风气，要造成一河大水，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的水，实行思想革命，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水，彻底改革各部门的工作。过去中宣部只想用一两桶水是无法彻底改革的。党校课程要改造。现在党校教中国古代史及西方史，离现实太远。应首先进行反对主观主义与宗派主义的教育，总课题为党的路线，研究季米特洛夫论干部政策与干部教育政策、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六大以来》。

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对该决定，毛泽东曾三易其稿，修改中加写了几段重要的话，如“政治教育

之目的，在于使干部除精通其专门业务、局部情况与局部政策之外，还能通晓一般情况与一般政策，扩大干部的眼界，避免偏畸狭隘、不懂大局的弊病。必须指出，好谈一般政治而忽视专门业务的倾向是不对的，但局限于专门业务而忽视一般政治的倾向，也是不对的。”这一段就是毛泽东重新写过的。

会议还通过《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党校组织及教育方针的新决定》，确定“今后党校直属中央书记处，其政治指导由毛泽东同志负责”。

参加张浩的葬礼

张浩，原名林育英，长期从事职工运动，曾任全国总工会常委和海员总工会党团书记，1933 年赴莫斯科任中共驻共产国际成员和赤色职工国际代表。1935 年回国，12 月参加瓦窑堡会议，传达共产国际七大关于建立世界反法西斯人民战线的精神。会后任中共中央白区工作委员会副书记。1936 年 1 月，参与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工作。他根据党中央的指示，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同张国焘分裂党的错误路线作斗争，迫使其取消了另立的伪“中央”，为维护党的团结做出了特殊的贡献。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政委。1938 年回到延安任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副书记。1940 年主持创办《中国工人》杂志。同年 4 月 30 日，在陕甘宁边区工人和各界群众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的集会上演讲。由于他不顾多病的身躯，长期忘我地工作，终于积劳成疾，在演说时，突发脑溢血病，从此卧床不起。在病中，他仍以坚韧不拔的毅力同病魔作斗争，同时努力继续为党作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如在 1941 年 1 月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后，党内有些同志把形势估计得过于严重，认为这是第二个“四·一二”事件，准备同国民党决裂。张浩得知消息后，立即写信给毛泽东，提出自己的看法：“目前的主要矛盾仍为帝国主义争夺世界霸权的战争，

国内的阶级矛盾虽然存在着、发展着，但仍为次要矛盾。”他认为皖南事变不同于“四·一二”事变，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我们有力量，即有布尔什维克的党中央，有八路军、新四军，有抗日民主根据地，有广大的抗日民众，有许多的中间分子同情我们等等。”因此，他主张党在皖南事变后应继续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毛泽东在回信中肯定了他的意见，要他好好保养身体，并亲自到医院看望了张浩。

张浩敬仰毛泽东，忠于党中央。他在弥留之际恳请党中央，在他死后将他埋葬在延安青年文化沟桃花岭。桃花岭和党中央、毛泽东的驻地隔河相望。张浩无限深情地说：“我要天天望着党中央、毛主席。”后来，党中央批准了他的遗愿。毛泽东还情深意长地说：“让张浩同志天天监督我们。”

1942 年 3 月 6 日凌晨，张浩在延安中央医院病逝。

3 月 9 日，毛泽东参加在中央党校门前广场上举行的安葬张浩的葬礼。毛泽东和中央各同志在灵台旁边轮流护灵之后，祭礼开始了。任弼时主祭，李克农读祭文，康生报告张浩的生平事略。老海员工人朱宝庭代表中央职工委，谢觉哉代表边区政府与边区 200 万人民，高长久代表边区几万工人相继致词。最后由张浩的家属致答词，次子林汉雄挥泪告诉大家：“努力学习，准备将来好好工作，继续爸爸尚未完成的事业，这样才能对得住党，对得住死去的爸爸……”祭礼结束，张浩的灵柩装上白布帷的灵车，送葬者迅速结成了漫长的行列。毛泽东亲为执绋。送葬队伍抵达桃花岭下，距墓地仍有一段高陡的山路，人们抬着灵柩爬上山顶。毛泽东同朱德、任弼时等亲自抬棺而行。队伍齐集山顶，灵柩送入墓穴，毛泽东又亲自给墓穴奠土，按照张浩生前的愿望，将他葬于桃花岭山顶。毛泽东还为墓碑题写了“张浩同志之墓”6 个大字。

改进《解放日报》工作

《解放日报》创刊以来，一直受到毛泽东的关注。1942年1月24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就《解放日报》的工作问题指出：社论、新闻、广播三者应并重。重视社论与专论，并出题目分配中央同志写文章，报社要组织写文章的工作。报纸的第三版和第四版应贯穿党的政策，题材应切实，文字应通俗。要组织新闻，在新闻中表现党的路线。中央各部委应组织自己的新闻。各部委要写新闻稿、评论稿。毛泽东还谈到广播，他说：广播比3千份报纸更重要，要成为第一位的工作。党务广播材料，要求中央各部委、西北局每月至少一条。

2月2日，《解放日报》在三版右下角不显著的位置，报道了毛泽东昨天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大会上发表关于整顿党的作风的演说的消息。2月10日，在三版左下角同样不显著的位置，报道了8日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召集的干部会议上毛泽东发表《反对党八股》的消息。

2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解放日报》的工作问题。毛泽东发言指出：现在《解放日报》还没有充分表现我们的党性，主要表现是报纸的最大篇幅都是转载国外资产阶级通讯社的新闻，散布他们的影响；而对我党政策与群众活动的传播，则非常之少，或者放在不重要的位置。报纸应以自己国家的事为中心，《解放日报》应把主要注意力放在中国抗战、我党活动和根据地建设上面，要反映群众的活动，充实下层消息。毛泽东提议根本改变《解放日报》现在的办报方针，使它成为贯彻我党政策与反映群众活动的党报。会议同意毛泽东的上述意见，决定委托秦邦宪根据本日会议的讨论，拟出改革方案，提交中央讨论。在新方案实施前，先进行改良。

2月20日，《解放日报》召开编委会，传达毛泽东的意见：我

们的报上不能反映党的消息的原因，不仅是报纸本身的缺点，而且延安各机关要负责。以后希望各部门的负责同志注意，尤其各机关的政治秘书要报道这些消息。

3 月 11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秦邦宪提出的《解放日报》改造草案。毛泽东发言说：我党现有 80 万党员，50 万军队，但党报是弄得不好的。我们自去年 8 月起已开始改造党的工作，但党报尚未实现彻底的改造。今年中央要抓住党校、党报、中宣部三个重要工作。党报是集体的宣传者与组织者，对党内党外影响极大，是最尖锐的武器。要达到改造党的目的，必须首先改造党报的工作。报社的同志要了解经过党报来改造党的方针，现在报社的同志没有了解这个方针。报纸必须地方化，要反映地方情形。党报要反映群众，执行党的政策。毛泽东还指出：党性是一种科学，是阶级性的彻底表现，是代表党的利益的，无论什么消息都要想想是否对党有利益。党报要允许同情者作善意的批评。关于办法问题，毛泽东提出发一个关于党报工作的指示，学习写分析文章，调一些好干部到报社工作等意见。会议决定，由王稼祥、秦邦宪、何凯丰、胡乔木、余光生组成中央党报委员会。3 月 16 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出《为改造党报的通知》。

3 月 14 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指出关于改进《解放日报》已有讨论，使之增强党性与反映群众，《新华日报》亦宜有所改进。

3 月 31 日，毛泽东同秦邦宪 在杨家岭中共中央办公厅召集延安各部门负责同志和作家 70 多人开座谈会，讨论《解放日报》改版问题。毛泽东在会议结束时讲话，指出：利用《解放日报》，应当是各机关经常的业务之一。经过报纸把一个部门的经验传播出去，就可推动其他部门工作的改造。我们今天来整顿三风，必须要好好利用报纸。他在讲话中还批评了在整顿三风的讨论中出现的绝对平均的观点和冷潮暗箭的作法。指出：近来颇有些人要求绝对平均，但这是一种幻想，不能实现的。小资产阶级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我们应该拒绝。批评应该是严正的、尖锐的，但又应

该是诚恳的、坦白的、与人为善的。只有这种批评态度，才对团结有利。冷嘲暗箭，则是一种销蚀剂，是对团结不利的。

《解放日报》从4月1日起正式改版。当天发表社论《致读者》。社论根据整风精神，从报纸的党性、群众性、战斗性和组织性等方面检查了该报存在的缺点，提出改革的目的是要使该报成为"真正战斗的党的机关报"。报纸的整个篇幅要"贯彻党的路线，反映群众情况，加强思想斗争，帮助全党工作的改进。"

鼓励舒群当主编

1942年3月11日，《解放日报》"文艺"专栏出满百期。专栏主编丁玲调文抗，决定由29岁的舒群任主编。该报连续3天登出"百期"特刊。舒群在《为编者写的》一文中说："一个编者也应该有多方面的才能，始能胜任。可是在我们，又多半是作家兼任编者，那就难上加难"。"一个作家未必是一个编者（但我这并不是对于丁玲同志的'下台'，或是我的'上台'，在这前后之间，有所骄傲，有所安慰和有所解脱）"。不久，《解放日报》改版，撤消"文艺"专栏刊头，改第四版为各种综合性副刊。

当毛泽东得知舒群有不能胜任副刊主编的思想问题时，就找舒群做他的思想工作。毛泽东说：要找这么个完全的人，这么有能力的人，你给我介绍一位。难道没有这么一个人，综合性的副刊就不办了吗？全能的人，现在没有，将来也不能有。你编文艺副刊，文艺副刊是个点，也是个面。因为你是搞文学的，所以文学是你的点，文艺是你的面。你也要由点到面嘛。你编综合性副刊，文艺是你的点，社会科学就是面了。都是先点后面，从点到面嘛！先文学的点后文艺的面；先文艺的点，后社会科学的面。面反过来又会促进点，使点深化。只要在工作实践中学习、提高，由点到面，你就一定能胜任这项工作。

《如何研究中共党史》

1942年3月18日，毛泽东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会议决定中央学习组与边区工作总结委员会共同开始研究中共党史，按大革命、苏维埃、抗战三大时期进行，一面请现在延安的每个时期党的负责人报告当时情况，一面从各方面收集党史资料，并首先编印一本适合中级干部阅读的党史文件选集。为此，3月24日，毛泽东同任弼时致电周恩来、董必武，告知中央正在编印中共党史资料选录。请他们用一切方法找到下列各文件邮寄或送延安：（一）汪（精卫）陈（独秀）联合宣言；（二）彭述之著《中国革命根本问题》。（三）瞿秋白著《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四）五次大会决议。

3月27日，毛泽东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会议讨论中央学习组新的学习计划，决定通读《六大以来》一书的计划告一段落，从下周起开始研究中共党史与中国革命史，首先请毛泽东报告中共发展三个时期的轮廓。会议还决定，本年内首先注重党的路线的学习，再进行各种专门业务的精研。各种学习研究方法，都须采用“古今中外法”，即研究问题须收集当前的与历史的、中国的与外国的各种材料、论著，加以分析与综合。

3月30日，毛泽东在中央学习组作《如何研究中共党史》报告。他说：把党的路线政策的历史发展搞清楚，“这对研究今天的路线政策，加强党内教育，推进各方面的工作，都是必要的。”“这个工作我们过去没有做过，现在正在开始做”。关于如何研究党史，毛泽东指出：“我们是用整个党的发展过程做我们研究的对象”。“按照历史发展的顺序，我们党的历史，我觉得可以分为这样三个阶段：大革命时期是第一阶段；内战时期是第二阶段；抗日时期是第三个阶段”。“中共党史分成这三个阶段，就斗争目标、打击对象、党的政治路线讲，都合乎事实，都说得通”。“根本的

方法马、恩、列、斯已经讲过了，就是全面的历史的方法”。通俗地讲，我想把它叫作“古今中外法”。“所谓‘古今’就是历史的发展，所谓‘中外’就是中国和外国，就是己方和彼方”。“研究中国党史，应该以中国做中心”，“不研究中国的特点，而去搬外国的东西，就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我们要把马、恩、列、斯的方法用到中国来，在中国创造出一些新的东西。”“研究党史上的错误，不应该只恨几个人，如果只恨几个人，那就是把历史看成是少数人创造的”。

“四三”决定

1942 年 4 月 2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会议研究在延安讨论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及毛泽东整顿三风报告的方法问题。毛泽东发言指出：讨论整顿三风报告与检查工作，开展自我批评，要有计划有领导地进行，不应放任。思想斗争的火力，不是只对着老干部，而应对着新老干部双方的毛病，使新老干部互相批评之后，更进一步地相互了解与团结。态度一定要好，态度不好，就会引起人家不满意。不要暗箭，不要冷嘲，热骂还好，冷嘲就不好，因为它会搞得疑神疑鬼。这种空气不要在共产党里面增长，它不利大家，使党不团结，使党分裂。不要暗箭，应该是采取积极的的态度上下夹攻。我们的目的，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在机关学校里面要开展民主，但还须有领导使这个运动发展到正确的方向去。对于我们各部门的工作，这一次要来一个彻底的检查。

会议决定关于这个问题由中宣部发一通知。

4 月 3 日，中共中央书记召开工作会议。会议通过经毛泽东修改的《中央宣传部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四三”决定）。决定指出，进行整风“是党在思想上的革命”。首先必须由党的各部门领导机关负责人把这种责

任担负起来。各机关各学校对中央决定、毛泽东同志报告及其他中央指定的文件，要深入研究，热烈讨论，先把这些文件的精神和实质领会贯通作为自己的武器。在阅读和讨论中，每人都要深思熟虑，反省自己的工作及思想，反省自己的全部历史；必须作历史的全面的考虑，避免有害的片面性。在检查工作时，要切实地检查，不仅只检查领导方面的，而且要检查下面的和各个侧面的。要运用中央文件的精神，彻底改造本部门的工作，彻底改造每个同志的工作作风和思想作风。讨论和检查的方式，应以上面领导和发扬民主并重，不可偏废。研究、讨论和检查的目标是为着认真地切实地整顿学风、党风、文风，改造工作、团结干部、团结全党。为此，在讨论中，应时常把握毛泽东同志关于“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精神。决定对于学习的文件、学习的时间以及考试的办法等，都作了具体规定。

毛泽东在会上还提议，延安进行讨论整顿三风与检查工作的各系统，由以下一些人分工领导：中央直属系统由康生、李富春负责；军委直属系统由王稼祥、陈云负责；中央党校由毛泽东负责；各学校（除军事学校）由何凯丰负责；陕甘宁边区由任弼时、高岗负责。会议通过了这项提议。

约见作家了解情况

为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毛泽东会前约见了许多作家了解情况，掌握大量的第一手材料。

萧军很早就受毛泽东的委托，将收集到的文艺界的情况材料陆续送给毛泽东。4 月 4 日，毛泽东致信萧军：“来信及附件收读，并转给几个同志看去了，感谢你的好意。”4 月 7 日，毛泽东写信约萧军于当天下午或晚上来谈，萧军应约前往。他们接连两天谈了有关党的文艺方针政策等问题。4 月 13 日，毛泽东又给萧军 写了一封信：“来信敬悉。前日我们所谈关于文艺方针诸问题，拟请

代我搜集反面的意见。如有所得，祈随时示知为盼！”召开文艺座谈会的日期还没有定下来，萧军不打算参加文艺座谈会，于是他给毛泽东写信说要动身旅行去。4 月 27 日，毛泽东复信萧军，恳切地挽留他：“准备本星期六开会，请你稍等一下出发，开完你就可走了。会前我还想同你谈一下，不知你有暇否？我派马来接你。”

4 月 9 日，毛泽东给作家、延安中央研究院文艺研究室主任欧阳山一信：“来信收到。拟面谈一次，如同意，请今日惠临一叙，并盼与草明同志偕来。”毛泽东与欧阳山、草明谈话后，4 月 13 日又致欧阳山、草明一信：“前日我们所谈关于文艺方针诸问题，拟请代我搜集反面的意见，如有所得，祈随时赐示为盼！”在收到欧阳山、草明的回信后，4 月 17 日，毛泽东再致他们一信：“四月十五日来信阅悉，我现在尚不能够对你们提出的问题作答复，待研究一下罢。如果你们在搜集材料，那很好，正反两面都盼搜集，最好能给我一个简明的说明书，不知文艺室同志有暇为此否？”

在会前，毛泽东也曾写信给诗人艾青：“有事商量，如你有暇，敬祈惠临一叙。”艾青应约前往，谈话中毛泽东说：现在延安文艺界有很多问题，很多文章大家看了有意见。有的文章象是从日本飞机上撒下来的；有的文章应该登在国民党的《良心话》上的……你看怎么办？艾青说：开个会，你出来讲讲话吧。毛泽东说：我讲话有人听吗？艾青说：至少我是爱听的。两天后，毛泽东给艾青写信：“前日所谈有关文艺方针诸问题，请你代我收集反面的意见。如有所得，希随时赐知为盼。”随后，艾青将自己对文艺工作的意见写成文章寄给毛泽东。不日毛泽东来信说：“大著并来函读悉，深愿一谈，因 河水大，故派马来接，如何？乞酌。”艾青去后，毛泽东对他说：你的文章我们看了，有些意见，提供你参考。艾青接过文章，只见有一页上有几位政治局同志传阅的字样。另纸用铅笔写了一些意见。这篇文章后来在 5 月 15 日的《解放日报》上发表，题为《我对目前文艺上几个问题的意见》，谈了 5 点：一、文艺和政治；二、作者的立场和态度；三、写什么；四、怎样写；

五、作家的团结。

与几位党员作家谈文说艺

为准备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毛泽东事先作了广泛的调查研究。1942年4月下旬，一天，毛泽东邀集鲁艺文学系和戏剧系的几位党员教员何其芳、严文井、周立波、曹葆华、姚时晓等到杨家岭谈话。毛泽东一见面就问：你们是歌颂光明的吧？听说你们有委屈情绪。一个人没有受过十年八年委屈，就是教育没有受够。

毛泽东一一问了他们几个人是什么地方人。当听说剧作家姚时晓曾在上海做过十多年工作时，毛泽东说：那你是个老工人了。接着，毛泽东问他：你们在农村演戏，老百姓看不看得懂？姚时晓说："看不懂。演的戏写的是铁路工作（指《红灯》）。陕北老百姓连铁路、火车都没有看见过，怎么能懂？"毛泽东说：问题主要不在这里。你们多到农民中去，你们了解了农民，农民也了解了你们，你们的戏农民就能看懂了。

毛泽东说：知识分子到延安以前，按照小资产阶级的幻想把延安想得一切都很好。延安主要是好的，但也有缺点。这样的人到了延安，看见了缺点，看见了不符合他们幻想的地方，就对延安不满，就发牢骚。毛泽东又说：小资产阶级喜欢讲人性，讲人类之爱，讲同情。比如打仗，我们正在追击敌人，这时我们旁边的同志受了伤，倒在地上了。到底是应该停下来，照顾受伤的同志，还是应该继续追击敌人呢？我认为还是应该继续追击敌人，把敌人消灭，完成战斗任务以后，再回来照顾受伤的同志。这样，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就说我们没有人性，没有人类爱，没有同情。除了个别来路不明，别有用心的人而外，一般主张和提倡、追随和附和"暴露黑暗"论的作者正是这样。"人性说"，"人类之爱"，"同情"它们正是"暴露黑暗"论的思想基础。

到了吃午饭的时候了，毛泽东招待他们吃了午饭，还喝了酒。

谈话继续，当严文井问毛泽东喜欢唐朝诗人李白还是杜甫的问题时，毛泽东说：我喜欢李白。但李白有道士气。杜甫是站在小地主的立场。

当谈到《聊斋志异》时，毛泽东说：《聊斋志异》可以当作清朝的史料看。其中一篇题目叫做《席方平》的，就可以作为史料看。又说，《聊斋志异》是反对八股文的。它描写女子找男人是大胆的。还举出《狼》作例子，说明作者的难能可贵之处。毛泽东讲完这个故事，后又说：蒲松龄有生产斗争知识。

有人问毛泽东喜不喜看话剧，毛泽东风趣地回答：我们天天在演话剧。

这个同志又说：文学艺术理论有这样一种说法，生活要 经过沉淀，经过一段时间的隔离，然后才可能把它写成很好的作品。现在反映抗日战争的作品吸引人感动人的比较少，是不是这样一个原因呢？毛泽东听了以后说：写当前的斗争，也可以写得很好。《解放日报》最近4月6日有一篇黄钢的作品，叫《雨》，写得很好，就是写当前敌后抗日战争的。

临别，毛泽东把他们送出很远，一一握手道别。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1942年4月10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上正式提议，准备以毛泽东、秦邦宪、何凯丰的名义召集延安文艺界座谈会，拟就作家立场、文艺政策、文体与作风、文艺对象、文艺题材等问题交换意见。会议同意并通过毛泽东的提议。

4月27日，毛泽东请舒群等草拟了一份参加座谈会的名单，他又补充了自己所惦记的一些人的名字，中央办公厅按照名单分发出100多份粉红色油光纸油印的请帖，上面写着："为着交换对于目前文艺运动各方面问题的意见起见，特定于五月二日下午一时半在杨家岭办公厅楼下会议室内开座谈会，敬希届时出席为

盼”。署名是“毛泽东、凯丰”。

5月2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在杨家岭召开延安文艺工作者座谈会第一次会议，有100多人参加，何凯丰主持会议。毛泽东作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引言部分)，指出：“今天邀集大家来开座谈会，目的是要和大家交换意见，研究文艺工作和一般革命工作的关系，求得革命文艺的正确发展，求得革命文艺对其他革命工作的更好的协助，借以打倒我们民族的敌人，完成民族解放的任务”。“在我们为中国人民解放的斗争中，有各种的战线，也可以说有文武两个战线，这就是文化战线和军事战线。我们要战胜敌人，首先要依靠手里拿枪的军队，但是仅仅有这种军队是不够的，我们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不可少的一支军队”。“我们今天开会，就是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为了这个目的，有些什么问题应该解决呢？我以为有这样一些问题，即文艺工作者的立场问题、态度问题、工作对象问题、工作问题和学习问题。”问题提得尖锐而又中肯，特别是毛泽东结合自己的切身经历，讲述了知识分子接触工农，感情转变的过程，给大家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毛泽东讲话后，大家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中午，大家在杨家岭中央机关食堂吃饭，下午又继续讨论，直到傍晚。

5月16日，毛泽东、朱德等出席延安文艺座谈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主要是听取与会者对文艺问题发表的各种意见。民众剧团团长柯仲平在发言中讲到他们下乡演《小放牛》，受到老百姓欢迎，老百姓送许多鸡蛋、花生、水果、红枣慰劳他们。柯仲平自豪而诙谐地说：“你们要在那些地区找我们民众剧团，怎么找呢？你们只要顺着鸡蛋壳、花生壳、水果皮、红枣核多的道路去，就可以找到”。到会的许多人笑了，毛泽东边笑边插话：你们如果老是演《小放牛》就没有鸡蛋吃了。

5月21日，毛泽东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关于延安文艺界座谈会的结论问题，会议同意毛泽东指出的延安文艺界工作中存在着的偏向，党的文艺政策的基本方针是为群众和如何为群众的问题。会议决定星期六（5月23日）由毛泽东在文艺座谈会上作结论。今后中宣部、中组部要根据毛泽东所作的结论，经常有计划地召集 文艺界的党员开会，加强党对文艺界整风运动的领导。

5月23日，毛泽东、朱德等出席延安文艺座谈会最后一次会议。起初仍进行大会发言，中间休息时，毛泽东、朱德等中央领导同志和与会者到室外草场上趁着快要下山的太阳光亮，照了合影像。在朱德讲话后，毛泽东作会议的结论。他说：座谈会开了三次，开得很好。前两次是我出题目，大家做文章。今天是考我一考，大家出题目，要我做文章。毛泽东的结论讲了文艺运动中的一些根本方向问题。首先讲党领导的文艺是为什么人的问题。他指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目前还存在某种程度的轻视工农兵、脱离群众的倾向。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一定要把立足点移过来，一定要在深入工农兵群众，深入实际斗争的过程中，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学习社会的过程中，逐渐地移过来，移到工农兵这方面来，移到无产阶级这方面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有真正为工农兵的文艺，真正无产阶级的文艺"。接着他从党领导的文艺是为什么人的这一根本问题出发，谈到以下几个问题。一、如何为工农兵服务的问题。他指出，文艺工作者首先要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向他们学习。关于普及和提高的关系，目前普及工作的任务更为迫切。二、文艺工作的党内关系和党外关系问题。他指出：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一部分，是服从党在一定革命时期内所规定的革命任务的。党的文艺工作者应当在抗日、民主、艺术方法艺术作风上和党外的一切文学家艺术家团结起来。三、文

艺批评问题。他指出："我们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动机和效果的统一论者。为大众的动机和被大众欢迎的效果，是分不开的，必须使二者统一起来"。文艺批评，应以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以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他还批评了"人性论"等错误倾向。最后，他指出，延安文艺界中还存在很多的唯心论、教条主义、空想、空谈、轻视实践、脱离群众等缺点，需要有一个切实的严肃的整风运动。

要使小鲁艺与大鲁艺结合起来

延安文艺座谈会后，毛泽东仍很关心延安文艺工作。他在5月28日高级学习组作报告时又讲到了延安文艺界问题。他指出：现在华北、华中各根据地，陕甘宁边区，延安，有大批的文学家、艺术家，这是一种很好的现象，绝不是坏现象。中央关于知识分子的决定，正面地肯定地指出，应该欢迎大批的知识分子，只要是抗日的就应该吸收。最近准备作一个关于文学艺术工作的决定，召开了三次座谈会，目的是解决文学家、艺术家、文艺工作者和我们党的结合问题，与工人农民结合的问题，与军队结合的问题；要结合，就必须克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转变到无产阶级思想，才能够在思想上与无产阶级、与工农大众相结合，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总是要格格不入的。我们的政策要好好引导小资产阶级出身的艺术家自觉地不是勉强地、慢慢地与工农打成一片。少数人不能打成一片，这是思想问题，不能勉强，不能用粗暴的态度。对文化人、知识分子要采取欢迎的态度，要 懂得他们的重要性，没有这一部分人就不能成事。

5月30日下午两点，毛泽东在鲁艺球场对全院师生讲话。他指出：在鲁艺领到文凭还不算毕业，这只是在小鲁艺毕业了，还没有在大鲁艺毕业，人民群众还不承认你们。你们这鲁艺是个小鲁艺，你们要到大鲁艺去，到工农兵群众那里去。小鲁艺在桥儿沟，大鲁艺就是社会嘛，要使小鲁艺与大鲁艺结合起来。他还说：

要拜群众为师，同他们交知心朋友，向他们恭恭敬敬地学习。工农兵的东西很生动、很丰富，当然也比较粗糙，是些豆芽菜。可是，你们不要瞧不起这些豆芽菜，任何大树刚出土的时候，都是两个芽，都是从豆芽菜长起来的。有些人嫌弃豆芽菜，把它踩死了，结果大树就长不出来。毛尔盖那个地方，因为没有人踩豆芽菜，所以大树多得很。

毛泽东在讲文艺作品比生活更高时说：你们不久以前演出的《带枪的人》里面，我们看见了列宁，在这个戏里和群众谈话、打电话、办公，赶走孟什维克……可是在戏里他没有吃过饭，也没有睡过觉。人不吃饭，不睡觉是不行的。列宁在生活中当然也要吃饭睡觉。戏里面并没有把列宁的一切活动都写出来。这也就是说，实际生活中的列宁比我们戏里看到的列宁要丰富得多。但是，列宁没有到过中国，更不用说延安。何况他已经去世了。戏里的列宁仍然活着，还可以永远活下去。他出现在延安边区大礼堂的舞台上。并且还可以出现在世界所有的舞台上。所以我说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要比普通的现实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

毛泽东看到姚时晓时问：现在还写剧本吗？回答说：不写了，现在做支部工作。毛泽东说：作支部工作是了解人、熟悉人的工作，和写剧本不矛盾。晚上，毛泽东还在鲁艺参加了晚会。当他听完大提琴独奏后，还专门走上前去与演员握手，连声说：谢谢！谢谢！

你的诗做了座右铭

续范亭来到延安后，已经不止一次地见到毛泽东，同毛泽东谈话。每一次见面和谈话，都使续范亭受到很大教育，所以他很自然地把毛泽东看作是自己最好的老师和最知己的朋友。1942年，续范亭发自内心地写诗歌颂毛泽东：“领袖群伦不自高，静如

处子动英豪。先生品质难为喻，万古云霄一羽毛”。续范亭解释说，这首诗的前面 3 句我早就想好了，可最后一句想了几天，拿毛主席比喻历史上哪个人好呢？有一名记者问斯大林，列宁同彼得大帝相比，谁更伟大时，斯大林回答说，如果说列宁是大海的话，彼得大帝就是苍海一粟。所以我说“先生品质难为喻”。我曾想把毛主席比作刘邦的三杰（张良、韩信、萧何），但觉得不够全面，最后才想起了杜甫的一句诗“万古云霄一羽毛”。这是杜甫赞颂诸葛亮的。“万古”是空前，“云霄”是甚高，“一羽毛”是品清质虚而体极小，惟其清虚而不自大，所以空前而又甚高。

毛泽东读诗后，5 月 14 日复信续范亭说：“不自高，努力以赴，时病未能，你的诗做了座名铭”。

成立中央总学习委员会

1942 年 5 月 21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关于整风学习问题，会议决定延长学习时间：机关由 4 月 20 日起延长到 9 月 20 日共 5 个月。学校由 4 月 20 日起延长到 8 月 20 日共 4 个月。会议决定成立中央总学习委员会，由毛泽东负总责，康生副之，领导全延安整风学习。

6 月 2 日，中共中央总学习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会议决定：（一）总学委巡视团工作。同意李富春所提总学委巡视团各巡视员分工，以后每星期巡视团汇报时，总学委各同志都可以参加。（二）加强《学习》报编辑委员会。（三）解答各方面所提出的问题，决定由何凯丰负总责。（四）总学委抽阅延安高级干部的学习笔记。（五）增加中央学习组的人数。

6 月 7 日，中共中央总学习委员会举行第二次会议。会议决定的主要内容是：（一）参加中央学习组的全体同志编组研究某些重要文件，先行讨论《联共党史》结束语及《论布什维克化十二条》两文件，并准备测验与调阅笔记。参加中央学习组的党、政、

军、民各方面的工作同志，混合编为10个小组，毛泽东为第一组组长，高岗、谢觉哉为副组长。(二)对 总学委抽阅各系统的笔记作了分工，毛泽东和彭真负责抽阅党校系统的笔记。(三)由中央宣传部通知全国各地党部，按照延安经验，暂时停止其他政治、业务教育及党的历史研究，集中力量研究22个文件及检查工作，将整风运动展开到全党。由中央学习组通知全国各地学习组，暂行停止党的历史研究，先行研究22个文件。

6月8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出《关于在全党进行整顿三风学习运动的指示》，决定全党均应进行整顿三风的学习运动，各地各级党委各级宣传部及原有的高级学习组均应按照中央指定的22个文件，有计划地领导这一运动。并具体指出：党的高级领导机关必须成立总学习委员会，各部门各单位成立学习分会。在学习22个文件期间，应把其他一切学习暂行停止。学习时期规定为四个月到五个月，起止时间由各地自行决定。

6月15日，中共中央总学习委员会举行第三次会议，决定：(一)各机关学校在学习期间互相参观时，主要行政负责人必须亲自参加，各系统大机关的互相参观，由总学习委员会规定之。(二)对墙报稿的选择，不论其正面的和反面的，正确的和不正确的，均应登载不得抑制。(三)中央总学习委员会和各系统的巡视人员不得向各单位要 现成的材料，要用自己的耳和手收集材料等。会议还通过了中央学习组组员的名单。

提出战后建国方针

1942年7月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毛泽东在发言中指出：中央为纪念抗战5周年宣言有一个新内容，就是战后的建国方针和强调团结问题。中国民族问题是一个基本问题，国民党50年来都抓住民族这个口号，所以在人民中间有很大的影响。我们提出战后办法是有策略意义的。现在我们的政策，在形式上

是改良的，实际上是革命的。今年七、八、九3个月是时局转变的关键，主要是日苏战争是否爆发，第二条战线是否建立，德国进攻高加索是否得手，过3个月后今年的局面就定了。国共关系也决定于这3个月。我对联络参谋说，谁打西安是汉奸，谁打延安也是汉奸。对何应钦，我们是只反对他的反共，何反共我反何，何不反共我也不反何。我们在统一战线中没有过去的斗争是不能存在的，在斗争之后又要团结。会议通过中共中央为抗战5周年纪念宣言草案及中共中央告抗日根据地全体党员和八路军新四军将士书草案，由毛泽东修改文字后发表，并由中宣部发一全党讨论这两个文件的通知。

7月7日，中共中央发表经毛泽东修改审定的《为纪念抗战五周年宣言》。宣言指出："战后的中国应当是独立的与各友邦发生平等互惠关系的中国，而不是殖民地半殖民地或附庸国。战后的中国应当是统一的和平的中国，而不是分裂的内部互相战争的中国。战后的中国应当是民主的中国，既不是专制的半封建的中国，也不是苏维埃的或社会主义的中国。战后的中国应当是民众幸福的经济繁荣的中国，既不是只顾一部分人民的经济利益，而使大多数人受苦的中国，也不是以暴力没收土地没收工厂的中国。战后的中国应当是各党派合作经过人民普选的民主共和国，而不是少数人专政多数人无权的中国。总之，战后中国的新秩序的建立应当依据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国民党的抗战建国纲领和中国共产党的施政纲领与社会政策。中国共产党声明：自抗战开始我们就是为着共同抗战并共同建设这样的新中国而奋斗。"

7月9日下午，毛泽东到延安交际处访晤晋西北士绅参观团，对诸士绅所提问题，一一详作解答，畅谈5个小时。毛泽东指出：中国共产党不仅在抗战中坚持团结抗日，在战后也是要坚持团结建国的。他以陕甘宁边区为例，指出：人民普选的参议会与三三制的民主政权，乃团结各个阶级共同抗日的最好的政治形式。战后更需要贯彻这种精神，团结各个阶级的人民，共同建设民主共

和的新中国。

不要把什么都说成是张国焘路线

1942 年 7 月 2 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发言指出：过去四方面军干部除何畏（曾是红四方面军红军大学政治委员）等以外都是好的，经过 6 年证明这些干部是好的。原四方面军干部犯了错误，要按错误的性质加以处理，不要把什么都说成是张国焘路线。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对待原四方面军干部态度问题的指示草案。

同日，中共中央发出经毛泽东修改审定的《关于对 待原四方面军干部态度问题的指示》。指示指出："原四方面军干部绝大多数都是工农出身，由下层工作渐次提升上来的。他们在国内战争中表示了对革命对党的坚定与忠诚；在克服国焘路线之后，又一致拥护党中央"；"抗战五年来的实践，考验了原四方面军干部在本质上是诚实的，坚决的，证明一九三七年反对国焘路线时中央所作的结论是完全正确的"。"对原四方面军的干部的信任与工作分配，应当和其他干部一视同仁"；"对原四方面军干部，如果在现在工作中有成绩，则应当表扬。如果犯有错误（任何干部都有犯错误可能），则应当就其错误的性质与程度，加以指出，并帮助纠正"。"原四方面军干部应当继续相信中央和军委干部政策的正确，放胆作事，不要畏首畏尾"。

此次整风是全党的

聂荣臻于 7 月 1 日写《全面展开整顿三风的学习与检查》一文。文章指出目前在晋察冀边区全面开展三风的学习与检查是纪念党的 21 周年的伟大献礼。文章具体分析了边区三风不正现象的主要表现，要求根据边区的特点进行整风、学习与检查同时并进，

学习过程中同时进行反省自己，反省工作，并全面展开对工作的检查。加强组织领导，及时纠正整风中的各种偏向。

7月4日，毛泽东致电聂荣臻："你七月一日的文章已全部收齐看到，即付《解放日报》发表，此文号召整风学习，纠正整风中的偏向，并指出边区学习特点，对整风开展有很大作用。但有一点请你注意，不要把三风分为某些是下级多些，某些是上级多些。即如党八股，就是包含着主观主义与宗派主义在内的，如果不包含这些，就不叫做党八股了。如果县以上还有党八股残余存在，即是证明还有主观、宗派的残余存在。此次整风是全党的，包括各部门各级干部在内。所谓各部门，就是不但有地方，还有军队；所谓各级，就是不但有下级，而且主要与首先的对象是高中两级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只要把他们教育好了，下级干部的进步就快了"。"在一个根据地内，主要应着重教育边区与地委两级，其次是县一级，只要他们有了正确方向，区、村干部的毛病就易纠正。我说这点，是想引起你注意抓紧党政军民各方面高级干部的学习领导，克服在他们中存在着的三风不正的残余。我们在延安亦是特别抓紧高级组的学习，着重阅读与自我反省"。

后来聂荣臻的文章发表在8月23日延安《解放日报》。

一次未实现的毛蒋西安谈判

1942年8月14日，周恩来应约会见蒋介石。蒋介石向周恩来提出，拟在西安约毛泽东一谈。周恩来答复说待延安答后即告。当日，周恩来将见蒋 情况电告毛泽东，并说蒋欲见毛泽东的目的"未可测"。周恩来提出两个办法：（一）以林彪为代表，赴西安见蒋；（二）要求蒋带周至西安，然后周飞延安，再偕一人（林彪或其他负责人）回西安见蒋。

8月17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复周恩来电，指出："毛现患感冒不能启程，拟派林彪同志赴西安见蒋，请征蒋同意。如能

征得蒋同意带你至西安，你回延面谈一次，随即偕林或朱赴西安见蒋更好。”

8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国际国内形势问题。会议认为丘吉尔和斯大林从8月12日至15日进行了会谈，讨论关于建立第二战线问题，在这种国际形势下，中国局势有好转可能。

8月19日4时半，毛泽东急电周恩来，指出：“依目前局势我似应见蒋，我感冒已十日，过几天要动也可以动”。“关于我见蒋，中央亦尚未作最后决定”。周恩来即日又致电毛泽东说：与蒋会晤时间“似嫌略早”，可由林彪或朱德“先打开谈判之门”；如蒋约林或朱来渝，也可答应，“以便打开局面，转换空气；一俟具体谈判有眉目”，毛泽东再来渝。

8月25日，毛泽东修改《中情通报十八号》。通报的内容是最近日苏关系及国共关系。通报指出：斯大林、丘吉尔会谈后，反希特勒战争即将进入决战的阶段，这是整个战争的新形势。国民党近已放弃了5月间的军事反共计划，而采取政治上解决国共关系的方针。蒋介石两次见周恩来谈话，国共关系确有走向好转的趋势。毛泽东在修改时加写了三段话，其中说：“由于缅甸失陷，西南国际（通路）断绝，迫使国民党不能不注意西北国际道路，并与苏联增强外交关系”。“加以地方与中央的矛盾，财政税收的困难，人民对负担的不满，其内部困难日益增加，如再扩大反共战争，将至不可收拾，这亦是对国共关系避免军事解决改取政治解决的重要原因”。“由于我一贯实施争取好转的政策，特别是今年‘七七’宣言，重申我党拥蒋合作方针，这不能不起促进好转的作用”。

8月29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蒋到西安时，决先派林彪见蒋，然后我去见他。依目前国际国内大局，我去见蒋有益无害，俟林彪见蒋后即确定我去时间。”

9月3日，毛泽东复电周恩来，重申亲自见蒋介石的重要性。

指出："目前不在直接利益我方所得之大小，而在乘此国际局势有利机会及蒋约见机会我去见蒋，将国共根本关系加以改善。这种改善如果做到，即是极大利益，哪怕具体问题一个也不解决也是值得的。蒋如约我到重庆参加十月参政会，我们应准备答应他。蒋在兰州顿了半个月，这几天可能即到西安。林彪准备在蒋电约后即动身去，我则在林去后再定去西安的日期。"

9月5日，周恩来致电毛泽东，再次陈述对毛泽东会见蒋介石一事的意见。认为毛见蒋"时机尚未成熟"，蒋对人"包藏祸心"，"对我党我军的观念，仍为非合并即大部消灭"，国际国内局势也"非对我有利"。周恩来指出毛与蒋会晤可出现的一种前途不能不防，即蒋"约毛来渝开参政会后，借口留毛长期驻渝，不让回延"。"若如此，于我损失太大"。因此，提议林彪出面，"不将话讲死，看蒋的态度和要解决的问题，再定毛是否出来"。

毛泽东采纳了周恩来的这一提议。

9月15日，毛泽东复电周恩来，指出："国内关系总是随国际关系为转移，第一次反共高潮发生于德苏协定、苏芬战争及英美反苏时期，第二次反共高潮发生于德苏协定继续存在，英美苏关系仍未好转而轴心则成立三国同盟时期。自苏德战起，英美苏好转，直至今天，国共间即没有大的冲突。这个期间，又分两段，在英美苏未订具体同盟条约及滇缅路未断以前，蒋的亲苏和共决心仍是未下的，在此以后，他才下这个决心。我们估计这个好转的方向是定了，目前任务是促成谈判，促成具体解决问题，故应避免一切枝节"。还告知：林彪昨晨已乘车起身，闻蒋介石已返渝，我们仍要林彪到西安后赴渝，以期打开商谈门路。

精兵简政要来一个大举方能切实见效

1942年8月19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了毛铎的文章《精兵简政在晋冀鲁豫边区》。文章介绍了晋冀鲁豫边区全面实行精兵

简政的情况。他们把精兵简政贯彻到各方面工作中去，并摸索出一套从政治动员到总结检查的系统做法。这些成绩与经验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和赞扬。就在文章发表的当天，毛泽东同边区参议会副议长谢觉哉、中共中央西北局常委组织部长陈正人，商谈召开二届参议会第二次会议的事宜，原拟定于10月10日召开，后决定延期。同一天，毛泽东在致他们的信中说："今天所谈二届参议会应以准备精兵简政为中心，在开会以前应实行精简，开会后应检查（点验）精简，而精简包括精少、效力、统一诸方面。今看本日（十九日）报纸《精兵简政在晋冀鲁豫边区》一文，所包事项尤多，尚有节省、反官僚主义诸项，此文我看很好，请你们也看一看，是否我们这里可以完全仿效？"毛泽东在赞扬晋冀鲁豫边区的同时，深感到其它根据地包括陕甘宁边区还做得很不够，因此在信中最后提出："此事应在整风学习后来一个如象整风这样的大举，方能普遍、深入与切实见效，过去还只是耳边风"。也就是说精兵简政要来一个大举方能切实见效，不能是走走过场、浮皮了草。以后毛泽东还指出"精兵简政也算是个运动"（11月21、23日毛泽东在西北局高干会上的演讲），也就是要自上而下，从陕甘宁边区到全国各抗日根据地都要普遍地进行。

精兵简政的辩证法

1942年4月22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关于总结精兵简政经验的通知，对各抗日根据地执行精兵简政的情况作了一次调查。调查结果发现，"一般已开始在做，便均做得很不够"。有些地区和工作部门发生明减暗不减，上层减下层不减，前方减后方不减的现象。还有一些地区和工作部门，对于这一政策的执行，是很勉强的、被动的，因而也就没有普遍贯彻。甚至还有很少数的地方不管中央如何决定，仍然是"原封不动"，"我行我素"，把自己的地区或工作部门看成是"例外"。更有极少数地方不但根本尚未

开始精兵简政，反而还想扩大部队增设机关学校。凡此情况表明，精兵简政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在一些同志的思想上还没有引起应有的认识，在他们的思想上对这一政策还存在着一些不正确的意见和片面的观点。

毛泽东认为，对于精兵简政“还有若干根据地的同志们因为认识不够，没有认真地进行。这些地方的同志们还不理解精兵简政同当前形势和党的各项政策的关系，还没有把精兵简政当作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看待”。所以，他在著文、讲话、发指示时多次首先说明这个问题：精兵简政是糊里糊涂的提出还是确有需要而提出来的呢？项英同志很早以前即提出了精兵主义，这在当时是不确当的。当时正是抗日战争初期，抗日武装刚刚建起，还没有发展壮大就提出精兵主义，当然是不对的。那时的抗日政权也在初创时期，没有巩固，提简政也是不对的。而现在情况不同了，我们的队伍发展起来了，但根据地在缩小，即“包含着这样的情况，即接近着胜利，但又有极端的困难，也就是所谓‘黎明前的黑暗’的情况”。这是因为抗日战争进入第五年以后，各抗日根据地的人力、财力消耗相当严重；这是因为国民党政府停发军饷，对抗日根据地实行经济封锁；这是因为日寇对抗日根据地实行残酷的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就使得抗日根据地必然要缩小。而我们已经发展起来的队伍和庞大的战争机构，是适应过去的情况的，那时的情况允许我们如此，也应该如此。但是现在不同了，根据地已经缩小，在今后的一个时期内还可能再缩小，我们便决然不能还像过去那样地维持着庞大的机构。在目前，战争的机构和战争的情况之间已经发生了矛盾，我们必须克服这个矛盾。而解决这个矛盾的办法，就是党中央提出的精兵简政的政策。

毛泽东针对主观主义、教条主义认识事物凝固不变的特征，教育全党的认识要跟上形势发展的需要，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解决。1942 年 9 月 7 日，他在为延安《解放日报》写的社论《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中运用了一个非常恰当的比喻，把这个问题说得很

清楚。他说："气候变化了，衣服必须随着变化。每年的春夏之交，夏秋之交，秋冬之交和冬春之交，各要变换一次衣服。但是人们往往在那'之交'不会变换衣服，要闹出些毛病来，这就是由于习惯的力量。目前根据地的情况已经要 求我们褪去冬衣，穿起夏服，以便轻轻快快地同敌人作斗争，我们却还是一身臃肿，头重脚轻，很不适于作战"。他还特 别指出机构精简后、队伍整编后精小能胜庞大的道理。他说："何以对付敌人的庞大机构呢？那就以孙行者对付铁扇公主为例。铁扇公主虽然是一个厉害的妖精，孙行者却化为一个小虫钻进铁扇公主的心脏里去把她战败了。柳宗元曾经描写过的'黔驴之技'，也是一个很好的教训。一个庞物大物的驴子跑进贵州去了，贵州的小老虎见了很有些害怕。但到后来，大驴子还是被小老虎吃掉了"。毛泽东希望我们的八路军新四军都是孙行者和小老虎．从而战胜那日本妖精或日本驴子，办法就是"变一变"，精兵简政，我们的身体变小了，但更加扎实些，我们就会变成无敌的了。

这种充满辩证法的智慧和认识问题的方法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全党摒弃主观主义、教条主义，掌握唯物辩证法，就会自觉地克服对于精兵简政政策一些不正确的看法。思想澄清后，就会认真地主动地愉快地去实行，也才能真正实行好，毛泽东在说明精兵简政的必要性时，把它提到认识论的高度，正如当时《解放日报》一篇社论总结的那样：精兵简政，这一口号所以提出，从某方面讲，全部意义也就是一个：实事求是。这样，就把它与教条主义对立起来，与当时党内整风，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的运动结合起来，以整风来推动精简，以精简来检验整风的成果，从而取得精神的与物质的双丰收。

务使我们的宣传增强党性

1942 年 8 月 29 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谈到《解

放日报》工作时指出：《解放日报》今年4月改版后是有进步的，要执行党的日常政策。《解放日报》社论及广播消息，是中央和人民说话，个人发表的文章也有很大的影响。今后日常政策问题报社应请示中央，陕甘宁边区问题由西北局负责审查。要使《解放日报》成为中共中央的机关报，还需要很大的努力。会议决定《解放日报》是中共中央机关报，又是西北局机关报。由秦邦宪（社长）、陆定一（总编辑）起草一个党报工作条例。

9月15日，毛泽东在致陈毅的电报中说："苏北报纸刊物请你抓紧，务使他们的宣传服从于党的当前政策。"

同一天，毛泽东致电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书记朱瑞："一切报纸刊物宣传，分局均须抓紧，使不违背党的政策。"

还是这一天，毛泽东致信何凯丰，表扬《解放日报》工作有进步，可以希望由不完全的党报变成完全的党报。关于各部门利用报纸做工作的事，毛泽东说："我想还要讨论一次，以促中央各部门同志的注意。各根据地当局也还未把报纸看作自己极重要的武器，我想要写一电报（或须用书记处名义），提出此种任务"。

10月28日，毛泽东起草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报纸通讯社工作给各中央局、分局的指示。指示指出："最近一时期内各地宣传曾发生若干不适合目前党的政策的事件，例如新华社太行分社发表参政会通电主张召集国是会议，山东分社发表东北军一一一师反对国民党人员的通电，苏北分社发表反对国民党的新闻，晋西北分社发表某军致新军五周年纪念贺电（足以影响友军之地位），均是和我党目前政策不适合的。查各地中央局中央分局对当地通讯社工作及报纸工作注意甚少，对宣传人员及宣传工作缺乏指导，尚不认识通讯社及报纸是革命政策与革命工作的宣传者组织者这种伟大的作用，尚不懂得领导人员的很多工作应该通过报纸去做。西北中央局已经发表了一个关于报纸工作的决定，各地亦应仿此办理，改正过去不讨论新闻政策及社论方针的习惯，抓紧通讯社及报纸的领导，务使通讯社及报纸的宣传完全符合于党的政策，务

使我们的宣传增强党性；拿《解放日报》所发表的关于如何使报纸增强党性的许多文件去教育我们的宣传人员，克服宣传人员中闹独立性的错误倾向。”

为延安《解放日报》第四版拟定征稿办法

1942年9月15日，毛泽东同《解放日报》社社长秦邦宪谈了半天，指出“报纸工作有进步，可以希望由不完全的党报变成完全的党报”。

同日，毛泽东致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何凯丰信，告以与秦邦宪谈话的情况，并说：“谈到各部门利用报纸做工作的事，我想还要讨论一次，以促中央各部门同志的注意。各根据地当局也还未把报纸看作自己极重要的武器，我想要写一电报（或须用书记处名义），提出此种任务”。毛泽东在信中还提出：“解放（指《解放日报》）第四版缺乏稿件，且偏于文艺，我已替舒群（《解放日报》副刊主编）约了十几个人帮助征稿，艾（延安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化思想研究室主任艾思奇）、范（延安中央研究院副院长兼历史研究室主任范文澜）、孙雪苇（延安中央研究院特别研究员刘雪苇）及工、妇、青三委都在内。青委约的冯文彬（中共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副书记），拟每月征6000——10000字的青运稿件，不知能办到否？”

9月20日，毛泽东为《解放日报》第四版正式拟定征稿办法：

“（一）《解放日报》第四版稿件缺乏，且偏于文艺，除已定专刊及由编辑部直接征得之稿件外，现请下列各同志负责征稿：

荒煤同志：以文学为主，其他附之，每月12000字。

江峰同志：以美术为主，其他附之，每月8000字，此外并作图画。

张庚同志：以戏剧为主，其他附之，每月10000字。

柯仲平同志：以大众化文艺及文化为主，其他附之，每月

12000 字。

范文澜同志：以历史为主，其他附之，每月 12000 字。

邓发同志：以工运为主，其他附之，每月 8000 字。

彭真同志：以党建为主，其他附之，每月 15000 字。

王震之同志：以戏剧为主，其他附之，每月 5000 字。

冯文彬同志：以青运及体育为主，其他附之，每月 12000 字。

艾思奇同志：以文化及哲学为主，其他附 之，每月 10000 字。

陈伯达同志：以政治、经济、国际为主，其他附之，每月 12000 字。

周扬同志：以文艺批评为主，其他附之，每月 10000 字。

吕骥同志：以音乐为主，其他附之，每月 5000 字。

蔡畅同志：以妇运为主，其他附之，每月 5000 字。

董纯才同志：以教育为主，其他附之，每月 5000 字。

吴老：以语文为主，其他附之，每月 5000 字。

以上共 149000 字。

（二）各同志担负征集之稿件，须加以选择修改，使思想上无毛病，文字通顺，并力求通俗化。

（三）每篇以不超过 4000 字为原则，超过此字数作为例外。

（四）如每人征集之稿件满 12000 字者，可在第四版一次登完。但编辑部也可以调剂稿件，分在两天或三天登完，并不用专刊名目。

（五）如有不合用之稿件，由编辑部退回负责征稿人，再行征补。如由编辑部作重要之修改，则应与征稿人商量一下。”

毛泽东拟定完征稿办法后，按名单招待负责征稿人吃顿饭。毛泽东一见面就说：“诸公驾到，非常感谢。今在枣园摆宴，必有所求。”席间，毛泽东把《〈解放日报〉第四版征稿办法》宣读一遍，并说：俗话说，吃人口短，吃人一口，报人一斗。吃亏这一回，但不许哪个口上抹石灰。办好党报，党内同志人人有责，责无旁贷。我想，诸位专家、学者必然乐于为第四版负责，当仁不让，有求

必应，全力赴之，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

1942 年 10 月 19 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在延安召开高级干部会议，会议至 1943 年 1 月 14 日结束，共进行 88 天。参加会议的有陕甘宁边区党、政、军、民、学各方面高级负责干部 300 余人，中共中央高级学习组全体人员与中央党校大部分领导干部都出席了这次会议。大会还邀请了边区政府有关部门的非党员负责干部和技术干部参 加了大会的开幕及整政、整财两项议程的讨论。

会议以整风的形式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比较彻底地解决了边区党的历史争论问题和当时的若干重大工作方针问题。主要表现在：第一，检讨了边区党在抗战前历史上的争论问题，实事求是地检讨了边区党的历史，分清了路线是非。第二，很好地解决了西北党的一元化领导问题。第三，讨论了边区今后的建设问题，确定了边区建设的任务与方针。

毛泽东自始至终关心着，并亲自参加指导这次会议。他除了会议期间用两天到会解说斯大林论党的布尔什维克化和为大会写了一篇关于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 10 万余字的报告外，在开幕、闭幕之日都到会讲话。

毛泽东在 10 月 19 日开幕会上的讲话，讲了三个问题。第一，关于国际形势。他说：“法 西斯和反法西斯阵线在今冬要起变化，德国已宣布了今后采取守势，这是件大事情。这正是有关整个世界、整个人类历史转变的时候。这样的形势对中国是有影响的，从 1941 年夏天苏德战争爆发后国共关系是比较好的。我们始终坚持抗战的方针，始终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到磨擦到来了，我们采取防御性的斗争。我们总的方针是团结，但有时要斗争，斗争过去又是团结。今年“七七”宣言的方针是我们坚持到底的方针，是打胜日本以后还要坚持团结的方针，那时我们仍是采取国内和

平的方针。第二，关于整顿三风。他说：从今春开始的整顿三风，是进行很大的党内教育，是根据抗战以前和抗战以后新老党员的情况提出的。新党员没有受过马列主义的教育，有的只是民族斗争中的教育，老党员中是从遵义会议以后才纠正了过去的许多缺点，但许多从又增长了新的缺点，自由主义、教条主义等。对于“党棍”要坚持清除。没有斗争便不能有进步。有人说我们所进行的党内斗争是不符合中国习惯的，但我们说我们必须拿起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使党员更提高更前进。现在这个会开得非常好，这就是行动上、工作上的整顿三风，是整风学习的考试。第三，关于边区的建设。他说：我们的军队将来要采取朱总司令提出的“南泥湾政策”，开荒生产，建立工厂，减轻人民的负担。要重视作经济工作的同志，中央去年就有了决定。这次开会我们是要大检查、大整顿。我们这次所提出的“七整”——整政、整军、整民、整党、整财政、整经济、整关系，就是本着这种精神来做的。通过“七整”，要达到精简、效能、统一、节约、反官僚五项目的。其中尤其达到统一是最重要的，一定要作到统一领导。

毛泽东在1943年1月14日西北局高干会闭幕会上的讲话，主要是讲关于领导问题。他用“集中起来，坚持下去”两句话，阐明领导的真实意义，指出党的领导就是集中人民的意见，经过思考研究变成党的意见，然后又把党的意见拿到人民中去实现。这就是所谓群众观点和领导艺术，就是真正理论与实际的联系。高级干部会议已经完成了将边区广大人民和广大党员的意见集中起来的任务，现在就是坚持下去的问题了。

实际上“坚持下去”的任务已经开始执行。在会议期间，边区政府已召开了政府委员和专员县长联席会议，高干会上所提出的有关政府工作意见，均经采纳施行。1943年政府的财政经济计划，军队、机关、学校和各县人民的生产计划，都在高干会闭幕前即已制定。一部分已着手进行。党政民各机关的彻底精简整编事宜，也在积极筹划执行中。党的领导一元化问题，在边区一级

已经完满实现，在各分区俟开会代表返任后，也必可统盘实现。这次会议的成功，取得的收获，确定的方针、任务，已成为边区各项工作转变的关键。

指示晋西北把敌人挤出去

1942 年 10 月，中共中央晋绥分局正式成立。关向应、贺龙、林枫、周士梯、甘泗淇等 9 人为分局委员。关向应为书记，林枫为副书记。

林枫从延安返回晋西北时，毛泽东当面指示：要把敌人挤出去。

10 月 31 日，毛泽东复电林枫，指出：“晋西北只有人口七十万至一百万，望检查如此迅速缩小的原因，与周、甘商讨积极开展游击战争向敌人挤地盘的具体方案（即具体的积极的全面的反‘蚕食’斗争）。必须振奋军心民心，向敌取积极政策，否则地区再缩，前途甚坏。”

张稼夫也要调到晋绥分局去工作了，临行之前，毛泽东约他谈话。毛泽东说，你要回晋绥去了，晋绥的情况有变化，全国的情况也有变化。我们的解放区，也就是敌后根据地，开始的时候是很小的。毛泽东一边说一边拿过来一个茶壶作比喻。他指着茶壶底说，原来我们的解放区象茶壶底，比较小；后来发展得很大，象茶壶的肚子；现在又缩小了，到了茶壶盖子了。全国各地的根据地都是这种形势，晋绥根据地更严重。现在你们的党委就住在黄河边上，有时还跑过河来，地区人口缩小到 100 万了。说到这里，毛泽东停了停说，黄河这边是陕甘宁边区，黄河以东才是你们晋西北的地盘嘛！现在敌人把你们的地盘挤得很小，据说连临县的三交镇也有了敌人的“维持会”。那么，你们为什么不把敌人挤出去呢？敌人的社会基础无非是地主阶级，你们应当针锋相对，发动农民群众，武装农民群众。接着，毛泽东着重讲了对敌斗争

的政策和领导工作方法问题，指出了晋绥分局今后工作的方针。

1942 年底，晋绥分局召开高干会议，传达和研究贯彻毛泽东的指示。

晋西北军民在毛泽东的号召下，开展了“挤敌人”的斗争。经过 4 个月的时间，全区共摧毁 827 个自然村的“维持会”，在 535 个自然村建立或恢复了抗日政权。到 1943 年上半年，基本上已将敌人挤出据点或交通线。

连续撰写几篇关于国际形势的文章

1942 年 10 月 12 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毛泽东撰写的社论《红军的伟大胜利》(建国后编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时，题目改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社论指出：斯大林格勒“这一战(指 1942 年 10 月 9 日苏联情报局宣布红军突破斯大林格勒西北部工业区德军包围线。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从 1942 年 7 月 17 日开始，到 1943 年 2 月 2 日结束。)不但是苏德战争的转折点，甚至也不但是这次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转折点，而且是整个人类历史的转折点”。“斯大林格勒一战将停止法西斯的进攻，这一战是带决定性的”。“拿破仑的政治生命，终结于滑铁卢，而其决定点，则是在莫斯科的失败。希特勒今天正是走的拿破仑的道路，斯大林格勒一役，是他的灭亡的决定点”。

10 月 14 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毛泽东撰写的社论《历史教训》。社论指出：“希特勒的实力和他的野心之间的矛盾，是他失败的重要原因。这个矛盾，表现在他采取避实击虚政策上面。”“一切他所避开的地点，都成了红军向他进攻的出发点”。社论评述了斯大林格勒战役中 8 月 23 日于 10 月 9 日期间苏联红军的正确战术和十分激烈勇猛的抵抗。社论最后指出：“整个苏德战争已经证明：只要人们不对法西斯讲慈悲，就是说，多一点勇气，法西斯就会失败的，这就是历史的教训。”“日本的实力与他的野心

之间的矛盾，也一定要把日本法西斯压得粉碎。”

10 月 16 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毛泽东撰写的社论《评柏林声明》。社论指出：“柏林发言人已于十月十二日正式发表声明。该声明说：‘德军已由攻势转入守势。’该声明又说：‘此不应视为吾人未来的作战计划……而以镇静态度及必胜信心以观变化。’”“这后一段是说谎的。”“所谓‘守势不应被看作将来的作战计划’，似乎还有第三个攻势的希望似的，但这只是完全的谎言。希特勒的旧军队是疲敝不堪了，精锐部分已经耗完。”“日本的情况稍有不同，他的实力还可以举行一个进攻，这是因为过去的战争没有动用他的主力的原故。”“但是不论怎么样，世界形势已起了根本的变化，一切法西斯国家实际上都已丧失了主动地位，不管德国或日本，都是如此，也不管日本采取这样或那样的政策，都是如此。”

毛泽东从 11 月开始至 1943 年 1 月，为了解和研究国际国内形势和有关国家的情况，大量抄录中央社和塔斯社、合众社、路透社、同盟社等一些外国通讯社关于中国和其他一些国家的报道，这些国家是：美国、法国、西班牙、苏联、德国、英国、南斯拉夫、葡 萄牙、罗马尼亚、土耳其、芬兰、澳大利亚、瑞士、意大利、匈牙利、日本。

讲斯大林论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

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干会议期间，西北局秘书长贾拓夫于 11 月 1 日致信毛泽东，询问毛泽东准备何时在西北局高干会议讲斯大林论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次日，毛泽东复信说：“大约可在十号左右讲，那时再商量确定日子。事先请你将布化十二条及结束语（指《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结束语）第四第五条按听众之数铅印或油印若干份，先期发与他们研究。十二条译文要用最近一次师哲（当时任毛泽东的俄文翻译）译出的，请注意。”

后讲解日期变化。11 月 14 日，毛泽东还参加了西北局高干会议大会讨论。到 11 月 21 日，才开始讲，22 日停了一天，23 日继续讲，并讲完。

毛泽东在讲解中首先指出，一般地说，中国共产党是布尔什维克党，从它的路线、工作、经验、觉悟程度、同群众的联系来说，是一个布尔什维克党。如果拿完全布尔什维克化的标准来说，那还有许多条件不具备或不完全具备。接着，逐条进行讲解。斯大林的第一条讲党是无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毛泽东指出：执行这一条，就要领导一元化，承认中央的“九一”决定（指 1941 年 9 月 1 日《中共中央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党要领导军队、政府和民众团体。斯大林的第二条讲党特别是党的领导者必须完全精通与革命密切联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毛泽东指出：十年内战时期，有马列主义对非马列主义的斗争。遵议会议以后，党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是比较正确的，但党内还有很大的缺点，党内产生了一种自由主义坏倾向。遵义会议以前，在党内关系问题上，主要偏向是过火的斗争。遵义会议以后，党内的主要偏向是自由主义，而不是过火的斗争。现在我们要增强理论，党校的同志每人要读三四十本马恩列斯的书。这次高干会后我们应当有一个学习，每人选读几十本马克思主义的书。斯大林的第三条讲党在制定各种口号、指示时，应根据对国内和国际具体条件的分析。毛泽东指出：这一条讲方法论、思想方法问题。制定口号、指示时，国际条件、外国的经验固然要考虑，但主要的是对我们国内的具体情况加以周密的研究和分析。斯大林的第四条讲党要在群众的革命斗争中检查自己的口号、指示是否正确。毛泽东指出：理论是从客观实际抽出来，又从客观实际得到证明的。实践是考验真理的标准尺度。斯大林的第五条讲党的全部工作，每一个行动，都要走向使群众革命化。毛泽东指出：这一条的原意是党不要有社会民主党的作风，要有布尔什维克的作风，不要有改良的作风，要有革命的作

风。我们中国共产党没有社会民主党的传统，我们党有两种缺点，一个是“左”，一个是右。现在我们党内自由主义相当浓厚，我们应该反对自由主义，同时当然也要反对过左的。斯大林的第六条讲党在工作中要善于把最高的原则性和同群众最大限度的联系相结合。毛泽东指出：这一条是讲群众工作的原则。我们对群众的关系，是一方面要教育群众，一方面要向群众学习。要把党的最高的原则性同群众的当前的日常要求联系起来，最高原则不要变成了关门主义，联系群众不要变成了尾巴主义。斯大林的第七条讲党在工作中要善于把不调和的革命性和最大限度的灵活性、机动性相结合。毛泽东指出：这一条是讲统一战线原则，革命与妥协的关系。列宁写了一本书，叫“左派”幼稚病，就是讲的这个第七条。这里有一个最大限度的灵活性、机动性问题。我们的“三三制”就是最大的灵活性、机动性，要灵活地用各种组织形式和斗争形式达到革命的目的。不调和的革命性不要同冒险主义混淆，最大限度的灵活性不要同迁就主义混淆。斯大林的第八条讲必须使党不掩饰自己的错误，不怕批评，要善于在自己的错误中改进和教育自己的干部。毛泽东指出；如果党害怕承认自己的缺点，害怕及时地公开地承认和纠正自己的缺点，那末党就不免于灭亡。公开地承认错误，揭露产生错误的原因，分析产生错误的环境，仔细讨论改正错误的方法，这就是郑重的党的标志。斯大林的第九条讲党要善于把先进战斗员中的优秀分子选拔到基本的领导核心中去。毛泽东指出：领导核心有什么条件，斯大林讲两个条件，就是要十分忠诚，十分有经验。斯大林的第十条讲党必须经常改善自己的社会成分，消除那些腐化党的机会主义分子。毛泽东指出：不够党员资格的，也要清洗，还要经常吸收好的分子。斯大林的第十一条讲党必须建立起铁的无产阶级的纪律。毛泽东指出：建立铁的纪律，是区别于社会民主党的条件之一，也区别于自由主义。建立铁的纪律的基础是思想的统一。斯大林的第十二条讲党应系统地检查自己的决定和指示的执行。毛泽东指出：这

次高干会议以后进行精兵简政，整党、整政、整军、整财、整民、整关系，是有系统的有威信的人去进行。最后，毛泽东总括地说：这个十二条，很值得我们好好地研究一下，这是我们全 党的“圣经”。是“圣经”，而不是教条，是可以变化的。

撰写《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

1942 年 12 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干会议期间，亲自组织收集经济和财政方面的历史的和现状的材料，为会议撰写了题为《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长篇书面报告。

在此期间毛泽东曾就收集整理材料一事几次致信陕甘宁边区政府财政厅长南汉宸。

12 月 8 日，毛泽东致信南汉宸，指出：“各件均收，写得很好，大有益处。现我还急需贸易、金融、工业三部分，并须在三天至多四天要。请你日夜赶办，于本星期五交我。金融过去原不归你经手，但现已归你；工业你也管了一部分，由你将你管的，建厅管的，军队管的综合起来写成一件，最为适当。”

12 月 13 日，毛泽东再致信南汉宸：“后送各件收到，甚慰。拟再请你对粮食、税收、贸易、金融，财政、供给等项干部在自己工作中应注意之点（应兴应革），每项写一千至一千五百字左右给我，以插入报告中教育干部，对于你今后的工作有大助益。此次高干会主要需要教育材料。在三至四天内送我即可”。“每项能写二三千字更好”。“如何使他们不扰民、不贪污、不浪费而又能完成任务。每个问题分列若干条应注意之事项。”

12 月 20 日，毛泽东再一次致信南汉宸：“请你写的东西不知着手否？我要的关于粮草、税收、金融、贸易四部分，每样要说政策，说工作，是向广大的干部说话，使他们看了懂得政策的 方向，懂得工作的作法。在说政策说工作时要批评错误意见，批评工作缺点，使他们有所警惕。每样要有点历史，有点分析，又有

一九四三年应如何作法。请你从今天至星期四四天之内下一番苦工赶一下，于星期五交我就好了，或在星期二三先将粮草一件交我，余在星期四五交我。金融、贸易二件请找银行与贸易局的人研究一下，粮税你是熟的。你前交报告很好，只是向少数人说的，不是向广大干部说的，故须重写。你写的被服部分我已采入工业问题里去了。”

《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书面报告，由贺龙在12月21日和29日向西北局高干会议传达。这个报告共10章，原计划写的税收和节约两章，因高干会闭幕，来不及写而付阙如。第一章《关于过去工作的基本总结》，建国后编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时，题目改为《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

毛泽东在这篇书面报告中指出：“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是我们的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的总方针”。批评了不从发展经济、开辟财源而企图从收缩必不可少的财政开支解决财政困难的保守观点，也批评了离开具体条件搞空洞的不切实际的大发展计划的冒险思想。在公私关系上，他提出正确的口号是“公私兼顾”或“军民兼顾”，批评不顾战争需要单纯地强调政府应施“仁政”的观点；也批评不顾人民困难，只顾政府和军队的需要，竭泽而渔、诛求无已地加重人民负担的观点。指出为了抗战建国的需要，人民是应该负担的，同时要使人民经济有所生长、有所补充，才能支持长期的抗战。“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我们有许多同志的头脑还没有变成一个完全的共产主义者的头脑，他们只做了向人民要东西的工作，而没有做给人民以东西的工作。“我们的第一方面的工作并不是向人民要东西，而是给人民以东西”，在目前条件下，就是领导人民发展生产，增加他们的物质福利，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和文化程度。他指出：许多部队、机关、学校的生产活动，负行政指挥责任的人不大去管，有少数人甚至完全不闻不问，只委托供给机关或总务处去管，这是由于不懂得经济工作的重要性的原故，有

的人是中了董仲舒等所谓“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这些唯心的骗人的腐话之毒。在目前陕甘宁边区的条件下，就大多数同志来说，中心工作“确确实实地就是经济工作与教育工作，其它工作都是围绕着这两项工作而有其意义”。

1943 年

保持施政纲领的稳定性

晋察冀边区拟定于1月15日，在她诞生5周年纪念日，召开第一届参议会。民国29年（即1940年）8月13日，边区曾发布一施政纲领。这一次原计划在参议会上发布一个新的施政纲领。并写好了新纲领的草案，报中央批准。1月11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复电晋察冀分局。这一复电是经毛泽东修改过的。毛泽东在复电中指出："二十九年发布之施政纲领在群众中有很大影响，并且直至现在还是适用的。目前不但不应发布和旧纲领并无多大区别的新纲领，而且不应对旧纲领条文有所修改，致影响纲领在群众中的威信。此参议会可发一宣言，此宣言由参议会中共产党员发起，邀党外人士联署向参议会提出然后发表。宣言中拥护二十九年之施政纲领，同时对二十九年纲领中未包括之事项加以叙述。"电报还对新纲领草案提出了八点意见。

遵照这一电报精神，会期最后一天，即1月22日发表了晋察冀边区第一届参议会宣言，宣言指出：会议"全体一致接受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北方分局于民国二十九年八月十三日公布的目前施政纲领——双十纲领为边区行政委员会的施政纲领"。"边区五年来实行三民主义已获得许多卓越成绩，今后仍本三民主义、抗战建国纲领、晋察冀边区目前施政纲领，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贯方针，继续进行保障一切抗日人民之人权、财权、地权、政治权利，保证一切政策法令的深入实现，更加巩固各党、各派、各阶层、各族、各界人民的团强，以战胜敌寇，建设三民主义的新中国！"

为受奖同志题词

1943年1月，中共中央西北局高干会上奖励了在边区经济建设中成绩昭著，而又刻苦奉公，在群众中有信仰的22名干部和三五九旅、延安县委县府、南区合作社3单位。团体奖品为西北局的红锦旗；个人奖品除毛毯外，更重要的有毛泽东的亲笔题词奖状。毛泽东在发给他们的奖状上的题词分别为：（名次以地区排列）

王　震：“有创造精神”。

何维忠：“切实朴素，大公无私”。

晏福生：“坚决执行屯田政策”。

罗　章：“以身作则”。

黄静波：“坚决执行党的路线”。

刘秉温：“善于领导群众”。

王丕年：“善于领导群众”。

惠中权：“实事求是，不尚空谈”。

刘建章：“合作社的模范”。

王世泰：“忠实，努力，不夸不骄”。

杨　林：“坚决执行党的政策”。

范子文：“机关生产的模范”。

胡起林：“无限忠心”。

马文瑞：“密切联系群众”。

马锡五：“一刻也不离开群众”。

王维舟：“忠心耿耿，为党为国”。

李丕福：“面向群众”。

习仲勋：“党的利益在第一位”。

文年生：“生产教育，两者兼顾”。

任成玉：“为群众谋福利”。

贺晋年："艰苦奋斗，不屈不挠"。
罗成德："不怕困难"。

与政府党外人士座谈会可每两月召集一次

中共中央西北局于1月29日下午召集政府党外人士举行座谈会。到会政府党外人士有李鼎铭，柳湜、贺连城、霍子乐、李升生，毕光斗等六人。先由边区参议会副议长谢觉哉说明开会宗旨是"为了传达高干会的经过与决定，同时听取党外人士对高干会的批评与意见"。继由中共中央西北局秘书长贾拓夫介绍西北局高干会经过及所讨论之各项问题的情况。其后各位党外人士纷纷发表意见，主要意见是：希望能把高干会对各方面问题更详细的情形告诉他们，或者能看到高干会的各种文件，而对未完全参加高干会讨论表示遗憾。希望今后凡不是党内干部问题的决定计划等，都能事先与他们商谈，对过去商谈不够的情形，多少有点表示不满等等。事后，谢觉哉、贾拓夫把座谈会的情况于1月30日整理了一个谈话记录报告中央。谢、贾在报告中指出：根据这次谈话的经验，以后这样的座谈会可以多开。把时局或方针问题经常告诉他们，而政府中一切重大问题在讨论前应多与他们商谈，思想沟通，酝酿成熟，然后在会议上讨论决定。

2月1日，毛泽东看到了这个报告，肯定了西北局召集党外人士座谈会的做法，并批示："以后西北局可每两月召集座谈会一次"。

称赞新秧歌剧《兄妹开荒》和为枣园老人祝寿

2月5日，农历正月初一，春节。延安群众敲锣打鼓，扭起秧歌，到枣园给毛泽东拜年。坐在10时开始，成千上万的人，一层一层地围成一个大圆圈，给毛泽东拜年的秧歌队就在这里面一个

接一个的演唱着："正月里闹元霄，金匾绣开了；金匾绣咱毛主席，领导主意高"。毛泽东与朱德等同群众在一起，坐在广场上欣赏演出。表演到精彩的地方，他们和群众一起热烈地鼓掌和欢笑。当毛泽东看到短小活泼、鼓舞群众生产热情的新秧歌剧"兄妹开荒"演出的时候，不仅连连点头，表示满意，还称赞说："这还象个为工农兵大众服务的样子！"他问朱德："你觉得怎样？"朱德也称赞说："不错，今年的东西和往年大不同了！革命的文艺创作，就是要密切结合现在的政治运动和生产斗争啊！"十几个秧歌队整整表演了三个多小时，每个节目演完后，毛泽东都同群众一起热烈地鼓掌。他还亲自走到演员们跟前，亲切地热烈地一个一个地握手，称赞说："你们演得很好，谢谢你们！"

下午，毛泽东热情地接待远近村庄前来拜年的群众。他亲自给客人们倒茶拿烟，与客人们亲亲热热地谈笑着。在谈话中，毛泽东十分关心生产，他问大家能不能做到"耕三余一"？并指示，在大生产运动中主要是把劳动力组织起来，搞变工互助。

2月19日，农历正月十五元宵节。毛泽东请了枣园村的24位60岁以上的乡亲吃饭，为其中两位正好在元宵节过生日的老人祝寿。下午，不到两点钟，毛泽东就在门口笑眯眯的迎接24位老人。其中一位老人紧紧捧着毛泽东的手，流着泪说："毛主席，你是咱们庄户人的大救星，你对咱们太仔细了，把咱们大大小小的事都办好了！咱们祖宗三代都没有做过什么寿呀！"毛泽东亲切地说："老人家，不要难过了！今天咱们翻了身，作了主人，人寿年丰，以后为每个年老的人都要祝寿！"毛泽东祝贺各位老人老当益壮，永远健康！还希望他们发挥种庄稼的丰富经验，教导和带领年轻后生，大大地发展生产，丰衣足食，过更美好的日子。

妇女工作者应参加经济工作

1943年2月24日，毛泽东在审阅修改《中央关于各抗日根据

地目前妇女工作方针的决定》草稿时，加写了如下一段话：

“妇女工作者本身必须学得农村经济知识，了解妇女生产内容，才能真正成为农村群众生产的组织者与领导者。许多有能力的女同志必须到合作社去工作。再则，许多女党员、女干部必须到公营经济机关中去工作，使公营经济发展起来。那些浮在上层、空闲无事，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

这个决定还指出：在日益接近胜利而又日益艰苦的各抗日根据地，战斗、生产。教育是当前的三大要务，而广大的农村妇女能够和应该特别努力参加的就是生产，广大妇女的努力生产，与壮丁上前线同样是战斗的光荣的任务。而提高妇女的政治地位、文化水平，改善生活，以达到解放的道路，亦须从经济丰裕 与经济独立入手。多生产、多积蓄，妇女及其家庭的生活都过得好，这不仅对根据地的经济建设起重大的作用，而且依此物质条件，她们也就能逐渐挣脱封建的压迫了。这就是在整个群众工作中广大农村妇女的特殊利益的中心所在，也就是各抗日根据地妇女工作的新方向。”

中共中央于 2 月 26 日发出这个决定。

任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书记处主席

1943 年 3 月 11 日，毛泽东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讨论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方案，修改后提交下次政治局会议讨论。

3 月 16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毛泽东作关于时局与方针问题的报告。关于方针问题，毛泽东指出：中央工作总方针是要从研究与指导两方面来达到保存骨干、准备将来的目的。中央机关的任务是工作、生产与教育，去年以完成整风学习为第一位，今年要以工作为主，从五月一日起开始工作。方针要增加一条，我们的领导要联系群众，方法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或者说集中起来，坚持下去。中央各部门的工作要实行彻底的转变，

肃清一切脱离群众的作风。我去年与许多部门工作同志很少接触，今年要多接触，要多接触才能有知识。会议讨论了中央机构调整和精简方案，整风学习总结计划。会议决定：4月底结束整风学习，从5月起实行新的学习计划。陕甘宁边区要以工作为第一，整风不要停了工作去做，今后要在工作中进行整风。

3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对时局问题作补充说明。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决定指出：根据中央精简政策和过去的经验，适应当前的工作条件，中央机构有重新加以调整的必要，其目的在使中央机构更加简便与灵活，使事权更加统一与集中，以达到更能增强中央的领导效能。政治局推定毛泽东为政治局主席。书记处重新决定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三同志组成之；毛泽东为主席，会期不固定，得随时由主席召集之；会议所讨论的问题，主席有最后决定权。在中央政治局及书记处之下，设立宣传委员会与组织委员会。这两个委员会，是政治局和书记处的助理机关。毛泽东任宣传委员会书记和中央党校校长。

同意新四军释放在反磨擦战斗中俘虏的韩德勤

1943年3月中旬，在新四军对日军的反扫荡作战中，国民党江苏省主席韩德勤率总部特务营和保安第三纵队王光夏部等，西渡运河，侵入新四军淮北根据地的中心地区，经多次劝说，警告其退出，均无效。韩部捕杀根据地的地方工作人员，收缴地方武装枪支，枪掠财物等，遂引发新四军与韩部的冲突，在冲突中韩德勤被我新四军第四师所部俘获。

3月18日，陈毅、饶漱石报告毛泽东："韩德勤已于十八日晨被我俘虏，其部队大部被我击散，现韩被押，我们装着不认识，拟即混在俘虏中释放，如何？"

次日，毛泽东同刘少奇复电陈毅、饶漱石："巧（18日）午电

悉，同意你们对韩某处置，混在俘虏中释放，但最好能把他放到津浦路以西去。”

在韩被俘前蒋介石曾令国民党军第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王仲廉率部星夜援韩，但韩被俘后尚无反应。为此，3月20日，毛主东同刘少奇又致电新四军第四师师长彭雪枫、政治委员邓子恢并告陈毅、饶漱石，指出：“你们接中央皓（19日）电后，应准备释韩，但暂时不释，待王仲廉及重庆反应明了后再行处置。”

3月23日，毛泽东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讨论释放韩德勤的问题，决定：如韩同意向西去，则发还一部分人枪就地解决问题。如韩不同意西去，则暂留一时期，待国民党表示态度后解决。

后韩德勤在俘虏中公开了身份。3月25日，陈毅由新四军军部到达第四师师部，主持与韩德勤的谈判。3月27日，陈毅致电中共中央，建议在蒋介石对韩德勤问题下决心之前，主动送韩出境，以利用国民党反共派内部矛盾。

3月29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复陈毅电，同意陈毅27日来电所提办法处理韩德勤问题。但无论如何必须与韩德勤订立一合作抗日密约，方不上当。

新四军于4月1日与韩德勤签订《新四军陈毅军长与韩德勤会谈备忘录十条》，并划定活动区域。当天，发还人枪，礼送韩德勤出境。

生日决定不做

1943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50岁生日，党内一些同志酝酿为他祝寿，并提出宣传毛泽思想的问题。

为此，4月22日毛泽东致信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何凯丰，指出：“生日决定不做。做生日太多了，会生出不良影响。目前是内外困难的时候，时机也不好。”信中还提出：“我的思想（马

列）自觉没有成熟，还是学习时候，不是鼓吹；要鼓吹只宜以某些片断去鼓吹（例如整风文件中的几件），不宜当作体系在鼓吹，因我的体系还没有成熟。”

关于何时打败日本问题的宣传工作的指示

1943年4月30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通过毛泽东为中央书记处起草的解释“今年打垮希特勒，明年打垮日本”问题给各中央局中央分局的电报。

这句话最早是在1942年7月7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纪念抗战五周年宣言》中公布的，宣言指出：“世界战争中胜败谁属，已很明显，今年打败希特勒，明年打败日本，我们应有此信心，应为这个目标而共同奋斗。”

后形势发生变化，中共中央宣传部在宣传要点中曾有解释，去秋以来《解放日报》也已改变论调。但有个别根据地的领导同志至今还不了解此种意义，不但不去作正面解释，反而机械地继续宣传今年打败日本的口号，人们提出询问，而领导仍然不知道如何解释，以至屡电中央询问。鉴于这种情况，毛泽东起草了这个电报。

电报说：当苏联提出1942年打败德国时，是以美约定于1942年建立第二 条战线为根据的，在当时不但可以而且应该提出此种口号以为动员努力之目标。但当英美没有开辟第二条战线又无新的约定时，就不应继续宣传此种口号。这是情况变化宣传必须随之变化的实例。当苏联根据英美约定提出上述口号时，我党亦提出1943年打败日本的口号，这也是不但可以而且应该的。但当英美没有履行诺言因而去年打败德国没有实现时，我党即不应继续宣传此种口号，而应向群众解释今年所以还不能打败日本的原因，鼓励群众坚持努力争取胜利。电报最后指出，各中央局及分局须作长期坚持打算，准备再作两年或三年的极端艰苦的斗争，并须

准备对付意外变化。

这个电报于5月1日发出。

为刘志丹陵园纪念碑题字

中央红军完成长征到达陕北后，把刘志丹等一批陕甘根据地的党、政、军负责同志从当时“左”倾错误路线的迫害下拯救出来。刘子丹出狱后，毛泽东同周恩来一起亲切地接见了他。不久，刘子丹被任命为西北革命军事委员 会副主任、北路军总指挥和二十八军军长。1936年初，刘志丹奉命率部渡过黄河东征。4月中旬，在围攻山西中阴三交镇的一次战斗中，不幸中弹牺牲。周恩来亲自扶柩，把刘志丹的遗体安葬在瓦窑堡。毛泽东亲自向刘志丹家属表示慰问。党中央应广大群众的要求，将保安县改名志丹县。

1943年，刘志丹牺牲7周年时，其墓由瓦窑堡迁葬于志丹县新建的陵园内。5月2日，刘志丹的灵榇在志丹县举行公葬。毛泽东为新建的刘志丹陵园内的纪念碑题字，正面题写“革命烈士纪念碑”7个字，背面题写碑文：“我到陕北只和刘志丹同志见过一面，就知道他是一个很好的共产党员。他的英勇牺牲，出于意外，但他的忠心耿耿为党为国的精神永远留在党与人民中间，不会磨灭的。”

同意关于解散共产国际的提议

1943年5月20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致电毛泽东，说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将于5月22日公布关于解散共产国际的提议，请中共中央急速讨论这一提议，并将意见告知。

5月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立即召开会议。会议决定：(一)

先由毛泽东复电表示赞成共产国际主席团的提议。(二)待共产国际公开宣布解散共产国际组织的提议后，中央再作决定。(三)将季米特洛夫来电内容转告周恩来并告他处理意见，同时将此电发给北方局，华中局和晋察冀、山东、晋绥、太行四个中央分局。会后，毛泽东即将季米特洛夫来电内容电告周恩来并告知："政治局会议于21日决定，完全同意此种提议。俟收到国际主席团正式提议后，当即发表中央的正式决定。你处收到国际主席团文件后应与各报同时在《新华日报》发表，但不作评论，俟收到中央决定后即公布中央决定，并发表拥护之社论。"

5月24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致周恩来电，指出："共产国际解散，中央即将开会讨论中国的政策，请你即回延安，能交涉飞机回延更好。"

中共中央于5月26日收到莫斯科《真理报》发表的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关于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当天立即召开政治局会议，会议一致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并决定即日召开延安干部会议，由毛泽东主席传达共产国际主席团的提议和中共中央的决定。中共中央的决定指出：(一)"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完全同意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1943年5月15日关于解散共产国际的提议。自即日起，中国共产党解除对于共产国际的章程和历次大会决议所规定的各种义务。"(二)共产国际在它存在的时期中，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包括对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尽一切可能给予援助。但在现在的各种条件下，各国共产党更加需要根据自己民族的特殊情况和历史条件，独立地解决一切问题，因此共产国际的解散是比其继续存在更加有利的。(三)"中国共产党的创立，是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中国工人运动发展的结果，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结果"。"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斗争中曾经获得共产国际许多帮助；但是，很久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即已能够完全独立地根据自己民族的具体情况和特殊条件，决定自己的政治方

针、政策和行动”。“共产国际的解散，将使中国共产党人的自信心与创造性更加加强，将使党与中国人民的联系更加巩固，将使党的战斗力量更加提高”。（四）中国共产党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因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是科学，而科学是没有国界的。中国共产党人必将继续根据自己的国情，灵活地运用和发挥马克思列宁主义，以服务于我民族的抗战建国事业”。

当天晚上，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延安干部大会。大会由任弼时主持，李富春传达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关于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接着，毛泽东以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的身份向大会作关于共产国际解散问题的报告。他首先指出，共产国际的解散，是一件大事。他肯定了共产国际在它存在的整个历史时期中，在帮助各国组成真正革命的工人政党上，在组织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事业上，特别是在帮助中国革命事业上，有巨大功劳。他接着指出，但是现在共产国际这个革命的组织形式，已经不适合斗争的需要了。如果还继续保存在这个组织形式，便反而会妨碍各国革命的发展。现在需要的是加强各国共产党，而无须存在这个国际的领导中心了。共产国际的解散，不是为了减弱各国共产党，而是为了加强各国共产党，使各国共产党更加民族化。这就增加了我们的责任心，每个同志都要懂得自己负担了极大的责任，从而发挥高度的创造力。毛泽东极其强调地指出，有两种团结是绝对必要的，一种是党内的团结，一种是党和人民的团结，这些就是战胜艰难环境的无价之宝。全党同志必须团结在中央的周围，只要共产党人团结一致，同心同德，任何强大的敌人，任何困难的环境，都会向我们投降的。党的干部应当和广大群众打成一片，克服一切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我们共产党人不是要做官，而是要革命，我们人人要有彻底的革命精神，我们不要有一时一刻脱离群众。只要我们不脱离群众，我们就一定会胜利”。

同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指出："中央对国际 解散共产国际的建议已作出决定，即日由战报发来，你收到后，除在《新华日报》上发表外，并请即交塔斯社驻渝代表，请他们全文发莫斯科，此间不再发去。《解放日报》另有社论一篇，亦将发给你。"

会见邓宝珊

1943 年 6 月初，蒋介石打电报给晋陕绥边区总司令邓宝珊，要他绕道宁夏去重庆开会。邓看完电报后说："不指定路线罢了，指定了，我偏要走延安"。于是一行人马于 6 月 17 日到达延安。

毛泽东当天就在杨家岭新建的中央大礼堂设宴，为邓宝珊等接风洗尘。宴会前毛泽东与邓宝珊相见，邓第一句话就是："毛主席发胖了！"毛泽东回答：这是由于我们军民搞了大生产，丰衣足食所致。

6 月 20 日，毛泽东亲自做东道主在交际处又一次设宴招待邓宝珊。毛泽东在谈到胡宗南时说：胡宗南以重兵包围边区，不过挑两筐鸡蛋叫卖而已，我们给他丢两块石头，就全部砸烂了。邓宝珊笑着说："其中可能有些石子"。毛泽东也笑了。邓宝珊这次在延安停留一周。

11 月下旬，邓宝珊在重庆办完事，由西安返榆林，再次经过延安。这次邓宝珊因长期在外劳忙，偶感风寒，突然患病。毛泽东非常关心邓宝珊的病况，除亲自慰问外，还请李鼎铭为邓宝珊诊脉，处方。11 月 26 日，毛泽东致延安交际处处长金城信，让他把 10 件狐皮作为大衣料送给邓宝珊。

11 月下旬的一天，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同邓宝珊、续范亭谈话。谈话间毛泽东指出，国民党可能采取 3 个方向：第一个是直接投降和内战方向。这条路不仅我党反对，一切爱国民主党派、国际友人反对，就是国民党内部也很难通过，因而是走不通的。第二个方向，一面假装抗日，一面积极反共。这种想法在国民党内

部很有欺骗性。第三个方向，根本放弃法西斯独裁和内战政策，这才是条生路。我们大家必须为此而努力奋斗。三民主义必须通过实行三大政策来实现。现在日本的困难越来越大，抗战胜利在望，光明在前，只须我们国共两党共同继续努力了。

这次邓宝珊一行在延安逗留了半个月，于12月初离延返榆。

中共中央为抗战6周年纪念宣言

1943年6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七七”宣言的起草问题，毛泽东发言说，由秦邦宪起草（后来实际上是毛泽东自己起草的）后再讨论一次，宣言内容要与党的政策相适合。

6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抗战6周年纪念宣言》草案，决定对毛泽东提出的草案略加修改后通过，并同意刘少奇的提议，在宣言末段增加“全体共产党员必能巩固地团结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周围”一语。

7月2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抗战六周年纪念宣言》在《解放日报》发表。宣言首先分析了全世界反法西斯同盟与法西斯侵略两大阵线所发生的力量对比的巨大变化及其意义。接着指出：在中国抗战的第七年，为了克服现有的困难和准备好将来反攻时的力量，中共中央向国民党政府提出四项建议。（一）应该加强作战。只有加强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互相援助，特别是加强对于敌后抗战军民的援助，才是加强整个中国战场作战努力的具体办法。（二）应该加强团结。抗日战争应该是始于团结，终于团结，团结是全国人民抗日的基础。如何加强这个团结，以利抗日，实在是一切任务中的最重要的任务。（三）应该改良政治。唯一的方针是实际执行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实行若干必要的政治上的改革。（四）应该发展生产。经济改革的基本方针，应该是为着发展生产而实行一个调节各阶级经济利益的民主集中的经济政策。宣言重申去年中国共产党纪念抗战

5 周年宣言中指出的战后合作建国的主张。宣言最后说：抗战的第6 周年，同时即是中国共产党诞生的第 22 周年。22 年的历史实践已经证明，中国共产党奋斗的方向，是使中华民族起死回生的完全正确的方向，并将在今后的历史实践中继续坚持下去，直到完全胜利而后已。

不赞成“毛泽东主义”的提法

晋察冀日报社社长兼总编邓拓，于 1942 年 7 月 1 日，在该报头版以醒目的标题刊出他写的社论：《纪念七一，全党学习掌握毛泽东主义》。社论明确提出“毛泽东主义”这个概念，号召“深入学习掌握毛泽东主义，真正灵活地把毛泽东主义的理论与策略，应用一时一地的每一个具体问题中去。”

一年之后，在中共 22 周年诞辰之际，即 1943 年 7 月 8 日，延安《解放日报》全文发表了王稼祥撰写的题为《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的文章。文章明确提出了“毛泽东思想”的概念，指出“中国民族解放整个过程中——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正确道路就是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就是毛泽东同志在其著作中与实践中所指出的道路。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的布尔什维主义，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共产主义，毛泽东思想，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运动实际经验相结合的结果”。

王稼祥事前把写好的文章送给毛泽东审阅。一天傍晚，毛泽东来到王稼祥那里，谈及了对文章的意见。在两个多月以前，4 月 22 日毛泽东在给凯丰的信中，曾说过“我的思想（马列）自觉没有成熟”。所以刚开始时，毛泽东连“毛泽东思想”都不同意提，后来由于王稼祥的坚持，毛泽东才同意了文中关于“毛泽东思想”的提法。

但是，毛泽东对王稼祥特别强调：不能提“毛泽东主义”。他

说：我是马克思、列宁的学生，怎么可以跟他们并列？马克思有马克思主义，列宁有列宁主义，我不能提“毛泽东主义”。我没有“主义”。我的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你们一定要提，还是你提的“毛泽东思想”好。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思想嘛，不能随便地提“主义”。不过，我仍然以为，作为一种思想体系，我还没有成熟。这不是谦虚，事实如此。

运用舆论反击国民党进攻

1943 年 6、7 月，国民党政府、蒋介石、胡宗南利用共产国际解散之机，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6 月 9 日，何应钦、白崇禧、胡宗南在陕西耀县举行军事会议，策划进攻陕甘宁边区。18 日，胡宗南在洛川召开军事会议，部署进攻陕甘宁边区，准备分 9 路闪击延安。7 月 2 日，胡宗南电令各部于 10 日前完成一切准备，待命行动。

与此同时，6 月 12 日，西安劳动营训导处处长、复兴社特务分子张涤非，召集所谓西安文化团体座谈会。在张涤非操纵下通过他事先写好的攻击马列主义已经破产，要求解散中国共产党的反动电文。7 月 6 日，国民党政府中央通讯社发表了这条公开反共，破坏团结的新闻。在重庆，国民党当局还禁止《新华日报》刊登记念中国共产党成立 22 周年的社论，并派人监视报馆。

7 月 7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关于对付国民党反共宣传与进攻陕甘宁边区问题。毛泽东发言指出：此次蒋介石、胡宗南调集河防兵力积极准备进攻边区，及国民党公开宣传“取消中共”、“取消边区”，制造反共舆论的举动，是他们企图利用德苏及日苏的紧张关系，估计日本会进攻苏联，利用共产国际解散机会，实行军事压迫、政治阴谋，企图解散中共、取消边区、取消八路军的反动行为。我们过去两年采用不刺激国民党的“和国”政策，保持了两年多的比较平静，是正确的。现在情况变化，就不适用

了，而要采用以宣传对付他们的反共宣传，以军事对付他们的军事进攻。会议同意毛泽东的上述意见，作出以下4项决定：(1) 在坚持统一战线，实行三民主义，拥护国民党政府和蒋介石的原则下，集中力量痛斥国民党反共分子的反动政策与挑起内战、破坏抗日团结的第五纵队的行为。立即公布朱德总司令致蒋、胡的电报及反对西安特务张涤非制造反共宣传的新闻。延安各机关、学校、部队应配合学习“七七”宣言举行热烈的讨论。(2) 于7月9日召开延安各界群众大会，纪念抗战6周年，在群众大会上表示坚持抗战，反对内战，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并用大会名义发表通电。(3) 进行军事上的作战准备，但后方机关不到必要时不要移动。(4) 由中央书记处对各地发出一个内部通知，边区各地由西北局发出。

7月8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致各中央局、中央分局电，指出：“中央决定发动宣传反击，同时准备军事力量粉碎其可能的进攻”。“各地应响应延安的宣传，在七月内先后动员当地舆论，并召集民众会议，通过要求国民政府制止内战，惩办挑拨内战分子之通电，发来新华总社，以便广播，造成压倒反动气焰之热潮，并援助陕甘宁边区之自卫战争。其宣传方针，根据延安民众大会通电之内容与口号。”

7月9日，延安各界群众3万余人举行纪念抗战6周年大会，紧急动员全边区人民制止内战，保卫边区。大会发出呼吁团结、反对内战的通电。

同日，毛泽东致电董必武，指出：“速将‘七七’宣言，朱总致蒋、胡电，延安新华社揭穿西安特务假造民意新闻及延安民众大会通电（今日发出），密印分发各报馆、各外国使馆、各中间党派、文化人士，并注意设法寄往成都、桂林、昆明各界及地方实力派，是为至要。此种宣传品散发愈普遍愈于我方有利，请用全部精力组织此事，并很机密地进行之。”

还是同一天，毛泽东起草任弼时致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周子

健电："速将朱总、萧主任致蒋、胡等电报，新华社揭发西安特务假造民意新闻及本日延安民众大会通电，设法密印数十至数百份，密发社会各界。此种工作甚为重要。"

7月11日，毛泽东为新华社起草题为《中共"七七"宣言在重庆被扣，张道藩（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发出挑拨声明，外国记者纷纷询问内战危机》的新闻稿。新闻稿揭露国民党当局禁止《新华日报》发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22周年的社论和刊登中共中央"七七"宣言的无理行径，以及国民党宣传机关对国民党军队准备进攻陕甘宁边区一事无法掩盖的窘境。

7月12日，《解放日报》发表毛泽东撰写的社论《质问国民党》。社论对蒋介石和国民党不用力抵抗日本的侵略和惩办汉奸卖国贼，而极力反共、破坏团结抗战和准备进攻陕甘宁边区这种亲痛仇快的行径，提出严厉的质问和抗议。社论说："我们正式向中国国民党中央提出抗议：撤退河防大军，准备进攻边区，发动内战，这是一种极端错误的行为，是不能容许的。中央社于七月六日发出破坏团结、侮辱共产党的消息，这是一种极端错误的言论，也是不能容许的。这两种错误，都是滔天大罪的性质，都是和敌人汉奸毫无区别的，你们必须纠正这些错误。"

7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关于国民党进攻陕甘宁边区和我党的对策问题。毛泽东发言指出：由于近日盟军在西西里岛登陆，苏联打退德国攻势，重庆各国大使的干涉，而主要是我党动员广大群众对蒋介石、胡宗南调兵进攻边区与公开宣传"取消中共"、"取消边区"表示坚决的反抗，使国民党不得不暂时和缓进攻边区的形势。但在重新调来进攻边区的军队尚未完全撤走时，不能认为已经停止了这次进攻。中央发表今年"七七"宣言时，对国民党采取了比较和缓的态度。而发现国民党积极布置进攻边区与公开宣传取消中共后，我们采用"坚持抗战，反对内战"、"坚持团结，反对分裂"的方针，并动员群众准备力量，表示坚决反抗，是非常必要的。延安民众抗战6周年纪念大会呼吁

团结反对内战通电的态度，也是完全正确的。中央今后须利用这次事件迅速进行下列各项工作：（1）实行政治攻势，打击国民党的反共气焰。（2）在军事上实行必要的准备，调若干兵力来边区及晋西北，加强军事技术训练，组织机关自卫军及加强民兵工作。（3）加紧进行清查特务奸细的普遍突击运动与反特务的宣传教育工作。（4）加强党内与人民中的阶级教育。（5）进行揭露国民党种种罪恶行为与反动思想、政策的宣传工作，以对抗国民党的反革命宣传。

同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指出：我宣传闪击已收效，10日蒋介石令胡宗南停止行动，11日蒋、胡均复电朱德声明无进攻意，12日胡下令开始撤退一个师及两个军部（第一军及九十军），内战危机似可克服。此次蒋之阴谋迅速破产，是我抓紧时机捉住反对内战、反对侮辱共产党两个要点，出其不意给以打击。望用一切方法克服困难，保持国共一年和平，我党即可能取得极有利地位。

你的《游击队歌》写得很好啊

作曲家贺绿汀在八路军平型关、阳明堡战斗胜利的鼓舞下，创作了著名的《游击队歌》。这首歌在临汾刘庄八路军高级干部会议上举行首演，贺绿汀亲任指挥，没有乐队伴奏，但一曲既终，掌声如雷。前座的朱德、任弼时、刘伯承、徐向前、贺龙、卫立煌都点头称赞这是一首好战歌。

很快，这首充满自豪乐观的《游击队歌》不胫而走，不仅在延安，而且在敌战区都流传开了，唱遍了祖国的四面八方。

1943年7月14日，贺绿汀历尽艰辛来到延安，与先前来到这里的妻小及多年不见的老朋友团聚了。不久后，在王家坪八路军总部礼堂，周扬引他来到毛泽东面前。毛泽东拉着他的手笑呵呵地说："我们还是老乡啊！贺果也是宝庆人，你认识他吗？贺绿汀马上回答：他是我三哥。毛泽东说，这就巧了，他还是我在一师

的同班同学呀！毛泽东更加高兴了，夸贺绿汀说：你的《游击队歌》写得很好啊！你为人民作了好事，人民是不会忘记你的。

评蒋介石《中国之命运》

蒋介石《中国之命运》一书于1943年3月10日出版。该书强调反对共产主义和自由主义，把10年内战的责任推到共产党身上，诬蔑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为“新式军阀”、“新式割据”，暗示两年内一定要解决共产党。

4月22日，毛泽东在致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何凯丰的信中说：“《中国之命运》我已要陈伯达（毛泽东的秘书）写一意见（数千字，征引原文），送政治局各人看，看后再考虑办法”。

以后毛泽东在党内会议上曾多次提到这本书。如在6月16日的中央政治局全会议上，毛泽东说，最近周恩来、林彪见蒋介石时，蒋介石说要照他的《中国之命运》一书所说的办，要共产党交出军权、政权。……国民党自蒋介石出版《中国之命运》一书后好转的可能很少。

7月18日《解放日报》发表题为《再接再厉消灭内战危险》的社论，社论中不点名地批评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一书。社论说：“今年三月，大后方出版了一本中国法西斯主义的‘经典’”。“这本‘经典’的中心思想，一句话说完，就是要在两年内解决中国共产党，以便实行法西斯主义”。

7月19日，关于陈伯达写的《评〈中国之命运〉》一文，毛泽东致信秦邦宪、陆定一，指出：“陈伯达文章看过改过，送上请阅，请在今日或明日发表，以约5000字登在社论地位，其余接登第四版，一天登完。以两天或三天广播之，并请广播两次。另印一小册子，亦请在日内印出，印15000份。以此作一次大宣传。印时请定一亲校一次，使无错字”。

7月21日，毛泽东起草中共中央宣传部致各中央局、中央分

局并转各区党委电。电文说："陈伯达同志《评〈中国之命运〉》一文，本日在《解放日报》上发表、并广播两次。各地收到后，除在当地报纸上发表外，应即印成小册子（校对勿错），使党政军民干部一切能读者每人得一本（陕甘宁边区印一万七千本），并公开发卖。一切干部均须细读，加以讨论。一切学校定为必修之教本"。"一切地方应注意散发到国民党军队中去。应乘此机会作一次对党内党外的广大宣传，切勿放过此种机会"。

同一天，毛泽东在致董必武的电报中指出："我为彻底揭穿阴谋并回答其自皖南事变以来的宣传攻势计，除已发之通电及解放（日报）社论外，并于本日公布陈伯达驳斥蒋著《中国之命运》一文，以便在中国人民面前从思想上理论上揭露蒋之封建的买办的中国法西斯体系，并巩固我党自己和影响美、英各国，各小党派，各地方乃至文化界各方面"。电报还要求中共中央南方局将《评〈中国之命运〉》一文，译印为中英文小册子，在中外人士中 散发，并搜集各方面对此文的反应。

8月30日，毛泽东在关于胡宗南等对《解放日报》发表的批判《中国之命运》的文章争相阅读，读后表现沉默的情况反映上，写了以下批语："请博古加印《评〈中国之命运〉》及愚民哲学（指艾思奇写的《〈中国之命运〉——极端唯心论的愚民哲学》一文，发表在1943年8月11日《解放日报》）各一万本，专发西安及沿途驻军，并召集有关同志讨论发散方法。"

纠正"抢救运动"的错误

1943年7月1日，毛泽东写信告诉总学委副主任、中央社会部部长康生，要他在《防奸经验》第六期上登载以下几句话："防奸工作的两条路线。正确路线是：'首长负责，自己动手，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调查研究，分清是非轻重，争取失足者，培养干部，教育群众。'错误路线是：

'逼，供，信。'我们应该执行正确路线，反对错误路线。"

但是，毛泽东的正确指示，没有立即完全得到贯彻执行。7月15日，康生在中央机关召开的加紧进行反特斗争的动员大会上作《抢救失足者》的报告。"抢救运动"开展仅10余天，就搞出大批"特务"，严重地混淆了敌我界限，造成大量冤、假、错案。

7月的一天，毛泽东同绥德专署专员袁任远谈话，询问绥德搞"抢救运动"的情况。毛泽东反复讲：不要搞逼供信，你逼他，他没有办法，就乱讲，讲了你就信。然后，你又去逼他所供出的人，那些人又讲，结果越搞越大。我们过去在肃反中错杀的干部很多，这是一个很沉痛的教训。我们这次无论如何不要搞逼供信，要调查研究，要重证据，没有物证，也要有人证。不要听人家一说，你就信以为真，要具体分析，不要轻信口供。对于有问题的人，一个不杀，大部不捉。杀人一定要慎重，你把人杀了，将来如有证据确实是搞错了，你虽然可以纠正，但人已死了，死者不能复生，只能恢复名誉。另外，也不要随便捉人，你捉他干什么，他能跑到哪里去。

7月30日，毛泽东致彭德怀并告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区党委负责同志电，重申审查干部的方针为：1、首长负责；2、自己动手；3、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4、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5、调查研究；6、分清是非轻重；7、争取失足者；8、培养干部；9、教育群众。共9条。强调"必须拿这种实事求是的方针去和内战时期曾经损害过党的主观主义方针完全区别开来，这种主观主义方针就是逼供信三个字"。

8月15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以中央文件正式公布毛泽东关于审查干部和肃清内奸的九条工作方针。决定指出："这一次我党在整风中审查干部，并准备进一步审查一切人员，不称为肃反，不采取将一切特务分子和可疑分子均交保卫机关处理的方针，而采取首长负责，自己动手，领导骨干与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调查研究，分清是非轻重，

争取失足者，培养干部，教育群众的方针”。“上述首长负责的整个方针，是和内战时期曾经在许多地方犯过错误的肃反方针根本对立的。这个错误方针，简单的说来，就是逼供信三字”。“这种错误思想的余毒，在许多干部中特别是在保卫工作干部中，至今还严重地保存着。只有采取上述首长负责的整个方针，才有充分可能肃清这种主观主义的错误思想，而使这次审查干部，乃至审查一切人员，达到最妥善最彻底之目的”。决定强调：“只有少捉不杀，或少捉少杀，才可保证最后不犯错误。留得人在，虽有冤枉，可以平反”。“确实冤枉者，必须平反，绝无犹豫余地”。

10月9日，毛泽东在绥德反奸大会材料上写如下批语：“一个不杀、大部不抓是此次反特务斗争中必须坚持的政策。一个不杀则特务敢于坦白，大部不抓（不捉），则保卫机关只处理小部。各机关学校自己理处大多数。须使各地委坚持此种政策。”

由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正确指示，延安“抢救运动”自8月初起，逐步停止下来。12月27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反特斗争必须坚持少捉少杀，少捉不杀的指示》。

发动反对中国的法西斯主义的运动

8月5日，中央总学委发出有系统地进行一次关于国民党的本质及对待国民党的正确政策的教育的通知。通知指出：“自从抗战以来，党内即有不少的一部分同志对今天的国民党、三民主义、蒋介石及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有不正确的了解，因而在实践上亦犯了许多错误，虽经毛泽东同志与党中央多次纠正，但是这些问题在许多同志的头脑中至今仍未彻底解决。在审查干部的工作中，在共产国际解散的讨论中，在这次反对国民党进攻边区的斗争中，证明不仅许多青年党员的思想中还保存许多错误观点，即使老党员中亦有些人有这种观点。因此，教育全党同志把这些问题（国民党、三民主义、蒋介石）彻底弄清楚，无论对目前保卫

边区和审查干部的工作上，或对于从思想上政治上使党更加巩固、统一和布尔什维克化的事业上，都是有极端重大的意义的。”通知还指出：“中央总学委决定自 8 月 16 日至 8 月 31 日的半个月中，各单位一律以主要力量来进行这个教育。”

8 月 11 日，关于发动反对中国的法西斯主义的运动，毛泽东同周恩来致电董必武，指出：“边区军事虽稍缓和，但国民党的武装准备并未放松，其宣传斗争则更加紧，各地参议会、新闻、文化、妇女等团体请解散中共电，已有十多处，中央社更发反共社论专电动员舆论”。“此间除继续广播《评〈中国之命运〉》各文外，拟于八九两月发动反对中国的法西斯主义的运动，通电全国，主张取消各种特务组织，严禁传播法西斯主义思想，以揭穿蒋记国民党实质，并教育自己”。电报同意重庆、桂林的文化界进行反压迫的抗议，并指示重庆《新华日报》和《群众》杂志应“多登载反法西斯主义文章，以开展思想斗争”。

8 月 25 日，为彻底纠正党内外对国民党的各种错误思想，毛泽东向各负责同志发出指示：应根据《解放日报》发表的各种文章、文件，在党内及群众中专门进行两个月的学习、讨论。并争取各中间阶层。某些重要文章，应各印成单行本，向我区、敌区人民广为散发。望将此事看作极重要事件，联系反特务斗争，由各负责同志亲自主持办理。

送大批干部回后方保存甚为必要

在精兵简政中，毛泽东十分重视把编余干部，尤其是中、高级干部送进后方学校进行培训学习，要各敌后抗日根据地都这样做，“一面支持斗争，一面大批保存干部”。1942 年 10 月 17 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就指出“送大批干部回后方保存甚为必要，后方经济虽困难，但可组织干部团，实行屯田政策及分散到后方部队中担任副职，一部分则进军事学校或党校”。1943 年 1 月 1 日，

在陕甘宁边区开始第三次精兵简政的同时，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征调敌后大批干部来陕甘宁边区保留培养的决定："估计到敌后形势与将来的反攻，我们必须有最大的决心抽调一大批干部来延保留与学习。在敌后发展的顶点，早经过去；由于根据地和军队的继续减缩，我们的干部，在数量上亦允许从现在工作中抽调一部出来。"

1943年8月11日，毛泽东为抽调干部送延安学习问题，致电彭德怀，嘱他和刘伯承、邓小平、杨秀峰、黄镇等说通，"从直属机关学校，从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抽调好的真正可造的高级上级干部五百左右送延学习，其他大批中级干部及犯有错误有嫌疑而前方不好处的人亦可送延，但不在此数目内"。并说："边区物质条件增 加二三万兵、一二万干部不成问题。边区今年雨量充足，可望丰收"。

8月12日，毛泽东起草中共中央书记处致晋察冀分局电，指出："支持斗争与保存干部均属重要，如对保存干部认识不足将犯严重错误。你处前送干部好的重要的甚少，兹决定由你们从直属机关学校（抗大、党校）及北岳、冀中、平北各区抽调好的高级上级干部四至五百人送延安学习"，"最好的中级干部亦可选一部分"。

8月16日，毛泽东起草中共中央书处记致邓小平和太行分局各同志电，要他们照中央给晋察冀边区电的内容，"同样正确地处理此问题。即是将全部干部分为支持斗争与保存学习两部分，而从直属机关学校（抗大、党校等）及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各区抽调好的有造就前途的高级上级干部四百及五百人送延学习，选拔中下级上来代替他们的职位"。

视察南泥湾

1943年10月，毛泽东同任弼时、彭德怀等乘汽车去南泥湾视

察三五九旅屯垦和大生产的情况。毛泽东一行到桃宝峪后，改为骑马，边走边看，来到南泥湾垦区政府所在地阳湾，受到王震等指战员的热烈欢迎。毛泽东在视察期间就住在这里。

毛泽东等在阳湾接见了三五九旅团以上干部，听取了关于部队布防、生产和训练的情况汇报。

毛泽东等在王震旅长的陪同下视察了三五九旅七一八团。团长陈冬光向毛泽东汇报了生产情况。他说，部队刚到南泥湾那一年，平均每人种5亩多地，粮食不够吃，连队生活很困难；今年每人种了30多亩地，可以做到“耕二余一”。我们也养猪、养羊、养鸡、养鸭，团里还办起了纺织厂、铁工厂、木工厂、鞋工厂、农具厂。不仅解决了吃穿问题，而且吃得好，住得好，用得好。我们已经达到两人一头猪，一人两只羊，粮食积余一年。毛泽东听了很满意，称赞说，你们的成绩很大嘛！他鼓励大家：困难并不是不可征服的怪物。大家动手征服它，它就低头了。大家自力更生，吃的穿的用的都有了。目前我们没有外援，假定将来有了外援，也还是要以自力更生为主。接着，毛泽东又讲了一段重要的话：敌人要封锁我们，我们对敌人的回答就是自己动手。用我们的双手，做到生产自给，丰衣足食。人民的军队一定要做群众的模范。我们有打仗的军队，我们有八路军、新四军，这支军队也要当两支用，一方面打仗，一方 面生产。我们有了这两支军队，我们的军队有了这两套本领，再加上群众工作一项本领，那么，我们就可以克服困难，把日本帝国主义打垮。毛泽东十分关心战士的生活和身体健康。他问：部队有没有得柳拐病的（即大关节病）？当听到“没有”的回答时，毛泽东高兴而又风趣地说：国民党困死我们，饿死我们。他们越困你们越胖了，连柳拐病都消灭了！毛泽东还对干部们说：战士的生产积极性越高，越要注意劳逸结合。你们当干部的，不仅要学会带兵打仗，还要学会领导搞生产。在视察过程中，毛泽东一行还深入到战士们新挖的窑洞、炊事班伙房、玉米和稻田。

毛泽东等还视察了七一九团驻地——九龙泉，对准备粉碎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军事进攻作了重要指示。毛泽东说：胡宗南还在我们门口，随时准备侵犯边区。我们要一面战斗，一面生产。

毛泽东一行在南泥湾视察了五六天后，即返延安。途中，在桃宝峪又视察了八路军总部炮兵学校，观看了射击表演。

总结抗日战争克敌制胜的十大政策

1943年7月1日，毛泽东出席中共中央办公厅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22周年和抗战6周年举行的干部晚会，并讲话。在讲到陕甘宁边区和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政策时，毛泽东指出：几年来我们创造了许多新东西，例如反“扫荡”、反“蚕食”、生产运动、土地政策，三三制、精兵简政、拥政爱民、拥护军队，整顿三风等。这些政策还要继续执行，一切为了战胜敌人，为了克服现在的困难，迎接将来的光明！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将各根据地执行的各项政策集中起来概括。7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关于国民党进攻陕甘宁边区和我党的对策问题，毛泽东在会上发言强调：中央今后要继续在全国贯彻整顿三风、精兵简政、统一领导、拥政爱民、发展生产、审查干部六大政策。同日，他在致彭德怀的电报中，再次提到六大政策，并说自我党实行这六大政策后，党内外，精神物质，焕然一新，大进一步，空前团结，无隙可乘。但是，到了7月30日，毛泽东考虑到敌后根据地的具体情况，又改变了提法。他在致彭德怀并告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区党委负责同志的电报中说：“前电所述六项政策，在敌后应加对敌斗争（反‘扫荡’、反‘蚕食’），再加阶级教育，成为八项政策，其次序是：一、对敌斗争；二、整顿三风；三、精兵简政；四、统一领导；五、拥政爱民；六、发展生产；七、审查干部；八、阶级教育。”

10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了毛泽东起草的《关于减租、生产、

拥政爱民及宣传十大政策的指示》，该指示最终对各根据地实行的各项政策给以全面的总结。指示说："我党在各根据地所实行的各项政策中，举其现时最切要的，共有十项。这十项政策就是：第一，对敌斗争；第二，精兵简政；第三，统一领导；第四，拥政爱民；第五，发展生产；第六，整顿三风；第七，审查干部；第八，时事教育；第九，三三制；第十，减租减息。"并指出"这十大政策是互相联系不可分割的"，"必须将这十大政策联系一致的思想向党内作普遍的宣传，使全党首先使干部认识，只有是全部的而不是残缺的，认真的而不是粗枝大叶的，实行这个联系一致的十大政策，才能达到克服困难、迎接光明之目的"。至此，抗日战争时期克敌制胜的十大政策完全总结出来了。从六大政策，到八大政策，再到十大政策，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也有个不断认识、不断总结的过程。

评国民党十一中全会和三届二次国民参政会

1943年9月6日至13日，国民党五届十一中全会在重庆召开。会议通过《关于中国共产党破坏抗战危害国家案件总报告》，大肆攻击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并决定抗战结束后一年召集所谓国民大会，制定所谓宪法。蒋介石在13日闭幕会上声称："中共问题是一个纯粹政治问题，因此应该以政治方法来解决"。

9月18日至27日，国民参政会三届二次会议在重庆召开。何应钦在会议第四日所作的军事报告中，不顾事先答应不攻击中国共产党的许诺，污蔑、攻击共产党和八路军。中共参政员董必武依照会议规则向何提出质问，并据实驳斥。CC分子捣乱会场。董必武当即声明退席，不再出席会议，以示抗议。26日，会议通过《关于军事报告中涉及第十八集团军部分之决议案》，诬蔑八路军破坏政令军令之统一。

董必武即电告中共中央。9月26日，毛泽东复电董必武，指出："你在参政会的行动是正确的"。蒋介石调动兵力到陕甘宁边区周围，都是针对我们的。"蒋所谓政治解决是欺骗，至少目前无此意"。

参政会闭幕第二天，即9月28日，毛泽东起草中共中央书记处复董必武电，指出将于10月10日在《解放日报》发表的双十社论（《只有新民主主义才能救中国——纪念三十二届双十节》），可以说团结抗敌是第一义，希望蒋介石制止内战危机，实现民主。并指示：如你当选国民参政会驻会委员，第一次会议可不出席，将来如情况略好仍可出席。

后董必武当选为国民参政会驻会委员，但位置放在末位。毛泽东在来电上批示："蒋利用邵（国民参政会秘书长邵力子）达其欺骗目的，仍要董但置末位，以示一拉一打，反映国民党不敢破裂，但反共是继续的。"

9月29日，毛泽东同周恩来致电董必武，指出：《解放日报》日内发表评国民党十一全会社论，当作我党的表示。"告小党派不要过于乐观，要静观国民党事实表现。蒋及国民党每遇一次危机即来一次宪政欺骗，毫无诚意，不要上当"。"驻会委员第一次会请假不去，以示对参政会通过反共决议之抗议"。

10月5日，《解放日报》发表毛泽东撰写的社论《评国民党十一中全会和三届二次国民参政会》。社论指出："国民党十一中全会诬蔑共产党'破坏抗战，危害国家'，同时又声言'政治解决'和'准备实行宪政'。三届二次国民参政会，在大多数国民党员把持操纵之下，通过了和十一中全会大体相同的反共决议案。此外，十一中全会还'选举'了蒋介石作为国民党政府的主席，加强独裁机构"。"十一中全会后国民党人可能打什么主意呢？不外三种：（一）投降日本帝国主义；（二）照老路拖下去；（三）改变政治方针。"社论以大量的事实，揭露武汉失守以后国民党在华北、华中的反共军事磨擦没有断过，把最大的仇恨集中在共产党；而共产

党则相忍为国，完全实践了1937年9月22日发表的共赴国难宣言中的四条诺言。社论最后指出："总之，在国民党可能采取的三个方向中，第一个，投降和内战的方向，对蒋介石先生和国民党是死路。第二个，以空言骗人，把时间拖下去，而暗中念念不忘法西斯独裁和积极准备内战的方向，对蒋先生和国民党也不是生路。只有第三个方向，根本放弃法西斯独裁和内战的错误道路，实行民主和合作的正确道路，才是蒋先生和国民党的生路。但是走这个方向，在蒋先生和国民党今天尚无任何的事实表示，还不能使任何人相信。因此，全国人民仍然要警戒极端严重的投降危险和内战危险"。

同一天，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在《解放日报》发表评国民党十一中全会社论后，在《解放日报》暂停发表公开批评国民党的文章，地方性报纸仍可批评。这一决定用中宣部名义通知各地党组织。

同一天，毛泽东根据本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的决定，起草中央宣传部致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并转各区党委电。全文如下："（一）十月五日《解放日报》发表《评国民党十一中全会及三届二次国民参政会》，你们收到后，除登报外，应大量印成小册子，广为散发，除教育干部外，应发到国民党区域各大城市及沦陷区人民中去。这个文件就是党的方针，就是对于时局的总结。（二）《解放日报》从十月六日起，暂时停止登载揭露国民党的言论，以示缓和，看一看国民党是否有政治解决及缓和时局的趋向。十月六日起，新华总社及各地分社相应停发一切揭露国民党的稿件。但各地报纸仍应继续揭露国民党，特别是反特务斗争消息应不断在报上登载。陕甘宁边区则用地方小报登载此种消息。党内阶级教育，继续进行，绝不停止。"

同一天，毛泽东复电董必武，指出："六日起解放日报及新华社一切揭露国民党的稿件暂时停止，风平浪静，以示缓和。五日文内并指出愿意恢复两党谈判"，"以后谈判由你担任"。见蒋介石

时除表示欢迎政治解决外，应指明“整个西北国民党军队备战甚急，延安不相信政治解决具有诚意，但延安欢迎政治解决，不愿破裂；如继续合作，则延安保证继续实践四条诺言，要求撤退若干军队”。

10月9日，毛泽东电示董必武：应出席国民参政会驻会委员会第一次会议。10月15日，董必武出席了国民参政会驻会委员会第一次会议。

合作社方式和组织起来

1943年10月14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干会议上作报告，当讲到发展生产时，特别讲了组织劳动力的问题。他指出，土地革命和减租减息破坏了封建剥削关系的一大半，这是第一个革命，今年边区在发展生产上，又来了一个革命，这就是用合作社方式，把公私劳动力组织起来，发动了群众生产的积极性，提高了劳动效率，大大发展了生产。毛泽东说，合作社的性质就是为群众服务，就是处处要想到群众，为群众打算，把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我愿各地同志注意提倡合作社的生产，把许多样式的合作社都发展起来，全体公私群众就会变成富裕的了。在敌后各根据地的目前困难状况，也就能够克服了。

11月13日，中直、军直第二届生产展览会开幕。毛泽东为展览会题词：“群众生产，群众利益，群众情绪，这些都是领导干部们应时刻注意的，庆祝今年生产的胜利。”前一天，毛泽东同朱德还参观了延安市为促进陕甘宁边区经济繁荣，便利商品交易而举行的骡马大会。

11月29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招待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大会上作题为《组织起来》的讲话。毛泽东说：“我想讲的意思，拿几个字来概括，就是‘组织起来’”。“高级干部会议方针的主要点，就是把群众组织起来，把一切老百姓的力量、一切部队机关学校

的力量、一切男女老少的全劳动力半劳动力，只要是可能的，就要毫无例外地动员起来，组织起来，成为一支劳动大军。我们有打仗的军队，又有劳动的军队。打仗的军队，我们有八路军新四军；这支军队也要当两支用，一方面打仗，一方面生产。我们有了这两支军队，我们的军队有了这两套本领，再加上做群众工作一项本领，那末，我们就可以克服困难，把日本帝国主义打垮”。“目前我们在经济上组织群众的最重要形式，就是合作社”。“这是人民群众得到解放的必由之路，由穷苦变富裕的必由之路，也是抗战胜利的必由之路”。“我们共产党员应该经风雨，见世面；这个风雨，就是群众斗争的大风雨，这个世面，就是群众斗争的大世面”。“我们应该抑制自满，时时批评自己的缺点，好像我们为了清洁，为了去掉灰尘，天天要洗脸，天天要扫地一样”。

12月9日，毛泽东参观陕甘宁边区第三届生产展览会后，在中共中央西北局办公厅邀请17位劳动英雄座谈生产经验，包括移民、打盐、义仓、部队生产、变工扎工及合作社等问题，鼓励他们要将这些生产经验在群众中广泛宣传，使这些经验能指导全边区人民的合作生产。

展开讨论抗日时期党的路线问题

1943年8月30日、9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连续召开会议，会议听取周恩来关于3年来大后方工作的报告。在30日会议上，毛泽东发言，讲抗日时期党的路线问题。他说：“这次我们提出蒋介石的买办封建法西斯主义，这种法西斯是被侵略国半殖民地的法西斯主义，又是反共反人民的。它的政策是两面政策，抗日与反共。我们对国民党的斗争是以斗争求团结，中央路线是正确的，王明只要团结不要斗争的路线是错误的。王明抹杀国民党内部的区别，反对抗日阵线中有左、中、右之分，只分抗日阵线与非抗日阵线。他认为中国是被侵略国就没有法西斯主义。现在证明国

民党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更加反动了，如出版《中国之命运》，调兵进攻陕甘宁边区，同时又更软弱了。王明1941年进中央医院前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说：中央路线是错误的，《新民主主义论》要修改。两年来，他还向人宣传中央路线是错误的。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决定继续举行政治局会议，展开讨论抗日时期党的路线问题。

10月5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通过关于党史学习的名单和分组，并决定：这次党史学习总学委以毛泽东为主任，刘少奇、康生为副主任，胡乔木为秘书。在日内召集中央会议，由各小组正副组长参加，由毛泽东报告学习和时局问题。学习时间暂定为3个月，开始从抗战后入门，然后再回到大革命、内战及抗战时期的问题，并向政治局提议，在参加学习者中间公开宣布允许讨论党的路线问题。

10月6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召集的会议（中央高级学习组会议）上作关于学习与时局问题的报告。关于学习问题，毛泽东指出：1940年12月25日中央《论政策》的指示本来要指出内战是路线错误，现在许多同志都不反对说是路线错误了。1941年九月会议，王明不赞成讲武汉问题，现在可以继续讨论这个问题。以前思想不成熟，没有长时间不能使大多数同志觉悟，目的也是争取。考虑四中全会是错误的，可当作问题来研究。最后毛泽东提出：团结是有原则的团结，要觉悟才能团结，有问题不争论，不是真正的团结。过去检查错误，不重思想觉悟，我们要采取历史的方法，从实际出发，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10月14日，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军事高干会上作报告，指出，我们党现在是有22年经验的党，有军队有根据地的党，再不能容许王明路线占领导地位了。王明路线的特点是：（1）以速胜论反对持久战；（2）以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反对独立自主；（3）军事上反对游击战主张运动战；（4）在组织上闹独立性，不服从中央，闹宗派主义。报告还指出：以斗争求团结的原则，要运用到

4 个范畴。第一，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要从斗争中把资产阶级提高到抗日纲领的地位，无产阶级是可以领导资产阶级的。第二，是无产阶级对农民，这是与第一个范畴完全不同的范畴，农民是我们最可靠的同盟军，对农民要以同志态度以斗争求团结，把农民提高到党的纲领的水平。第三，是无产阶级自己的队伍，以斗争求团结，统一劳动阶级，反对一切分裂无产阶级的落后思想，反对无产阶级队伍中的孟什维主义思想。第四，是在无产阶级先锋队——共产党内也要发展自我批评，反对一切机会主义思想，以斗争求团结。

12 月 28 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学习〈反对统一战线中的机会主义〉一文的指示》，指出：我党七次大会时，即将总结我党 22 年的经验……批判王明、博古宗派及其机会主义路线的形成，四中全会的篡党，五中全会的达到顶点，以及遵义会议的开始克服，但在 1937 年 12 月会议至 1938 年 9 月六中全会期间，这个宗派又利用长江局进行其反党活动，并且王明本人长期地坚持其错误路线，反而说中央路线是错误的，是违背前共产国际方针的。……各地在我党七次大会决议发表以前可以在中央局至区党委的高级干部中初步传达、初步讨论内战时期王博宗派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及其严重损失（白区损失十分之十，苏区及红军损失十分之九），抗战时期（1938 年）这个反党宗派的右倾机会主义（投降主义）路线错误及严重损失（项英的失败，华中华北在其影响时期的损失）。

12 月 28 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致饶漱石、罗荣桓、黄敬、邓小平、程子华、林枫电，指出：政治局关于研究王明、博古宗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的指示电，日内即可发给你们。你们应很慎重地组织这一研究。参加研究的高级干部范围目前不宜太多，每一分局所属地域内约在一百人至二百人左右为适宜，名单应由中央局或分局决定。”“在干部研究前，中央局及分局委员须作讨论，在思想上酝酿成熟，然后领导干部研究。此种研究的

性质是整风的深入与高级阶段，其目的是使干部提高认识与增进统一团结，并为将来讨论‘七大’决议作思想准备。”

在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强调：检查王明的错误，要用“历史的方法，从实际出发的方法，自我批评的方法”。“全党要团结”，“我们的标准是：把党斗好，不是斗翻”。“这次要避免历史上错误的斗争方法，要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当时王明因病未参加会议，毛泽东多次去看望他，并派党的工作人员听取他的意见。经过细致的工作，当时王明的思想有一定的提高，并写信给中央，承认了部分错误。

开罗会议和德黑兰会议

1943 年 10 月 19 日在莫斯科开始举行的苏、美、英三国外长会议，拟定了关于普遍安全的宣言，并邀请中国参加这一宣言。10 月 30 日，三国外长与中国驻苏联大使在这一宣言上签字。

11 月 4 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宣传部起草《宣传要点》。指出：“斯大林‘五一’命令中及中央‘七七’宣言中所称今年打败希特勒一节应作如下的解释。打败希特勒不但需要苏联的努力，而且需要英美的努力，但在过去时期内，因为只有苏联单独抵抗希特及其欧洲伙伴，英美两国没有执行他们在一九四二年开辟第二条战线的诺言，故使得希特勒还能继续进攻，使得希特勒还没有被打败。现在希特勒对苏联的第二个夏季攻势已经破产了，这是苏联单独作战的结果。今后世界反法西斯的任务，就是发动对法西斯阵线的进攻，最后地打败法西斯。今年十月革命节乃是整个反法西斯阵线，由防御到进攻的转折点，是特别值得庆祝的。”

11 月 5 日，毛泽东代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致电斯大林、苏共中央和苏联全体军民，热烈庆祝十月革命 26 周年，庆祝红军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伟大胜利，庆祝莫斯科三国会议及中国参加的四国宣言的伟大成功。并表示：中国人民将永远和苏联人民携

手并进，团结一致，争取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

11 月 6 日，毛泽东出席中共中央办公厅为庆祝十月革命 26 周年举行的干部晚会，并讲话。指出：在这一年之中，苏联红军的胜利就转变了战争的全局，关系于整个人类的命运。讲话肯定三国外长莫斯科会议所取得的成功，指出："不久的时间内，我们将看得见第二战场的实际开辟，从东西两面夹击希特勒而打败他，决定地解决欧洲的问题。欧洲问题解决，就是打断了整个法西斯的脊骨与右手，剩下日本帝国主义这个左手，也就不难打断了"。讲话表示中国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将同全国爱国的军民一齐努力，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建立自由平等的新国家。

11 月 22 日至 26 日，罗斯福、丘吉尔、蒋介石在开罗举行美、英、中三国首脑会议，讨论联合对日作战的计划，作出在滇缅路发动对日作战的决定，并签订开罗宣言。宣言表示三国的宗旨是：剥夺日本从 1914 年以来在太平洋上所夺得或占领的一切岛屿，把日本侵占的领土如满洲、台湾、澎湖群岛等归还中国，等等。宣言坚持日本必须无条件投降。

11 月 28 日至 12 月 1 日，斯大林、罗斯福、丘吉尔在德黑兰举行苏、美、英三国首脑会议，讨论对德作战中的一致行动和战后和平问题等，签订了德黑兰总协定和德黑兰宣言。总协定规定美、英等国应于 1944 年 5 月发动诺曼底登陆战役，开辟欧洲第二战场。

12 月 16 日，毛泽东同彭德怀在复邓小平的电中，着重分析目前国际形势及敌后的任务，指出："开罗会议，打击了日本诱降（但未最后放弃），堵塞了蒋介石寻求妥协之门，给与澎湖、台湾、满洲支票，可能招致日寇正面进攻之祸。德黑兰会议肯定开辟欧陆第二战场，与蒋希望快在太平洋反攻相违背。故蒋此次由开罗飞返重庆不及前次废约之大吹大擂、兴高采烈了。时局于抗日革命是极为有利的，但困难仍在增加（如开罗会议可能促使日本财阀间军阀间各派别之矛盾减少而较前更妥协团结，坚持持久战争

等)，特别处于敌后之华北须有充分准备，再坚持三五年，防止在德黑兰、开罗会议及苏联不断胜利下，引起轻敌，放松长期准备”。

1944 年

正确处理季米特洛夫的来信

共产国际驻延安联络员弗拉基米洛夫向莫斯科反映了大量关于中国共产党的错误情报。原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于1943年12月22日致信毛泽东，错误地指责中国共产党的整风运动是“反对周恩来和王明的运动”，要“把周恩来和王明这样的人排出在党之外”。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知道季米特洛夫是因为偏信错误的情报才发出这封有严重错误的信，所以采取了既坚持原则又继续维护友谊和团结的态度，正确处理这封来信。

1944年1月2日，毛泽东通过中共中央的电台，向莫斯科发了一个电报，向原共产国际领导人表示真挚敬意，告之收到季米特洛夫的来信，说明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中的任务、政策和为之奋斗的基本原则。

1月4日晚，毛泽东邀请弗拉基米洛夫一起看平剧，散戏后，毛泽东明确地告诉他，季米特洛夫的信已经收到，并表示另约时间同他谈谈季米特洛夫来信中所提出的问题。

1月6日，毛泽东同刘少奇、周恩来等邀见弗拉基米洛夫等人，向他们说明中国共产党整风运动的目的和情况：中共没有采取任何行动破坏抗日统一战线；在中国革命根据地里，反共产国际的宣传是不存在的；延安的工作一切正常。

第二天，毛泽东亲自去弗拉基米洛夫的住处，向他解释中共中央处理党内问题中坚持的原则。随之，毛泽东写了一份给季米特洛夫的电报，要求弗拉基米洛夫立即发往莫斯科。电报再次说明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人民奋斗中遵循的原则；对季米特洛夫的心情，表示感动，请他不要担心，要冷静下来，正确理解中共领导的党内政策。电报指出，中共一直都在采取有力措施来加强党的团结，结果，党内形势大为改善，党内政策的实质是统一和

团结，至于对王明，也完全是按党内统一和团结政策这个主要原则来对待的。

此后，中共中央仍和弗拉基米洛夫友好相处。弗拉基米洛夫继续留在延安任苏联驻延安联络员兼塔斯社随军记者，直到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后，他才于1945年11月离开延安回国。

旧剧革命的划时期的开端

1944年1月9日，毛泽东要观看中央党校三部演出的平剧（京剧）《逼上梁山》。白天先要来剧本阅读，晚上到中央党校俱乐部看戏。

毛泽东看戏回来，当即给该剧编导杨绍萱（中央党校研究员）、齐燕铭（中央党校教务处文教科科长）写了一封信，全文如下："看了你们的戏，你们做了很好的工作，我向你们致谢，并请代向演员同志们致谢！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在旧戏舞台上（在一切离开人民的旧文学旧艺术上）人民却成了渣滓，由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统治着舞台，这种历史的颠倒，现在由你们再颠倒过来，恢复了历史的面目，从此旧剧开了新的生面，所以值得庆贺。郭沫若在历史话剧方面做了很好的工作，你们则在旧剧方面做了此种工作。你们这个开端将是旧剧革命的划时期的开端，我想到这一点就十分高兴，希望你们多编多演，蔚成风气，推向全国去！"

信中提到郭沫若，当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他曾经将他在1942年2月写的一部历史话剧《虎符》的剧本寄给毛泽东。在观看平剧《逼上梁山》的当天，毛泽东写了一封电报给董必武请他转交郭沫若。电报说："收到《虎符》，全篇读过，深为感动。你做了许多十分有益的革命的文化工作，我向你表示庆贺。"

为个人生产节约计划事致信林伯渠

1944年春节前，陕甘宁边区政府机关大门边上，新贴出的几张墙报吸引了很多人。原来，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把《我的生产节约计划》公布出来了。其内容是：一、从农业生产上，完成细粮二石交粮食局（用变工合作方法）。二、收集废纸交建设厅。三、自卅三年一月二十五日（即1944年大年初一）起，戒绝吸外来纸烟。四、今年的棉衣、单衣、衬衣、鞋袜、被单、手巾、肥皂、完全不要公家供给。他还写了一首诗，附在计划后面，诗云："待客开水不装烟，领得衣被用三年。淡巴菰一亩公粮缴，糖萝卜二分私费赡。施肥锄草自动手，整旧如新不花钱。发动男耕和女织，广辟草菜增良田。边区子弟多精壮，变工扎工唐将班。"（扎工、唐将班原是陕北和关中农村集体出雇的一种组织，当时带有劳动互助的性质）。

林伯渠在写信给毛泽东汇报1944年边区政府关于开展生产节约运动的打算时，也附了自己的生产节约计划。毛泽东看后十分赞同林伯渠的计划，当即回信说：

林老：

来信诵悉，生产节约今年必比去年有更好成效，你个人的计划能实行，必有好的影响。我也定了一点计划，准备实行。敬祝

健康！

毛泽东

一月十九日

边区的文化教育工作要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1944年3月22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宣传委员会召开的宣

传工作会议上讲话，谈发展陕甘宁边区的文化教育问题。他说，1943年一年把经济搞好了，但文化教育问题还未提到议事日程上来。有些宣传部门不知如何干法，只会搞军事、政治，不会搞经济、文化，这不行。接着毛泽东进一步论述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关系。他说：过去军事政治第一是对的，要打垮阻碍经济文化发展的东西，才能搞经济文化。军事政治是推翻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力量，目的在发展经济文化。文化反映政治经济，反过来又影响政治经济。孔夫子办学校，目的是宣传封建秩序。资本主义没有文化建设不成。我们建设抗日根据地，没有文化也不行。军队需要文化，才能战胜旧军队。战士没有文化，不可能提高战斗力。如果不发展文化，经济发展会受阻碍。他又说：我们党首先学会了政治，后来又学会了军事。总的说来，政治、军事我们比较会，经济、文化就不大会。经济、文化不大会，这个共产党就没有多大用处。陕甘宁边区的直接任务就是两项：生产和教育。去年我们搞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生产取得很大成绩，这是一个基础。今年应把文化教育提上议事日程，学会文化工作。从现在起，我们就要提出这个问题，请大家考虑，调查研究一下，到今年冬天我们要开一个会展开讨论。毛泽东在讲话中，还对文化工作方面的报纸、学校、艺术、卫生等问题，提出了具体意见。

会后，中共中央宣传部和西北局宣传部组织了六个调查组，分别到陕甘宁边区的6个分区，深入农村调查文化教育情况，总结经验，为这一年10月至11月召开的陕甘宁边区文教工作者会议作准备。

称赞《延市完小面貌一新》是好新闻

完小，是完全小学的简称。当时延安小学教育分为普小和完小两种，普小为初小3年义务教育，完小是在初小3年的基础上再加2年高小。1943年3月21日《解放日报》发表题为《延市完

小面貌一新》的报道。报道说：延安市完小在去年上半年以前，教学方针脱离群众，教的是天下国家大事，很少有陕甘宁边区的事情，在学校所学的不能为群众服务，因此群众不愿送子弟入学。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听取了群众意见，改变了教学方针，教学内容增加了记账、写信、写路条、写契约、珠算等，自编一些介绍边区的乡土教材，并实行教学与生产相结合，受到群众的欢迎。所以，在今年春季招生中学生骤增一倍。

3月22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宣传委员会召开的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称赞这个报道，说：这是很好的一个新闻。有这样一条新闻，比我们讲好多话还好，因为它已经做出了实际成绩。这是一个完小的消息，应该把它广播到全国去。现在完小办得很好，过去的小学办得不好，群众不欢迎，我们硬要办，这是命令主义。

不但是指创作时“集中”起来

延安大学校长兼鲁迅艺术文学院院长周扬，为《马克思主义与文艺》一书写了编者序言。序言开头就指出：“毛泽东同志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给革命文艺指示了新方向，这个讲话是中国革命文学史、思想史上的一个划时代的文献，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科学与文艺政策的最通俗化、具体化的一个概括，因此又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科学与文艺政策的最好课本。本书就是企图根据这个讲话的精神来编纂的。……从本书中，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同志的这个讲话一方面很好地说明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人的文艺思想，另一方面，他们的文艺思想又恰好证实了毛泽东同志文艺理论的正确”。“本书选辑了马克思、恩格斯、普列哈诺夫、列宁、斯大林、高尔基、鲁迅及毛泽东同志的有关文艺评论和意见……。”周扬在序言中还引用了列宁对蔡特金的一段谈话，当时用的译文是：“艺术是属于人民的。它的最深的根源，应

该是出自广大劳动群众的最底层。它应该是为这些群众所了解和为他们所挚爱的。它应该将这些群众的感情、思想和意志联合起来，并把他们提高起来”。

在发表之前，周扬将序言寄给毛泽东，请他提意见。4月2日，毛泽东致信周扬：“此篇看了，写得很好。你把文艺理论上几个主要问题作了一个简明的历史叙述，借以证实我们今天的方针是正确的，这一点很有益处，对我也是上一课。只是把我那篇讲话配在马、恩、列、斯……之林觉得不称，我的话是不能这样配的。此外，第十页上‘艺术应该将群众的感情、思想、意志联合起来’，似乎不但是指创造时‘集中’起来，而且是指拿这些创造到群众中去，使那些被经济的、政治的、地域的、民族的原因而分散了的（社会主义国家没有了政治原因，但其他原因仍在）‘群众的感情、思想、意志’，能借文艺的传播而‘联合起来’，或者列宁这话的主要意思是在这里，这就是普及工作。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把他们提高起来’。是否可以作这样解释，请再斟酌一下，或同懂俄文的同志商量一下加以酌定。其余没有意见。”

后来，周扬的这篇文章发表在4月8日的《解放日报》上。

贸易金融财政是组织全部经济生活的重要环节

任弼时在1944年4月7日、8日的陕甘宁边区高干会上作《去年边区财经工作估计与今年边区金融贸易财政政策的基本方针》长篇演讲。他提出边区经济工作的第一个基本方针是发展生产，增加财富，达到完全自给；第二个基本方针是公私兼顾，互助合作，一致对外；第三个基本方针是厉行节约，建立家务，备战备荒。

事前，任弼时把演讲稿送毛泽东审阅。4月3日，毛泽东对任弼时的演讲稿写了如下批语：“可以有五百人听，中央同志及中直可去二百人左右。另在党校第一部讲一次。”“在十天内印出。印

五千本，发到五千个干部阅读（发时应编号数，发给可靠干部），标明‘党的高级干部读物，不得遗失’等字。送少数本到敌后各根据地去。”毛泽东还对讲演稿作了若干修改。在讲演稿的“新社会制度的建立，就是为着适应生产力的发展的，它是为着经济发展的，而且只有经济发展了才使新的社会制度获得巩固的基础”后，加写一段话：“并且还因为中国革命的长期性，一方面为着革命与战争事业的物质供给上的需要，一方面为着人民的需要，都必须从事经济建设的工作，不应该也不可能等候把全部敌人打平后，才去进行建设工作。加以中国地方的广大，要使全国人民都信服我们所指出的道路的正确性而拥护我们，而参加革命奋斗，就需要我们拿建设的榜样给他们看，才能作得到。”在讲演稿的“在这次高干会以后，应当可以引起全党来在思想上认识贸易金融财政工作的重要”后，加写一段话：“认识贸易金融财政是组织全部经济生活的重要环节，离了它们，或对它们采取了错误方针，全部经济生活就会停滞，或受到障碍。”

我欢迎你这个态度

陈毅奉命于1944年3月7日抵达延安，准备参加中共七大。陈毅到达延安，受到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的热情欢迎。陈毅见到毛泽东，除要系统汇报华中抗战形势外，还想倾诉满腹委曲，报告他与饶漱石的争论问题。但毛泽东对陈毅说：如果你谈三年游击战争的经验，谈华中抗战的经验，那很好，我可以召集一个会议，请你谈3天3夜。至于与小饶的问题，我看还是不要提，一句话也不要提。关于这件事，华中曾经有个电报发到中央来。这电报在，如果你要看，我可以给你看，但是我看还是暂时不要看为好。陈毅说：那我就不看，华中的事也就不谈。毛泽东说：我欢迎你这个态度。之后，陈毅开始给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起草一份《1938年至1943年的华中工作总结报告》。

一个星期后，3 月 15 日毛泽东对陈毅说：经过一个多礼拜的考虑，我以为你的基本态度是好的。你现在可以给华中发一个电报　向他们作一个自我批评。我也同时发一个电报去讲一讲，这个问题就打一个结，你看如何？

陈毅说：这样好，我照办。于是，陈毅向饶漱石和华中局、军分委各同志发了个电报。电报在热忱地叙述了到延安后毛主席对他的巨大教育帮助后，诚恳地检讨了“我的某些认识上和处理方式常有不正确的地方”，并在结尾中表示“七大后再回华中工作。”

毛泽东阅后，也起草了一份电报，于 3 月 15 日一同发往华中。毛泽东的电报说：“陈毅同志抵延，知悉华中工作发展情况，甚以为慰。关于陈、饶二同志间的争论问题，仅属于工作关系性质，在陈动身前，两同志已当面谈清，现已不成问题。中央完全相信，在陈、饶二同志及华中局、军分委各同志的领导下必能协和一致，执行中央路线，争取战争胜利。关于内战时期在闽西区域的争论，属于若干个别问题的性质，并非总路线的争论，而且早已正确地解决了。关于抗战时期皖南、苏南的工作，陈毅同志是执行中央路线的，不能与项英同志一概而论。无论是内战时期与抗战时期，陈毅同志都是有功劳的，未犯路线错误的。如有同志对以上两点不明了时，请漱石同志加以解释。”

饶漱石收到电报后，于 3 月 16 日上午以他个人的名义给毛泽东回电，回电内容反映了饶漱石的基本态度是“顶”。饶还告诉毛泽东，他另外给陈毅复电了。饶漱石对毛泽东的电报尚且是“顶”，给陈毅的复电就可想而知了。

陈毅正患感冒，看到饶给他的复电，顿时怒火中烧，提起笔来就给毛泽东写了封信，马上派人送去。

4 月 9 日，毛泽东复信陈毅：“来信已悉，并送少奇同志阅看。凡事忍耐，多想自己缺点，增益其所不能；照顾大局，只要不妨大的原则，多多原谅人家。忍耐最难，但作一个政治家，必须练习忍耐，这点意见，请你考虑。感冒宜多睡、少动、多食。余容

面叙。”

4 月 10 日，毛泽东去看望陈毅。陈毅如实地汇报了这两天的病情和心绪。毛泽东劝他说：你现在在延安，你又不能回去，横直搞不清楚。这个事情容易解决，将来你回去是可以解决的，主要是人家对你有误会，你有什么办法？越解释，误会越大。陈毅当即表示：本来我的气很大，你这样一讲，我也没有什么意见了。

毛泽东的劝导，使陈毅又有茅塞顿开之感。陈毅结合阅读毛泽东送来的向他征求意见的《学习与时局》来检查自己的思想路线等问题，经过一昼夜的反复思考，他又给毛泽东写信，表示“今后多从打开脑筋重新认识自己去着手，由己及人，变更过去及人而不由己的办法”。

《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

《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是在毛泽东的授意与主持下由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副主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谭政起草的。当时中央军委总政治部正在彻底检查部队的政治工作，从整个政治工作的方向、制度、作风进行全面检讨。谭政起草前，毛泽东曾召集陕甘宁晋绥联防军领导人贺龙、徐向前、萧劲光、谭政等讨论军队政治工作问题。初稿写出后，毛泽东作了修改，加写了 3000 字左右，并指示谭政将修改稿送周恩来审阅，以及向当时在中央党校学习的各抗日根据地的主要领导人征求意见。毛泽东加写的文字中，有：“ 中国共产党从它参加与领导中国民族民主革命以来，从它参加与领导为这个民族民主革命而战的革命军队以来，就创设了并发展了军队中的革命的政治工作。这种政治工作的基本原则，是以民族民主革命的纲领教育群众，是以人民革命的精神教育军队，使革命军队内部趋于一致，使革命军队与革命人民、革命政府趋于一致，使革命军队完全服从革命政党的政治领导，提高军队的战斗力，并进行瓦解敌军、协

和友军的工作，达到团结自己，战胜敌人，解放民族，解放人民的目的，这就是我们的军队和其他军队的原则区别。我们说，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的政治工作是革命军队的生命线，就是指的这个意思。”“如果我们的军队没有共产党领导，如果没有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的军事工作与革命的政治工作，那是不能设想的。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就不可能有彻底拥护人民利益的军事工作与政治工作，而如果没有这种军事工作与政治工作的军队，就不可能是彻底拥护人民利益的军队。八路军新四军在抗日战争中之所以能够如此英勇坚持，艰苦奋斗，再接再厉，百折不回，其根本原因就在这里。”

1944 年 4 月 11 日，谭政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作了这个报告。

4 月 20 日　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共中央军委总政治部联合发出关于学习和印发谭政《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报告的通知，指出：这个报告“是八路军、新四军政治工作问题的全面总结，其中关于发扬成绩、纠正缺点部分及组织形式、工作制度部分，都是八路军、新四军全体适用的；关于边区经验部分，亦值得全军重视”。这个报告“不但特殊地解决了军队政治工作问题，而且也一般地解决了我党历史经验、领导方法与工作作风上的许多问题，为全党干部所应注意。”

《学习和时局》

中国共产党中央领导机关和高级干部在 1941 年到 1944 年间，对于党的历史特别是党在 1931 年初到 1934 年底这个时期的历史所进行的讨论，大大地帮助了党内思想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统一。1935 年 1 月遵义会议虽然纠正了从 1931 年初到 1934 年底的“左”倾错误路线，改变了中共中央的领导机关的成分，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领导，把党的路线转到马克思列宁

主义的正确轨道上，但是在党的很多干部中间，对于过去的错误路线的性质却没有作过彻底的清算。为着进一步提高党的干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中共中央政治局在1941年到1943年这个时间内，曾经几次进行了关于党的历史讨论；随后又在1943年到1944年这个时间内，领导全党高级干部进行同样的讨论。这个讨论为1945年召集的中共七大作了重要的准备，使那次大会达到了中国共产党前所未有的思想上政治上的一致。

1944年3月5日，毛泽东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会上提出了关于路线学习6条方针性的意见：（1）党内党外问题。在去年党的路线学习中，有部分同志对王明、秦邦宪同志怀疑是党外问题，现在确定是党内问题。（2）合法与非法问题。过去有同志认为临时中央和五中全会是非法的。现在看到张闻天反省笔记中说到临时中央共产国际来电批准过，在当时上海严重情况下有上海国际代表机关批准，五中全会也经过共产国际批准。根据这一点是合法的，但选举手续不完备。临时中央到中央苏区时应该报告。他们没有报告是不好的。确定了上述决定后，就好检讨四中全会是否是政治路线的错误。四中全会经过共产国际与中央的承认，这在形式上是合法的，但政治内容是不好的。（3）思想弄清与结论宽大问题。我们自整风以来就是治病救人的，在清查党内历史中有人怀疑好像不是治病救人的方针，现在我们的方针，还是在思想上要清算彻底，组织结论要慎重和适当。过去在我们党的历史上，除反张国焘斗争外，有两次大的斗争，即反陈独秀与反李立三的斗争，那时在思想上没有很彻底的讨论，但结论作得严重，因此未达到治病救人的目的，前车之覆并没有成为后车之鉴。这一次我们要在思想上弄清楚。过去未做过认真研究理论和研究历史的工作，对犯错误者只是惩罚。没有认清立三路线的错误不是个人问题，而是代表了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急性病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的社会的必然性，不是个人的偶然现象，而是社会现象。中国社会最基本特点是小资产阶级的社会，

党对这个问题要慎重处理。我们要强调产生错误的社会原因，不要强调个人问题，因此我们的组织结论可以宽大些。这个方针现在就要宣传解释，使同志们了解实行这个方针的必要。思想要弄清，结论要宽大，对党才有利。对抗战时期也许不在七大作结论。七大只作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这一段历史的结论，这个结论应取得经验教训，要照顾以后，不重视惩办，只作政治结论，以达到治病救人的目的。(4) 不要反对一切。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这一段历史，也不要一切否认。当时我与秦邦宪在一起工作，有共同点，都要打蒋介石，分歧点就是如何打蒋介石，就是策略上的分歧。在土地问题上，六大决议是没收地主阶级土地分配给雇农、贫农、中农，争论是在没收土地后秦邦宪等主张富农分坏田、地主不分田，我是不同意的。如果把过去一切都否认就是一种偏向，我们要分析，不要笼统地一概否定。我在写《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时，也说到要保留好的东西，这才是实事求是。(5) 对六大的估计。在讨论中有少数同志企图否认六大，有人说六大基本上是错误的。我认为六大基本上是正确的，六大指出革命性质，提出十大政纲，指出形势是两个高潮之间，反对速胜论，提出要争取群众，六大的基本精神是有群众观点的。(6) 党内的宗派是否还有？我认为经过几次分化是没有了。经过遵义会议的分化、抗战初期的分化，又经过这次的分化，现在是没有这个宗派了。去掉这个包袱才合乎事实，利于全党的团结。现在比较严重的是山头主义，这种东西相当妨碍我们的合作，在党政军民关系上表现还严重。毛泽东关于路线学习讲的这 6 条方针性的意见，得到政治局会议的赞同和批准，成为政治局的结论。

4 月 12 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作关于学习问题与时局问题的报告。毛泽东的报告，讲了两个问题：(1) 关于学习问题。毛泽东传达并进一步发挥了 3 月 5 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关于路线学习讲的 6 条意见，这 6 条意见曾经得到政治局会议的同意作为政治局的结论。(2) 关于时局问题。毛泽

东分析了国际国内的形势，指出：目前国际形势有两个特点，一是反法西斯阵线力量的高涨和走向胜利，法西斯阵线力量的衰落和走向失败；二是反法西斯阵线内部人民力量的增长和反人民力量的衰落。关于国内形势，去年八月中共中央发表了国共两党抗战成绩的比较，说明国共两党在抗战中的实际地位改变了。报告说明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和抗日根据地发展的三个阶段。指出，第一个阶段是上升的，第二个阶段是下降的，第三个阶段又上升了。第一个阶段好比是伸开手掌。第二个阶段是缩回的拳头，第三个阶段是再伸出强有力的拳头。为了争取胜利，要去掉一个东西，要学习一个东西。要去掉我们背上各种各色的包袱，解除精神上的负担。党的历史上曾经有过几次表现了大的骄傲，都是吃了亏的，全党要引为鉴戒。要学会开动脑子，善于思索，养成分析的习惯。如果我们既放下了包袱，又开动了脑子，既是轻装，又会思索，那我们就会胜利。

5 月 20 日，毛泽东在中央党校第一部作关于时局问题的报告，对国际国内形势进行了分析。指出：目前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都是反法西斯力量上升，人民革命的力量上升，所以就全世界来说是胜利快要到来，就中国来说也是胜利快要到来。目前我们就是如何迎接胜利，因此要特别强调两个问题。一是要防止骄傲。骄傲是最害人的，在我们党的历史上上了骄傲不少的当。骄傲像一个包袱，什么人都可以背上这个包袱。现在是要放下这个包袱，放下这个包袱才能接近群众。我们每个同志都不要骄傲，不要只看到自己的长处，要随时看到自己的不足，随时学习。二是要打开思想，善于思索问题。如果大家放下了骄傲这个包袱，能接近群众，可是不能替群众解决问题，还是没有用。现在就是要大家多想问题，才能解决问题。

中共中央将毛泽东 4 月 12 日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报告，和 5 月 20 日在中央党校第一部的报告合并整理成《学习和时局》一文，于同年 5 月发给八路军总部、各中央局、中央

分局等。建国后，《学习和时局》一文编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

关于《永昌演义》一书致信李鼎铭

《永昌演义》是一部描写明末李自成领导的农民战争的书。作者李健侯，陕西米脂县人，出生于一个官宦家庭，其父在绥德当过官。李健侯从小听过许多关于造反头目李自成的故事，当他知道李自成是和自己是一个家庭后，便决心创作《永昌演义》。他到处收集有关李自成的传说，并请人到河南、湖北等地采访，抄录了有关史书的文献记载，于1926年写出初稿，曾交当时任陕西省政府清乡局局长的杜斌丞等看过。杜斌丞等提了意见作者修改了六次，于1930年冬完稿。全书四十回，近40万字。李鼎铭当了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后，将《永昌演义》转交给毛泽东。毛泽东阅读一过，十分高兴，并将此书抄存一部，即于4月29日致信李鼎铭：

“《永昌演义》前数年为多人所借阅；近日鄙人阅读一过，获益良多。并已抄存一部，以为将来之用。作者李健侯先生经营此书，费了大力，请先生代我向作者致深切之敬意。此书赞美李自成个人品德，但贬抑其整个运动。实则吾国自秦以来二千余年推动社会向前进步者，主要的是农民战争。大顺帝李自成将军所领导的伟大的农民战争，就是二千年来几十次这类战争中的极著名的一次。这个运动起自陕北，实在陕人的光荣，尤为先生及作者健侯先生们的光荣。此书现在如按上述新历史观点加以改造，极有教育人民的作用，未知能获作者同意否？又健侯先生近来健康如何，能来延安一游否？统祈转致健侯先生为祷！”

李鼎铭接信后即交四子李之配将毛泽东的手书转交李健侯。李看后激动不已，即应毛泽东之邀赴延安。毛泽东热情地接待了李健侯，并奖励他两石小米。建国后，毛泽东指示陕西省政府将李健侯安排在省文化馆当研究员，修改《永昌演义》，但李健侯不

幸于 1950 年病逝。李鼎铭已于建国前去世了，他的次子李力果于李健侯去世后，准备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承担修改《永昌演义》的任务。李力果，1926 年参加革命，1927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建国后曾任中共唐山市委书记，第一机械工业部副部长等职，但不幸的是他又于 1959 年病逝。从此《永昌演义》这部书稿的修改工作就搁置下来了。

半百年华不知老

1944 年五一劳动节的前一天，即 4 月 30 日，毛泽东邀请续范亭（当时任八路军晋绥军区副司令员，在延安治病休养）等人到他的窑洞中小宴。毛泽东亲切地询问续范亭近来的病情、治疗和休养情况，并讲了些有效的疗养方法。饭后，续范亭坐在毛泽东的身旁，两人畅谈身世。续范亭问毛泽东年岁几何？毛泽东说：光绪 19 年癸己生。续范亭又问是几月几日？毛泽东告诉他：旧历 11 月 19 日。续范亭心想：正小我一个月。而毛主席身体健康，器宇雄厚，脚踏实地，目光远大。毛主席的智慧究竟在哪里？毛主席的智慧就是群众的智慧；同时，群众的智慧，也就是毛主席的智慧。续范亭想，自己奔走 30 年，一事无成，直到遇见了毛主席，才使自己心悦诚服，中国革命，从此再不会走冤枉路了。续范亭又想到去年旧历 11 月 19 日，正是毛主席 50 整寿，而延安各界并没有举行什么庆祝活动。他当时也不知道。后来，他听贺龙说，毛主席认为国难期间，不必祝寿，打走日寇，时间多的是。所以，毛主席的 50 寿辰也就不声不响地过去了。续范亭觉得，在今天这个聚会上，借以祝贺毛主席的健康，也是个好机会，于是他即席赋诗一首：“半百年华不知老，先生诞日人不晓。黄龙痛饮炮千鸣，好与先生祝寿考”。毛泽东听了这首诗，高兴得同大家一起笑了。

交谈中，又谈到粮食对战争之重要，毛泽东说：韩信在登拜将坛以前，还在汉中当过“粮食部长”。朱总司令自述他初做军官

就充当司务长，旧日司务长正是管连队生活，并负训练与作战的责任。现在我们的大将们研究粮食问题，全体指战员都亲自动手，建立各单位的大小家务。各部首长、干部不但都能管理军队生活，而且都能直接参加生产，这是全世界军队没有的奇迹，同时也是中国军队的大改革，这对革命是一件很大的事。

宴请林迈可

1944年5月中的一天，毛泽东与周恩来在杨家岭设晚宴招待客人，林迈可一家应邀参加。毛泽东和周恩来在山坡上亲自欢迎他们的到来。晚宴上毛泽东不停地抽烟，说话很慢，声音很低。他逗着林迈可夫妇的女儿艾瑞卡说："她会喜欢这个地方的，延安对孩子是最好不过了。"席间，毛泽东详细询问林迈可在中国的经历，然后说："你能和我们一起过这种艰苦的生活，我们很感动。不论你是为了什么到中国来，我们能得到你帮助打日本人，觉得很幸运。"

林迈可是英国人，出身贵族世家，毕业于牛津大学。1937年，应司徒雷登之聘和白求恩乘一艘船来到中国，任燕京大学经济学教授。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林迈可同新婚不久的中国妻子离开燕京园来到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帮助八路军改进通讯工作，一直到1944年四、五月间离开晋察冀来到延安，被聘为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无线电通讯顾问，帮助三局建成一台发射功率为600瓦的发报机和一架大型定向天线。新的电台和天线建成，使太平洋彼岸美国西部也能听到延安的声音。后应朱德的要求，林迈可转到新华社工作，成为新华社英文部的第一位外国专家。毛泽东在七大所作的《论联合政府》的报告就是林迈可和新华社的其他几位同志用了三四天时间逐行逐段讨论，突击翻译出来的。这也是《论联合政府》最早的英译本。1945年底，蒋介石企图发动的内战已迫在眉睫，林迈可觉得他应该尽快回到祖国去，向英国

人民解说中国的局势，帮助制止中国的内战。

在林迈可一家离开延安的前夕，毛泽东又一次宴请他们，为他们饯行。毛泽东在席间向林迈可说："林先生，你比其他外国人都更清楚地知道我们中国共产党不想再打仗了，我们最急切需要的是和平，整个国家都需要和平。但是，如果爆发内战，国民党不能消灭我们，即使我们更弱，军队更少，他们也不能消灭我们。"

林迈可是一个耿直的英国人，他虽然不是共产党员，但对中国革命却抱有真诚的友好情谊。这种情谊表现之一，就是他能对我们工作中的不是提出直言不讳的批评。

比如林迈可初到延安，看到延安使用的标准时间一律以边区政府院子的日晷为准，这很不方便，尤其是同外界联系带来很大困难。但由于这是中央作的决定，没有人公开反对。林迈可就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指出当今世界上通行的是标准时区的办法，又说明了使用日晷的种种不便。毛泽东收到信以后立即派人打电话给各单位，询问采用什么样的标准时间最好，结果采纳了林迈可的意见。几天后《解放日报》登出通知，规定延安一律使用所在时区的时间，即中国中部标准时间。毛泽东为此专门复信林迈可，感谢他提的意见。

中共六届七中全会

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于 1944 年 5 月 21 日在延安召开第一次会议，会议选举毛泽东、朱德、刘少奇、任弼时、周恩来 5 人组成七中全会主席团，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及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主席。会议决定，在全会期间由主席团处理日常工作，中央书记处及政治局停止行使职权。会议通过了党的七大的议事日程和报告负责人，决定除毛泽东的政治报告由主席团全会讨论外，其他如军事报告、修改党章报告、党的历史问题报告等，分别成立委员会进行起草。

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第一次会议上，毛泽东代表中央政治局向全会提出关于党的历史问题的六点意见，全会同意这六点意见并形成决议。毛泽东并代表中央政治局向全会作工作报告，讲抗日准备时期和抗战时期的主要问题。毛泽东指出：这两个时期我们的目的就是为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而奋斗。为达到这个目的，我们的方针就是发展自己，团结友军。这个方针最初决定于1935年12月瓦窑堡会议，直到现在都为执行这个方针而斗争。关于发展自己，即发展八路军、新四军及其根据地，以此作为代表中华民族打击日军的中心力量，中央曾做过很多工作来说服反对这个方针或不积极执行这个方针的同志。事实说明没有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战，中国的抗战决不能有今天。关于团结友军，我们始终站在团结国民党抗日的立场上，但遇到反共磨擦则要同它斗争。在反磨擦中，我们是采取有理有利有节的方针，使磨擦斗争归于缓和，将国民党引导到对敌斗争目标上去。我们发展八路军、新四军及其根据地的政策是完全正确的。我们团结友军的政策也是完全正确的。今年军事仍以精练为主，明年准备发展，并占领一批小城市，在获得美国配合时，准备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

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历时11个月，于1945年4月20日最后一次会议结束。

共产党员都应该学习经济工作

1944年5月22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在中央党校大礼堂为陕甘宁边区工厂厂长及职工代表会议的代表举行招待会。毛泽东出席招待会，接受职工代表的献旗和献词，并发表讲话。他指出：5年前边区才真正开始有了一点工业，当时只有700个工人，现在有12000个工人，所以边区工业的进步是很快的。它的数目虽小，但它所包含的意义却非常远大。谁要不认识这个最有发展、最富于生命力、足以引起一切变化的力量，谁的头脑就是混沌无 知。要

打败日本帝国主义，需要工业。要使中国的民族独立有巩固的保障，就需要工业化。我们共产党要努力于中国的工业化的。中国落后的原因，主要的是没有新式工业。日本帝国主义为什么敢于这样地欺负中国？就是因为中国没有强大的工业，它欺侮我们的落后。因此消灭这种落后，是我们全民族的任务。老百姓拥护共产党，是因为我们代表了民族与人民的要求。但是，如果我们不能解决经济问题，如果我们不能建立新式工业，如果我们不能发展生产力，老百姓就不一定拥护我们。在抗日战争中间，我们是有经验有成绩的。但是经济工作，尤其是工业，我们还不大懂，可是这一门又是决定一切的，是决定军事、政治、文化、思想、道德、宗教这一切东西的，是决定社会变化的。因此所有的共产党员都应该学习经济工作，其中许多人应该学习工业技术。如果我们共产党员不关心工业，不关心经济，也不懂别的什么有益的工作，对这些一无所知，一无所能，只会做一种抽象的“革命工作”，这种革命家是毫无价值的。我们应该反对这种空头革命家，学习使中国工业化的各种技术知识。

向在审干和“抢救”运动中受委屈的同志摘帽道歉

1944年毛泽东为纠正在审干和“抢救”运动中出现过火的偏差，作了大量的工作。

1月10日、11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听取聂荣臻关于晋察冀边区工作报告时，对整风审干问题插话指出：对知识分子还应相信是好的。过去延安重视知识分子，不重视工农分子，抢救运动以来，又走到完全不相信知识分子。现在应估计大多数知识分子是好的。

2月8日，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政府交际处处长金城2月6日关于“抢救”运动冲击到钱拯及其子女的一份报告上批示：“钱

拯应优待他，他可能不是汉奸，他的子婿是否是特务也还是疑问，如不是，应平反的。”钱拯曾是同盟会会员，参加过辛亥革命。在毛泽东的亲自过问下，钱拯及其子婿不是汉奸的问题才得以澄清。1945年钱拯任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参议员。

2月26日，关于在审干坦白运动中应注意的问题，毛泽东等复电邓小平、滕代远，指出：“你们的审查干部工作，已进入坦白运动，并收到一些成绩，这是很好的。为使今后工作更能顺利正确进行，必须认识反奸斗争是一种隐蔽的尖锐的斗争。因为敌人是隐蔽的，所以在未发现特务之前，党内一般的倾向，是麻木不仁，熟视无睹。又因为斗争是尖锐的，所以在已发现特务之后，特别是进入坦白运动之时，党内倾向就容易转入‘特务如麻’、‘草木皆兵’。”“在没有开展反奸斗争的地方，应纠正右的倾向；在已开始发动群众反奸斗争的地方，应防止‘左’的偏向”。电报还指出：特别是在进入坦白运动的地方应注意下列问题：(1)“要灵活地运用坦白运动，不要机械的搬运延安各机关的经验”。(2)“要正确地估计敌人的力量”。“不要把一切从敌区及国民党区来的学生、知识分子、军人、文化人、技术工作人员等等，一切犯过错误的半条心的人，一切坦白分子及逮捕了的犯人，都看成是特务分子；不可将一切敌后或大后方党的组织或左倾革命团体，都看成是红旗政策的特务组织”。(3)“在坦白运动中，要不断教育干部进行调查研究工作，搜集真凭实据，不要轻信口供，使所有干部懂得没有调查研究，没有真凭实据，要判别一个人的是非轻重是很困难的”。(4)“坚持一个不杀大部不捉（不超过可疑分子的百分之五）的原则，不要在坦白大会上把不坦白的人就实行逮捕。在已经发动坦白运动的地方，要在干部和群众中深刻地广泛地进行反对逼供信的教育，详细地讨论中央的各种指示，使他们懂得逼供信的绝大危险，绝大害处，不仅可以冤枉同志，而且必然会中特务的诬害阴谋”。“因此你们要不倦地进行教育，订出一定的条例，宣布一定的纪律，而且随时进行检查工作，时时地反对逼

供信的错误”。“以上几点，我们不是说你们已经犯了这些偏向，而是根据各地经验告诉你们，提起你们注意”。这一电报还同时发给华中、山东和晋察冀。

3月5日，毛泽东同康生、彭真复电山东军区副政治委员黎玉、政治部主任萧华并告中共中央北方局，指出：“鉴于过去湖西锄奸错误的影响至今在党内外尚未完全消灭，因此山东分局对审干及反特工作必须十分细心，正确掌握中央审查干部的九条方针，坚持一个不杀大部不抓，坚决反对逼供信路线，有准备有步骤地慎重进行”。“审干反特，你们二人均须亲自参加，取得经验”。

5月19日，毛泽东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在会议讨论刘少奇报告党章草案问题时，毛泽东说，经过生产与锄奸运动，证明有许多原来准备洗刷的党员是好的。

5月24日，毛泽东出席合并后的延安大学在陕甘宁边区政府大礼堂举行的开学典礼。他在讲话中指出：“共产党人在工作中的缺点错误，一经发觉，就会改正。他们应该不怕自我批评，有缺点就公开讲出是缺点，有错误就公开讲出错误。一经纠正之后，缺点就不再是缺点，错误也就变成正确了。”

就在5月的一天，毛泽东对中央党校即将到前线去的学员讲话。他说：在整风中有些同志受了点委屈，有点气是可以理解的。但已经进行了甄别，还生气不讲团结，这就不好。整风中的一些问题，是则是，非则非。搞错了的，摘下帽子，赔个不是。讲到这里，他向大家敬礼赔不是。并说：同志们，我举手向大家敬个礼，你们不还礼，大家想想，我怎么放下手呢？这时全场起立鼓掌。

9月14日，毛泽东关于山东审干问题，复电罗荣桓、黎玉、萧华，指出：“延安审查干部经验中，在初期有许多是过左的，后来已纠正，你们不要重复。山东应该稳重谨慎地去作，凡无充分可靠证据，不要轻信某人为特务，要把特务、叛变、自首、党派及犯错误等项分别看待，严重嫌疑分子（有证据者）可以暂时逮捕

候讯，但为数应极少，尤要坚持一个不杀的方针”。

9 月 22 日，毛泽东出席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在讨论审干问题时，毛泽东发言指出：审查干部问题，结论不忙作，待整个甄别工作告一段落后，再由中央讨论一次。因为搞错了许多人，所以对于“抢救”我有些怀疑，乱子就出在这里，以后“抢救”二字不能用。

10 月 25 日，毛泽东在中央党校大礼堂给即将去前线的干部作报告，在讲审干、反特务问题时指出：审干、反特务发生许多毛病，特别是在“抢救”运动中发生过火。去年“抢救”运动，搞了十几天，我们马上就使它停止了。“抢救”运动的基本错误是缺乏调查研究和分别对待这两点。“抢救”运动有错误，错误是夸大了问题方面，但不能说是路线错了。

11 月 15 日，毛泽东在《中情通报》上关于反奸斗争的政策加写了一段话：“我们必须坚持一个不杀、大部不捉及九条方针的原则，不警惕不严肃的右倾思想是不对的，不谨慎不精细的‘左’倾思想也是不对的。”

12 月 4 日，毛泽东在审改中共中央书记处给晋察冀分局等《关于审干反奸问题》的指示稿上加写一段话：“九条方针中，最主要的是调查研究、分清是非轻重两条，两条中又以调查研究为最中心关键，凡无调查研究或虽有而是表面的非真凭实据的，一概不能误认为特务，此点特须使一切干部充分认识清楚。”

起草《中央关于城市工作的指示》

1944 年 6 月 5 日，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召开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讨论通过毛泽东起草的《中央关于城市工作的指示》。指示指出：“不占领大城市与交通要道，不能驱逐日寇出中国。”“过去人们以为从大城市与交通要道驱逐日寇的任务，似乎只有国民党才能胜任；现在必须改变此种观点，认为有些只有依靠我党才能胜

任，有些主要依靠我党才能胜任，依靠国民党是无望的。”“因此各局各委必须把城市工作与根据地工作作为自己同等重要的两大任务，而负起准备夺取所属一切大中小城市与交通要道的责任来。”“一方面发展与巩固根据地，依据现有基础，建设比现在强大得多的军队与地方工作；又方面，争取城市及交通要道的千百万群众，瓦解与争取伪军伪警，准备武装起义，以候时机成熟，就可使二者相配合，里应外合地进攻日寇，占领大城市与交通要道。里应外合的思想，是我党从大城市驱逐敌人的根本思想。”“各局各委必须把争取敌占一切大中小城市与交通要道及准备武装起义这种工作，提到极重要的地位，改变过去不注重或不大注重城市工作与交通要道工作的观点，唤起全党注重此项工作，认真地与细心地总结经验，研究办法，组织机关，配备干部，进行工作，以期在今年下半年及明年上半年，就能收获显著成绩，准备配合世界大事变，在时机成熟时，夺取在我强大军队与强大根据地附近的一切敌占城市与交通要道。”指示还提出了要实现这个伟大任务，必须解决的关于思想，关于计划与组织，关于工作方向，关于工作方法，关于干部，关于经费等等具体问题。

在会议上，毛泽东对指示作了说明，他说：日寇这次大规模进攻，目的在于打通粤汉、平汉两路，消灭蒋介石野战军，其进攻可能造成4种变化：一是国民党大大削弱，美国增加援助后恢复战斗力；二是国民党大大削弱，美国暂时不增加援助，但不投降；三是国民党大大削弱后，一部分投降，一部分继续抗战；四是完全投降。在一、二种情况下，美国、国民党、共产党3股力量对日反攻收复大城市；届时我们应争取起决定作用。国民党在精神上物质上都下降，汤恩伯一败如水，英美舆论和民主政团同盟都同情我们，国民党内部有分化。现在如不提出这个任务，则我们在抗战中将犯大错误。但根据地在这一年内的主要任务，还是巩固而不是发展。将来为了团结群众，也可以在共产党以外组织一种阵线。

会议还提议由刘少奇等14人组成中央城市工作委员会，彭真为主任，并建议七大的议程增加城市工作一项。

会见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

1944年6月9日，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一行21人到达延安。其中外国记者有：美联社、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的斯坦因，美国时代杂志、纽约时报、同盟劳动新闻的爱泼斯坦，合众社、伦敦泰晤士报的福尔曼，路透社、多兰多明星周刊的武道，美国天主教信号杂志、中国通讯的夏南汉神甫，苏联塔斯社的普金科等。中国记者有：中央日报的张文伯，中央社记者徐兆镛、杨家勇，扫荡报采访主任谢爽秋，大公报记者孔昭恺，时事新报记者赵炳烺，国民公报编辑周本渊，新民报主撰赵超构，商务日报总编金东平等等。

毛泽东于6月12日在中央大礼堂后面客厅会见了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他首先致词说：我十分欢迎各位记者来到延安。各位到延安时，正遇着欧洲开辟了第二战场，第二战场的开辟，其影响不仅在欧洲，而且将及于太平洋与中国。中国共产党坚持国共合作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建立独立民主的中国的政策始终不变。中国有很大的缺点，一言以蔽之就是缺乏民主，只有民主抗战才能取得胜利，也只有民主才能使中国在战后继续团结。致词后，毛泽东回答记者提问，综合起来为三个问题：（一）关于国共谈判，（二）关于第二战场，（三）关于中共的希望和它自己的工作。毛泽东着重谈了第三个问题，指出：中国缺乏一个为推进战争所必需的民主制度。我们所希望于国民政府、国民党及一切党派的，就是从各方面实行民主。民主必须是各方面的，政治上的，军事上的，经济上的，文化上的，党务上的以及国际关系上的。我们很需要统一，但是只有建筑在民主基础上的统一，才是真统一。我们共产党为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而做的一切工作，都贯彻着一

个民主统一或民主集中的精神。全中国只有民主制度、民主作风，目前才能胜敌，将来才能建立一个很好的和平的国内关系与国际关系。这次会见[illegible]3小时。会见后，毛泽东设宴招待记者参观团。宴会后，又陪同他们观看平剧《古城会》、《打渔杀家》、《鸿鸾禧》、《草船借箭》。当看到《古城会》里的张飞，《打渔杀家》里的教师爷，《鸿鸾禧》里的金老头，《草船借箭》里的鲁肃时，毛泽东不断地发笑。毛泽东对客人们说：对于平剧没有研究，但很喜欢看。

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在延安不断地参观，连续地谈话，不知不觉快一个月了。7月2日，毛泽东又同他们举行了谈话会。12日，记者团除5名外国记者留在延安继续参观访问，其余都离开延安回重庆。

7月14日，毛泽东单独会见了留下继续参观访问的外国记者斯坦因。谈话从下午3时持续到15日凌晨3时，毛泽东回答了斯坦因提出的问题。关于中国共产党所信仰的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思想方法问题，毛泽东说：各国的共产党只有一件共同的东西，那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思想方法。中国共产党特别需要严格地把共产主义观察、研究、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和新民主主义的实际政策相区别。没有共产主义的思想方法，我们将不能指导中国社会革命的民主阶段；没有新民主主义政治制度，我们就不能把共产主义哲学正确地适用于中国社会。中国现在所需要的是民主，不是社会主义。关于什么是新民主主义的主要社会经济内容的问题，毛泽东说：新民主主义的中心经济特点是土地革命。就是在当前对日作战是我们的主要任务时，也是如此。农民是我们战争努力的基础。将来的新民主主义不能建立在分散的落后的农业经济基础上。中国社会的发展主要地要依靠工业的发展，因此，工业必须是新民主主义的主要基础。只有工业社会才能成为完全民主的社会。但是为了发展工业，土地问题必须首先解决。关于中国共产党的土地革命政策问题，毛泽东说：在抗日战争时期，我

们实行减租减息政策，我们的减租政策（不是土地没收）具有两重利益，一方面改善农民生活，一方面吸引地主留在乡村，参加抗日战争。关于中国共产党战后对中国工商业资本采取的态度问题，毛泽东说：中国的私人资本及外国的私人资本在战后都必须给以宽大的机会，以便扩大发展，因为中国需要工业发展。在战后中国与世界的商业关系上，我们要以与一切国家自由平等的贸易政策来代替日本把中国做为殖民地的政策。铁路、矿山等等能够操纵国民经济的主要产业，最好由国家经营。其他工业必须由私人资本来发展。为了利用我们在手工业及农村小规模工场手工业方面巨大的潜力，我们必须依靠强大的民主的合作社。关于共产党如何注意听取群众意见的问题，毛泽东说：这是重要的一点。假若一个党的领袖人物真是为广大人民的利益而工作，忠实地为此而努力着，他们就有听取人民群众意见的许多机会。经过乡镇区县的人民会议，经过党员和各阶层人民的交谈，经过其他的会议、报纸和人民的来信，我们能够而且常常发现群众的真正的意见。关于“中国第一”还是“共产党第一”的问题，毛泽东说：没有中国，就没有中国共产党。你提的问题等于是问，是先有孩子还是先有父亲，这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际问题。我们相信马克思主义是正确的思想方法，并不是说我们就忽略了中国文化遗产及非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价值。接受中国古代思想或外国思想，并不是无条件地接受过来；它们必须和中国实际情形结合，根据实际情形而实行。我们的态度是批判地接受中国历史遗产和外国思想。盲目地接受和盲目地拒绝，我们都反对。我们中国人必须以自己的头脑来思想，并决定什么东西能在中国土地上生长起来。

7月18日，毛泽东又单独会见了留下继续参观访问的外国记者武道，同他进行了关于政治科学、国共两党关系等问题的谈话。毛泽东说：我们批判地接收中国长期的传统，继承那些好的传统，而抛弃那些坏的传统。我们以同样的态度对待来自国外的事物。我

们曾经接受了诸如达尔文主义、华盛顿和林肯树立的民主政治、十八世纪的法国哲学、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德国的马克思主义以及俄国的列宁主义。我们接收一切来自国外的、对中国有益和有用的东西。我们抛弃坏的东西，例如法西斯主义。1943 年 7 月以前，我们在一段长时间内克制对国民党的批评，因为我们期待着国共两党关系会得到改善。然而发生了国民党进行军事威胁的七月事件。我们在七、八、九三个月进行了十分广泛的批评。1943 年 9 月，国民党在十一中全会上提出和共产党的分歧应通过政治方式解决。从那时至今年 5 月，我们没有进行批评。最近提出的批评是由于以下的原因造成的：第一，国民党军队没打好，没能顶住敌人的进攻。第二，来自华盛顿和伦敦的批评比我们尖锐激烈得多，并指出中国有不抵抗的危险。鉴于全国局势的严重性，我们才提出批评。为了改变局势，国民党必须改变它的根本政策。它必须在政治和经济领域采取同人民团结的政策。只有这样，军事形势才能得到改观。我诚恳地盼望你和其他志愿援助中国人民的外国朋友们，帮助国民党认清新的形势。我们一切希望都是为了团结和民主。

毛泽东在 7 月 19 日致李先念、中共中央华中局、北方局、山东分局、晋鲁豫分局、晋察冀分局、晋西北，通报时局近况的电报中，提到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访问延安的情况。电报说：英、美、苏记者到边区已一个多月，他们感到兴奋。但是蒋介石在事前沿途布置反共宣传，又派一批人同来监视他们，进行破坏中共工作，但未达到目的。这些人现已离边区，但是英、美、苏三国主要记者尚留边区，他们愿意多看一看，并将赴晋西北参观。他们对英、美、苏的新闻报道有利于我们。

每一个模范合作社都是一本活的教科书

1944 年 6 月 30 日延安《解放日报》刊登丁玲写的《田保霖》

和欧阳山写的《活在新社会里》两篇文章。这两篇文章介绍了陕甘宁边区合作社工作中的模范人物，毛泽东读了十分满意。7月1日，毛泽东提笔给丁玲和欧阳山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快要天亮了，你们的文章引得我在洗澡后睡觉前一口气读完，我替中国人民庆祝，替你们两位的新写作作风庆祝！合作社会议要我讲一次话，毫无材料，不知从何讲起。除了谢谢你们的文章之外，我还想多知道一点，如果可能的话，今天下午或傍晚拟请你们来我处一叙，不知是否可以？"

当天下午，丁玲和欧阳山如时赴约。毛泽东还请他们一起吃了晚饭。谈话中，毛泽东从他们深入工农兵的写作实践中，又得知了不少关于边区合作社工作的事情。

7月3日，中共中央在杨家岭大礼堂招待出席陕甘宁边区合作社会议的全体代表。毛泽东到会并讲话，阐述了合作社的方针和任务等。他首先说：自1942年边区高干会后，一年半中间，合作事业有了很大的发展，整个工作走上了轨道，出现了大批的模范合作社。"每一个模范合作社，都是一本活的教科书！"接着他指出：第一，合作社是为广大群众办的。这个方针在前年冬天高干会上就已确定，这次合作社会议要重申这一方针。第二，合作社的业务主要有10项：工业、农业、运输、畜牧、供销、卫生、信用、教育、植树、公益。通过合作社把全边区的人民组织起来。第三，合作社是统一战线的性质，所有农民、工人、地主、资本家都可以参加合作社，它是政府领导、各阶层人民联合经营的经济、文化及社会公益事业的组织。第四，所有干部都应认清合作社事业的重要性，不应该有丝毫轻视的心理。毛泽东在讲话中还表扬了丁玲和欧阳山，说《田保霖》和《活在新社会里》这两篇文章写得好，作家到群众中去就能写好文章。

会后，毛泽东接见了16位合作社英雄，询问了各人的姓名、年龄及合作社的情况。

在抗日根据地内是有很多伯乐的

中共淮北区委书记刘子久，当时在延安中央党校学习。7月5日，刘子久就学习问题给淮北区党委写了封长信。同一天，毛泽东阅读了这封信，进行了修改并加写了几段话。在信中“古人说‘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一段话后面，毛泽东写道：“我们是最进步阶级和最进步人民的先锋队，我们是共产主义者，应该一变历史上的状况，就是说，在我们党内，在我们的抗日根据地内，是不但有很多的千里马，而且有很多伯乐的，埋没英雄的现象，是不应该有的，一时有这种现象是应该很快消灭的。”

7月27日，延安《解放日报》全文发表了这封信，同时发表了编者按语，按语指出：“刘子久同志在他的信里，代表广大党内党外群众说出了心里想说的话，而他指摘的弊病，作为现象的一种，或一个侧面，在我们党里，在各个抗日根据地里，几乎是普遍存在的。……自夸自满、自高自大、官僚主义、脱离群众的风气，并没有很好地受到批判；认真关心群众利益，认真发扬党内外的民主，认真向广大群众中与各个阶层中的模范人物学习，发扬这些模范人物的事迹，当作推动全般工作的范例，这种作风，还没有完全普及；而要普及它，还须作很大努力”。

7月28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宣传部起草致各地各级党委的电报。电报指出：“午感（即7月27日）《解放日报》发表刘子久同志给淮北区党委的信，各地收到后，除在报上发表外，应印成小册，广为散发；同时，连同《前线》剧本一道，均作为各地党校、军校、训练班、整风班及普通中等以上学校的教材之一。”

请各地调查和答复10个问题

1944年7月28日，为使中共中央在今秋能对几项工作作出恰当的指示，毛泽东致电李先念、饶漱石、罗荣桓、黄敬、邓小平、程子华、林枫，请他们调查和答复10个问题。这10个问题是：(1) 经过时事教育、整风、反特、减租之后，团结党外人士和“三三制”的推行是否产生了“左”的现象？(2) 减租工作的偏向是否还存在？(3) 拥政爱民与拥军优抗两项工作是否有进步，缺点是什么？(4) 今年秋冬军队轮番大整训的可能性如何？(5) 民兵工作的缺点是什么，是否还有大量发展的可能性？(6) 沦陷区、接敌区合法与非法工作相配合的工作是否有更大的发展，赤白对立的现象是否发生过及，如何克服？(7) 中央对城市工作的指示实现的可能性如何？(8) 经过今年大生产运动，是否可以减轻人民负担百分之十至二十而不影响财政支出？(9) 在我们帮助农民发展生产方面是否已经看见农民收益的增长，农民对按家计划、互助组织和合作社的态度如何？(10) 对于将民众团体的工作在减租减息后转到领导各界人民发展生产、文化、卫生方面，你们意见如何？

各地收到电报后，按中央提出的10个问题，进行调查，并写出情况报告报至中央。

12月25日，毛泽东致电邓小平：“关于十个问题的答复，早已收到，内容极好。除抄给此间许多同志阅读外，并转发各地参考。我完全同意你们的路线，望坚持贯彻下去。并请告知太行区党委负责同志，我十分感谢他们给我以关于今年生产的非常有用的总结报告。”

同日，毛泽东又致电罗荣桓、黎玉：“(一) 关于十个问题的答复，早已收到，内容很好，你们的路线是正确的。(二) 每一地区从开始减租到全部彻底完成减租任务，大体要经过三年时间，还

要抓得很紧，稍为放松，即难完成。生产工作、民兵工作、官兵关系、军民关系、文教工作，大体也是如此。要有这些时间，全体干部才能学会，全体群众才能发动。你们已有丰富经验，估计一九四五年山东全党工作会有极大进步。（三）人民生产工作，希望加强注意。（四）城市工作希望一年内有普遍发展。（五）减租后，贫农、中农粮税负担必须增加，地主、富农负担则须酌减，方见公平，方能维持军费，但赤贫者须免税。（六）减租后，地主收地必须抑制，其收回自种者可被允许，但仍须同时照顾农民利益，必须保证农民有地可种。”

欢迎美军驻延安观察组

1944 年 7 月 15 日，中共中央接到董必武来自重庆的电报：美军观察组头一批 9 人，定于 20 日飞延（实际是 22 日飞抵延安），他们的任务是与中国新力量合作；主要是商量在边区及敌后根据地建设机场问题，了解我实际情况，观察我与苏联的真实关系。人员包括有陆军、航空、电讯、医药等方面的人。希望每月通航一次。

毛泽东在 7 月 19 日致电李先念、中共中央华中局、北方局等，通报时局近况的电报中说：罗斯福 3 次电蒋要求派美国军事代表团来延安，均被蒋拒绝；此次华莱士（美国副总统）来华，正式提出罗斯福第 4 次电报，蒋始被迫答应。美国军事人员 18 人不日可到延安。

7 月 22 日，美军中缅印战区驻延安观察组（代号“迪克西使团”）第一批人员在组长包瑞德上校率领下乘飞机到达延安。

毛泽东出席了 7 月 26 日为美军观察组到达延安举行的晚宴。席间同坐在身旁的观察组成员、美国驻华大使馆二等秘书、中缅印战区司令部政治顾问谢伟思进行了交谈。在交谈中毛泽东提出美国是否有可能在延安建立一个领事馆的问题，并说他提出这一

问题，是因为考虑到在抗日战争结束后美军观察组会立即撤离延安，而这时正是国民党发动进攻和打内战的最危险的时机。

8月7日，美军观察组第二批人员到达延安。这样，驻延安美军观察组达18人。当晚，毛泽东、朱德、李鼎铭设宴招待全体人员。

8月14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毛泽东改写的社论《欢迎美军观察组的战友们》。毛泽东写道：在过去，在盟国政府与盟国人民方面，他们所了解的中国抗战情形、所得的印象，是中国抗战的主力军是国民党，将来反攻日军也主要依靠国民党。“这些印象，直到现在还是统治着盟国朝野大多数人的思想的。”“所以出现这种完全违反事实的现象的原因，主要的在于国民党统治人士的欺骗政策与封锁政策”，“只许国民党的丑诋、恶骂、造谣、诬蔑，向世界横飞乱喷，决不许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的真象稍许透露于世”。“但是事实胜于雄辩，真理高于一切，外国人中国人的眼睛，总有一天会亮起来的。现在，果然慢慢地亮起来了，中外记者团与美军观察组，均先后冲破国民党的封锁线，来到延安了。这是关系四万万五千万中国人民反抗日寇、解放中国的问题，这是关系中国两种主张、两条路线谁是谁非的问题，这是关系同盟各国战胜共同敌人、建立永久和平的问题”。“关于国民党的抗战不力、腐败无能这一方面，大半年以来的外国舆论与中国舆论，已经成了定论了。关于共产党的真象究竟如何这一方面，大多数的外国人与大后方的中国人，还是不明白的，这是因为国民党的反动宣传与封锁政策为时太久的原故。但是情况已经在开始改变。大半年以来的外国舆论中，已经可以看见这种改变是在开始。这次记者团与观察组的来延，将为这种改变开一新阶段”。

建立新民主主义家庭

在热火朝天的大生产运动中，一种民主的关系在抗日根据地

的许多劳动农民家庭里逐步形成：家庭领导由家庭成员民主选举；生产计划、分工摊派以及劳动果实的分配等等，都要通过召开民主的家庭会议由家庭成员集体讨论决定。由于家庭内部民主关系的建立，进一步激发了每个家庭成员的生产积极性，使根据地家庭经济逐步发展起来。延安《解放日报》从1944年三八妇女节起，就不断登载有关这方面的报道。例如，3月14日第四版所载李树厚家；5月5日第三版所载王世兴、张树凤、杜元林家；6月2日第二版所载王国保家；8月9日第二版所载蔡德旺家，第三版所载李来成家。如何加紧旧家庭的正确改造，如何促进新家庭更大量地涌现，无论从发展农民家庭经济来说，也无论从发展整个根据地的各种建设事业来说，都是很重要的基本工作。为此延安解放日报社的一位同志起草了一篇题为《把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建立在家庭里》的社论。稿子送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作了很大修改，并把题目改为《改善家庭关系，建设新家庭》。

改稿主要讲了3个问题：第一，肯定了在新民主主义条件下各抗日根据地兴起的一种新型的家庭关系。第二，提出了对旧式家庭不断进行改造的必要性。第三，指出了建立新民主主义家庭的基本要求。原文经毛泽东的修改，这3个问题讲得比较充分。但是，毛泽东觉得稿子“改的与原文各部分颇不调和”，不好发表，“而请报馆另写一篇不涉及许多根本问题的文章发表了”。报馆另写的一篇文章的题目是《发扬根据地新式家庭》，作为社论发表在1944年8月25日延安《解放日报》的第一版。然而，未发表的改稿和已发表的社论，对在家庭问题上的一些理论原则和我党的基本政策，有的没有论及，有的虽论及了，但未加深入阐明。因此，8月19日毛泽东给解放日报社社长博古写了一封信，对家庭问题作了进一步的阐述。

毛泽东指出：“原文（指未发表的原题为《把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建立在家庭里》的《解放日报》社论草稿——引者）着重改造家庭，关于联系群众方面说的很少（即在已发表的那篇社论

上亦是如此），而问题的重点，恰是使家庭改造与群众运动联系起来。这种群众运动，有当地的不脱离家庭的群众运动——变工队及合作社，自卫军及民兵，乡议会，小学、识字组及秧歌队，以及各种群众的临时集会；有脱离家庭、远离农村的群众运动——进军队（才有革命军），进工厂（才有劳动力市场），进学校（才有知识分子）以及其他外出做事等。民主革命的中心目的，就是从侵略者、地主、买办手下解放农民，建立近代工业社会。‘巩固家庭’的口号，只有和上述种种革命运动联系起来，才是革命的口号。农民的家庭是必然要破坏的，进军队进工厂就是一个大破坏，就是纷纷‘走出家庭’。实际上，我们是提倡‘走出家庭’与‘巩固家庭’的两重政策。扩军、归队、招工人、招学生（这后二项将来必多）、移民、出外做革命工作、找其他职业等等，都是提倡走出家庭，这个数目，在现在敌后战场是很大的，将来也是很大的。剩下的男女老幼，才是提倡巩固其家庭。在内战时的兴国县，有些家庭，剩下来待我们巩固的，竟只占人口的少数。只要有一个大的时局变动，例如打下北平之类，我们居住的这个现在很少变动的边区农村家庭人口，也将有许多人走出家庭。实际上，不断地走出，不断地巩固，这就是我们的需要。所以，根本否定五四口号，根本反对走出家庭，是不应该也不可能的。”毛泽东还指出：“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是工厂（社会生产，公营的与私营的）与合作社（变工队在内），不是分散的个体经济。分散的个体经济——家庭农业与家庭手工业是封建社会的基础，不是民主社会（旧民主、新民主、社会主义一概在内）的基础，这是马克思主义区别于民粹主义的地方。简单言之，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是机器，不是手工。我们现在还没有获得机器，所以我们还没有胜利。如果我们永远不能获得机器，我们就永远不能胜利，我们就要更之。现在的农村是暂时的根据地，不是也不能是整个中国民主社会的主要基础。由农业基础到工业基础，正是我们革命的任务。”毛泽东在信中最后还附了一段关于解放个性的话：“我在

改文中加上了解放个性，这也是民主对封建革命必然包括的。有人说我们忽视或压制个性，这是不对的。被束缚的个性如不得解放，就没有民主主义，也没有社会主义”。

提出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

1944 年 8 月 17 日，董必武致电请示周恩来：传说国民党和张澜、左舜生等商议加补参政员名额，我党应取何种态度？如赞成加补，则我党加补多少？推荐谁？应准备。毛泽东收阅此电后批示：“应与张、左商各党派联合政府。参政会可同意增人，取积极态度，但是第二位的。以上请周考虑拟复。”

8 月 18 日，周恩来复电董必武、林伯渠，请他们考虑目前由我党向全国提议并向国民党要求提前召集各党派及各界团体代表会议，改组政府，然后由此政府召开真正民选的国民大会，讨论反攻，实行民主，这一提议是否可能引起大后方响应，尤其是小党派、各地方实力派的同情。毛泽东在电报稿上写了如下批注：“应先召集党派及团体代表会，改组政府，方有召集民选国大之可能；否则即使召集，也是假的。我们如此提议，蒋必不从，将来他召集假国大，我有理由说话。此意我党‘七大’应作决定。”

同一天，毛泽东致电董必武、林伯渠，对第三届第三次国民参政会仍持去年出席的态度。如林伯渠未离渝可出席本次参政会。首要的问题是与民主党派商谈组织各党派联合政府问题。对增补名额应持积极态度，但是第二位的。如何应钦、俞鸿钧（国民党政府财政部政务次长）进攻，“我取针锋相对态度还击之”，并提出抗议。

8 月下旬，董必武、林伯渠、王若飞致电中共中央：（1）同意中央提出的“在目前由我党向全国提议并向国民党要求，提前召集各党派及各界团体代表会议，改组政府，然后由此政府召开真正民选的国民大会，讨论反攻，实行民主”的意见，并认为这是

切合时局发展新阶段的正确主张。(2) 估计民主党派和地方实力派、国民党内孙科、覃振以及中、下层党员，都会赞成这一主张。(3) 这一主张一定要争取美国支持，这一工作要在延安、重庆同时进行。

8月23日，毛泽东同美军观察组的谢伟思就国共关系问题进行长时间谈话。在谈话中，毛泽东指出：国民党政府应该立即召开一次临时（或过渡的）国民大会，应邀请一切团体派代表参加。在人数分配方面切实可行的妥协可以是，国民党大概占代表数的一半，所有其他代表占另一半，蒋介石将被确认为临时总统。这次临时国民大会必须有全权改组政府并制定新的法令——保持有效到宪法通过之时为止。它将监督选举，然后召开国民大会。我们现在只是要求：美国政府要努力引导国民党改革自己。国民党已在忙于为发动内战制造借口。我们可以说，内战是不可避免的，但不是十分确定的。

9月1日，毛泽东出席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会议讨论关于提议召开各党派代表会议，成立联合政府等问题。在讨论关于国民党变不变，倒不倒的问题时，毛泽东说：变而不倒与先变后倒均有可能。联合政府还是量变，因为特务不搞掉，封建势力不倒，无法质变。

9月4日，中共中央关于提出改组国民政府、成立联合政府问题，致电林伯渠、董必武、王若飞，指出："目前我党向国民党及国内外提出改组政府主张时机已经成熟，其方案为要求国民政府立即召集各党、各派、各军、各地方政府、各民众团体代表，开国事会议，改组中央政府，废除一党统治。然后，由新政府召开国民大会，实施宪政，贯彻抗战国策，实行反攻。估计此项主张，国民党目前绝难接受。但各小党派、地方实力派、国内外进步人士，甚至盟邦政府中开明人士，会加赞成。因此，这一主张，应成为今后中国人民中的政治斗争目标，以反对国民党一党统治及其所欲包办的伪国民大会与伪宪。"望你们在起草回答张治中、王

世杰的信中，“加上此项主张，说明这是我们关于实施民主政治的具体步骤和主张”。“在这次参政会中，如得小党派及进步人士同意，可将上述主张作成提案”。

9月5日，董必武、林伯渠出席第三届国民参政会第三次大会。提出这次大会应着重讨论国共谈判、召开国民会议、成立各党派民主联合政府等问题。

与延安市委书记谈工作

1944年夏末秋初的一天，毛泽东派秘书惠中权请延安市委书记张汉武来枣园谈工作。

毛泽东首先询问了延安市委的工作情况，张汉武直率地说：我自己的能力低，做延安市的工作，总觉得担子太重。毛泽东说：你说担子重，我也感到担子重。但是，不担担子怎么行。停了一下，毛泽东把话题一转，说道：一个领导人当解决一个问题，决定一项政策时，要左耳听批评，右耳听不是。意见对的就改正，不对的就解释。要注意听取各阶层各方面反映。能改进的就改进，需要补充的重新补充。不要认为一经决定和决议通过，就万事大吉，坐待总结了。

毛泽东接着说：延安是边区的首都。首都工作人人喊难，有人不想在首都工作，你的想法也是这样吗？这里有中央机关，军事机关，工作是不大好搞的，你一定很困难吧？张汉武回答道：延安工作有好的一面，好的一面占主要地位。我们可以直接得到党中央的指示。同时，又有这么多机关、学校，对我们工作都作了不少帮助。这时候，毛泽东讲了一个“宛平知事”的故事，使张汉武深受教益，十分感动。

谈话继续进行着，话题转到延安市的文化教育工作。毛泽东鼓励延安市把黑板报继续办下去。毛泽东说：为什么把黑板报不算报纸呢？应当算，而且是最好的报纸！一个人办报，东南西北

的群众都参加，干部、领导、小学教员写稿，这样的方向是好的，办法是好的，来自群众又到群众中去。既宣传党的政策，又宣传时事。既有表扬，又有批评。比《解放日报》活泼得多。文章又没有教条主义，几十个字、一百多字一篇，简单明了。可惜，这样的好报，你还不当报。你们要继续办下去。接着，毛泽东询问延安市在职干部的学习情况，毛泽东说：在职学习贵在坚持。除学习原著外，还要和当地的实际工作结合，不要空对空，要反对教条主义。延安整风之前，有的人读了那么多马列的书，都不能解释边币的问题。谈话还提到办党校的问题，毛泽东很称赞延安市办的不定期的训练班，说：那就是党校，你那个党校更灵活，有事就办，需要办就办，一定时期还可以停办。接着毛泽东还介绍了自己在大革命时期办农民讲习所的办法，学员每期 200 到 300 人，工作人员只有两个人，一个管理员，一个主办者。

毛泽东又问起延安市有多少土生土长的本地干部。张汉武回答：延安市共有 80 多名干部，其中大多数是土生土长的。毛泽东说：本地干部很重要，就熟悉情况而言，我就不如你们。我们总是要走的，象你，根据需要也有随时调动的可能。当谈到干部要经得起人们的批评和议论时，毛泽东讲了他在江西被排挤的情况，指出干革命就要经得起人们的批评和议论，甚至是错误的批评和议论。毛泽东说：那时，中央红军，人家不让我干，我就下农村做调查研究，长岗乡、才溪乡、兴国调查就是在那时写的。党内斗争很复杂，但任何时候都要记住党的团结、党的组织原则和党的纪律。

谈话已进行了七、八个小时，但是毛泽东依然兴致勃勃。他又问张汉武：听说你们搞了个“十一运动”，是吗？张汉武说，是的。当即汇报了这个“十一运动”的性质和内容。这是延安市提出的一个工农业生产、文化教育和市政建设的规划，内容共十一条，如每村一个识字班，每乡一个黑板报，每户一个厕所等等。毛泽东听完张汉武的汇报后，指示说，有个统一规划是对的，而且

经济、文化各方面都要包括，不可偏废。但订规划一定要看实际，如每户一个厕所，提法就不妥当。如果一个院里住几户，每户都搞一个厕所，就太多了，反而不卫生。你们提出要改进是对的，这些地方就要改进。其次，不要一律，要考虑地理和居住条件。纠正时要注意。我们无论搞什么工作，首先要调查研究，这样会搞准确。当然某些东西不会很完整，要在运动中逐渐加以修改。

谈话还涉及了许多问题……

告别时，张汉武说："我今天占了主席的宝贵时间，打扰了你一天，没谈什么情况……"没等张汉武说完，毛泽东接过话头说：不是打扰我，我犯了官僚主义，你是个父母官，应该经常找你，是麻烦你了。毛泽东又说：我们过了很有意义的一天，我从你这里了解了很多情况。

《为人民服务》

张思德是中央警备团战士，为解决在延安召开的中共七大代表的取暖问题，临时被调到安塞烧木炭。张思德到安塞后，吃苦耐劳，处处走在前头，很快与大伙烧出了一窑又黑又亮的木炭。但因窑小，烧的木炭有限，他和战友为尽快完成中央分配的任务，又重新挖窑。9月5日，天空下着雨。张思德和战友白仓正在挖一个新炭窑时，因土质松软，上面雨水渗透，造成塌方。张思德把白仓推出窑外，自己却被压在窑内，不幸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毛泽东知道这个不幸的消息后，沉痛地说：前方打仗死人是没有办法的，后方生产劳动死人不应该！他当即给警卫队长明确指示：第一，给张思德身上洗干净，换上新衣服；第二，搞口好棺材；第三，要开追悼会，我要去讲话。

9月8日，中央直属机关的1000多人在延安枣园操场举行隆重的追悼会。毛泽东身穿灰色粗布衣，没有戴帽子，神情庄重地从枣园住所走进会场。他拿着有亲笔题字的花圈，把它献在烈士

的灵位前，旁边悬挂着他亲笔题写的挽词："向为人民利益而牺牲的张思德同志致敬！"随后，默默地站立着。当警卫团政治处首长介绍了张思德同志革命的一生后，毛泽东走到台子前，首先向烈士致敬，然后转过身，开始作一小时半的讲话。

毛泽东指出："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张思德同志就是我们这个队伍中的一个同志。""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做司马迁的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张思德同志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建国后，这篇讲话编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时，题为《为人民服务》。

新闻工作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1944 年 10 月 4 日，毛泽东在解放日报社和新华社社长博古的陪同下，来到清凉山西侧山腰上中央印刷厂的礼堂，看望解放日报新华社的全体工作人员，并作了简短的讲话。毛泽东在讲了当前国际形势之后，提出新闻工作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他说，三心二意不行，半心半意也不行，一定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在谈到办党报和通讯社的两个方面，即指导和反映时说，有时候要专门反映，有时候要专门指导。毛泽东指出，党中央对各地工作的领导和指示，除了一些日常的指示活动外，一切大政方针都是通过新华社和《解放日报》来传达到各地和各阶层人民群众中去的。还说，中央了解国内外情况有许多来源，但是，主要靠你们。别的方面的东西也有一些，但是不多，主要还是靠你们。你们的工作很重要。最后，毛泽东勉励大家把《解放日报》新华社办好。

12 月 20 日，毛泽东对晋绥边区《抗战日报》指示怎样办地方

报纸问题，指出：本地消息，至少占两版多至三版。排新闻应以本地为主，国内次之，国际又次之。对于外地消息与国际消息应加以改造，对新华社的文章不能全登。应根据当地人民的需要（联系群众、为群众服务）办报，否则便是脱离群众，失掉地方性的指导意义。

在陕甘宁边区文教大会上讲话

1944年10月11日至11月16日，中共中央西北局、陕甘宁边区政府和边区文协联合召开陕甘宁边区文化教育大会，总结1942年整风运动和1943年生产运动以来文教工作的经验，表扬了各条战线群众创造的文教工作的典型，奖励了一批文教工作的模范，明确了继续发展文教工作的方针，提出了今后5年至7年内文教工作的目标。

10月30日，毛泽东在大会上讲话，阐述新民主主义文化运动中的统一战线方针（建国后，这篇讲话编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时，题目是《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毛泽东在讲话中，第一，明确指出文教工作在整个革命事业中的地位和作用。他说："我们的工作首先是战争，其次是生产，其次是文化。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第二，阐明统一战线的重要性。他说："解放区的文化已经有了它的进步的方面，但是还有它的落后的方面"。"我们必须告诉群众，自己起来同自己的文盲、迷信和不卫生的习惯作斗争。为了进行这个斗争，不能不有广泛的统一的战线。而在陕甘宁边区这样人口稀少、交通不便、原有文化水平很低的地方，加上战争期间，这种统一战线就尤其要广泛"。"我们的任务是联合一切可用的旧知识分子、旧艺人、旧医生，而帮助、感化和改造他们。为了改造，先要团结"。第三，强调为人民服务，群众路线的重要性。他说："文化工作者必须有为人民服务的高度的热忱，必须联系群众，而不要

脱离群众。要联系群众，就要按照群众的需要和自愿”。“这里是两条原则：一条是群众的实际上的需要，而不是我们脑子里头幻想出来的需要；一条是群众的自愿，由群众自己下决心，而不是由我们代替群众下决心”。

组织南下支队挺进华南

1944年8月间，中共中央就开始考虑，拟派遣一支部队挺进华南，深入敌后，建立抗日革命根据地。

9月1日，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正式决定：为发展湘鄂赣等地的工作，派遣王震、王首道、谭余保诸同志率步兵10个连及干部4个连到6个连，挺进华南，建立抗日革命根据地。动身前，将干部集中在中央党校训练一个时期，主要学习、研究党的方针、政策。

10月3日，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讨论了发展河南工作和调部队和干部去河南、湘赣问题。

10月7日，毛泽东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上发言指出：这几个月我们的作战，特别在山东有很大发展。今后主要发展方向是南方，江南、湘南、河南；同时要注意东北，还要准备苏联打日本。在干部配备上，主要的是注意南方，同时注意东北。

10月25日，毛泽东在中央党校大礼堂给即将去前线的干部作报告。首先讲时局问题，毛泽东说：在中国，现在有两个东西：一个没有希望，这就是国民党。它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政治腐败，经济衰竭，正在一天天垮下去；另一个大有希望，这就是我们。中国要胜利，日本要赶走，中国人民要解放，只有靠我们。我们一天比一天壮大，不仅数量多了，质量也提高了，全国人民现在都望着我们。同志们要到敌后去开辟工作，和你们闹麻烦的很多：第一个是日本；第二个是国民党。对于国民党，你们不能气一上来就要打倒它，要照顾大局，这个大局就是大敌当前，日本

人站在面前。我们要尽量发展自己的力量。抗战以来，我们中央就是这个政策。从现在的环境看，还需要大大的发展，广东、湖南、河南，都可以大发展。毛泽东还通过总结党内、军内的历史经验，着重指出加强党内团结和党与人民群众团结的极端重要性。他说：同志们这次出去，要能够团结广大党外群众。一个共产党员，要象柳树一样，插到哪里就在哪里活起来。但是柳树也有缺点，就是随风倒，软得很，所以还要学松树。松树的劲大得很，到冬天也不落叶子。柳树有灵活性，松树有原则性。斯大林说过，共产党员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什么是特殊材料呢？就是松树和柳树结合起来，象柳树那样可亲，人人喜欢，象松树那样坚定，稳当可靠。这样人民群众就会成群结队地围绕在我们身边。毛泽东反复指出：我们的前途是光明的，但也有很多困难。这一回你们是去长征的，一直到湖南、广东，要准备饿饭，没有房子住，生病受伤没有人抬担架，要有克服各种意想不到的困难的精神准备。毛泽东最后说：我讲的许多话，有一个原则，就是为中国人民服务。我们整个党和军队，都是为人民服务的，为了人民的利益，我们准备牺牲一切包括生命。为中国人民解放，为我们整个民族解放，我们应该这样做。

10 月 31 日，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讨论八路军一二〇师三五九旅主力南征的区域和组织机构等及其他问题。决定由王震、王首道率领的干部和部队在湖南湘水和资水之间以衡山为中心建立根据地；由王震、王首道、贺炳炎、廖汉生、王恩茂等 8 人组成军政委员会，以王首道为书记；部队用“湖南人民抗日救国军”名义（三五九旅主力组成的南征部队出征前，命名为八路军独立第一游击支队，通称南下支队；进入湖南攻占平江后改称湖南人民抗日救国军），以王震为司令员，王首道为政治委员；增派三五九旅七一八团随同出发。会议还决定取消过去夏曦关于解散洪湖党组织的决定；同意毛泽东关于大后方党员绝大多数是可靠的，有问题的只是少数的这一估计。

11月1日，毛泽东同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出席南下支队在延安东关机场举行的誓师大会。首先检阅八路军南下支队的指战员。检阅后，毛泽东讲话。他说：现在日蒋眉来眼去，一唱一和，日本占领城市，蒋介石占领山头。你们这次就是到南方去，到敌人的后方去插旗帜，开辟新的敌后抗日根据地。这是一个光荣而又艰巨的任务，你们会遇到许多困难。但是我请同志们相信，前途是无限光明的。你们要以最大的毅力去克服各种困难，上下一心，团结一致。要象“王者之师”那样，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真正做到纪律严明，秋毫无犯。要同群众打成一片，忠实地为人民服务。最后，他衷心地祝贺大家身体健康并取得远征的胜利。

八路军南下支队于11月10日从延安出发，开始南征。

与赫尔利谈判

美国总统罗斯福的私人代表赫尔利于1944年9月6日到达重庆。9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电报，请董必武代表中共欢迎赫尔利等来延安。

10月17日、18日、23日，董必武、林伯渠在重庆同赫尔利举行3次会谈。10月17日，董必武、林伯渠致电毛泽东、周恩来，报告17日同赫尔利第一次谈话的情况。赫尔利说：他约林、董谈话是蒋介石允许的，蒋也允许他必要时去延安；中共军队组织、训练都好，力量强大，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种因素；蒋介石为抗日的领袖，是全国公认的事实；中国现政府不民主，等等。董、林来电还指出，“蒋见我态度强硬，怕我们不承认他是抗战领袖”。19日，毛泽东在董、林来电上写了如下批语：“九月下半月至十月上旬，蒋对罗（斯福）、丘（吉尔）压力，硬抗了几个星期。在此期间，对我方亦表示硬性。但在双十演说出了一通气之后，又软下来。对美国软，对我方亦随着软些。邵力子召集的国、共及中间

三方会议，决定派五参政员来延及要求延安停止骂蒋等，即其表现。蒋最怕指名批评他，美国亦怕我们不要蒋，故在许蒋存在条件下，可以作出一些有利于我们的交易来”。10 月 18 日，董必武、林伯渠致电毛泽东，报告 18 日第二次同赫尔利谈话的情况。赫尔利说：他拟约张治中、王世杰和我们谈，得出两党合作初步结果后，他拟向蒋介石谈。蒋同意后，他便到延安来和毛泽东谈，求得双方合作的基础。最后蒋、毛见面，发出宣言，两党便合作起来了。10 月 24 日，董必武、林伯渠再致电毛泽东，报告 23 日第三次同赫尔利谈话的情况。赫尔利说：蒋介石 21 日交他一方案，被他当场退回。至于方案的内容，他保守秘密。他只打了一个比喻说，蒋叫你们在前面打，他们在后面打，意思要消灭你们。他问蒋为什么不可以和共产党并肩作战？他已告蒋，要马上行动，实行民主，释放政治犯，不能再等了。

11 月 6 日，毛泽东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上，就赫尔利来延安谈判问题说：蒋介石要赫尔利来调停，可得救命之益。至于能拿出什么东西来，多少可以拿一点。他怕我们不要他。如果我们愿意谈判，就表示要他。对国民党问题，赫尔利看得相当乐观。关于如何接待赫尔利，毛泽东还作了具体安排，他说：赫尔利来要开个欢迎会，由周恩来出面介绍，再搞点音乐晚会。

赫尔利于 11 月 7 日飞抵延安。毛泽东同周恩来等到延安机场迎接赫尔利。同机到达的还有林伯渠。

11 月 8 日上午，毛泽东和朱德、周恩来同赫尔利进行第一次会谈。赫尔利首先说明了自己是受罗斯福的委托作为他的私人代表，来谈判关于中国的事情。这次来延安，还得到蒋介石的同意和批准。然后他提交一份他和蒋介石共同草拟的题为《为着协定的基础》的文件，内容有五点，主要是要中国共产党的军队遵守并执行国民党政府及其军事委员会的命令，要共产党军队的一切军官和士兵接受政府的改组，然后国民党政府才承认共产党的合法地位。会上宣读了这一文件，赫尔利并作了一些说明。上午会

谈至此结束。

同日下午，毛泽东等同赫尔利进行第二次会谈。毛泽东首先对赫尔利到延安表示欢迎。接着毛泽东说：中国需要在民主的基础上团结全国抗日力量。首先希望国民党政府的政策和组织迅速来一个改变，这是解决问题的起码点。如果没有这一改变，也可能有某些协定，但是这些协定是没有基础的。因此必须改组现在的国民党政府，建立包含一切抗日党派和无党无派人士的联合国民政府，改变现在政府的不适合于团结全中国人民打日本的老政策。关于改组军队，我以为应当改组的是丧失战斗力、不听命令、腐败不堪、一打就散的军队，如汤恩伯、胡宗南的军队，而不是英勇善战的八路军新四军。在不破坏解放区抗战力量及不妨碍民主的基础上，我们愿意和蒋介石取得妥协。即使问题解决得少一些，慢一些，也可以，我们并不要求一下子解决所有的问题。但是要破坏解放区抗战力量和妨碍民主，那就不行了。然后，毛泽东对《为着协定的基础》提出具体修改意见，主要是：增加将现在的国民党政府改组为包含所有抗日党派及无党无派政治人士的代表的联合国民政府，改组统帅部为包含所有抗日军队代表的联合统帅部的条文；将原条文中的中国共产党的军队要遵守和执行国民党政府及其军事委员会的命令，共产党军队的一切军官和士兵要接受国民党政府的改组，修改为一切抗日军队应遵守与执行联合国民政府及其联合统帅部的命令，并应为这个政府及其统帅部所承认；增加保障人民各种自由权利的规定；要求承认中国共产党及一切抗日党派的合法地位。

11月9日下午，毛泽东等同赫尔利进行第三次会谈，讨论经过修改后的协定草案。毛泽东说：我们所同意的方案，如蒋介石先生也同意，那就非常好。赫尔利说：我将尽一切力量使蒋接受，我想这个方案是对的。赫尔利还说：如果蒋先生表示要见毛主席，我愿意陪毛主席去见蒋，讨论增进中国人民福利、改组政府和军队的大计，并担保毛主席及其随员在会见后能安全地回到延安。毛

泽东说：我很久以前就想见蒋先生，过去情况不便，未能如愿。现在有美国出面、赫尔利将军调停这一好机会，我不会让它错过。我还不了解蒋先生是否会同意我们的五要点。他如同意，我即可与他见面。我总觉得在我和蒋先生见面时，要没有多大争论才好。毛泽东还强调说：我很希望在赫尔利将军离开中国以前见蒋先生。毛泽东提出，这五要点双方同意之后，应当由双方共同签字，公开发表。赫尔利表示他也要在上面签字。会谈商定：今天把文件准备好，明天签字。

当天晚上，中共召开六届七中全会，毛泽东向全会报告同赫尔利会谈情况，指出：经过 3 次会谈修改后的五点协定，没有破坏我们的解放区，把蒋介石要破坏解放区的企图扫光了；破坏了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使共产党得到合法地位，使各小党派和人民得到了利益。如果蒋介石签字承认这个协定，就是他最大的让步。明天签字后，我们的文章做完了，问题即在重庆了。关于见蒋介石的问题，不能拒绝，尤其此时要考虑，为了民族的利益。签字后不去见蒋，我们就输了。现在我不去，将来再说。今天中央委员会批准这个新五条，明天即可签字。周恩来在发言中说：蒋介石认为我们参加政府和成立联合政府是有区别的。赫尔利则将二者混而为一，所以他以为蒋介石不至于为难。全会一致同意五点协定。

11 月 10 日上午，毛泽东等同赫尔利进行第四次会谈。毛泽东首先说明：（一）关于我们所同意的文件，请赫尔利将军转达罗斯福总统。（二）关于我们与赫尔利将军商谈的这个协定，昨天晚上我们中央委员会开了会，一致通过这一文件，并授权我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这个文件上签字。（三）我今天还不能和赫尔利将军同去重庆。我们决定派周恩来和你同去。毛泽东与赫尔利分别在《中国国民政府、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协定》上签字。下午 2 时，赫尔利携带签字后的协定乘机离延，周恩来和包瑞德同行。

同一天，毛泽东应赫尔利建议，写信给美国总统罗斯福。信中说："我很荣幸的接待你的代表赫尔利将军。在3天之内，我们融洽的商讨一切有关团结全中国人民和一切军事力量击败日本与重建中国的大计。为此，我提出了一个协定"。"这一协定的精神和方向，是我们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八年来在抗日统一战线中所追求的目的之所在"。"我现托赫尔利将军以我党我军及中国人民的名义将此协定转达于你"。

当天，毛泽东还致电罗斯福，祝贺他连任美国总统。

飞返重庆的赫尔利，于11月19日同蒋介石谈话，将他11月10日在延安与毛泽东签署的五条协定草案交蒋介石，被蒋当场拒绝。21日，蒋介石提出另一协定草案，共三条。主要内容是：中共派代表参加政府和军事委员会；中共将一切军队交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管辖，进行整编；承认中共合法。从此，赫尔利背弃与中共签署的五条协定，而为蒋介石的三条反协定作说客。

赞扬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

《甲申三百年祭》，是郭沫若1944年3月19日至22日在重庆《新华日报》连续发表的著名史论著作。文中叙述了明末李自成农民起义军在攻入北京推翻明朝以后，若干首领腐化并发生宗派斗争，以致陷于失败的过程。

4月12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说："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

接着，4月18日、19日两日，延安《解放日报》全文转载了《甲申三百年祭》，该报同时发表编者按语，指出《甲申三百年祭》是"科学地解说了历史"，赞扬"郭先生在他的文章里充满了爱国爱民族的热情"，斥责国民党顽固派对郭文的"围剿"。

5月，延安的新华书店总店出版了《甲申三百年祭》单行本。

6月7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和中央军委总政治部联合发出通知，号召党和军队的干部认真学习《甲申三百年祭》，要求党员，“首先是高级领导同志，无论遇到何种有利形势与实际胜利，无论自己如何功在党国，德高望重，必须永远保持清醒与学习的态度，千万不可冲昏头脑，忘乎所以，重踏李自成的覆辙。”

11月21日，毛泽东致信郭沫若：“武昌分手后，成天在工作堆里，没有读书钻研机会，故对于你的成就，觉得羡慕。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毛泽东还说：“倘能经过大手笔写一篇太平军经验，会是很有益的；但不敢作正式提议，恐怕太累你。”信中还提到郭沫若在1929年写的一部反映自己1910年至1911年生活经历的的作品《反正前后》，毛泽东说：“看了《反正前后》，和我那时在湖南经历的，几乎一模一样，不成熟的资产阶级革命，那样的结局是不可避免的。此次抗日战争，应该是成熟了的吧，国际条件是很好的，国内靠我们努力。”毛泽东谦虚地指出：“我虽然兢兢业业，生怕出岔子，但说不定岔子从什么地方跑来；你看到了什么错误缺点，希望随时示知。毛泽东鼓励郭沫若说：“你的史论、史剧大有益于中国人民，只嫌其少，不嫌其多，精神决不会白费的，希望继续努力”。

作题为《一九四五年的任务》的演说

陕甘宁边区第二届第二次参议会于1944年12月4日至19日召开。毛泽东在12月15日大会上作题为《一九四五年的任务》的演说。在演说中，毛泽东指出：“整个反法西斯战争有很大的胜利，打倒希特勒明年就可以实现。我们唯一的任务是配合同盟国打倒日本侵略者。”但是，国共谈判毫无结果，国民党仍然固执其一党专政及失败主义的政策。因此，全国人民的总任务，是一致起来，大声疾呼，要求国民党当局改变现行政策，以便迅速

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中国人民不论在大后方、在沦陷区、在解放区，都要为此目标而奋斗。中国解放区“现在已经成了抗日救国的重心”。1945 年解放区的任务有 15 项，主要是：巩固和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整训和扩大正规军、游击队、自卫军和民兵，加强军队的内部团结，进一步改善军民关系；加强民族统一战线，认真执行三三制政策；深入开展减租运动；普遍开展大规模的生产运动；注意文教工作；提高干部的工作能力和水平；用多方面的努力和各种办法促成民主的联合政府尽可能迅速地建立起来。毛泽东在演说中特别强调党内党外都要大大地提倡民主作风。他说：“各级领导人员，有责任听别人的话。实行两条原则：（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二）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我们一切工作干部，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民服务，我们有些什么不好的东西舍不得丢掉呢？如果我们改正了这个缺点，那我们就能团结更广大的人民，我们的事业就能获得更大的与更快的发展。”

12 月 25 日，中共中央发出经毛泽东修改审定的关于目前形势与任务的指示。关于形势方面，该指示指出：国共谈判无结果，但未关闭谈判之门。蒋介石军队溃败不堪，重庆及国民党区域人心惶惶。如果日本再向西南及西北进攻，国民党崩溃甚至投降的危险是可能发生的。该指示特别指出：“最近八个月，中国政治形势起了一个大变化。国共力量对比，已由过去多年的国强共弱，达到现在的国共几乎平衡，并正在走向共强国弱的地位。我党现在已确实成了抗日救国的决定因素”。关于任务方面，该指示指出：“一九四五年方针见之十二月十五日毛主席演说，各地应按照自己特点部署工作，特别注意发展生产、城市工作及扩大解放区三方面”。如果在数年之后，我们能达到一百万至一百五十万有纪律有训练的军队，而又有充足的粮食及日用品供养这个军队，而不感到勉强与竭蹶，中国的命运就可由我们掌握了”。“一切决定于任务的提出与政策的恰当。精密地掌握政策的执行，十分必要”。

不要使英雄模范因骄傲而落选

1944年12月22日，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大会在延安开幕。在各地选举英模的过程中，有一些边区一级的英模如晋察冀根据地的李勇因骄傲而落选。为此，毛泽东于12月24日，专为此事致电中共晋察冀5局代理书记程子华，指出："李勇这类现象，陕甘宁边区也发生了，各地还会发生，其责任主要的不是在他们本人，而是在于领导他们的人。嗣后凡当选的英雄模范，须勤加教育，力戒骄傲，方能培养成为永久模范人物。如果只有赞扬，没有教育，骄傲落选将是必然现象，此点请加注意。"

1945年1月10日，毛泽东出席陕甘宁边区英模大会，并讲话。毛泽东对出席会议的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们说："你们开了会，总结了经验，大家欢迎你们，尊敬你们。你们有三种长处，起了三个作用：第一个，带头作用。这就是因为你们特别努力，有许多创造，你们的的工作成了一般人的模范，提高了工作标准，引起了大家向你们学习。第二个，骨干作用。你们的大多数现在还不是干部，但是你们已经是群众中的骨干、群众中的核心，有了你们，工作就好推动了。到了将来，你们可能成为干部，你们现在是干部的后备军。第三个，桥梁作用。你们是上面的领导人员和下面的广大群众之间的桥梁，群众的意思经过你们传上来，上面的意见经过你们传下去"。接着，毛泽东语重心长地指出："你们有许多长处，有很大的功劳，但是你们切记不可以骄傲。你们被大家尊敬，是应当的，但是也容易因此引起骄傲。如果你们骄傲起来，不虚心，不再努力，不尊重人家，不尊重干部，不尊重群众，你们就会当不成英雄和模范了。过去已有一些这样的人，希望你们不要学他们。"

1945 年

[redacted]

在陕甘宁边区英模大会上讲话

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大会于1944年12月22日至1945年1月14日召开。

大会期间毛泽东专门用了整整一天时间，在枣园约各地委书记和专员谈话。毛泽东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你们的工作，群众赞成的有哪些？不赞成的是哪些？大家根据自己工作中的体会，你说一条，他说一条。等大家发言以后，毛泽东加以综合概括。他说：群众表示赞成的恐怕有那么十多条，比如；干部经过整风，作风民主了；搞了大生产运动，减轻了群众负担，没有要饭吃的了；禁止抽大烟，禁止赌博，改造二流子，社会风气好了；婚姻自主，废除了买卖婚姻；消灭了土匪，群众能安居乐业等。群众感到不满意的方面：还有个别干部深入群众差，工作方法简单片面；有些问题群众还未接受，宣传工作搞得不那么好；有的地方还有懒汉，要求改造二流子等。接着毛泽东对地委书记和专员们说：群众不满意，说明我们工作没有做到家。如果你们按政策办，给群众交待清楚，群众会接受我们的政策和意见的，这些问题也就可以解决了。在谈话中，毛泽东同大家还讨论了劳动英雄的作用问题；实行“三三制”和搞好统一战线工作的问题；重点讨论了生产建设的问题。

1945年1月7日，毛泽东同刘少奇、高岗、林伯渠、李维汉、贾拓夫、刘景范谈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大会的总结问题。毛泽东说：热过头了（意指冲昏头脑），要泼点冷水（头脑冷下来）。毛泽东和刘少奇一致指出：上级指示行不通的，打个招呼，顶回来，才是真正对革命负责。党的根本宗旨是为人民服务，对人民负责。上级指示不可生硬。

1月10日，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大会上作题为《两三年内完全学会经济工作》的讲话（建国后，以

《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为题，编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毛泽东首先指出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有3个作用，即带头作用、骨干作用、桥梁作用，勉励大家切记不可以骄傲。然后着重讲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指出："我们必须在两三年内，使陕甘宁边区和敌后各解放区，做到粮食和工业品的全部或大部的自给，并有盈余"。他强调发展经济必须从现在所处的农村环境出发。他说，"有一个问题必须再一次引起大家注意的，就是我们的思想要适合于目前我们所处的环境。"目前所处的环境是"建立在个体经济基础上的、被敌人分割的、因而又是游击战争的农村"，不应"带着城市观点去处理农村"。只有"注意使我们的思想完全适合于我们所处的环境，然后才能使我们的工作样样见效，并迅速见效。"毛泽东在讲话中还指出："我们是主张自力更生的。我们希望有外援，但是我们不能依赖它，我们依靠自己的努力，依靠全体军民的创造力。那末，有些什么办法呢？我们就用军民两方同时发动大规模生产运动这一种办法。""由于是农村，人力物力都是分散的，我们的生产和供给就采取'统一领导，分散经营'的方针。""任何地方必须十分爱惜人力物力，决不可只顾一时，滥用浪费。""一切产品，不但求数量多，而且求质量好，耐穿耐用。"毛泽东最后指出："将来从城市赶跑敌人，我们也会做新的经济工作了。中国靠我们来建设，我们必须努力学习。"

关于召开国事会议预备会议的谈判

1945年1月11日，毛泽东关于召开国事会议预备会议复信赫尔利。毛泽东在信中说："1月7日来信收到。1944年11月中国共产党所提出五条已为国民政府所拒绝。国民政府所提三条，敝党又万难同意，固有先由国民政府自动实行释放政治犯等四条之请求，借以证明国民政府是否有诚意在民主基础上解决国事问题。今阁下提议在延安召开两党会议，并有阁下参加，但恐此次会议

得不到任何结果，徒劳阁下等之往返。8年来一切两党秘密会议，均证明国民党方面毫无诚意。建议这个会议在重庆召开，预备会议应有国民党、共产党、民主同盟三方代表参加，并保证会议公开进行，各党派有平等地位及往返自由。如国民政府同意这个建议，周恩来将军可到重庆磋商。

1月20日，赫尔利又致电毛泽东，说他相信国民政府准备作出重要让步，建议派周恩来到重庆谈判。

1月22日，毛泽东复电赫尔利，告知派周恩来赴重庆代表中共与国民党政府谈判。

1月24日，周恩来飞抵重庆。行前，毛泽东指示：一、争取联合政府，与民主人士合作；二、召开党派会议作为具体步骤，国民党、共产党、民盟参加；三、要求国民党先办到以下各项——释放张学良、杨虎城、叶挺、廖承志等，撤退包围陕甘宁边区的军队，实现一些自由，取消特务活动。

周恩来到重庆之后，于25、26日两日即同赫尔利、宋子文、王世杰、张治中谈判。27日周恩来致电毛泽东，报告谈判情况。电报说，赫尔利和宋子文、王世杰提出在政务委员会以外的两个补充办法：（一）由美国、国民党、共产党各派一人组织军队整编委员会；（二）由美国派一将官任敌后中共军队的总司令，国民党、共产党各派一人为副总司令。周恩来拒绝了这两个补充办法，指出这是不公允和无理的。

1月28日，毛泽东发电周恩来，指出："你拒绝了赫尔利的两个补充办法是很好的。这是将中国军队尤其将我党军队隶属于外国，变为殖民地军队的恶毒政策，我们绝对不能同意。""如果谈到国民大会问题时，应表示：我们不赞成在国土未完全恢复前召集任何国民大会，因为旧的国大代表是贿选的过时的，重新选举则在大半个中国内不可能。即使在联合政府成立后也是如此，何况没有联合政府。并望以此征小党派同意，共同抵制蒋的国大把戏"。

2月3日，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召开会议，会议讨论周恩来1月30日和2月2日关于国民党谈判情况及党派会议问题的来电。毛泽东发言指出：去年9月提出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是正确的。党派会议是预备会议性质，是圆桌会议，不是少数服从多数。对我们提出的条件，国民党要先实行几条才能召开国事会议。蒋介石提出召开国民大会，我们要抵制。

同一天，毛泽东两电周恩来。一电指出：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已在开会（指2月4日开始的美、英、苏三国政府首脑在苏联雅尔塔举行的会议），数日后即可见结果。苏联红军迫近柏林，各国人民及进步党派声势大振。苏联参与东方事件可能性增长。在此种情形下，美国和蒋介石均急于和我们求得政治妥协。“请明白告诉国民党及小党派：除非明令废止一党专政，明令承认一切抗日党派合法，明令取消特务机关及特务活动，准许人民有真正自由，释放政治犯，撤销封锁，承认解放区，并组织真正民主的联合政府，我们是碍难参加政府的。”二电指出：除坚持废除党治外，请着重取缔特务、给人民真正的自由、释放政治犯、撤销对边区的包围四条。请直告赫尔利、宋子文、王世杰、张治中，如这四条不先办到，不能证明废党治、行民主不是骗局，我们万难加入政府。因加入政府要负责任，不先实行这四条，我们无从负责任。

2月11日，周恩来致电毛泽东，报告2月10日同赫尔利、宋子文、张治中、王世杰会谈情况。会谈中，周恩来强调在召开党派会议之前，国民党政府必须实现中共提出的释放政治犯等四条主张。赫尔利敷衍其事，提出发表由他和宋子文起草、有利于国民党的共同声明，当场遭到周恩来断然拒绝。后赫尔利又提出要周恩来起草共同声明，周恩来提出如要发表声明，必须说明中共方面的要求以及国共双方主张的不同之点，以明真相。

2月12日，毛泽东复电周恩来：“断然拒绝赫尔利，完全正确。我们必须坚持八条，并先做四条，否则将长独裁之志气，灭民主之威风。民主同盟纲领卖到200元一份，可见民意所在。今日美

新闻处广播美洲10家华侨报纸要求废止一党专政成立联合政府，可见我党主张已得到海外拥护。外国多数舆论亦是拥护此项主张的。美政府扶蒋主张可能被迫放弃，我党必须攻掉此项主张。

2月13日，周恩来在重庆同赫尔利会见蒋介石。蒋宣称：不接受组织联合政府的主张，组织联合政府无异于推翻政府，党派会议等于分赃会议。对此，周恩来逐条予以批驳。国共谈判又陷入僵局。

2月16日，周恩来飞返延安。

2月17日，毛泽东为新华社起草关于国共谈判无结果，周恩来返延安的新闻稿。新闻稿说："一月二十四日由延安飞赴重庆的中共中央代表周恩来同志，在重庆留了三个星期，和国民党政府方面举行了多次商谈。由于国民党当局依然坚持一党专政，反对联合政府，反对人民与民主，并企图吞并八路军、新四军，以致仍如过去谈判一样，未能成立任何协议，恩来同志乃于十六日十二时飞返延安。"

向前来拜年的延安市西区军民代表讲话

1945年2月14日是农历正月初二。这一天，延安市西区群众、警备团、枣园机关的代表和劳动英雄、模范工作者200余人，齐集在俱乐部，给毛泽东、朱德、刘少奇、林伯渠等拜年。毛泽东等接见了各代表，并和他们一一握手为礼。代表们都持贺年贴趋前祝贺毛主席及各首长新春健康。毛泽东在回拜和致谢各代表后，即开始讲话。

毛泽东说：去年一年当中，靠大家努力，做出不少成绩。象四区枣园村27家人，去年过年只杀了6口猪，今年过年就杀了17口猪。老百姓是发了。机关部队在经济上、工作上也向上发展了。接着，毛泽东指出去年这时法西斯希特勒还很厉害，今年这时候希特勒就快垮台了。我们的工作也有进步，去年八路军新四军只

有 40 几万人，几个月以前有了 60 几万，现在已经有 70 几万了，各位代表们回去要向老百姓讲一讲。毛泽东随即指出，为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这还不够，明年这时候，我们八路军和新四军要有 100 万以上。毛泽东继即向四区来拜年的代表们提出今年要办的几件事。毛泽东说今天这个大会，是个团结大会。我们要更加合作，区乡干部、区乡干部和劳动英雄、干部劳动英雄和老百姓都要更合作、更团结。毛泽东并称：我昨天到区政府去看过，以后还要到裴庄、邓家沟……去拜访大家。其次，希望大家增加粮食，去年西区打了 2900 石细粮，出了 470 石公粮，我希望今年你们能多生产 480 石粮食，使增加的粮食就够交公粮。这件事希望大家商量商量，看看能不能办到。再有一条，就是要多纺纱织布。西区妇纺还不发达，去年只有 20 多家学会了纺线。希望大家向本区妇纺劳动英雄史秀英学习。不会纺的 400 多家向会纺的 20 多家学习，慢慢来。最后一条，要讲卫生，把娃娃养好。去年公家医生帮助老百姓，大家都很感激他们，今年还要多帮助老百姓，把娃娃养好。

要使延安文艺工作者多参加群众性的集会

萧三在 1945 年 2 月 20 日的延安《解放日报》上发表《第一步——从参加边区参议会及劳模大会归来》的文章。文章说参加大会，使人苏醒过来，眼界大开，看到一些想象不到的东西。文艺工作者与模范之间有了很好的感情。他们不是以好奇的心或资产阶级新闻记者和作者的心理与态度，去“剥削”他们，从他们身上“挖材料”，以取得名和利。他们下决心去亲近工农兵，为他们服务，使自己也尽一份力量。具体的工作就是笔。希望今后发动和组织更多的作家、艺术家去参加工作，接近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用各种形式去再现他们，雕塑他们，歌唱他们。

2 月 22 日，毛泽东致信萧三：“你的《第一步》，写得很好。你

的态度，大不同于初到延安那几年了，文章诚实，恳切，生动有力。当然，从前你的文章也是好的，但是现在更好了，我读这些文章，很得益处。为着使延安文艺工作同志们多参加群众性的集会，须关照高岗、贾拓夫、谭政、罗迈、李富春、彭真几位同志，遇有这类会议不要忘记组织文艺同志们去参加。此事请你访他们去谈谈，我有机会也将告诉他们。今年全边区性的大会少开，但地方性的，延市、延安县和延属分区的，必有许多，同县、市、分区的负责同志及宣传部讲通此事，也很必要，可否也请你去谈一下？”

我们这里是一个大秧歌

1945 年 2 月 23 日，延安秧歌队给毛泽东拜年，广场观众达千余人。毛泽东、周恩来等亲临观看。秧歌队出演的节目有“小放牛”、“妇纺”等，前者演唱南区合作社发展的情形，后者表演他们本乡一个妇女对纺织认识的转变。演毕，毛泽东讲话。

他说：我们这里是一个大秧歌，边区的 150 万人民也是闹着这个大秧歌，敌后解放区的 9000 万人民，都在闹着打日本的大秧歌，我们要闹的将日本鬼子打出去，要叫全中国的四万万五千万人民都来闹。

周恩来也讲了话，他说：我们这里大家都是很高兴的在闹秧歌，大后方的老百姓也想闹，但是有人不让他们闹，那里只有少数人在闹独脚秧歌。

最后，秧歌队领队代表群众也讲了话，他说：现在大家红火热闹的闹秧歌，开春后要红火热闹的闹生产。

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猪仔国民大会

1945 年 3 月 1 日，蒋介石在重庆宪政实施协进会上发表演

说，提出在1945年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坚持独裁统治，拒绝成立联合政府。还说国民党政府准备组织一个三人委员会管理整编共产党军队的一切事宜，并在他的节制下指派一名美国将官直接统率共产党军队。

3月2日，中共中央给王若飞发出指示，指出蒋介石3月1日的公开演说，证明他仍是坚持一党独裁，反对党派会议，反对建立联合政府。对蒋介石准备11月召开一党一系包办的御用国会必须坚决反对。我党与民盟的意见相同，主张先建立临时的联合政府，等到国土恢复、人民解放条件具备时，再开全民普选的国民大会，成立正式的民主政府。

3月7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王世杰答外国记者称“现在政府决将关于国民大会的召集问题，提付国民参政会审议”。3月8日，新华社播发毛泽东写的新华社记者评王世杰谈话的评论，揭露王世杰这一说法的荒谬性和欺骗性。评论指出：“自从国民参政会成立以来，根据它的组织法，根据历来的事实，任何决定问题的权力也没有，现在叫它‘审议’起国民大会的应否召集来，按照王博士的法律，它说‘应’也没有用，它说‘否’也没有用。假如忽然有用起来，岂非犯法乱纪”。评论最后指出：中国人民必须振作精神，整顿国家，好打日本侵略者。“整顿之法，就是追问独夫蒋介石丧师失地祸国殃民的责任，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猪仔国民大会，立即废止蒋介石独夫专政，成立民主的联合政府”。

3月13日，毛泽东会见了3月9日返抵延安的美军观察组成员谢伟思，毛泽东在谈话中指出：蒋介石拒绝成立任何真正的联合政府，他宣布在1945年11月召开国民党一手炮制的国民大会，他现在走的道路是直接导向中国内战和国民党毁灭的道路。必须向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和中国的朋友美国，讲清楚蒋介石决心立即在国民党独占的基础上建立立宪政府这一最新策略所具有的危险。和平过渡到宪政的唯一希望就是成立联合政府。

旧金山会议我们要参加

1945 年 2 月 18 日，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召开主席团会议，会议听取周恩来关于同国民党谈判情况的报告。毛泽东在发言中提出：旧金山会议我们要参加，赫尔利已同意，需与民主同盟联合提出要求。

同日，周恩来致电赫尔利，指出：4 月 25 日在旧金山召开的联合国会议，决不能单独由国民党政府派遣其代表去出席。出席旧金山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应包括国民党、共产党、民主同盟三方面代表，国民党代表只应占代表团人数三分之一，其余三分之二的代表，应由共产党及民主同盟派遣。并要求将上述意见转达美国总统。20 日，赫尔利复电拒绝。

3 月 7 日，毛泽东在王若飞 3 月 6 日关于有消息传出蒋介石可能指派中共方面参加旧金山会议代表的来电上批示："似须电若飞，向王世杰提出我方出席人选，免蒋随意委派。"同日，周恩来起草致王世杰信，声明两事：（一）蒋介石 3 月 1 日讲话宣布在 11 月 12 日召集国民大会，表明国民党政府一意孤行，国内团结问题的谈判更无转圜余地，因此对王所提的政治咨询会议草案，已无再答复的必要。（二）对于出席 4 月旧金山会议的中国代表团，中共中央认为必须包括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民主同盟的代表，中共中央决定派中央委员周恩来、董必武、秦邦宪三人参加代表团。要求王世杰将以上两事迅速转达国民党政府。这封信经毛泽东修改后，于 3 月 9 日发出。

3 月 27 日，国民党政府公布中国出席旧金山会议代表团成员名单，中共方面代表有董必武一人。同日，中共中央致电王若飞，指出：出席旧金山会议代表团名单既已公布，为委曲求全我们同意董老参加，但须告王世杰、邵力子，对只给中共一名代表表示不满。

4月1日，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召开主席团会议。会议决定：董必武带随员2人（伍修权、陈家康或章汉夫），参加中国出席旧金山联合国制宪会议代表团。主席团指示，董赴美后主要是争取外国朋友，提高我党的国际地位，并尽量争取留驻美国工作。下午，毛泽东、周恩来、朱德、董必武一起，同谢伟思（1945年4月4日离开延安，奉召回国）进行最后一次谈话。毛泽东说：中国共产党对美国的政策，是寻求友好的美国支持在中国实现民主和在对日作战中进行合作。对国民党的政府仍旧是：一方面批评并试图激励其进步；另一方面提出能够作为实现真正统一、民主和使全国一切力量致力于赢得战争的基础的妥协。这个妥协必须意味着国民党和蒋介石专政的结束，这个妥协必须包括承认共产党军队是国家军队的一部分，解放区政权是合法的地方政府。对于国民党，我们不打第一拳，不放第一枪。但是蒋介石现在计划召开的国民大会一定会带来内战。一旦受到攻击，我们将予以反击。一旦中国发生内战，希望美国对国共双方采取不插手政策。

4月6日，董必武由延安乘飞机抵达重庆。4月12日，董必武偕章汉夫（《新华日报》总编辑）、陈家康（周恩来的秘书）乘飞机离重庆飞即转美，参加旧金山联合国会议。

旧金山联合国会议于4月25日至6月26日在美国旧金山举行。6月26日，联合国会议一致通过联合国宪章。董必武以中国代表之一的身份，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

对《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案的多次修改

1944年5月10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组织党的历史问题决议准备委员会，成员是任弼时、刘少奇、康生、周恩来、张闻天、彭真、高岗，后又增加秦邦宪。任弼时为召集人，主持起草历史问题决议的日常工作。

1945年3月至4月，毛泽东亲自对历史问题决议草案作多次

修改。在3月31日的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上毛泽东说："对决议草案我现已修改了八次。"（档案中仅保存下6次修改稿）

在第一次修改中，毛泽东把底稿的原题《关于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期间中央领导路线问题的决定（草案）》改为《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案）》。在文内加写了"团结全党同志如同一个和睦的家庭一样，如同一块坚固的钢铁一样，为着获得抗日战争的彻底胜利和中国人民的完全解放而奋斗。"

3月24日，毛泽东对《决议》草案作了第二次修改，修改的主要内容是：强调六大的正确方面；批评四中全会打击所谓"右派"的错误，对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实等受打击的同志作了充分肯定的评价；指出遵义会议实现的转变对克服张国焘路线、挽救一部分主力红军的重要意义。在这个稿子上，他给任弼时写了一个批语，要他请周恩来、朱德、张闻天、刘少奇看一下，是否这样改，然后印若干份，发给40多位同志，召集他们座谈一次，《决议》草案就可交六届七中全会通过。

4月7日、8日，毛泽东对《决议》草案作了第三次、第四次、第五次的修改。主要是在开头加写了一大段话，说中国共产党从产生以来就以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自1921年以来的24年中，进行了英勇奋斗，取得了伟大成绩和丰富经验，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日益巩固，成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伟大领导者。

4月8日以后，毛泽东对《决议》草案作了第六次修改，指出九一八事变以后中共中央确定的抗日方针和所进行的抗日工作都是正确的，"第三次'左'倾路线统治时间特别长久，所给党和革命的损失特别重大"。

《决议》草案在1945年4月20日召开的中共六届七中全会最后次会议上原则通过。毛泽东在讨论历史问题决议时说：《决议》不但是领导机关内部的，而且是全党性质的，与全国人民有关系的，对全党和全国人民负责任的。哪些政策或哪些部分在群众斗

争中证明是适合的，哪些是不对的，如果讲得合乎事实，在观念形态上再现了25年的历史，就对于今后的斗争有利益。党是政治团体，不是家族或职业团体，都是五湖四海因为政见相同而结合起来。政见不同就要有争论，争论时分清界限是必要的，但今后要少戴帽子为好。凡是过去政治上犯过错误的同志，现在都改正了，都要如《决议》所说的像一个和睦的家庭一样。《决议》把许多好事都挂在我的账上，我的错误缺点没有挂上，不是我没有而是没有挂，为了党的利益没有写上。这是大家要认识清楚的，首先是我。孔夫子七十而从心所欲不踰矩，我即使到七十，相信一定也会踰矩的。

第二天，毛泽东在中共七大预备会议上说：我们这次写历史决议案是很谨慎的，决议案昨天七中全会基本通过了，交给七大以后新的中央采纳修改。

后来，七大委托七届一中全会修改和通过，最后在8月9日召开的七届一中全会第二次会议上一致通过。建国后，由毛泽东提议，经中央政治局同意，把《决议》作为附录编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

致七大开幕词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在延安召开。

4月21日，中共中央召开七大预备会议，会议选举毛泽东等15人组成大会主席团，大会主席团推选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为主席团常委。会议通过七大4项议程：一、政治报告（毛泽东）；二、军事报告（朱德）；三、修改党章报告（刘少奇）；四、选举中央委员会。毛泽东在会上作《七大工作方针》的讲话，阐明七大的工作方针是：团结一致，争取胜利。他指出：大会的眼睛要向前看，而不是向后看。我们现在还没有胜利，前

面还有困难，必须谨慎谦虚，不要骄傲急躁，全党要团结得象一个和睦的家庭一样。

4月23日，中共七大开幕，毛泽东致开幕词（建国后，编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时，题为《两个中国之命运》），指出：我们的大会是处在反法西斯最后胜利的前夜。在中国人民面前摆着两条道路、两种命运：或者是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中国人民得到解放的新中国；或者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分裂的、贫弱的老中国。“我们应当用全力去争取光明的前途和光明的命运，反对另外一种黑暗的前途和黑暗的命运。我们的任务就是这一个！这就是我们大会的任务，这就是我们全党的任务，这就是全中国人民的任务。”我们现在已经具备了实现这个任务的前所未有的条件，这就是：“一个强大的中国共产党，一个强大的解放区，全国人民的援助，国际人民的援助”。“我们需要一个正确的政策。这个政策的基本点，就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的力量，在我党领导之下，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毛泽东在最后指出：“我们应该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在现时，为着团结全国人民战胜日本侵略者，在将来，为着团结全国人民建设新民主主义国家。只要我们能够这样做，只要我们有正确的政策，只要我们一致努力，我们的任务是必能完成的。”

作《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

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向七大提交《论联合政府》的书面政治报告。报告共分5个部分：（一）中国人民的基本要求；（二）国际形势与国内形势；（三）抗日战争中的两条路线；（四）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五）全党团结起来，为实现党的任务而斗争。报告科学地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抓住当前时局的关键，郑重地提出了中国人民强烈希望建立民主联合政府，打败日本侵略者，建

设新中国的基本要求。报告指出：法西斯侵略势力一定要被打倒，人民民主势力一定要胜利，这是战后历史的总趋势。中国人民克服一切困难，实现其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基本要求的时机，已经到来了。在两个前途、两种命运的激烈斗争中，为了争取光明的前途，反对黑暗的前途，毛泽东在报告中提出了一条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路线，这就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毛泽东指出：“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努力，没有中国共产党人做中国人民的中流砥柱，中国的独立和解放是不可能的，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也是不可能的。”为了加强党的领导，毛泽东号召全党要发扬党的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这是党的优良传统，也是中国共产党区别其他非无产阶级政党的显著标志。

同日，毛泽东在七大上，就《论联合政府》书面政治报告中的一些问题以及其他问题作报告。关于形势与路线，他指出：我们的路线，我们的纲领拿一句话讲完，就是这样“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这里面有一个队伍，有一个敌人，有一个队伍的领导者，指挥官。这个队伍就是人民大众，这个敌人就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这个指挥官就是无产阶级。关于政策方面，毛泽东讲了 11 个问题：一般的纲领与具体的纲领；关于孙山中；关于资本主义；关于共产主义；对于国民党的态度；关于改造旧军队；关于我们的军队；扩大解放区；准备转变；军队与地方；召集中国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关于党的建设，毛泽东讲了三个问题。第一，关于个性党性。指出：说共产党是要消灭个性只要党性，这种意见是不正确的。我们是讲个性党性的，党性就是普遍性，个性就是差别性。没有差别性哪里有普遍性？没有党员，哪里有党性？党员是有各种不同的，抹煞差别性，也就没有统一性。第二，关于党内几部分干部问题。如理论工作者、知识分子、在沦陷区国民党区工作的同志、本地干部、本地军事干

部、经济工作和后勤工作干部、民运工作干部、抗战时期入党的新干部、党外干部等，平时感觉对他们不很公平，这要特别注意。第三，讲真话问题。毛泽东说：要讲真话，不偷、不装、不吹。偷就是偷东西，装就是装样子，吹就是吹牛皮。懂得就是懂得，不懂得就是不懂得，懂得一寸，就讲懂得一寸，不讲多了。我们现在是一个很大的党，一个经过24年积累了很多经验的党，一个准备胜利的党。我们要在全国胜利，我们有这个志向。全党要团结起来，为全国人民的解放而奋斗。

5月2日，延安《解放日报》全文发表了毛泽东在七大上的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在“我们的具体纲领”一节，“第七，工业问题”中，有一段话是关于我们应当利用外资的：“为着发展工业，需要大批资本。从什么地方来呢？不外两方面：主要地依靠中国人民自己积累资本，同时借助于外援。在服从中国法令，有益中国经济的条件之下，外国投资是我们所欢迎的。对于中国人民与外国人民都有利的事业，是中国在得到一个巩固的国内和平与国际和平，得到一个彻底的政治改革与土地改革之后，能够蓬蓬勃勃地发展大规模的轻重工业与近代化的农业。在这个基础上，外国投资的容纳量将是非常广大的。一个政治上倒退与经济上贫困的中国，则不但对于中国人民非常不利，对于外国人民也是不利的。”建国后，《论联合政府》编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但删去了这段话。

5月3日，延安《解放日报》第一版上刊登了毛泽东写的更正：“昨天本报发表的《论联合政府》，有下列错字，应予更正：（一）在‘走着曲线道路的历史’题下第六段内，“中国民族抗日先锋队’系‘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之误。（二）在‘我们的一般纲领’题下第十八段内，‘二十五年’，系‘二十四年’之误。”

5月31日，毛泽东在七大上作关于政治报告讨论的结论。他根据讨论中提出的问题，主要讲了国际形势；国内形势；若干思想政策问题。毛泽东指出：中国也要发展资本主义。蒋介石是半

法西斯半封建的资本主义，我们是发展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将来还有用，在中国与欧洲、南美的农业国家中还有用，它的性质是帮助社会主义的。它是革命的、有用的，有利于社会主义发展的。毛泽东还指出：如无预见，则无领导，为着领导，必须预见，预见前途和偏向。东北四省极重要，有可能在我们的领导下。有了东北四省，我们即有了胜利的基础。

作关于选举方针的报告

1945 年 5 月 17 日，中共七大召开主席团和各代表团主任会议，会议讨论选举问题。决定由任弼时、刘少奇、周恩来、彭真、李富春组成一非正式的委员会，与各代表团主任商定一个中等人数的候选名单，并拟定选举条例。

5 月 19 日，中共七大主席团和各代表团主任会议通过选举中央委员会条例草案，预选选举等日程按排。

5 月 23 日，中共七大主席团和各代表团主任会议听取对选举问题讨论情况的汇报。各代表团讨论中，提出中央委员会要少而精，有人提出不要照顾山头，王明是否要列入中央委员会候选名单等意见。毛泽东在发言中指出：少而精的思想是好的，但这是理想。山头是要照顾的。中央委员会不可能每个人都有各方面的知识。如何对待犯错误的人，过去八七会议不要陈独秀出席，后来又不选他，过去还有人主张所有犯错误的人都不要，这些都是不对的。少而精只是一方面的真理，少不见得就很精，多一点也不见得就不精。就是说要照顾到山头，要照顾到犯错误的同志，不要一次就精得不得了，太精了就会脱离群众。

5 月 24 日，毛泽东在七大上代表主席团作关于中央委员会选举方针的报告。毛泽东指出选举的标准，是要选举那些能够保证实行大会路线的同志来组织中央委员会。对过去犯过路线错误，但已认识了错误，并决心改正错误的人，还是可以选的，不能搞绝

对化，图简便，要善于同犯过错误的同志合作。世界上的事，往往是这样：要图痛快反不痛快；准备了麻烦，麻烦就少。选举要尽可能地照顾各个方面，各个部分，各个山头。坏的是山头主义、宗派主义，而不是山头。要承认山头，消灭山头主义。要尽可能地照顾，一定要照顾各方面那也不好，照顾得那样周密、完全，就可能是一种凑数。对于才能知识的要求，只能是比较完全一些，任何一个人都不可能通晓各个方面的知识，中央委员会是集体的领导，我们要从集体中求完全，不是从个人求完全。关于人数问题，新的中央委员会必须比过去老的中央委员会25个人扩大，我们大会必须采取扩大中央委员会的政策。现在有大、中、小3个方案：大的就是100人左右，中的就是70人左右，小的就是30人左右。太小了不能够反映我们党，太大了一个司令员管一个兵，当然也不是最好的方针。我想我们两头都不要，取一个中间，就是70人左右，主席团认为这是比较好的方针。

5月27日，中共七大主席团和各代表团主任会议讨论中央委员会选举问题，决定中央委员会由正式中央委员45名、候补中央委员25名组成。在会上毛泽东就干部问题说：新老干部关系、外地本地干部关系发生问题，一般情况下要老干部、外来干部负责。两万老干部团结带领广大的新干部、本地干部、非党干部的问题，是关系中国革命胜败的问题。凡是历史上跌了交的事，不要害怕正视，当作经验是很好的。历史地看问题是马克思主义。

5月31日，毛泽东在七大作关于政治报告讨论的结论。毛泽东在结论中再次谈到党性与个性的关系，指出这就是普遍性与差别性、集体与个人的关系问题。我们党内大大发展了个性，因为有了自由。《共产党宣言》中讲得很清楚："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不能设想120万党员变成120万块木头，不能把党员变成一模一样，那会有什么党性！只要服从党，在此范围内尽量发展各人的长处，不要只喜欢那些纸糊泥做的人。当然，也不是说一定要有不同的意见。

6月2日，中共七大主席团和各代表团主任会议听取各代表团对候选人意见的汇报，并进行讨论。在讨论中毛泽东说：选举问题不是个人的问题，自己选不选自己有自由。只有在自己选自己对党不利时就不选，否则就应自己画自己的圈。所有同志应把自己想讲的话彻底讲清楚好。历史证明，凡是原则性的问题，敷衍下去，总有一天还会出来。彻底弄清楚，才有利于团结。会议决定，6月5日开大会进行预选。

6月9日，中共七大选举正式中央委员44人，毛泽东当选正式中央委员。

6月10日，中共七大选举候补中央委员。首先由任弼时作关于正式中央委员选举开票经过的报告，李富春作关于正式中央委员选举结果的报告。接着，毛泽东作关于选举候补中央委员问题的报告。他指出：今天选举候补中央委员，这个选举的意义也是很重大的。如果八大推迟，不能如期召开的话，那么候补中央委员的作用就更大。所以希望大家重视这个选举。接着，他说在昨天的选举中，王稼祥同志没有当选。我在这里要说几句话。王稼祥同志是犯过错误的。在四中全会前后，犯过路线错误。但是，他是有功劳的。他现在在病中，他的病也是在第四次反“围剿”中负伤而起的。我认为他是能够执行大会路线的，而且从过去看，在四中全会后第三次“左”倾路线正在高涨时，在遵义会议时，在六中全会时，也都可以证明这一点。昨天选举正式中央委员，他没有当选，所以主席团把他作为候补中央委员的第一名候选人，希望大家选他。毛泽东还指出：关于东北问题，我觉得这次要有东北人当选才好。东北是很重要的，从我们党，从中国革命的最近将来的前途看，东北是特别重要的。只要我们有了东北，那末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现在我们的基础是不巩固的，因为我们根据地在经济上还是手工业的，没有大工业，没有重工业，在地域上也没有连成一片。毛泽东报告后，大会进行选举候补中央委员的投票。

6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闭幕。闭幕会公布了候补中央委员选举结果，选出候补中央委员33人，王稼祥当选候补中央委员。毛泽东在会上致闭幕词（编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时，题为《愚公移山》）。他说：我们开了一个很好的大会。我们做了三件事：第一，决定了党的路线；第二，通过了新的党章；第三，选举了党的领导机关——中央委员会。“今后的任务就是领导全党实现党的路线。我们开了一个胜利的大会，一个团结的大会”。“我们宣传大会的路线，就是要使全党和全国人民建立起一个信心，即革命一定要胜利。首先要使先锋队觉悟，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毛泽东以“愚公移山”的寓言，鼓励全党坚持奋斗，挖掉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两座大山。“我们坚决相信中国人民将要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大会的路线的领导之下，得到完全的胜利，而国民党的反革命路线必然要失败。”

拒绝参加四届一次国民参政会

1945年6月15日，中共七大主席团召开会议，讨论是否参加定于7月7日召开的第四届国民参政会问题。毛泽东在会上说：我们不出席参政会，跟着也就不参加国民大会。不参加好处很多，因为这一套都是独裁，而以民主为招牌。这次不参加是给美蒋一个警告，给反蒋的民主派撑腰。我们拟发表谈话，举出三项理由，而以第三项为主，意思是说如果不开国民大会我们还可参加参政会。会议决定不参加此次国民参政会，并发表谈话。

同一天，毛泽东为新华社起草《中共中央负责人声明不参加此届国民参政会》的新闻稿。新闻稿指出：定于今年7月7日召集的所谓国民参政会，“中共方面将没有什么人出席”。这是因为：（一）去年9月以来，中共与中国民主同盟及其他广大民主人士，一致要求国民党政府，迅即取消一党专政，成立民主的联合政府，

实行民主改革。此项主张，实为中国大多数人民公意之反映，但已被国民党政府所拒绝。（二）此次所谓新的国民参政会的召集，“完全由国民党一手包办”，“不但与民主原则相违背，亦与中共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不符合”。（三）尤其重要的，是国民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一意孤行地决定于今年11月12日召集那个由国民党一手包办的分裂人民的准备内战的所谓国民大会，而在行将开会的国民参政会上，就要强迫通过许多具体办法，以便实现国民党的反动决议。中共方面为保卫民族的人民的民主的利益起见，决定不参加此次会议，以示抗议。

7月7日至20日，国民参政会四届一次会议在重庆举行。中共参政员拒绝出席此次会议，其他方面也有很多人未出席。第一天会议到会人数之少，为历届参政会所未有。蒋介石在致词中表示，由国民党六大决定的本年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鉴于未听取参政会的意见，政府暂不作决定。此事交给参政会讨论。7月19日，参政会全会讨论国民大会问题，争论激烈。结果以绝大多数票通过的如下决议案：鉴于本会对国民大会问题意见不一，关于是否召开国民大会，请政府酌定；关于国民大会代表问题，请政府妥定办法，务须大会有极完满之代表性；宪法制定时，应即实施；国民大会召集前，继续求取统一团结。7月20日，会议选举林虎等31人为四届一次参政会休会期间驻会委员，中共参政员董必武继续当选。

7月22日，新华社播发毛泽东写的新华社记者关于时局的评论《内战危险空前严重》。评论指出：第四届国民参政会已于20日闭幕，整个会议所讨论的中心问题是国民大会问题，19日通过一个决议案。“这个决议包含了某些妥协性，但是并未变更国民党的反动计划”。“只有三个条件可能改变中国的政治形势：第一个，解放区军民一致团结起来，坚决地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坚决制止内战；第二个，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民主力量一致团结起来，坚决反对内战；第三个，英、美、苏三国在东方问题上团结一致，

反对中国的内战。中国人民应该为争取三个条件，反对内战危险而奋斗。”

和黄炎培谈跳出这个“周期率”

1945年6月2日，国民参政会参政员褚辅成、黄炎培、冷遹、王云五、傅斯年、左舜生、章伯钧七人联名致电毛泽东、周恩来，大意是说：团结问题的政治解决，为全国国人所渴望，某等鉴于国际国内一般情势，惟有从速恢复商谈，促成团结，盼复。6月11日中共七大闭幕。6月18日，毛泽东、周恩来电复七参政员，指出：“敝党无不乐于商谈。诸公惠临延安赐教，不胜欢迎之至。”同时毛泽东致电在重庆的王若飞，嘱他对七参政员来延，即使无具体内容，只来参观，也应表示欢迎，并争取陪他们同返延安。七参政员得到复电后，经蒋介石同意，在王若飞的陪同下，于7月1日飞抵延安（王云五因病未能成行）。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林伯渠、吴玉章等亲到延安飞机场迎接。7月2日，毛泽东在杨家岭接待前来拜访的褚辅成等六参政员。谈话中六参政员一一简述这一次他们来延安的大意，认为团结是有绝对的必要。国共商谈的门是没有关的。毛泽东接着他们的话题说：双方的门是没有关，但门外有一块绊脚的大石挡住了，这大石就是国民大会。这一点我们的看法倒是相同的。晚宴后，毛泽东、朱德等陪同六参政员在热烈的掌声中步入中共中央为欢迎六参政员而举行的晚会，观看《兄妹开荒》等剧。7月3日晚，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到陕甘宁边区政府招待所同六参政员会谈，这天谈话时间长，谈到的事项多，各抒己见，不涉辩论，尽大家自由发言。结果约定由中共方面把意见写出来，第二天公开阅看。7月4日，毛泽东先同黄炎培、冷遹畅谈。后又开始与六参政员正式谈话。毛泽东分送他们一份谈话记录。双方一致同意：停止国民大会进行，从速召开政治会议。中共方面建议，政治会议之组织，由中国国民党、中国

共产党、中国民主同盟三方面各自推出同数之代表及由三方面各自推出三分之一并经他方面同意之无党派代表人士若干人共同组成之。政治会议应议之事项是：关于民主改革的紧急措施；关于结束一党专政与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关于民主的施政纲领；关于将来国民大会的召集。政治会议召开以前释放政治犯，并由各方面先作预备性质的协商等等。至次几天来的会谈结束。毛泽东与六参政员共会谈了三个半天，合起来有十来个小时。

有一次毛泽东问黄炎培的感想怎样？黄炎培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人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毛泽东回答说：我们已经找出一条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7月5日，毛泽东同朱德、周恩来、林伯渠等亲到飞机场欢送六参政员飞返重庆。

《评赫尔利政策的危险》

1945年7月10日，新华社播发毛泽东写的评论《评蒋介石参政会演说》。评论指出：蒋介石在第四届国民参政会开幕时说什么政府对国民大会召集有关的问题，拟不提出任何具体方案，而要听取参政会的意见。这表明所谓今年11月12日召集国民大会一件公案，大概就此收场了。“这件公案，也和帝国主义者赫尔利有关系。原来这位帝国主义者是极力怂恿蒋介石干这一手的，蒋介石的腰这才敢于在今年元旦的演说里稍稍硬了起来，至三月一日的演说而大硬，说是一定要在十一月十二日‘还政于民’”。“四月二日，赫尔利在华盛顿发表声明，除了抹杀中共的地位，污蔑中共的活动，宣称不和中共合作等一派帝国主义的滥调而外，还极

力替蒋介石的‘国民大会’等项臭物捧场。如此，美国的赫尔利，中国的蒋介石，在以中国人民为牺牲品的共同目标下，一唱一和，达到了热闹的顶点。从此以后，似乎就走上了泄气的命运。反对者无论在中国人和外国人中，在国民党内和国民党外，在有党派人士和无党派人士中，到处皆是，不计其数。”

蒋介石的元旦演说是指1945年1月1日蒋介石的广播演说。蒋介石在这个演说里，以召开国民大会来对抗成立民主的联合政府。

蒋介石3月1日的演说是指蒋介石在重庆宪政实施协进会上的演说。蒋介石除坚持“元旦演说”的反动主张外，又提出组织有美国代表参加的三人委员会来“整编”八路军新四军，公开地要求美帝国主义者来干涉中国的内政。

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于4月2日在美国发表关于中国问题的谈话。公开宣布美国政府全力支持蒋介石国民党。赫尔利在记者招待会上说：“中国共产党曾向美国要求供给武器军火，但以武器供给一武装之政党，无异于承认其为一对日交战者，而美国已承认重庆国民政府为中国之政府，中国一日如有拥有武力之政党存在，则中国即一日不能获得统一。”

7月12日，新华社播发毛泽东写的评论《赫尔利政策的危险》（编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时，题为《评赫尔利政策的危险》）。评论指出：赫尔利4月2日在华盛顿所发表的声明，宣称美国只同蒋介石合作，不同中共合作，这是代表美国政府中一群人的意见，但这是错误的而且危险的意见。“这个以赫尔利为代表的美国对华政策的危险性，就在于它助长了国民党政府的反动，增大了中国内战的危机。假如赫尔利政策继续下去，美国政府便将陷在中国反动派的又臭又深的粪坑里拔不出脚来，把它自己放在已经觉醒和正在继续觉醒的几万万中国人民的敌对方面，在目前，妨碍抗日战争，在将来，妨碍世界和平。这是一种必然的趋势”。“可以确定地说的，就是赞助中国反人民势力和以如此广大的中国

人民为敌的这个赫尔利式的政策，如果继续不变的话；那就将给美国政府和美国人民以千钧重负和无穷祸害，这一点，必须使美国人民认识清楚。”

7月19日，新华社播发经毛泽东修改的评论《新华社记者再评赫尔利政策》。毛泽东加写了一段话：“为了共同战胜日寇与建设世界和平，我们希望一切愿以平等待我的公正的美国舆论界、政府人员及军队人员积极起来纠正赫尔利式的错误政策，因为这个政策的结果只会拖延对日战争的胜利与破坏世界和平。”

撰写新闻稿《爷台山战事扩大》

国民党军胡宗南部于1945年7月21日对陕甘宁边区淳化县爷台山八路军防地发动进攻。由于国民党军的进攻不断扩大，27日八路军撤出爷台山地区。

7月22日，新华社播发毛泽东写的新华社记者关于时局的评论《内战危险空前严重》。评论指出：独裁制度丝毫未变，内战危险空前严重，现有各种铁一般的事实，包括陕甘宁边区周围的军事行动在内，证明国民党反动派正在较前更加积极地准备发动一个大规模的内战，借此以援助日本侵略者。”

7月23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扩大会议，讨论如何打退胡宗南部对陕甘宁边区淳化县爷台山的进攻。毛泽东说：胡宗南他们已经战役展开，问题是大打还是小打，小打就是打爷台山。要准备他们大打，大闹。大打，要准备他们打到延安。毛泽东要求西北局和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全力组织好这次战斗。

7月25日，新华社播发毛泽东写的新闻稿《爷台山战事扩大》。新闻稿说，爷台山战事扩大，蒋军正面攻击部队，除暂五十九师外，又增加了一个师，并配备有许多新式武器。新闻稿指出：“爷台山为一重要据点，蒋军志在必得，然后深入关中分区，据为向北进攻之有利阵地。但我军士气高涨，决不让任何反动派轻易

窜入，屠杀边区人民。关中全区民众已迅速动员起来，协助守军作战，送茶水，抬伤兵，热烈异常，对于战胜这些反动派，具有充分的信心。”

7 月 30 日，毛泽东致电在重庆的徐冰、刘少文，告以胡宗南军此次进攻分为 4 路，共侵占我防地 44 个村。东面第一路侵入边区 34 里。中间第二路侵入边区 24 里，中间第三路侵入边区 12 里。西面第四路侵入边区 10 里，东西两端顽军相距 45 里。要徐冰等将上述情况在报上公布，并向各方交涉。电报还说：“如彼方全部撤退，我方保证不超出边区原有防地一步。如爷台山不撤，难免一战，我方已调集相当兵力待命。”

8 月 8 日，八路军向侵占爷台山地区的国民党军队进行反击。9 日，收复爷台山地区。

就苏联对日宣战发表声明

1945 年 8 月 8 日，苏联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召见日本驻苏大使佐藤，代表苏联政府宣布：从 8 月 9 日起，苏联认为其本身已与日本进入战争状态。自此，苏联对日宣战。

8 月 9 日，中共七届一中全会召开第二次会议。会议着重讨论时局问题。毛泽东在发言中阐述了苏联参战后的形势和的党的方针、任务。他说：苏联参战，使抗日战争进入最后阶段。我们准备发表一个声明。我们的任务有 4 项：配合作战；制止内战，集中统一；国共谈判。关于配合作战，他说：现在同苏联红军配合作战，是痛快的。具体如何配合，还要等战争的展开。我们现在要做的是配备干部，发展攻势，准备几十个旅打仗，考虑一个计划。我们要对日本军队放手进攻，不会犯冒险主义，学习较大规模的作战。如果在战略上今天还不放手就会犯错误，当然战役上要谨慎。关于制止内战，他说：日本交防给蒋介石，这种接防一般地是难于制止的，中间是蒋，我们的文章就在左右两翼做。我

们在第一个时期的主要方针是取之于日伪，扩大地方，扩大力量，然后才有可能在第二时期回过头来对付内战的威胁。关于集中统一，他说：在干部分配、财政、城市工作、装备分配等方面，都要考虑集中统一问题。关于国共谈判，他说：在苏、美、中协定的基础上准备继续国共谈判，国共谈判要在国际的基础上（不是一切）来解决。苏联参战后，美国的政策可能有某些改变，但靠蒋介石是一定的，故我与美蒋是一个长期的麻烦。内战的危险随日本垮台而增加。

同一天，毛泽东同朱德致电斯大林，对苏联政府的对日宣战，表示热烈欢迎，并表示“中国解放区的一万万人民及其军队，将以全力配合红军及其他同盟国军队，消灭万恶的日本侵略者”。

同一天，毛泽东还以中共中央主席的名义就苏联对日宣战发表声明（建国后，编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时，题为《对日寇的最后一战》）。声明说：“八月八日，苏联政府宣布对日作战，中国人民表示热烈的欢迎。由于苏行动，对日战争的时间将大大缩短。对日战争已处在最后阶段，最后地战胜日本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时间已经到来了。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民的一切抗日力量应举行全国规模的反攻，密切而有效地配合苏联及其他同盟国作战”。“中国民族解放战争的新阶段已经到来了，全国人民应该加强团结，为争取最后胜利而斗争。”

不应夸大原子弹的作用

1945 年 8 月 6 日，美军在日本广岛投下第一颗原子弹。9 日，又在日本长崎投下第二颗原子弹。

8 月 9 日，延安《解放日报》在第一版显著位置刊登了美国新闻处、合众社、路透社等 8 条有关原子弹的消息，标题是“战争技术上的革命，原子弹首袭敌广岛”，下面在副题处作了摘要：“东京承认广岛所有生物被烧死。该城烟火弥漫，高达四万英尺。

敌内阁当日举行会议”。此外，第一版上还刊登了合众社3条消息，标题是“同盟国将发出新公告，促使日寇迅速投降，否则即将以原子弹摧毁日本”。而第三版对原子弹威力的宣传更为集中，头条是“杜鲁门宣布使用原子弹攻日，此种炸弹较二万吨的TNT的威力还大，较英国顶大的巨弹爆炸力大二千多倍”。同版还发表了中央社伦敦电：“英报评原子弹”；路透社电：“阿特里及史汀生谈原子炸弹发明的经过”，“美报评原子弹的发明是科学与战争的革命”，说“原子弹可能为人类谋利益，也可能是死亡与毁灭”。

8月10日早晨，毛泽东把负责宣传和新闻工作的胡乔木、余光生和陈克寒叫到他的窑洞来，批评不应夸大原子弹的作用。毛泽东批评的大意，就是8月13日他在延安干部会议上讲演中的一段话：

“原子弹能不能解决战争？不能。原子弹不能使日本投降。只有原子弹而没有人民的斗争，原子弹是空的。假如原子弹能够解决战争，为什么还要请苏联出兵？为什么投了两颗原子弹日本还不投降，而苏联一出兵日本就投降了呢？我们有些同志也相信原子弹了不起，这是很错误的。这些同志看问题，还不如一个英国贵族。英国有个勋爵，叫蒙巴顿。他说，认为原子弹能解决战争是最大的错误。我们这些同志比蒙巴顿还落后。这些同志把原子弹看得神乎其神，是受了什么影响呢？是资产阶级的影响。这种影响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从资产阶级的学校教育中来的，是从资产阶级的报纸、通讯社来的。……我们队伍中的唯武器论，单纯军事观点，官僚主义、脱离群众的作风，个人主义思想，等等，都是资产阶级的影响。对于我们队伍中的这些资产阶级的东西，也要像打扫灰尘一样，常常扫除。”

得知日本宣布投降的消息

1945年8月10日凌晨，日本裕仁天皇在御前会议上批准外

务省提案，表示日政府愿意接受波茨坦宣言，准备无条件投降，唯一要求是保留天皇。当天，日本政府经过瑞士、瑞典政府向交战各国发出乞降照会。

傍晚，延安新华通讯社新闻台从路透社、合众社收译到十万火急的电报："日本投降了！""日本天皇已经接受盟国条件，宣布投降！"在场的副社长吴文焘飞步出窑，赶往社长博古的住处，真不凑巧，博古刚好外出。吴文焘顺手念亮桌上的煤油灯，摇动挂在墙上的皮盒子里的电话机，接通了毛泽东的电话。对方接电话的是叶子龙。吴文焘说："这里是新华社，有重要新闻，快请毛主席！"很快，毛泽东来接电话了。吴文焘向毛泽东报告了收译到的电报内容，兴奋地说：日本投降了！毛泽东听到后第一句话就："噢，那好啊！"随即嘱咐新华社新闻台有新情况时继续汇报。不一会儿，博古在毛泽东处给新华社打电话，要他们在电话机旁等候中央指示。此时，延安的清凉山上已响起了一片欢呼 声，大家奔走相告，呼喊着："日本投降了！""日本投降了！"群众纷纷走上大街，扭起秧歌，举了火炬游行，整个延安城沸腾了。

约在半夜时分，新华社就得到从枣园传来朱总司令签名的、勒令敌伪向八路军、新四军投降的延安总部第一号命令，由新华社向全国广播。

第二天，即 8 月 11 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日本投降的中国共产党任务的决定。决定指出："苏联参战后，日本已宣布投降。国民党积极准备向我解放区'收复失地'，夺取抗日胜利的果实。这一争夺战，将是极猛烈的。""目前阶段，应集中主要力量迫使敌伪向我投降，不投降者，按具体情况发动进攻，逐一消灭之，猛力扩大解放区，占领一切可能与必须占领的大小城市与交通要道、夺取武器与资源，并放手武装基本群众，不应稍有犹豫。""国共谈判将以国际国内新动向为基础，考虑其恢复，延安对美国与国民党的批评暂时将取和缓态度。但各地对蒋介石绝对不应存在任何幻想，必须在人民中揭露其欺骗，对蒋介石发动

内战的危险，应有必要的精神准备，但目前阶段主要注意力应集中于解决敌伪，勇敢、坚决、彻底地夺取最大胜利，不可分散注意力。”

坚决地彻底地反对蒋介石的命令

日本宣布投降后，8月11日蒋介石下达三道所谓命令：一是要解放区人民军队“就地驻防待命”，不得向敌伪“擅自行动”；二是要他的嫡系部队“积极推进”，“切勿松懈”；三是要伪军“切实负责维持地方治安”，抵抗人民军队受降。

8月13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的讲演。毛泽东在讲演中分析了抗日战争胜利后的中国政治的基本形势，提出了无产阶级的革命策略。一方面要尽力争取和平，反对内战；另一方面对帝国主义和反动派不抱幻想，不怕威吓，坚决保卫人民的斗争果实，努力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毛泽东提出了对付蒋介石的方针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

同一天，延安《解放日报》发表了毛泽东为新华社撰写的评论：新华社记者驳斥蒋介石“命令”，挑拨内战破坏世界和平（建国后，编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时，题为《蒋介石在挑动内战》）。评论指出：“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发言人发表谈话说，第十八集团军朱德总司令于八月十日在延安总部所发表的限令敌伪投降的命令，是一种‘唐突和非法之行动’。这种评论，荒谬绝伦。”“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发言人的评论和蒋介石的‘命令’，从头到尾都是在挑拨内战，其目的是在当着国内外集中注意力于日本无条件投降之际，找一个借口，好在抗战结束时，马上转入内战。”评论指出蒋介石的“命令”，是违背中华民族利益的，仅仅有利于日本侵略者和背叛祖国的汉奸们。这是以宁渝合流、蒋伪合作去代替“中日提携”，日伪合作；以蒋介石的反共建国，去代替日本人、

汪精卫的反共建国。评论公开表示坚决拒绝蒋介石给第十八团军的这个命令，并号召全国人民团结一起，坚决制止内战。

同一天，毛泽东起草朱德总司令致蒋介石电，揭露蒋介石的反革命面目，教育全国人民警惕蒋介石的内战阴谋。电报对蒋介石明确指出："我们认为这个命令你是下错了，并且错得很厉害，使我们不得不向你表示：坚决拒绝这个命令。因为你给我们的这个命令，不但不公道，而且违背中华民族的民族利益，仅仅有利于日本侵略者和背叛祖国的汉奸们。"

8月16日，毛泽东起草朱德总司令致蒋介石的第二个电报，进一步揭穿蒋介石集团准备内战的阴谋，并提出中国共产党关于制止内战的6项主张。电报在最后指出："由此看来，一切同盟国的统帅中，只有你一个人下了一个绝对错误的命令，我认为你的这个错误，是由于你的私心而产生的，带着非常严重的性质，这就是说，你的命令有利于敌人。因此，我站在中国和同盟国的共同利益的立场上，坚决地彻底地反对你的命令，直至你公开承认错误，并公开收回这个错误命令之时为止。我现在继续命令我所统帅的军队，配合苏联、美国、英国的军队，坚决向敌人进攻，直到敌人在实际上停止敌对行为、缴出武器，一切祖国的国土完全恢复之时为止。我向你声明：我是一个爱国军人，我不能不这样做。"

同一天，毛泽东为新华社撰写评论：《人民公敌蒋介石发出了内战信号》（建国后，编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时，题为《评蒋介石发言人谈话》）。8月15日蒋介石发言人在重庆记者招待会上讲共产党违反蒋委员长对朱德总司令的命令，说"委员长之命令，必须服从"，"违反者即为人民公敌"。评论针 对蒋介石发言人谈话，明确指出"这是蒋介石公开发出的全面内战的信号"。而制止内战的办法是："坚决迅速努力壮大人民的民主力量，由人民解放敌占大城市和解除敌伪武装，如有独夫民贼敢于进犯人民，则取自卫立场，给以坚决反击，使内战挑拨者无所逞其伎。""全体人

民团结起来，壮大自己的力量，内战就可以制止。”

赴重庆谈判

1945 年 8 月 14 日，蒋介石向毛泽东发出第一次邀请电。电称：“倭寇投降，世界永久和平局面可期实现，举凡国际国内各重要问题，亟待解决。特请先生克日惠临陪都，共同商讨。事关国家大计，幸勿吝驾。”

8 月 16 日，毛泽东复电蒋介石：“朱德总司令本日曾有一电给你陈述敝方意见，待你表示意见后，我将考虑和你会见的问题。”本日毛泽东曾起草朱德总司令致蒋介石电，提出中国共产党关于制止内战的 6 项主张：在接受日伪投降缔结受降后的一切协定和条约的时候，要事先和我党商量，取得一致意见；中国解放区、中国沦陷区及其一切抗日的人民武装力量，有权接受我们所包围的日伪军队的投降，收缴其武器资材：有权派遣自己的代表参加同盟国接受敌人的投降和处理和敌国投降后的工作；有权选出自己的代表团，参加将来关于处理日本的和平会议和联合国会议；制止内战，国民党军队只接受被国民党军队所包围的敌伪军的投降；废止一党专政，召开多党派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等。

8 月 20 日，蒋介石第二次电邀毛泽东：“如何以建国之功，收抗战之果，甚有赖于先生之惠然一行，共定大计，则受益拜惠，岂仅个人而已哉。特再驰电奉邀，务请惠诺为感。”

8 月 22 日，毛泽东复电蒋介石：“从中央社二十日新闻电中，得知先生复电。兹为团结大计，特先派周恩来同志前来进谒，到后希予接洽为恳。”

8 月 23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讨论去重庆谈判的问题。毛泽东在发言中分析了国内外形势，他说：现在情况是，抗日战争的阶段已结束，进入和平建设阶段。过去是抗战、团结、进步，我们现在新的口号是：和平、民主、团结。和平是能争取

的，苏、美、英需要和平，人民需要和平，我们需要和平，国民党也不能下决心打内战。因摊子未摆好，兵力分散，内部矛盾。但蒋介石想消灭共产党的方针没有改变，也不会改变。蒋介石所以可能采取暂时的和平，是由于上述诸条件。会议决定周恩来先去谈判，如能谈得拢，毛泽东才能出去。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决定在毛泽东出去期间，由刘少奇代理其主席职务。

同一天，蒋介石第三次电邀毛泽东："承派周恩来先生来渝洽商，至为欣慰。惟目前各种重要问题，均待与先生面商。时机迫切，仍盼先生能与周恩来先生惠然偕临，则重要问题方得迅速解决，国家前途实利赖之，现已准备飞机迎迓，特再驰电速驾。"

8月24日，毛泽东复电蒋介石："鄙人极愿与先生会见，商讨和平建国大计，侯飞机到，恩来同志立即赴渝晋谒，弟亦准备随即赴渝。"

8月25日，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政治局部分成员同从重庆回来的王若飞再次研究毛泽东赴重庆谈判的问题。经过反复权衡利弊，决定毛泽东赴重庆谈判。同日，毛泽东复美军中国战区司令官魏德迈本日来电："鄙人承蒋委员长三电相邀，赫尔利大使两次表示愿望来延，此种诚意极为心感。兹特奉达，欢迎赫尔利大使来延面叙，鄙人及周恩来将军可以偕赫尔利大使同机飞渝，往应蒋委员长之约，以期早日协商一切大计。"

还是这一天，中共中央发表对于当前时局的宣言。宣言指出："中国共产党认为在这个新的历史时期中，我全民族面前的重大任务是：巩固国内团结，保证国内和平，实现民主，改善民生，以便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实现全国的统一，建设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并协同英美苏及一切盟邦巩固国际间的持久和平"。宣言要求国民党政府立即实施6项措施：承认解放区的民选政府和抗日军队；划定八路军、新四军及华南抗日纵队接受日军投降的地区；严惩汉奸、解散伪军；公平合理的整编军队；承认各党派的合法地位；立即召开各党派和无党派代表人物会议，成

立举国一致的民主的联合政府。

中共七大结束后，各大战略区主要负责人有的要立即奔赴前线。在离开延安时，毛泽东对他们说：我们的口号是和平、民主、团结，首先立足于争取和平，避免内战。我们提出的条件中，承认解放区和军队为最中心的一条。中间可能经过打打谈谈的情况，逼他承认这些条件。今后我们要向日本占领地区进军，扩大解放区，取得我们在谈判中的有利地位。你们回到前方去，放手打就是了，不要担心我在重庆的安全问题。你们打得越好，我越安全，谈得好。别的法子是没有的。

毛泽东在 8 月 26 日政治局会议上发言说，去重庆谈判，可以取得全部的主动权。自然，谈判就必须作一定的让步。在不妨害双方根本利益的条件下才能得到妥协。由于有我们的力量，全国的人心，蒋介石自己的困难，外国的干预 4 个条件，这次去是可以解决一些问题的。

8 月 26 日，毛泽东还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同国民党进行谈判的党内通知。通知指出："现在苏美英三国均不赞成中国内战，我党又提出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并派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三同志赴渝和蒋介石商量团结建国大计，中国反动派的内战阴谋，可能被挫折下去。""同时我党力量强大，有来犯者，只要好打，我党必定站在自卫立场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之（不要轻易打，打则必胜）绝对不要被反动派其势汹汹所吓倒"。通知还指出：在谈判中，我方准备给以必要的，不伤害人民根本利益的让步。"可能在谈判后，造成两党合作（加上民主同盟等）、和平发展的新阶段。""但是你们绝对不要依靠谈判，绝对不要希望国民党发善心，它是不会发善心的。必须依靠自己手里的力量，行动指导上的正确，党内兄弟一样的团结和对人民有良好的关系。坚决依靠人民，就是你们的出路。"

同一天，新华社向全国、全世界宣布了毛泽东要赴重庆谈判的重大消息。

毛泽东赴渝前同刘少奇整整谈了一天一夜，大致意思是：我在重庆期间，前方和后方都必须积极活动，对蒋介石的一切阴谋都要予以揭露，对蒋介石的一切挑衅行为，都必须予以迎头痛击，有机会就吃掉它，能消灭多少就消灭多少。我军的胜利越大，人民群众活动越积极，我们的处境就越有保障，越安全。须知蒋委员长只认得拳头，不认识礼让。8 月 27 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各中央局、分局、各区党委通知："在毛离延期间，刘少奇同志代理主席职务，并增选陈云、彭真二同志为候补书记。"

8 月 28 日一清早，人们就从枣园、桥儿沟、王家坪、杨家岭等地向延安机场涌去，等着给毛主席、周副主席送行。一辆延安人都熟悉的带蓬子的中型汽车驰过来了。汽车停住，车门打开，机场上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和激昂的口号声，毛泽东走下车来，和平日不同，新的布制服，深灰色的盔式帽，整个装束象出门作客一样，引起延安人民一种离别的依恋之情。毛泽东在震荡山谷的口号声停息后，向欢送的人群发表了为和平民主谈判的简短讲话。然后面带微笑，热情地和中央负责同志一一握手告别，迈着稳健的步伐，穿过人群，走向飞机……千万双眼睛在注视着毛泽东，人们期望他一路平安，早日归来。这天清早，延安周围各部队传达了毛主席乘飞机去重庆谈判的通知。11 点钟左右，所有的战士都翘首西望，向天空中寻找那架从延安起飞的飞机，谛听着飞机的声音，他们紧紧握着手中的武器，像是跟随在毛主席的身边，一起飞到重庆，保卫毛主席。随毛泽东同机起飞的还有周恩来、王若飞、以及在 8 月 27 日专程来延安迎接的蒋介石代表张治中和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

作《关于重庆谈判》的报告

1945 年 10 月 11 日下午 1 时 30 分，毛泽东、王若飞在张治中的陪同下由重庆飞返延安，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庆谈判宣告结束。

毛泽东亲赴重庆谈判，经过43个日日夜夜的斗争，终于赢得了历史性的胜利。10月10日，蒋介石被迫和中国共产党签订了《国共双方代表会谈纪要》，也就是著名的《双十协定》。国民党不得不承认了和平团结的方针和人民的某些民主权利。这一切尽管是纸上的东西，但却使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获得了极大的主动。

第二天，毛泽东与张治中共进早餐。当张治中询问对今后谈判的意见时，毛泽东说，希望此次谈判中尚未获得协议的国民大会问题与解放区问题，早日商得共同意见，以便政治协商会议能及早顺利开幕。早餐后，毛泽东前往机场，为张治中偕同王若飞乘原机飞返重庆送行。

10月17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关于重庆谈判》的报告。毛泽东指出："这一次，国共两党在重庆谈判，谈了四十三天。谈判的结果，已经在报上公布了。现在两党的代表，还在继续谈判。这次谈判是有收获的。国民党承认了和平团结的方针和人民的某些民主权利，承认了避免内战，两党和平合作建设新中国。这是达成了协议的。还没有协议的。解放区的问题没有解决，军队的问题实际上也没有解决。已经达成的协议，还只是纸上的东西。纸上的东西并不等于现实的东西。事实证明，在把它变成现实的东西，还要经过很大的努力。"

毛泽东说："'针锋相对'，要看形势。有时候不去谈，是针锋相对；有时候去谈，也是针锋相对。从前不去是对的，这次去也是对的，都是针锋相对。这一次我们去得好，击破了国民党说共产党不要和平、不要团结的谣言。他们连发三封电报邀请我们，我们去了，可是他们毫无准备，一切提案都要由我们提出。谈判的结果，国民党承认了和平团结的方针。这样很好。国民党再发动内战，他们就在全国和全世界面前输了理，我们就更有理由采取自卫战争，粉碎他们的进攻。成立了《双十协定》以后，我们的任务就是坚持这个协定，要国民党兑现，继续争取和平。如果他们要打，就把他们彻底消灭。事情就是这样，他来进攻，我们

把他消灭了，他就舒服了。消灭一点，舒服一点；消灭得多，舒服得多；彻底消灭，彻底舒服。中国的问题是复杂的，我们的脑子也要复杂一点。人家打来了，我们就打，打是为了争取和平。不给敢于进攻解放区的反动派很大的打击，和平是不会来的。”

毛泽东还指出：“我们的方针是保护人民的基本利益。在不损害人民基本利益的原则下，容许作一些让步，用这些让步去换得全国人民需要的和平和民主。”但是，“人民的武装，一枝枪、一粒子弹，都要保存，不能交出去。”

邯郸战役

1945年10月13日，《双十协定》的墨迹未干，蒋介石又发布进攻解放区的密令，要求国民党军队将领“遵照中正所订的剿匪手本，督励所属，努力进剿，迅速达成任务”。在发出这封密令的同时，蒋介石又把他在十年内战时期亲自拟订，抗战胜利后予以重印的《剿匪手本》，运往国民党各个战区，分发到官兵手中。

在蒋介石的严厉督责下，从10月14日起，国民党军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率领第四十、第三十、新编第八军共7个师，自河南新乡沿平汉铁路北进。欲先占领邯郸，与沿石太线西进，先期到达石家庄的第三、第十六军会合，然后继续北进，与空运到北平的第九十二、第九十四军会师，最后达到完全控制平汉路，分割晋察冀、晋冀鲁豫两大解放区的目的。

这时毛泽东刚从重庆返回延安。军情紧急，他顾不得旅途的疲劳，立即与中央其他领导人商量对策。回到延安第二天，即10月12日毛泽东便起草了一份给刘伯承、邓小平的电报。电报说：“山东、华中主力转移至冀热辽区及东北，至快还须一月；各部到达后，布置战场，熟悉地形，初步完成准备，至快亦须两月至三月。因此，我们阻碍和迟滞顽军北进，是当前严重的战略任务。”“我太行及冀鲁豫区可集中六万以上主力，由刘邓亲自统一指挥，

对付平汉路北进顽军，务期歼灭其一部至大部。”

为配合这一战役，10 月 16 日毛泽东起草中共中央致晋察冀中央局、晋绥分局电，令他们在北面展开平绥战役，打破国民党军企图切断我东北、华北、西北之通路的计划。同日，毛泽东电告聂荣臻，望注意侦察蒋系第十六军主力、第九十二军、九十四军是否到平、津的动向。

10 月 17 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致晋冀鲁豫中央局诸同志回电，再次强调：“在你们领导下的一切力量，除以太岳兵力展开同蒲路的作战争取应有胜利外，必须集中太行与冀鲁豫兵力，争取平汉战役的胜利。即将到来的新的平汉战役，是为着反对国民党主要力量的进攻，为着争取和平局面的实现。这个战役的胜负，关系全局极为重大。你们须准备以一个半月以上的时间，在连续多次的战斗中，争取歼灭八万顽军一半左右或较多的力量，方能解决问题。望利用上党战役的经验，动员太行、冀鲁豫两区兵力，由刘伯承、邓小平亲临指挥，精密组织各个战斗，取得第二个上党战役的胜利。”

10 月 24 日，晋冀鲁豫军区部队突然在邯郸以南出击，将过漳河的国民党 3 个军全部包围，并控制漳河渡口。10 月 26 日，刘伯承、邓小平、薄一波等致电中央军委：在我后续部队未到达前，继续疲困敌人，一俟后续部队到达，即寻求机会，消灭敌人一两个师。10 月 27 日，毛泽东复电指出：“部署甚当。俟后续到齐，养精蓄税，那时敌必饥疲，弱点暴露，我集中主力寻求弱点，歼灭其一两个师，敌气必挫。”

10 月 28 日黄昏，晋冀鲁豫军区部队向被围敌军发起总攻，同时派军区参谋长李达赴新八军军部，敦促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新八军军长高树勋率部起义。

坐镇重庆的蒋介石得知 3 个军被围的消息后，立即电令驻石家庄的第十六军和驻安阳的第三十二军南北对进，增援被围部队。在延安的毛泽东也在密切注视战况的变化。当他获悉国民党南北

援军出动的消息后，为确保战役胜利，也电令在山西的部队赶到平汉线附近，援助晋冀鲁豫军区部队。

10月29日，毛泽东致电刘伯承、邓小平："十六军三个师南援，进至高邑后，估计将以一个师位于临城、柏乡、高邑各点，掩护后路及侧翼，两个师向南推进。如我以地方兵团及民兵地雷战作有力之打击，使彼误认为我有主力部 队在该地区，必能迟滞多日不敢放手前进，我则争取时间歼灭当面之敌，然后再歼援敌，仍甚有利。"10月30日，毛泽东致电刘伯承、邓小平、指出胡宗南南援部队"似不十分积极"，"如北面地方兵团及民兵能作有力之阻击、困扰，可能迷惑该顽不改冒进"。同日，毛泽东又致电刘伯承、邓小平，指出："为集中一切可能力量歼灭当面之敌，再歼援敌之目的，除令赵尔陆率六个主力团南进外，请你们考虑是否调太行七八两分区主力至磁县地区，准备箝制王仲廉可能北援之部队。"同日，毛泽东还致电赵尔陆，令他"即率六个主力团兼程向南进至高邑西南临域附近，接受刘邓命令"。10月31日，毛泽东又起草两电，分别给赵尔陆和刘伯承、邓小平、再次强调打援部署，并指示刘、邓："你们是否还感兵力不足，除陈赓纵队主力外，一切在半月行程内可能调动之部队均可调动，以便集中最大兵力。"

战斗至30日，国民党军第四十军第一0六师大部被歼，第三十军也遭到有力打击。这时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高树勋率新八军大部及河北民军等部约万人宣布起义。10月31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名义电告重庆中共代表团："进入邯郸地区之三个军血战七天，昨（三十日）夜新八军高树勋起义，脱离副长官部，三十军、四十军全体向漳河以南退却，我正追击中"。

11月1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刘伯承、邓小平电："高树勋起义意义很大，你们处置很对"，并建议高部改称"民主建国军"或"人民建国军"。11月2日，毛泽东、朱德电贺高树勋率部起义："闻兄率部起义，反对内战，主张和平，凡属血气之士，莫

不同声拥护，特电驰贺，即颂戎绥。”

至11月2日，邯郸战役结束。这次战役除新八军等部起义外，共毙伤国民党军3000余人，俘国民党军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四十军军长马法五以下1.7万余人。同日，毛泽东发来贺电：“庆祝你们的伟大胜利”，并指示将战役情况均经新华社公开发表。

接见作家草明

女作家草明决心到东三省解放区去工作的申请得到批准后心里非常高兴，只是觉得这一走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再见毛主席，于是她想趁这功夫再见一次毛主席。她通过邓颖超大姐的帮助实现了自己的愿望，毛泽东接见了她。草明告诉毛泽东：“我即将到东北新区去，我一定按《讲话》精神去做”。她顺便谈到自己过去不懂得工农兵。虽然生于缫丝女工的环境中，但不是有意识地了解她们，更谈不上有马克思主义的水平去分析她们，研究她们，所以作品写得不理想。毛泽东说：“你过去的工作是有意义的。现在到前方去，看见工农兵就更高兴了”。草明说：“过去我脱离工农兵，不懂得要改造世界观，现在懂得了这一点，可惜太晚了，我已经33岁了”。毛泽东指出：“33岁算不了什么。66岁还可以为党工作好多年嘛。”毛泽东用坚定的口气鼓舞她。毛泽东还问草明：“整风中受委屈了没有？”草明回答：“没有受委屈。”毛泽听后，说：“有也不要紧，审查者和受审查者彼此都可以从中吸取经验教训”。毛泽东又问草明：“听说你和欧阳山离婚了？”草明没想到毛泽东会了解到这么细微的问题，因此她慌忙地回答说：“是的，我们现在没有感情了。”毛泽东纠正她说：“怎么会没有感情呢？感情更洗练了，今后更能把精力集中到工作中去了”。最后，毛泽东还关切地问草明：“到前方带孩子去吗？”草明回答：“前方工作可能很紧张，我身体又不好，不准备带了”。毛泽东点头说：“那好，孩子交给党”。谈话结束，草明起身和毛泽东握手告别。在以后的生

活和实践中，草明一头扎进工厂，努力同工人群众相结合，创作出许多如《原动力》、《火车头》、《乘风破浪》等热情歌颂中国工人阶级的优秀作品。

播发以中共发言人名义发表的谈话

延安新华广播电台于1945年9月11日正式恢复播音。在这之前试验播音的时侯，延安台反复播出由毛泽东签发，以朱总司令名义发布的指示我军迅速反攻的重要命令。

11月初，毛泽东赴重庆谈判回延安不久，冒着初冬的严寒，同刘少奇、任弼时等一起来到军委三局所在地裴庄视察。这里距延安11公里。延安台的发射机房在距离裴庄2公里的盐店子山上，播音室则设在裴庄村内。毛泽东等在三局听取了王诤关于延安台恢复广播的汇报，并且兴致勃勃地利用延安台的设备同远离千里之外的张家口新华广播电台通了话，对方和毛泽东谈话的是刘澜涛。之后，毛泽东等亲切地会见了三局的全体同志，并讲了话。他谈到通信工作和广播工作的重要性，号召大家提高警惕，准备打仗，准备吃苦，准备对付蒋介石发动的内战。

11月5日，延安新华广播电台播发了毛泽东以中共中央发言人名义发表的谈话（建国后，编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时，题为《国民党进攻的真相》）。谈话揭露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吴国桢粉饰国民党军进攻真相的谎言，指出“在各次自卫战斗中，我方缴获大批‘剿匪’和反共文件，其中有国民党最高当局所颁发而被吴国桢氏称为不过是‘笑话’的《剿匪手本》、‘剿匪’命令和其他反共文件，正在向延安解送中。这些反共文件，都是国民党军队进攻解放区的铁证。”谈话还指出：“国民党当局正在大举调兵，象洪水一样，想要淹没我整个解放区。他们在九、十两个月几个进攻失败之后，正在布置新的更大规模的进攻。而阻碍这种进攻，亦即有效地制止内战的武器之一，就是不许他们在铁路

线上运兵。我们和旁人一样，主张交通线迅速恢复，但必须在受降、处置伪军和实行解放区自治三项问题获得解决之后，才能恢复。”“交通问题应该迅速解决，这三大问题尤其应该迅速解决。三大问题不解决而言恢复交通，只是使内战扩大延长，达到内战发动者们淹没解放区的目的”。

同一天，毛泽东还电告中共重庆代表团：“刚才博古说，前在焦作被迫降落之国民党飞机，内有军委会（蒋署名）给阎锡山的信及剿匪手册两本，此信由太行拍来总社，博古已发广播，此事一下揭穿了蒋的秘密，且看反映如何。”同日，毛泽东又发一电给中共重庆代表团，指出邯郸战役缴获大批文件证明政府有全盘反共内战计划，请考虑采取强硬态度，说政府一面谈判，一面大举进攻，现并大举调兵，所谈尽是欺骗，我们不能信任；如欲取信，必须立即解决受降（包括撤兵驻防）、处置伪军、解放区自治三大问题。

在柳树店王家坪治疗休养

重庆谈判回到延安后，毛泽东感到有些疲劳，但因他离开期间，许多事情都有了变化，所以他顾不上休息，便又开始了紧张的工作。到了11月，毛泽东的身体状况越来越令人担忧，有时全身发抖，手脚痉挛，冷汗不止，不能成眠。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不得不停下工作，进行治疗休养。

但是，这时延安的各主要医院已大部撤离，留在延安的医务人员仅有傅连暲等，他们都先后给毛泽东看过病，但谁也没能解除毛泽东的病痛。在无可奈何之际，中央书记处办公室主任师哲，经请示毛泽东同意，给斯大林发了一份电报，说明毛泽东的病情，希望他们给予医疗方面的帮助或提供一些医疗意见。不久，苏联方面回电说，从电报上他们的医学专家无法诊断毛主席的病情，建议由他们派医生去延安为毛主席担任医疗护理工作。

毛泽东开始治疗休养，先住在柳树店附近联防军司令部修建的干部疗养所。在柳树店一个多礼拜的时间里，毛泽东在身体状况好些的时候，总要出去访问，把那里的干部和附近的群众差不多访问遍了，完全掌握了周围的情况。

几天以后，毛泽东又觉得离机关太远，看不到文件，听不到消息，很着急，他再也呆不下去了。这样，又搬到王家坪的桃林去住。王家坪桃林同军委、解放日报社、新华社等单位靠近，他就安居下来了。并请医生黄树则负责毛泽东的医疗和护理。

12 月初的一天，一架苏联飞机飞抵延安。机上有苏联派来的两名医生，外科大夫阿洛夫和内科大夫米尔尼柯，同机到达的还有毛泽东的长子毛岸英。毛泽东亲往机场迎接。毛岸英身着苏联陆军上尉军服走下飞机，毛泽东走上前去，紧紧地握住岸英说："你长得这么高了！"接着同来宾一一握手。然后请他们都到王家坪休息。傍晚，毛泽东设宴招待全体来宾。宴会后，他请机长到他的住处座谈，并当场要师哲给斯大林写一封感谢信，说明阿洛夫、米尔尼柯大夫、他的儿子毛岸英等均已安抵延安，望勿悬念，对送给他的礼品表示谢意。这封信写好后，由毛泽东亲自交给机长带回莫斯科上交斯大林。

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休养，毛泽东的心情、精神状态和健康状况都显著有了好转。不久毛泽东完全康复了，又全身心地投入紧张的工作中去了。

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

国民党为独占东北于 1945 年 10 月、11 月由美国军舰海运第十三、第五十二军在秦皇岛登陆，并攻占八路军山海关、绥中、锦州等地。中国共产党坚决反对国民党独占东北的企图，同时也估计到苏联将要根据《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把苏军进驻的大城市及交通线移交国民党政府。而八路军自关内各解放区进入东北后，尚

未来得及休整补充和统一思想；大批新扩编的部队未经整训，很不巩固；广大乡村及中小城市多为伪军和地主土匪武装所盘踞；东北群众工作还未及深入开展，部队没有牢固的根据地作依托。因此，八路军不可能阻止国民党军进入东北并控制主要铁路干线和大城市。

当时在东北工作的陈云、高岗、张闻天、李富春、罗荣桓、黄克诚等应中共中央的要求，都分别给中央发了电报，谈了自己的看法。11 月 29 日、30 日分两次发往延安，以陈云、高岗、张闻天 3 人共同署名的电报指出："我们必须承认，首先独占三大城市及长春铁路干线以独占满州，这种可能性现在是没有的。因此，当前在满州工作的基本方针，应该不是把我们的全部注意力集中于这三大城市，而是……有计划地主动地和迅速地分散到北满、东满、西满，包括广大乡村、中小城市及铁路支线的战略地区，……以建立三大城市外围及长春铁路干线两旁的广大的巩固根据地。"

上述这些情况，促使中共中央开始考虑重新调整在东北的策略方针。新方针的基本思想就是"让开大路，占领两厢"。毛泽东治疗休养结束，即开始主持制定在东北工作的新方针。他吸收了各方面的意见，于 12 月 28 日为中共中央起草致东北局的指示（建国后，编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时，题为《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对"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新策略方针作了全面的阐述。电报指出："我党现时在东北的任务，是建立根据地，是在东满、北满、西满建立巩固的军事政治的根据地。""建立这种根据地的地区，现在应当确定不是在国民党已占或将占的大城市和交通干线"，"也不是在国民党占领的大城市和交通干线的附近地区内。""建立巩固根据地的地区，是距离国民党占领中心较远的城市和广大乡村。"毛泽东还在电报中明确指示东北局：目前"我党在东北地区的工作重心是群众工作"。如果不抓群众工作，"我们在东北就将陷于孤立，不能建立巩固根据地，不能战胜国民党的进攻，而有遭遇极大困难甚至失败的可能"。毛泽东要求中共所

有的干部和军队，“必须给东北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利益”，要下决心与东北人民打成一片，要彻底扫除干部中一切不经过自己艰苦奋斗，流血流汗，而依靠意外便利，侥幸取胜的心理。

1946年

你应该上中国的“劳动大学”

毛泽东的长子毛岸英从苏联回到延安，毛泽东很高兴，这，他治病休养，恢复健康都有一定的帮助。1946年1月8日，毛泽东在复蔡和森之子蔡博等青年的信中说：“永福（即毛岸英——引者）回来，接到你们的信，十分高兴。正如你们信上所说，新中国需要很多的学者及技术人员，你们向这方面努力是很适当的。”

毛岸英回到延安后，领导上先安排他住在延安交际处，这件事谁也没告诉毛泽东。一天，毛泽东到交际处来看望客人，正好看到毛岸英也在交际处与其他客人谈话。事毕，毛泽东问交际处的负责人：“岸英也住在这里？”负责人回答：“是的”。毛泽东又问：“为什么让他住在这里？”负责人回答：“这是上级领导的意思，主要考虑到岸英刚从苏联回来，生活上不大习惯，让他在这里适应一段时间，反正马上就要分配他工作了，上班前就让他在这里住几天吧。”毛泽东听了摇摇头，只“唔”了一声，当时没说什么。过了几天，毛岸英就搬出去住了。

这以后的一天中午，毛泽东和毛岸英坐在屋外大柳树下的石桌旁，亲切地交谈着。毛泽东问：“你在苏联经常读中国书吗？”毛岸英回答：“经常读。读过《红楼梦》、《水浒》，还有鲁迅的作品……”。毛泽东点点头，说：“还好，应当知道中国的知识，更要懂得中国革命的知识。”说到这里，毛泽东停顿了一下，脸上流露出郑重而又严肃的表情说：“你在苏联的大学毕业了，可是你学的只是书本上的知识，你还没有上过中国的‘劳动大学’，对中国的情况了解得很少，缺乏实践。你应该上中国的‘劳动大学’，到农村去，拜农民为师。在这个大学里，可以学到许多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你说好不好？”“好！”毛岸英愉快地答应了。

谈话之后，毛岸英向周围的同志问了许多农民的生活情况。毛泽东嘱咐他：要自带行李、口粮和种子，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

当毛岸英知道农民睡觉都不用褥子时，决定自己的褥子也不带了。不几天，毛岸英就要到农村去上“劳动大学”了。毛泽东指定毛岸英要去的地方是吴家枣园，有好几十里路程，但是毛泽东只许毛岸英步行，而不许他骑毛驴走。警卫员想送送毛岸英，他也不让送。就这样，毛岸英穿着父亲送给他的一套打过补钉的灰布衣服，一个人背起行李，迈开大步上路了。

下达停战令

1946年1月1日，美国总统驻华特使马歇尔（1945年12月22日到达重庆）指示他的助手起草了一份停战计划。1月3日，马歇尔分别向蒋介石和毛泽东送交一份备忘录，提出自己的建议。主要内容是：立即停止一切战争行动，停止一切军事调动，但国民党军队为接受主权而开入东北和在东北境内的调动除外；停止一切破坏交通的行为；一切军队维持在现时驻地。马歇尔对国民党可以继续向东北运兵这一条，曾多次私下里向周恩来作过解释。

就在马歇尔发出备忘录的当天，中共代表团复函国民党，同意建立3人小组进行谈判。1月5日，中共代表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王若飞与国民党代表张群、王世杰、邵力子达成《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协议》。协议规定：停止国内各地一切军事冲突，并恢复一切交通。双方又拟定了停止国内冲突的命令和声明，其中规定在北平设军事调停处执行部：“该执行部由委员三人组成之，一人代表中国国民政府，一人代表中国共产党，一人代表美国”。决定由张群、周恩来、马歇尔组成。

1月7日，三人小组举行第一次会议。会上张群坚持要将国民党军队在东北的调动作为例外，并写到停战令上。他还要求，允许国民党军队接收热、察两省的重要城市赤峰和多伦。目的是想通过对赤峰、多伦的控制，割断东北和华北两大解放区的联系，使东北的中共军队孤立无援。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运兵东北作了让步，但坚决反对国民党军队“接收”赤峰、多伦。1月9日，中共中央电示重庆代表团：必须坚决拒绝蒋介石占领赤峰、多伦的要求，同时向马歇尔声明，由于国民党军队仍继续向热河、察哈尔进攻，内战尚未停止，美军应同时停止向华北、东北运送国民党军队，否则，一旦发生更大的军事冲突，中共概不负责。

这等于向蒋介石、马歇尔发出警告。1月9日晚，马歇尔直接找蒋介石，要他让步。蒋介石看到，谈判僵持下去对自己不利，只好给马歇尔一个面子，接受中共的要求，在停战协定中不涉及赤峰和多伦的归属。

1月10日，停战谈判达成协议。国民党政府代表张群与中共代表周恩来签署的《关于停止国内冲突的命令和声明》和本月5日达成的《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协定》同时公布。同一天，毛泽东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的名义向中共所属部队发布了停战令（《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通告》）：“本党代表与国民政府代表对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之办法、命令及声明，业已成立协议，并于本日公布在案。凡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之一切部队，包括正规军、民兵、非正规军及游击队，以及解放区各级政府，共产党各级委员会，均须切实严格遵行，不得有误。全中国人民在战胜日本侵略者之后，为建立国内和平局面所作之努力，今已获得重要之结果。中国和平民主新阶段，即将从此开始。望我全党同志与全国人民密切合作，继续努力，为巩固国内和平，实现民主改革，建立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

拥护重庆政治协商会议

政治协商会议于1946年1月10日在重庆开幕。蒋介石在会上宣布四项诺言：保证人民自由，各政党一律平等，实行地方自治和普选，释放政治犯。1月14日，周恩来即在政协会上提出要

求释放张学良、杨虎城。接着又提出要求释放叶挺、廖承志等人。蒋介石不得不做出一点样子，同意释放叶挺、廖承志。中共也以释放被俘的国民党高级将领马德五等人，作为交换条件。

会议期间周恩来飞返延安，于1月27日参加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报告关于停战、政协等问题的谈判情况。会议认为代表团取得的成绩很大，方针都是正确的。第二天，中共中央书记处继续召开会议，初步商定：中共参加政协的名单为：毛泽东、朱德、林伯渠、董必武、吴玉章、刘少奇、张闻天、周恩来。

周恩来于1月29日飞抵重庆，1月31日出席政治协商会议闭幕式。政协会议对政府组织案、国民大会案、和平建国纲领、军事问题案、宪法草案等都达成了协议。2月1日，周恩来会见蒋介石，转达毛泽东关于军党分立、长期合作的意见，并说毛泽东将参加联合政府。

2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目前形势与任务的指示。指示指出：重庆政治协商会议“已获得重大结果”，“从此中国即走上了和平民主建设的新阶段”。“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目前已由武装斗争转变到非武装的群众的与议会的斗争，国内问题由政治方式来解决”。“我党即将参加政府”，“我们的军队即将整编”。指示并指出“练兵、减租与生产是目前解放区三件中心工作”。

毛泽东于2月6日为中共中央起草致重庆中共代表团电，同意周恩来、董必武、吴玉章、秦邦宪和何思敬（中共代表团法律顾问）5人为宪草审议委员我方人选，毛泽东、林伯渠、董必武、吴玉章、周恩来、刘少奇、范明枢（解放区山东省临时参议会议长，如范不能去则提彭真）、张闻天，为国民政府委员的我方人选，以便将来指导中心移至外边。并指出：“同意以周、林、董、王（若飞）分别任行政院副院长、两部长及不管部。”

2月9日，毛泽东与美联社记者谈话，说：“政治协商会议成绩圆满，令人兴奋。但来日大难，仍当努力，深信各种障碍都可加以扫除。”“总的方面，中国走上民主舞台的步骤，已经部署完

成”。“各党当前的任务，最主要的是在履行政治协商会议的各项决议，组织立宪政府，实行经济复兴。共产党于此准备出力拥护。”

警惕中国法西斯分子的阴谋

国民党以接收东北人员张莘夫被杀一事为借口，于1946年2月22日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在重庆举行反苏反共游行，并指使特务捣毁重庆《新华日报》营业部、民盟机关报《民主报》营业部、打伤工作人员多人。周恩来当即举行记者招待会，提出把爱国和排外分开，把学生的爱国运动与特工人员有组织有计划的阴谋分开。这次事件与较场口（2月10日重庆各界在校场口举行庆祝政协成功大会，国民党特务捣毁会场，打伤郭沫若、李公朴、施复亮、马寅初等）、沧白堂的捣乱（政协会议期间重庆各界政治协商会议协进会在沧白堂举行报告会，遭到特务破坏），都是一个来源。“要求政府负责惩办祸首，赔偿损失，保证今后的民主秩序。”2月24日，周恩来致电中共中央并毛泽东，提出：东北问题仍将为斗争焦点。对蒋军的挑衅和进攻，请予防范和准备。对东北问题须有更主动之答复。

2月25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毛泽东修改定稿的社论《重庆事件与东北问题》。毛泽东在修改时增写了一段话：从中国法西斯分子的一切言论行动中可以看出，“他们总是小心保护着日本帝国主义分子和汉奸伪军，不愿丝毫触犯他们。至于对真正援助中国独立解放的盟邦苏联，都称之为‘新帝国主义’，放在必须‘打倒’之列。同样，他们对日寇汉奸略无仇恨，对于中共则恨入骨髓，必欲消灭之而后快。”

2月26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毛泽东修改定稿的新华社消息《在国民党政府纵容下，反动派扩大反苏反共活动》。毛泽东对该消息稿作了多次修改，在增写的内容中指出：“法西斯反动派之所以能够煽动一部分群众参加示威，一半依靠威胁，一半依靠

欺骗，即是利用人们不明东北真相与不明反动派挑拨国际战争与国内战争的阴谋之结果。我们相信只要东北真相被了解，反动派的阴谋被揭露，真正的群众是决不会盲从反动派的。”

欢迎马歇尔等最高军事三人小组

最高军事三人小组三成员马歇尔、张治中、周恩来和军调部三委员罗伯逊、郑介民、叶剑英于1946年3月4日飞抵延安。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领导人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彭德怀、林伯渠等和各界群众6千人到机场欢迎。在机场毛泽东与美国总统驻华特使马歇尔是第一次见面，彼此不熟悉，周恩来连忙给他们作介绍。毛泽东握着马歇尔的手说：“欢迎马将军到延安来视察！”马歇尔连忙回答：“感谢毛主席的盛情欢迎！”周恩来又把罗伯逊、郑介民介绍给毛泽东，毛泽东也表示热烈的欢迎。张治中是老朋友了，毛泽东握着他的手时，两人几乎不约而同地说道：“真想不到，我们又见面了！”

接着，毛泽东同朱德陪同三人军事小组在机场检阅了延安卫戍部队的仪仗队。主要检阅者共5人，成一横排，毛泽东在右，朱德在左，中间为三人小组成员，周恩来在左、张治中在右，马歇尔居中。被检阅的队伍既整齐，又精神。检阅完毕，又同欢迎群众见面。群众热情欢迎的场面使马歇尔、张治中深受感动。

下午，马歇尔到枣园拜访毛泽东。毛泽东同马歇尔进行了会谈。毛泽东答应中共方面将遵守各项协议的规定。马歇尔赞扬了周恩来在谈判中的友好合作，并说自己无意干涉中国的事务，但强调停火的必要。马歇尔还向毛泽东表明了他已对蒋介石讲过的要点：如果中国不统一，美国就不能给预援助。在会谈过程中，毛泽东说，希望停战协定能引用于满洲，把执行小组派到东北去。会见毛泽东后，马歇尔也拜访了朱德。张治中与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人也进行了互访。

当天晚上，毛泽东、朱德在杨家岭中共中央招待所设宴款待三人军事小组和军调部三委员。宴会开始，毛泽东首先致词。他对马歇尔、张治中、周恩来与各位将军、同志表示热烈欢迎，对各位努力于中国的和平、民主、团结表示衷心感谢。他还表示，中共准备作出一切努力促进中国的和平、民主、团结。马歇尔在祝酒时说：感谢毛泽东主席、朱德将军及各位主人的热情欢迎和盛情款待。为中国人民干杯！说完，大家一齐举杯，一饮而尽。宴会后，毛泽东等又陪同客人们，出席为欢迎他们而举行的歌咏晚会。

马歇尔最高军事三人小组在延安只住了一天。3月5日上午，毛泽东和朱德、林伯渠等及延安各界代表到延安机场欢送马歇尔、张治中、周恩来等飞赴汉口。马歇尔在上机前对毛泽东再次表示感谢，并说“我们的会晤是具有历史意义的”。毛泽东答称：“我也愿意重申我们对您帮助中国人民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事业的努力的衷心感谢。”

中共中央准备搬迁到清江浦

政治协商会议通过政府改组案、和平建国纲领案、军事问题案、国民大会案、宪法草案案，这些协议实际上否定了国民党的独裁和内战政策，在当时情况下对人民是有利的。中国共产党真诚地谋求国内和平，不遗余力地争取有利于人民的和平发展道路，对于政协的协议也是真诚地准备付诸实施。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开始酝酿准备南迁的问题。

早在1945年8月26日，毛泽东赴重庆谈判前夕，他就曾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议论过抗日战争胜利后延安的地位。毛泽东说：延安之所以重要，一因打日本，一因蒋介石在重庆，即都是偏安之局。如蒋介石回到南京，延安就不那么重要了。当然，不要轻易搬家。

1946 年 1 月 28 日，政协决议通过前夕，周恩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将来我们要参加国民政府、行政院，党中央要考虑搬到国府所在地去。2 月 2 日，中央书记处在讨论如何实施政协决议时，刘少奇说：华中（指苏皖解放区）我们应保留，也可能党中央将来搬去。这个问题也要告诉周恩来。朱德随即表示了相同的意见。同一天，中共中央致电陈毅，指出必须巩固华中现有地区，因中央机关将来可能迁淮阴办公。2 月 6 日，刘少奇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又说：如果改组政府确定了，党中央的工作重心会搬过去。因此，党中央机关要考虑搬家问题，搬到离国民政府近一些的地方。

3 月 4 日傍晚，毛泽东、朱德宴请三人军事小组和军调部三委员。在晚会上张治中说："你们将来写历史的时候，不要忘记'张治中三到延安'这一笔！"毛泽东立即插话："将来你也许还要四到延安、五到延安，怎么只说三到呢？"张治中机智和真诚地回答："和平实现了，政府改组了，中共中央就应该搬到南京去，你也应该到南京去，延安这地方，我不会再有第四次的机会了！"毛泽东为张治中的话所感动，他认真地说："是的，我们将来当然要到南京去，不过，听说南京热得很，我怕热，希望常住在淮安，开会就到南京"。

3 月 12 日至 25 日，中国民主同盟秘书长梁漱溟访问延安。以后梁漱溟回忆说，在访延期间，毛泽东曾同他说："中共中央准备搬到清江浦，我也准备参加国民政府，作个委员，预备在南京住几天，在清江浦住几天，来回跑。"

但是，随着蒋介石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协议，大举进攻解放区，中共中央改变了"和平民主新阶段"已经到来的估计，中共中央准备南迁淮阴（清江浦）的拟议也就理所当然地取消了。

倾听梁漱溟陈述政见

1946年3月12日至25日，中国民主同盟常务委员、秘书长梁漱溟访问延安。这是他第二次访问延安。

重庆政治协商会议开过后，梁漱溟对政协所通过的将实行的宪政失去信心，宣称不参加将要组织的联合政府，为求得中共方面的谅解，便有这第二次访问延安之行。事前，梁漱溟预先写好给毛泽东的一封信，托周恩来转交，表明他要退出现实政治，从事思想言论工作，不参加联合政府之意。毛泽东不同意梁漱溟的这种做法。他接信后手书一封回信，仍经周恩来转交梁漱溟。复信大意说，参加政府与从事言论工作不相妨碍。周恩来交复信时对梁漱溟说得更明白。他说：国民党一党专政，关着门，不容许多党派参加，经我们大家合力争取，现在门已敲开，你却临门后退。他还说：如果知道信里是这个内容，他就不会将信带去延安了。

但是周恩来还是安排了梁漱溟的这次访问。

梁漱溟飞抵延安时，毛泽东在机场迎接。梁漱溟一见到毛泽东，寒暄后即提出，他希望能有一个机会，请毛泽东找10位中共领导人（包括毛在内），听他陈述自己对当前中国的一点意见，如能满足，感激之至。毛泽东当即同意了，随后同梁漱溟一车坐至枣园休息用饭。第二天，梁漱溟被请到一间不大的会议室里，毛泽东首先迎上来同他握手，除早已认识的张闻天外，又分别见过朱德、任弼时、彭德怀等中共领导人。

梁漱溟见毛泽东约了那么多领导人来听他的政见，情绪颇为激动，兴冲冲讲开了。他说：而今有了停战协定，有了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大家又兴高采烈地高唱着在中国实行欧美式的宪政，大谈在轮流执政、你上我下的政局中实现民主，进行建设。但我对此有怀疑。我认为在中国照搬欧美政治体制的一套，一不合中

国的历史文化传统，二不合中国的国情和现状的需要，其后果将不利于中国迅即进行长期的经济建设，致使中国摆脱不了贫穷落后的状况，而无法以独立、富强之民族自立于世界之林。梁漱溟的话隐约有一个意思，只要蒋介石在就不好办，除非蒋介石的死，或他失势下台。但话不好明说，所以梁漱溟说，如果诸位反问我，你需要一个什么样的政府呢？你的意见、设想如何实现呢？我却答不上来。……

毛泽东等10位领导人都很耐心地听着梁漱溟的长篇发言。毛泽东没有插话，其他人也没有说什么。只有任弼时插了几句：梁先生的意思是不是要蒋先生死了，国民党垮了台，中国才能进行经济建设；而现在蒋介石并没有死，国民党也没有垮台，因此答不上来？梁漱溟报以微笑，却没有正面答复。毛泽东始终没有讲话。

我只接受第十一个宪法

国民党于1946年3月1日至17日召开的六届二中全会。在蒋介石的亲自导演和顽固分了的巨大压力下，会议通过一项决议，强调要对政协关于宪章问题的决议进行修改。蒋介石对政协宪草决议最不满的主要有3条：即不设国民大会；削弱总统职权，以行政院与立法院互相制约；省得制定省宪等。国民党在政协宪草审议小组提出了3点修改：一是将国民大会由无形改为有形；二是取消有关行政院向立法院负责的条款；三是改“省得制定省宪”为“省得制定省自治法”。

延安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得知这一消息，十分震惊。3月16日，毛泽东在关于反对国民党修改政协决议和宪草原则问题的电报上，加写一段话：“最近时期一切事实证明，蒋介石反苏反共反民主的反动方针一时不会改变。只有 经过严重斗争，使其知难而退，才有作某些较有利于民主的妥协之可能。”

3月17日，毛泽东起草中共中央致重庆中共代表团电，指出："如果蒋介石坚决要修改宪法原则，我们便须考虑是否参加政府及是否参加国大的问题。我党国府名单及国大代表名单暂勿提出，民盟亦然，请与民盟商酌。"根据这一指示，中共代表团未交出参加国民政府的名单。

中共中央又于3月18日给全党发出经毛泽东 修改审定的指示，指出国民党对政协草案的修改，"这是一件有关中国人民命运的原则问题，是中国走民主道路还是走独裁道路的问题，各地应严重注意和警惕"。指示还指出："国民党内反动派以至蒋介石，都不喜欢政协决议，企图推翻，但正面推翻丧失信用过大，乃采取迂回阴谋手段，首先推翻宪草原则，只要宪草原则推翻，成立独裁政府，则国大改组、政府纲领、整军等决议，势必成为其文以至全部推翻。因此，我党对国民党反动派此种阴谋必须坚决反对，坚持和强调政协决议每一条每一句均须实现，反对修改；特别对于宪草原则，反对任何修改，对国民党二中全会推翻宪草原则的决议及其在宪草审议会中所提出的修改宪草原则的任何主张，必须予以痛驳，并要他们遵守信义"。

为此，中共中央还特别指示周恩来尽快飞回延安一趟，汇报有关情况。据梁漱溟回忆，当时他正在延安访问，被邀参加了毛泽东召集的会议。毛泽东在会上说：他们（指国民党）要制定他们所要的宪法，十个、八个，由他们自己制定去吧！必须制定共同遵守的宪法，我才接受。我只接受第十一个宪法！

我感觉对你及许多同志很负疚

洪禹，当时在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文学系研究室从事研究工作。在延安审干期间，受到了错误的审查，他为此于1946年1月25日向毛泽东写了申诉信。

3月12日，毛泽东复信洪禹："一月二十五日给我的信，很久

就收到，很对你不起，到今天才复你，这是由于我几个月来都在病中的原故，请你原谅。在详细看了你的信以后，我感觉应当同意你的意见。在关于你本人的具体问题上，当然这是你一方面的声音，而别方面的我还未听到；但是我觉得你所提出的那些意见，确是我们的党组织值得注意与必须注意的。因为今天离你发信的日子已有一个半月，在这期间内不知道你的问题已获解决否？如果尚未，请你去找组织部副部长安子文同志当面商量解决，我已把你给我的信付给安子文同志看去了。在你的问题得到解决的时候，请你告知我是如何解决的，我愿意知道这事的结果。总之我感觉对你及许多同志很负疚，因为我们工作中做得不好的事实在太多了。”

洪禹的问题，在毛泽东的过问下得到了解决。

批准叶挺入党

1946年3月4日，在皖南事变中被国民党反动派非法拘留而监禁了5年之久的新四军军长叶挺出狱了。叶挺出狱后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重新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出狱后不过10小时，就向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递交了一份入党申请书。叶挺在他的入党申请书中说：“我已于昨晚出狱。我决心实现我多年的愿望，加入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在你们的领导之下，为中国人民的解放贡献我的一切。我请求中央审查我的历史是否合格，并请答复。”

叶挺于1924年在中国共产党旅莫支部入党。后因回国参加北伐、南昌起义、广州起义，成为“北伐名将”，“大革命时代的赵子龙”。但在中共六大前夕，叶挺奉命赶到莫斯科述职时，受到王明一伙的无理指责和排挤，他一气之下，离开莫斯科脱离了党。后来他抗日报国，成为新四军军长，直至皖南事变。

在叶挺5年多的囚禁时期，蒋介石一直想用高官厚禄拉拢叶挺。一天，蒋介石召见叶挺，诱劝他参加国民党。蒋介石说：“我

知道你现在不是共产党员，你可以参加国民党。一个革命者不能中立的。”叶挺回答：“现在我是一个囚徒，在我恢复自由以前，根本不能考虑这个问题。假如我此时加入国民党，我就是一个毫无人格的软骨头。你们要我这样的软骨头有什么用呢？”蒋介石无可奈何。出狱前夕，沈醉又来问叶挺获释后第一件事想做什么。叶挺爽快地回答：“请求恢复我的共产党党籍。”沈醉把叶挺的话告诉特务头子戴笠，戴笠听到这句话，惊得目瞪口呆。

就在叶挺入党申请书发出的第三天，3月7日中共中央就给叶挺回了电报。这个复电是经毛泽东亲自修改审定的。电报称叶挺为亲爱的同志。电报说：“五日电悉，欣闻出狱，万众欢腾。你为中国人民解放与人民解放事业进行了二十余年的奋斗，经受了种种严重的考验，全中国都已熟知你对民族与人民的无限忠诚，兹决定接受你加入中国共产党为党员，并向你致热烈的慰问与欢迎之忱。”

同一天，毛泽东还为中共中央起草致董必武、王若飞电：“同意叶入党。叶来电与中央复电，均于今晚广播，收到时请在《新华日报》发表，并先告叶，但不要登广告。”

3月9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了《欢迎叶挺将军》的文章，文章指出：“中国共产党所引为光荣的，是叶挺将军的入党，更证明中国共产党是真正为中国人民、中华民族服务的党。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人，都是为着这一纯洁高尚的目的，而不是为着其他。”

向“四八”被难烈士致哀

中共中央委员王若飞、秦邦宪，刚出狱的新四军军长叶挺、中共中央职工委员会书记邓发等，在1946年4月8日乘美国飞机由重庆飞回延安途中，因飞机迷失道路，于下午2时左右在晋西北兴县东南80里的黑茶山遇雾，撞山焚毁，当即全部遇难。

4月13日，中共中央成立以毛泽东为首的26人组成的治丧

委员会。19 日，延安各界 3 万余人隆重追悼并公葬王、秦、叶、邓等诸烈士。灵堂正中，国旗和党旗下，悬挂着毛泽东的挽词："为人民而死，虽死犹荣。"

4 月 20 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毛泽东《向"四八"被难烈士致哀》一文。全文如下："亲爱的战友们，不朽的英雄们：数十年间，你们为人民事业做了轰轰烈烈的工作。今天，你们为人民事业而死，虽死犹荣！你们的死是一个号召，又将加深中国人民对于中国共产党的认识，它将加强中国人民坚持和平、民主、团结事业的决心！你们的死是一个号召，它号召全党党员和全国人民团结起来，为和平、民主、团结的新中国奋斗到底！全党党员和全国人民将继承你们的遗志，继续奋斗，直到胜利，决不懈怠，决不退缩！"

为什么不叫"人民日报"

1946 年 4 月，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要出一份机关报，开始报名拟为"晋冀鲁豫日报"或"太行日报"。大家委托晋冀鲁豫中央局副书记薄一波去请毛泽东题写报头。毛泽东听了薄一波的汇报后，对他说："为什么你们不叫'人民日报'？"并说：报纸不一定非要冠上地区的名字。"薄一波认为这建议非常好，当即表示赞同。于是毛泽东非常认真地润墨提笔，一连写出了五幅横书的"人民日报"。写好后毛泽东进行了认真比较，然后指着其中一幅，嘱咐薄一波说："这个比较好，就用这个吧！"5 月 15 日，中共晋冀鲁豫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在河北邯郸创刊了。

化四平街为马德里

1946 年 3 月 18 日，苏军撤出四平，东北民主联军迅速进入该城，歼灭城内伪满军，从而阻断了国民党军沿长春铁路北进的通

路。3月24日，毛泽东指示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林彪等：鉴于国民党已经撕毁东北停战协议，则“我党方针是用全力控制长、哈两市及中东路”。毛泽东命令东北民主联军迅速集中主力，坚决扼守四平地区，狠狠打击北进之敌。

4月3日，林彪电告中共中央：“我此刻已到四平街……，集中近六个旅的兵力拟坚决与敌决一死战。”4月6日，毛泽东复电林彪并告彭真：“集中六个旅在四平地区歼灭敌人，非常正确。党内如有动摇情绪，那怕是微小的，均须坚决克服。希望你们在四平方面，能以多日反复肉搏战斗，歼敌北进部队的全部或大部，我军即有数千伤亡，亦所不惜。”

毛泽东并不放心，4月8日他又致电林彪、彭真，对东北作战问题作了数点补充：（一）“北面作战应以反复肉搏打几昼夜，歼灭敌顽一个师至二个师之大部或全部为目的。因此，必须集中绝对优势兵力（例如六个旅或更多）；必须作充分的精神准备与军事准备，必须选择有利我之地形；这就是说，不要浪打，打则必胜。”（二）“为大规模作战所不可少的各项后勤组织，例如粮食供给，兵源补充，民兵游击队配合作战等项，必须迅速在北面组织起来，南面机构及人员必须大量北移，并须从速，迟则不利。”（三）“破路极关重要，应组织专门破路司令部，凡敌将占及已占之路必须彻底破坏。”

4月12日，毛泽东电告林彪、彭真，说周恩来11日来电，建议派兵进入长春。请酌办。4月14日，苏军撤退的最后一列火车刚刚离开长春站，东北民主联军便向盘踞长春的伪军发起进攻，经过4天激战，18日解放长春。毛泽东于18日当天得知这一消息，立即致电东北局：“我应力争保持长春于我手中，如我能在四平地区大量歼灭顽军，此种可能性是有的；但目前尚难作最后决定，须看斗争结果如何而定；在未作最后决定前，你们应作长期保持计划。”接着，4月23日东北民主联军又攻占了苏军撤去后的齐齐哈尔。4月28日，解放哈尔滨。4月16日，毛泽东致电东北局及林

彪，要求“夺取长、哈、齐后，注意纪律，给市民以好影响。”“保护国民党一切文职人员，不要杀害一人，以利谈判，军事俘虏亦不杀害。”

国民党军经过一番调兵遣将，从4月18日起，开始猛攻四平，为时一个月的四平保卫战正式拉开序幕。东北民主联军守城部队依托工事顽强抵抗，使进攻之敌伤亡惨重，未能获得任何进展。其余机动部队则在四平东西两侧延长战线，挫败了敌军迂回四平的企图。

为表彰四平守军的英雄气概，4月27日，毛泽东起草了中共中央军委致林彪电，指出：“四平守军甚为英勇，望传令奖励。”“请考虑增加一部分守军(例如一至二个团)，化四平街为马德里。”毛泽东要把四平保卫战变成二次大战前西班牙的马德里之战，意思是要不惜任何代价，坚守四平城，不让进攻之敌前进一步。

几天之后，5月1日，毛泽东在致林彪的电报中说明了“化四平街为马德里”做法的原因。电报说：“东北战争，中外嘱目，蒋介石已拒绝马歇尔、民盟和我党三方同意之停战方案，坚持要打到长春。因此，我们必须在四平、本溪两处坚持奋战，将两处顽军打得精疲力竭，消耗其兵力，挫折其锐气，使其以六个月时间调集的兵力、武器、弹药，受到最大消耗，来不及补充，而我则因取得长、哈，兵力资财可以源源补充，那时便可能求得有利于我之和平。”显然，毛泽东“化四平街为马德里”的决策，是在当时特殊的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是为谈判桌上的斗争服务的。

5月3日，毛泽东起草中共中央致林彪、彭真电，指出：“自蒋介石拒绝停战后，东北我军须作长期打算。前方不要攻坚，除必须数量之守城部队外，应控制强大机动部队，以为有利时机在运动中打击敌人之用。除坚持四平阵地外，速准备公主岭及他处之第二线阵地。”但此时，东北民主联军为保障四平侧翼的安全，已将主力向四平两侧延长防线五百余里，已经没有机动兵力了。

5月中旬，国民党用于北线攻击的总兵力达10个整师，比以

前增加了近一倍。5 月 14 日，国民党 10 个师在飞机、大炮和坦克的掩护下，开始对四平发起总攻。经过 4 昼夜的激战，战局的发展显然对东北民主联军不利。5 月 18 日，林彪急电中共中央和东北局："四平以东阵地失守数处，此刻敌正猛攻，情况危急。"为摆脱被动局面，保持部队的作战能力，林彪在请示毛泽东批准后，准备主动撤退。当天，东北民主联军就撤出四平地区。5 月 19 日，国民党军进占四平街，四平街保卫战到此结束。

5 月 19 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致林彪并告彭真电，指出"四平我军坚守一个月，抗击敌军十个师，表现了人民军队顽强英勇精神，这一斗争是有历史意义的"。毛泽东所指具有历史意义，就在于这次战役，推迟了国民党北进计划的实现，对争取时间巩固中共的北满根据地起了重要作用。同时，它也证明了中共军队，是一支不仅能打拿手的游击战和运动战，而且也能打城市防御战的优秀部队。

中原突围胜利第一

中原解放区，是抗日战争转入相持阶段后，新四军第五师和八路军南下支队在鄂、豫、皖、湘、赣五省交界地区创建的敌后抗日根据地。由于国民党军实行"蚕食"政策，到 1946 年 5 月，中原我解放的面积已不及原先的六分之一，6 万大军被压缩到以宣化店为中心，方圆不足百里的狭小地区，困难重重，处境危艰。

毛泽东一方面命令中原我军坚持自卫原则，毫不客气地对国民党的"蚕食"进行反击，进行生产自给，克服经济困难；另一方面又指示周恩来和北平军调部的中共代表，揭露事实真相，签订"罗山协定"、"应山协定"和"汉口协定"，使国民党破坏停战令的行为有所收敛。但最重要的是对中原军区在情况最紧急时实行突围作了重要部署。

1946 年 5 月 1 日，中共中央致电中原军区司令员李先念、政

治委员郑位三，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王震："你们须立即准备突围，以最大决心，坚决奋斗，团结一致，才能克服困难，战胜危险，但主力突围方向应详细考虑。"

5月2日，毛泽东起草中共中央复中原局电，同意中原局5月1日提出向西突围的计划，指出："顽进攻时，在原地打几仗不轻走，以免中敌挑拨之计和自取困难。万不得已向西突围，方针甚好，即照此执行，但一切准备工作宜快。"

5月4日，周恩来同马歇尔会谈，说明政府军将在5月4日至9日向中原解放区进攻，这是新的全面内战，我方将自卫还击。为制止进攻，希望政府派代表到湖北协商解决第五师转移问题。经马歇尔和国民党方面代表徐永昌同意，5月8日周恩来同美方代表、国民党代表一起抵达中原解放区宣化店。9日回武汉，10日周恩来同徐永昌、白鲁德签字停止中原战事的协议。

5月12日，毛泽东在致薄一波的信中说："目前五师虽获致临时协定，根本危险依然存在，故仍须准备对策。"

6月1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致郑位三、李先念、王震电，指出："（一）美蒋对我极为恶劣，全面内战不可避免。要求美机运款接济你们，恐已希望甚小，你们须求自救之道。如一方面节省用费留出准备突围时费用；另方面麦子已熟，向民众征收粮税。（二）必须准备对付敌人袭击及突围作战，预拟突围后集中行动及分散行动两个计划。大概在突围及突围后一个时期内以全军集中行动为有利；而在敌人追剿紧急，行军给养均极困难时，便应分为两股或三股，各自独立行动，可以避免集中行动之困难，而利于分别牵制敌人与互相作战略上之策应。（三）目前时机紧迫，你们应充分注意，并团结内部准备艰苦斗争。"

蒋介石自恃在中原地区兵力上占绝对优势，甚至认为中共军队已成瓮中之鳖。到6月中旬，蒋介石终于下达了围歼中原共军的密令："应按既定计划，先速歼鄂中李先念部"，"郑州刘峙在驻马店设指挥所，统一指挥下列各兵团：……对鄂中'奸匪'实行

进剿作战”，“担任攻击各部队统于已月养日（即6月22日——引者）前秘密完成包围形势，以攻击准备，实施攻击。各部在攻击行动中，应严防‘奸匪’伺隙逃窜”。

毛泽东得知这一消息后，于6月19日立即为中共中央起草致郑位三、李先念、王震电，指出：南京周恩来电称：蒋决定大打，你处随时注意敌情，准备突围。“突围后有两个可能前途，第一个能达向北目的；第二个被敌阻隔不能达向北目的。”“因此你们须作两个准备：第一个争取一切可能向北；第二个在向北不可能时，准备在国民党区域创造根据地，以待时局之变化。”同时，毛泽东还分别起草致刘伯承、邓小平和陈毅、舒同等电，除令刘、邓设法接护中原突围部队外，对准备蒋介石大打，各战略区的任务作了部署。

6月20日，中原军区在宣化店召开紧急军事会议，议定突围方案。6月21日，郑位三、李先念致电毛泽东：我们提议中央能允许我们在本月底即开始实施主力突围的计划，即经鄂中分两个纵队分别向陕南及武当山突围，然后转至陕甘宁边区。我们认为就时间及敌情来说，现在主动突围较过去虽大大困难，在突围过程中虽可能遭受一定损失，但如不再突围，则以后更难了。如何？请即复示。

中共中央收到中原局电报的第三天，6月23日即复电郑位三、李先念，批准了中原军区的突围计划。毛泽东在复电中强调：“（一）二十一日电悉。所见甚是，同意立即突围，愈快愈好，不要有任何顾虑，生存第一，胜利第一。（二）今后行动，一切由你们自己决定，不要请示，免延误时机，并保机密。（三）望团结奋斗。预祝你们胜利。”

6月26日，国民党军向中原解放区大举围攻，全面内战爆发。李先念、郑位三、王震率中原局、军区机关及主力一部组成北路突围军，副司令员王树声率主力一部组成南路突围军，在一纵一旅向东佯动的掩护下，于晚间开始突围。北路突围军和南路突围

军先后于6月29日，7月1日先后西越平汉铁路，而后分别向陕南、鄂西北方向前进。至此，中原军区的突围战取得了完全胜利，实现了毛泽东提出的“生存第一，胜利第一”的目标。

先在内线打几个胜仗

1946年6月19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一个指示中判断：“观察近日形势，蒋介石准备大打，恐难挽回。”对于大打以后的结局，毛泽东作了这样的估计：“六个月内外时间如我军大胜，必可议和；如胜负相当，亦可议和；如蒋军大胜，则不能议和。”

毛泽东鉴于国民党军大举进攻在即，迫切需要制订我军的战略方针，于6月22日设想了一个南线作战的战略计划，请刘伯承、邓小平、薄一波、陈毅、舒同等同志考虑。这个计划是在全局破裂，国民党军向我大举进攻时，我山东、太行两区主力实行外线出击，向南作战。“太行区以豫东地区为主要作战方向”，集中主要兵力尽可能攻取十几个县城，“主要着重在野战中消灭敌军有生力量，相机占领开封”。山东区以徐州地区为主要作战方向，攻取徐州、蚌埠间若干县城，“主要着重调动徐州之敌于野战中歼灭之，相机占领徐州”。“只要占领开封、徐州间及徐州、蚌埠间主要铁路线及上述各县城之半数左右，即为有利。”中原部队突围向河南出动，其任务为钳制河南之敌，华中部队粟、谭主力“对付江北之敌”。“上述作战胜利（不一定要取得开封、徐州）后，如形势有利，可考虑以太行、山东两区主力渡淮河向大别山、安庆、浦口之线前进。”毛泽东还强调，这一计划的精神着重向南，与蒋的精神着重向北相反，可将很大一部蒋军抛在北面，处于被动地位。

为了实施这一计划，毛泽东于6月27日为中共中央起草致使华中局电：“决定刘、邓主力出陇海、豫东，陈，舒主力出徐蚌间，调动敌人而歼灭之”。“应以一部在苏中吸引并牵制通扬线上之敌，

粟、谭率主力（不少于十五个团）位于三分区与陈、舒配合，一举占领蚌浦间铁路线，彻底破坏铁路，歼灭该地之敌，恢复三四分区失地，并准备打大仗，歼灭由浦口北进之敌。”并限于7月10日以前完成一切准备，待命攻击。华中局根据这一指示，于6月27日命令华中野战军主力西进，集中于六合、天长之间整训。

华中野战军司令员粟裕接到此命令时正在海安，他从实际情况出发，对可能产生的各种情况进行了认真的分析研究，于接到命令的当天，即6日27日向中央军委，山东野战军、华中军区报告：在淮南集中大兵团作战，粮食、民夫和交通运输均极困难，目前主力集中于苏中，民夫及作战用具都已准备完毕，是否在苏中打一仗再西移。粟裕发完电后，立即赶回淮安，同邓子恢、张鼎丞、谭震林共商，他们也都同意粟裕的意见，于是在6月29日联名再电中央军委，电报认为华中主力转至淮南后，不仅粮食须由苏中供给，民夫运输也恐难支持。如苏中失陷，淮南战局万一不能速胜，则我将处于进退两难（苏中大部为水网，如被顽占据，不易夺回）。目前我们主力都集中于苏中，民夫及作战用具都已准备完毕，如不在苏中打仗便西移，不仅对群众很难说服，即对部队亦难说服。电报建议在第一阶段中，华中野战军第一师和第六师仍留苏中解决当面之敌，改善苏中形势与箝制敌人；在山东及太行完成第一阶段任务后，华中野战军第一、第六师再加入蚌埠、浦口线作战，完成第二阶段任务。

毛泽东接到粟裕等人的电报后极为重视。次日，他即为中央军委起草复电：“部队暂缓调动，待与陈军长商酌后，即可决定通知你们。”

7月初，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毛泽东根据各地传来的情报获悉：胶济、徐州、豫北、豫东、苏北、苏中之国民党军可能同时向各解放区进攻。经过审慎的考虑，毛泽东也感到先在内线迎敌较为有利，所以决定采纳粟裕等人的建设，6月30日，毛泽东曾将粟裕等人的意见告诉陈毅、舒同，认为“此意见似有理由，你

们觉得如何，望告”。7 月 4 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刘伯承、邓小平、陈毅和华中分局电，就明确提出：“我先在内线打几个胜仗再转至外线，在政治上更为有利”。就这样，改变了中央军委原定的战略计划，先在内线打几个胜仗的战略计划决定下来了。后来苏中七战七捷的实践证明，粟裕等人的建议是完全正确的。毛泽东采纳良策，及时改变原定战略计划的决策也是十分英明的。

为争取和平民主而牺牲的斗士精神不死

随着国民党反动派对解放区疯狂进攻的同时，蒋介石集团又对大后方的爱国民主人士加紧了血腥镇压。1946 年 7 月 11 日，国民党特务在昆明街头，用美制无声手枪暗杀了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救国会“七君子”之一的李公朴。不几天，7 月 15 日国民党特务又在昆明光天化日之下，枪杀了中国民主同盟另一位中央委员、西南联大教授闻一多。在不出 5 天的时间里，两位著名的民主人士连遭杀害，全国震惊，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怒，各地群众纷纷起来声讨国民党反动派卑劣的暗杀行径。

当得知李公朴被暗杀的消息后，毛泽东同朱德于 7 月 13 日联名致电李公朴先生的夫人张曼筠：“惊悉李公朴先生为反动派狙击逝世，无限悲愤！先生尽瘁救国事业与进步文化事业，威武不屈，富贵不淫，今为和平民主而遭反动派毒手，是为全国人民之损失，抑亦为先生不朽之光荣。全国人民必将以先生之死为警钟，奋起救国，即以自救。”

李公朴的尸体尚未火化，闻一多又牺牲了。消息传到延安，毛泽东同朱德于 7 月 17 日马上联名打电报给闻一多夫人，表示哀悼。电文说：“惊悉一多先生遇害，至深哀悼。先生为民主而奋斗，不屈不挠，可敬可佩。今遇奸人毒手。全国志士必将继先生遗志，再接再励，务使民主事业克底于成。”同日，延安《解放日报》发

表了题为《杀人犯统治》的社论。这一天，延安各界还举行盛大的追悼李公朴、闻一多烈士的反内战反特务大会。

很快，追悼李公朴、闻一多烈士的活动席卷全国各地，并波及全世界。这是代表千千万万人的悲恸，来哀悼中国人民光荣的民主斗士；这又是代表千千万万人的愤怒，来抗议蒋介石反动统治集团镇压民主、扩大内战的罪行。

10月5日，上海各界5千多人，隆重举行追悼李公朴、闻一多烈士大会。毛泽东、朱德敬送挽联："为保卫政协争取和平民主而牺牲的斗士精神不死！"

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

1946年上半年，国民党军队继续在许多地方向解放区进攻，在东北进攻的规模更大，形成关内小打，关外大打的局面。同时，美国用极大力量运输和装备国民党军队。到了1946年6月底，蒋介石认为自己已经有了充分准备，认为可以在3个月至6个月的时间内消灭全部人民解放军，就以6月26日大举围攻中原解放区为起点，发动了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大战伊始，国民党方面的总兵力为430万人，其中正规军248个旅，约200万人。中共方面，总兵力只有127万人，其中正规军只占一半，约61万人。国共双方的兵力，为三点四比一。全国大多数中间派对此忧心忡忡，普遍认为形势对中共不利，中共即使不被消灭，也将遭受严重打击，十年内战的历史又将重演。

但是，毛泽东不这样认为。他在7月20日起草的《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的党内指示中就指出："蒋介石虽有美国援助，但是人心不顺，士气不高，经济困难。我们虽无外援助，但是人心归向，士气高涨，经济亦有办法。因此，我们是能够战胜蒋介石的。全党对此应当有充分的信心。"

8月的一天，正当蒋介石的百万大军在关内各个战场上凶猛

地进攻中共军队的时候，毛泽东在延安的窑洞前，一棵苹果树下平坦的土台上会见了来访的美国女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进行了一次历史性的谈话。由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任翻译。

斯特朗问：你觉得中国的问题，在不久的将来，有政治解决、和平解决的希望没有？

毛泽东答：这要看美国政府的态度。如果美国人民拖住了帮助蒋介石打内战的美国反动派的手的话，和平是有希望的。

问：如果美国除了它所已经给的以外不再帮助了，那末蒋介石还可以打多久？

答：一年以上。

问：共产党能支持多久？

答：就我们自己的愿望说，我们连一天也不愿意打。但是如果形势迫使我们不得不打的话，我们是能够一直打到底的。

问：如果美国人民问到共产党为什么作战，我该怎样回答呢？

答：因为蒋介石要屠杀中国人民，人民要生存就必须自卫。这是美国人民所能够理解的。

谈话进行得很顺利。当他们谈到中共军队从蒋军手里缴获了美国武器时，毛泽东称之为“输血”。他说：“由美国输给蒋介石；又由蒋介石输给我们。”当他们谈到“美帝国主义”时，毛泽东说：它变得孤单了。它有那么多朋友都死了或病了，连盘尼西林也不能治好他们。当他们谈到“反动统治者”时，毛泽东说：“他们是纸老虎。看起来可怕，一场雨就完了。”这是他第一次用“纸老虎”这个词，说完之后还停下来，问斯特朗是否领会了它的确切含义。陆定一最初把它译成“稻草人”。毛泽东请斯特朗解释什么是“稻草人”。听过解释后，毛泽东表示不赞成这个英文词。他告诉斯特朗，他所说的是纸老虎不是呆立在地里用来赶鸟和吓唬小孩子的稻草人，而是样子象一头凶猛的野兽，但实际上是纸糊的，一遇水就软了。

毛泽东解释后，在谈话中继续使用“纸老虎”这个词。他说

在俄国二月革命以前，沙皇看上去强大而可怕，但是一阵二月的雨就把他冲跑了。希特勒也被历史的暴风雨冲走了。日本帝国主义也是如此，他们都是纸老虎。毛泽东用英语说："蒋介石也是纸老虎"。斯特朗问：我是不是可以报道说，毛泽东说蒋介石是纸老虎？

毛泽东回答：不要只是那么说。你可以说，如果蒋介石维护人民的利益，那末他就是铁老虎。如果他背弃人民，发动反人民的战争，就象他现在做的那样，那末他就是纸老虎，就会被雨冲跑。

斯特朗最后问，中共能否在这场战争中取胜？毛泽东没有预言何时能取得胜利，但以坚定的语气告诉斯特朗：拿中国的情形来说，我们所依靠的不过是小米加步枪，但是历史最后将证明，这小米加步枪比蒋介石的飞机加坦克还要强些。虽然中国人民面前还存在着许多困难，中国人民在美帝国主义和中国反动派的联合进攻下，将要受到长时间的苦难，但是这些反动派总有一天要失败，我们总有一天要胜利。这原因不是别的，就在于反动派代表反动，而我们代表进步。

听盲艺人说书

韩起祥是普普通通的盲艺人，住在陕北张家窑子村。1946 年 8 月的一天，毛泽东派专人请他去说书。来人拉过马对韩起祥说："毛主席用自己骑的马来接你"。韩起祥心里非常激动，骑上毛泽东派来的马，来到了杨家岭。

一位同志先陪韩起祥去吃饭，端来的是小米饭、炒洋芋和西红柿。那位同志告诉他："这是毛主席吃的饭，今天招待你。"韩起祥心里又是一热：毛主席为人民日夜操劳，吃的却这样普通、简单！

吃完饭，韩起祥被人请到中央大礼堂。他虽然眼睛看不见，但

觉得人很多，听众中间还有日夜思念的毛主席哪！韩起祥说了两段书，是歌颂解放区民主政权领导妇女翻身的《张玉兰参加选举会》和关于重庆谈判的《时事传》。韩起祥今天说得特别带劲，说完后，毛泽东来到他的身边，紧紧握住了他的手夸奖他说得好。还看了看他用的三弦说："全国解放后，给你买个新的。"并鼓励他好好学习，多带徒弟，多多编写和演唱工农兵。最后还对工作人员说："老韩睡惯了炕，睡床板可能不习惯，多给他铺些被褥，暖和些。"毛泽东的无微不至的关怀感动得韩起祥流下了热泪。直到解放后，毛泽东仍惦记着这位盲艺人，专门派人帮他学盲文，让他能够更好地学习和工作。

韩起祥为了纪念这次亲切的接见，他编写了新书词《毛主席给我指方向》。

苏中七战七捷

1946年7月13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陈毅，张云逸等电：周恩来7月10日自南京来电，说国民党拟于本月12日开始大举进攻苏皖区。望充分注意。同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再致陈毅、张云逸等电："苏北（指长江以北的江苏北部——引者）大战即将开始，蒋军将由徐州向南，由津浦向东，由江边向北，三方面同时动作，先求解决苏北，然后打通津浦、平汉。在此情况下，待敌向我苏中、苏北展开进攻，我苏中、苏北各部先后在内线打起来，最好先打几个胜仗，看出弱点，然后我鲁南、豫北主力加入战斗，最为有利。"电报还指出："一切作长期打算，争取最后胜利"。华中野战军司令员粟裕接到这两封电报后，感到大战将从苏中开始，毛泽东在电报上写着"先打几个胜仗，看出敌人弱点"，实际上赋予了在苏中作战的任务，据此粟裕等于当天毫不犹豫地发起苏中战役。

7月13日夜，华中野战军主力第一、第六师各以5倍于敌的

兵力分别向宣家堡、泰兴守敌整编第八十三师之第十九旅发起攻击。经激烈战斗，至15日拂晓，歼敌第十九旅两个团，攻克宣家堡，首战告捷。

毛泽东对此战役十分关注。战斗结束后，他便亲拟电文询问：打的是否即整编第八十三师？该师被消灭了多少？尚存多少？粟裕等在清查战果之后，一一作了汇报。宣泰战斗结束的当天，即7月15日毛泽东致电粟裕："此次泰兴作战不论胜败如何，均须于结束战斗后，立即整理部队，准备再战。即使打了大胜仗，也要如此，因敌人会继续进攻，我军在南线准备打四五个大胜仗，方能解决问题。"

华中野战军遵照毛泽东的指示，连续作战。此时，北援之敌整编第六十五师已迫近泰兴。靖江之敌第九十九旅向黄桥前进；南通之敌整编四十九师向如皋进犯。我决定停攻泰兴，以一部兵力牵制北进之整编第六十五师及第九十九旅，我主力以4倍于敌的兵力迅速东进，于18日以突然之行动，将敌第四十九师包围于如皋以南。经19、20日两日激战，歼灭该师师部及第二十六旅全部、第七十九旅大部共1万余人。

7月21日，中央军委、毛泽东发来贺电："庆祝你们打了大胜仗。"并指示华中野战军："敌情尚严重，望将参战主力集中休整，补充缺额，恢复疲劳，以利再战。"

如皋南战斗后，华中野战军主力转至海安东北地区休整。7月30日，敌军自如皋、姜堰合围海安。同日，毛泽东起草中央军委给华中野战军指示电："在我军主力未获充分补充休息、恢复疲劳以前，及敌未进至有利于我之地形条件之前，宁可丧失一些地方，不可举行勉强的无把握的作战。此次粟裕部歼敌二万，打得很好，今后作战亦不要过于性急，总以打胜仗为原则。"根据这一指示，我军以一部在海安以西以南实行运动防御，阻击5天，因不便歼敌，于8月3日主动撤出海安。此时，陈毅从执行外线出击的方针考虑，认为淮南在全局上比苏中更为重要，而淮南解放区已被

敌人突破，为此向中央建议：粟部迅速西调，仍以切断津浦、陇海，开展淮上新区，夺取徐州为目的。毛泽东对这个建议，态度极为慎重，他回复陈毅："粟裕集团应否于此时调动，各有利害，待考虑再告。"不日，中央军委致电粟裕："对苏中目前即取防御方针，由你率主力与陈军长会合，集中力量打开淮北局面；或出淮南，切断蚌浦线，直接配合陈宋、刘邓之作战，这是一个方案"；"八月内在苏中再打一仗，然后西移，这是又一方案"。要粟裕就以上两案表示意见。当时李堡战斗正在进行中，粟裕从战争全局出发，结合当时的实际情况，作了反复考虑，最后还是主张在苏中再打几仗的意见。并于8月14日报告了中央军委。次日，中央军委、毛泽东批准了粟裕等的建议："所思很对。望利用苏中各种有利条件，继续在那里作战，如你们今后一个月内再打二三个胜仗，继续歼敌二三个旅，则对整个战局助益极大。"这时陈毅也来电指示："宜就地开展局面，不必忙于西调。"

8月7日，国民党军在调整部署中以一部冒进华中野战军主力隐蔽集结之海安以东地区，粟裕即电告中央军委"歼敌良机已到"，并希望调淮南第五旅在苏中参战。次日，毛泽东复电表示："歼敌良机已至，甚好甚慰"。"如连续歼敌两个旅有便利条件，则可连续歼敌两个旅，否则可先歼其一个旅，休息数日再找机会歼其另一个旅。""预备部队或钳制部队如有可调者，望张、邓、谭尽可满足粟之要求，集中最大兵力于主要方向。"10日晚，华中野战军主力向李堡发起攻击，至11日下午将两个旅部及两个团全部歼灭。

8月12日，毛泽东接到苏中李堡战斗胜利的消息后，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粟裕等电，庆祝在苏中取得的第二次大胜利〔实际上已取得宣家堡和泰兴战斗、如（皋）南战斗、海安战斗的胜利，因战斗的连续进行，当时把上述战斗合称为苏中第一次胜利。〕同日，毛泽东又为中央军委起草致陈毅等电，指出："粟裕军前日在苏中第二个胜仗，不但使苏中蒋军陷入极大困难，亦将使淮南

第五军无法北调。”“粟部在苏中民情熟悉，补给容易，地形便利，苏中敌军装备亦比第五军差，较易取胜。马上调淮南，因敌人硬，地势险，不一定能完成切断蚌浦路任务。不如令粟部再在苏中作战一时期，再打一二个胜仗，使苏中蒋军完全转入守势，保全苏中解放区，对全局有极大利益。这样配合淮北作战，更为有利。”8月13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致粟裕等电，指出：“苏中各分散之敌利于我各个击破，望再布置几次作战。即如交通总队凡能歼灭者一概歼灭之。你们如能彻底粉碎苏中蒋军之进攻，对全局将有极大影响。”

在毛泽东指示电的鼓舞下，华中野战军于8月21日又发起丁（堰）林（梓）战斗，当日结束，歼敌5个交通警察大队共5千余人，切断了南通至如皋的公路，打开了主力西进黄桥的通道。

8月23日，敌整编第二十五师进攻西边的邵伯，企图直扑高邮、宝应。我军为粉碎敌对邵伯等地的进攻，遂转兵向西进攻敌后，袭击泰州，以吸引敌整编第二十五师回援而歼之。在我向西转移中，和敌第九十九旅、第一八七旅及第七十九旅之一个团遭遇，我当即将敌分别包围于分界、加力地区，以各个歼敌的战法，共歼敌两个半旅约1.7万余人。8月23日至26日，北犯邵伯之敌遭我顽强抗击，被迫停止进攻。

至此，历时一个半月的苏中战役结束。这一战役，华中野战军同优势敌人连续进行七次战斗，先后歼敌6个旅、5个交警大队共5万余人，占敌军进攻苏中解放区的全部兵力的五分之二，被誉为苏中“七战七捷”。

苏中战役结果表明，毛泽东提出的集中优势兵力歼敌的作战原则和作战方法是完全可行的。8月28日，毛泽东即向全军通报了苏中战役的经验。他指出：“我粟谭军从七月十三日至八月二十七日一个半月内，作战六次（未将邵伯保卫战斗算在内——引者），歼敌六个半旅及交通总队五千，造成辉煌战果。而我军主力只有十五个团。但这十五个团是很充实与很有战斗力的，没有采

取平均主义的补充方法。每战集中绝对优势兵力打敌一部（例如八月二十六日集中十个团打敌两个团，八月十七日集中十五个团打敌三个团），故战无不胜，士气甚高；缴获甚多，故装备优良；凭借解放区作战，故补充便利；加上指挥正确，即灵活又勇敢，故能取得伟大胜利。这一经验是很好的经验，希望各区仿照办理，并望转知所属一体注意。”

接见延安解放前的大地主张永泰

延安解放前的大地主张永泰在土地革命时被分配了土地和耕牛，他曾一度怀恨在心。以后经过参加劳动，认识有了转变，通过辛勤劳动，家庭生活也很好，并被选为植树英雄。1946年9月10日下午，毛泽东接见了张永泰及其他的孙子。张永泰向毛泽东送上自己种的桃子和葡萄，并汇报了自己思想转变的过程。毛泽东听了，表示赞许说：“分配过土地的地方，再不分了。你明白分配土地是为了大家过好光景，道理很对！”谈话后，毛泽东还和张永泰爷孙俩共吃晚饭。

自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即《五四指示》）以来，就决定把减租减息政策改为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的政策。但中共中央表示在没收地主土地的同时，必须“公开宣布保障地主在土地改革后必需的生活”。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缓和地主逃亡，分化地主内部，并减少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和中间人士的动摇怀疑，以巩固反对内战独裁、争取和平民主的统一战线，使土地问题得到顺利的解决”。

为缓和矛盾，毛泽东还曾考虑以有偿赎买方式解决地土问题。6月27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周恩来、叶剑英的电中指出：“中央正考虑由解放区发行土地公债发给地主，有代价地征收土地分配农民。其已经分配者，补发公债，如此可使地主不受过大损失。惟汉奸、土豪劣绅、贪官污吏、特务分子不在此例。你

们可向中间派非正式透露此项消息。”据此，中共中央于7月19日发出《关于要求各地答复制定土地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的指示》，提出以赎买方式解决土地问题的设想，并要求各地迅速研究其实施的可能性电告中央。中共中央还于同一天给周恩来、董必武发出指示，向民盟人士说明：“我党中央正在研究和制定土地政策，除敌伪大汉奸的土地和霸占土地与黑地外，对一般地主土地，不采取没收办法。拟根据孙中山照价收买的精神，采取适当办法解决之，而且允许地主保留一定数额的土地。对抗战民主运动有功者，给以优待，保留比一般地主更多的土地”。

但是，后因全面内战爆发，各地反映情况不一，有些地区要求暂缓发布新政策，因而以赎买方式解决土地问题的尝试未能实现。

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

在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中，除制定作战计划外，毛泽东考虑得最多的则是为中共军队规定正确的作战方法和作战原则。

1946年7月20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对党内的指示中告诫全党：“战胜蒋介石的作战方法，一般地是运动战。因此，若干地方、若干城市的暂时放弃，不但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必要的。暂时放弃若干地方若干城市，是为了取得最后胜利，否则就不能取得最后胜利。此点，应使全党和全解放区人民都能明白，都有精神准备。”指示还指出：“为着粉碎蒋介石的进攻，必须和人民群众亲密合作，必须争取一切可争取的人”，“必须作持久打算”。

9月16日，毛泽东为全面阐述中共军队必须遵守的作战方法和作战原则，专门起草了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对党内的指示。指示一开头就指出：“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方法，

不但必须应用于战役的部署方面，而且必须应用于战术的部署方面。”为进一步认识到集中兵力歼灭敌人的好处，毛泽东解释说：“这种战法的效果是：一能全歼；二能速决。全歼，方能最有效地打击敌军，使敌军被歼一团少一团，被歼一旅少一旅。对于缺乏第二线兵力的敌人，这种战法最为有用。全歼，方能最充分地补充自己。这不但是我军目前武器弹药的主要来源，而且是兵员的主要来源。全歼，在敌则士气沮丧，人心不振；在我则士气高涨，人心振奋。速决，则使我军有可能各个歼灭敌军的增援队，也使我军有可能避开敌军的增援队。在战术和战役上的速决，是战略上持久的必要条件。”毛泽东还指出：“集中兵力各个歼敌的原则，是我军从开始建军起十余年以来的优良传统，并不是现在才提出的。但是在抗日时期，我军以分散兵力打游击为主，以集中兵力打运动战为辅。在现在的内战时期，情况改变了，作战方法也应改变，我军应以集中兵力打运动战为主，以分散兵力打游击战为辅。而在蒋军武器加强的条件下，我军必须特别强调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方法。”

毛泽东于10月1日，为总结1946年7月全国规模内战爆发以来的三个月战争的一系列经验，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三个月总结》的党内指示。关于作战方法和作战原则，指示总结说：“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是过去三个月歼敌二十五个旅时所采用的唯一正确的作战方法。我们集中的兵力必须六倍、五倍、四倍、至少三倍于敌，方能有效地歼敌。不论在战役上、战术上，都须如此。不论是高级指挥员，或中下级干部，都须学会此种作战方法。”

毛泽东提出并反复强调的这一作战方法和原则，成为中共军队在解放战争中克敌制胜的重要法宝。

主要应澄清悲观思想指出必胜前途

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将要在1946年9月12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的题为《蒋军必败》的社论，送交毛泽东审阅，并附一信说："在战争过程中，宣传上主要目标，为揭露美国，澄清同志对美的各种幻想。"

9月11日，毛泽东读了这篇社论和陆定一的信，写了如下批语："不但澄清对美幻想，主要应澄清悲观思想，指出必胜前途，这是目前的中心问题。"

事过不久，9月27日，毛泽东还就一篇文章如何修改，致信陆定一。全信内容如下："文章的写法宜改变，因为在解放区军民中目前的中心问题不是对美蒋的幻想问题，存在这种幻想的时期已经过去了；向军民描写美蒋怎么厉害，怎么凶，这在七月以前是必要的，七月以后则 不但不必要，且有副作用了。目前解放区军民心目中的中心问题是能否胜利与如何取得胜利，尤其是在失了一些地方之后大家很关心。因此我们的文章与新闻立论之重点，不是说敌人如何压迫，如何凶狠，而是要解释敌人虽有二百师兵力，虽有美国援助，虽已经占去了一些地方与还可能占去一些地方，但是有种种条件我军必胜蒋军必败。每遇一次胜利，即写一篇社论鼓励之，证明之；每失一重要地方即写一短文解释之，说只要歼敌，将来可以恢复。以上方针，请加考虑，并与乔木、光生商酌实行。至于为揭破美蒋欺骗，可借进攻张家口事件写文揭发，但归结仍应强调我军必胜，方不泄气。"

坚决反对召开伪国大

毛泽东于1946年11月8日致电南京中共代表团，问询蒋介石是否拟于11日为召开伪国大下虚伪的停战令？并说：我们准备

事先揭穿他。但蒋介石提前于当日发表声明，宣布其一党包办的“国民大会”将于11月12日如期召开，并发布所谓“停战令”。事实上，蒋介石正命令胡宗南率部向陕甘宁边区进攻。

11月10日，中共中央发言人廖承志发表声明指出：“此次停战令和历次的一样，不是什么‘停战令’而是继续大打的作战令。”“如果蒋介石欲证明他对和平具有诚意，那么，他就应当：(一) 下令停开一党包办的所谓国大。(二) 恢复一月间第一次停战位置。”

11月11日下午，蒋介石宣布，应第三方面的要求，国大延期3天召开。实际上他想多拉几个第三方面的人参加国大。作为第三方面的中坚力量民盟始终同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拒绝参加违背政协决议的国大。

11月12日，毛泽东起草中共中央致南京中共代表团电，指示：“蒋之‘国大’开会后，你们即可回延，留董老在宁主持。”

11月15日，国民党一党包办的所谓国民大会在南京召开。它实际上宣告了抗战结束以来长达15个月的国共和谈从此结束。

同一天，毛泽东起草中共中央致南京中共代表团电：“‘国大’已开会，除董及少数人留京外，周及其余各人宜即回延。”第二天，周恩来在南京梅园新村举行了告别性的中外记者招待会，宣布：中国共产党坚决不承认这个“国大”，和谈之门已被国民党最后关闭了，中共代表将于近日返回延安。

11月18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给各中央局的指示，指出：中国人民坚决反对蒋介石一手包办的分裂的“国民大会”，此会开幕之日，即蒋介石集团开始自取灭亡之时。指示说：蒋介石军队在被我歼灭了35个旅之后，在其进攻能力快要枯竭之时，即使用突袭方法，占领延安，亦无损于人民解放战争胜利的大局，挽救不了蒋介石灭亡的前途。总之，蒋介石自走绝路，开“国大”、打延安两着一做，他的一切欺骗全被揭破。这是有利于人民解放战争的发展的。

毛泽东的这个指示，第一次将“自卫战争”改称为“人民解

放战争”，并指出蒋介石灭亡的前途。

在枣园后沟召开的三人重要会议

1946年11月21日，毛泽东从枣园迁居枣园后沟。这一天，是周恩来刚从南京返回延安的第三天。毛泽东决定召集中央书记处书记刘少奇、周恩来在新迁的窑洞里开一个重要会议，主要议题是对一年多来的国共和谈作出恰当的评价，确定中共今后的方针。

在三人会议上，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一致认为，前一阶段参加和谈是必要的，也有成绩、有收获的。毛泽东认为：南京谈判有成绩，达到了教育人民的目的。代表团不能早回来，一定要开“国大”以后才能回来。这样，战争和分裂的责任才清楚，才不至失去人心。

接着，三位领导人进一步分析了国共两党的基本情况和时局的发展方向。毛泽东说：我们的条件比之抗战时期是更好些，统一战线比那时更广泛。很多人以前不理我们，现在要来理我们。我们在国际国内都有广大的统一战线，这是基本问题。

随后，毛泽东把话题转到军事形势。他说：战后的世界变为美国反动派与世界人民的对立，在中国也反映这种对立，因此中国的斗争与世界有密切的联系。中国人民中间以及我们党内都有打不打的问题，但这个问题现在是解决了，剩下的问题便是胜不胜。现在揭破蒋的阴谋，清除和平幻想已退为第二位的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要建立坚定的胜利的信心。我们说中美反动派外强中干，要藐视他们，这不是为了单单安慰鼓励自己，而有其事实根据。世界在进步，苏联在高涨，美国在面临危机；美国与资本主义世界的矛盾将成为世界的主要矛盾。因此我们的统一战线是宽广的。我们的问题是要熬过明年一年，后年就要好转。美蒋威信降低之速是出乎意外的，世界进步（在欧洲、亚洲各国）之速是出乎意外的。在土地问题上也并不妨碍我们团结地主，抗战时

期减租减息也得罪了地主，但仍可以团结。现在土改完成后，在明年也可以对地主大拉一把，照顾他们的生活，让他们一样可以生产、富足起来。在军事上，歼灭战已经经历了事实的证明，过去至今已歼灭了38个旅，占75个旅的过半数。蒋介石的攻势是可以战胜的，经过半年到一年，消灭他七八十个旅，停止他的进攻，开始反攻，把他在美国援助下七八年的积蓄一年内打破，达到两党平衡，这是很便宜的事。

对于今后的趋向和中共的方针，毛泽东看法既相当谨慎，又十分坚定。他说：达到了平衡就是很容易超过。那时我们就可以打出去，首先是安徽、河南、湖北、甘肃。然后就可以再向长江以南，约需3年到5年的时间。现在是否打倒蒋介石？做此工作而不提此口号，口号仍是1月13日停战位置与政协决议。宁可把困难估计得艰难一点，消灭75个旅以后，美国还会加强援助，新的困难又会来，因此不但要准备3年到5年，还要准备10年到15年。

毛泽东在这次谈话中，第一次提出做打倒蒋介石的工作。但考虑到当时国共关系尚未完全破裂，决定暂不公开宣布“打倒蒋介石”的口号。将这一口号公诸于众，是在一年以后的事。那时，蒋介石垮台不仅已成定局，而且指日可待了。

“打”的方针确定了，至于如何“打”，毛泽东在三人会议上作了说明。除了早已实行的行之有效的战略战术外，毛泽东又指出：解决土地问题，这是一切的根本。对国民党一方面要藐视他们，非此不足以长自己志气，灭他人威风；而另一方面要重视他们，每一仗都要谨慎。毛泽东还强调一切都要按长期战争打算。如果我们打掉他75个旅，他可能又要谈判，而我们亦不能拒绝。麻烦仍是长期的，不是蒋介石的问题，而是帝国主义的问题。

采纳陈赓“围魏救赵”之计

1946年11月上旬，在南京的国民大会召开前夕，蒋介石为对中共施加压力，命令胡宗南从晋南抽4个旅到陕北，准备会同原来包围陕甘宁解放区的部队，突袭延安。

为保卫延安，粉碎蒋介石的阴谋，中共中央电令陈赓率第四纵队驰援延安。但陈赓却没有立即西渡黄河，他提议乘胡宗南抽兵、晋西南地区敌人力量空虚，先打一仗，迫使胡宗南回援，以打乱其突袭延安的部署。陈赓认为如胡宗南不为所动，四纵再渡河西进，参加延安保卫战，时间也未晚。陈赓用的是“围魏救赵”之计，他的建议得到了毛泽东的赞同。

毛泽东很了解陈赓，他多次赞扬陈赓巧妙的指挥战法。10月25日，他在致聂荣臻等通告胡宗南部入晋后动向的电报中说：“我陈赓纵队原拟歼击北上之敌，因敌七个旅密集行军不好打，故转入临汾以南打敌后路，收复大部失地，亦是威胁敌人之好方法。”

11月10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陈赓、谢富治电，指出：“你们到吕梁后看情况，如胡军向延安急进，则你们亦急进；如胡军缓进，则你们可攻占吕梁各县，待命开延。”

11月24日，在获悉胡宗南又令整编第一师从陕西禹门口东渡返回晋西南后，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致陈赓、谢富治电，指出：“务于数日内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占隰县、蒲县、乡宁、吉县、大宁等五县，并准备在蒲县、乡宁地区歼灭整一师可能向我进攻之部队。”

陈赓等率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四纵队于11月22日起，在晋西南发起吕梁战役，在三五九旅、独立旅的配合下，连克中阳、石楼、永和、大宁、隰县、蒲县等县城，把吕梁地区国民党军搅了个人仰马翻。胡宗南见主力侧背受到威胁，不敢冒然实施突袭延安的计划，并急令已调入陕的整编第一、第九十师东返晋西南。

毛泽东为再次肯定陈赓的作战计划，于11月26日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陈赓、谢富治并告晋绥军区第二纵队司令员王震、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教导旅长罗元发电，指出：要使全体指战员“人人明白，发展吕梁区是保卫延安、巩固太岳的重要条件”。

自12月中旬起，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四纵队、晋绥野战军、太岳野战军各一部在晋西南抗击进犯的胡宗南部。12月19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致陈赓、谢富治、王震等电，通告向吕梁地区进攻的国民党军动向，并指出：“此次作战，不但保卫吕梁，而且有保卫延安意义。你们应迅速集中兵力于蒲县附近地区，准备连续战斗，以歼灭敌两个旅为目标。”

12月26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致陈赓、谢富治、王震电：“你们最近两仗打得很好，每次歼敌一个营，若能再打几个这样的仗，就可等于一个大胜仗。”

12月28日，进入吕梁地区的胡宗南部被迫撤退，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四纵队又将其后卫第六十七旅歼灭。同日，毛泽东又为中央军委起草致陈赓、谢富治、王震电：“（一）你们在蒲县又歼敌一营，并缴获大批骡马，甚好甚慰；（二）前后几次作战有功将士望传令嘉奖。”

由于采纳陈赓“围魏救赵”之计而引发的吕梁战役，于1947年1月1日结束，共歼敌1万余人，彻底粉碎了蒋介石突袭延安的阴谋。

与西方记者的问与答

1946年12月9日，毛泽东会见西方记者郝戈登、罗德利、陈依范，就他们提出的问题作了简要的回答：

问：国民党是否仍然企图进攻延安？

答：进攻延安的计划是早已定了，还要打，但有很大可能把进犯的军队给打垮。

问：中国国内局势是否就要打下去？

答：是要打下去，因为人家要打。中国共产党现在的方针仍然是尊重政治协商会议的路线，并为恢复一月停战协定的位置而奋斗，现在召开的非法的分裂的“国民大会”，应该解散。

问：中国共产党是否不受停战协议的拘束？

答：停战协定早已让人破坏了，我们当然不再受它拘束，将来的谈判就是看战争的结果而定。

问：美国人支持蒋介石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排外的缘故吗？

答：共产党并不排外。现在有两种美国人，马海德、李敦白、史沫特莱、斯特朗这样的美国人我们都欢迎。不光是这样的人，就是反对我们的人，我们也愿意让他们到解放区来看一看，只要做一些比较公道的报告就对我们有好处。希望记者都成为人民的代言人，而不要成为反动派的代言人。

问：人民代表会议是否准时召开？

答：现在还没有召开，将来是一定要召开的，因为它是人民的代表会议，至少也要总结一些工作经验。

问：中国共产党为什么反对中美条约（指1946年11月4日国民党政府与美国政府在南京签订的《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将来共产党得势后是否废除这一条约？

答：中美条约是不平等条约，将来一定废弃。11月4日是中国新的国耻纪念日。这个商约应该废止，另订平等条约。

问：现在世界局势是否还是有利于民主运动发展？

答：现在更高涨了。从今年2月至今美国帝国主义分子所干的一套都是违背人民意志的，快要失败了。美国反动分子与美国人民是有区别的，反动分子想独霸世界，势必引起全世界人民的反对。现在美国反苏是放烟幕弹，想独霸世界，首先就是损害中国和英国的利益，其次就是美苏间的中间地带。

问：是否欢迎英国对中国进行调解？

答：英国现在没有勇气反对美国政策，跟着美国走；中国问

题还是由中国人自己解决，但欢迎外国的技术帮助。

问：中国共产党对香港问题态度如何？

答：现在不提出立即归还的要求，将来可按协商方法解决。

1947 年

从新的观点出发研究法律甚为必要

毛泽东十分重视法律工作，这从他同法学家陈瑾昆的交往中就可以看出。

1947年1月16日，毛泽东致信陈瑾昆："大示诵悉。从新的观点出发研究法律，甚为必要。新民主主义的法律，一方面与社会主义的法律相区别，另方面，又与欧美日本一切资本主义的法律相区别，请本此旨加以研究。"毛泽东在这封信中还告诉陈瑾昆："目前美蒋所提和谈，如过去一切和谈一样，全属欺骗性质，因其军事失败，企图收得休息时间，整军再战，我们切不可上当。"

陈瑾昆教授于1946年由北平到张家口。他曾到延安会见毛泽东。毛泽东答应同他合作办法律大学。当毛泽东听到陈瑾昆已到张家口的消息后，便于1946年9月20日致电晋察冀中央局，询问陈瑾昆教授的情况，并要中央局向陈教授解释，因战争紧张，合作办法律大学暂时不能开办了，同时托中央局向他转致问候，并在生活上给予优待。9月22日，毛泽东谈到陈瑾昆写的《余为何参加中共工作》一文，深受感动，当即写信给陈瑾昆，赞扬这篇文章"义正词严，足以壮斗士之志，夺奸邪之魄"；还说"拟付《解放日报》发表，并广播全国"。当时蒋军正大举进攻张家口，所以毛泽东邀请陈瑾昆来延安"共策工作之进行"。

陈瑾昆接信后，于10月抵达延安。10月30日，中共中央在延安中央礼堂举行干部晚会，庆祝邯郸起义一周年，并欢迎抵达延安的以范龙章为首的民主建国军参观团和法学家陈瑾昆教授。陈瑾昆在延安，任中共中央法律委员会委员。

第二次接见起义军官

1947年春节后不久的一天晚上，毛泽东由枣园后沟来到杨家

岭，在中央办公厅的会议室里，接见了高树勋部下范龙章率领的民主建国军参观团。

高树勋原是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于1945年10月30日在邯郸战役中率部起义。在起义一周年的时候，他们组织了一个代表团，由范龙章率领来到延安。1946年10月31日，延安专门召开了庆贺邯郸起义一周年晚会。毛泽东、朱德等亲自出席，同参观团的起义军官们见面。从那以后，这个参观团在延安住了4个月，参观访问了不少地方。现在，由于胡宗南的进攻，他们就要离开延安了。临走之前，这些起义军官们很想再见一见毛泽东，请毛泽东给他们作些指示。

毛泽东一走进会场，全场掌声响成一片。毛泽东笑容满面地招着手，走到起义军官们身边，和他们一一握手，然后到了坐位跟前，微笑着伸出两个指头说："我们已经是熟人了，这是第二次见面！"一阵轻松愉快的笑声和热烈的掌声过后，毛泽东接着说："上一次见面没有讲话嘛，今天就要补一次了！"

毛泽东首先赞扬了他们的起义，说：你们都有过打日寇的光荣，现在不愿意戴起美国帽子打中国人，人民称赞你们这一义举！毛泽东打着生动的比喻说：中国好象是一条河，现在河里有两条船在朝不同的方向开着。原来你们所乘的蒋介石的那条船，是逆着潮流，背着风向，已被风浪打击得破烂不堪，现在快要翻了。你们这些船伙伴，是识大义、辨利害的人，从蒋介石那条船，跳到人民这条船上来了，从此就可以一帆风顺。

接着，毛泽东讲起人心向背的问题。他说：要为人民服务，就要讲政治啊！什么是政治呢？政治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人心嘛！这里所说的人心，是指人心向背。过去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中国不得人心，现在蒋介石打内仗也不得人心，目前胡宗南向陕甘宁边区进攻更是不得人心！因为人民是要革命的，是要和平、要民主的，是反对压迫、反对剥削的。我们所进行的自卫战争是正义的战争，人民的心是向着我们的。而一切中外反动派要压迫、剥削广大人

民群众，势必人心丧尽，引得中外广大人民群众起来和他们作坚决的斗争。别看蒋介石、胡宗南这阵子凶得狠，可是，他们终究是纸老虎。违背人民的心愿，同人民作对，到头来是决没有好下场的。历史的发展必然是“得民心者昌，失民心者亡!”

毛泽东进一步讲了兵民一体才能打胜仗的道理。他说：我们人民的军队，是主要依靠群众打胜仗的。军队和群众的关系，好象是鱼和水的关系。鱼离开水就活不成了！八路军、新四军为什么和老百姓关系搞得那样好呢？就是因为我们的军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

毛泽东最后鼓励起义军官们：你们回去还要带兵啊！切不可用军阀那一套办法。官兵要靠在一起，同甘苦，共患难，要使士兵们相信你们。这样的官，威信就高了，你们就能打胜仗!

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

1947 年 1 月 16 日，国民党政府通过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向中国共产党要求重新恢复谈判，并提出互派代表到延安或南京等 4 项条件。同一天，毛泽东在一份电报上写道：“对于美方调停，此时形式上我们虽然尚不公开反对，但实际上应拒绝之”。

1 月 24 日，毛泽东同周恩来致电南京董必武、王炳南并告北平叶剑英：“如美蒋两方再来人催询四条回答，可告他们根本拒绝此四条，非完全接受我方两条（即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恢复谈判的两项条件：（一）废除违反政协决议召开的国民大会制定的宪法；（二）恢复 1946 年 1 月 13 日停战生效时的军事位置。）最低限度的条件，不能开谈。”

由于国民党拒绝共产党的两条最低限度的条件，重新恢复谈判无望。1 月 29 日，美国驻华使馆发言人发表声明，宣布美国代表退出执行停战协定的军事三人小组，并撤出军事调整处执行部。

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于 2 月 1 日召开政治局会议。会议

通过了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的党内指示，以指导全党认清形势。指示指出："目前各方面情况显示，中国时局将要发展到一个新阶段。这个新阶段，即是全国范围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发展到新的人民大革命的阶段。现在是它的前夜。我党的任务是为争取这一高潮的到来及其胜利而斗争"。"这一形势，是在美国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代替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汪精卫的地位采取了变中国为美国殖民地的政策、发动内战的政策和加强法西斯独裁统治的政策的情况之下形成的"。指示强调："为着彻底粉碎蒋军的进攻，必须在今后几个月内再歼蒋军四十至五十个旅，这是决定一切的关键"。指示最后说："我党和中国人民有一切把握取得最后胜利，这是毫无疑义的。但这并不是说我们面前已没有困难。……解放区的某些部分将暂时变为沦陷区或游击区，部分的革命力量可能暂时遭受损失，在长期战争中人力物力将受到消耗。凡此种种，全党同志都必须充分地估计到，并准备用百折不回的毅力，有计划地克服所有困难。反动势力面前和我们面前都有困难。但是反动势力的困难是不可能克服的，因为是他们接近于死亡的没有前途的势力。我们的困难是能够克服的，因为我们是新兴的有光明前途的势力"。

指示华野必要时放弃临沂

鲁南战役后，国民党军侦知华东野战军主力集结在临沂地区，认为临沂是我山东解放区的首府，我必固守。所以蒋介石制定了一个"鲁南会战"的计划，以欧震指挥的 8 个整编师 20 个旅由陇海线北犯临沂；以李仙洲指挥的 3 个军 9 个师由胶济路南犯新泰、莱芜，两个集团南北对进，企图夹击我军主力。

华东野战军的 9 个纵队 24 个师，在司令员陈毅、副司令员粟裕的指挥下，立即作出相应的决策和部署。最初的计划是：将华野主力迅速集中于临沂地区待机，准备在临沂以南迎战当面之敌，以

战斗精神保卫临沂。具体打法是采取诱敌深入，首先引诱其中一路进攻之敌突出冒进，然后集中优势兵力予以围歼。这正如毛泽东在2月3日给陈毅等指示中说的那样："诱敌深入。敌不动我不打，敌不进到有利于我、不利于敌之地点我亦不打，完全立于主动地位。"

但是一连等了好几天，南线敌人却不肯上当，采取了"集中兵力，稳扎稳打，齐头并进，避免孤军突出"的战法。而北线南犯之敌有所不同，也许是李仙洲等人没有吃过中共军队的苦头，胆子比较大，故推进速度较快，先头部队已进至莱芜、新泰一线，对华野的后方腹 地构成了重大威胁，在这种情况下，陈毅、粟裕不得不重新考虑作战计划。

正在这时候，毛泽东于2月4日为中央军委起草致陈毅等电，指出："不管邱（清泉）军到鲁与否，敌愈深进愈好，我愈打得迟愈好；只要你们不求急救，并准备于必要时放弃临沂，则此次我必能胜利。目前敌人策略是诱我早日出去，将我扭打消耗后再稳固地进占临沂，你们切不可上当，必须等候敌进至郯城、临沂之中间地带（比较接近临沂），然后打第一仗方为上策。"

毛泽东的电报显然给华野领导人重新考虑作战计划提供了新的思路。华野领导人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经过慎重研究，决定提出3个方案，陈毅、粟裕、谭震林于2月5日致电中央军委报告3个方案，其中第一、第二方案仍要创造条件，力争在南线歼敌；第三个方案则大胆提出，如南线仍无歼敌机会，便留少数部队在南线牵制敌人，主力急行北上，彻底吃掉李仙洲集团。电报指出："如执行此第三方案，至少可以彻底解决北线敌人，利于我今后全力向南。"

2月6日，毛泽东即起草复电："完全同意五日十五时电第三方案，这可使我完全立于主动地位，使蒋介石完全陷于被动。"并指示待敌占新泰、莱芜后再秘密北上。华野接到中央的复电后，即以第二、第三两个纵队佯装我全军都在阻击敌南线集团，主力秘密北上。

情况果不出所料，敌北线李仙洲集团两个军陷入华野的战役

包围圈。从2月20日起，华野各纵按原定计划向被围的李仙洲集团发起攻击。2月23日晨，李仙洲率被围之敌突围，我遂在莱芜以北设下袋形阵地，诱敌向北突围。当敌后尾脱离莱芜城后，我军即抢占莱芜城，并以东西对进给突围之敌以猛烈攻击。战至下午5时，全歼北线敌第七十三、第四十六两军共7个师5万6千余人，并俘虏李仙洲以下国民党军将级军官19人。又创了一个歼灭战的新记录。

毛泽东于2月24日致电陈毅、粟裕等："李仙洲五万人被歼，极为欣慰。全体将士应予嘉奖。"

可以打两把菜刀

1947年3月11日，美军观察组撤离延安。4小时后，国民党军美制飞机开始轰炸延安，连续轰炸到17日为止。

就在这一天，毛泽东召集中共中央领导人开会研究面对的形势，决定刘少奇、朱德、任弼时、叶剑英等带领一部分机关人员，搬到瓦窑堡的王家沟办公，保证在任何情况下，党的神经中枢都能运转自如。毛泽东、周恩来则为了指挥作战方便，从枣园后沟直接搬到王家坪人民解放军总部，与彭德怀等住在一起。

3月12日天刚亮，成群的敌机又向延安轰炸了。彭德怀多次登上王家坪后山，鼓励防空部队狠狠打击空中强盗，他严肃地对战士们说："这里很重要，毛主席就住在下面！"

警卫战士劝说毛泽东撤离延安，毛泽东说，不忙，现在胡宗南远哩，就是到了跟前，也没有什么可怕的。突然，有几架敌机朝王家坪俯冲过来，3颗燃烧弹落在了毛泽东的院子里，只听一声巨响，四周围全被火光烟雾笼罩了！警卫战士再一次请毛泽东撤离。毛泽东站起来走到门口，看了看院子里正在灭火的战士，又看了看天空，说："你们先去防空洞里避一避，我办完公再说。"然后，又回到桌边，镇定自若地继续工作。这时，有人拿了一块炸

弹片，走进毛泽东的办公室，催请毛泽东上路。他说："主席，你看，这是从院子里拣到的弹片。"毛泽东放下手中笔，接过余热未散的弹片，在手里掂了掂，轻蔑地一笑，说："嗬，这个很好啊，可以打两把菜刀使用！"毛泽东自己不走，却关心着还没有走的其他首长和群众。飞机飞去之后，他对警卫战士们说："你们赶紧去，看看群众受到什么损失没有。"

3月13日，胡宗南军15个旅14万余人，分兵两路，同时沿宜川、洛川一线公路向延安发动进攻。保卫延安的部队利用梢林隘路和纵深工事展开英勇抗击。同时，几十架飞机对延安继续实行狂轰滥炸。彭德怀急调新四旅一个团守卫延安机场，准备歼敌空降兵，并亲自来劝说毛泽东尽早撤离延安。但是，毛泽东回答："我是要最后撤离延安的！"

3月16日，毛泽东搬进石洞办公，将文件、地图随身带着。天还有余寒，毛泽东穿着大衣，戴着帽子，坐在一角，聚精会神地批阅文件。中午，正当毛泽东同周恩来、彭德怀谈话中间，两颗炸弹在门前不远处同时爆炸，门窗玻璃全部震碎，窑洞受到强烈气浪冲击。但是毛泽东仍然稳坐在办公桌旁，他用手在身上轻轻一掸，拂去烟尘，笑着对大家说：他们的风不行，连我一个人也吹不动。我们的风起来就不得了，要将他们连根拔呢！

拿一个延安换一个全中国

西北野战军新四旅在陇东西华池参加歼灭敌四十八旅的战斗后，奉命赶回延安，投入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掩护机关、群众全安转移的新战斗。

1947年3月14日傍晚，毛泽东在王家坪的窑洞里，接见了新四旅部分旅、团领导干部。

一见面，毛泽东就笑着对等待已久的客人们说："让你们等久了。要搬家了，要给胡宗南腾延安嘛，忙一些。"一句话引得大家

都笑起来了。毛泽东问："我们要撤出延安、战士们有些什么意见？"一位团长说："一枪不放，就把延安让给敌人，真有些不甘心！"毛泽东笑着说："你可以放呀，你完全可以放几枪'欢迎'胡宗南嘛！告诉他：我们走了，延安这个包袱，送给你背上吧！"

停了一阵，毛泽东说：延安是党中央所在地。我们在这里住了10年，挖了窑洞，吃了小米，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培养了干部，指导了全国革命，全中国、全世界都知道有个延安。现在我们要主动放弃它，战士们是会有些反应的。但是，一定要给大家讲清楚，我军作战历来不在于一城一地的得失，主要是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毛泽东以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史实为例，说明"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的道理。接着他说："从陕北目前情况来看，敌人来势很猛，兵力很集中，我们一下子还把它消灭不了，因此，中央才决定暂时把延安让给它。但是，这只是暂时的，人们很快就会看到，蒋介石占领延安，决不是他的胜利，而是他失败的开始。我们要拿一个延安换一个全中国。你们回去问问战士，看大家愿意不愿意？

接下去，毛泽东给大家透彻地分析了全国的形势。他说："蒋介石已经损失了60多个旅，71万人，他能用于进攻解放区的机动兵力越来越少了，因此被迫放弃"全面进攻"，改在解放区的两翼：山东和陕北，实行"重点进攻"。这正表明蒋介石已走近穷途末路，离灭亡的日子不远了。毛泽东扳着指头算了一笔帐：蒋介石进攻解放区的兵力共有218个旅，过去8个月，平均每月歼灭它8个旅，如果以后几个月还保持这个平均数，那末等于歼灭它100个旅左右，则军事形势必将发生重大的变化。

到了吃饭的时候，毛泽东请大家吃饭。在饭桌上，毛泽东的谈话又续上了。他指着桌上的饭菜说：这些东西都是我们自己生产的。我们样样自己动手，做到丰衣足食。可是蒋介石、胡宗南不让我们过好生活，来打我们。他要来延安，那就请他来吧！延安就这么几孔窑洞，还是我们自己出力气打的，他也搬不走；要

是他破坏了，那样也好，我们将来好盖大楼。人民永远都是我们的，我们怕什么！毛泽东又诙谐地说：几个窑洞你们都舍不得，将来人家把上海、南京、北平、武汉、西安、广州……都给你们就会舍得吗？那些大城市都是我们的，全中国都是我们的，蒋介石心疼也没办法！

干部们的思想全通了，大家都为毛泽东深入浅出的分析所折服。当干部们向毛泽东告辞时，毛泽东又以十分明确、十分坚定的语气对他们说：回去给全体指战员讲清楚，延安永远是我们的。少则一年，多则两年，我们还要回来的！

我是要最后撤离延安的

在彭德怀劝说毛泽东及早撤离延安时，毛泽东说过一句话：我是要最后撤离延安的！

1947 年 3 月 18 日清晨，在成群敌机轰炸的同时，沉重的炮声和机关枪声也传到了延安城。刚起床，彭德怀就把毛泽东身边的警卫战士找来布置任务。他说：敌人已经很近了，我们今天晚上就撤离延安。现在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都关心毛主席的安全，希望毛主席早过河东，可是他不同意。他不愿在敌人打来的时候离开陕北人民，一定要坚持留在陕北指挥作战。中央还没有最后决定，你们务必做好留在陕北的准备，你们是代表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意志，直接保卫毛主席安全的战士，一定要完成这个光荣的任务！顿了一下，彭德怀又补充一句：主席一向不顾自己，必要时，你们抬也要把他抬走！

上午，毛泽东仍然稳如泰山，继续办公。

午后，敌人的部队已过劳山，正逼近三十里铺，枪声炮声响成一片。司机把吉普车开到毛泽东的住院门口，毛泽东还是那句话："不要忙，枪声还远得很嘛。"

下午 4 点钟，周恩来下达"今晚出发"的命令。

太阳快落山的时候，敌人已经过了二十里铺、十里铺，接近七里铺、宝塔山了。延安的最后一批机关工作人员背上行李，带上文件，迅速向北转移；延安最后一批市民、老乡，捣毁灶台，牵驴挑担，迅速向北疏散；保卫延安的部队，胜利完成了毛主席交给的7天阻击任务，在歼敌5千余人之后也迅速向北撤退。延安，已经变成了座空城，然而这个时候，毛泽东还在延安！

彭德怀、习仲勋来了，劝毛泽东马上走！毛泽东笑着说：好，走，走！但等彭德怀、习仲勋走后，毛泽东又返回了办公室。

警卫战士再次劝毛泽东马上走！毛泽东却亲切地笑着说：不要紧，来得及。大路朝天，各走一边。他走他的，我走我的。他上这个山头，我上那个山头。怕什么！

王震来了，他向毛泽东简要汇报了部队的情况，领受了任务后，催请毛泽东立即离开延安。毛泽东却拉住王震问这问那，好象根本不知道敌人已经兵临城下。

周恩来来了，这次毛泽东同意出发，但有一个条件：吃了饭再走！周恩来知道毛泽东的脾气，只好同意。于是，炊事员又把饭从汽车上取下来，毛泽东同周恩来、王震一起，在延安共进了最后一次晚餐。

晚8时许，毛泽东走出了延安的窑洞，他站在门前，深情地凝望着暮色中的延安古城，问道："老乡们和机关工作人员都走完了吧？"战士们回答："早就走完了，现在就剩我们了！"毛泽东又问大家："你们愿意不愿意离开延安？"还没等大家回答，毛泽东就说："不管你们怎么样，我反正不愿意离开延安！"

毛泽东从容地登上吉普车，汽车的马达响了起来。车队缓缓地离开了延安城，在车上毛泽东扭头深情地再望了一眼渐渐隐去的延安宝塔山，心里默默地念颂着：延安！我们不久会回来的，一定会回来的！

毛泽东生活和战斗了10年的延安生活结束了，他又满怀信心地踏上了转战陕北的征途。

附　录

毛泽东在延安活动简表

（1937 年 1 月 13 日——1947 年 3 月 18 日）

1937 年

1 月 13 日　随中共中央机关进驻延安。

1 月中旬　兼任抗大教育委员会主席。

1 月 28 日　同朱德出席延安抗日救国会举行的纪念“一·二八”抗战庆祝大会，并讲话。

2 月 9 日　会见《大公报》记者范长江。

2 月 10 日　中共中央发出致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电，向国民党提出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

2 月 24 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决定由林伯渠主持西北办事处工作，筹建陕甘宁边区政府和准备更名改制工作。

3 月 1 日　会见美国作家、记者史沫特莱。

3 月 2 日　为抗大第二期第二队学员题词：“要学习朱总司令：度量大如海，意志坚如钢。”

3 月 13 日　签发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惩治贪污浪费的命令。

同日　同朱德致电绥远阵亡将士追悼大会，吊唁傅作义部为收复百灵庙等地阵亡将士：追念国殇，同深恸悼。”

3 月 23 日至 31 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讨论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和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以后，国内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势和中共的任务，批评张国焘的错误，作出《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

4 月 5 日　同朱德派林伯渠为代表，参加祭黄帝陵的民族扫墓典礼。

4 月 7 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修改国民大会选举法和组织法。

4 月 10 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青年工作。

4 月 12 日　出席西北青年救国代表大会开幕典礼并发表讲

话。

5月2日至14日　出席苏区党代表会议。在会上作《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的报告，并作题为《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结论，强调在统一战线中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重要性。

5月10日　同朱德发出关于征集红军历史材料的通知。

5月15日　致电西班牙人民，表示对他们保卫祖国斗争的支持。

5月29日　出席欢迎国民党中央考察团的晚会，并致欢迎词。

6月3日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发言，肯定刘少奇在白区工作会议所作的《党与群众工作》的报告是正确的。

6月12日　同朱德、林彪、萧劲光、李德等5人被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任命为军事研究委员会委员。

6月22日　会见美国外交政策协会远东问题专家毕森、美国《太平洋事务》杂志主编拉铁摩尔、美国《美亚》杂志主编贾菲等。

6月24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各省工作和红军改编等问题。

6月25日　致信美国共产党总书记白劳德。

7月4日　同斯诺夫人尼姆·韦尔斯谈话。

7月7日　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卢沟桥事变，全国抗日战争开始。

7月8日　同红军将领朱德、彭德怀等致电蒋介石，要求实行全国总动员，保卫平津，保卫华北，收复失地。

7月13日　出席延安市共产党员与机关工作人员紧急会议，号召每一个共产党员与抗日的革命者，应该沉着地完成一切必须准备，随时出动到抗日最前线。

7月14日　致电张云逸，提出各方此时的任务：一方面是促成蒋介石建立全国抗战的最后决心；另一方面是自己真正地准备

一切抗日救亡步骤。

7月23日　著文指出抗战存在着两种方针、两套办法和两个前途。

7月—8月　在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讲授《辩证法唯物论》，《实践论》和《矛盾论》其中的两节。

8月1日　出席延安抗战动员体育运动大会，在开幕式上发表讲话，指出中华民族到了最后关头，要动员全国各阶层人民联合起来，与日本帝国主义作殊死的斗争。

同日　同张闻天致电周恩来等，指出“在整个战略方针下执行独立自主的分散作战的游击战争”是红军作战必须坚持的一条原则。

8月4日　同张闻天致电朱德等，提出在同蒋介石谈判时中共方面对国防问题的意见：“总的战略方针暂时是攻势防御，应给进攻之敌以歼灭的反攻，决不能是单纯防御”。

8月5日　同张闻天就红军参战的任务和兵力使用的原则致电朱德等：红军担负的作战任务是以独立自主的游击运动战，钳制敌人大部分，消灭敌人一部分。是在一定地区内协助正面友军作战，而不是“独当一面”。

8月15日　出席延安各界举行的欢送“西北战地服务团”赴华北抗战前线的晚会。

8月22日至25日　出席在陕北洛川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作军事问题和国共两党关系问题的报告，并对会议讨论情况作了总结。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和毛泽东起草的《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的宣传鼓动提纲，确定了党在抗日战争中行动路线和基本任务。会议选出以毛泽东为主席的新的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

8月25日　同朱德、周恩来发布关于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9月11日八路军按战斗序列改称第十八集团军）的命

令。

8 月 27 日　在洛川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的座谈会，提出在统一战线的长期过程中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存在着谁吸引谁的问题，强调统一战线建立后，主要危险是右倾机会主义，要注意在党内加强教育。

9 月 1 日　在党的积极分子会议上作关于中日战争爆发后的形势和任务的报告。

9 月 7 日　写《反对自由主义》一文。

9 月 12 日　致电彭德怀，提出向国民党解释“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作战原则的问题。

9 月 16 日　就敌情变化，改变八路军三个师的部署问题，致电朱德、任弼时。

9 月 21 日　致电彭德怀，指出要实行独立自主山地游击战方针，就要战略上有有力部队处于敌之侧翼，就要以创造根据地发动群众为主，就要分散兵力。

9 月 25 日　致电周恩来等，指出“整个华北工作，应以游击战争为唯一方向”。

9 月 26 日　致电朱德等，庆祝八路军平型关战斗取得胜利。

9 月 29 日　致电周恩来、朱德、彭德怀、任弼时，进一步阐述八路军的作战方针是争取群众，组织群众游击队，在这个总方针下，实行有条件的集中作战。

同日　写《国共合作成立后的迫切任务》一文。本月 22 日和 23 日，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的宣言和蒋介石承认中共合法地位的谈话先后发表，标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毛泽东在文中指出：“历史的车轮将经过这个统一战线，把中国革命带到一个崭新的阶段上去。”

9 月 30 日　同张闻天致秦邦宪、叶剑英，对南方各地游击队整编原则发出指示。

9 月　读完艾思奇所著《哲学与生活》一书，并作了不少摘录。

10 月 6 日　对于华北中国军队作战的战略问题提出补充意见，认为敌人占领石家庄后，将向西面进攻，因此龙泉关、娘子关两点须集结重兵，实行坚守，以便主力在太原以北取得胜利。

同日　写《农村调查》序言一。

10 月 10 日　同谭政电告任弼时等，中共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已成立，任弼时为主任，毛泽东兼代副主任。

同日　致信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院长雷经天，指出逼婚杀人犯黄克功被处极刑，是由他自己的罪恶行为决定的，“共产党与红军，对于自己的党员与红军成员不能不执行比较一般平民更加严格的纪律。”

10 月 13 日　同张闻天发出反对国民党投降主义倾向的指示。指出民族统一战线，不但不取消对国民党的错误政策进行批评与斗争，而且只有在这一基础上才能使统一战线充实巩固起来，使之继续前进。

10 月 19 日　在陕北公学纪念鲁迅逝世周年大会上作《论鲁迅》的讲演，号召大家学习鲁迅精神。

10 月 25 日　同英国记者贝特兰谈话，就中国共产党和抗日战争、抗日战争中的八路军、民主制度和抗日战争等多方面问题，回答了贝特兰的提问。

11 月 1 日　出席陕北公学开学典礼，作关于目前时局的讲演，提出反对民族投降主义，号召实现全民族抗战。

11 月 12 日　在延安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的报告，提出在全国反对民族投降主义和在党内反对阶级投降主义的任务。

12 月 9 日至 14 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抵制王明“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一套右倾投降主义主张。会议决定成立中共“七大”筹备委员会，毛泽东任主席。

12 月 28 日　致电项英，同意新四军编四个支队。

1938 年

1 月　会见梁漱溟，就抗战前途等问题进行长时间谈话。

2 月 1 日至 4 月 1 日　读李达《社会学大纲》、克劳塞维茨《战争论》和潘梓年《逻辑与逻辑学》三本书，写了二个月的读书日记。

2 月 11 日　在延安反侵略大会上演讲。

2 月 15 日　对新四军工作发出指示，指出目前最有利于发展的地区在江苏境内的茅山山脉。

2 月　会见美国合众社记者王公达。

2 月 27 日至 3 月 1 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抗战形势和军事战略问题。

3 月 12 日　出席延安各界举行的纪念孙中山逝世十三周年和追悼阵亡将士大会，并在会上演说。

3 月 15 日　出席中国人民抗日军事大学第三期三大队毕业典礼并讲话。

4 月 10 日　出席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成立大会并讲话。

4 月 11 日　在陕甘宁边区国防教育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开幕典礼上讲话。

4 月 16 日　同张闻天等致电中共中央长江局转张国焘，希望张国焘翻然悔悟，早日归来。

4 月 17 日　会见途经延安的国民政府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卫立煌。

4 月 20 日　同张闻天、刘少奇致电彭真、聂荣臻，指出晋察冀根据地目前的中心任务是在各方面巩固已取得的胜利和继续发展。

同日　出席陕甘宁边区第一次工人代表大会举行的晚会，作题为“结团体，打日本”的讲话。

4 月 21 日　同张闻天、刘少奇发出关于在河北、山东平原地

区大力发展游击战争的指示。

5月4日　致电项英，指出新四军在敌后、在平原广大地区组织民众武装，发展新的游击队，创造根据地，是完全有希望的。

5月11日　会见国民党老党员施方白，在谈话中指出，中国在抗战胜利后不是立即实行社会主义，而是彻底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5月13日　就《大公报》宣传徐州会战是“准决战”的问题，致电王明、周恩来等，指出这个论调是不对的。

5月26日至6月3日　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作《论持久战》的讲演。讲演论述了抗日战争为什么是持久战，预见到抗日战争要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三个阶段而取得最后胜利，批判了亡国论和速胜论以及轻视游击战争的错误思想。

5月30日　发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文章论述了抗日游击战争的重要战略地位及其发展的正确道路。

6月14日　会见平民教育会派来延安参观的诸述初。

6月16日　同秦邦宪、王明、董必武、林伯渠、吴玉章、邓颖超被国民政府聘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

7月2日　会见世界学联代表团成员柯乐满、雅德、傅路德、雷克难。

7月7日　出席延安各界举行的追悼抗日阵亡将士及死难同胞大会，并献挽词：“抗战到底，浩气长存”。

8月15日　出席陕甘宁边区教育厅主办的暑期小学教员国防教育研究班毕业典礼，作题为《教育与战争》的演讲。

9月14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上王稼祥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和季米特洛夫的意见：中共一年来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中共中央领导机关要以毛泽东为首解决统一领导问题，要有亲密团结的空气。

9月29日至11月6日　出席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为主席团成员。会上代表中央政治局作《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及

结论报告。毛泽东提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的任务。全会批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政治局的路线。这次会议基本上克服了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统一了全党的步调。

11月20日　日机轰炸延安，当晚由延安市内凤凰山麓搬至杨家岭办公。

1939年

1月2日　为八路军总政治部主办的《八路军军政杂志》创刊撰写发刊词。

1月17日　在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开幕会上讲话，指出抗战一定要有民权主义与民生主义。

2月2日　出席延安党政军生产动员大会并演讲。

2月15日　会见印度援华医疗队爱德华、柯棣华一行。

3月12日　出席延安纪念马克思、孙中山晚会并讲话。

3月18日　出席延安纪念三一八惨案、巴黎公社和慰劳保卫工作人员的晚会并讲话。

4月19日　在《新中华报》上发表题词：“为消灭文盲而斗争。”

4月下旬　撰写《五四运动》一文，指出“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

5月1日　在延安各界国民精神总动员和五一劳动节大会上发表题为《国民精神总动员的政治方向》的演讲。

5月4日　出席延安青年纪念五四运动二十周年大会，作关于青年运动的政治方向的演讲。

5月5日　访萧三，谈文学问题。

5月10日　为鲁艺成立一周年题词：“抗日的现实主义，革命的浪漫主义。”

5 月 20 日　在中共中央干部教育部召开的学习运动动员大会上讲话。

5 月 26 日　撰写《抗大三周年纪念》一文，指出“抗大的教育方针是：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

5 月 30 日　出席西北青年救国会举行的模范青年授奖大会，作题为《永久奋斗》的讲话。

6 月 1 日　出席抗大成立三周年纪念大会，作题为《抗大的政治方针》的讲话。

同日　为英国援华委员会举行“中国周”撰写《中英两国人民站在一条战线上》一文。

6 月 10 日　在延安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作反投降的报告。

6 月 30 日　为抗战两周年纪念撰写《当前时局的最大危机》一文。

7 月 20 日　出席延安中国女子大学开学典礼并讲话，指出：“中国妇女起来之日，就是中国革命胜利之时。”

8 月 1 日　出席延安各界人士追悼平江惨案死难烈士大会，发表题为《用国法制裁反动分子》的演说。

9 月 1 日　关于目前国际形势和中国抗战问题，对《新华日报》驻延安记者发表谈话。

9 月 14 日　在延安干部大会上作关于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的讲演。

9 月 16 日　会见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三记者，回答他们提出的问题，再次表明中共对待磨擦问题的态度，这就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9 月 24 日　会见再次访问延安的美国记者斯诺。

9 月 25 日　在陕甘宁边区机关、学校、部队秋收动员大会上讲话，指出自己动手，自己劳动，这就是我们对待困难的回答。

10 月 4 日　为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共产党人》撰写发刊词，提

出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是战胜敌人的三大法宝。

10月10日　起草《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指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投降危险、分裂危险和倒退危险仍然是当前时局中的最大危险。强调我们的任务，仍然是切实执行“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三大政治口号。

12月1日　起草《中共中央关于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指出“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

12月6日　就晋西事变，同王稼祥电示八路军总部等：“晋西南晋西北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我们绝不能放弃。”

12月9日　同王稼祥就晋西事变与我们的方针发出补充指示，指出我们的方针是“坚决反击阎之进攻，力争抗战派的胜利”。

12月21日　撰写《纪念白求恩》一文。

12月22日　出席欢迎途经延安的抗日将领、东北挺进军总司令马占山的晚会并讲话。

12月31日　同王稼祥就晋西事变和我军部署问题，致电八路军总部、一二〇师：“保持山西抗战根据地在我手中，保持华北与西北的联系，这是目前中心问题”。

12月　主持撰写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第一章、第二章定稿。该书对中国历史、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各项基本问题，作了全面论述，开始使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概念。

1940年

1月5日　同王稼祥致电贺龙、关向应，令贺、关直接负责晋西北对阎锡山旧军作战的指挥。

1月9日　出席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作题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的演讲。2月20日《解放》杂志刊登该文时改名为《新民主主义论》。该文论述了中

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形成的国际国内条件及其基本规律，规定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纲领，是毛泽东思想达到成熟阶段的主要代表作之一。

1月15日　出席中共中央为吴玉章六十诞辰举行的祝贺大会并致祝词，号如人们学习吴玉章“一辈子做好事”、“艰苦奋斗几十年如一日”的精神。

2月1日　出席延安民众声讨汪精卫大会，并发表题为《相持阶段中的形势与任务》的演说。

2月5日　出席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成立大会并讲话。

2月7日　在《中国工人》创刊号上发表《〈中国工人〉发刊词》一文。

2月11日　同王稼祥致电萧克等，确定挺进军的战略任务是确保平西根据地，发展冀东游击战争，直至热河、山海关，并准备将来再向辽宁前进。

2月15日　设晚宴招待去内蒙拍摄《塞上风云》影片外景途经延安的西北摄影队。

2月20日　出席延安各界宪政促进会成立大会，发表题为《新民主主义的宪政》的演说。

3月6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的党内指示，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权在人员构成上实行“三三制”的原则。

3月10日　出席八路军后方技术干部及技术部门政治干部座谈会并讲话，指出技术工作对革命的重要意义。

3月11日　在延安党的高级干部会上作《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的报告。

3月14日　起草中共中央书记处和中央军委致朱德、彭德怀等电，指出“反磨擦斗争必须注意自卫原则，不应超出自卫的范围”。

4月4日　为“四四”儿童节题词：“天天向上”。

5月4日　起草中共中央关于在抗日战争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对东南局及新四军的指示。

5月28日　会见著名作家茅盾。

6月1日　会见到延安参观访问的南洋华侨领袖、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主席国民参政员陈嘉庚。

6月21日　出席延安新哲学会第一届年会并讲话。

7月5日　为纪念抗战三周年而作的《团结到底》一文在《新中华报》发表。

8月28日　同朱德、王稼祥致电朱瑞等：坚持山东根据地，并准备将来调一部向苏北发展。与敌人挤地盘，缩小敌占区，扩大我占区。

9月20日　延安各界庆祝百团大战（第一阶段）胜利、纪念“九一八”九周年大会。被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

10月9日　同朱德、王稼祥致电刘少奇等，指出陈毅部在苏北黄桥地区大胜反共顽军韩德勤部，振我士气，黄克诚南下增援是完全正当的。

10月25日　转发周恩来二十四日来电。周来电说：目前国民党方面的种种情况，“均证明反共高潮是在着着上升，何、白十九日电是表示了国方决心”。

同日　关于对世界形势的估计及对国民党可能进攻的对策，复电周恩来并发彭德怀、刘少奇、项英，指出：“我们应估计到最困难最危险最黑暗的可能性，并把这种情况当作一切布置的出发点”。

11月1日　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致项英电：叶挺及一部工作人员必须过江北指挥江北大部队。你及皖南部队或整个移苏南再渡江北，或整个留皖南准备于国民党进攻时向南突围，二者应择其一。

11月9日　致电周恩来，告以“佳电”发出后各项工作的部

署情况：江南确定主力北移，以示让步，江北确定暂时请免调。

12 月 3 日　致电项英，询问新四军是否已作应付突然事变的各项准备。

同日　出席陕甘宁边区 1941 年经济自给动员大会并讲话。

12 月 18 日　同朱德、王稼祥致电叶挺、项英：形势严重，项英、曾山二人暂勿离开军队，叶及一部人员北上，望速作部署。秘密文件必须烧毁，严防袭击。

12 月 25 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现在还不能说是反共高潮下降，但不过是大吹小打。同日，为中共中央起草《中央关于时局与政策的指示》。指示指出：目前党内的主要危险倾向，仍然是过左的观点在作怪。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既不是一切联合否认斗争，又不是一切斗争否认联合，而是综合联合和斗争两方面的政策。”

12 月 26 日　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致项英、周子昆、袁国平电，指示他们克服动摇犹豫，坚决执行北移方针。

1941 年

1 月 1 日　出席八路军军政学院开学典礼。

1 月 4 日　新四军皖南部队 9000 余人由云岭出发转移。6 日即遭国民党军拦击，8 日在茂林地区陷入预伏圈。新四军被迫抗击，至 14 日，除 2000 余人突围外，其余 6000 余人大部壮烈牺牲，一部被俘。

1 月 7 日　同朱德发急电复叶挺、项英：“你们在茂林不宜久留。只要宣城、宁国一带情况明了后即宜东进，乘顽军布置未就突过其包围线为有利。”

1 月 12 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决定：皖南新四军一切军事、政治行动均由叶军长、饶漱石二人负总责，一切行动决心由叶军长下，项英随军行动北上。15 日，政治局会议通过由毛泽东起草的《中央关于项、袁错误的决定》。

1月15日　致电周恩来等："中央决定，发动政治上的全面反攻，军事上准备一切必要力量"，粉碎国民党的进攻。

1月20日　以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言人的名义对新华社记者发表关于皖南事变的谈话，严正斥责国民党宣布撤销新四军番号并将叶挺交军法审判的反动命令，提出解决皖南事变的十二条办法。

2月2日　同朱德、王稼祥致电彭德怀、刘少奇、周恩来等："反共高潮可能下降，中日矛盾仍属第一"。

2月14日　复电周恩来，指出"军事守势，政治攻势八个字是完全正确的，二者相反正是相成。"

3月1日　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关于谈判无结果坚决不出席参政会复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的急电。

3月12日　致电周恩来，分析蒋介石6日在参政会上的演说，指出我们的攻势有结果，与蒋介石关系仍是一打一拉即拖的局面，仍应继续我们的攻势。

3月18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后的时局》的党内指示，指出要反对认为国共已最后破裂或很快就要破裂的错误的时局估计及由此产生的许多不正确的意见。

4月19日　为《农村调查》一书写跋。

5月1日　亲自修改审定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正式发布。

5月8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通过毛泽东起草的《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

5月16日　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在延安创刊，毛泽东题写报名和撰写发刊词。

5月19日　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报告，主张改造全党学习方法和学习制度，反对主观主义，提倡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

6月12日　同朱德、王稼祥、叶剑英致电朱瑞、陈光、罗荣

桓等：目前我党方针在拉蒋抗战。我军应坚持党中央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自卫的原则。

6月23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反法西斯的国际统一战线的决定》。

7月5日　致电周恩来：我党今年“七七”宣言的宗旨，主要在拉英、美、蒋反德、日、意，但包括对蒋批评。

7月7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设立调查研究局的通知，以毛泽东为主任。

8月1日　中共中央发出毛泽东起草的《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

8月26日　为《鲁忠才长征记》写按语。

9月10日至10月22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检讨了党在十年内战后期的领导路线问题，决定成立中央研究组，毛泽东任组长。

10月30日　出席在延安召开的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代表大会并讲话。

11月6日　出席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开幕会，在讲话中批评不善于同党外人士合作的狭隘的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作风。

11月7日　为庆祝十月革命节在延安发表关于目前时局的广播讲演。

12月8日至9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通过毛泽东主持修改的《中国共产党为太平洋战争的宣言》。

12月　主持编辑的《六大以来》正式印制。

1942年

1月17日　为《文化课本》作序。

1月23日　致信谭政、莫文骅、指示八路军留守兵团及晋西北部队学习红军第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的决议。

1月26日　起草《中宣部宣传要点》，内容是反对党内的主观

主义和宗派主义。

1月28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毛泽东在会上指出：这一决定是第一次公开承认资本主义生产并给予奖励。

2月1日　在中共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作《整顿学风党风文风》的报告，提出“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的任务。

2月8日　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召集的干部会议上发表《反对党八股》的演说。

2月21日　同王稼祥电告周恩来：高级学习组中可以讨论过去问题，但不牵涉人的问题。研究宗旨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3月8日　在《解放日报》上发表题词：“深入群众，不尚空谈”。

3月23日　在延安举行的高级技术干部季会上讲话，强调技术建设的重要性，对不统一不合理的现象必须立即纠正。

3月30日　在中央学习组作《如何研究中共党史》的报告。

3月31日　同秦邦宪召集延安各部门负责同志和作家七十多人开座谈会，讨论《解放日报》改版问题。

4月3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会议通过经毛泽东修改的《中央宣传部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

4月20日　在中央学习组作关于整顿三风的报告，报告今年明年是最困难的两年，所以要加强我们的内部教育。

5月2日　出席延安文艺座谈会第一次会议，并作《引言》，指出文艺工作者应该解决立场问题、态度问题、工作对象问题、工作问题和学习问题。

5月16日　出席延安文艺座谈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听取与会者对文艺问题的各种意见。

5月21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决定成立中央总

学习委员会，由毛泽东负总责。

5月23日　出席延安文艺座谈会最后一次会议。在所作《结论》中深刻阐明了文艺工作者深入工农兵、密切联系实际、学习马克思主义和改造世界观的重要性，回答了现代文艺运动中许多有争论的问题。

5月30日　在鲁迅艺术文学院讲话，号召文艺工作者走出“小鲁艺”，到“大鲁艺”中去，全心全意地为工农兵服务。

6月22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会议决定今后总学委会议与书记处会议合并举行，但有关学习问题，仍用中央总学委名义发通知。

6月25日　写信祝贺在华日本共产主义者同盟成立。

7月2日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发言指出：中央为纪念抗战五周年宣言有一个新内容，就是战后的建国方针和强调团结的问题。

7月4日　致电聂荣臻：此次整风是全党的，包括各部门各级干部在内。在一个根据地内，主要应着重教育边区与地委两级，其次是县一级。注意抓紧党政军民学各方面高级干部的学习领导，克服他们中存在着的三风不正的残余。

7月9日　致电刘少奇：“掌握思想领导是掌握一切领导的第一位”。

8月4日　致电陈毅，指示华中精兵简政问题。

8月31日　代表中共中央电贺英共机关报《工人日报》复刊。

9月7日　《解放日报》发表毛泽东撰写的社论《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阐述了精兵简政政策的重要性。

9月20日　拟定《〈解放日报〉第四版征稿办法》。

10月9日　为《解放日报》发表刘少奇《论党内斗争》一文起草编者按语。

10月12日　在《解放日报》发表为延安平剧研究院成立的题词：“推陈出新”。

10月19日　出席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开幕会并讲话。

10月28日　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致各中央局、分局电：务使我们的宣传增强党性，克服宣传人员中闹独立性的错误倾向。

10月31日　致电林枫，指示检查根据地缩小的原因，制定开展游击战争向敌人挤地盘的具体方案。

11月21日、23日　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结合中国共产党的情况，讲斯大林论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

12月　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期间，亲自组织收集和整理经济和财政方面的历史的和现状的材料，为会议撰写《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书面报告。

本年　为拍摄《南泥湾》电影题词："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1943年

1月1日　在干部晚会上讲话指出：1943年在前方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任务是战斗、生产、学习；在后方陕甘宁边区的主要任务是生产和学习。

1月14日　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闭幕会上作关于领导问题的讲演，指出党的领导就是集中人民意见，经过思考研究变成党的意见，然后又把党的意见拿到人民中去实现。同日，西北局高干会，对领导经济建设成绩卓著的王震等22人及三个单位给予奖励，毛泽东分别为22人的奖状题词。

1月25日　致电彭德怀：民主政权的实质是改善人民的经济生活与提高人民的政治觉悟，二者均为抗战。

2月7日　为进一步改善国共关系，同朱德、王稼祥、叶剑英向各战略区发出对统战工作的指示。

2月9日　致电周恩来等，告知："边区财政难关已渡过"，"如不遭旱大有办法，人民经济亦大有发展，可达到丰衣足食"。

2月12日　复电林彪并告周恩来，指出国共谈判成功大概要等到实行反攻前夜，不到反攻，彼方认为是不需要和我妥协的。

3月16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关于时局与方针问题的报告，指出中央机关的任务是工作、生产与教育，去年以完成整风学习为第一位，今年要以工作为主，从5月1日起开始工作。

3月20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推定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书记处主席、中央宣传委员会书记、中央党校校长。

4月6日　致电周恩来：对国民党这次反共，我方应取守势，待彼方进攻再行反驳，而不应事先公开发表文件。

4月22日　复信何凯丰："我的思想（马列）自觉没有成熟，还是学习时候，不是鼓吹时候；要鼓吹只宜以某些片断去鼓吹（例如整风文件中的几件），不宜当作体系去鼓吹，因我的体系还没有成熟。"

4月30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通过毛泽东起草的关于何时打败日本问题的宣传工作的指示。指示要求各中央局及分局须作长期坚持抗战的打算，准备再作两年至三年的极端艰苦的斗争，并须准备意外的变化。

5月21日　将季米特洛夫关于解散共产国际的来电电告周恩来，并说明政治局会议完全同意此种提议。

5月26日　出席延安干部大会，作关于共产国际解散问题的报告。

6月1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毛泽东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领导方法的决定》。决定指出："我们共产党人无论进行何项工作，有两个方法是必须采用的，一是一般和个别相结合，二是领导和群众相结合。"

6月6日　电示彭德怀："整风前一阶段注重学风是正确的，但后一阶段便应注重党风。"只有如此，"才能将思想方法应用于

党性的实践，克服党性不纯现象”。

7月1日　出席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二十二周年和抗战六周年干部晚会，并作报告。

同日　致信康生，要他在《防奸经验》第六期上登载关于防奸工作的两条路线的指示，反对“逼，供，信”的错误路线。

7月2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抗战六周年纪念宣言》在《解放日报》发表，指出抗日战争应该是始于团结，终于团结，团结是全国人民抗日的基础。

7月7日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对付国民党反共宣传与进攻陕甘宁边区问题时，发言指出：我们要以宣传对付他们的反共宣传，以军事对付他们的军事进攻。

7月8日　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致各中央局、中央分局电：“中央决定发动宣传反击，同时准备军事力量粉碎其可能的进攻。”

7月12日　为《解放日报》撰写的社论《质问国民党》发表。

7月13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会上发言指出，对于国民党的这次进攻，我们采用“坚持抗战，反对内战”、“坚持团结，反对分裂”的方针，并动员群众准备力量，表示坚决反抗，是非常必要的。

同日　致电彭德怀，指出：我宣传闪击已收效，此次蒋之阴谋迅速破产。

7月21日　电示董必武：为彻底揭穿蒋介石企图以宣传攻势动摇我党，除已发通电和社论外，并于本日公布陈伯达为驳斥蒋著《中国之命运》一书所写的《评〈中国之命运〉》一文。

8月2日　出席中共中央办公厅举行的欢迎周恩来等从重庆归来的干部晚会。

8月5日　就实行精兵简政致电聂荣臻：“你们要下决心减去3万人，否则民困军疲，将来很危险。只要能保存3万精兵（包括游击队），就是了不起的成绩。”

8月8日　在中央党校第二部开学典礼上讲话，指出我们这

一辈子要干两个革命，一个是新民主主义革命，一个是社会主义革命。这两个革命要在我们手里完成。

8月11日　同周恩来致电董必武，通告中央拟于八九月发动反对中国的法西斯主义的运动。

8月30日、9月1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周恩来关于三年来大后方工作的报告。毛泽东在会上讲了抗日时期党的路线问题。

9月29日　因国民参政会三届二次会议通过反共决议，同周恩来致电董必武："驻会委员第一次会请假不去，以示对参政会通过反共决议之抗议。

10日1日　起草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减租、生产、拥政爱民及宣传十大政策的指示》在《解放日报》发表，十大政策是：对敌斗争、精兵简政、统一领导、拥政爱民、发展生产、整顿三风、审查干部、时事教育、三三制、减租减息。

10月9日　在绥德反奸大会材料上指示："一个不杀，大部不抓，是此次反特务斗争中必须坚持的政策"。

10月14日　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干会议上作报告，指出备战是这次高干会的中心任务。报告对十大政策作了阐述。还指出以斗争求团结的原则，要运用到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对农民，无产阶级自己的队伍，在无产阶级先锋队内的四个范畴中去。

10月　主持编辑的《两条路线》（上、下）成书。

11月6日　出席中共中央办公厅为庆祝十月革命举行的晚会并讲话。

11月12日　同朱德参观延安市骡马大会。

11月13日　为中直、军直第二届生产展览会题词："群众生产，群众利益，群众情绪，这些都是领导干部们应时刻注意的，庆祝今年生产的胜利。"

11月29日　在中共中央招待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大会上作

题为《组织起来》的讲话。

12月9日　参观陕甘宁边区生产展览会后，邀请17位劳动英雄座谈生产经验，鼓励他们要将这些经验在群众中广泛宣传，使这些经验能指导全边区人民的合作生产。

12月16日　同彭德怀致电邓小平："努力生产，注意积蓄，准备迎接更加艰苦的局势之到来，这是完全对的，请你坚持此方针"。

12月27日　同康生致电华中局等："反特斗争必须坚持少捉少杀及少捉不杀的方针"。

1944年

1月1日　出席中共中央办公厅举办的新年干部晚会。

1月9日　观看平剧《逼上梁山》后，写信给该剧编导，表示称赞与祝贺。

1月10、11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听取聂荣臻关于晋察冀边区工作报告。

1月18日　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致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并转各有关区党委电："对于国民党的军队，我军谨守防地，不得发生由我启衅之任何事件。仅在彼方进攻时。我应执行自卫原则。"

1月19日　复信林伯渠："生产节约今年必比去年有更好成效，你个人计划能实行，必有好的影响。我也定了一点计划，准备实行。"

2月4日　致电董必武："观察今年大势，国共有协调之必要与可能。我们应做些工作，除延安报纸力避刺激国民党，并通令各根据地采取谨慎步骤。

2月7日　接见延安市人民秧歌队和接收群众团体代表的献旗。

2月24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七大"的准备工作和党的历史问题。

3月1日　为中共中央政治局起草关于宪政问题给各中央局、中央分局转各区党委的指示。

3月5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关于路线学习、工作作风和时局问题的长篇讲话。

3月22日　在中共中央宣传委员会召开的宣传工作会议上讲话，谈发展陕甘宁边区的文化教育问题。

4月2日　致电周杨，表示把自己的文章“配在马、恩、列、斯……之林觉得不称，我的话是不能这样配的。”

4月5日　同朱德、彭德怀致电罗荣恒等：争取国内平静，准备拉蒋抗日是目前政策中心。

4月11日　指导写成并修改的《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由谭政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公布。

4月12日　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作关于学习与时局问题的报告，传达中央政治局关于研究党的历史经验应取何种态度等几个重要问题的结论，强调必须在党的干部中间提倡“放下包袱和开动机器。”

4月15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国共关系问题与林伯渠去重庆谈判问题。

4月29日　致信李鼎铭，评论陕人李健侯所著的关于李自成起义的书《永昌演义》。

5月15日　关于国共谈判条件问题，致电林伯渠，告知中共中央向国民党方面提出的解决若干急切问题的意见二十条。

5月21日　出席中共六届七中全会第一次会议，代表中央政治局向全会提出关于党的历史问题的六点意见和作工作报告，被推选为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及七中全会主席团主席。

5月22日　在中共中央办公厅举行的招待会上讲话，号召共产党员都应该学习经济工作，反对只会做一种抽象的“革命工作”的空头革命家。

5月24日　出席延安大学开学典礼，并讲话，指出延安大学

应为抗战及边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服务，为实际服务，不要犯教条主义。

6月5日　出席中共六届七中全会第二次会议。会议讨论和通过毛泽东起草的《中央关于城市工作的指示》，提议成立城市工作委员会，并建议“七大”的议程增加城市工作一项。

6月12日　会见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在致词中说：“中国人民非常需要民主，因为只有民主抗战才能取得胜利，也只有民主才能使中国在战后继续团结。

6月14日　为《解放日报》撰写的社论《纪念联合国日　保卫西安与西北》发表。

7月1日　致信丁玲、欧阳山，对丁玲写《田保霖》和欧阳山写《活在新社会里》的“新写作作风”，表示祝贺。

7月3日　出席中共中央举行的欢迎陕甘宁边区合作社会议全体代表的招待会，讲话阐述了合作社的方针和任务。

7月4日　为庆祝美国独立一百六十八周年，同朱德设宴招待在延安的美国侨民和中外记者团留延的外国记者。

7月26日　出席为美军观察组到达延安举行的晚宴。8月7日　美军观察组第二批人员到达延安，当晚同朱德、李鼎铭又设宴招待全体人员并致词，祝中美友好和抗战胜利。

8月12日　为《解放日报》修改定稿的社论《衡阳失守后国民党将如何》发表，指出“一切问题的关键在政治，一切政治的关键在民众，不解决要不要民众的问题，什么都无从谈起。”

8月17日　在董必武向周恩来请示如何对待增补国民参政员问题的电报上指示：应与张澜、左舜生商量各党派联合政府。参政会可同意增人，取积极态度，但是第二位的。

8月18日　关于第三届第三次国民参政会问题，致电董必武、林伯渠，指出“参政会开会，你们可仍持去年出席的态度”，何应钦等如向我进攻，“我取针锋相对态度还击之，并对外发表抗议”。

8 月 23 日　同谢伟思谈话，指出美国政府要努力引导国民党改革自己，不要支持蒋介石打内战。

8 月 31 日　在致博古的信中指出，“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是工厂（社会生产，公营的与私营的）与合作社（变工队在内），不是分散的个体经济。”“由农业基础到工业基础，正是我们革命的任务。”革命必然包括解放个性，“个性如不得解放，就没有民主主义，也没有社会主义。”

9 月 1 日　出席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会议决定派王震、王首道等率部南下，成立以彭真为部长的中央城市工作部等。

9 月 4 日　中共中央电示林伯渠等，“目前我党向国民党及国内外提出改组政府主张时机已经成熟”。9 月 5 日　董必武、林伯渠在第三届第三次国民参政会上提出成立各党派民主联合政府等问题。

9 月 8 日　出席中央警备团为张思德举行的追悼会，作《为人民服务》的讲演。

10 月 4 日　在博古的陪同下，到清凉山中央印刷厂礼堂看望解放日报社和新华社的全体工作人员，并讲话。

10 月 14 日　同朱德致电邓小平、滕代远：华北可能成为主要的决战战场。在可能条件下，我军应乘虚尽量消灭伸入根据地内的伪军、顽军及敌军的小据点，扩大根据地，但一般的暂时不打交通要道及较大城市。

10 月 25 日　在中央党校大礼堂给即将去前线的干部作报告，指出：我们共产党人要学柳树、松树，象柳树那样可亲，松树那样可靠。

10 月 30 日　在陕甘宁边区文教大会上讲话，阐述新民主主义文化运动中的统一战线方针。

11 月 1 日　同朱德等出席八路军南下支队在延安东关机场举行的誓师阅兵仪式，并发表讲话。

11 月 7 日　同周恩来等到延安机场迎接从重庆抵延安的赫尔利。8 日、9 日同赫尔利会谈。10 日，同赫尔利分别在《中国国民政府、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协定》上签字。决定由赫尔利将协定转交蒋介石。后国民党声称不能接受此协定，并提出反建议案。

11 月 21 日　致信郭沫若："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

12 月 12 日　同周恩来致电王若飞："我们毫无与美方决裂之意"，"牺牲联合政府，牺牲民主原则，去几个人到重庆做官，这种廉价出卖人民的勾当，我们决不能干"。

12 月 15 日　在陕甘宁边区第二届第二次参议会上作题为《一九四五年的任务》的演说。

12 月 25 日　中共中央发出经毛泽东修改审定的关于目前形势与任务的指示。指示指出，国共力量对比，已由过去多年的国强共弱，达到现在的国共几乎平衡，并正在走向共强国弱的地位。

1945 年

1 月 1 日　出席中共中央举行的新年干部晚会并讲话，号召加强团结，战胜日本帝国主义。

1 月 10 日　在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大会上作题为《两三年内完全学会经济工作》的讲话。

1 月 31 日　为《解放日报》撰写的社论《游击区也能进行生产》发表。

2 月 3 日　致电周恩来：罗斯福、邱吉尔、斯大林正在开会，美蒋均急于和我们求得政治妥协，故应强调须按我党所提条件办，否则我们不参加政府。

2 月 14 日　会见前来拜年的延安市西区群众、警备团、枣园机关的代表和劳动英雄、模范工作者等，并讲话。

2月15日　在中共中央党校讲演，就审查干部工作中的错误作自我批评，赔礼道歉。

3月1日　起草中共中央复河南区党委电，指出：华北各根据地因长期战争，连年旱灾，财政均感到困难，你们必须确定与坚持自力更生的财政原则，不要希望外援。

3月28日　出席中共中央办公厅为林伯渠60大寿辰举行的祝寿会。

3月31日　出席中共六届七中全会第七次会议。会议通过拟提交“七大”的毛泽东作的政治报告草案。

3月至4月　对《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案作多次修改。

4日1日　出席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会议决定：董必武带随员二人参加中国出席旧金山联合国制宪会议代表团。

4月9日　致电郑位三等，要求鄂豫皖边区深入发动群众，开展大生产运动，“自己动手，克服困难”。

4月20日　出席中共六届七中全会最后一次会议。会议基本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4月21日　出席中共“七大”预备会议，作《“七大”工作方针》的报告。

4月23日　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致开幕词指出：在中国人民面前摆着两条道路，两种命运。我们的任务就是为着打败日本侵略者，建立一个独立的、自由的、民主的、统一的、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

4月24日　向中共“七大”提交《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并就此作口头报告。报告总结了抗战中两条不同指导路线的斗争，阐述了党在民族民主革命阶段的一般纲领和具体纲领，指出中国人民应当争取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的前途。报告第一次从理论上概括了党的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密切联系群众、自我批评的三大优良作风。

4月27日　为《解放日报》撰写的社论《全军生产自给，今年应是普遍推行的一年——兼论整风与生产的历史重要性》发表。

5月3日　同朱德致电斯大林，祝贺苏联红军于5月2日攻克柏林。

5月11日　出席朱德等举行的招待在延的苏、美、英等国朋友的宴会，庆祝盟军在欧洲的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结束。

5月24日　在中共“七大”上代表主席团作关于中央委员会选举方针的报告。

5月31日　在中共“七大”上作关于政治报告讨论的结论。

6月2日　出席中共“七大”主席团和各代表团主任会议，在谈到形势问题时说：“美国现在定下的方针是联蒋抗日拒苏反共，全面称霸东方，指出美国只帮助蒋介石反共，这种政策是很危险的。

6月9日　在“七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

6月10日　出席中共“七大”，作关于选举候补中央委员问题的报告。

6月11日　向中共“七大”致闭幕词，以“愚公移山”的寓言，鼓励全党坚持奋斗，去争取胜利。

6月15日　出席中共“七大”主席团会议。会议讨论决定不参加第四届国民参政会，讨论准备中共七届一中全会的议程。

6月17日　中共“七大”代表及延安各界代表举行中国革命死难烈士追悼大会。毛泽东主祭，并献挽词和讲话。

6月19日　出席中共七届一中全会第一次会议，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兼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主席。

7月上旬　同朱德、周恩来、林伯渠等到机场迎送褚辅成、黄炎培、冷遹、傅斯年、左舜生、章伯钧六位参政员，并同六参政员多次进行会谈。

7月10日　为新华社撰写的评论《评蒋介石参政会演说》发表。

7 月 12 日　为新华社撰写的评论《赫尔利政策的危险》发表，文章批评美国政府的扶蒋反共政策。

7 月 22 日　以新华社记者的名义，撰写的关于时局的评论《内战危险空前严重》发表。

同日　致电中共中央重庆工委委员徐冰、刘少文，告知胡宗南调动四个军的兵力，开到边区边境三原、淳化一带，其一部已袭入我关中地区，内战危机突趋严重，让他们向邵力子提出质问，要求制止内战。

7 月 23 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如何打退胡宗南部对陕甘宁边区淳化县爷台山的进攻。

7 月 25 日　新华社播发毛泽东写的新闻稿《爷台山战事扩大》。

7 月 29 日　致电福斯特和美共中央，对美共抛弃白劳德的修正主义路线，重新恢复美国共产党表示祝贺。

8 月 4 日　起草中共中央致郑位三等电，指示他们，现在就应考虑在桐柏山、大别山、鄂西、鄂南、鄂东、襄北扩展根据地问题。准备精神的与实力的条件对付将来内战危险，应是你们今后工作的出发点。

8 月 9 日　出席中共七届一中全会第二次会议，在讨论大反攻问题时提出：苏联参战，使抗日战争进入最后阶段。我们的任务有四项：配合作战；制止内战；集中统一；国共谈判。

同日　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

同日　同朱德致电斯大林，对苏联政府对日宣战，表示热烈欢迎，并表示中国解放区的一万万人民及其军队，将全力配合红军及其他同盟国军队消灭日本侵略者。

8 月 13 日　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的讲演。

8 月 23 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提出今后的口号是和平、民主、团结。

8月28日　偕同周恩来、王若飞，在张治中和赫尔利的陪同下，飞赴重庆谈判。10月10日　国共双方鉴署《国民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10月11日　飞返延安。

10月17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电晋冀鲁豫中央局，对胜利的上党战役表示祝贺，并指示邯郸战役的作战部署。

同日　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关于重庆谈判》的报告。

10月25日　在抗大七分校作报告，欢迎即将上前方的学员。

11月1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关于11月作战部署致各战略区电："我党任务是夺取东北，巩固华北华中。"

11月5日　以中共中央负责人身份发表《国民党进攻的真相》的谈话。

同日　视察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并用广播与张家口通话。

11月7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减租和生产是保卫解放区的两件大事》的党内指示。

11月中旬至12月中旬，患病治疗休养。

12月15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党内指示《一九四六年解放区的工作方针》。

12月16日　到延安机场欢送周恩来赴重庆参加政协会议。

12月28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给东北局的指示《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指出：现时在东北的任务是建立根据地，应建立在距离国民党占领中心较远的城市和广大乡村。

1946年

1月8日　致信蔡和森之子蔡博等，指出："新中国需要很多的学者及技术人员，你们向这方面努力是很适当的"。

1月10日　为重庆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题词："为和平民主团结统一而奋斗。"

1月28日　致信柳亚子先生："闻先生已迁沪，在于再追悼会上慷慨陈词，快何如之。"

2月1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目前形势与任务的指示》，指出：政治协商会议“已获得重大结果”，“从此中国即走上和平民主建设的新阶段”。

2月6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重庆中共代表团电：同意毛泽东、林伯渠、董必武、吴玉章、周恩来、刘少奇、范明枢、张闻天为国民政府委员的我方人选。

2月16日　在延安王家坪接见延安秧歌队，并观看演出。.延安县川口区6乡人民代表向毛泽东敬献“人民救星”的金匾。

2月25日　修改定稿的社论《重庆事件与东北问题》在延安《解放日报》上发表。

3月4日　同朱德、刘少奇、林伯渠等到延安机场迎接最高军事三人小组成员，马歇尔、张治中等。晚，出席欢迎晚会，并致欢迎词。

3月5日　到延安机场欢送马歇尔等，声明中共坚决贯彻停战协定、政协协议、整编军队等3个协定。

3月6日　起草中共中央致华东局、晋冀鲁豫局，华中分局，并告聂荣臻、贺龙电：“无论将来情况如何，我们均须精兵简政，减轻民负，方有利于解放区之巩固与坚持。”

3月7日　起草中共中央致董必武、王若飞电：同意叶挺加入中国共党。

3月17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周恩来电，提出对东北停战协定的修改意见。

4月5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各中央局及军队首长电，指出：“目前正是国际国内反动逆流高涨之时，望提高警惕，加强侦察，加强防御配置，严防敌人突袭，切勿大意。”

4月6日　起草中共中央致林彪并告彭真电，指出：“四平和本溪两仗如能打好，东北局面即可好转。党内如有动摇情绪，哪怕是微小的，均须坚决克服。”

4月13日　为“四八”遇难烈士，中共中央统战部成立毛泽

东等 26 人组成的治丧委员会。

4 月 20 日　为“四八”被难烈士的题词“为人民而死，虽死犹荣”在延安《解放日报》发表。

4 月 27 日　起草中共中央军委致林彪电，指出：“四平守军甚为英勇，望传令奖励。”“请考虑增加一部分守军，化四平街为马德里。”

5 月 1 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中央关于练兵问题的指示》，要求各地必须抓紧练兵。

5 月 4 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决定把减租减息政策改为没收土地分配给农民的政策。

5 月 19 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林彪告彭真电，指出“四平我军坚守一个月，抗击敌军十个师，表现了人民军队高度顽强英勇精神，这一斗争是有历史意义的。”

5 月 20 日　致信新安旅行团，希望他们努力学习，继续前进，争取民主中国的胜利。

5 月 23 日　致电民主同盟张君劢、黄炎培、沈钧儒、章伯钧、梁漱溟，对他们提出的国共双方停止东北内战 3 办法表示欢迎。

6 月 1 日　就中原军区部队突围，为中共中央起草致郑位三、李先念、王震电：“全面内战不可避免，”“你们须求自救之道”。“必须准备对付敌人袭击及突围作战，预拟突围后集中行动及分散行动两个计划。”

6 月 22 日　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的名义发表声明，抗议美国“军事援华法案”，要求美国停止一切对国民党的军事援助和撤退美国在华军队。

6 月 23 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中原局电：同意中原军区部队“立即突围，愈快愈好，不要有任何顾虑，生存第一，胜利第一。”

6 月 26 日　国民党军向中原解放区大举围攻，解放战争正式开始。

7 月 13 日　同朱德致电李公朴先生的夫人张曼筠，对李公朴

于 11 日在昆明被国民党特务暗杀表示哀悼。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陈毅、粟裕等电，指示“我苏中、苏北各部先在内线打起来，最好先打几个胜仗”。

7 月 17 日　同朱德致闻一多的家属，对闻一多于 15 日在昆明被国民党特务分子暗杀表示哀悼。

7 月 25 日　同朱德致陶行知的家属，对陶行知的逝世表示哀悼。

7 月 28 日　为于本月 21 日逝世的关向应题写“忠心耿耿为党为国，向应同志不死”的挽词，在延安《解放日报》上发表。

8 月 6 日　会见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提出“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论断。

8 月 7 日　在中共中央致华中局并陈毅等的电报中加写一段文字：“我们必须自觉地向富农让步，坚持中央不变富农自耕土地的原则。”“对待一般中小地主亦应与对待汉奸豪绅恶霸有所区别。”

8 月 22 日　就定陶战役作战部署，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刘伯承、邓小平电，庆祝晋冀鲁豫野战军出击陇海路战役取得大胜利，并指出：望集中主力于路北休整，补充新兵，以利再战。“凡无把握之仗不要打，打则必胜。”

9 月 16 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指示。

9 月 18 日　接见 17 日抵延安的王震和三五九旅部分指战员。

9 月 22 日　致信陈瑾昆，告知陈著《余为何参加中共工作》已交《解放日报》发表并广播全国。

9 月 27 日　致信陆定一，指出目前宣传重点，在于宣传我军必胜，蒋军必败的种种道理。

10 月 1 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对党内的指示《三个月总结》。

10 月 5 日　出席中共中央办公厅举行的盛大晚会，欢迎中原

突围归来的将士及由京沪返延的廖承志等。

10 月 30 日　同朱德设宴招待英国统一援华基金会会长克利浦斯夫人。

11 月 6 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通过保卫延安的命令。

11 月 18 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蒋介石召开伪国大和进攻延安，给各中央局的指示。

11 月 21 日　由枣园迁居后沟。

同日　同刘少奇、周恩来召开三人会议，提出做打倒蒋介石的工作。

11 月 30 日　在《解放日报》发表为祝贺朱德 60 寿辰的题词“人民的光荣”。

1947 年

1 月 1 日　在《解放日报》发表《新年祝词》，指出：“独立、和平、民主的新中国一定要在今后数年内奠定稳固的基础。”

1 月 17 日　就莱芜战役军事部署，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陈毅、陈士榘、粟裕并告华东局电。

1 月 24 日　同朱德宴请延安地区劳动英雄、居民及驻军干部。

1 月 29 日　为中国工人运动领导人朱宝庭逝世题写挽词：“工人阶级的英雄。”

2 月 1 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中国时局已发展到新的人民大革命高潮的前夜。会议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的党内指示。

2 月 24 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萧劲光、陈云、萧华并告林彪电，对他们在三保临江作战中歼敌一个团两个营，极为欣慰。

3 月 12 日　同周恩来由枣园后沟搬到王家坪人民解放军总

3 月 13 日　国民党军胡宗南部分路向延安发动进攻。

3 月 16 日　接见新四旅部分负责人并讲话，表示“少则一年，多则两年，我们还是要回到延安的。

3 月 18 日　随中共中央机关撤离延安，开始转战陕北。

后　记

为继承发扬延安精神和纪念毛泽东诞辰百周年，我应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之约，编写了《毛泽东在延安纪事》一书，但由于种种原因，我很晚才得以动手编写，以至延误了出版期限。好在得到了丛书编委会的支持和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的大力协助，才使本书与广大读者见面。在此我谨向给于本书支持和帮助的同志，表示忠心的感谢！

本书记载了从1937年1月13日到1947年3月18日，10年多的时间里，毛泽东在延安的一些活动。需要说明的是，本书既不是传记，也不同于年谱和大事记。所以它不能包括毛泽东在延安的全部活动，也不能说明书中所写的都是毛泽东在延安主要的或重要的活动。为此，本书在后面附录了《毛泽东在延安活动简表》，以供参考。

在付梓之时，我仍感到本书有些地方稍嫌单薄，尚可充实，但时间已经不允许了。由于出书时间紧迫，书中难免存在疏漏之处，敬请广大读者给以批评指正。

刘益涛

1993年12月于北京